

2016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3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经费的支持

2016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3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编的《北方民族考古》系列丛书第3辑，收录的24篇论文大部分选自中国人民大学"2015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草原丝绸之路"这一主题，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化互动与交流、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艺术史等学科研究者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考古. 第3辑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9

ISBN 978-7-03-049961-5

Ⅰ. ①北… Ⅱ. ①中…②中… Ⅲ. 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Ⅳ.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5033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彭 涛

责任印制：徐晓晨 / 封面设计：张 放 李雨濛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1/2 插页：4

字数：510 000

定价：158.00元

《北方民族考古》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科技与文化

附录

彩版目录

辽宁北票发现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姜洪军　杜志刚

（北票市文物管理所，北票，122100）

在北票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我市境内共发现了2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期陆续又发现5处，共7处，这些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我们以前不了解不清楚的，为研究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布局、现状、性质及古人类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为北票辖区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

一、各个地点遗物描述

遗址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和牤牛河流域，还有黑城子河、老寨川河、十八奋河、凉水河和巴图营河[1]附近的山顶或山丘上；它们分别为：房申地遗址、大力虎遗址、丫台山遗址、店后山遗址、西北村后遗址、铁吉营东山遗址及下石砬子遗址。各遗址通过采集到的陶器残片标本分析，均可确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现分述如下（图一）。

1. 房申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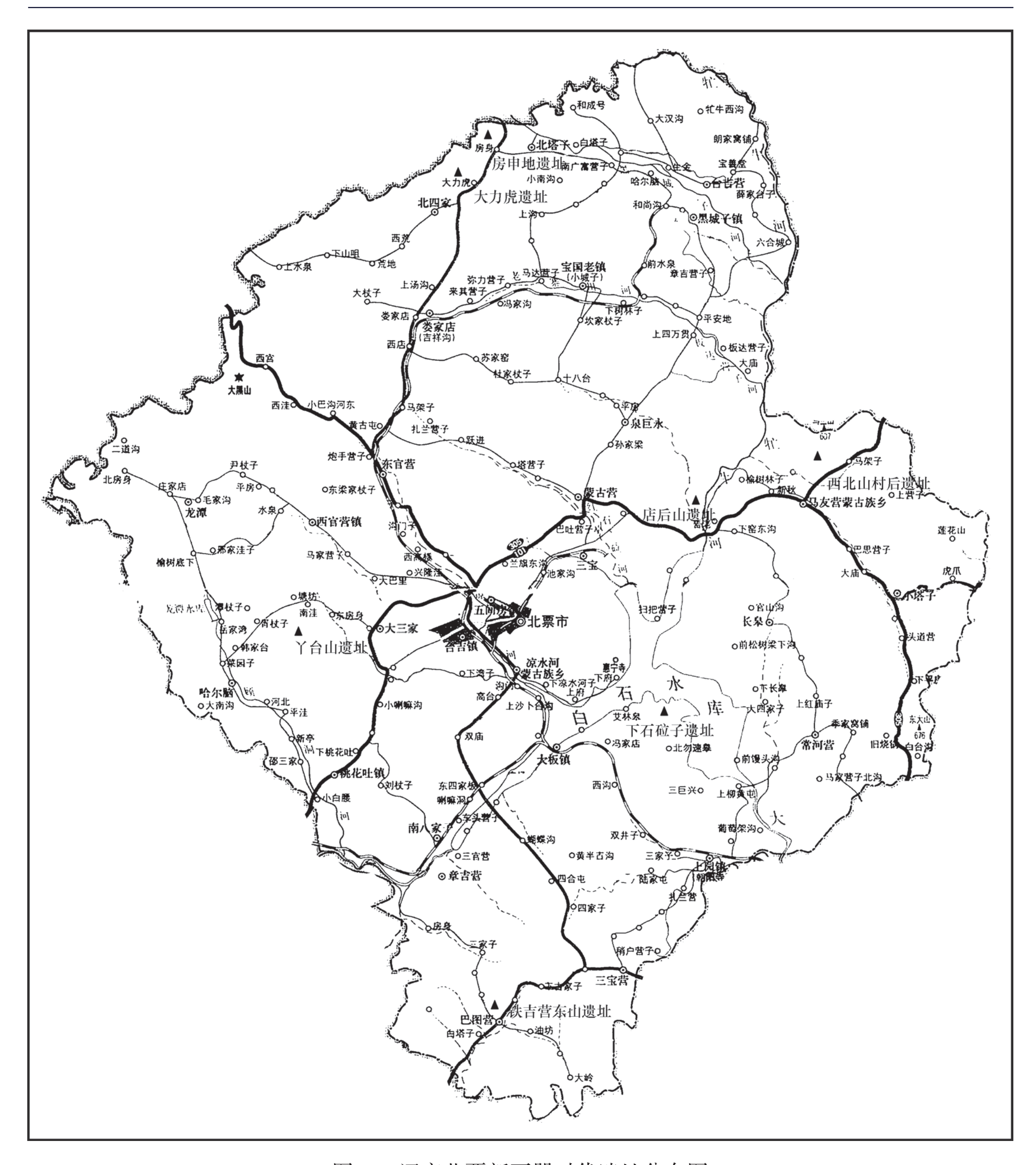
位于北塔乡房申村西北2000米的山丘东坡耕地内，海拔398.3米。南坡下是由西向东流的黑城子河，遗址地势西高东低，南北长150、东西宽80米，面积12000平方米。现地表为灰褐色土，土质松软。采集标本主要有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石铲、石刀、石磨棒和石斧。陶器均为夹砂红褐陶，可辨器形有罐。

石铲　1件。残。黑褐色页岩。磨制，有肩，顶柄及肩下均残，见有磨痕，局部磨光。残高8.8、残宽8.1、残厚1.9厘米（图二，1）。

石刀　1件。残。黑褐色页岩。打制，半月形，弧背，偏锋弧刃，三角形横截面。残长9.6、宽6.4、厚1.7厘米（图二，2）。

石磨棒　1件。残。灰白色花岗岩。磨制，肩部经过打磨，棱柱体，横截面略呈梯形。残长11.7、宽1.1、厚5.8厘米（图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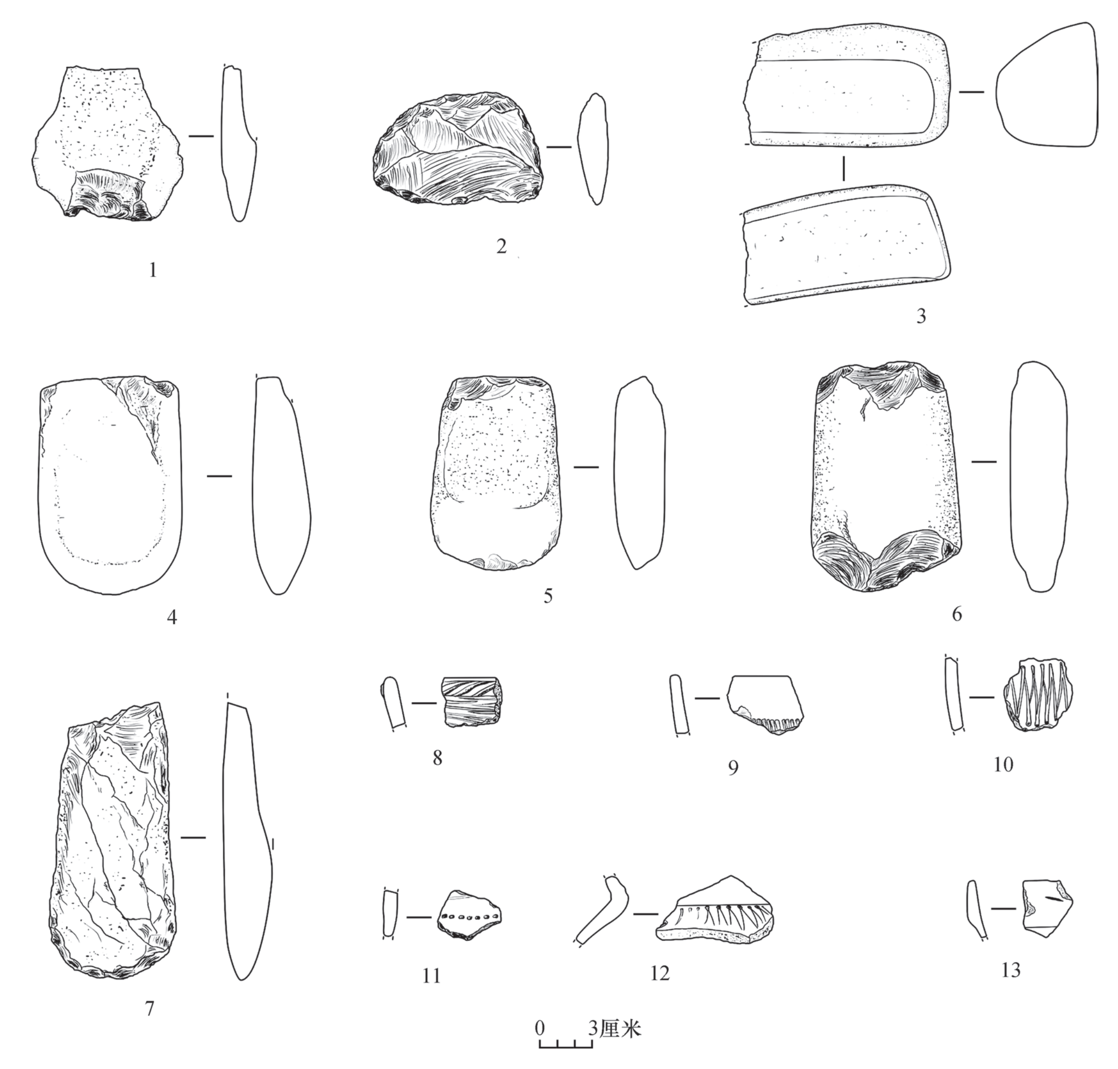
石斧　4件。第一件：残。黑色页岩。磨制，通体磨光，顶部残，体略呈长方形，两刃呈圆弧形，正锋弧刃，刃稍残见有使用痕。残长12.5、宽8.2、厚3.3厘米（图二，4）；第二件：残。黑褐色页岩。磨制，通体磨光，体略呈长方形，顶部较窄，稍残，



图一　辽宁北票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扁圆体，刃成圆弧形，正锋弧刃，刃部磨光稍残见有使用痕迹。长11.1、宽7.5、厚2.9厘米（图二，5）；第三件：残。黑褐色页岩。磨制，体略呈长方形，顶部窄，下体宽，斧身见有琢刻痕，局部磨光。刃部残，残长13.2、宽8.6、厚3.2厘米（图二，6）；第四件：残。黑褐色页岩。打制，顶部残，体略呈长方形，顶部窄，刃宽，弧刃正锋。残长15.9、宽7.2、厚2.8厘米（图二，7）。

敞口罐口沿　2件。均残片。夹砂红褐陶。第一件：为直敞口，薄尖圆唇，斜直



图二　北塔子房申遗址采集器物

1. 石铲　2. 石刀　3. 石磨棒　4～7. 石斧　8、9. 敞口罐口沿　10. 罐腹片
11. 罐肩部残片　12. 罐折肩部残片　13. 陶钵口沿

腹，近口处施左斜线纹带，下施多道横压"之"字纹。残高2.9、壁厚0.8厘米（图二，8）；第二件：直敞口，方圆唇，腹部施竖压"之"字纹。残高3.4、壁厚0.7厘米（图二，9）。

罐腹片　1件。残片。夹砂红褐陶。竖压"之"字纹。残高4厘米，壁厚0.7厘米（图二，10）。

罐肩部残片　1件。残片。夹细砂，灰陶。上施一道横排戳点纹。残高2.8、壁厚0.8厘米（图二，11）。

罐折肩部残片　1件。残片。夹砂红褐陶。折肩处施横排竖压"之"字纹。残高3.9、壁厚0.9厘米（图二，12）。

陶钵口沿　1件。残片。泥质红陶。尖圆唇，直敞口，口沿近口处施一道斜线黑彩，腹下部残。残高3.3、壁厚0.7厘米（图二，13）。

2. 大力虎遗址

位于北四家乡大力虎村一组北300米庙后山南坡中部耕地内，海拔401.2米。南1000米是由西向东流的黑城子河。遗址地势北高南低，东西长50米，南北宽40米，面积2000平方米，现地表为灰褐色土，土质松软，采集标本主要是石器和陶片。石器有石锄、石饼形器和有窝石器。陶质多为夹砂陶，也有少量泥质陶，纹饰以"之"字纹为主，还有附加堆纹。可辨器型陶器有罐和钵。

石锄　1件。残。打制，扁平体，椭圆型柄，柄顶残，束腰，斜肩，弧刃，正锋，刃部有崩疤。长18.6、刃宽11、腰宽7.5、厚2.1厘米（图三，1）。

石饼形石器　1件。残。磨制，方形圆角，扁平体，外缘有崩疤，长7.6、宽6.6、厚1.6厘米（图三，2）。

有窝石器　1件。残。方形扁平体，双磨面，一面见有5个大小不一的钻窝，窝直径0.7～1.4、深0.8～0.1厘米，琩钻。残长5.1、残宽4.3、厚1.1厘米（图三，3）。

罐口沿　4件。均为残片，形制有别。第一件：夹砂红褐陶。直敞口，尖圆唇，见有四种组合纹饰施于器表，由上至下依次排序为，颈施弦纹数周，下三圈圆点戳印纹，下施三周弦纹，弦纹下施数周交叉划纹，腹部施交叉划纹。残高12.8、残宽6.6、壁厚0.9厘米（图三，4）；第二件：夹砂灰褐陶。敞口，尖圆唇，唇下窄凸附加堆纹带饰左斜线划纹，腹部施多道横压竖排"之"字纹。残高5.5、壁厚0.7厘米（图三，5）；第三件：夹砂灰褐陶。敞口，尖圆唇，腹部施竖压横排"之"字纹，残高4.9、壁厚1.1厘米（图三，6）；第四件：夹砂灰褐陶。敞口，尖圆唇，颈施一周戳点纹，腹施竖压横排"之"字纹，残高4、壁厚0.8厘米（图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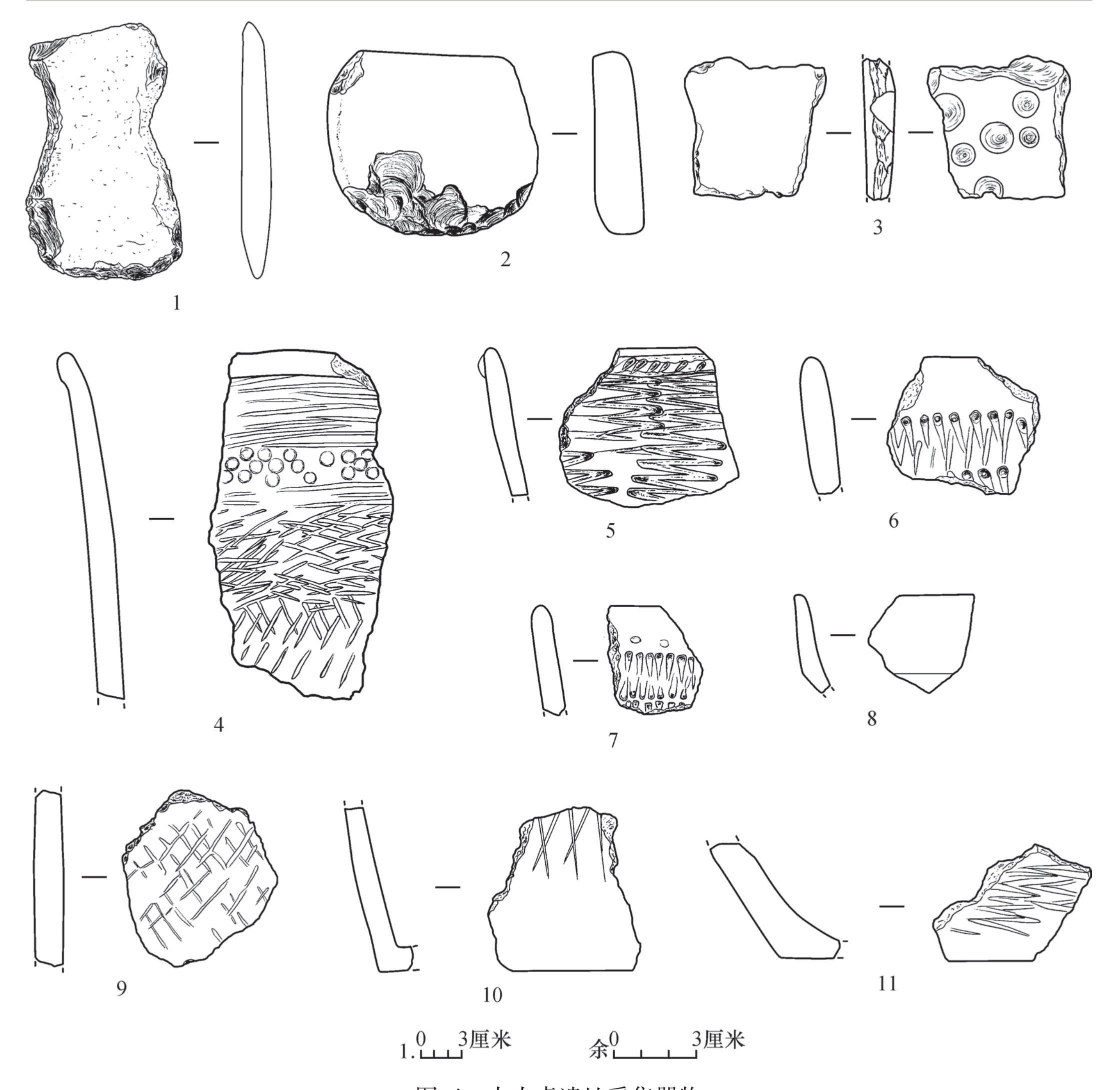
罐腹片　1件。残片。夹砂红褐陶。上施交叉划纹，残高6.4、壁厚1.1厘米（图三，9）。

罐器底残片　2件。均残片。第一件：夹砂红褐陶。斜腹平底，腹部见有交叉划纹。残高5.9、壁厚0.8、底厚0.9厘米（图三，10）；第二件：夹砂红褐陶。斜腹平底，腹部施横压"之"字纹。残高4.2、壁厚1.3、底厚0.3厘米（图三，11）。

陶钵口沿　1件。残片。泥质红陶，外施红陶衣。敞口，方圆唇，折腹。残高3.6、壁厚0.7厘米（图三，8）。

3. 丫台山遗址

位于大三家乡羊肠沟村西北2千米丫头山顶部，海拔565.9米。遗址地势，平面较平呈长方形东西长20米，南北宽15米，面积300平方米，地表为黑褐色土，文化层厚0.4米。采集的标本是夹砂红褐陶片，纹饰为"之"字纹，可辨器形是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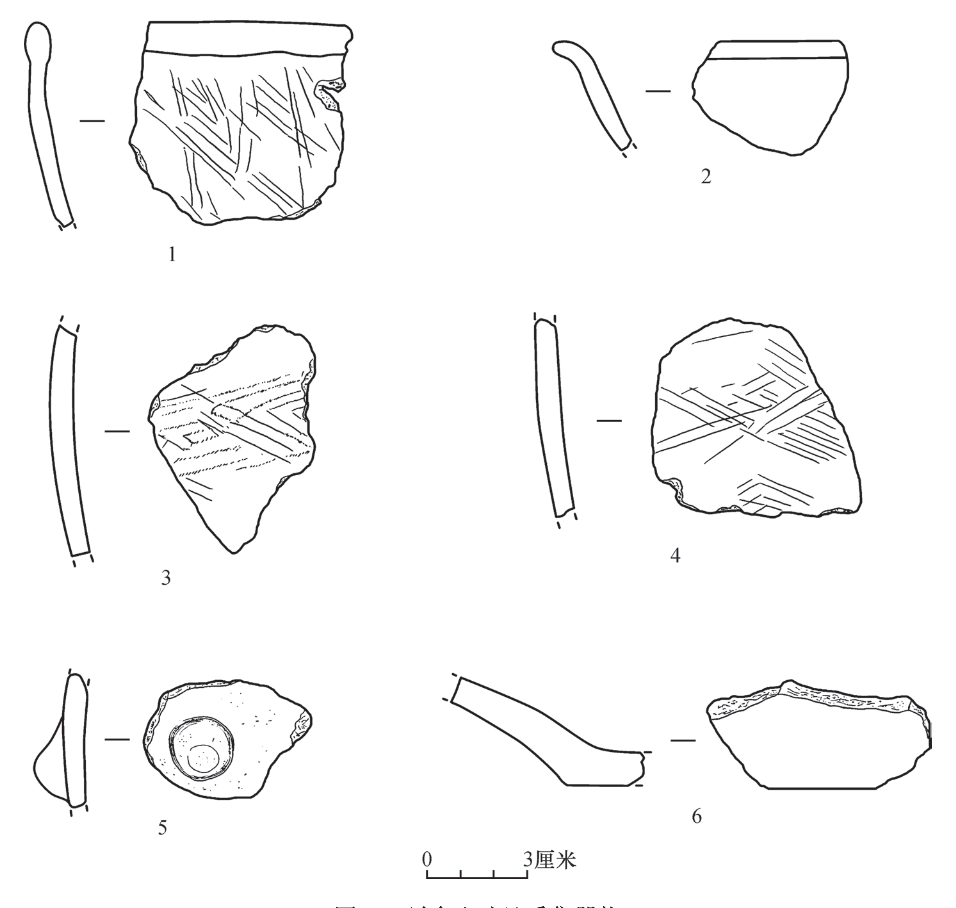
图三　大力虎遗址采集器物

1. 石锄　2. 石饼形石器　3. 有窝石器　4～7. 罐口沿　8. 陶钵口沿　9. 罐腹片　10、11. 罐器底残片

敞口罐口沿　2件。均为残片。夹砂红褐陶。敞口，圆唇，形制有别。第一件：壁较薄，腹部施不规则划纹。残高6、壁厚0.6厘米（图四，1）；第二件：外折沿，斜腹，素面。残高3.4、壁厚0.6厘米（图四，2）。

陶罐腹片　3件。均残片。夹砂红褐。形制有别。第一件：施重叠菱形压印细绳纹。残高6.9、壁厚0.7厘米（图四，3）；　第二件：施重叠菱形压印细绳纹，残高5.8、壁厚0.7厘米（图四，4）；　第三件：上施一个圆形乳丁纽，纽直径1.9、高0.9厘米。腹片残高3.5、壁厚0.6厘米（图四，5）。

陶罐底残片　1件。残片。夹砂红褐陶。素面，斜腹，平底。残高3.2、壁厚1、底厚1厘米（图四，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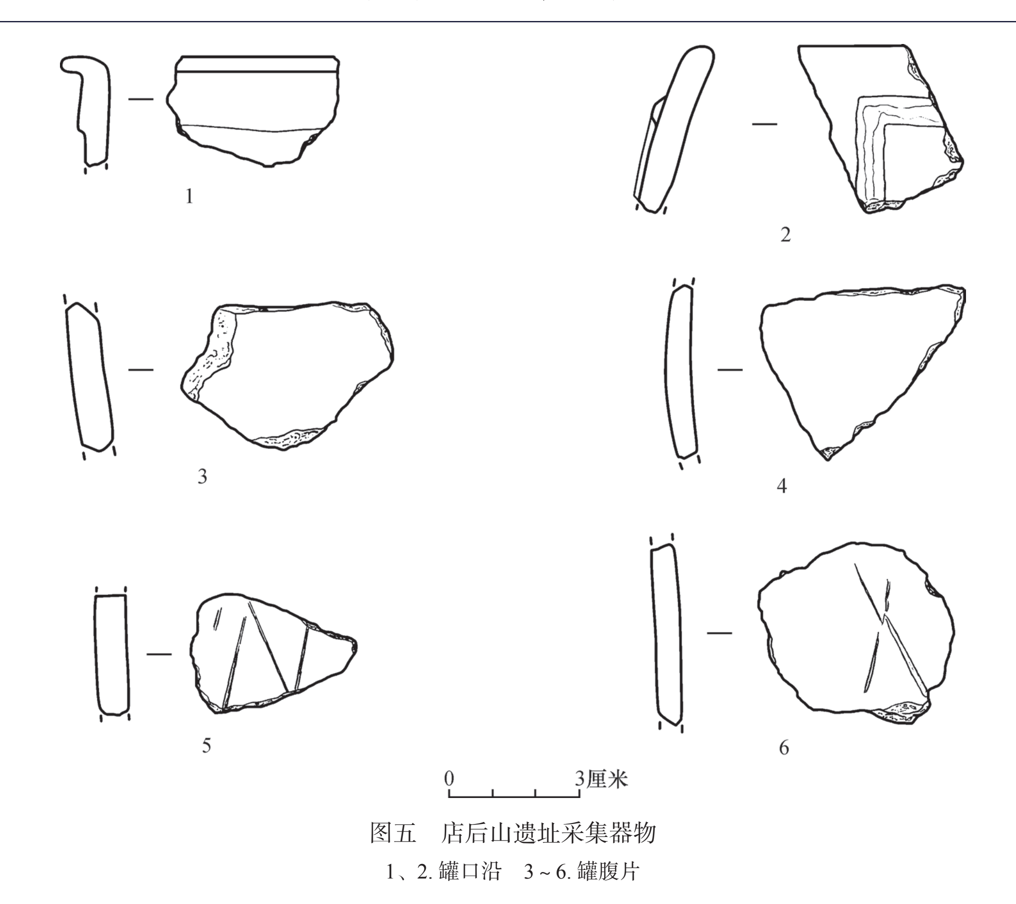
图四　丫台山遗址采集器物
1、2. 敞口罐口沿　3～5. 陶罐腹片　6. 陶罐底残片

4. 店后山遗址

位于三宝乡小苏营村东北2000米店后山南坡台地的耕地内。海拔151.21米。东面是由北向南流的牤牛河，西面是由西北折向东南注入牤牛河的十八奋河。遗址地势北高南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50、南北宽30米，面积4500平方米。在遗址南部断面上可见厚0.4～0.8米的黑褐色土堆积的文化层，其间夹杂有不规则的石块及少量碎陶片。采集到的标本有陶片，以泥质陶为主，另有夹砂陶，纹饰多施划纹和“之”字纹，可辨器型有罐。

罐口沿　2件。均残片。第一件：夹砂红褐。口微敛，圆唇，溜肩折腹内收，下部残，素面。残高2.5、壁厚0.6厘米（图五，1）；第二件：泥质灰陶。敛口，尖圆唇，肩施一道直角附加堆纹带。残高3.9、壁厚0.7厘米（图五，2）。

罐腹片　4件。均残片。第一件：夹砂红褐。素面。残高3.4、壁厚0.7厘米（图五，3）；第二件：泥质灰陶。素面。残高4、壁厚0.6厘米（图五，4）；第三件：泥质



图五　店后山遗址采集器物

1、2. 罐口沿　3～6. 罐腹片

灰陶。施四道斜线划纹。残高2.8、壁厚0.7厘米（图五，5）；第四件：夹砂红褐陶。施两道交叉斜线划纹。残高4.1、壁厚0. 6厘米（图五，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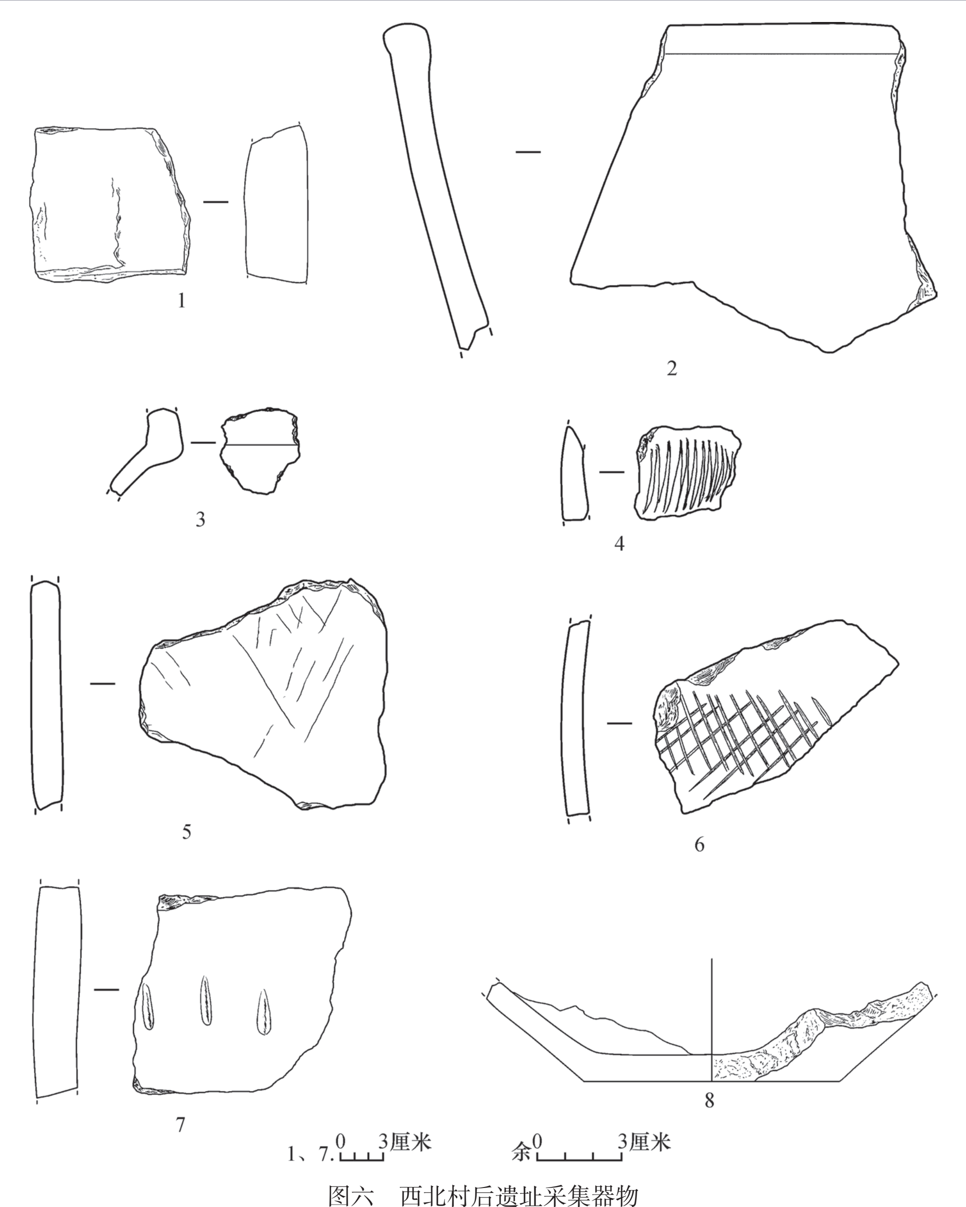
5. 西北村后遗址

位于马友营乡小勿兰村西北山组居民区北50米的耕地内，海拔271.6米。其北面3千米是乌兰山，西面10千米是由北向南流的牤牛河。遗址地势北高南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0、南北宽30米，面积1200平方米。现地表为灰褐色土，土质松软夹杂少量遗物，采集到的标本主要是陶片，也有石器，石器见一打制石器。陶片多为夹砂红褐陶，纹饰有"之"字纹、划纹和戳点纹，可辨器形有罐。

石器　1件。残。红褐色砂岩。打制，呈长方形，扁平体，残高11、残宽10、厚4.5厘米（图六，1）。

罐口沿　1件。残片。夹砂灰褐陶。敞口，方圆唇，斜腹，素面，残高11.7、壁厚1.1厘米（图六，2）。

罐折肩残片　1件。残片。夹砂红褐陶。素面，鼓腹。残高3.1、壁厚1.2厘米（图六，3）。



图六　西北村后遗址采集器物

1. 石器　2. 罐口沿　3. 罐折肩残片　4～7. 罐腹片　8. 罐底

罐腹片　4件。均残片。夹砂陶。形制有别。第一件：夹砂红褐陶。施横排竖压“之”字纹。残高3.4、壁厚0.8厘米（图六，4）；第二件：夹砂红褐陶。施多道交叉划纹。残高8、壁厚1厘米（图六，5）；第三件：夹砂灰陶。施交叉网格划纹。残高7、壁厚0.7厘米（图六，6）；第四件：夹砂红褐陶。施三处横排戳印纹。残高7、壁厚1.6厘米（图六，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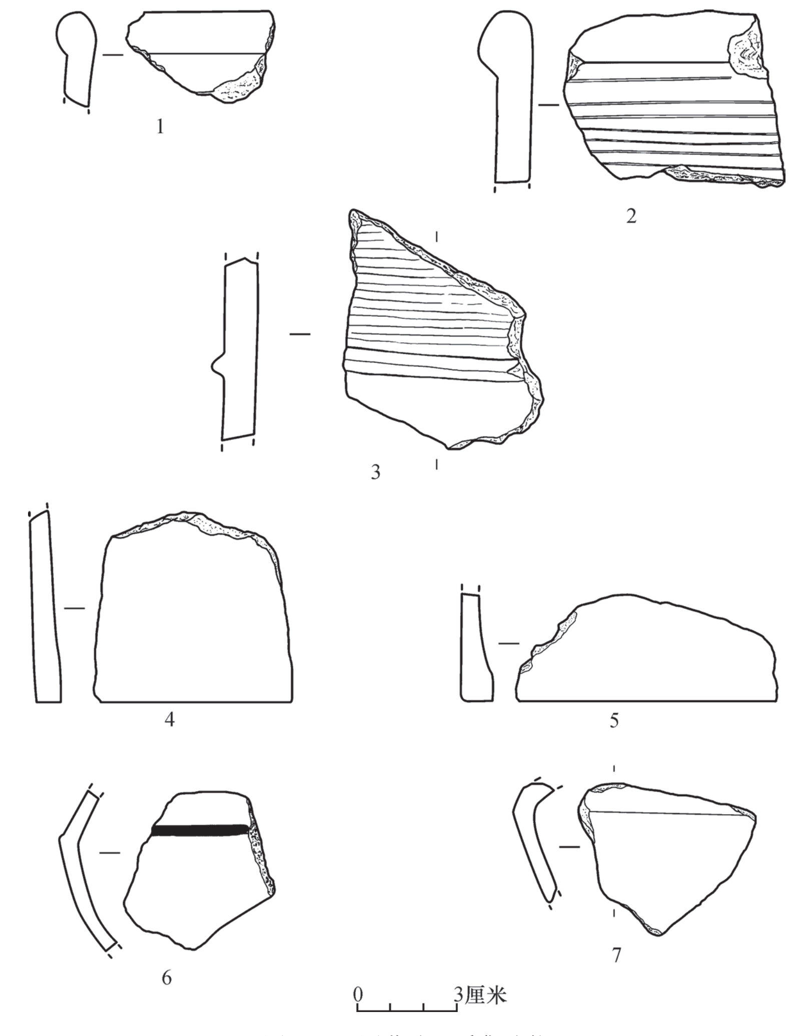
罐底　1件。残片。夹砂灰陶。斜腹，平底，素面。残高7、底径18.2、壁厚1.6、底厚1.9厘米（图六，8）。

6. 铁吉营东山遗址

位于巴图营乡铁吉营村铁吉营组东200米东山顶部耕地上。海拔270.12米。南1000米是由东北向西南流的巴图营河。遗址中部较高四周低缓，东西长60、南北宽50米，面积3000平方米。现地表为灰褐色土，土质松软夹杂少量遗物，采集的标本为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另有夹砂灰陶，可辨器形有红山文化陶筒形器和陶钵。

筒形器口沿　2件。均残片。夹砂红陶。直筒状，形制有别。第一件：标本T：1，为尖圆唇，折沿，素面。残高2.8、壁厚0.8厘米（图七，1）；第二件：标本T：2，为圆唇，颈部平行施多道凹弦纹，残高5.2、壁厚0.8厘米（图七，2）。

筒形器腹片　1件。残片。夹砂红陶。颈腹连接处施一道凸棱纹，颈部施多道凹弦纹。残高7.2、壁厚0.7厘米（图七，3）。



图七　巴图营遗址采集遗物

1、2. 筒形器口沿　3. 筒形器腹片　4、5. 筒形器底口残片　6、7. 陶钵

筒形器底口残片　2件。均残片。夹砂红陶。无底，内出台抹平，素面。第一件：残高5.8、壁厚0.7厘米（图七，4）；第二件：残高3.3、壁厚0.6厘米（图七，5）。

陶钵　2件。均为口沿残片。第一件：为泥质红陶。敛口，折肩处施一道黑彩，外施红陶衣。残高4.8、壁厚0.5厘米（图七，6）；第二件：夹砂红陶。敛口，折肩。残高4.6、壁厚0.5厘米（图七，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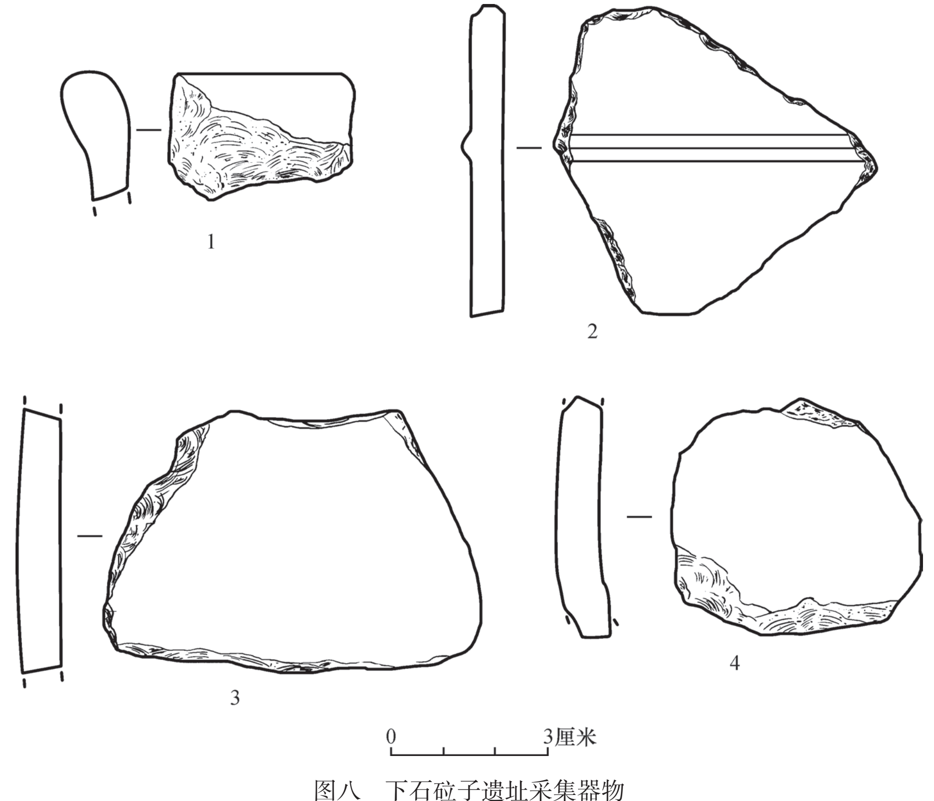
7. 下石砬子遗址

位于大板镇下烧锅村下石砬子组东北山顶部。海拔157.1米，北坡下是大凌河，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中部较高四周低缓，南北长90、东西宽30米，面积2700平方米。现地表为灰褐色土，土质松软，生长松树和荆条树，地表见有遗物较多，较碎，采集到的标本为夹砂红陶片，可辨器型是红山文化陶筒形器。

筒形器口沿　1件。残片。夹砂红陶。圆唇。残高2.4、壁厚0.7厘米（图八，1）。

筒形器腹片　2件。均为残片。夹砂红陶。第一件：颈腹结合处施一道凸棱纹。残高6、壁厚0.6厘米（图八，2）；第二件：素面。残高5、壁厚0.8厘米（图八，3）。

筒形器底口　1件。残片。夹砂红陶。无底，内出台抹平，素面。残高4.6、壁厚0.8厘米（图八，4）。



图八　下石砬子遗址采集器物

1. 筒形器口沿　2、3. 筒形器腹片　4. 筒形器底口

二、小　　结

通过这次第三次文物普查，于我市境内发现的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之我们较清晰地了解到：

（1）从遗址分布上看，都分布在大凌河、牤牛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山顶或山丘坡地上，海拔150～500米，丫台山遗址位于丫台山的顶部，海拔500米，其余的都在山丘的东坡或南坡，海拔150～400米。房申地遗址南3.7千米是大力虎遗址，北12千米是小山遗址（即兴隆洼Ⅳ号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1.3千米[2]，从这可以看出在我市境内有很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的主要特征。

（2）从房申地遗址、大力虎遗址、店后山遗址和西北村后遗址采集到的遗物，在石器型制上看：房申地遗址、大力虎遗址的石器以人类日常的生活、生产工具为主。制法有打制、磨制，也有自然石块直接使用的情况，可见石器在当时的重要性。其中磨制石斧、有肩石锄、石磨棒、有窝石器[3]都相同于查海文化的石器。在陶器型制上看：多数为夹砂红褐和灰褐陶，手制，火候较低。可辨器形以敞口罐为主，还有敛口钵。纹饰多施压印"之"字纹、附加堆纹、交叉划纹、戳点纹、器口施附加堆纹带，还有组合纹饰[4]。由此可知以上四处遗址使用时间长，有兴隆洼文化时期的聚落址和赵宝沟文化时期聚落址的特征。

（3）铁吉营东山遗址和下石砬子遗址采集的陶器为夹砂及泥质红陶，可辨器形有筒形器和钵。多为筒形器口沿及腹片，口沿下施多道凹弦纹，颈腹连接处是一周凸棱纹，底口内出台，抹平。还有敛口钵，折腹，折肩处施一周窄黑彩宽带纹[5]。从遗址的地理位置上看，两者都分布在河流附近的低矮山丘或坡地上，地势中间高，四周低。以上这些特征都与红山文化墓地遗存性质相同，可见两处遗址应属红山文化时期。

（4）丫台山遗址的陶器为夹砂红褐及灰褐陶，手制，火候较低。可辨器形为罐，施压印细绳菱形回字纹，这是小河沿文化筒形罐的主要特征[5]，但是由于地表采集到标本较少，无法推断其所属时代，还有待进一步工作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弥补了北票区域内对兴隆洼、红山、小河沿等几个不同时期文化以往未知的历史，对北票辖区以及周边地区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但限于此次调查所采集遗物较少，又很不典型，有些问题还有待日后深入工作。

附记：参加调查人员有姜洪军、李振军、杜志刚及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调查期间，得到了北票市各乡、镇文化站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注　　释

［1］ 徐国林主编. 北票市志（第二篇） 自然环境［M］. 北京：国际商务出版社，200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J］. 考古，1987（6）.

［3］ 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b. 方殿春. 阜新查海遗址的发掘与初步分析［J］. 辽海文物学刊，1991（1）.

［4］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1985（10）.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J］. 考古，1997（1）.

c. 朱延平. 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A］. 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C］.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d. 赵宾福. 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分期与特点［J］. 求是学刊，2004（4）.

［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6］ a. 杨福瑞. 小河沿文化陶器及相关问题的再认识［J］. 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2006.

b. 索秀芬，李少兵. 小河沿文化年代和源流［A］. 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57～63

c.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 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J］. 文物，1977（12）.

Seven Neolithic Sites Found in Beipiao Liaoning

Jiang Hongjun　Du Zhigang

Abstract: During the third national cultural relic census, two Neolithic sites were found in Beipiao. After that, five more sites were found, making it seven in total. These newly found Neolithic sites were not known before, and they provide new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layout of the Neolithic sites, their present situation, their nature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These sites also provide materials for the Neolithic research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Beipiao.

Key words: Beipiao; Neolithic; pottery; layout

“双房遗存”辨析

褚金刚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110003）

1980年在普兰店市双房发现了钵口弦纹壶、叠唇罐与曲刃青铜短剑、滑石斧范共存的一座石盖石棺墓[1]。之后在辽东地区又陆续发现大批含钵口弦纹壶的墓葬。学界普遍将这类含钵口弦纹壶的墓葬称为“双房遗存”或“双房文化”。关于这类遗存的研究学界主要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王巍先生在《双房遗存研究》[2]一文中，指出双房遗存是以墓葬材料为主，是以钵口弦纹壶和叠唇罐为代表的遗存，主要分布于北抵辽宁抚顺、清原一带，西达辽阳左近，南到辽东半岛南部，东至朝鲜半岛西北部。其来源主要是辽东半岛的双坨子三期文化，其次为马城子文化，上马石上层文化可能为双房遗存早期遗址的代表。年代约在西周时期，至春秋战国之交或稍后衰亡。

第二种，赵宾福先生将《双房遗存研究》[3]一文中所认为的双房遗存以及辽东地区出有素面无耳壶、叠唇筒腹罐、侈口鼓腹罐、侈口鋬耳罐等遗物的所有积石墓、土坑墓、房址等均归为双房遗存。主要分布于辽东及辽西平原地区。关于遗存的来源与意见王巍先生无异。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

第三种，以朱永刚和吴世恩两位先生为代表，见于《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4]《辽东地区双房式陶壶研究》[5]《关于双房文化的两个问题》[6]等文中。他们认为双房遗存主要是指钵口弦纹壶遗存，其分布以千山山地的太子河和浑河为中心，东至大同江，北达辽河上游，西以浑河为界，南抵辽东半岛最南端。马城子文化为其主要来源，遗存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战国之际。

第四种，华玉冰先生在《新城子文化初步研究》[7]一文中将辽东半岛北部的弦纹壶墓葬命名为新城子文化和东山类型，南部依然称为“双房类型”。新城子文化分布于辽河以东属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来源于马城子文化（马城子文化），年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战国之际。东山类型分布于丹东地区，来源亦为马城子文化。双房类型分布于辽东半岛中东部，来源于双坨子三期文化，年代在商代早期至战国时期。

第五种，陈光先生在《羊头洼类型研究》[8]中认为双房遗存的中心分布区在碧流河流域，左翼达渤海，右翼及鸭绿江下游，占有整个辽东半岛，其主要来源为羊头洼类型（双坨子三期文化），并受到马城子文化的影响。器物组合为颈部弯曲的鼓腹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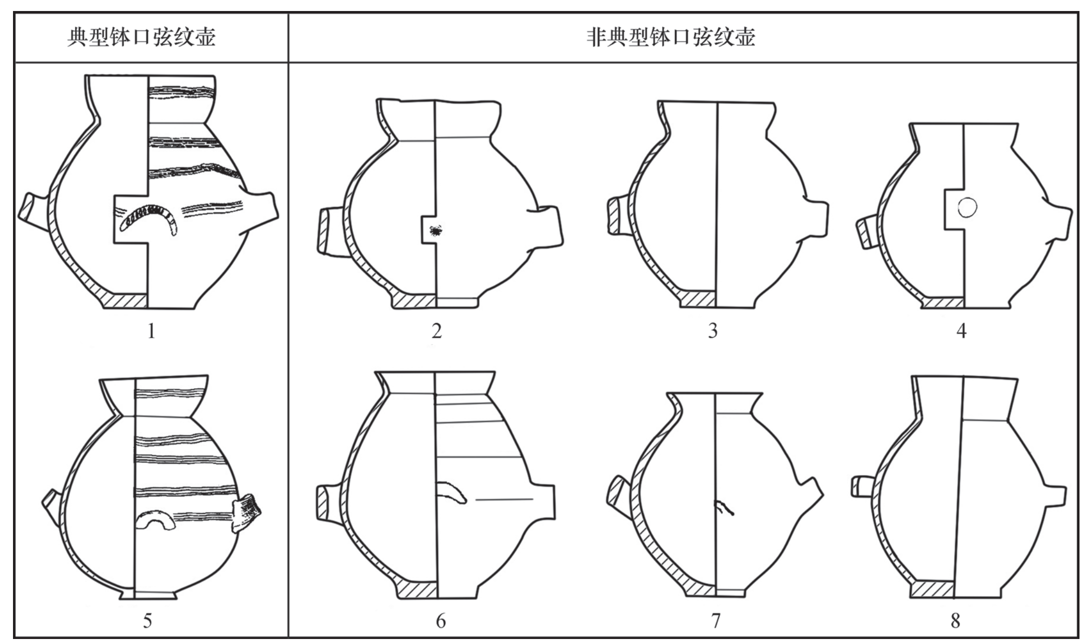
罐、叠唇筒腹罐、长颈壶，年代上限为商代晚期，至迟不晚于西周早期。

第六种，郭大顺先生在《辽东半岛青铜文化的原生性——以双房六号墓为实例之一》[9]中认为以双房M6为代表的双房类型来源于羊头洼文化（双坨子三期文化），曲刃青铜短剑起源于辽东，上马石上层可能包括了双房类型的墓葬和居住址，时代应在公元前9世纪以前。

由上可见，对于含钵口弦纹壶遗存的研究，年代上争议不大，基本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内涵上所持观点不尽相同，相差较大。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类遗存的文化内涵、分布范围、来源及区域差异作一番探讨，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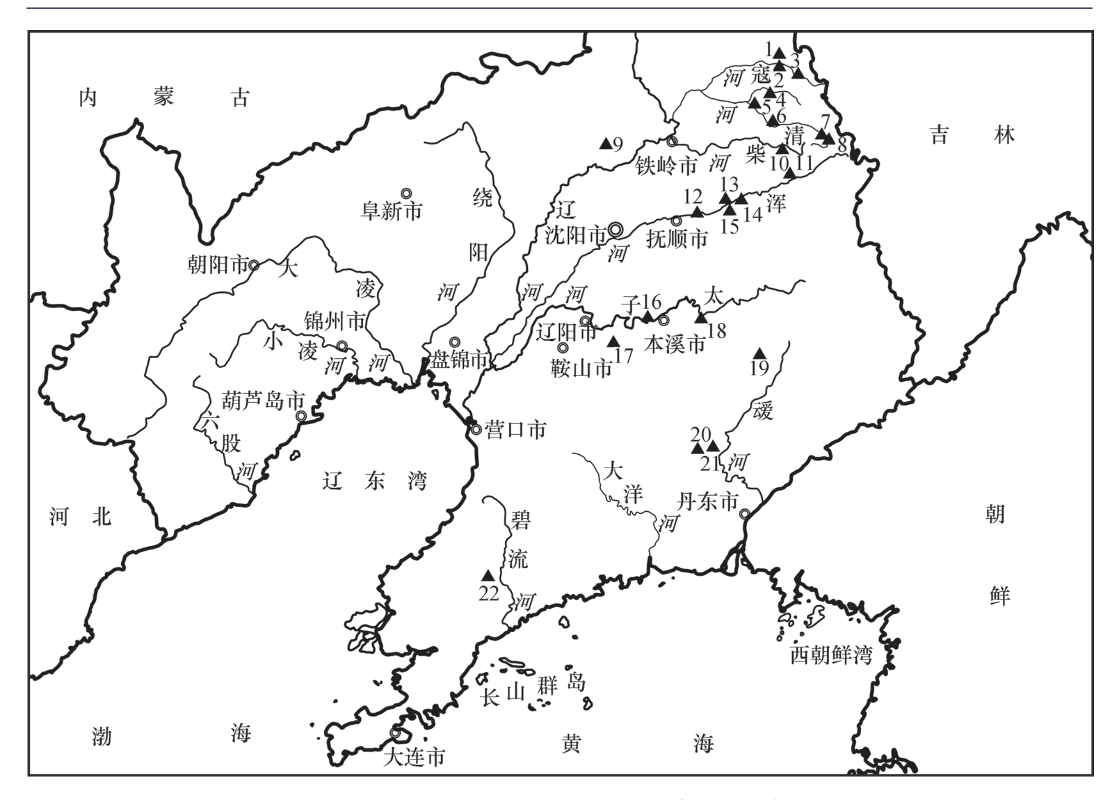
一、遗存的文化内涵和分布范围

“双房遗存”的文化内涵，可以从其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钵口弦纹壶作为切入点。关于钵口弦纹壶，其特征可归纳为口呈钵形，鼓腹，低圈足或平底，腹部一般饰几条弦纹带，腹部有对称的横桥耳及一唇状附耳；另外个别陶壶腹部无弦纹和器耳，但壶的形态与钵口弦纹壶无异，因此若排除纹饰和器耳的装饰性因素，他们也可以归入钵口弦纹壶的大类中（图一）。辽宁地区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见有钵口弦纹壶的材料有（图二）：普兰店双房[10]（M6）、辽阳二道河子[11]（M1、M2）、本溪通江峪石棺墓[12]、本溪龙头山石棺墓[13]、本溪新城子墓地[14]（M1、M7、M8、M10、M11、M13～M15）、抚顺祝家沟[15]（M2～M4）、抚顺小青岛[16]（M5）、抚顺八



图一　本文所讨论钵口弦纹壶种类

1. 东沟（M12：1）　2. 东沟（M2：1）　3. 东沟（M13：1）　4. 东沟（M10：1）　5. 新城子（M8：1）　6. 李家台（M1）　7. 祝家沟（M2：3）　8. 清原马家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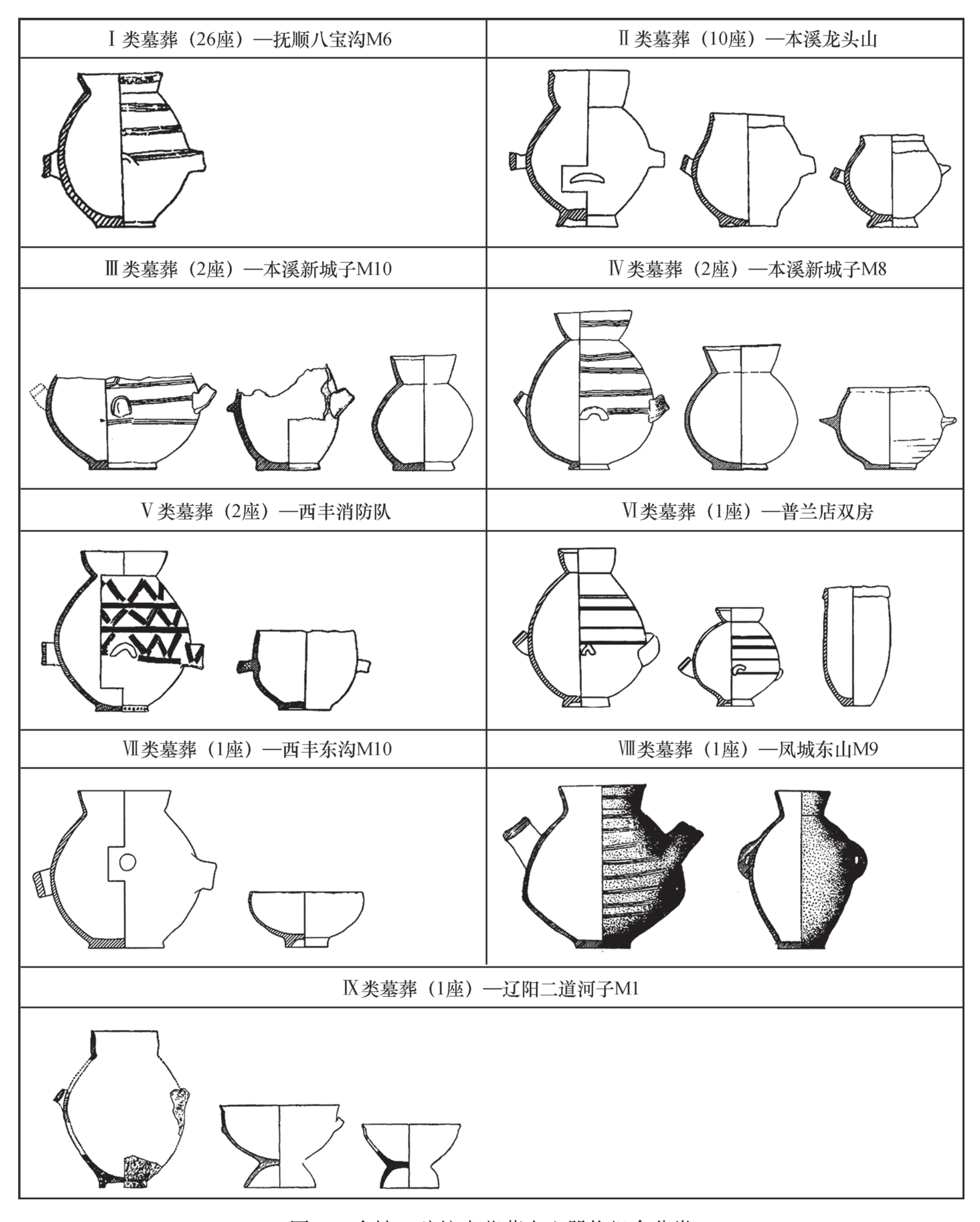
图二　辽宁地区出土钵口弦纹壶墓葬分布示意图

1. 西丰消防队石棺墓　2. 西丰东沟墓地　3. 西丰诚信村石棺墓　4. 开原尖子山石棺墓　5. 开原建材村石棺墓　6. 开原李家台石棺墓　7. 清原土口子中学石棺墓　8. 清原门脸石棺墓　9. 法库黄花山，长条山石棺墓　10. 清原马家店石棺墓　11. 清原斗虎屯镇白灰场石棺墓　12. 抚顺甲帮石棺墓　13. 抚顺祝家沟石棺墓　14. 抚顺八宝沟石棺墓　15. 抚顺小青岛石棺墓　16. 本溪龙头山石棺墓　17. 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　18. 本溪通江峪石棺墓　19. 本溪新城子墓地　20. 凤城西山墓地　21. 凤城东山墓地　22. 普兰店双房墓地

宝沟[17]（M6）、抚顺甲帮石棺墓[18]、清原县斗虎屯镇白灰厂石棺墓[19]、清原县土口子中学石棺墓[20]、清原县马家店石棺墓[21]、清原县门脸石棺墓[22]、西丰消防队石棺墓[23]、西丰诚信村[24]（96M1、06M2）、西丰东沟[25]（M2～M5、M7、M10、M12～M15、M18）、开原建材村石棺墓[26]、开原尖子山石棺墓[27]、开原李家台[28]（M1、M2）、法库黄花山[29]（M1）、法库长条山[30]（M9）、凤城东山[31]（M7、M9）、凤城西山[32]（M1）。

以上出土钵口弦纹壶的墓葬共计46座，根据这些墓葬中与钵口弦纹壶共出的其他陶器的器物组合，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图三）。

Ⅰ类墓葬，只出钵口弦纹壶，26座：抚顺小青岛M5、抚顺八宝沟M6、抚顺甲帮、辽阳二道河子M2、西丰东沟（M2～M5、M12、M15）、本溪新城子（M1、M11、M13～M15）、凤城西山M1、凤城东山M7、清原县斗虎屯镇白灰厂、清原门脸、清原县土口子中学、清原县马家店、法库长条山M9、开原建材村、开原尖子山、开原李家台（M1、M2）。



图三　含钵口弦纹壶墓葬出土器物组合分类

Ⅱ类墓葬，钵口弦纹壶和双耳罐组合，10座：本溪通江峪、本溪龙头山、抚顺祝家沟M3、西丰东沟（M7、M13、M14、M18）、西丰诚信村（92M1、06M2）、法库黄花山M1。

Ⅲ类墓葬，钵口弦纹壶和素面陶壶组合，2座：本溪新城子（M7、M10）。

Ⅳ类墓葬，钵口弦纹壶、素面陶壶和双耳罐组合，2座：本溪新城子M8、抚顺祝家沟M4。

Ⅴ类墓葬，为钵口弦纹壶和双耳钵组合，2座：西丰消防队、抚顺祝家沟M2。

Ⅵ类墓葬，为钵口弦纹壶和叠唇罐组合，1座：普兰店双房M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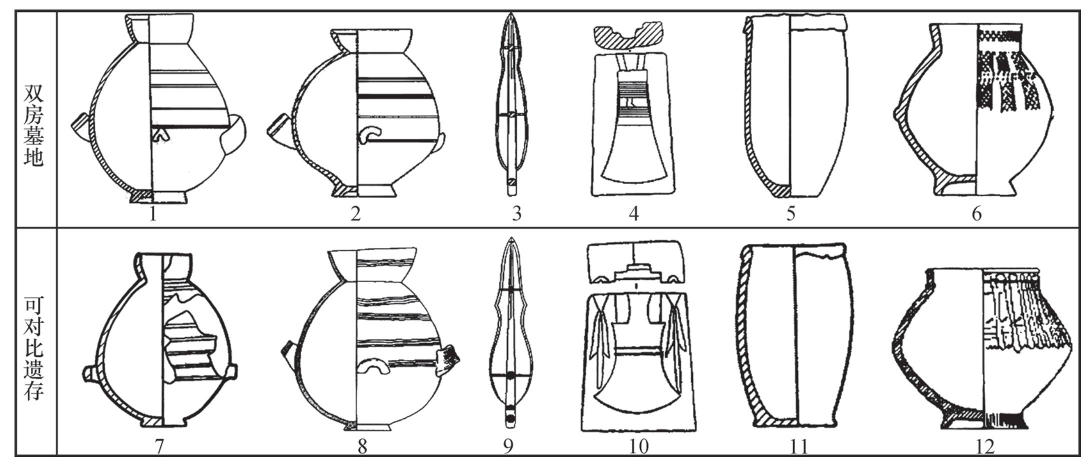
Ⅶ类墓葬，为钵口弦纹壶和圈足碗组合，1座：西丰东沟M10。

Ⅷ类墓葬，为钵口弦纹壶和双耳陶壶组合，1座：凤城东山M9。

Ⅸ类墓葬，为钵口弦纹壶和豆的组合，1座：辽阳二道河子M1。

以上统计可以看出，辽东地区含钵口弦纹壶墓葬以Ⅰ、Ⅱ类器物组合的墓数量最多，占比约80%。其他器物组合的墓葬基本与Ⅰ、Ⅱ类器物组合的墓葬同处于一个墓地，或其所在位置处于Ⅰ、Ⅱ类墓葬分布的中心范围（普兰店双房M6除外）。因此辽东地区含有钵口弦纹壶的墓葬及同处一个墓地其他墓葬性质上比较单纯，应该属于同一文化。普兰店双房M6因其特殊性，不属于该文化；凤城东山、西山墓地出土的个别陶器很有地方特点，但仍属于该文化，下文详述。

普兰店双房M6以其特色鲜明的器物组合出现在辽东半岛，因发现和报道年代稍早，学界普遍将后发现的钵口弦纹壶墓葬与之进行比对，造成“双房遗存”的内涵愈加复杂。根据目前辽东地区和辽东半岛已发表的相关材料，可以明确地看出，双房M6及其所处的双房墓地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不具备成为某种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存的代表。比如双房M6的钵口弦纹壶（图四，1、2）来自辽东地区（图四，7、8）；叠唇罐（图四，5）在当地同时期的石棚墓、石棺墓中也常见（图四，11）；曲刃青铜短剑（图四，3）和滑石斧范（图四，4）是辽东地区青铜时代晚期常见的器物（图四，9、10），不属于本地特有；另外双房墓地2号石棚出土的陶壶（图四，6），从器物的造



图四　双房墓地随葬品与周边地区相近遗存的比较

1～5. 双房M6　6. 双房M2　7. 凤城西山M1　8. 新城子M8：1　9、10. 辽阳二道河子M1

11. 碧流河大石盖墓　12. 于家坨头M21：5

型、施纹部位及圈足等方面，明显与大连于家坨头积石墓[33]M21：5（图四，12）相似，这种陶壶在岗上墓地[34]也有发现，因此应来源于辽东半岛的南端。双房M6应与本地区同时期随葬叠唇罐的石棚墓、石棺墓属于同一文化，其出土的钵口弦纹壶属于孤例，不能简单地将其与辽东地区出土钵口弦纹壶的墓葬归属为同一文化。

凤城东山、西山墓地出土钵口弦纹壶数量较少，双耳陶壶数量较多，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忽略其与辽东西部钵口弦纹壶墓葬的内在联系。据统计东山墓地共发现墓葬33座，发掘13座（M1～M10、M18～M20）、清理7座（M11～M17）、剩余13座破坏严重。发掘的13座墓葬除M18外均有随葬品，清理的7座中仅M11出土了随葬品。另外在东山附近的西山墓地发掘的五座大石盖墓，仅M1出土随葬品，从西山墓地墓葬的排列、朝向、筑墓材料、随葬品丰富程度看M1墓主人身份、地位非同一般，而且恰好西山墓地唯一一件钵口弦纹壶出自该墓中。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做如下两个推测：一，东山、西山墓地遭破坏墓葬数量太多同时不少墓葬不随葬器物，所以出土钵口弦纹壶数量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二，凤城东山、西山墓地随葬钵口弦纹壶的墓葬数量本就较少，但从西山墓地M1看使用钵口弦纹壶作为随葬品的人群在此地区有较高社会地位。综上所述钵口弦纹壶在东山、西山墓地的随葬品组合中具有重要地位；随葬品中出现较多的双耳陶壶，可能说明该地区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双耳陶壶早在马城子文化的洞穴墓葬中就是常见的随葬品，而祝家沟遗存的来源正是马城子文化，此问题下文详述）。

综上，根据辽东地区出土钵口弦纹壶的墓葬及同处一个墓地其他墓葬出土遗物可以确定此类墓葬的随葬品主要为钵口弦纹壶、双耳罐和素面陶壶三类器物的不同组合，另外圈足碗、双耳钵、双耳陶壶、素面陶罐、陶豆、陶鼎等因发现数量较少或出土地点单一不具备普遍性可作为次要构成部分。除陶器外，此类墓葬中还经常伴出有石斧、纺轮、石斧范、石刀、青铜短剑、矛、斧、镞等。

据目前考古发现可看出这类遗存的分布范围大致为北到西丰，南不过鞍山，东临凤城——新宾沿线，西止于沈阳，核心区域应在清河、浑河和太子河所在的哈达岭、龙岗山、长白山西麓地区。关于这类遗存的名称，个人认为应以发现和见诸报道较早，材料较为丰富且具备典型性的大伙房水库石棺墓命名，学界已有的祝家沟遗存这一名称可称之。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发现和见诸报道虽早于大伙房水库祝家沟石棺墓，但其两件较为完整的弦纹壶均为采集品，发掘出土的弦纹壶破损严重，因此不足以代表此类遗存。双房遗存、双房文化、双房类型等以双房M6为代表的文化应另有所指，不适合包括此类遗存。另外由于目前此类遗存所见的遗址材料稀少，不应急于命名为某文化，以某遗存称之为佳。

二、祝家沟遗存的来源

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来源应该从本地区或相邻地区较早的遗存中去寻找。具体的方法是首先对邻近地区的早期遗存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通过陶器的型式演变和遗存所展现的人群生活习惯这两个主要方面来发现遗存的传承关系。

在祝家沟遗存分布区域及相邻地区，较其年代稍早的有分布于千山腹地的马城子文化[35]、辽东半岛的双坨子三期文化[36]、下辽河地区的新乐上层文化[37]。以上三种考古学文化，马城子文化以洞穴墓著称，流行火葬，出土陶器主要为壶、罐、碗、钵等；新乐上层文化是继高台山文化后分布于下辽河以东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出土陶器有三足鼎、甗、壶等；双坨子三期文化是岳石文化退出对辽东半岛影响后在原土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积石墓葬，主要陶器有鼓腹罐、高领罐、豆、盆、碗等。以上三种文化从陶器器类构成、演变关系及分布地域的远近来分析，马城子文化与祝家沟遗存的渊源关系更为明显。以下通过具体陶器的演变及遗存所展现的人群生活习性两方面详述。

1. 陶器

祝家沟遗存主要的陶器为钵口弦纹壶、双耳陶罐，其次为素面陶壶、圈足碗、双耳钵、双耳陶壶、豆等。将祝家沟遗存的陶器与马城子文化相比，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

属于马城子文化早期的本溪张家堡A洞M34：12、M31：7（图五，2、3）两件鼓颈壶在器形上已经具备了钵口弦纹壶的基本特征，只是缺少弦纹和器耳的装饰；马城子文化晚期山城子C洞M2：2（图五，1）的鼓颈壶在器形、弦纹和器耳诸方面与钵口弦纹壶无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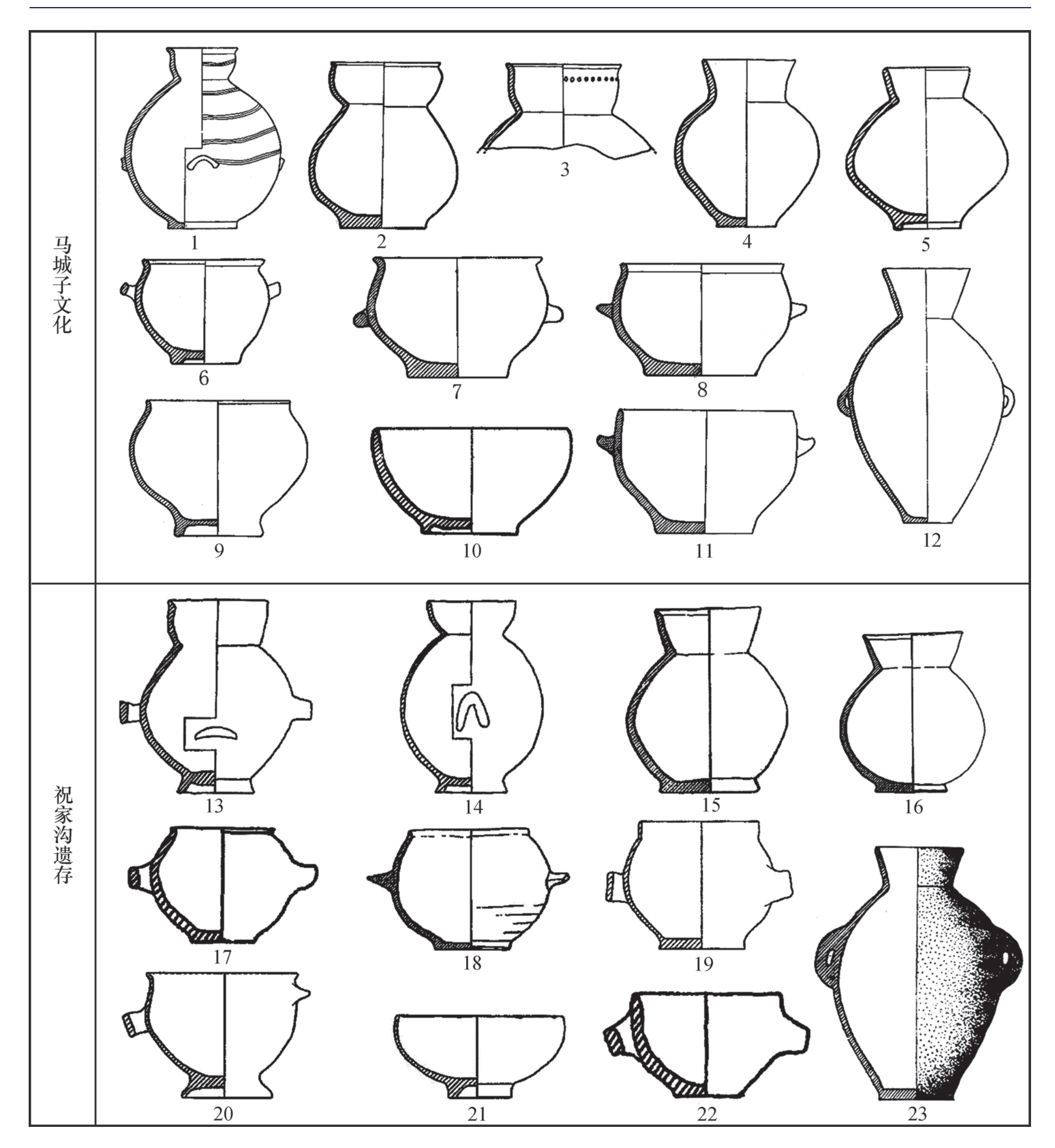
双耳罐方面马城子C洞M8：2（图五，7）、M14：4（图五，8）、A洞M12：19（图五，9）、张家堡A洞M6：3（图五，6）分别与西丰东沟M13：2（图五，20）、新城子M8：3（图五，18）、东沟M13：2（图五，20）、祝家沟M3：4（图五，17）相似。

山城子B洞M4：3（图五，4）、M4：7（图五，5）素面陶壶与新城子墓地的素面陶壶M10：1（图五，15）、M8：2（图五，16）相近，只是新城子墓地的素面陶壶由于受钵口弦纹壶影响，口沿内侧呈凹弧状。

碗在马城子文化洞穴墓葬中大量存在，但平底者居多圈足者极少，张家堡A洞M34：9（图五，10）与西风东沟M10：2（图五，21）相似。

马城子C洞M22：4（图五，11）双耳钵与抚顺祝家沟M2：2（图五，22）相近。

双耳陶壶在马城子文化的张家堡A洞和山城子C洞均有发现（图五，12），其与凤



图五　祝家沟遗存与马城子文化陶器对比图

1. 马城子C洞M2：2　2. 张家堡A洞M34：12　3. 张家堡A洞M31：7　4. 山城子B洞M4：3　5. 山城子B洞M4：7　6. 张家堡A洞M6：3　7. 马城子C洞M8：2　8. 马城子C洞M14：4　9. 马城子A洞M12：19　10. 张家堡A洞M34：9　11. 马城子C洞M22：4　12. 张家堡A洞M33：2　13. 本溪龙头山　14. 本溪通江峪　15. 新城子M10：1　16. 新城子M8：2　17. 祝家沟M3：4　18. 新城子M8：3　19. 东沟M14：2　20. 东沟M13：2　21. 东沟M10：2　22. 祝家沟M2：2　23. 凤城东山M9

城东山石盖墓的双耳壶（图五，23）别无二致，显示了从马城子文化早期直至祝家沟遗存这类器物都没有太大变化。

2. 遗存所展现的人群生活习性

人群的生活习性方面，由于马城子文化和祝家沟遗存均是以墓葬材料为主，而通过墓葬葬俗最能反映人群的认同度和文化传承。二者在墓葬葬俗方面有几点相似的地方。

首先在墓葬形制上，祝家沟遗存目前发现的墓葬主要为石棺墓，少数为土坑竖穴，石板封顶；马城子文化虽以洞穴墓葬为主，然少数洞穴墓也有用石块砌筑石圹或用石板筑石棺的现象（马城子A洞M12，马城子B洞M4、M6，马城子C洞M1，张家堡A洞M42、M48，山城子B洞M4～M8、M10）；此外在该文化晚期的本溪全堡[38]、蜂蜜砬子[39]、南芬西山[40]、抚顺莲花堡[41]等地已经出现了非洞穴的石棺墓。

其次在葬式上，马城子文化有较多的拣骨葬，人骨均残缺不全，这种情况在祝家沟遗存时期更甚，很多墓葬人骨不全甚至不见人骨。另外在马城子文化中存在的火葬和合葬的习俗在祝家沟遗存中也存在。如新城子墓地多数墓葬不见人骨，原报告编者推测二次葬和骨灰葬的可能性很大；凤城西山M1，发掘者描述墓室西部石板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并留有较多数量的木炭，葬式未作说明，从墓葬线图看没有成形的人骨，应是火葬；1992年发掘的本溪龙头山石棺墓据发掘简报描述，出土头骨5例，既有成年人骨骼又有小儿骨骼，这与马城子文化合葬墓均为妇女、儿童合葬也较相似。

由以上对陶器和丧葬习俗两方面的比较，不难发现祝家沟遗存很多文化因素可以在马城子文化中找到源头，祝家沟遗存正是在马城子文化基础上演变而来，二者在分布地域、陶器形态、丧葬习俗等方面的传承关系毋庸置疑。

三、祝家沟遗存的区域差异

通过分析已发现的属于祝家沟遗存墓葬的地理位置分布图，可以看出：遗存的核心分布区应在清河、浑河和太子河流域，此中心区内可划出浑河、清河、寇河上游（A区）与太子河上游（B区）两个集中分布区；凤城东山、西山距离核心分布区稍远，可视为另一个分布区（C区）。

以上所划分的两大区三小区是建立在墓葬所处地理位置的基础上，那么从墓葬出土器物组合和墓葬形制看是否也能吻合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1. 墓葬出土器物组合

A区和B区在器物组合上差异不大，基本是以钵口弦纹壶或钵口弦纹壶与双耳陶罐或钵口弦纹壶与素面陶壶的组合为主，占比达90%以上，偶见有钵口弦纹壶与双耳钵或圈足碗或陶豆的组合。两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个别陶器的形态和出现频率上。如双耳陶罐基本分为两种形态，实圈足和空圈足，A区两种形态的双耳陶罐均有且数量基本相当，B区主要为实圈足的双耳罐，空圈足罐仅在本溪龙头山石棺墓中见到一例。素面无

耳陶壶在B区常见，A区则没有发现。

C区在器物组合上与A、B两区差异明显，双耳陶壶本是马城子文化墓葬的主要随葬品。到祝家沟遗存阶段，在原马城子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即本文所分的祝家沟遗存分布的B区已看不到双耳陶壶，然这类器物却在祝家沟遗存C区墓葬随葬品组合中占据重要地位。除双耳陶壶外，祝家沟遗存的典型器物钵口弦纹壶在C区出现的频率也没有A、B区高。

2. 墓葬形制

上文统计已发表出土钵口弦纹壶的墓葬除普兰店双房M6外共计有45座，另外在西丰东沟、本溪新城子、凤城东山西山还有已发表的位于同一墓地的祝家沟遗存墓葬24座。此24座墓葬虽未出土钵口弦纹壶，有的甚至不出随葬品，但在讨论墓葬形制时，具有统计意义。综合分析69座墓葬，可以将祝家沟遗存的墓葬形制归纳如下：

此类遗存的墓葬以石棺墓为主，极少数为土坑墓穴，墓底一般没有铺底石，墓顶用数块或者单块大石板封盖。石棺的构筑分为石板立砌、石块垒砌、石板石块混砌、石板石块与卵石混砌、石块与自然土壁相结合几种形式。具体到三个分区内，墓葬形制各有特点。

A区所见墓葬均为石棺墓，没有土坑墓穴，可统计数量有35座。石棺的构筑以石板立砌者最多，有27座，占比约77%；其次为石块垒砌石棺，有4座，占比约11.5%；另外有石板立砌和石块垒砌混筑石棺4座，占比约11.5%。A区墓葬均由数块石板封盖，墓底无铺底石居多，仅有7座墓存在铺底石，占比约21%。

B区所见墓葬也均为石棺墓，可统计数量有19座。石棺的构筑方式可分为三种：石块垒砌石棺8座，占比约42%；石板立砌和石块垒砌混筑石棺10座，占比约53%；石板、石块、卵石混筑石棺1座，占比约5%。B区墓葬保存有封顶石的均是由数块石板封盖，墓底无铺地石居多，仅2座有铺底石，占比约11%。

C区墓葬除石棺墓外还有大量的土坑墓穴墓，可统计数量有16座。该区石棺墓的构筑分为石块垒砌和石块与自然土壁结合两种，计有8座，占比50%；土坑墓穴墓有8座，占比50%。C区墓葬均由单块大石板封盖，墓底均没有铺底石。

由此可以看出，祝家沟遗存A区以石板立砌石棺墓为主，墓顶由数块石板封盖；B区以石块垒砌和石板与石块混砌的石棺墓为主，没有单纯石板立砌石棺，墓顶也是由数块石板封盖；C区是以石块垒砌石棺墓和土坑墓穴墓为主，二者数量相当，石棺墓不见石板立砌现象，墓顶由单块大石板封盖。

综上所述，按照目前所发现的祝家沟遗存墓葬的地理位置，所划分的遗存分区在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组合上都能得到合理的印证。以上三区的划分说明祝家沟遗存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的类型，如果选择三个分区内有代表性的墓地，可以分别成为祝家沟遗存东沟类型、祝家沟类型及东山类型。

四、小　　结

祝家沟遗存是西周早期至春秋时期继马城子文化后分布于辽东地区一种非常重要的遗存，尤其在这类遗存中发现有曲刃青铜短剑，所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以往由于辽东地区发现的材料多为零散的抢救性发掘或征集所得，因此很容易将特点鲜明的双房M6视为此类遗存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西丰东沟墓地和本溪新城子墓地的发掘，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和界定这类遗存。

通过对辽东地区所有出土钵口弦纹壶的墓葬以及同处一个墓地的其他墓葬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的统计和分析，我们认为祝家沟遗存仅指分布于辽东半岛北部哈达岭、龙岗山、长白山西麓地区，出土钵口弦纹壶、双耳罐、素面陶壶、圈足碗、双耳钵、双耳陶壶、素面陶罐等陶器的石棺墓或盖石土坑墓；其来源于本地区稍早的马城子文化，二者在陶器形制和葬俗方面均有渊源；根据目前所发现的祝家沟遗存陶器器物组合和墓葬形制的不同，可将其初步划分为三个地方类型，祝家沟类型、东沟类型、东山类型。这三个地方类型从陶器器形和种类看，东山类型显得更为保守、原始，东沟类型和祝家沟类型文化面貌更为崭新，应是这类遗存的主体和主要发展方向。

注　　释

［1］ 许明纲，许玉林. 新金双房石盖石棺墓［J］. 考古，1983（4）.

［2］ 王巍. 双房遗存研究［A］. 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402～411.

［3］ 赵宾福. 以陶器为视角的双房文化分期研究［J］. 考古与文物，2008（1）.

［4］ 朱永刚. 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J］. 考古学报，1998（2）.

［5］ 朱永刚. 辽东地区双房式陶壶研究［J］. 华夏考古，2008（2）.

［6］ 吴世恩. 关于双房文化的两个问题［J］. 北方文物，2004（2）.

［7］ 华玉冰. 新城子文化初步研究［J］. 考古，2011（6）.

［8］ 陈光. 羊头洼类型研究［A］. 考古学文化论集（二）［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3～151.

［9］ 郭大顺. 辽东半岛青铜文化的原始性——以双房六号墓为实例之一［J］. 旅顺博物馆馆刊，2006.

［10］ 同［1］.

［11］ 辽阳市文物管理所. 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J］. 考古，1977（5）.

［12］ 梁志龙. 辽宁本溪多年发现的石棺墓及其遗物［J］. 北方文物，2003（1）.

［13］ 同［12］.

［1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本溪县文物管理所. 辽宁本溪县新城子青铜时代墓地［J］. 考古，2010（9）.

［15］　佟达，张正岩. 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石棺墓［J］. 考古，1989（2）.
［16］　同［15］.
［17］　同［15］.
［18］　抚顺市博物馆. 辽宁抚顺市甲帮发现石棺墓［J］. 文物，1983（5）.
［19］　同［15］.
［20］　清原县文化局，抚顺市博物馆. 辽宁清原县近年发现一批石棺墓［J］. 考古，1982（2）.
［21］　同［20］.
［22］　清原县文化局. 辽宁清原县门脸石棺墓［J］. 考古，1981（2）.
［23］　辽宁省西丰县文物管理所.辽宁西丰县新发下的几座石棺墓［J］. 考古，1995（2）.
［24］　a. 同［23］.
b. 许超，张大为. 西丰县振兴镇诚信村石棺墓2006年清理简报［J］. 东北史地，2010（4）.
［2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 辽宁西丰县东沟遗址及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2011（5）.
［26］　许志国. 辽宁开原市建材村石棺墓群［J］. 博物馆研究，2000（3）.
［27］　许志国，李忠恕. 辽宁开原市发现的几座石棺墓［J］. 博物馆研究，2001（4）.
［28］　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 辽北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1981（2）.
［29］　许志国，庄艳杰，魏春光. 法库石砬子遗址及石棺墓调查［J］. 辽海文物学刊，1993（1）.
［30］　同［29］.
［31］　a. 许玉林，崔玉宽. 凤城东山大石盖墓发掘简报［J］. 辽海文物学刊，1990（2）.
b. 崔玉宽. 凤城东山、西山大石盖墓1992年发掘简报［J］. 辽海文物学刊，1997（2）.
［32］　同［31］b.
［33］　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 大连于家村坨头积石墓地［J］. 文物，1983（9）.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双坨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展和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35］　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b. 赵宾福. 马城子文化新论——辽东北部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整合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c. 李恭笃. 本溪地区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J］. 辽海文物学刊，1989（1）.
［36］　同［34］.
［37］　a. 赵晓刚. 沈阳地区新乐上层文化初探［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b. 霍东峰，华阳，付珺. 新乐上层文化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38］　同［12］.
［39］　同［12］.

［40］ 万欣，梁志龙，马毅. 本溪南芬西山石棺墓［A］. 辽宁考古文集［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41］ 同［15］.

Analysis of "The Shuangfang Remains"

Chu Jingang

Abstract: A sarcophagus tomb containing a bowl mouthed Xianwen pot and of the curved edges bronze dagger, was discovered in Pulandia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in 1980. Then more graves like thi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Liaoning Province. Scholars have many names about such remains, such as: the Shuangfang type, the Shuangfang culture, the Xin Chengzi culture or the Zhu Jiagou remai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cently published materials of Benxi Xinchengzi and Xifeng Donggou cemetery. The paper arrives at the the conclusion: the graves contain the bowl mouthed Xianwen pot in Liaodong and the graves at Pulandian and Shaungfang do not belong to the sam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se graves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the Zhu Jiagou remains. The Zhu Jiagou remains were found earlier than the Shuangfang remain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River, Hun River, Taizi River.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burials, the Zhu Jiagou rem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Zhu Jiagou type, the Donggou type and the Dongshan type.

Key words: Liaodong; Bowl mouthed Xianwen pot; The Zhu Jiagou type

诺音乌拉墓地出土西汉耳杯*

奇斯佳科娃·阿格尼娅（Chistyakova A. N.）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新西伯利亚考古与民族研究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

诺音乌拉墓地是一处匈奴贵族墓地，时代约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该墓地位于蒙古北部诺音乌拉山岭，距乌兰巴托130千米。早在1924至1927年，P.科兹洛夫（P.Kozlov）即对其进行过发掘，后由蒙古共和国科学会发掘。该墓地由200余座墓葬组成，墓葬平面多呈方形，高约2米。2006年和2009年，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科学院主研究员N.V.坡罗喜玛科（N.V.Polosmak）[1]领导的俄罗斯蒙古联合考古队对该墓地进行发掘。

诺音乌拉墓地出土的随葬品有匈奴制作的艺术品，同时还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随葬品，如铜器、玉器和漆器等。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漆器——耳杯。

诺音乌拉墓地共出土11个汉代耳杯，其中5个带有铭文的较为特殊。

（1）M6出土耳杯，现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编号为：MP2301。该耳杯杯底用红色油漆写有“上林”二字。根据“上林”二字铭文以及《汉书》中记载的匈奴单于乌珠留诚心前来长安朝拜一事，别尔恩希塔姆（Bernshtam A. N.）认为该耳杯是汉代赐予匈奴的礼物[2]。杯底边缘还有17字铭文，仅记录了两个工匠和一个监督员的姓名，省略了其他工匠和管理员的姓名，这证明了该耳杯是在私人作坊制造的。耳杯的铭文由日本研究者梅原末治释读：

建平五年九月工王潭經畫工獲壺天武省[3]

日本、韩国、法国等国的研究者也对该耳杯铭文进行过释读，如下：

建平五年九月工王潭經畫工獲畵夫武省[4]

梅原末治先生提出，西汉建平年号只有四年（公元前6～前3 年），而没有建平五年，他认为该耳杯铭文中的“建平五年”实际上是元寿元年（公元前2 年）[5]。

（2）1927年西姆克夫（Simukov A. D.）在诺音乌拉山（The Tzurumte Mounds）未编号的一座墓葬发现了一个带铭文的耳杯，现藏于乌兰巴托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其编号为：V50-3-89（原编号：A-242）。2008年，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彩版一），铭文释读如下：

* Supported by the Russian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No. 14-50-00036)

建平五年蜀郡西工乘輿髹氵月畫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 素工尊 髹工袞 上工壽 銅耳黄塗工宗 畫□□ □□□ □工白 造工夫造護工卒史巡 守長克 丞駿掾豊 守令史嚴主

梅原末治在《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一文中有如下释读[6]：

建平五年 蜀郡西工造 乘輿髹泪畫木黄耳棓 容一升十六籥 素工尊髹工褒上工壽 銅耳黄塗工宗 畫工□ 泪工豊 清工白 造工［告］造 護工卒史巡 守長克駿掾豊 守令史嚴主

（3）2006年2至11月，由坡罗喜玛科博士带领的考古发掘队在苏珠克图盆地（The Suzukteh Mounds）清理了两座墓葬。M20发现了四件耳杯，其中三件是完整的，另一件仅保留了鎏金铜釦（彩版二，1、2），现藏于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第一个耳杯底部长9.25厘米，宽5.12厘米，底部边缘有46个字：

乘輿髹氵月畫木黄耳一升十六籥棓元延四年考工二［工］通繕氵月工憲守佐臣文嗇夫臣勳掾臣文臣 右丞臣光 令臣譚省

（4）第二个耳杯底部长9.7厘米，宽5.2厘米，底部边缘仅保留了13个字：

臣孝主守右丞臣忠守令臣畫省[7]

（5）2009年在苏珠克图盆地清理了诺音乌拉墓地M31，又发现了保留比较完整的两件漆器耳杯，现藏于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其中一件底部长92.5厘米，宽5.12厘米，壁厚4厘米（彩版二，3），铭文为：

乘輿髹氵月畫木黄耳一升十六籥棓元延四年考工二［工］相造 氵月工憲畫護臣隆守佐臣文嗇夫臣勳令史臣□掾臣文主右丞臣光 令臣□省[8]

通过对这5件漆器耳杯的研究，可以确定带铭文耳杯最常见的花纹是一对凤凰相对而立于几朵祥云之中。铭文给我们提供了汉代社会的重要信息——漆器制造年代、工匠名、官名以及漆器生产与管理过程等。

诺音乌拉发现的漆器均为设在都城的少府考工以及供御用的西工和工官制造的，官职的顺序不同（表一）。

表一　诺音乌拉墓地出土带铭文耳杯中的官职

诺音乌拉墓地	官名						
未编号	護工卒史	守長	丞	掾	守令史		
M6			嗇夫				
M20		佐	嗇夫		掾	右丞	令
M20					掾	守右丞	守令
M31	護	守佐	嗇夫	令史	掾	右丞	令

通过对诺音乌拉墓地出土带铭文耳杯中的官职名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工和工官官职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考工则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因此，除了未编号墓葬出土的耳杯之外，其他耳杯均由都城（长安）考工制造[9]，事实表明诺音乌拉是匈奴的贵族墓。

第二，其中两件于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制作，两件于元延四年 （公元前9年）制作，还有一件制作年代未知。

第三，根据铭文可知制作漆器的具体情况或工序。按工种分为：素工、髹工、氵月工、畵工、清工、铜耳黄涂工等。

第四，其中三件耳杯的铭文表明耳杯的容量为一升十六籥（龠）（约362毫升）。按照汉代的尺寸测量，籥容为10.65毫升，升容为191.825毫升。但是实际上耳杯的容量是不同的，不一定等于362毫升。

第五，耳杯的铭文应该是一种“标志”。

最后，耳杯铭文可以协助确认陵墓的年代；铭文包括制造年代、工匠名、汉代管理人员的姓名、官职等；匈奴墓葬随葬品包括表明匈奴与汉代建立密切文化关系中国制造品，耳杯为考工，故可确认诺音乌拉墓地是一处匈奴贵族（即单于）及其陪葬者的墓地。

注　释

［1］ a. Polosmak N.V. Bogdanov Ye.S. *Tseveendorzh The Twentieth Noin-Ula Tumulu*［M］. Novosibirsk: INFOLIO, 2011: 184.

b. Polosmak N.V. Bogdanov Ye.S. *The Suzukteth Mounds (Noin Ula, Mongolia), Part 1*［M］. Novosibirsk: INFOLIO, 2015: 136.

［2］ Bernshtam A.N. Khunnskii Mogilnik Noin-Ula i ego istoricheskoye znacheniye (Xiongnu Noin-Ula Burial Site.It’s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Value) ［J］. *Bulletin of the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1937(4): 947-968.

［3］ Umehara Sueji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 *Artifacts found at the Noyon uul site in Mongolia* ［M］. Tokyo: Tōyō Bunko, 1960.

［4］ Pirazzoli-t’Serstevens M. A. Chinese Lacquerwere from Noyon uul: Some Problems of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J］. *The Silk Road*, 2009(7): 31-41.

［5］ 同［3］.

［6］ 同［3］.

［7］ Chistyakova A.N.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Lacquer Cup from Noin Ula Mound 20 (Mongolia)［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9(37-3): 59-68.

［8］ Chistyakova A.N. Lacquer Cup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Noin Ula, Mongolia): An Analysis of Inscriptions ［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11(39-4): 83-89.

［9］ 洪石. 战国秦汉漆器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The Lacquered Ear Cups of Han Dynasty excavated from Noin-Ula burial site

Chistyakova A. N.

Abstract：Noin-Ula burial site is the tombs of the aristocracy of the Xiongnu (end of the 1st century BC-1st century AD). They are located in Noin-Ula hills of Northern Mongolia by the Selenga River in the north of Ulan-Bator in Batsumber sum of Tov Province. They were excavated in 1924-1927 by Pyotr Kozlov who found them to be the tombs of the aristocracy of the Xiongnu. Later the mounds were excavated by the Committee of Science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Noin-Ula burial site consists of more than 200 large burial mounds of a square form, some 2m in height. In 2006 and 2009 the excavation of the burial site was continued by Russian-Mongolian expedi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N.V. Polosmak, a chief researcher of Archeology and Ethnography Institute of the RAS Siberian Branch. Noin-Ula collection consists of 11 pieces of Chinese lacquer cups with handle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re 5 cups with Chinese inscriptions. The most frequent pattern on cups is pairs of opposing Phoenix (Fenghuang). Inscriptions and ornamentation help to clarify the dating of mounds, determine the time of cups manufacture and workshop in which they were made.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articles shows that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were close cultural and family Chinese-Xiongnu relations. Availability of articles from the Chinese imperial workshops confirms that Noin-Ula mounds buried Xiongnu (Shanyu) and their retainers.

Key words: Noin-Ula burial site; Xiongnu; Russian-Mongolian expedition; Han dynasty; lacquered cups

蒙古国境内的两座突厥墓

——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

东　潮[1]著　筱原典生[2]译

（1. 德岛大学，日本德岛；2.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一、乌兰克热姆墓的结构与壁画

乌兰克热姆墓[1]位于蒙古国布尔干县巴彦诺尔。坟丘（南北长约34米，东西长约30米，高约4米）的外围有南北长175米，东西宽83米的长方形垣墙。墓葬为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总长约46米，由墓道、四过洞、四天井、二龛室（第四天井）、甬道及后室组成。墓道长约20米，墓室南北长3.4米，东西宽3.1米。同时期长安地区的新城长公主墓为约50米，郑仁泰墓是53米，苏定方墓是73米，阿史那忠墓是55米，安元寿是60米，懿德太子墓是101米，章怀太子墓是71米，可以说全长约50米的乌兰克热姆墓属于大型墓葬。墓道、过洞以及墓室均画有壁画。墓道东西壁画有青龙和白虎、列戟、仪卫一人、男侍三人。墓道和过洞后壁画有门楼、莲花化生、畏兽（鬼神）图像。顶部、过洞两壁有牵马图像。东壁牵马图中的马夫为发辫，着交领长袍，穿袴，应该是突厥人。有马鞍和马镫（右侧），它类似与随葬品中的鎏金铜马镫。西壁上的马夫戴帽子，着圆领长袍，穿裤。第四个过洞两壁上各有二人，西壁为一个女侍和一个男装女侍。后室四壁画有屏风和树下人物像。女侍为穿红色长袖衫和条纹裙的初唐样式，男侍身着圆领服和裤子。树木上方用红色线条勾云纹。龛内有陶俑列队，应是卤簿。此外还随葬有金铜三梁冠，剑鞘装饰，带钩，小型鎏金铜马镫、马镳，金属货币，金属容器，木偶，织物等。斜坡墓道上的青龙白虎图，从画风判断应为七世纪末的唐样式，属于咸阳苏定方墓（675年）、礼泉阿史那忠墓（667年）、礼泉永泰公主墓（706年）、洛阳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706年）等壁画系列当中。从墓室结构和壁画布置来看，类似于礼泉阿史那忠墓和洛阳唐氏墓。唐氏墓就是李旦（睿宗）夫人墓。鬼神像（畏兽）图像画在第二个过洞的后壁。它的功能同于镇墓兽及守墓的门卫像。它与太原徐显秀墓（571年）门楣鬼神和济南道贵墓（571年）甬道门鬼神一样，表现在墓门上，即守在内外边界。畏兽盛行于南北朝，一直见于唐代，如李思摩墓（647年）。后室树下人物屏风图像类似于山西太原南郊唐墓和陕西礼泉燕妃墓（671年）等。屏风画出现于南朝，继承隋的

传统，盛于唐朝。山东临朐崔芬墓（552年）的树下人物图像是南朝的“竹林七贤”样式。墓道后壁门楼与昭陵陪葬墓长乐公主墓的图像非常相似。门楼图像代表宅院的内外边界。后来，门楼图从墓道后壁（北壁）移到墓道两壁上，如懿德太子墓。

二、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的等级

唐代墓葬中，封土、墓室、墓道规模以及天井、过洞数量均代表墓主身份地位。龛内陶俑列队及壁龛数量与卤簿制度有关。

天井、过洞数量与墓道规模相关。七世纪中叶到八世纪初出现并发展拥有四到七个天井及过洞的大墓，到了八世纪中叶逐渐衰退。乌兰克热姆墓有四个天井和四个过洞，它与拥有四个天井四个过洞的李绩墓（司空上柱国曹国公右武侯大将军）相同，其地位与拥有五个天井五个过洞的阿史那忠墓（镇东大将军邢州大都督上柱国）同等或低一级。也可以推测乌兰克热姆墓的等级高于拥有三个天井三个过洞的仆固乙突墓。乌兰克热姆墓出土金铜三梁冠直径20厘米，高23厘米，在圆形金铜带子上加三根骨架，侧面贴六花瓣的金属装饰，其形制与李绩墓出土三梁进贤冠相似。关于冠帽有“三品以上三梁”的规定，李绩墓出土冠帽与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的地位相符合。李绩卒于总章二年（669年），第二年下葬。《旧唐书》卷四十五载：“亲王，远游三梁冠，金附蝉，犀簪导，白笔……进贤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犀簪导，九品以上一梁，牛角簪导。”《旧唐书》卷三载：贞观八年（634年）“上初服翼善冠，贵臣服进德冠”。乌兰克热姆墓出土冠为三梁冠，它代表墓主人身份，应与李绩相等，相当于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一级。墓道两壁各画三个一组的“列戟”，它在一根木杆悬挂旗旌，从尖端的形状来看是矛或枪，而不是戟。关于唐代列戟的组成，李寿墓是左右各七、共十四（左武卫大将军，淮安王，赠司空），段简墓是左右各六、共十二，李氏定襄县主墓是左右各六、共十二，新城长公主墓是左右各六、共十二，阿史那忠墓（右骁卫大将军薛国王、从一品）（675年）是左右各六、共十二，苏定方墓（左武卫大将军）是左右各五、共十，李贤墓（706年）是左右各七、共十四，永泰公主墓（中宗第七女）是左右各六、共十二，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宗长子）是左右各六、共十二，万泉县主薛氏墓是左右各五、共十。《唐六典》卷四载：“凡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及一品以下，诸州门，施戟有差，凡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及一品以下，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十六戟，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若上国柱国带职事二品以上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以上中都督府上州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州门一十戟”。

根据墓室结构或壁画图像等因素来判断，乌兰克热姆墓建于670年左右，看来乌兰克热姆墓早于阿史那忠墓（675年）。壁画题材有青龙、白虎、仪仗、列戟、门楼、牵马、畏兽、莲花、侍女等，基本上与同时代的唐代壁画题材一样。关于列戟，阿史那忠

墓是东西壁各有六个共十二个，苏定方墓共有十个。乌兰克热姆墓虽然只有六个列戟，但墓主人身份高于大将军才能画有列戟。壁画代表着生前地位，丧葬礼仪是政府行为。三梁冠和佩剑与李绩墓（司空公太子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相同。从墓主人身份和墓制的关系来看，乌兰克热姆墓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应与右武卫大将军（正三品）凉州都督郑仁泰（664年）、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667年）、右骁卫大将军薛国王（从一品）、右骁卫大将军金微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乙突（678年），右威卫将军赠代州刺史（从三品）上柱国安元寿（683年）等一样。

三、仆固乙突墓与金微州都督府

仆固乙突墓[2]位于蒙古国中央省扎马尔县的图拉河北岸。其西南约一千米处有和日木登吉城[3]。陵园围墙为南北长的108米，东西宽87米的长方形。封土直径约20米，高5米。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有一对龛（第二天井）、三个过洞、三个天井，总长21米。出土有陶俑、木制品以及纺织品。墓室为3.6米×3.5米。通往墓室的第三个天井部分发现有《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据墓志，墓主人讳乙突，金山人。祖父歌滥拔延，皇朝左武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父思匐，继袭金微州都督。乙突死于仪凤三年（678年）二月，同年戊寅下葬于缬碖原。墓葬的位置如墓志所述，西为峙葱山，北临蒲海。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杜尔）陪葬于昭陵时，其封土象为“葱山”并立碑（《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九）。歌滥拔延、乙突、怀恩等仆固部世代袭任金微州都督。根据仆固乙突墓的埋葬地点，基本可以判断金微州都督府就在蒙古国中央县扎马尔地区附近。据《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为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俟利发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以多览为燕然府、仆骨为金微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据墓志记载：“祖歌滥拔延皇朝左武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父思匐继袭金微州都督”，“父殁传嗣还囗本部都督统率部落奉声教”，这个思匐（乙突的父亲）被认为是在显庆五年（660年）和龙朔二年（662年）的讨伐中被诛杀的仆骨部首领。思匐曾经是金微州都督，乙突继袭，他们是祖孙三代金微州都督。如果，他们的墓地选在自己的根据地的话，金微州就在图拉河以北的扎马尔一带。仆固乙突墓位于布尔干县和中央县境的鄂尔浑河东边，其支流图拉河之北约2.5千米。据墓志：“仪凤三年二月廿九日遘疾终于部落。春秋卌有四”，死于金微都督之地。仆固乙突的埋葬年代相当于唐朝的羁縻统治时期。根据墓志，仆固乙突是“遘疾终于部落……迈彼毡裘之乡，参兹缨冕之列”，就是说墓主人经常往返从蒙古的根据地和唐朝之间。其埋葬地是“缬碖原”，即Shoroon Bumbagar[4]。缬碖原是西邻葱山，北面蒲海的地域，也即鄂尔浑河、图拉河和Haraa河之间的东西150千米，南北25千米的区域。金微州都督就设置在其范围内的扎马尔地区，仆固乙突的墓葬也在缬碖原上。西面

有葱山，有扎马尔山（海拔1816米），图拉河和鄂尔浑河之间有Mogod山（2139米），“蒲海”指贝加尔湖，这地区还包括金微州北部的庐山都督府。

我们通过仆固乙突墓志，能够了解羁縻统治时期的丧葬礼仪及皇帝吊祭的相关情况：“以仪凤三年二月廿九日遘疾，终于部落，春秋卌有四。天子悼惜久之，敕朝散大夫，守都水使者，天山郡开国公麹昭，监护吊祭，赙物三百段，锦袍金装带弓箭胡禄鞍鞯等各一具。凡厥丧葬，并令官给，并为立碑。即以其年岁次戊寅八月九日朔十八日壬寅，永定于于缬碖原，礼也。”

乙突下葬是高宗赐予“金装带弓箭胡禄鞍鞯”。弓箭、胡禄与横刀都是重要的仪礼佩器。“弓箭胡禄”就是见于长乐公主墓、郑仁泰墓、李绩墓、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所谓“虎韔豹韬”，就是老虎和豹子皮做的弓袋。此外还包括乌兰克热姆墓出土的金铜制马镫、马镳。葬具还有“鞍鞯”，马是墓主人的送葬以及升仙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存在，因此墓室壁画必绘有牵马图。乌兰克热姆墓出土金铜马镫明器三件、马镳一件。其中有一对高6.3厘米，宽4.4厘米，直径2.2厘米，重55.5克，另一件高6.3厘米，宽4.4厘米，直径2厘米，重25.4克。马镳长8.6厘米，宽1.2厘米，重21.7克。小型马具明器是唐代葬具的一种，同样的金铜马具还见于新城公主墓等，它们之间的墓室结构和壁画内容有一定的共性。可能在长安作坊制造后运至各地。此外，各地发现的明器马具有：宁夏固原史道洛墓（646年）的金铜马镫（4.8厘米）、马镳（长6.5厘米）；西安独孤思贞墓（618年）铜镫（高7.2厘米）、铜马镳（长7.3厘米）；礼泉新城长公主墓（663年）铜马镳（长6.2～9.2厘米）、铜镫（高5.8厘米）；富平李凤墓（675年）金铜圆镫（长4厘米，宽3厘米）；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干沟43号墓的马镫和銙带；吉林省扬屯大海猛（渤海）；扶苏山城（统一新罗）等。小型马具与銙带、开元通宝、唐三彩等一起，分布于唐代的高昌国、渤海、百济、新罗·统一新罗以及日本等地。《旧唐书》卷四十四有关于“夷狄君长”的“典客、司仪”的记载：“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二王后及夷狄君长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皇帝太子为五服之亲及大臣发哀临吊，则赞相焉。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司仪令掌凶礼之仪式及丧葬之具。丞为之贰。凡京职事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京官四品已上，如遭丧葬卒，量品赠祭葬，皆供给之”。唐朝葬仪由鸿胪寺司仪掌管，墓志由秘书省著作局撰文。乙突墓志反映了皇帝对铁勒仆固部的丧葬仪礼的相关情况。乌兰克热姆壁画也是作为丧葬仪礼，由鸿胪寺司仪负责制作的，同时立碑建祠庙。

四、突厥的陵园和祠庙的变迁——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

据《新唐书·突厥传》，贞观八年（634年）“颉利死。赠归义王谥曰荒，诏国人葬之，从其礼，火尸，起冢灞东”。火葬是突厥的丧葬风俗，还建墓碑和祠庙。此外，

还有“俄苏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启民可汗弟也”的记载说明殉葬的存在。这些都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据《旧唐书》，开元二十年（732年）“阙特勒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帝为刻辞于碑，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即建立墓碑、祠庙、石像等，垣墙上画有墓主人在战场的场面。阙特勒庙的西侧放有石棺、祠庙、石雕、碑刻以及列石。垣墙是有瓦顶的夯筑土墙。《新唐书》载：为了阙特勒“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站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旧唐书》的“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和《新唐书》的“四垣墙图战阵状”画在什么地方？发掘阙特勒庙时发现有壁画，很有可能原来画在墙上。其内容应该是颂扬阙特勒生前战功的战争画。同时也应绘制肖像画，立在祠庙周围的石人就是肖像。唐朝皇帝参与了“第二突厥帝国”的阙特勒和默棘连（毗伽可汗）的丧葬仪礼，为其立碑。此外，从长安派去参加阙特勒吊祭的金吾将军张去逸墓发现在咸阳底张镇。下葬于748年，官职为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上柱国。突厥陵园由垣墙、壕沟、基坛、石椁（石棺）、祠庙、石人等石雕、石碑和列石组成。由东向西排列碑、庙、石棺，营建拥有东西轴线的长方形陵园。到了回纥时期，受唐朝影响出现南北方向的陵园，但后来又改回传统的东西方向。平面由圆形或椭圆形发展成长方形。例如，Bugat庙和温格图庙的陵墙为圆角长方形，后来变成长方形陵园，如哈拉郭勒庙（卢山都督・乌碎之子）和阙特勒庙（731年）等。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是南北方向的长方形陵园，这种从东西轴线到南北轴线的变化应该是在羁縻体制下受到唐朝墓葬制度的影响。盛唐时期的李宪墓（742年，睿宗长子・让皇帝惠陵）是南北长方形的陵园。

五、回纥汗国的陵园和墓室结构

回纥时期（745～840年）的陵园在突厥阙特勒陵园结构的基础上发展。回纥时代的陵园群分布在都城的哈喇巴拉嘎斯城西的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一带[5]。

乌布尔哈其勒山谷有八处陵园。陵园的方位为M1（275°）、M5（280°）、M6（275°）、M7（270°），M8（285°），M9（290°），M2（305°）、M3（300°），M4（300°）。在峡谷边上的山坡面营建东西方向的陵园，因此选择东西方向的峡谷。这与以南北轴线为善的风水的地理条件不同。

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其勒3号陵园[6]在祠堂旁边建造南北（东南）方向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甬道和圆形墓室。墓室的方位为西北—东南方向。3号陵园的圆形砖室墓的年代可以从内蒙古、河北北部等中原地区和辽宁朝阳等地的唐墓，唐朝式莲雷纹瓦当的年代推测。

这种圆形砖室墓见于和林格尔县大梁李氏墓（807年）的椭圆形单室土洞墓。辽宁省朝阳地区的初唐墓有圆形砖室墓，如张秀墓（635年）、中山营子勾龙砖室墓（672

年）、左才墓（673年）等，中晚唐时期也很发达。漠南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梁李氏墓[7]是单室土洞墓，有椭圆形墓室和带有两个天井的斜坡墓道。其年代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墓主人是唐故朝散大夫蓟州长史成府君陇西郡夫人李氏，该墓位于单于都护府的故城，是在内蒙古地区的唐墓，离回纥的活动地区不远。

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1号陵园[8]是长41米，宽约34米的长方形，方位是130°，沿山脊而建。墓区内有六座回纥墓。台基的庙堂装饰有画像砖，见有盛唐流行的花鸟图像。回纥时期的墓室的营建顺序根据后室的平面形状，斜坡墓道的缩小化、倾斜度等判断，从早到晚依次为：祠堂东北角的M16（后室长方形，墓道方向135°）；祠堂南侧的M15（梯形，墓道方向140°），祠堂东北角的M17（横长方形，墓道方向132°），M18（长方形，无甬道，墓道方向133°），M9（长方形，无甬道，墓道方向140°）。墓室均为西北—东南走向，与陵园的方位基本一致。使用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是唐朝中晚期的特点。这些墓室的结构类似于长安城附近的西安郊区唐墓。盛唐至晚唐时期，在西安白鹿原等地出现左墓道的土洞墓等多种多样的墓室结构[9]，如唐成王李仁砖墓（710年）和扬州大都督司马妻土洞壁画墓（765年）等。

回纥陵园与突厥一样是东西方向。为什么选择东西方向呢？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太和公主下嫁于回纥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她与婚礼使一起入宫廷。《旧唐书·回纥传》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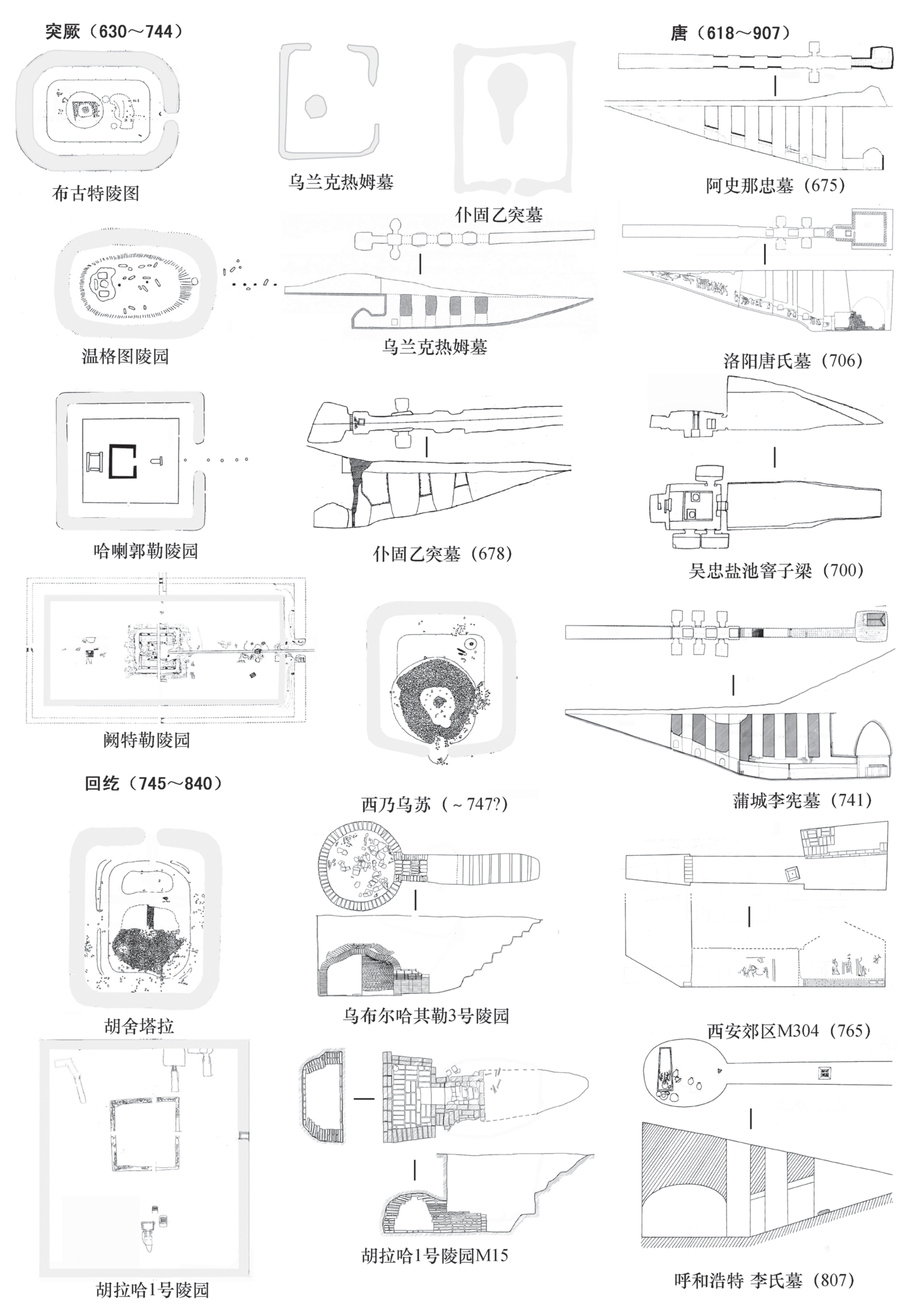
> 至虏庭，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毡幄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妪侍，出楼前西向拜……虏先设大舆曲扆，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纥九姓相分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自此臣下朝谒，并拜可敦。

首都哈喇巴拉嘎斯城是东西方向，宫殿也是朝东。回纥的基础观念上存在东西观念和太阳信仰。陵园和墓室的方向基本上是坐西朝东（图一）。

1. 六胡州的鲁州·灵州

宁夏忠市盐池窨子梁[10]的“大周囗囗囗何府君”墓的墓主人是在久视元年（700年）死于“鲁州如鲁县”的月氏人。唐调露元年（679年）设置的“六胡州”中的鲁州位于宁夏盐池县。何姓墓主人应该是粟特人[11]。何府君墓的后室为长方形带四个龛室，墓室内立有两根八角形柱子，可能受到石窟寺的影响（图一）。

吴忠西郊唐墓位于盐池西方的吴忠市区的红星家园、西部嘉园以及中央大道南北段，共发掘了120座墓葬，年代大约从盛唐至中晚唐。在市区的绿地公园发现了“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墓主人是朔方节度左卫兵马使，据墓志，该墓葬在灵州迴乐东原，由此可推测灵州的位置[12]。在吴忠北郊的明珠公园发掘了从北魏至唐代墓葬123座[13]。有的砖室墓类似于胡拉哈1号陵园墓室。地理上也有关系。明珠公园墓葬群


突厥（630～744）
唐（618～907）
布古特陵图
乌兰克热姆墓
仆固乙突墓
阿史那忠墓（675）
温格图陵园
乌兰克热姆墓
洛阳唐氏墓（706）
哈喇郭勒陵园
仆固乙突墓（678）
吴忠盐池窨子梁（700）
阙特勒陵园
回纥（745～840）
西乃乌苏（～747?）
蒲城李宪墓（741）
胡舍塔拉
乌布尔哈其勒3号陵园
西安郊区M304（765）
胡拉哈1号陵园
胡拉哈1号陵园M15
呼和浩特 李氏墓（807）

图一　突厥回纥墓制

都出土有銙带和开元通宝。唐式銙带是反映身份制度的，分布于唐朝领土及其交通圈内。

2. 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和契苾何力・仆固怀恩

“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发现在盐池县西北，黄河流域的青铜峡市邵岗墓群。单室砖券墓，带斜坡墓道或阶梯式。根据墓志，神龙二年（706年）卒于皋兰州官邸内，景云二年（711年）下葬在贺兰山南原之地。夫人的父系家族是铁勒九部的浑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铁勒属于唐朝，浑部置根据地皋兰州，后改为东皋兰州（现在中宁县鸣沙），隶属灵州都督府。邵岗唐墓是铁勒浑部的家族墓地[14]。

根据墓志，浑公夫人契苾氏的曾祖父为瑞右武卫大将军贺兰州都督，祖何力为唐辅国大将军右金吾将军驸马都尉贺兰州都督申国公，父明是唐镇东大将军行左屯卫将军贺兰州都督凉国公。《旧唐书》卷一〇九有关于契苾何力的记载，他在仪凤二年去世，最后官位是镇东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凉国公、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于昭陵。浑公夫人墓志补充了《旧唐书・契苾何力传》的相关内容。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是铁勒诸部契苾氏贺兰州都督的后裔。《旧唐书》卷一〇三载：“凉水界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代为酋长……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长流瀼州、浑大德长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长流藤州、庐山都督思结归国长流琼州”。这里出现“贺兰都督契苾承明”之名，开元年间（713～741年），他与回纥、契苾、浑、庐山的都督一起，因为诽谤王君㚟被流放[15]。仆固怀恩（765年）在安禄山的乱后背叛唐朝。根据《旧唐书》卷一二一：“怀恩领回纥及朔方之众继进，行至鸣沙县，遇疾舁归，九月九日，死于灵武，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仆固怀恩是金微都督，其所在地不详[16]。突厥和回纥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鄂尔多斯地区，乌布尔哈其勒3号陵园1号墓等的回纥墓制是受到唐墓，尤其是鄂尔多斯地区影响，可能是在8世纪后半回纥时期修建的。这地区出现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等在羁縻时期按照唐朝制度修建的墓葬以后，东突厥第二可汗国被灭亡，建立回纥可汗国成立后又出现唐制墓葬。这些墓葬制度反映了突厥灭亡后的回纥和唐朝的国际关系。

六、唐与突厥、高昌、新罗——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

昭陵自贞观十年（637年）开始营建，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安葬于此。永徽元年（650年），在昭陵北司马门立“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十四国蕃君长中，铁勒和突厥族有五人，由此窥见太宗、高宗时期唐朝和突厥的政治关系非常重要。《唐会要》卷二十载：“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立了突厥颉利可汗右（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出（咄）苾（634年）、突厥

頡（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631年）、突厥乙弥泥孰候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647年）、突厥都（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655年）和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盛的石像，反映了唐朝对突厥实行严格的羁縻政策。此外，唐朝对新罗乐浪郡王金贞（真）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盛、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林邑王范头黎、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等赐予王号或郡王号。这几个突厥人中，阿史那李思摩和阿史那杜尔是陪葬昭陵，阿史那咄苾葬于洛阳浊水之东。阿史那什钵苾与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645年）的葬地不明。乾陵的蕃君长石人像有“故左威卫大将军兼金微都督仆固乙突”的题记，他的功绩是“及东征靺鞨，西讨吐蕃，并效忠勤，丞摧凶勤”，东讨高句丽，西伐吐蕃。乾陵蕃君长石像中，另有一位阿史那氏，即“吐火□□□□□□督阿史那忠节”，他可能是《旧唐书》卷二二一下所记的“显庆中，以其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折小城为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阿史那忠（675年）陪葬于昭陵。昭陵十四蕃君长到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代表了唐朝的蛮夷观和天下观。唐和高昌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让他们率领突厥和契苾何力的骑兵数万骑讨伐高昌，麹智盛投降唐朝。昭陵北司马门址出土“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勇”碑。贞观二年（651年）“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旧唐书》卷四），显庆三年（658年）“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及咥运，阙啜。西域平，以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永徽二年（651年）“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旧唐书》卷四）。吐鲁番的阿斯塔那有高昌国时期到安西都护府、西州时期的墓葬群。M38是壁画墓，前室顶部画有云纹和飞鹤，四壁上部有童子骑飞鹤图等，后室顶部有二十八宿天文图，后壁画有六幅树下人物屏风图。树下人物屏风是初唐时期流行的题材，也见于突厥乌兰克热姆壁画墓。这些题材见于长安城北方的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下的突厥活动区和西方的安西都护府下的高昌国故地。

真平王十六年（594年）“隋帝诏拜王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三国史记》卷四）；真平王四十六年（624年）“唐高祖降使册王为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善德王四年（635年）“唐遣使时节册命王为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真德王元年（647年）“唐太宗遣使时节。追赠前王。为光禄大夫。仍册命王为柱国封乐浪郡王”；真德王八年（654年）“王薨。谥曰真德。葬沙梁部。唐高宗闻之。为举哀于永光门。使大常丞张文收持节吊祭之。赠开府仪同三司。赐彩段三百”（《三国史记》卷五）；武烈王元年（654年）“唐遣使持节。备礼，册命。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王遣使入唐表谢”；武烈王八年（661年）“以阿飡宗贞为都督”（《三国史记》卷五）；文武王二年（662年）“唐使臣在馆。至是册命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文武王三年（663年）“大唐以我国为鸡林大都督府。以王为鸡林州大都督。唐皇帝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前都督王文度之众我兵”（《三国史记》卷六）。真德王三年

（649年），采用唐朝衣冠制。真德王四年（650年）规定，真骨身份者持“牙笏”。采用了唐朝的持笏制度。庆州龙江洞古墓出土的持笏陶俑应该是来自长安。同时出土的青铜十二生肖像说明此时已经从唐朝传入了十二生肖思想。文武王四年（664年），“下教妇人亦服中朝衣裳”。

七、乌兰克热姆墓和瀚海都督府、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

《旧唐书·铁勒传》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契苾、回纥等十余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尽，乃相继续归国。太宗各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多览葛为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为龟林都督府……又置燕然都护以统之”。《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下载，龙朔三年（663年）“改燕然都护府为瀚海都护府、瀚海都护府为云中都护府”，麟德元年（664年）“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都护府、官品同大都督”，总章二年（669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1. 仆固乙突墓和日木登吉城

仆固乙突是金微州都督，其父、其祖父都当过金微州都督。墓地位于图拉北岸的扎马尔地区。将仆固（仆骨）部为金微府。和日木登吉城位于图拉河南边，有东城和西城。东城为东西310～410米，南北560米，西城是东西640～780米，南北760米。东城是辽代所建，西城则可以追溯于回纥、突厥时代。

图拉河的南岸有乌兰克热姆城、陈套勒盖城和哈尔巴鲁卡斯城，均为辽代所建。据《辽史·地理志七》，为了防御边疆：“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关于镇州城的所在地，有陈套勒盖城说，以及和日木登吉城说（冯恩学，2014）。哈尔巴鲁卡斯城为方形城墙、带有瓮城。该城虽是辽城，但应该能够复原其前身，即回纥时代、甚至突厥时代都城的面貌。

仆固乙突墓位于图拉河南岸，乌兰克热姆墓位于图拉河北岸东北76°，距约11千米处，两者虽分别位于图拉河的南北两岸，但距离却不远。乌兰克热姆墓的墓主人应该是都督一级的人物，这与乙突墓相同。由于墓室规模比乙突墓大，可能他的等级较高。乌兰克热姆墓营造于羁縻统治时期，墓主人应该是在唐朝羁縻政策下被授予唐朝将军称号的突厥贵族。

鄂尔浑河和图拉河流域自从东突厥从第一可汗国以来，经过唐朝羁縻统治时期、东突厥第二可汗国时期、回纥可汗国时期直到契丹（辽）时期，一直都是文化兴盛的地区。乌兰克热姆壁画墓和仆固乙突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的。

2. 薛延陀的势力范围

贞观四年（630年），唐朝降服了颉利可汗，真珠毗伽可汗（夷男）趁着北方草原无主之际率自己部落返回东部故地，将宫廷置于都尉揵山之北、独逻河（图拉河）之南。距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到金山、南临突厥、北面瀚海（贝加尔湖），即古代匈奴的故地。兵力约有二十万人，让二子分别统治南北两部（《旧唐书·铁勒传》）。

文献曰“京师北三千三百里”，唐代的1里是约560米，那么直线距离约1800千米。其势力范围是图拉河（独逻河）的“南岸”，然而从长安城明德门到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约1500千米。

铁勒同罗部是“在薛延陀北、多览葛之东、距京师七千里”（《新唐书·回纥下》）。七千里是3920千米。

墓主人的阿史夫人，她嫁给在唐朝为官的汉人、突厥人或粟特人，在内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丈夫的工作调动来到哈尔巴鲁卡斯城，去世之后被埋葬在此地。“卯年”是唐朝设置瀚海都护府的龙朔三年（663年）以后、估计667年（丁卯）或679年（己卯）。

哈尔巴鲁卡斯被认为瀚海都护府，即安北都护府的都护府城。此地为东回纥可汗国时代（八世纪中叶～九世纪中叶）的Oldu-Baliq首都（宫帐之城）。从哈尔巴鲁卡斯城Bai-Baliq（富贵城，757年建）迁到这个都城[17]。

在四面环山的平原上营建了以哈尔巴鲁卡斯城为中心的城市系统。阿史那夫人墓就在此地。

3. 哈喇郭勒碑和思结部、庐山都督

蒙古国色格愣省蔓达勒的哈喇郭勒遗址[18]，筑有东西约40米，南北约70米的长方形土墙，有石椁、建筑（庙）、碑石以及石造像，石椁还刻有装饰图案。碑高170厘米，宽60厘米，厚25厘米。碑额雕有人面及两匹狼。碑铭有“安公鲁山人”“□山都督”“陵”“朝命”“册命”“父乌□（碎）”等文字。“陵”字有可能表现陵园和墓。

碑文中的“乌碎”见于《资治通鉴》，即置卢山都督府的思结部首领的名字看。那么墓主人（即碑文赞颂的人物），可以推定为“第一代卢山都督，乌碎的儿子”或者“思结归国之前的某一位都督”（也许是归国的祖父或父亲）。卢山府置于思结部。哈喇郭勒碑（庙）位于色格愣省蔓达勒地区，在鄂尔浑河支流的Haraa河流域。即相邻金微州都督的边界。

瀚海府置于回纥部。应该在回纥都城哈尔巴鲁卡斯城到图拉河流域的地区。安北都护府也在这个地方。

乌兰克热姆墓的年代早于仆固乙突（678年）墓，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高于右骁卫大将军金微都督。该墓出土的三梁进贤冠是三品以上，这与英国公李绩相同。这说明他的地位等同于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中，仅次于李绩的右骁卫大将军薛国王（从一品）阿史那忠的等级。瀚海都护府（后改为安西都护府）推定在回纥的哈尔巴鲁卡斯城附近，即鄂尔浑河图拉河之间。相邻金微州都督府的区域。

乌兰克热姆墓是根据唐朝的墓葬制度，按皇帝祭祀的规格而建，其年代应该是在唐朝羁縻统治时期（660 ~ 670年）。

贞观十九年（647年）燕然都督府置于多览葛，同一年设燕然都护府。后来对燕然都护府进行改制，扩大了其统辖范围。663年将"燕然都护府"改为瀚海都护府。瀚海都护府的领域为鄂尔浑河・图拉河流域。669年改为安北都护府。据《新唐书・回纥下》，多览葛是"在薛延陀东、滨同罗水、胜兵万人"，仆骨（仆固）是"在多览葛之东"，同罗是"在薛延陀北、多览葛之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胜兵三万"。多览葛（燕然都督府）位于金微州都督之西，即在鄂尔浑河和Tarnii和流域。燕然都督府的所在地后来设置瀚海都护府以及安北都护府。其中心地区应该在哈尔巴鲁卡斯城。

贞观十九年（647年），将回纥部为瀚海都护府。回纥是"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众十万、胜兵半之"。磨延啜碑说的"婆陵水"是色格楞河。回纥故地就在色格楞河上游。与同罗一样，距长安七千里，人口十万，兵过半。这是铁勒诸部中的主力，因此这里置瀚海都护府。瀚海都护府的疆域从色格楞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包括薛延陀故地。根据燕然都督府、瀚海都护府的位置，能够阐明铁勒诸部的相对关系。

根据哈喇巴拉嘎斯发现阿史夫人壁记，我们了解到从长安携同阿史夫人来到突厥之地的唐朝高官"贤夫"的存在。阿史夫人被葬于667年（丁卯）或679年（己卯），这与仆固乙突墓和乌兰克热姆墓同一个时代。

乌兰克热姆墓的年代，正是设置瀚海都护府的时期。墓主人身份应该与这些都督府或都护府有关的人物。

注　释

［1］ a. А.Очир, Д. 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 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Бу*лган аймгийн Баяннуур сумын Улаан Хэрмийн Шороон бумбагарын малтла гын тайла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b. 东潮. モンゴル草原の突厥オラーン・ヘレム壁画墓［A］. 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人间社会文化研究第21卷［C］，2013.

［2］ a. А.Очир, С. В. Данилов, Д. Эрдэнэголд, Ц. Цэрэндрж.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Төв аймгийн Заамар сумын Шороон бумбагарын малтлагын тайла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b. 杨富学. 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J］.文物，2014（5）.

［ 3 ］ A.Ochir, A.Enkhtor著，滕铭予译. 和日木・登吉古城［A］. 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4 ］ 石见清裕. 羈縻支配期の唐と鉄勒仆固部—新出《仆固乙突墓誌》からみて—［J］. 东方学，

［ 5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 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2005～2006年）［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6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 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2006年）［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7 ］ 孙建华. 和林格尔县大梁村唐代李氏墓［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1，2）.

［ 8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 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 9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郊区隋唐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

［10］ 吴峰云. 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8（9）.

［1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忠市文物管理所. 吴忠西郊唐墓［A］.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五［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忠市文物管理所. 吴忠北郊北魏唐墓［A］.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五［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3］ 宁夏文物考古所，青铜峡市文管所. 青铜峡市邵岗唐墓发掘简报［A］. 宁夏考古文集［C］. 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14］ 铃木宏节. 唐の羈縻支配と九姓鉄勒の思結部［A］.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ⅩⅩⅩ）［C］. 大阪：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2015.

［15］ 石见清裕. 羈縻支配期の唐と鉄勒仆固部—新出《仆固乙突墓誌》からみて—［J］. 东方学，2014（127）.

［16］ 冯恩学. 蒙古国出土金微州都督仆固墓志考［J］. 文物，2014（5）.

［17］ 石见清裕，森安孝夫. 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记の再読と歴史学的考察［A］. 内陆アジア言语研究（ⅩⅢ）［C］. 大阪：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8.

［18］ 铃木宏节. 唐の羈縻支配と九姓鉄勒の思結部［A］.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ⅩⅩⅩ）［C］，Azuma Yshio→Azuma Ushio, 2015.

Two Turkic Tombs in Mongolia: Wulankeremu Tomb and Puguyitu Tomb

Azuma Yshio

Abstract: This paper locates the Wulankeremu Tomb (乌兰克热姆墓) and Puguyitu Tomb (仆固乙突墓), which are in Mongolia. This paper did icon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mural of Wulankeremu Tomb, investigating the structure and hierarchy of the tomb, unearthed crowns, pottery figurines and Lubu (卤簿)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presumed the location of HanhaiDuhufu (瀚海都护府), AnbeiDuhufu (安北都护府) and JinweizhouDuhufu (金微州都督府) by the "Record on Wall about Lady Anxi of Tang Dynasty"(大唐安西夫人壁记) and two turkic tombs which were found around City Харбалгас in County Aerhangai (阿尔罕盖县), Mongolia. The period of Wulankeremu Tomb is the time that HanhaiDuhufu and AnbeiDuhufu are established. The owners of tombs should be people in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Dudufu and Duhufu. Wulankeremu Tomb and Puguyitu Tomb are north-south rectangular cemetery and the change from the east-west axis to the north-south axis should be affected by the burial system of Tang Dynasty under the Jimi system (羁縻体制). Hui Tomb, which belongs to Empere Li Xian in Tang Dynasty, has a north-south rectangular cemetery. City Halabalagasi (哈喇巴拉嘎斯城) is east-west direction and its palace is also facing the east. The basic concepts of Huihe(回纥) have the concept of east and west, and the sun belief. The direction of their cemeteries and tombs are usually oriented west to east.

Key words: Turkic Tomb; Duhufu of Tang Dynasty; Wulankeremu Tomb; Puguyitu Tomb

辽上京宫城考古新发现和研究

汪　盈　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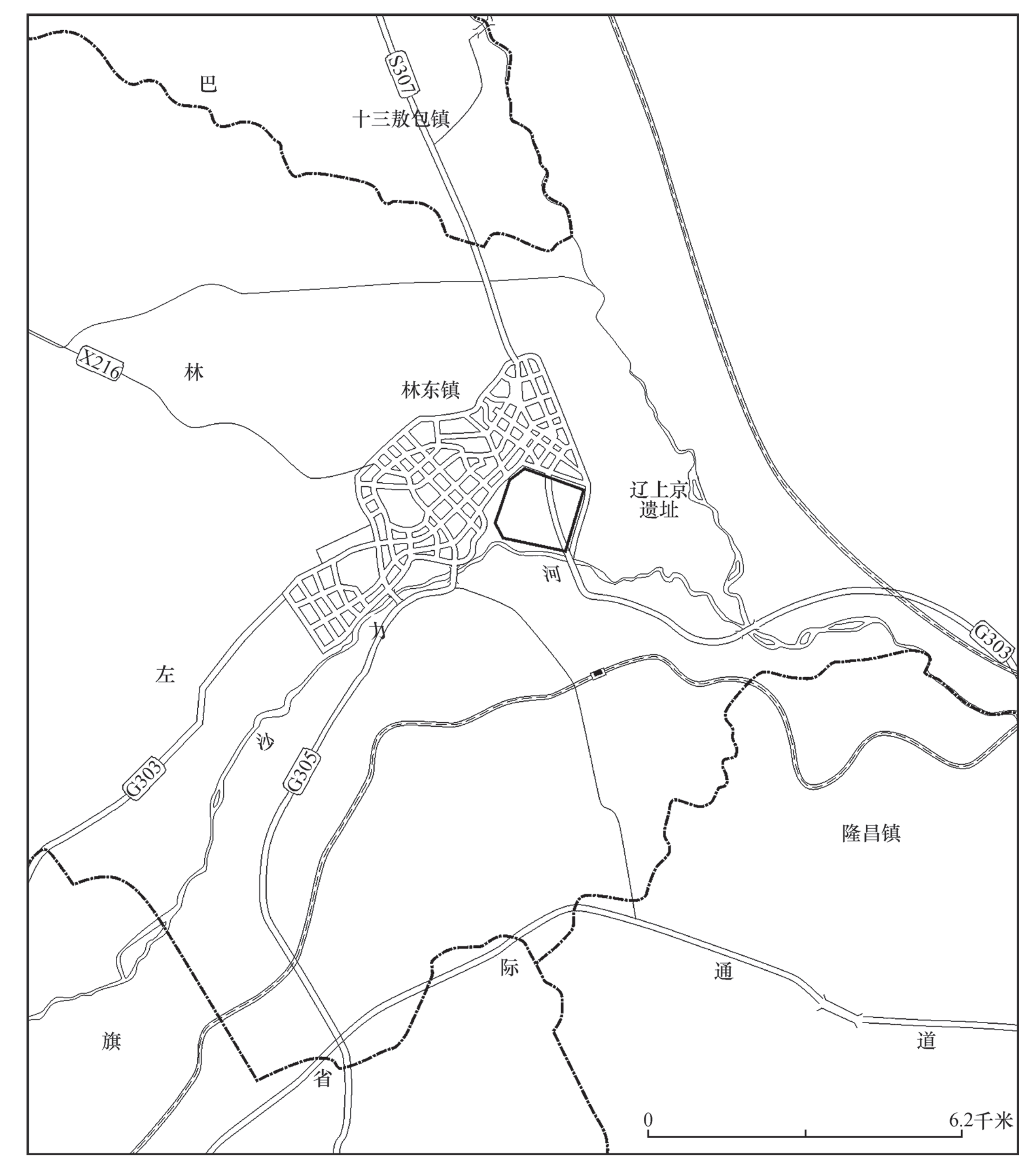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图一）。辽上京始建于神册三年（918年），是辽代的首都，也是辽代最为重要的都城。辽上京城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皇城（北）和汉城（南）两部分组成。

一、问题的提出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中记载，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1]这条文献明确了辽上京皇城内建有宫城，称为“大内”，且宫城设有南、东、西三座城门。

辽上京皇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六边形，保存较好，皇城墙范围基本完整。除南门被沙里河冲毁，地表不存外，皇城东、西、北门保存较好。在皇城中部地表，依稀可见一些大型宫殿遗址。但是宫城的准确范围一直都不清楚。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者的考古勘探工作，曾初步确认辽上京宫城的部分北城墙（约450米）和西墙的可能走向，而南墙和东墙均无线索[2]（图二）。可以说，辽上京宫城形制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这无疑是探讨辽上京皇城形制布局的瓶颈。

为了探讨辽上京城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1年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测绘、勘探和发掘工作。前几年的辽上京皇城考古工作，我们曾做过简要的报道[3]。根据考古钻探工作的进展情况，2014年，辽上京考古队适时将考古工作的重点，确定为搞清辽上京宫城形制规模和沿革方面。本文就2014年辽上京宫城考古工作略作概述。



图一　辽上京遗址位置图

二、考古钻探和试掘情况

辽上京考古队拟定2014年辽上京皇城考古工作的重点，就是要重新对辽上京宫城范围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在普探提供的线索基础上，在重要节点上进行考古试掘和发掘，采取勘探与发掘紧密相结合的方式，力求达到寻找并确认辽上京宫城的范围及其沿革的学术目标。



图二　辽上京皇城复原图（引自《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

围绕这个学术目标，我们的考古工作分几个步骤。第一，我们在对辽上京皇城进行全面普探的同时，侧重对辽上京皇城内的中心区域进行重点勘探。寻找宫城城墙的迹象。我们根据1962年考古勘探提供的线索，对辽上京宫城北墙进行复探，并选择3个关键地点进行试掘。通过考古试掘，我们确认了宫城北墙的存在，并了解到宫城北墙形制结构和营建做法，为寻找其他几面宫城墙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二，我们根据对宫城北墙夯土情况的认识，推翻了1962年勘探对宫城西墙的认识。根据近两年钻探的新资料，重新判断宫城西墙的位置和走向。第三，根据判断宫城北墙和西墙提供的经验，经过仔细地面调查、考古勘探和分析，寻找到宫城南墙和东墙的线索。第四，通过对宫城西墙、南墙进行的试掘，确认了宫城西墙和南墙的形制结构和保存状况。第五，通过对宫城西

墙与晚期“西大院”北墙交点处豁口的发掘，确认了辽上京宫城西门遗址。并解决了1962年考古勘探提出“西大院”院落遗址的年代问题，有助于对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认识。

（一）主要遗迹

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的主要遗迹包括辽上京宫城墙址、宫城西门遗址、晚期“西大院”北墙遗迹等，并对宫城的范围进行了初步确认。

1. 宫城城墙遗址

通过对辽上京宫城北墙、南墙和西墙的试掘，可知残存宫城墙由夯土夯筑而成，夯土可分为地上墙身和地下基槽两部分[4]。目前发现的宫城北墙和西墙形制基本相同。夯土墙身残高0.3～1.2米，底面宽度均2.6～2.9米，主体为黄色夯土；基槽深度0.25～0.45米（图三）。南墙形制有所不同。夯土墙身残高约1.2～2米，底面宽度6.6～6.8米，主体为灰褐色夯土；基槽深度约0.6～0.92米。墙基两侧筑有夯土护坡等附属设施，墙外设有壕沟。通过发掘和解剖，揭露出宫墙夯土侧壁上等距分布的立柱痕迹，在夯土底部等距分布的小柱坑等与宫墙营建工程相关的重要遗迹。结合出土遗物推定，宫城墙建于辽代，局部夯土经过增补修筑；毁弃于金代，并有金代房址建于墙体的废弃堆积之上。



图三　宫城北墙夯土剖面（北—南）

2. 宫城西门遗址

宫城西门位于宫城西墙中部，与皇城西门相对。通过钻探发现两门之间有道路相通。宫城西门遗址由两侧的墩台和中间的门道两部分组成（图四）。夯土墩台保存较差，中间设单门道，宽度约6.4米。门道内仅存将军石、地栿石、路面、柱洞等局部建筑基础遗迹。结合出土遗物推定，该门址在辽代至少经过两次较大的营建。城门及门道毁弃后，此处建有晚期房址，在门道以北有晚期东西向道路遗迹。现存最晚遗迹是叠压晚期房址的“西大院”北墙和打破房址和门址的墙外壕沟。



图四　宫城西门遗址（上为北）

3. 晚期“西大院”北墙遗迹

在辽代宫城西部，尚存一座大型院落遗迹，沿用以往资料称为“西大院”遗址。“西大院”四面墙体地表遗迹明显，呈近似梯形，东西宽240～270米，南北长360～390米（图五）。其北墙东部，恰从辽代宫城西门的位置穿过。通过本次发掘和解剖可知，“西大院”北墙完全叠压在辽代宫城墙废弃后的堆积上，分层堆土而建。残高0.8～1米，底面宽度为5.3～5.5米。墙体堆土层厚0.3～0.5米，土质疏松且包含大量遗物。墙外有壕沟。根据遗迹遗物判断，西大院墙体始建年代不早于金代晚期。

4. 辽代宫城的范围

通过今年的重点勘探工作，我们找到了辽上京宫城四面城墙的新线索。通过考古发掘，更正了以往资料对辽上京宫城范围的模糊认识和推测，首次确认了北墙、西墙、南墙、东墙的走向、长度、位置以及形制特点。进而第一次探明了宫城四面墙体的完整范围（图五）。辽上京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740米，南北长约770米，总面积约占皇城面积的五分之一。结合遗迹和遗物，我们可以推断，辽代宫城城墙在金代已经基本毁弃。也就是说，辽上京城市格局在金代发生了较大改变。



图五　辽上京皇城航片和宫城范围示意图（上为北）

（二）主要遗物

本次发掘出土的遗物较少。主要包括琉璃瓦、瓦当、筒瓦、板瓦残块、陶质脊兽等建筑构件（图六），陶罐、陶壶、陶碗等陶瓷器标本，铜钱、铜印、铜镜等铜器（图



图六　宫城北墙位置G3出土瓦片



图七　宫城西门遗址出土铜器

七），铁杈等铁器，龙纹骨制品等骨器，石刻残块等。其中一件刻字、穿孔的白石条可能为玉册残件。一枚铜质花押印，内镌二字，疑为“大内”。此两件遗物均出自宫城西门废弃堆积及其相关遗迹中。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为遗迹断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建立辽上京城出土遗物的年代序列积累了重要的基础材料。

三、初步认识

2014年度对辽上京宫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推进了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考古研究进展。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

（1）首次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面积，更正了以往对宫城范围的推测，为研究辽上京城址布局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2）通过对宫城北墙、西墙、南墙的局部发掘和解剖，初步掌握了辽上京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为今后的勘探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3）通过对宫城西门遗址的揭露，首次了解到辽上京宫城西门的位置、形制结构及其沿革。

（4）通过对“西大院”墙体的解剖，确认了墙体的结构及其年代。根据考古勘探和发掘的现象得知，辽代宫城墙在金代逐渐被破坏，直至毁弃。从已揭露的几处探沟可见，有较多金代的小型房址、灰坑等打破或叠压于辽代宫城墙及其废弃堆积之上；在部分叠压辽代宫城西墙的位置，金代晚期还兴建了“西大院”这样较大规模的院落。这表明辽上京城到金代虽然仍在沿用，但是在城市格局上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辽上京宫城形制规模和遗迹年代关系的确认是辽上京考古的重要成果，丰富了辽代都城考古的基础材料，也进一步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　释

［1］（元）脱脱等撰.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3］董新林. 辽上京皇城遗址近年考古发掘新收获［A］. 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2014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5（12）.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of Liao Shangjing's Imperial Palace

Wang Ying　Dong Xinlin

Abstract: The shape and size of Liao Shangjing's Imperial Palace is unclear which restricted the discussion of the layout of Liao Shangjing's Imperial City. The Liao Shangjing archaeological team resolved this problem, through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trial excavation in 2004, and studied the layout of Liao Shangjing's Imperial Cit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about Liao Shang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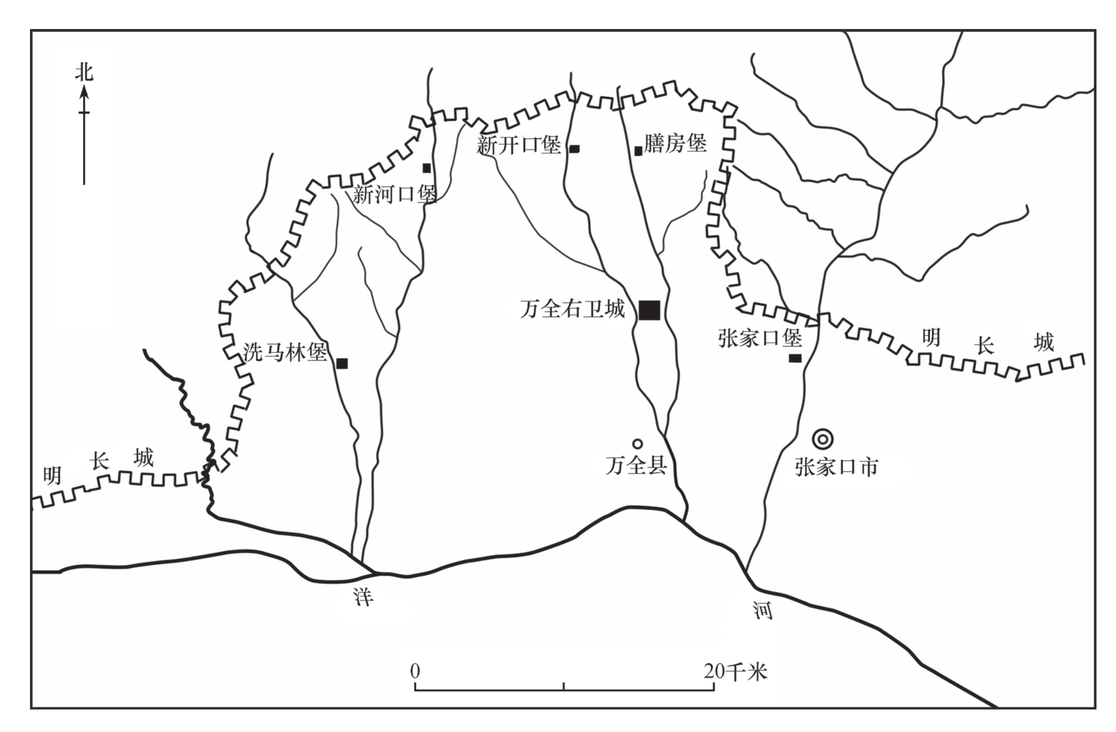
Key words: Liao Shangjing; Imperial Palace; The shape and scale

张家口明代卫所城调查与研究*

郝园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万全右卫城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县，该城保存较为完好，大部分城墙包砖尚在，城内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明清建筑。该县境内的洗马林堡、新河口堡、新开口堡、膳房堡与位于张家口市区的张家口堡也仍保留部分城墙遗迹。它们在明代划归于同一行政体系，组成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军事防御系统（图一）。通过对该地区明代卫所城的调查与研究，可以窥探出明代卫所城的一些发展规律。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



图一　本文调查古城位置示意图

*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明京西防御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以张家口段明长城建筑群为核心”成果（项目批准号15XNH068）。参与调查的人员有万全县文广新局谢绍坤、殷双进；中国人民大学魏坚、巴依尔、李雪欣、黄燕妮、郝园林等；社科院考古所刘建国、中国人民大学森谷一树提供corona卫星照片。在此一并致谢！

族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12年10月、2013年11月下旬组队，两赴张家口对上述古城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古调查。本文拟从这两次调查所获资料入手，结合以往考古发掘与调查取得的成果，在充分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明代卫所城的形制和布局等问题做一初步梳理，以飨读者。

目前对张家口地区古城的调查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万全右卫城、洗马林堡和张家口堡。刘建华曾对万全右卫城的城墙、瓮城进行测量[1]。倪晶、谭立峰等在河北省古建所调查和本人调查所得数据的基础上，对万全右卫城的建制沿革、规模形制、内部布局做了简单介绍，并对洗马林堡有所涉及[2]。李孝聪在探讨明代卫所城选址所考虑的因素时，特别以万全右卫城为例，认为该城址选址充分照顾了冲要、屯戍、水源三要素，在明代卫所城中具有代表性意义[3]。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曾对张家口堡进行调查，但无测量数据[4]。胡明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张家口堡的形制[5]。杨申茂等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和实地调研，对张家口堡形制规格进行了考证，并得出城堡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而对长城沿线军堡演变做了类型学研究[6]。

可以看出，以万全右卫城为核心的军事防御体系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且其调查研究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有不足：主要体现在调查资料较少，缺乏翔实的数据，这就阻碍了研究的深入推进；还表现为没有对上述古城进行系统研究，多是零散的介绍，使得万全右卫城及其周围边堡构成的卫所体系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上述两点是本文的着力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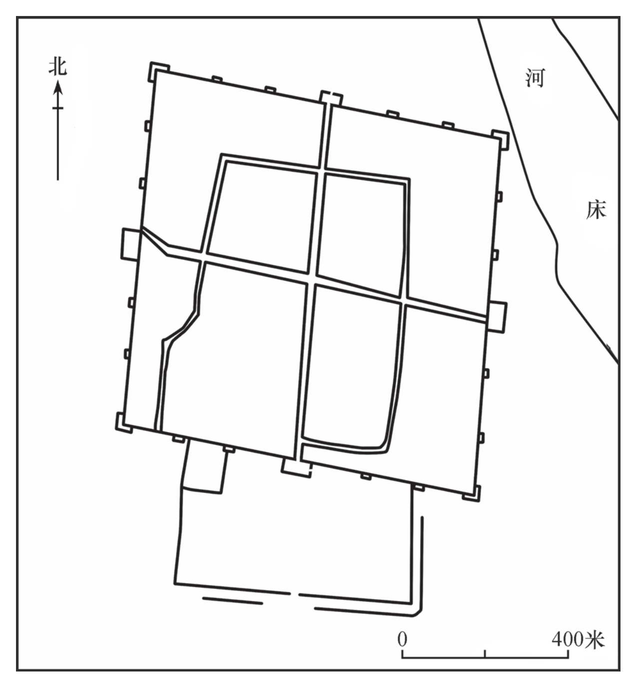
一、张家口明代卫所城的调查

张家口境内的卫所防御体系主要以万全右卫城为核心，位于其西、北、东三个方向的洗马林堡、新河口堡、新开口堡、膳房堡、张家口堡为其外延，为体系的次核心，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 万全右卫城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县万全镇，其西南角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0°51′36.23″，东经114°44′04.99″。古城平面近似正方形，方向为北偏东5°。古城城墙保存基本完好，东墙长861.2米，南墙长863.1米，西墙长862.6米，北墙长865.3米，周长共计3452.2米，古城面积为0.74平方千米。北部略向东倾斜，东北角与西南角略呈钝角。古城有南北2个城门、城门外有瓮城，南门外另有南关。每面城墙上4个共计16个马面，四个角分别有角台，东西城墙各有翼城（图二）。

城墙保存基本完整，高度约为12米，城墙底宽14.4米，顶宽5.4米。城墙墙体由里侧的夯土和外侧的包砖构成。夯土层上部共7层，每层厚约20厘米。往下为砾石、碎砖层，厚约15～18厘米。再往下为夯土、砾石相间层。最下层纯为夯土层。墙心夯土质地



图二　万全右卫城平面图

纯净，密实而坚固，均为经过筛选的黄土。包砖共分两层，均采用一顺一丁的砌筑方式。上层砖的规格为长39厘米，宽18.5厘米，厚8.5厘米。下层为肩石，由毛石砌筑而成，毛石由上而下逐层加厚，共计五层，高约1.6米，肩石上部内收约21厘米。通过东墙及南墙上豁口可以看出，城墙经过多次修补，城墙最初为砂土夯筑，使用一段时间后用砂土（有些夹杂石块）进行修补，又经一段时间对墙体进行包砖，包砖前有些地方用夯土对墙体进行了修整，然后用不大规整的砖找齐平面，最后用2至3层规整的墙砖包砌外表。

古城有南北两个城门，南北城门规格稍有差别。南城门为迎恩门，城门正中匾额上尚可看出“迎恩门”字样。城门南侧宽4.3米，北侧宽4.32米，南侧门洞纵深5.3米，中部门扉深2.82米，北侧门洞纵深10.95米。城门中部门扉和南侧门洞处分别有2个门栓，门栓应起临时禁行的作用。北城门为德胜门，城门正中匾额上字迹模糊，无法辨识。城门南侧宽4.4米，北侧宽4.17米。南侧门洞纵深11.5米，中部门扉深3.03米，北侧门洞纵深4.7米。与南门类似在中部门扉和北部门洞有两道门栓，北城门北侧东部残存一顶门石桩。

两座城门外均有瓮城，保存情况均较差。瓮城均呈长方形，边长约40米，瓮城城门朝向东，为砖拱券式样。南门瓮城城门朝东开，纵深14.25米，内侧门宽4.4米，外侧门宽3.6米。城墙上缘厚8.5米，外侧包砖砖体厚1.5米，夯层厚14～18厘米。北门瓮城城墙顶部厚约1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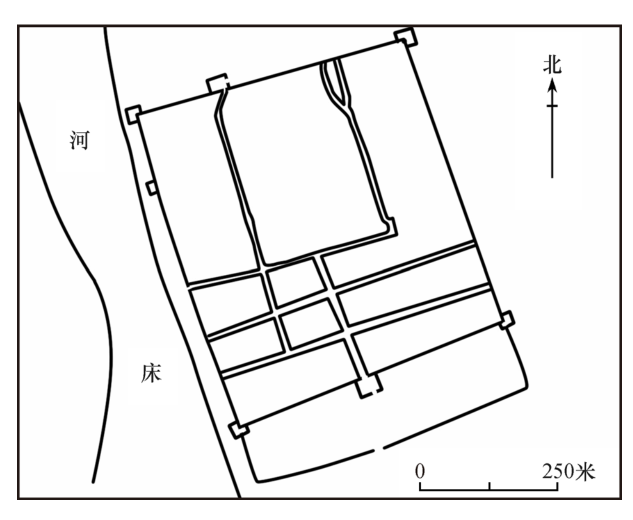
古城东西墙中部外侧均有翼城。东西翼城呈长方形，没有发现城门。东墙翼城整体保存完好，外围长60米，宽40米，城墙顶部厚约8.3米。城墙上有一圈单砖的曲尺形结构，砖为长边侧立，略突出于地表，怀疑为房屋基址。东墙翼城现在仍在使用，后人在墙体上开了一个小门，并建有登城踏道。西墙翼城内部夯层损毁较为严重，外部包砖保存较好，规格与东墙翼城同。

古城四个角均有角台，保存基本完整，仅东南角台靠近南墙侧有出阙情况。其为二出阙，墙体为一出阙，出阙后内收0.55米。墙体出阙处距墙角4.72米，角台一出阙距南墙4.5米，二出阙距南墙8.35米。角台南面宽19.5米，东面宽19.5米。西南角台南面宽19.65米。每个城墙外均有马面，保存基本完整，各马面间距离基本为126米，底基突出墙体7.5米，底基面阔约16.5～17.2米。

古城南门外有南关，保存情况较差，现仅残留部分印记。南关近似长方形。东墙、南墙、西墙为内外双重城垣，外侧城墙长分别为311米，626.9米，379.8米，东墙内外城垣间距约为20米，南墙约为30米。南关内西北角有一长方形建筑，南北长约109米，东西宽约90米。

2. 洗马林堡

位于万全县洗马林镇，其西南角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0°48′41.41″，东经114°27′22.20″。古城平面近似正方形，方向约为北偏西18.2°。东墙基本不存，南墙、西墙和北墙尚有数段高大的城墙，西墙北段和北墙保存较好。东墙残长537.9米，南墙长536.3米，西墙长598.4米，北墙长544.1米，周长共计2216.7米（图三）。城墙的砌筑方式较为特殊，除采用整体包砌的方式外，部分仅包砌转角处或是采用分段立柱式方法包砌。这样既达到了坚固城墙的目的，也节约了修筑的成本。每面城墙均有角台。角台规制均相似，以西北角台为例，该角台呈正方形，部分与城墙墙体重合。角台突出城墙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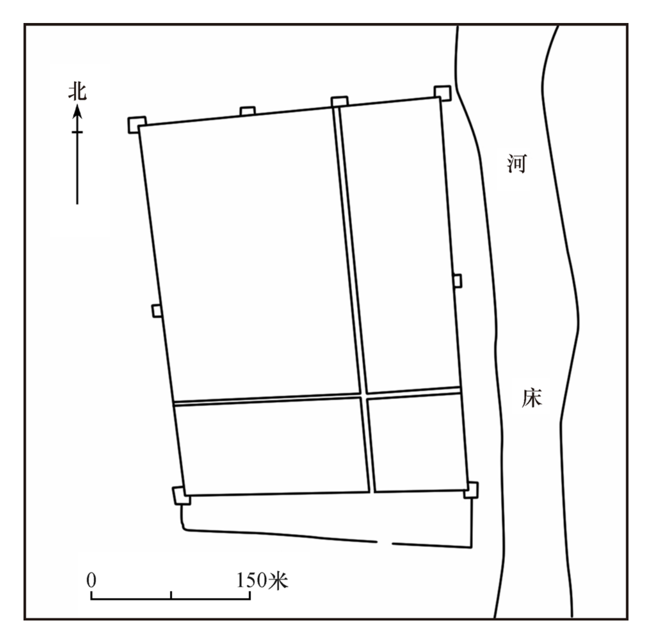
图三　洗马林堡平面图

4米，两条边长均约为14.2米。该角台往南118.1米处有一马面，该马面外凸约8.3米，长约15.3米。该城共有北、西、南三个城门，南北城门外均有瓮城，瓮城残损较为严重，其规模大致相同：长约43.2米，宽约17.4米。北瓮城城门朝东开，南瓮城城门朝南开，且与南门略有错位。南城门外有南关，东西长与古城城墙同，南北宽100米，城墙高11米，全系土石堆垒而成。南关只设南门和东门，门为砖石结构，其与内城门建筑相似，名为“定远门”。南关现破坏较为严重，只留部分痕迹。

3. 新河口堡

位于万全县新河口乡。其西南角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0°56′45.94″，东经114°32′16.04″。古城平面近似长方形，方向为北偏西7°。古城城墙保存相对较好，东墙长约369.3米，南墙长约290.4米，西墙长约360.2米，北墙长约296.3米，周长计1316.2米（图四）。古城东墙仅断续残留，北段保存较好。东墙中间处有夯土马面；东南角台残存，残高约5米，墙体由黄土夯筑；东北角台残高8～9米，南侧外凸5.3米，东侧长14米，北侧长12.2米。从土壤质地和夯筑方式，可知东北角台分两次夯筑，并且角台与墙体亦非同时修建，其夯层厚约20厘米。墙基由4层条石构成，最下层厚约0.5米，上一层约0.4米，再上一层约0.3米，最上一层约0.2米，总计厚1.4米。

古城北墙保存也较好，墙体明显有多次修补的痕迹。北墙本无门，现于南门正街相对处开一口。墙体高6～8米。北墙有一马面，正视若梯形，马面向外凸约6米，东西宽约8米。马面上发现有残砖块，底部也有发现，残砖长31厘米，宽18厘米，厚约7厘米。西北角角台新夯过，土壤质地、夯筑方式与墙体不一样。



图四　新河口堡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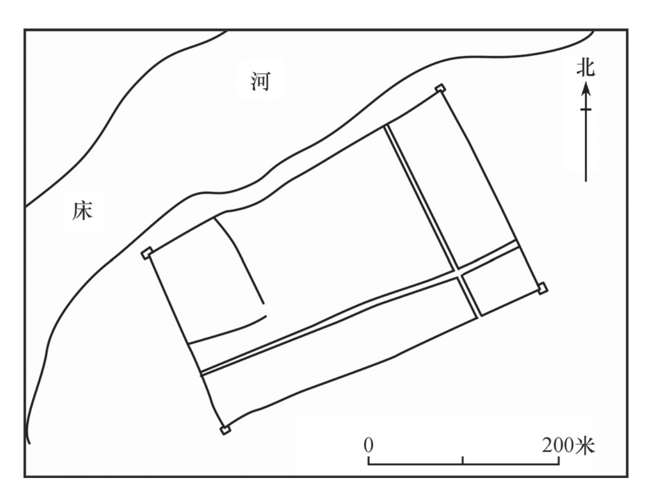
古城西墙尤其是该墙南段保存较好。西墙中间处有夯土马面，规格同北墙马面一致。西墙用黑灰土夯筑，夯层较厚，一般在30厘米左右，内含大量卵石。古城南墙残损较严重，仅于东南角以西约60米残留有一段夯土墙基，以西约70米为古城南门。

根据corona卫片，可知古城原有南关。南关近似梯形，西墙北接西南角台，长约23米。东墙北接东南角台，长约62米。南墙长约281米。南墙偏东处有一门，与古城南门相对。

古城内部由十字街道分成四个部分。

4. 新开口堡

位于张家口市万全县膳房堡乡新开口村，古城西南角地理坐标为北纬40°57′38.66″，东经114°39′44.34″。古城现位于新开口村北半部分。古城破坏严重，城墙仅断续残存。根据残留城墙初步判断古城为长方形，方向为北偏西25.4°，东墙长约276.7米，南墙长约377.9米，西墙长约187.5米，北墙长约372米，周长计1214.1米（图五）。西墙南侧墙体保存稍好，残存高度约4～6米，墙体用黄土和黑淤土夯筑，夯层厚17～20厘米，夯土中含有较少砂土。底部为卵石根基，高60～70厘米，其上有稍加修整的条石两层，上层厚22厘米，下层厚24厘米，皆以白灰作浆，条石经过粗略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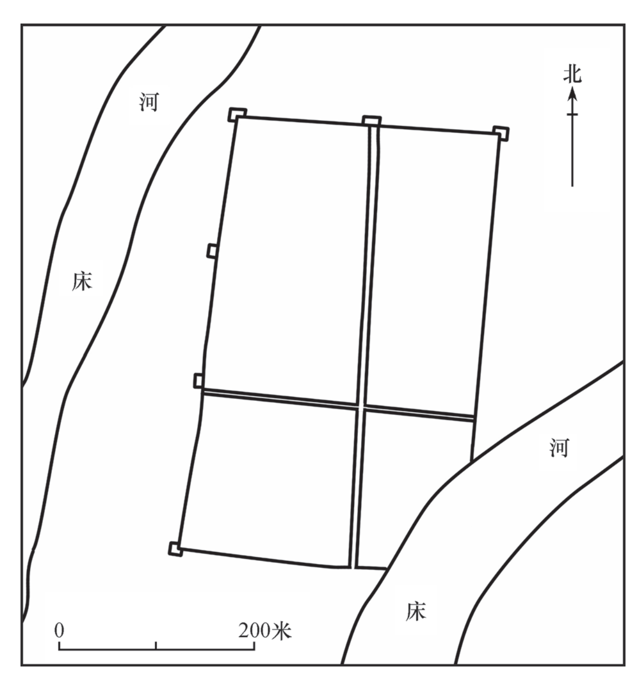


图五　新开口堡平面图

东墙东南角台尚存，但损毁严重，部分已坍塌。角台残高约9～10米，向南外凸约5.9米，南面宽约14.3米。从断面观察，可见夯层内含有大量砂石。角台底部为卵石与白灰搅拌垫砌形成的基础。根据corona卫片可知古城内部早先由十字街分成四部分，东西街位置偏南，南北街偏东。东北角原有近似长方形建筑。

5. 膳房堡

位于万全县膳房堡村北。城堡西南角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0°57'25.26"、东经114°43'29.97"。古城方向为北偏东8°，东墙、南墙已被河水冲毁，东墙残长333.9米，南墙残长174.3米，西墙长437.5米，北墙长267.3米，周长总计1213米（图六）。墙体用土夯筑，残高4～6米，夯层厚20厘米，夯土中含有大量卵石和砂土。西墙外侧看到有一马面，墙外侧包砖。马面位于西墙中间偏北。马面与西墙城门将西墙三等分，城门与马面在西墙上为南北对称。北墙中部也有角台，现已无存。古城南门外有南关，近似梯形。



图六　膳房堡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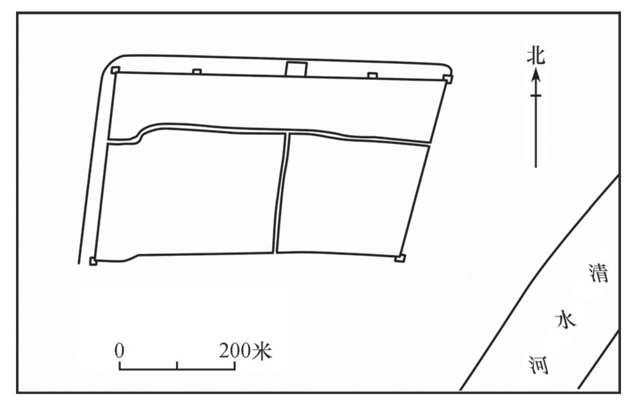
根据corona卫片，古城在20世纪60年代时仍有三个角台残存，现已无存。古城内部由十字形街道分成四部分，南北街北接角台，南抵南门。东西街位置稍偏南。

6. 张家口堡

位于张家口市市中心，因为位于市区，损坏较为严重。依据残留可判断城墙西南角的地理坐标分别为北纬40°49′01.66″，东经114°52′06.60″。张家口堡现位于张家口市市中心，古城的方向约为北偏东8.1°。古城城墙残损较为严重，南城墙在西墙根街南边，西城墙在马道底街西端，北城墙在玉皇阁一线。根据实地调查，结合corona卫片判断古城的东墙长约325米，南墙约540米，西墙约314米，北墙约568米，周长约1747米（图

七）。西墙墙体中部被民居打破，墙高约8米，底宽14～15米。墙体上部包砖无存，中部残留少部分包砖，底部为现代水泥包筑。城墙夯层厚20～26厘米，黄色砂质土夯筑。北墙墙体状况与西墙类似，包砖仍有所保留。除北墙一小段仍有包砖外，其他墙段包砖皆已剥落，夯土外露。

根据corona卫片，古城早先有东、南、西三个门，南门位于南墙偏东，东门、西门位于各墙稍偏北。四角均有角台，北墙有三个马面。西墙、北墙外有一挡墙。



图七　张家口堡平面图

二、张家口明代卫所城特征研究

通过以上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张家口境内明代卫所城在规模、形制、建筑方式和布局等方面有一定的规律。

规模上，上述各古城的大小规模不一，其中万全右卫城最大，边长约为860米，其他则较小，边长在200～500米。而万全右卫的上属机构万全都司驻地宣府镇的边长约为3000米。就整个宣府镇来说，宣府镇城周长是路城、卫城的3.5～4倍，是所城、一般堡城的8～10倍[7]，体现了明代都司卫所体系下城址的等级性特征。

形制上，古城形态各异，其中万全右卫城近似正方形，其他则为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不规则四边形等。据李孝聪先生研究，明代卫城一般为方形，下属古城则形状各异，这多与环境和历史因素有关[8]。古城内部多由十字形街道分成四个部分，其中尤其以万全右卫城为典型，这种布局形态决定了明代卫所城在功能分区上有一定的规律性。此外，每个古城均有角台、马面，这是卫所城军事性质的集中体现。而且，部分重要古城有南关，南关应为古城内部空间的向外延伸，多用来存储粮草。建筑方式上，均为城墙内部用土夯筑，外面砌砖，底部垫条石。夯层厚15～25厘米。有的全部包转，有的部分包砖，根据古城的重要性不同有所区别。

布局上，每个城堡都选择了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再因地制宜而建。洗马林堡扼守镇河口线之南出口，同时可兼防新河口线之南出口，堡子紧邻洗马林河，位于洗马林

河的冲积平原上。新河口堡扼守新河口线北大门，位于谷地内的肥沃台地上，东侧有河床。新开口扼守新开口线北大门，亦位于谷地内的肥沃台地上，西侧、北侧有河床；膳房堡扼守黑风口线的北大门，处于谷地内的肥沃台地上，古城东西两侧均有河床。张家口扼守大境门之天险，其东侧有清水河流经，堡子就位于清水河南出坝上高原形成的冲积平原上。万全右卫城为镇河口线、新河口线、新开口线、黑风口线几路交通要道的交汇之处，位于洋河冲积平原北侧上。

布局上的另一个特征是上述古城是以万全右卫城为核心，分层布局。最外一层为长城防御，长城每隔一段距离设边墩、火路墩等，驻少量兵士，主要起瞭望警报作用，也可起简单的防御作用；第二层为洗马林堡、新河口堡、新开口堡、膳房堡、张家口堡等，它们均沿长城分布，距长城的平均距离为4～6千米。堡内守备官统领兵马，组织防御。由于长城实际由上述各堡分领，因此这一层实际为最外层之有效防御力量。第三层为万全右卫城，距第二层古城的距离为20～23千米。这意味着万全右卫城的有效反应半径覆盖到了第二层。万全右卫城作为最后一层防御力量，内驻参将，协调各堡的防御，并对各堡随时进行增援。

这种布局特征的好处是当第一层防御体系被攻破时，第二、第三层则层层递补以应对。由于战场情况复杂多变，跨级援助便成为常态。如隆庆三年（1569年）“虏三百骑犯宣府新河口堡，守备李国珍等不能御，总兵马芳、副总兵刘国及原任总兵胡镇督兵合剿，虏遁去，追至大沙沟，败之”[9]，这便为层级防御特征的典型事例。即第一、第二层防御线条被攻破之后，第三层防御点便汇集到万全右卫城一点，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虏寇膳房堡，总兵郤永御之不能入，遂于万全右卫拆墙拥入”[10]，当蒙古部落攻不下膳房堡，便绕过第二层防御体系进入，后只能直面万全右卫城，其他城堡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不过战场情况复杂多变，也有诸多从第二层防线越过万全右卫城直接进攻其他城堡的记录。明将领在组织防御时，会将主要兵马在万全右卫城配置一部分，以策应各边堡的突发情况。如成化十九年（1483年），“宣府总兵官周玉、巡抚都御史秦纮等驰奏：……臣等据报随调副将江山等将兵应援，仍行缘边有警之处分守，守备等官各领屯兵战守。臣玉臣纮则分驻于万全左右以节制之”[11]。这里我们看到：当在遇到紧急战事时，将领首先派兵增援至要紧之处，再命守备官即第二层防御线做好战斗准备，最后大将则亲领军马驻于万全右卫城，以备军情之万变。

这种布局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强调互相沟通和应援。下面的一面敕令可显著反映明廷对该防御体系组织防御的设想：“特命尔管神机铳炮，分守万全右卫等处地方，与参将等官一同提督操备，固守城池，有警，相机战守，凡由合行事务，须与之从长计议而行，毋得偏执违误，仍听宣府镇守总兵等官节制……如违，罪有所归，尔其钦承朕命，故勅”[12]，另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宣府报虏自万全右卫入寇。上命亟檄宣大蓟辽各预图战守，并令大同伏兵于天城、阳和间，伺虏至，击之”[13]，这里是中央要求各个镇之间的互相应援，即当万全右卫城战事紧急时，便亟令相邻处做好战斗

准备，以防敌军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分层布局还有助于各古城之间互相策应，如成化三年（1467年）“命署都指挥佥事许宁充游击将军，仍命宁守备柴沟堡地方及往来万全左右、怀安、新河口、洗马林、西阳河等处地方巡哨，遇有贼寇侵犯以便调度西路官军相机剿杀，凡军情重务悉与镇守巡抚等官会议”[14]，这个例子非常典型，要求柴沟堡、万全右卫城、万全左卫城、怀安城、新河口堡、洗马林堡、西阳河堡等均加强哨探，且任何一地若发生危机，则调集整个西路官军去应援，且官员做决策时也要做到互相会议以闻。

三、结　　语

万全右卫城及其建筑群在抵御蒙古部落南下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体系固有的弱点致使其防御效果并没有使其达到明人的设想，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地方大员总督宣大尚书直接指出筑边墙的效果为“及其虏之溃墙直下，曾无结草之固”，道出了长城防御的脆弱性，而筑堡的弱点则在于“使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棋布星罗遍满川原，然虏一深入，望风瓦解，村落歼则掠及小堡，小堡空则祸延中堡，中堡尽而大堡存者仅十之一二”[15]，一语道破防御体系的弱点。另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虏从宣府张家口堡入犯，寻趋大同天城、新平堡口出边”[16]，敌人从宣府镇张家口堡抵大同新平堡，走了近70千米，横穿万全右卫城防御体系，竟然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可见防御体系的脆弱性。

进入明代后期，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防御体系有其固有的弱点，而“款塞议和”乃为正途。如隆庆五年（1571年）总督尚书等人指出“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衣缯之具，咸仰给中国，今既誓绝侵犯，故虏使即求互市，庶免盗窃……”[17]，一语道破明廷两百年来边患不绝的根源：蒙古部落生产物资的缺乏。而正是修筑长城塞堡，使互通有无的可能性断绝，人为地隔绝了两个民族间正常合理的交往。长城和战事，正是一个自洽的过程，越是增修城墙，则蒙古部落物资越紧缺，则迫使其冒险进攻，战事愈频繁，则愈加紧迫修筑。期间，蒙古部落曾不断地要求与明廷通贡，可明廷在对蒙政策上一贯持保守敌对的态度。正是这种错误的民族政策，才是张家口境内长城防御体系失效的根本原因。

注　　释

［1］ 刘建华. 张家口地区明代长城调查综述与分析［J］. 文物春秋，1990（1）.

［2］ a. 倪晶. 明宣府镇长城军事堡寨聚落研究［D］. 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2005.

b. 谭立峰. 明代河北军事堡寨体系探微［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3］ 李孝聪. 明代卫所城选址与形制的历史考察［C］. 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A］.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4 ］ 钟铁军，覃影. 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张家口地区考察记［DB/OL］. http://w3.pku.edu.cn/academic/zggds/005/005/001.htm，2004.
［ 5 ］ 胡明. 张家口堡城池考［J］. 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2）.
［ 6 ］ 杨申茂. 明代长城军堡形制与演变研究—以张家口堡为例［J］. 建筑学报，2012（S1）.
［ 7 ］ 王琳峰，张玉坤. 明宣府镇城的建置及其演变［J］. 史学月刊，2010（11）.
［ 8 ］ 同［3］.
［ 9 ］ 明穆宗实录・卷三九・隆庆三年十一月丁亥［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0］ 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一・嘉靖二十三年十月甲戌［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1］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二・成化十九年秋七月戊申［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2］ （正德）宣府镇志・卷八・制勅・勅内官监太监叶森令［M］. 北京：线装书局，2003.
［13］ 明世宗实录・卷五六〇・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乙未［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4］ 明宪宗实录・卷四一・成化三年夏四月甲子［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5］ 明世宗实录・卷五一〇・嘉靖四十一年六月甲寅［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6］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卯［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7］ 明穆宗实录・卷五四・隆庆五年二月庚子［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The survey and study on the Ming Wei-suo in Kalgan

Hao Yuanlin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summary of results from site-focused surveys, which were carried out in 2012 autumn and 2013 winter to investigate visible surface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the Wei-suo dated back to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AD). Wei-suo documented historically, including Chiu-wan-ch’ üan, Hsi-ma-lin, Hsin-tung-k’ou, Hsin-k’ai-kou, Shan-fang-p’ u, and Kalgan, are reported in detail here, with the descriptions of their sizes,

structures, and possible functions. It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ei-suo we have visited, that those Wei-suo have as a whole formed a defensive system that is somewhat centered on Chiu-wan-ch’ üan (one of the largest Wei-so in the region) and shows differentiating capabilities as the distance increases between Chiu-wan-ch’ üan and those with smaller sizes and less complex and developed facilities.While the clustering of Wei-suo seems to form a defensive circle, the whole system clearly was not fully functioning, according to historic records. Our studies provide the archaeological basis for studying political control and centralization of the Ming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Northern Lands.

Key words: Chiu-wan-ch’ üan; Kalgan; Wei-suo; Kalgan

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起源

——以俄罗斯图瓦阿尔赞-1号大墓为中心

姜仁旭

（庆熙大学，韩国首尔）

一、绪　　论

公元前9～前3世纪，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着发达的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游牧文化。近期，通过树轮补正法，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南西伯利亚阿尔赞古墓年代被确认为公元前9世纪初。这一发现将开启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圈的新纪元。

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尼古拉·迪·科斯莫（Nicola Di Cosmo）以及阿纳托利·哈扎诺夫（Anatoliy Khazanov）等研究游牧社会构造的学者均认为，游牧国家的国家体系建立，受到了像中国、希腊等国家定居文明的影响。但位于西伯利亚草原中心的阿尔赞-1号大墓却是在周围没有定居文明的环境下，由游牧集团独立建造的巨大古墓。此外，因其建造年代追溯到了公元前10～前9世纪，早前的“游牧文化出现在定居文明附近”的学说受到了质疑。阿尔赞-1号大墓也成了重新研究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起源，甚至游牧社会形成过程的重要遗址。阿尔赞-1号大墓研究报告成书于30多年前，只在俄罗斯学术领域被研究讨论过。因此，本文旨在重新研究阿尔赞-1号大墓的发现及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起源。第三章考察部分将重点研究公元前10～前8世纪转换时期，图瓦地区移动性较强的游牧部落的产生原因，以及阿尔赞大墓在这种文化的产生中起到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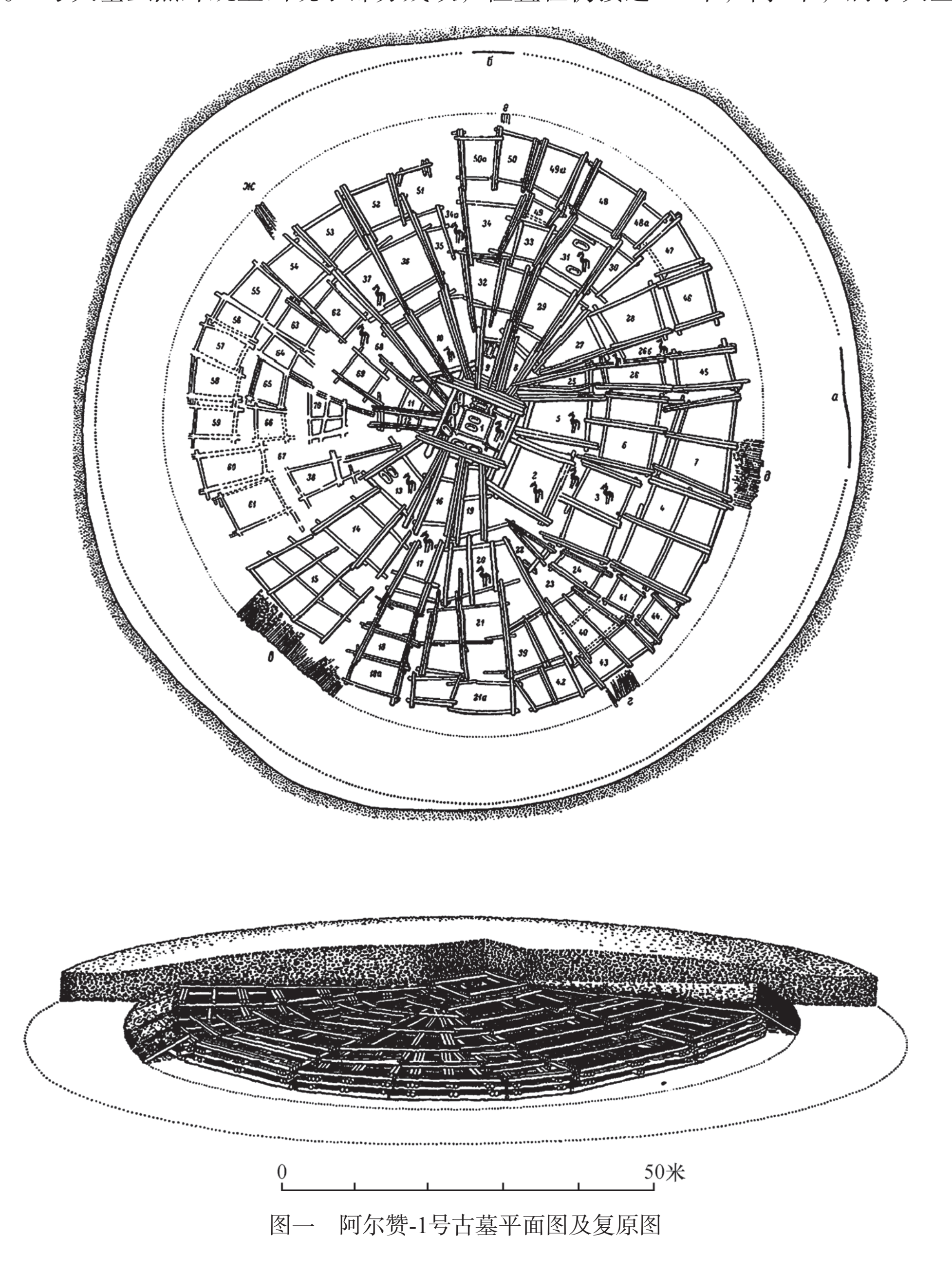
二、阿尔赞-1号古墓的发掘及年代

1. 南西伯利亚图瓦阿尔赞-1号大墓的发掘

阿尔赞遗址（东经93°35″，北纬52°03″）位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乌尤克江附近海拔1000米左右的图兰诺—乌尤克高原地区阿尔赞村。该地区共发现有三个大型古墓（格

里亚兹诺夫，1980年）。1号大墓直径为120米，高3～4米，2号大墓直径为80米，高1.5米，3号大墓直径为105米，高1米左右。其中1号大墓由格里亚兹诺夫（M.P.Gryaznov）和曼奈奥勒（Manai-ool）于1971～1974年发掘。2号大墓由楚古诺夫（K.V. Chugunov）及德国考古学研究所于2001～2003年发掘。

阿尔赞-1号墓的构造在1980年发行的研究报告（格里亚兹诺夫，1980年）中有详述。根据报告，可知1号大墓的坟冢底部由直径约为80米的相互连通的冢室组成（图一）。1号大墓虽然外观上出现了部分残缺，但直径仍接近120米，高4米，属于大型古



图一　阿尔赞-1号古墓平面图及复原图

墓。阿尔赞古墓的中间放置着皇室夫妇的棺椁，棺椁的东南方向放置着6个独木棺。坟冢的中心外围，东、南方向还殉葬有马匹。墓葬的外部由大石块堆筑而成，底部由若干个冢室呈放射状排列。冢室共29个，埋葬着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该墓地的棺椁以中间坟冢为中心，其他棺椁围绕着中心进行放置。墓地的边缘用圆木搭建成帐篷状木架结构。放射状的坟冢边缘能放置约38个棺椁，排列成6～7列，根据计算坟冢内部空间能放置250～300个棺椁。但因为坟冢的木制结构被简单地排列成放射状，格里亚兹诺夫推算现在能计算的棺椁为70多个，当时最少制作了100多个棺椁（格里亚兹诺夫，1980年，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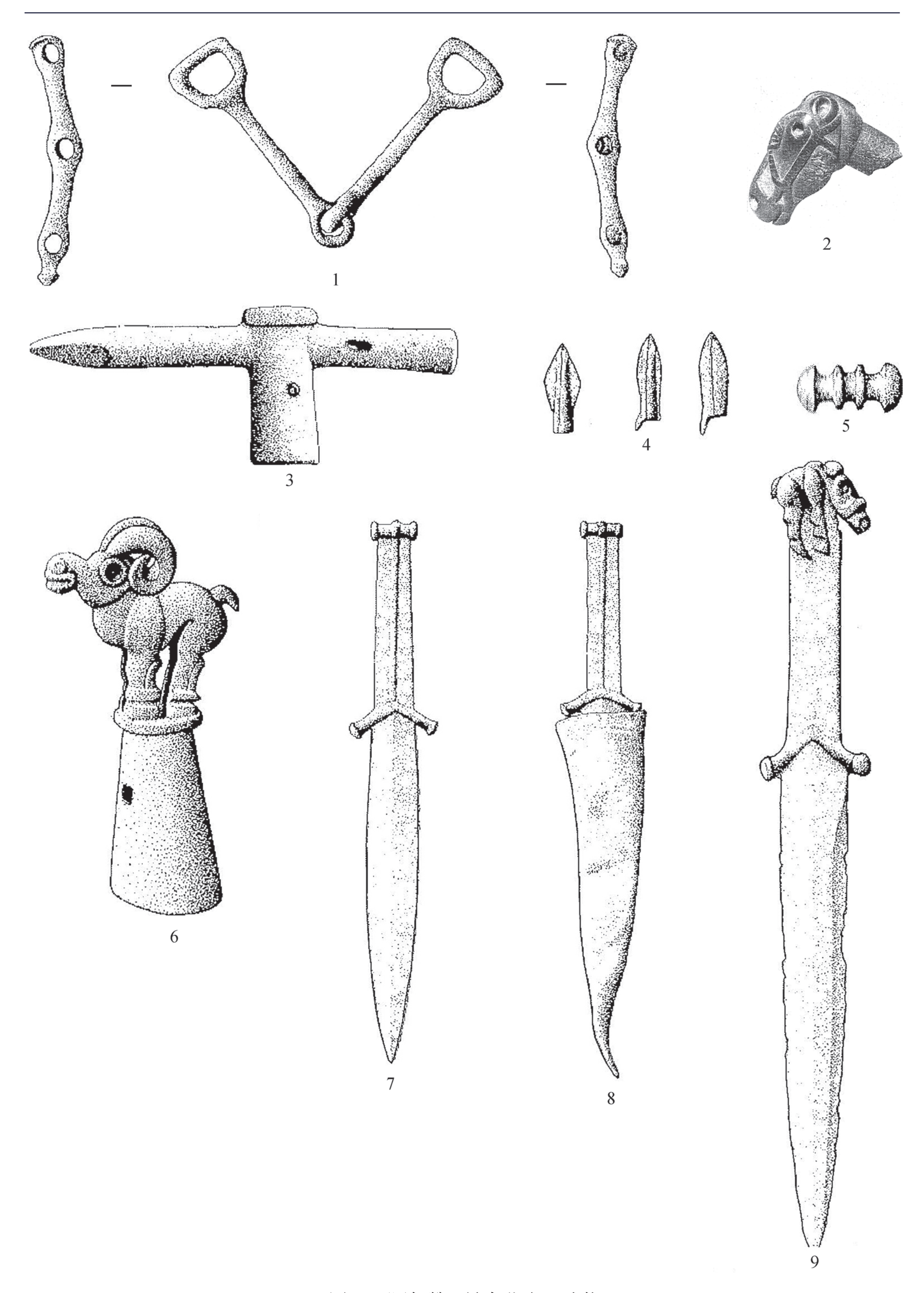
该古墓被盗及损坏程度非常高，经过全面发掘，目前被发掘的70多个棺椁中只有29个棺椁中的随葬品可以得到确认。遗物中的青铜器有大量的铜剑、铜刀、竿头玲、铜配饰及铜制的马具（图二）等。铜剑的末端和竿头装饰类陪葬品上刻有大量动物图案。除此之外还发掘了很多貂皮服饰（图三）和各种用黄金装饰的衣服（图四）。被埋葬者能判断出年龄的有约30名，其中60岁以上4名，40～60岁1名，50多岁3名，青年（20多岁）的只有1名，这与巴泽雷克古墓的年龄构成（Polosmak，2002年）形成了对比。

制作棺椁所用的木材均为阔叶树，观察年轮可知是在9月份采伐的。发掘者通过这些推测：当时人们为了秋季的葬礼，由1500人左右在周边地区采伐了7～8天树木，才完成了棺椁的制作（格里亚兹诺夫，1980年）。

2. 阿尔赞古墓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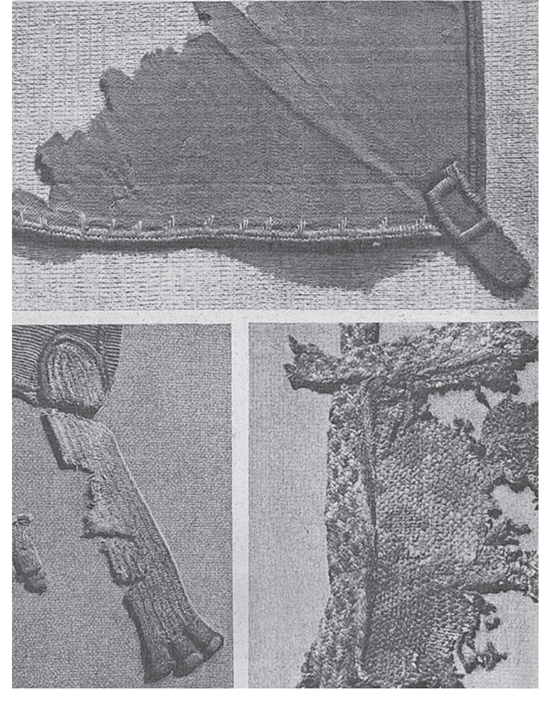
阿尔赞古墓被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根据出土遗物及放射性碳素测年法的测定结果，该墓地的年代很有可能比原来的斯基泰文化的上限公元前7世纪还要早（格里亚兹诺夫，1975年）。这是依据随葬的动物纹饰品、马具和铜剑等所体现出的卡拉苏克文化（公元前13～前9世纪）要素，以及坟冢堆筑石中发现的鹿石等随葬品和少数的^{14}C年代（2750±50、 2770±50、 2880±50年）所判断的。格里亚兹诺夫在做出正式报告后（1980年），综合了各种证据，提出阿尔赞古墓为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圈的代表性遗址（格里亚兹诺夫，1983年）。对此，支持近东起源说的代表学者 N.L.奇列诺娃（Chlenova，1991、1997年），根据^{14}C测年法、鹿石的编年以及早期发掘的动物纹饰品和马具的形态在不同地区发掘时间不同等特点，试图将年代定为公元前7世纪。其实，阿尔赞-1号大墓至少是在两百年（公元前9～前7世纪）间建造的，所以这和N.L.奇列诺娃指出随葬品为公元前7世纪的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但她将下限年代替换为中心年代的主张，目前还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将阿尔赞大墓的上限年代提早至公元前9世纪的另一个决定性原因是将阿尔赞-1号大墓发掘的大量圆木棺椁进行了树轮测年法。在东亚，除去中原地区，能够准确测定为公元前10～前9世纪的遗物并不多。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所于2003年对陶器器壁上的附着物进行多次AMS年代测定，最终将弥生文化的上限追溯到



图二　阿尔赞-1号古墓出土遗物

1. 马镳及马衔　2. 青铜马头像　3. 战斧　4. 铜镞　5. 联珠纹青铜装饰　6. 青铜伫立状鹿　7 ~ 9. 青铜短剑




图三 衣服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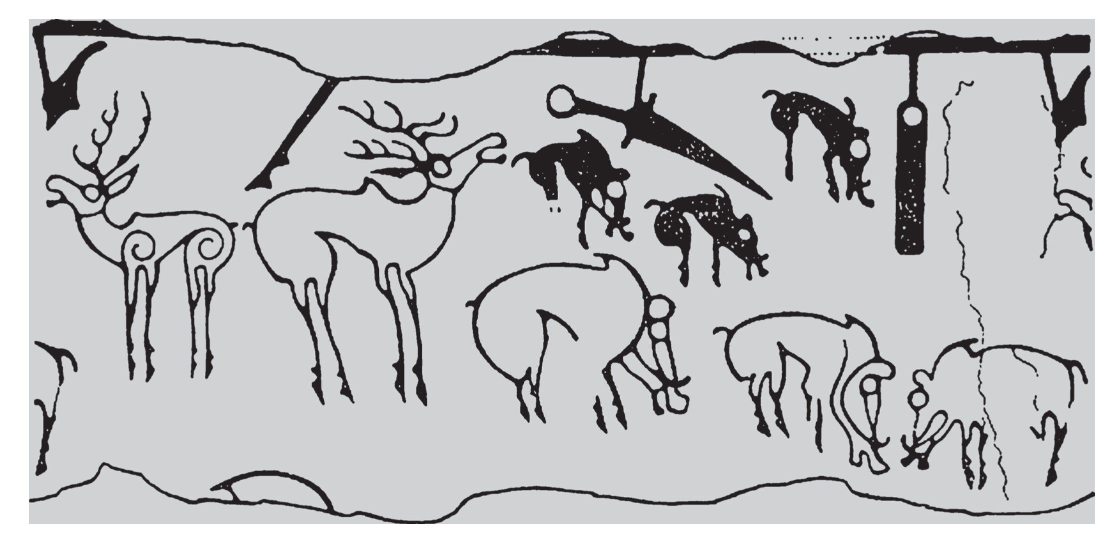



图四 黄金装饰

了公元前9世纪以前。另外，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制作于西周末至春秋初的中原礼器的铭文纪年资料和测年结果的交叉旁证，也与上述年代吻合。以上两种情况表明，研究人员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因AMS的测定误差以及中原制作工艺的延续时间等争议，使各研究人员之间存在1～200年的年代误差也是不争的事实。相反，阿尔赞-1号大墓不仅可以利用AMS和圆木棺椁的树轮测定年代，还可以通过各棺椁使用的木材进行年代比较，从而还原建造时间、建造顺序等。综上所述，可以将阿尔赞古墓选用树轮测定法的背景，包括保存完好的圆木以及与其类似的阿尔卑斯高原地区树轮年代测定法所提供的数据作为重要参考。

最先提出对阿尔赞大墓进行树轮测定的学者为扎哈里耶娃（Zakharieva，1976年）。她以阿尔赞-1号大墓各部分采集标本的结果为基础，确定了跨越547年的相对年代范围，而绝对年代因参考年轮数据的不足并未确定。但她提出，图克塔古墓晚于阿尔赞-1号墓136年，巴泽雷克5号古墓晚于图克塔古墓105年以及巴泽蕾克1～4号古墓是在巴泽雷克5号古墓之后的53年间建造的。她的研究虽然有时代局限性，但在开拓阿尔赞-1号墓的新编年法这一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1990年以后可比较的树轮数据逐渐增多，测定方法也更加科学。马尔萨多罗夫（Marsadolov，1988年）和扎伊采娃·博科琴科（Zaitseva Bokovenko，2005年）将巴泽蕾克的年代跨度拓宽到634年间，并且重新确定了遗址的年代。但仅通过20～40个数据来确定年轮值依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

2002年以后以扎伊采娃为中心的研究团队找到了树轮法的新突破口。她通过对图克塔古墓的重新测年，解决了阿尔赞-1号古墓的争议，并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年轮数据（Zaitseva Bokovenko，1997年）。此外，通过与阿尔卑斯高原地区树轮补正数据与交叉编年，明确了编年问题中最有争议的鹿石棺椁所使用的木材上采集的标本年轮年代为公元前885～前790年，她的研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图五）（扎伊采娃·博科琴科，2005年，1052～1056页）。由此可以推断阿尔赞-1号大墓的建造年代至少是公元前9世纪初。实际上，阿尔赞-1号大墓最开始设定的木椁直径为200米，然后再建造，即阿尔赞-1号大墓开始建造时，社会已经处于趋向复杂的阶段，并且开始建造古墓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



图五　古墓内发现的鹿石

由表一可知，中央棺椁和离它最近的12号墓室是公元前13～前10世纪，和26号一样靠近外部的棺椁时间相对更晚。26号出现于公元前10～前9世纪这样较为宽泛的年代值，这也是因为棺椁使用了大型圆木作为材料，在测定年轮采集标本的时候根据采集部位，中心部位和边缘部位的不同年代值范围广泛。年轮代表着树木本身的年代值，所以会出现公元前10世纪以前这样的年代值。这虽与古墓年代没有直接性关系，但却能推测出早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开始建造坟冢。

表一　阿尔赞-1号墓绝对年代值（笔者根据Zaitseva Bokovenko，2005年重新整理）

序号	分析序号	^{14}C绝对年代（BP）	修正年代		标本	标本采集位置	参考文献
			1σ	2 σ			
1	Ле-5146	2950±90	1300～1010	140～920	木材	12号墓室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续表

序号	分析序号	^{14}C 绝对年代（BP）	修正年代		标本	标本采集位置	参考文献
			1σ	2 σ			
2	Ле-5446	2880 ± 120	1260 ~ 980	1400 ~ 800	马的牙齿	26b墓室	Alekseev et al, 2002
3	Ле-2310	2800 ± 50	1010 ~ 840	1130 ~ 820	木材	年轮中心部	Марсадолов и др. 1994; Zaitseva et al, 1997
4	Ле-2444	2790 ± 40	1000 ~ 890	1020 ~ 820	木材	15 ~ 35 年轮	Zaltseva et al, 1998
5	Ле-2452	2790 ± 40	1000 ~ 890	1020 ~ 820	木材	48 ~ 60 年轮	Марсадолов и др. 1994; Zaitseva et al, 1997
6	Ле-5141	2790 ± 80	1020 ~ 830	1130 ~ 800	马蹄	31号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7	Ле-1698	2770 ± 40	980 ~ 830	1000 ~ 820	木材	1 ~ 25年轮	Марсадолов и др. 1994; Zaitseva et al, 1997
8	Ле-2311	2770 ± 50	980 ~ 830	1020 ~ 810	木材	年轮中心部	Марсадолов и др. 1994; Zaitseva et al, 1997
9	Ле-2312	2750 ± 50	970 ~ 830	1000 ~ 810	木材	年轮外部	Марсадолов и др. 1994; Zaitseva et al, 1997
10	Ле-5195b	2750 ± 30	915 ~ 835	980 ~ 820	木材	26号，50号 圆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11	Ле-2449	2740 ± 40	924 ~ 830	980 ~ 800	木材	36 ~ 60 圆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12	Ле-5195a	2700 ± 20	900 ~ 810	900 ~ 805	木材	26号墓室，外侧12个年轮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13	Ле-5195c	2680 ± 40	900 ~ 800	910 ~ 790	木材	26号墓室，木材内部年轮20个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14	Ле-5184	2670 ± 25	830 ~ 804	900 ~ 795	木材	30个年轮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15	ГИН-8618	2620 ± 40	828 ~ 788	900 ~ 590	木材	20个年轮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16	ГИН-8425	2610 ± 30	819 ~ 788	830 ~ 760	木材	木材内部10个年轮	Членова 1996

续表

序号	分析序号	^{14}C 绝对年代（BP）	修正年代		标本	标本采集位置	参考文献
			1σ	2 σ			
17	ГИН-8619	2600 ± 40	820 ~ 760	840 ~ 540	木材	26 号墓室	Членова 1996
18	Ле-5144	2590 ± 90	890 ~ 520	910 ~ 410	木材	12号墓室30个年轮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19	Ле-5194	2570 ± 50	810 ~ 550	880 ~ 520	木材	26号墓室中间棺椁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20	Ле-5193	2430 ± 40	760 ~ 400	770 ~ 400	木材	26号大型原木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21	Ле-5645	2750 ± 35	810 ~ 590	820 ~ 540	木材	20 号内部圆	Zaitseva, Vasiliev et al, 1998
22	СОАН-4053	2765 ± 30	970 ~ 830	1000 ~ 820	木材	40 ~ 60个年轮	L.A.Orlova
23	СОАН-4054	2720 ± 25	900 ~ 825	920 ~ 810	木材	80 ~ 100个年轮	L.A. Orlova

3. 阿尔赞-1号大墓和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圈的南西伯利亚起源

通过对阿尔赞-1号大墓的发掘和年代研究可知，在现存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起源学说中，相对于黑海沿岸的先斯基泰文化学说、中国长城一带的先匈奴学说，南西伯利亚起源说更有说服力。黑海沿岸的先斯基泰学说到1970年之前一直是俄罗斯学术界的主流学说，主张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起源于受美索不达米亚影响的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之后广泛传播于欧亚大陆草原地区。这一学说以美索不达米亚流行的动物纹饰品、斯基泰文化的相似性以及在伊朗出土的卢里斯坦（Luristan）青铜器作为主要依据（Chlenova，1997年）。虽然近东地区的动物纹饰品和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其他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却差异很大。此外，能与近东地区斯基泰系统的文化进行比较的动物纹饰品主要出现于公元前6 ~ 前5世纪，并不能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除此之外，萨尔贡Ⅱ世（公元前772 ~ 前705年）的众多随葬品中也没有发现能与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饰品进行比较的随葬品。不仅如此，在年代标注非常明确的近东地区，也几乎没有发掘出能够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西伯利亚系统的随葬品。另外，因对于卢里斯坦青铜器（在Chlenova1997年的文章中被作为依据）的年代争论较多，所以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立场对这些青铜器进行了不同的编年，主要

有公元前1300～前1250和公元前750～前700两种学说。造成这两种学说的主要原因在于，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里斯坦青铜器的主要文物在伊朗卢里斯坦地区被盗。但根据实际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卢里斯坦青铜器大部分属于初期铁器时代Ⅲ期，年代都比较晚（Overlaet，etc.，2004年）。因此最近的研究主流趋向于“卢里斯坦的年代比早前确定的要早”这一说法。综上所述，斯基泰系文化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没有被发现，并且随着公元前9世纪南西伯利亚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属于“先”斯基泰文化）的发现，其地位被动摇了。

此外，中国北方起源学说在20世纪70～80年代由中国学者田广金首次提出，该学说被称为“先匈奴文化学说”，主张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与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均由匈奴先祖创造。先匈奴文化学说还主张，商代甲骨文上被标为鬼方的地方，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肆虐中国北方，这些外夷被周代的猃狁、荤粥所继承。此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最后形成了匈奴（田广金，1983、1988年；姜仁旭，2007年）。但“先匈奴文化论”因过分将多种时代看作同一个系统而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并没有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迹象（公元前9～前8世纪）。因此将该地区看做文化起源地存在局限性。纵观中国北方长城草原地区，内蒙古长城附近的鄂尔多斯高原与周边地区分布的斯基泰—西伯利亚类型的玉皇庙文化、杨朗文化、毛庆沟文化等铜剑文化中，几乎不存在属于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类型的器物。玉皇庙文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公元前9～前8世纪）（靳枫毅，1991年），现在又推后到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之后（杨建华，2004年；洪猛，2013年）。公元前9～前7世纪的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空白期后，最近在鄂尔多斯高原附近发现了属于该时期的西岔文化（曹建恩，2012年）。但由于西岔文化的遗物数量较少，无法与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进行比较。这表明中国北方地区可能不存在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由于上述理由，中国考古学界提出该文化的自主产生说，但很难找到其他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自主产生学说。但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便存在着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而此后因气候环境变化及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介入，呈现出时而定居、时而游牧的文化。

1980年，格里亚兹诺夫提出西伯利亚起源说，正如第二章中所论述的，将阿尔赞-1号大墓的年代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初叶的观点，通过树木年轮交叉编年研究得到了更精准的证明并获得了更多支持。最近阿尔赞-1号墓和同时期南西伯利亚的遗址，以及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的研究仍在继续。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代表器物有三孔Y型马衔，这种马衔在阿尔泰地区、图瓦的阿尔赞-1号大墓以及黑海地区被确定为公元前9～前7世纪。这一时期阿尔泰地区以麦尔类型（Maiemir type）为代表，以库尔图2号（Kurtu）、塞米萨尔特1号（Semisart）等遗址为代表（Kiryushin，1997年）。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他加尔文化最初阶段为巴伊诺夫类型（Bainov，公元前9～前7世纪），出土了很多青铜时代晚期的器物，如兀字形铜器、刻有伫立动物纹的车

轮装饰、卡拉苏铜剑等，这些都能与阿尔赞-1号墓进行比较。

综上所述，公元前9～前8世纪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器物出土较多的地区为南西伯利亚地区，其中属于大型古墓、出土遗物较多的只有阿尔赞-1号大墓。因此，以上论述可以证明，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发源地及其早期形成过程应该追溯到阿尔赞-1号大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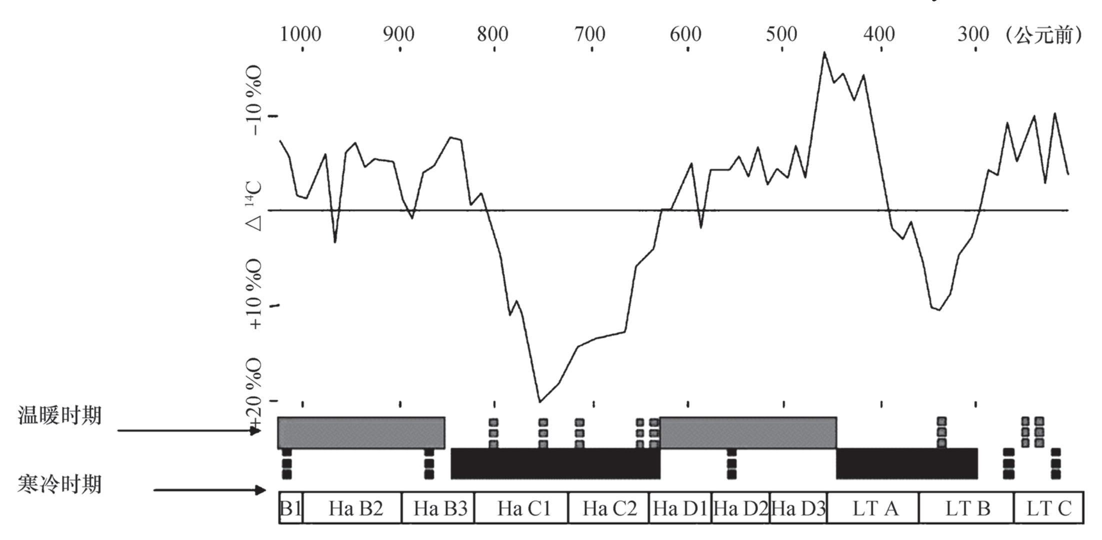
三、讨　　论

1. 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形成背景

如上一章所述，现存的证据显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所代表的新游牧经济应在以阿尔赞-1号墓为首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形成。那么，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唯独在南西伯利亚地区首次出现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其背景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游牧经济的出现这一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与大型古墓的出现这一埋葬习俗的变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游牧经济这种新型经济体制入手。游牧经济在早前的后青铜时代就已经存在，但在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阶段更加集中经营。草地是游牧经济体制的关键因素，根据气候环境的变化会非常敏感地扩张或缩小，因此可以将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之前的阶段——后青铜时代开始的气候变化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变化相关联起来探讨说明。公元前10～前8世纪，欧亚大陆整体都处于寒凉干燥的气候（图六）。

这样的急剧寒冷化在部分地区有时间上的出入，但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0～前8世纪，其范围涉及整个欧亚大陆地区。南西伯利亚地区寒冷化在公元前850年最为明显，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50年。欧洲中部地区从后青铜时代转变为哈尔斯塔特时期的时间也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这与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也大体一致（Khokhorovsky，2001年；



图六　公元前850～前700年东欧亚草原的气候寒冷化

（Khokhorovsky, 2011）

Molodin，2010年）。公元前10～前9世纪气候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这个时期成为后青铜时代（卡拉苏文化时期）诸文化消失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西伯利亚各地区出现了文化扩散与居民迁徙等现象。

在公元前10～前8世纪这样的气候变化期里，西部和南部西伯利亚一带根据气候的变化分为大肆建造城池以加强定居的群体和放弃定居转而开始游牧的群体。首先应对气候变化开始实施定居生活的地区为西部西伯利亚草原及森林草原地区，该地区在公元前10～前8世纪被称为“青铜时代—初期铁器时代的过渡期”。西部西伯利亚转换区一带居民的农业、畜牧、狩猎、捕鱼等活动因气候寒凉化改变而转变为复合经济体系，从而产生了很多建造防御性城壕的大规模村落。分析这一时期居民的构成可知，比起森林草原地区，选择迁徙到泰加森林地区以南的居民比率更高（Molodin，2010年）。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西部西伯利亚的大型城壕聚落遗址赤察-1（Molodin Parzinger；姜仁旭，2012年）。这种南迁现象与该时期波及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地区的气候寒冷化现象有关，泰加地区的居民因气候的寒冷化从而自然地进行了南迁，并且泰加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变得更能适应寒冷气候，融入了该地区的文化。

另外，在比西部西伯利亚更偏南的阿尔泰高原草原地带，公元前13～前9世纪的后青铜时代（卡拉苏文化）遗址却出现了大幅减少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阿尔泰乌科克（Ukok）高原集中发掘的405个遗址中，没有发现任何属于青铜时代后期的遗址（Molodin，etc.，2004年）。在米奴辛斯克盆地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也出现了相同的现象。公元前10～前9世纪人口骤减，古墓也呈较小规模，也没有发现社会的分层化现象。这种遗址减少现象持续到了公元前9世纪中叶。而随着阿尔赞-1号大墓的发掘，定居文明被完全打破，出现了拥有强有力武器和马具装备的游牧部落。

游牧各部落应对这种极端气候变化的方法截然不同。以公元前9世纪为中心的过渡期，位于草原北部森林—草原地区的赤察1号（Chicha）遗址，选择了人口集中化及复合生态经济的方法对抗气候环境的变化，而草原地区则转变为游牧经济来对抗气候转变。

那么，为何在广阔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唯独南部西伯利亚图瓦地区是最先转变为游牧经济的地区呢？当然也不容忽视其他被遗漏的草原地区。但是在调查研究比较充分的中国及黑海沿岸、近东地区等，这些被认为是文明中心地的地区几乎不存在定居文明和附近地区的历史资料，即使在具有纪年材料或铭文的希腊双耳瓷瓶（amphora） 等年代确定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也很难找到与阿尔赞-1号大墓同时期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痕迹。并且在其他草原地区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像阿尔赞1号大墓这样用地表调查就能轻易发现的古墓。

靠近定居文化的地区没有发现大型古墓的原因可以推测为与定居文化接触的势力并未转变为游牧经济，而在和这些定居国家交流和角力的过程中试图适应这一变化。在公元前9～前8世纪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过渡期，以山戎和戎狄为首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

对定居国家的频繁侵略（Prucek，1970年）和交流正是适应这种转换期的一种方式。黑海沿岸的希腊地区，公元前9～前7世纪的先斯基泰部落居民虽没有正式引入游牧经济，但在公元前7世纪发展成为征服定居部落的游牧民族斯基泰国家。也就是说，黑海沿岸地区也并未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激进的游牧经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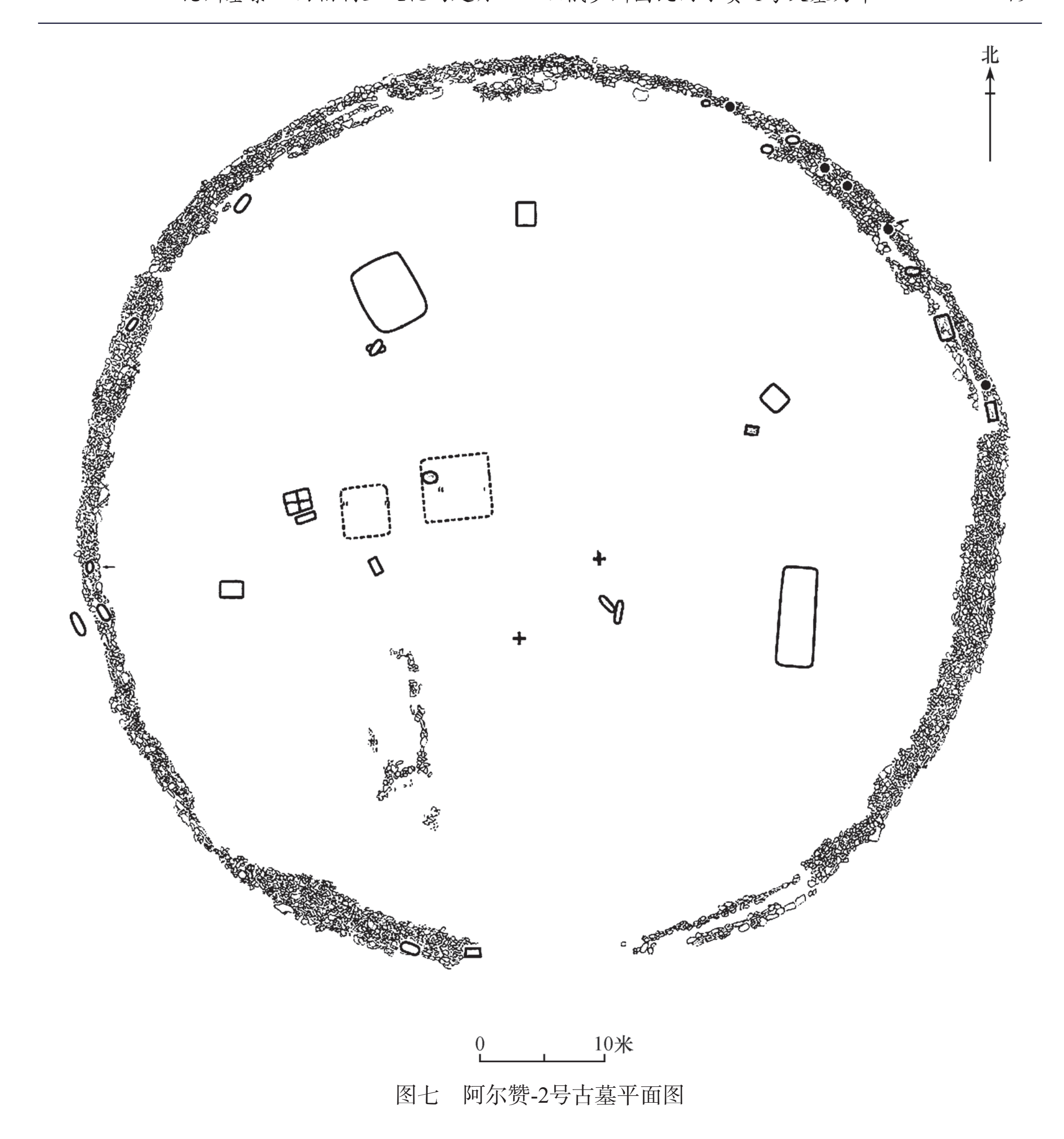
反观图瓦阿尔赞-1号墓，其地理位置处于被萨彦岭——阿尔泰山脉包围的高原盆地地区。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也可知，与阿尔泰地区不同，没有和丝绸之路一带（现在的新疆地区）或者中原地区进行过交流的迹象。在这种地理条件下，图瓦地区直到现代，在西伯利地区都属于被分离的、独立的地区。换言之，这意味着在同样的草原地区，根据气候变化进行经济重组，但不存在定居文明。也就是说，位于草原中心的图瓦地区在地理条件上更容易为游变换为游牧经济，并且相比与定居国家交流，更注重与北方森林—草原地区交流、在草原地区内部互相交流。

除了快速改变为游牧经济以外，并无其他生存战略的图瓦阿尔赞古墓建造者最先引进游牧经济，并且为了支持这种经济又引进了发达的马具（马镳）和青铜铸造技术。A.A.科瓦列夫（Kovalev，2014年）根据动物纹饰品三孔马镳将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起源追溯到了新疆准格尔盆地公元前10～前8世纪的察吾乎遗址（Charwighul）和洋海遗址。虽然不能将准格尔盆地本身视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起源，但是作为马具的发源地还是备受关注的。综上，我们可以认为阿尔赞古墓的建造者率先引进了周边包括发达的马具技术在内的多种技术，并在公元前9世纪初（或者公元前10世纪末）已经形成了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新型社会构造。另外，可以推测阿尔赞部落游牧经济的成功引进，对阿尔赞周边的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区一带传播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可从阿尔赞古墓随葬周边地区的各种马匹陪葬可知。

2. 阿尔赞-1号大型古墓的产生与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起源

图瓦草原地带有利的气候及地理环境，严格来讲可以作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产生的背景，但用来说明阿尔赞-1号大型古墓还不充分。从直径达到200米这一数据来看，阿尔赞-1号大墓属于超大型古墓，与温带地区权利集中化以及社会复杂化而产生的古冢古坟有所不同。阿尔赞-1号大墓是以中央棺椁为中心、陪葬各种周边地区马具的形式建造的。并且根据^{14}C测年以及棺椁制作圆木的年轮测定可以表明，整个阿尔赞-1号大墓是历经200年的时间逐渐建造并形成了目前的埋葬形态的。此外，阿尔赞-1号大墓附近的另一个大型古墓阿尔赞-2号古墓的建造时间若推测为公元前7～前5世纪（楚古诺夫，2004年），可知人们应该是在建造了阿尔赞-1号墓之后建造的阿尔赞-2号墓（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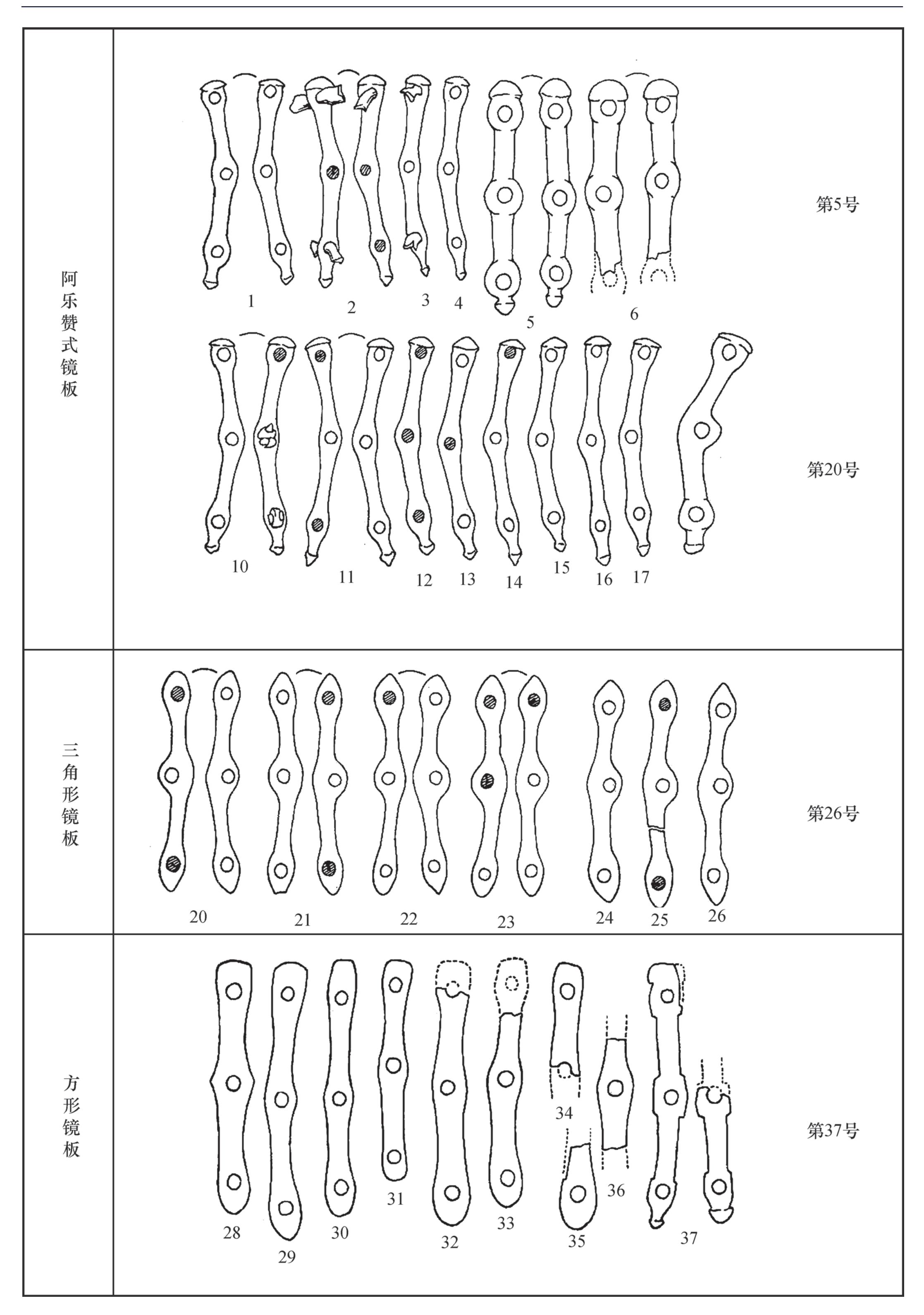
阿尔赞-1号大墓出土的文物以马具为主，装备了马具等的马冢也与人类的古墓一样建造成相同的大小及位置。由此可见马具和骑乘用马象征的地位非常高。这种现象在青铜时代是从未出现过。因此，各古墓中出土的马具对分析阿尔赞-1号大墓的性质具有极大的意义。阿尔赞-1号大墓是以中间的族长棺椁为中心、其他棺椁呈放射形排列，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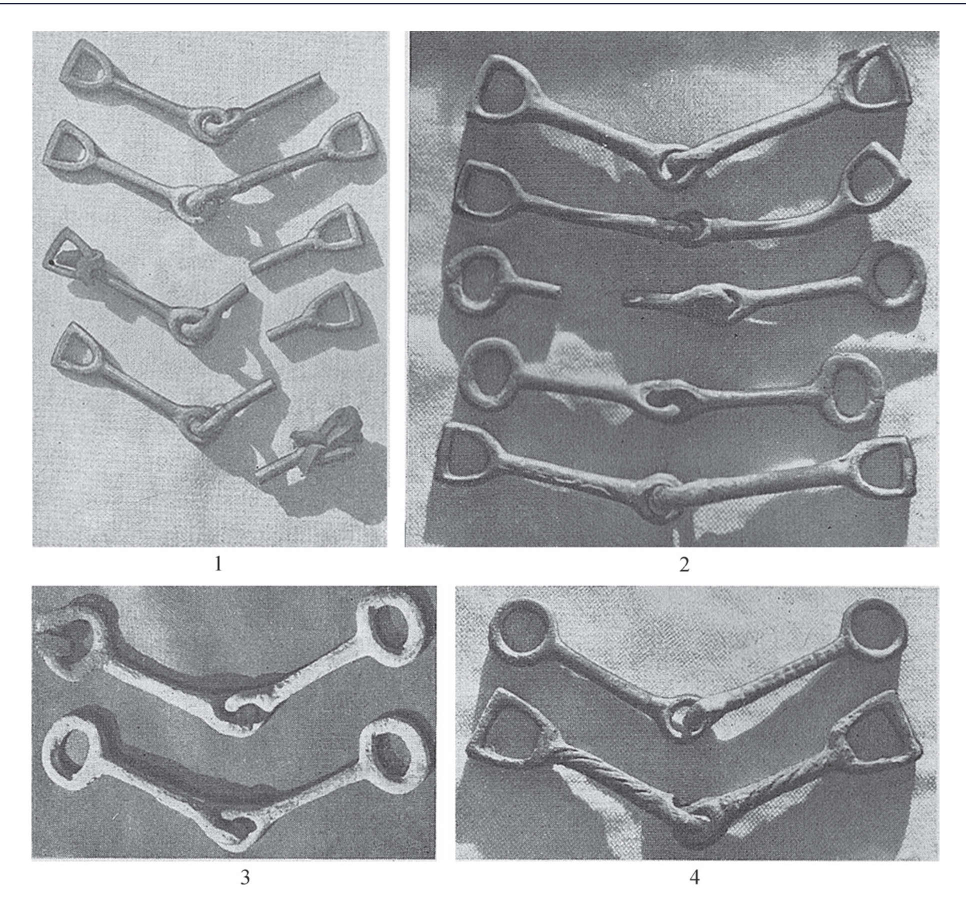
图七　阿尔赞-2号古墓平面图

棺椁并未完全制造好，而是只把框架排成了放射形状。阿尔赞-1号墓的另一个特点为，木椁里所发现的马具与阿尔泰、米努辛斯克盆地、哈萨克斯坦等地区的马具存在一些差异。格里亚兹诺夫（1980年）通过对阿尔赞-1号墓出土的马具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央棺椁东南方向的7组棺椁为图瓦地区附近一带的马具，形态上具有细微的差别，可以称为“阿尔赞-1号墓型马衔”（图八）。而北部4组古墓中出土的马具则完全不同，可以推测为其他部落所赠送，并且与马衔配套使用的马镳也呈锹刃形、圆形、梯形等，各古墓出土的形状各有不同（图九）。

阿尔赞-1号古墓部落的族长办理葬礼时，距离数百千米的周边地区其他文化部落也



图八　阿尔赞-1号古墓出土马衔



图九　阿尔赞-1号古墓出土马具
1为37号墓室所出，其他均为26号墓室所出

赠送了随葬用的马匹。这种赠送只出现于随葬用马匹等，并不能说明阿尔赞文化征服了南部西伯利亚一带。换言之，可以推测阿尔赞古墓的主人对图瓦一带有着直接的统治从属关系，但不存在对更远周边部落的支配权，部落之间只维持着给部落首领赠送随葬品这种较松弛的关系。

综上可以断定，阿尔赞古墓没有通过武力，而是通过象征性及礼仪性的赠送随葬马具来支配着周边地区，这是因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在经济体系重组方面需要的并不只是经济体系，还需要宗教与礼仪等新元素。能够代表引进了游牧经济的草原诸多部落的新型物质文化以武器（铜剑）、马具（三孔马镳）、战士的象征（动物饰品）为主，这不仅仅是新型遗物，而且还与新经济体制与以游牧为中心转换的社会中新型意识体系的成立有关。可以认为在这种转换时期，阿尔赞大型古墓的建造者在新经济体制建立上与周边地区进行了有关礼仪的交流。事实上这种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在阿尔泰地区的马依爱弥尔期（Maiemir）、塔加尔文化在巴伊诺夫时期也得到了确认，其年代可从与阿尔赞古墓的编年（Kiryushin，1997年）以及^{14}C测年（Kuzmin，2005年）

等方法追溯到了公元前9世纪。但是从未出现过图瓦这样的大型古墓。阿尔泰的马依爱弥尔文化只发掘了单人墓中随葬马匹的小型墓葬。塔加尔文化的巴伊诺夫阶段也只出现了小型墓葬，并且数量非常少。各地区都留存着浓重的后青铜时代的特点，并且一同发掘的还有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武器和马具。也就是说，后青铜时代的部落不存在重大更替而是延续下去了，在此基础上转变为新青铜时代文化。但除了阿尔赞地区，在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发现的任何以大型古墓为代表的社会集中化现象。换言之，陶器以及农用器具等清晰地保留着原有文化面貌，与此同时转变为游牧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由此可知，阿尔赞古墓的墓主在这一转换时期并不是南部西伯利亚一带的直接支配者，而是在与周边地区进行交流的联盟中起到首脑的作用。

同时，格里亚兹诺夫（1980年）指出：因阿尔赞古墓的中心部位流淌着泉水，人们将泉水视为圣水，所以历来这一地区就被神圣化。阿尔赞大型古墓的建造就是在公元前9世纪新型游牧经济引入草原地区版图的重组中，阿尔赞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是发达的马具，宗教和礼仪也被人们引入了游牧经济中。因此可以认为，阿尔赞古墓势力以建造大型古墓及随葬品、定期接收周边地区供奉的马匹等方式与周边地区进行交流，并传播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能把阿尔赞等巨型古墓的出现视为巨大权利的集中及国家形成的依据，应视为通过建造古墓及陪葬随葬品而建立起来的游牧集团联盟。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特征在公元前7世纪以后开始变化，这可以通过阿尔赞-2号墓的发掘进行推测。阿尔赞-2号墓为公元前7世纪中期～前5世纪。阿尔赞-2号大墓直径为80米，高2米，与1号古墓外形相似，但黄金制品有20千克，并以中央棺椁为中心周围围绕着30多个独立的棺椁（楚古诺夫，2004年；Čugunov，2010年），这一点体现了不同的埋葬风格。阿尔赞-2号大墓与阿尔赞-1号大墓相比，在财富的集中和古墓的构造上有明显差异，这也意味着阿尔赞古墓从礼仪中心转型到了游牧社会权利中心。阿尔赞-1号大墓中墓室有一半以上都空着，这一点也非常奇特。在阿尔赞-1号大墓的29个墓室中，有皇族墓室1个、贵族墓室15个、随葬马匹墓室13个，除此之外的墓室都是空的。在整个古墓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在旁边建造了阿尔赞-2号大墓，这也意味着从初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过渡到中期的社会构造变化。

由此可见，阿尔赞古墓的建造源于公元前9世纪生计经济的重组，这种重组使各地区用于维持游牧社会的武器及马具的需求量增加，随之各地区产生与之匹配的政治体系，并出现了体系之间产生与匹配的相互作用权，可以推测这种相互作用权以草原地区为基础，以谋求共同的经济体制、快速的信息传递、迁徙的日常化等游牧经济特征为背景，迅速得到了发展。他们相互之间不仅存在着物质交流，而且随着游牧经济的出现而改变的礼仪等非物质因素也成了重要的基础。因此，阿尔赞-1号大墓的出现是图瓦地区的地理因素、公元前10～前9世纪环境变化、新型骑马术的引进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并且阿尔赞势力在地区发展、社会体制改变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地区游牧经济的快速转型。综上所述，从阿尔赞势力开始的新型游牧经济在公元前7世纪发展为覆盖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地区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全盛期。

四、结　　论

目前为止，对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传播过程的研究只局限以马具、武器、动物饰品“斯基泰三要素”为代表的随葬品之中，并且停留在以草原为基础、共同经济体制、信息快速传递、迁徙日常化等游牧经济的原则性分析上。但是通过对阿尔赞-1号大墓的研究，可了解到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南部西伯利亚地区，以此为据，将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形成过程与阿尔赞势力的出现过程相结合进行了分析。其结果表明，在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产生阶段的所出现的大型古墓并不是因武力与权利集于一人而产生的， 而是以礼仪和意识形态为根据，各部落共同发展并且结为联盟的方式而产生的。由此可知，以西伯利亚草原为基础的文化，其发展与定居文明的文化发展方向不同，因此在数千平方千米广阔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可以形成独立的文化圈。这种特点意味着游牧社会的形成可以跳跃“游牧文化”的片面视角，结合时间、空间以及土著文化的关联性等进行考察。

目前为止对草原地区的研究大多强调与定居文明的对抗这一外部层面上（Khazanov，1979年；Di Cosmo，2002年；Barfield，1989年）。游牧社会形成的文献资料大多是关于与希腊接壤的斯基泰、与中国接壤的匈奴的，这就造成了不得不依附于定居文化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姜仁旭，2014年）。事实上匈奴与斯基泰的兴盛，是在与中原及希腊接触、磨合过程中产生的。但是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及南西伯利亚阿尔赞却毫无与定居国家存在过交流的迹象。定居文明对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圈的形成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相反，气候的变化、游牧经济的发展等因素和社会复杂化引起的地区间交流增加等游牧社会自发性因素才是决定性因素。大范围的气候变化使草原面积增加，也刺激了游牧经济的发展，草原各部落从复合经济转向更加依赖游牧经济。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各政治体间交换武器和马具的相互作用权应运而生，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快速地传播于草原各个地区，起到了连接东西欧亚大陆的作用（Boyle Katie, Renfrew Colin & Levine Marsha，2002年）。公元前一千年前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急剧变化是从阿尔赞大型坟冢开始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初期阶段，在中国东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被发现，由此可以判断与东北亚青铜时代的前期也毫无关系。阿尔赞-1号古墓还揭示了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和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以及他们和亚洲东北部青铜时代的关联性的新视点。

参考文献

韩　文

V.I.Molodin, H.Parzinger, 姜仁旭.西部西伯利亚Baraba Steppe的城壕遗址及公元前8世纪的东亚［A］. 21世纪韩国考古学［C］，2009.

姜仁旭. 对于中国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概念及初期研的检讨究：从古董学到新中国成立之前［J］. 中国史研究，2007（48）.

姜仁旭. 新视觉中的丝绸之路及中亚历史［N］. 百山学报，2014（98）.

曹建恩. 中国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商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D］. 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崔梦，李憲宗，姜仁旭. 西伯利亚的先史考古学［M］，2003.

中　文

洪猛. 略论玉皇庙墓地的分期与年代［J］. 考古，2013（10）.

靳枫毅. 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与主要器物特征［J］. 辽海文物学刊，1991（4）.

田广金.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J］. 考古，1983（3）.

田广金.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J］. 考古学报，1988（3）.

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卫城文明［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杨建华. 再论玉皇庙文化［A］.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杨建华，曹建恩. 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N］.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

英　文

Barfield T.J.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M］. Hoboken:Wiley, 1992.

Beckwith C.I. *The empires of Silkroad-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and Oxford, 2009.

Bokovenko N. Migrations of early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 in a context of climatic changes in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in Eurasi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O Advanced Research Workshop*, 15-18 November 2003. St. Petersburg: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6: p21-34.

Boyle Katie, Renfrew Colin, Levine Marsha. *Ancient Interactions: East and West in Eurasia*［M］.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Monographs, 2002.

B.van Geel, N. A. Bokovenko, etc. The Su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cythian culture after 850 BC,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in Eurasi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O*

Advanced Research Workshop, 15-18 November 2003. St. Petersburg: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6: p151-158.

Čugunov K., Parzinger H., Nagler A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kurgan Aržan 2 in Tuva*.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0.

Di Cosmo N.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hazanov A.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Kuzmin N.Yu. Prospects for Correlating Radiocarbon and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ies of the Scythian and Hunno-Sarmatian Age Burials in the Sayan-Altai Region [J].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8(35-3): p77-87.

Overlaet B. The Early Iron Age in the Pusht-i Kuh, Luristan [J]. *Luristan Excavation Documents IV*, Acta Iranica 40, 3e série, Leuven, 2004.

Prucek G. *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e Period 1400-300 B.C.* [M]. New York: Dordrecht, 1971.

Renfrew Colin, John F. Cherry. *Introduction: Peer Polity Interac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Peer Polity Interac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cott E. M., Alekseev, A.Yu., Zaitseva G.I.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in Eurasia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O Advanced Research Workshop*, 15-18 November 2003. St. Petersburg: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6.

Zaitseva G.I, etc. A tree-ring and ^{14}C chronology of the key Sayan-Altai monuments [J]. *Radiocarbon*, 1998(40-1): p571-580.

Zaitseva G I etc. Chronological Studies of the Arzhan-2 Monument (Russia) [J]. *Radiocarbon*, 2004(46-1): p277-284.

俄 文

Грязнов М.П.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хронологии ранних кочевников в связи с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кургана Аржан. // Ранние кочевник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Л.: (1975). с. 6-10.

Грязнов М.П. Аржан. Царский курган раннескиф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Л.: (1980), 64 с.

Грязнов М.П. Начальная фаза развития 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их культур. // Археолог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Вып. 12. Кемерово: (1983). с. 3-18.

Зайцева Г.И. Боковенко Н.А. и др. Евразия в скифскую эпоху-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а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2005 ; СПб). с.290.

Захарьева Е.И. Дендро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ургана Аржан //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н.1, (1976) с. 100-107.

Кирюшин Ю.Ф. Тишкин А.А. Скифская Эпоха Гогного Алтая, Часть I.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анне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 Барнау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7). с. 232.

Ковалев А.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кифов из Джунгарии: основания гипотезы и е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 Арии степей Евразии...Барнаул. (2014) с. 124-136

Марсадолов Л. С. Дендрохронология больших курганов Саяно-Алтая (I тыс. до н. э.) // АСГЭ. Вып. 29. (1988) с. 65-81.

Молодин В.И.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тресс» на рубеже II–I тыс. до н.э.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у народо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 Культура как систем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2010).

Молодин,В.И.　Полосьмак,Н.В.　Новиков А.В. и др.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плоскогорья Укок (Горный Алтай) ; Ин-т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4). - 255 с.

Полосьмак, Н.В. Всадники Уко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2).

Савинов Д.Г. Синташта и Аржан // Элитные курганы степей Евразии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ую эпоху. СПб: (1994). с. 170-175.

Слюсаренко И.Ю. Датирование скифских древностей Евраз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 «Terra Scythica»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11).

Степ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М., (1989).

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М., (1992).

Хохоровский 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тресс»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и культурный «шок» в Карпат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е в конце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 «Terra Scythica»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2011).

Членова Н.Л. Ещё раз о дате оленного камня из Аржана. // КСИА. Вып. 204. М.: (1991). с. 24-30.

Членова Н.Л.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скифы. I. Дата кургана Аржан и его место в системе культур скифского мира. М.: ИА РАН, (1997). 98 с.

Чугунов К.С. и др. Аржан-источник в длине царе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ые в Туве, СПб, (2004).

On the origin of early Schyto-siberian culture and Arzhan-1 kurgan of Tuva, Southern Siberia

Kang Inuk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Arzhan-1 kurgan, located in Tuva, Russian Federation, Southern Siberia. The researcher who excavated and reported Arzhan-1 suggests that this kurgan is dated to 9-8th BCE and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earliest site of scytho-siberian world. Recently Gryaznov' dating is confirmed by dendrochronological dating and advanced 14C dating (AMS and Wiggle matching).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reasons why the earliest scythian kurgan appeared in Tuva plateau. Firstly, the climate change in 10-8th BCE forced peoples of Siberia to change the economic patterns of late bronze ages. As climate became cold and dry, significant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Taiga region to Western Siberia in Novosibirsk region was caught b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cha-1 site. Arzhan people, located in mountainous plateau, selected nomadic life style with advanced horse equipments, bronze weapon and animal style ornaments. Secondly, Arzhan revealed various types of horses from each buri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urgan formed as a wheel, with leaders' tomb on the centre. This means the great size of Arzhan doesn't show the concent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s shown in Korea or Japan in the period of state formation, but it played a central place for rituals of nomadic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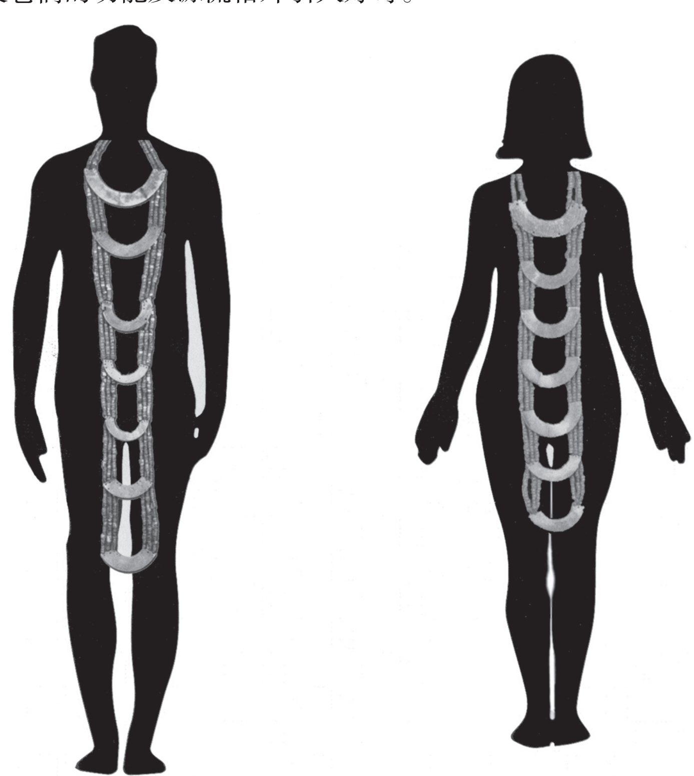
Key words: Scytho-Siberian World; Arzhan kurgan; Arzhan-Maier culture;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ancient interaction; scythian world; nomad economy

周代贵族佩饰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黄翠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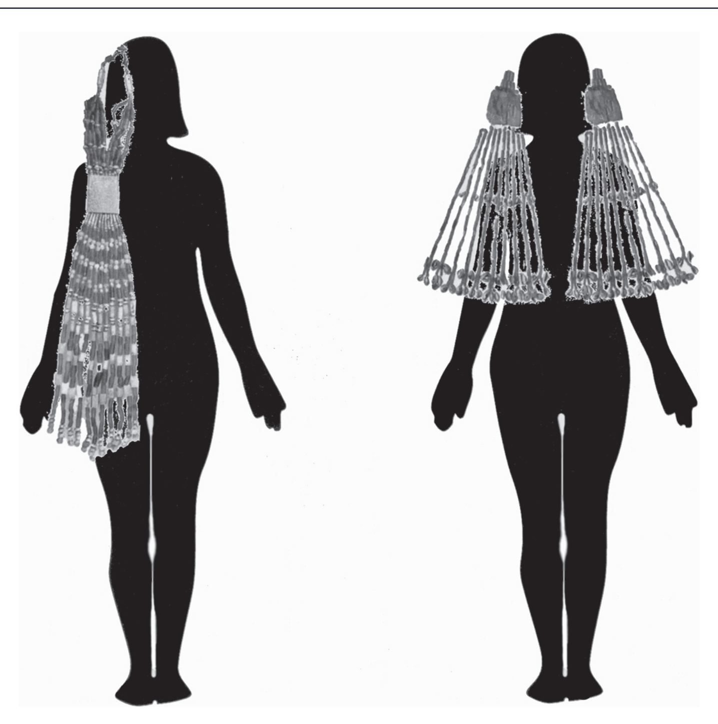
（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台南市，700）

玉石佩饰是周代贵族彰显身份的重要标志，其中又以圈挂于胸颈部位的玉璜组佩（图一）和垂串于女性头侧的梯形牌联珠串饰（图二）最为突出。玉璜作为胸颈饰件的佩饰传统虽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然而周代玉璜组佩以红玛瑙、绿松石等多彩珠管搭衬玉璜的配置方式，却清楚标示出它们与新石器时代玉璜项饰的区别；至于西周至春秋早期贵族墓葬中常见于女性墓主头侧的梯形牌联珠串饰，以及它们以梯形牌饰絜领多股多彩珠穗的组合设计，则完全不见于周代以前中国各地的串饰传统。因此，有关它们的功能及源流格外引人好奇。



图一　西周至春秋时期佩戴多璜组佩的男女贵族示意图

（图中的玉璜组佩采自《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图一二〇、图一三八）



图二　西周至春秋时期佩戴梯形牌联珠串饰的女性贵族示意图
（图中的梯形牌联珠串饰采自《文物》2008年1期，第10页，图一五；《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第10页）

笔者近年整理了数种考古出土的青铜时代早期至商周时期的玉石佩饰和珠管串饰，并尝试从它们的出土位置、组合设计以及时空分布等面向复原其使用方式及发展源流。[1]研究结果显示，作为西周贵族服饰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项饰和头饰等人体佩饰，既奠基于青铜时代以前的佩饰传统，其丰富多元的质材运用与对比强烈的色彩配置，又明显与传统崇尚均一质感与淡雅色泽的审美风尚大异其趣。这些迹象表明，无论西周红玛瑙珠等多彩珠管的流行、玉璜组佩的再兴或梯形牌联珠串饰的发轫，应与来自跨域交流的文化刺激有关，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信号源，即是北方草原民族艳丽多彩的人体佩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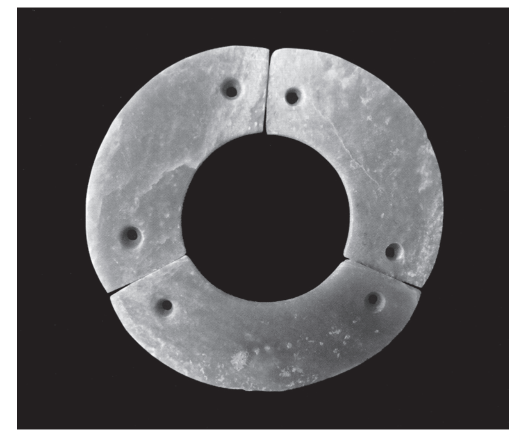
一、玉璜项饰的沈潜与再兴

考古数据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4000～前2300年）玉璜串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发展得相当成熟，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公元前三千纪后叶至二千纪初），除了少数地区仍有零星玉璜出土外，长江流域使用玉璜及各类玉石饰品的风气已经基本式微。

相对而言，在大约同时期的黄河流域，饰品的发展则更为兴盛，材质越趋多元，种类也相当繁多。例如，黄河下游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晚期（约公元前三千纪末至

二千纪初）大型墓葬M202和M203都随葬了绿松石珠管串坠和饰片；[2]黄河中游汾河流域的山西芮城清凉寺、襄汾陶寺和临汾下靳等墓地，出土了石珠、骨珠、蚌环、石贝和绿松石珠管等串饰，以及作为镯饰的玉琮、玉璧、玉环、多璜联环等，个别墓葬还可见到嵌绿松石头饰和腕饰。[3]至于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除了延续马家窑文化以来使用石珠、骨珠、绿松石珠管和海贝之传统外[4]，部分齐家文化遗址也开始出现玉石璧、琮、多璜联环（璧）和玉璜[5]，充分反映黄河流域多方交汇的文化态势，以及材质多样、异彩纷呈的人体装饰倾向。

前述饰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多件玉璜缀合组成的多璜联环。这种多璜联环最早见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晋南山地，而后随着发展时间和地域的扩展，璜形构件的外形、裁切和拼合方式均渐趋规范。例如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多璜联环多由2至4件外形规整一致的素面玉璜组成，而又以由3件接近120°圆心角的扇形玉璜组成的三璜联环最为常见（图三、图四），其流传时间和影响范围也最为广泛。



图三　青海喇家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素面扇形玉璜［《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图一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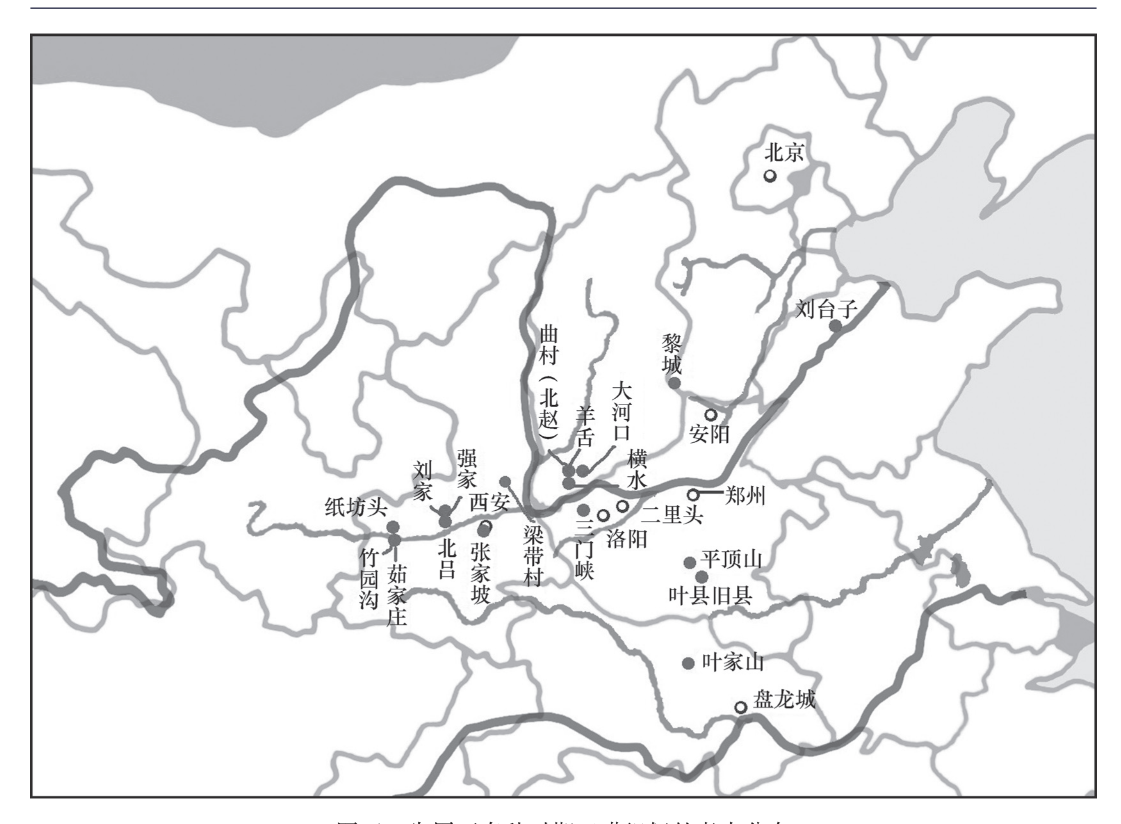


图四　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的三璜联环［《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图二四］

进入公元前二千纪以后，随着新疆、甘青、晋陕和内蒙古等地区红玛瑙珠和金属饰品的兴起，遗留自齐家文化的素面玉璜也逐渐流向中原地区，并进而在玉璜项饰新一阶段兴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

（一）从素净淡雅到多彩缤纷

玉璜组佩主要盛行于西周早期至春秋时期[6]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据笔者所掌握的考古材料，截至目前已出土的玉璜组佩或疑似玉璜组佩共49组，隶属于40座墓葬中的42个个体，其中除少数墓葬同时出土2或3组外，多数为每墓一组。这些墓葬主要分布于黄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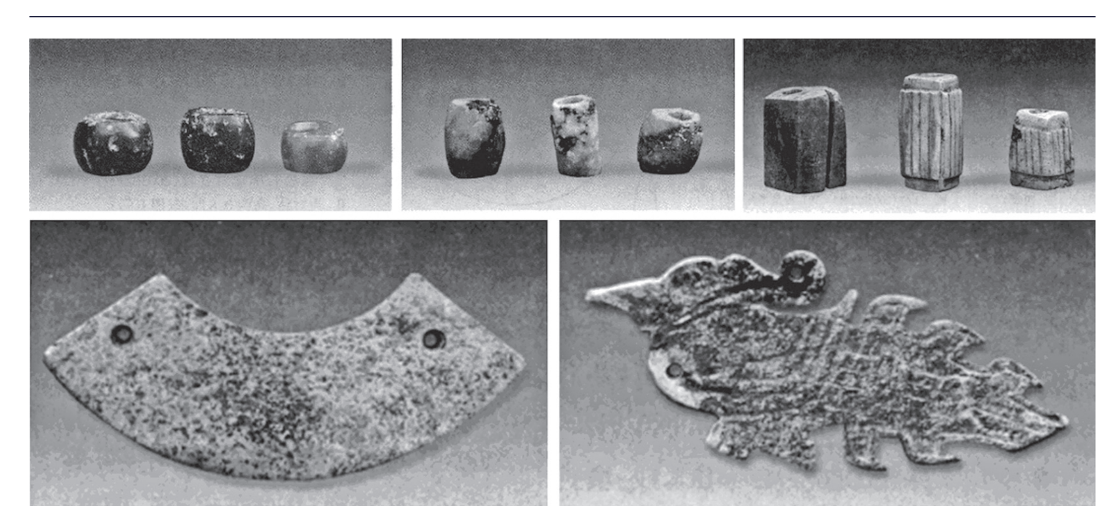
图五　先周至春秋时期玉璜组佩的考古分布

下游的周原、关中以及晋、倗、霸、黎、芮、虢、应和许国领域，仅有一例位于汉东地区的曾国地域（图五）。

考古数据显示，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叶的商周之交，位处甘青、宁夏、内蒙古、渭河流域和汉中交会地带的宝鸡强国领域开始出现由红玛瑙珠和绿松石珠搭配素面玉璜组成的项饰。

1974～2003年，考古学者曾先后在渭河两岸的宝鸡纸坊头、竹园沟和茹家庄等地发掘了多座先周至西周早、中期阶段的高阶男女贵族墓葬，并且在其中8座墓中发现了11组玉璜项饰，它们分别隶属于10个不同的个体。[7] 其中宝鸡纸坊头一座年代约为先周时期的強鱼国贵族墓葬（M3）中，在墓底北部约相当于墓主胸腹部的位置，随葬了扇形素面玉璜以及红玛瑙珠与绿松石珠、玉管、玉鸟、小玉戈等（图六）[8]，这些珠管和玉璜很可能原属于一组串饰。果若如此，则此组以红玛瑙珠、绿松石珠和小件玉饰搭配单件扇形素面玉璜的串饰，是已知周文化范围中玉璜项饰最早期的样式。

此外，在西周早期早段（成康之际；约公元前11世纪后叶）的宝鸡竹园沟BZM1和BZM13，以及西周早期晚段（康昭之际至昭王年间；约公元前10世纪初）的BZM7、BZM4等強国国君或其殉妾身上，都分别出土一组由1至5件扇形素面玉璜和红玛瑙珠及绿松石珠组成的玉璜项饰（图七、图八）。[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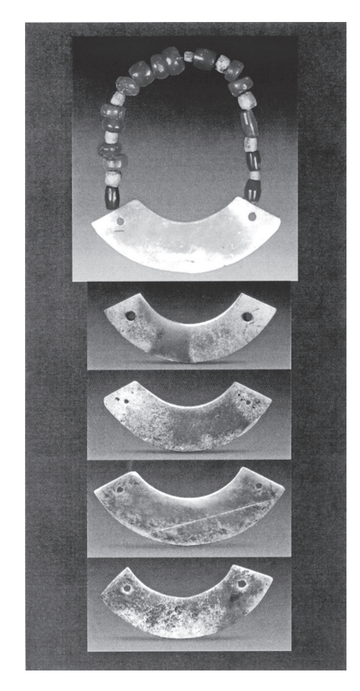
图六　宝鸡纸坊头M3出土的串饰组件

（《文物》2007年8期，第44、46页）



图七　宝鸡竹园沟BZM1出土的玉璜项饰

（《強国玉器》，第212页）



图八　宝鸡竹园沟BZM7出土的五璜组佩

（据《強国玉器》，第281～283页推测复原）

前述先周至西周早期的強国墓葬出土的玉璜项饰皆以素面玉璜为主体，其外形多为近120°圆心角的扇形，轮廓利落、工艺规整，两端各穿有一孔，与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素面玉璜相当类似，推测它们多数为齐家文化遗物。笔者认为这些素面玉璜在宝鸡地区的重新利用，可能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以来兴起于甘青和晋陕地区的金属弧形项饰有



图九　甘肃徐家碾寺洼文化M45出土的
红玛瑙、绿松石与白骨珠串饰
（《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彩版七，3）



图一〇　甘肃徐家碾寺洼文化M72出土的
红玛瑙、绿松石与白骨珠串饰
（《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彩版七，1）

关。至于与玉璜一同穿缀佩戴的红玛瑙珠串，则不排除是受到甘肃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遗址（约公元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10]的影响（图九、图一〇）（详下节）。

大约从西周早期晚段开始的一百年间（昭王至孝夷之际；约公元前10世纪初至前9世纪初），宝鸡一带使用玉璜项饰的风气越趋兴盛，并逐渐沿着渭河、黄河以及汉水流域向关中平原、晋南山地、秦岭—黄淮平原过渡带以及山东半岛发展，其影响甚至远及汉东地区。到了西周中期，除了宝鸡茹家庄強国墓地外，关中平原的扶风刘家丰姬墓、黄堆强家墓地和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晋南山地的曲村晋国墓地、北赵晋侯墓地、横水倗国墓地、大河口霸国墓地，河南中部的平顶山应国墓地，以及山东半岛逢国墓地和汉东地区的曾国墓地等，都有玉璜项饰的发现。[11]

此外，随着玉璜项饰的东传，不仅玉璜和珠管之间的组合方式日趋规律，原本的素面玉璜也逐渐被装饰着双龙纹或人龙纹的玉璜所取代，并一步步朝向作为周代贵族崇高身份与等级象征的玉璜组佩发展。其中最具关键性的代表，是沣西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M58（昭穆时期；约公元前10世纪中叶）的玉璜组佩。

张家坡M58墓主尸骨不全、性别难辨，墓中出土的玉璜组佩由3件刻纹玉璜、4件玉管以及148件红玛瑙珠和10余件绿色料管组成，其中3件玉璜的尺寸及弧度由上而下依次递增，由4件束腰形玉管和红玛瑙珠及绿色料管穿缀组成的2股珠串则分置玉璜左右两

侧。此外，玉璜器面分别刻有一对反身相背、龙尾相交的吐舌龙纹，或回首相向、龙尾相迭的双龙纹样，其中2件玉璜两侧龙首上方还刻有表示角冠的线纹及齿饰，纹饰刻划细致繁复，属于西周龙纹装饰的早期样式（图一一、图一二）。[12] 此组三璜组佩不仅为西周晚期以后大兴的合抱式多璜组佩首发先声，玉璜器面刻划的两种双龙纹饰也代表西周龙纹装饰的主要典型。

到了西周晚期晚段（宣幽时期；约公元前9世纪末叶至前8世纪初叶），除了前述关中平原、晋南山地和秦岭—黄淮平原过渡带外，玉璜组佩在豫西山地也有所发展，此时无论珠管构件的种类、色彩组合以及玉璜的大小、弧度和数量的配置都有一定的规范。[13] 其中又以北赵M31晋侯夫人墓（图一三）、平顶山M107应国贵族墓以及三门峡M2001虢公墓和M2012虢公夫人墓出土的玉璜组佩最具代表。此时玉璜的数量一般在5至7件，大小和弧度由上而下依次递增的配列方式已成定制，左右两侧也固定缀以红色或多彩相间的单股或双股珠管串饰，竭尽所能以珠管的艳丽多彩衬托玉璜的庄严质朴。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的2座西周晚期晚段的虢国国君墓（M2001、M2009）及1座夫人墓（M2012）中，分别出土了一组七璜、五璜和六璜组佩，惟其中仅M2001虢季墓和M2012梁姬墓的二组玉璜组佩已有清晰图片发表（图一四、图一五）。[14] 这两组玉佩中的玉璜之大小和弧度自上而下依序递增，两侧再缀以多彩相间的单股或双股珠串，玉璜器面则装饰着繁简不一的双龙纹、人龙纹或凤鸟纹。当这些玉璜组佩被层叠有序地覆盖在位于墓室中心的墓主身上时，丧礼核心参与成员的注意力也会被牵引到位于组佩中心的玉璜（图一六）。如此不仅成功营造了“众珠拱璜”式的视觉力场与心理效应[15]，也清楚确立玉璜在阶序森然的西周贵族心目中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

西周末期以后，玉璜组佩持续朝向叠加玉璜或扩大玉璜尺寸的方向发展，并且屡屡为了获取足量的玉璜而混用或改制前代旧玉。例如，年代属于春秋早期的陕西韩城梁带村M27芮公墓及M26芮公夫人墓中各出土了一组七璜组佩（图一七、图一八），组佩中除了加大了玉璜的尺寸，更反转玉璜尺寸及弧度变化的既有规律，改为由上而下依次递减，并以左右各3股硕大且艳红的玛瑙珠串衬托拱卫7件玉璜[16]，直截了当地夸耀墓主不可一世的社会地位。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微与服饰制度的变革，目前除了河南叶县旧县M4许公墓犹见一例四璜组佩外，[17] 不仅东周贵族已不盛行在颈下佩戴玉璜组佩，红玛瑙珠的使用也不再是一枝独秀，代之而起的是由各种珍稀材质制作的环、璧、珩、龙形佩和珠管等垂串组成的腰腹佩饰。

（二）金属弧形项饰与玉璜项饰的交替兴盛与交互模仿

如前所述，周代玉璜组佩多样醒目的色彩配置，明显与新石器时代玉璜项饰素净淡雅的装饰设计不同。它们的出现一方面折射出以新石器时代的玉璜项饰传统为基础的



图一一　张家坡M58玉器出土情况

（《张家坡西周玉器》，图一～图一三）

1. 三璜串饰　2. 玛瑙珠串饰　3、6. 环　4. 龙　5、16、17、33. 鱼　8、9、11、13、27、29、30、41. 柄形饰　10. 璧　12、35. 玉饰　14. 璜　15、31、38、40. 龙　36. 半环　37、39. 鸟





图一二　张家坡M58出土的三璜组佩及组佩上的三件玉璜

（左：《玉石之魂》，第107页；右：《张家坡西周墓地》，图一八三，4、9、10）



图一三　北赵M31晋侯夫人墓中出土的多璜组佩

（《晋侯古玉—山西晋侯墓地玉器精品展》，图四八）



图一四　三门峡M2001虢季墓出土的七璜组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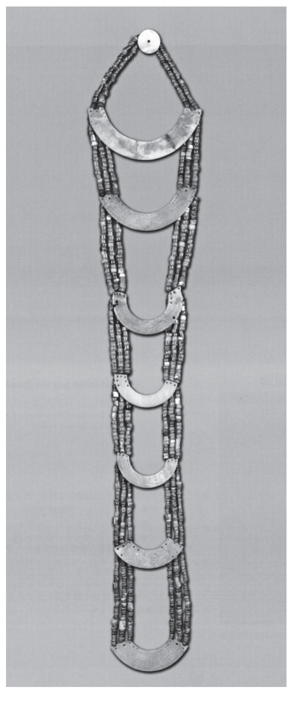
［《三门峡虢国墓》（第1卷），彩版一七］



图一五　三门峡M2012梁姬墓出土的五璜组佩
（《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精粹》，第52页）



图一六　三门峡M2001虢季墓棺内玉器及串饰出土情况
（《三门峡虢国墓》，彩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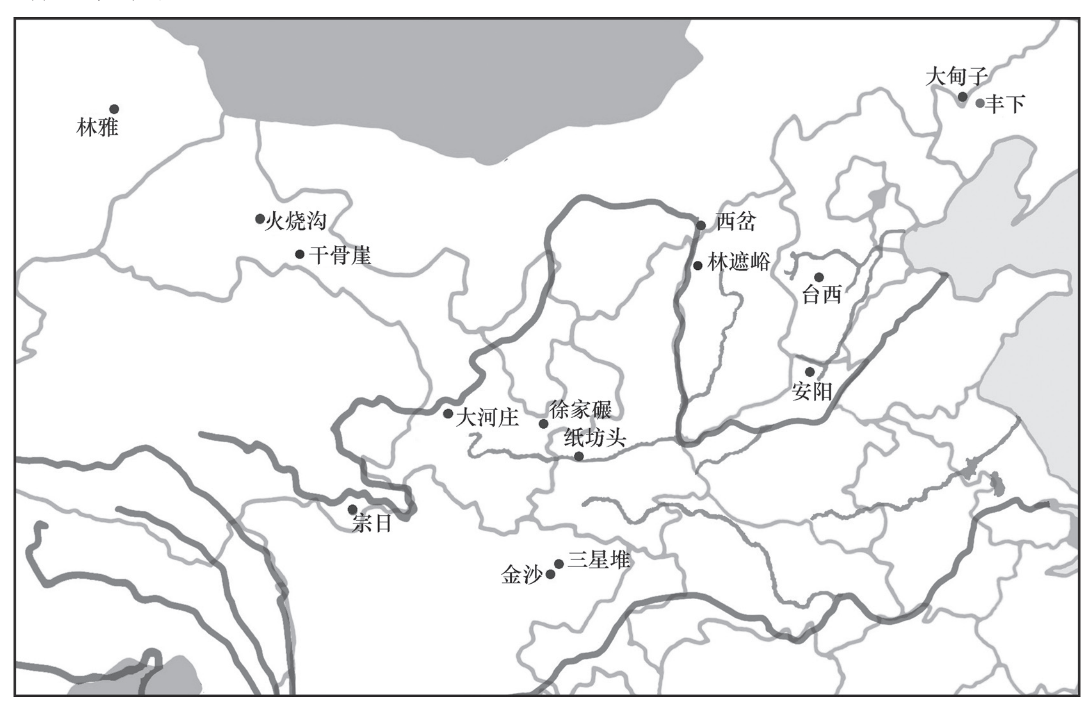
图一七　梁带村M27芮公墓出土的七璜组佩
（《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第247页）



图一八　梁带村M26芮公夫人墓出土的七璜组佩
（《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第227页）

记忆重建，另一方面也见证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装饰风尚对西周各国的刺激，其中除了艳丽多彩的红玛瑙珠管外，光灿耀眼的金属饰品也极为关键的催化剂。

依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青铜时代初期，零星的红玛瑙珠已见于天山北路林雅墓地、河西走廊火烧沟和干骨崖四坝文化遗址、青海同德宗日遗址、甘肃大河庄齐家文化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与辽宁北票丰下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进入公元前二千纪后叶以后，红玛瑙珠的分布逐渐扩及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包括山西藁城台西、保德林遮峪、河南安阳、四川三星堆和金沙等地都有红玛瑙珠的发现；而至迟在商周之际（约公元前12世纪至前11世纪中叶），使用红玛瑙珠的风气，已经出现在六盘山一带的甘肃平凉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遗址和宝鸡纸坊头𢐗国领域（图一九）。[18]



图一九　公元前二千纪红玛瑙珠的考古分布

此外，在中国北方边缘地带与红玛瑙珠约莫同步发展的，还有铜质和金质耳环、指环、项饰、手镯和臂钏等各种小型金属饰品。[19]在这些金属饰品中，又以和玉璜一样具有弧形外缘，但两端尖削、器身扁薄的月弧形金属项饰特别引起笔者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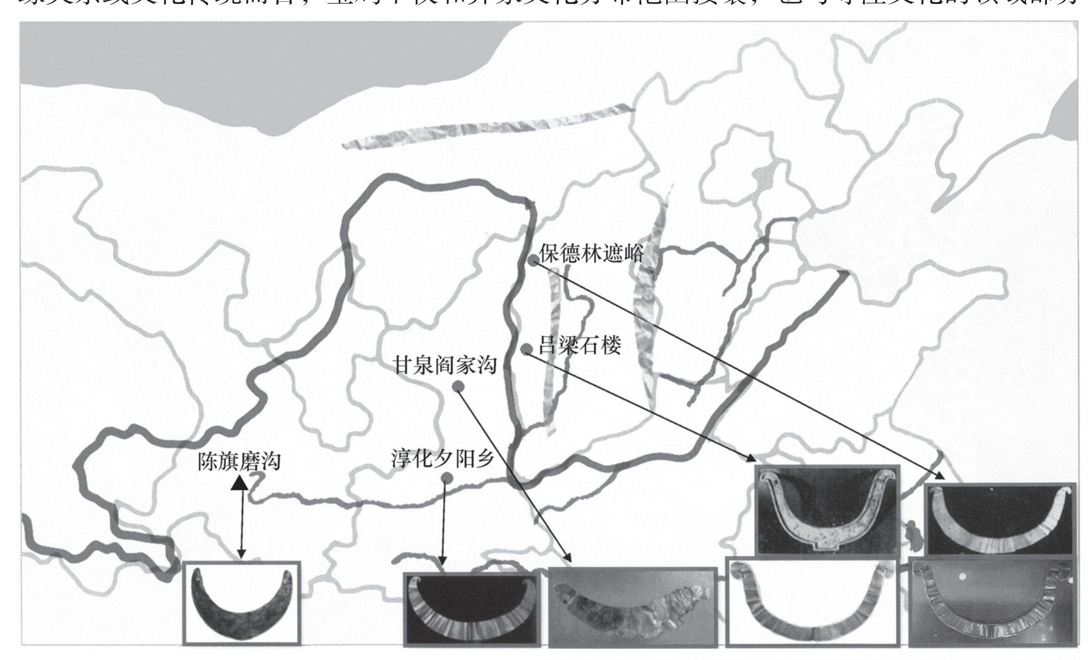
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月弧形铜项饰（外径17.46厘米）见于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晚期墓葬中（约公元前1500年）（图二〇）[20]，到了晚商至早周之间（公元前二千纪末叶），金属弧形项饰已经出现在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和关中地区的山西保德林遮峪、吕梁石楼桃花庄、石楼义牒、石楼褚家峪、石楼后兰家沟、陕西甘泉县阎家沟以及渭河北岸的咸阳市淳化县夕阳乡等多个遗址之中[21]，并且其材质更为多元、尺寸


图二〇　甘肃临潭县陈旗乡磨沟齐家文化晚期118号墓出土的月弧形铜项饰
（笔者摄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更为硕大（外径介于17～30厘米），造型也更富变化（图二一）。[22]其中陕西咸阳淳化夕阳乡出土的月弧形金项饰年代约为商末至周初，其弧端内勾，端末呈细线螺旋，工艺相当细致（图二二）。这件月弧形金饰是商周时期关中地区所仅见，也是已知金属弧形项饰分布的南界，对于探讨关中地区与晋陕高原和北方草原的饰品交流别具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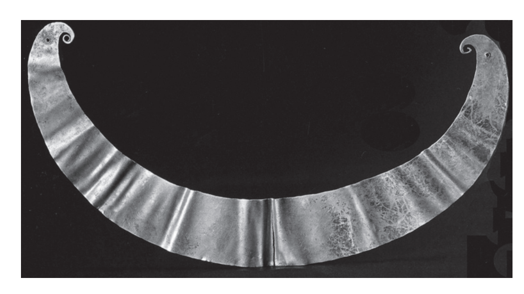
目前的研究显示，青铜时代初期萌芽于中国北方的红玛瑙珠不仅与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有所联系，其源头还可以再往西追溯到西亚和印度河流域[23]，而作为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核心内容之一的金属饰品，也明显受到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24]换言之，甘青地区和晋陕山地佩戴多彩珠管和金属饰件的装饰风尚，其根源很可能都与欧亚草原地区的身体装饰有关。

宝鸡地区三面环山，西出甘肃及河西走廊、东接长安、南邻汉中、北连宁夏与内蒙古并进而与欧亚草原及大漠相通，自古便是各地文化交流往返的咽喉要塞。无论就地缘关系或文化传统而言，宝鸡不仅和齐家文化分布范围接壤，也与寺洼文化的领域部分



图二一　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至末叶金属弧形项饰的考古分布
（图版来源参见注释［22］）

重合，并可能向东沿着渭河与晋陕高原互动。因此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它既是北方草原多彩装饰风尚传入渭河流域的前哨站，也成为启动齐家文化扇形玉璜再生之路的重要据点。其中象征西周贵族身份等级的玉璜组佩，很可能是宝鸡地区在北方草原金属项饰的启发下，以取材自齐家文化的旧玉对自身的佩玉传统进行了重建。



图二二　陕西淳化夕阳乡出土的弧形金项饰
［《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一），图七］

而后随着西周政治势力的稳固和拓展，玉璜组佩也逐步规范化和中原化，并在中原及其邻近地区并展开了为期数百年的发展，而前一阶段盛行于甘青地区和晋陕高原的金属弧形项饰则已不复出土。即使近年曾经在山西翼城大河口一座隶属媿姓狄人霸国墓葬M6022的盗洞中发现一件造型和装饰明显仿自玉璜的金质璜形饰件（图二三）[25]，这种混合了北方草原金饰风尚与中原地区玉璜传统的金璜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发展成西周璜佩的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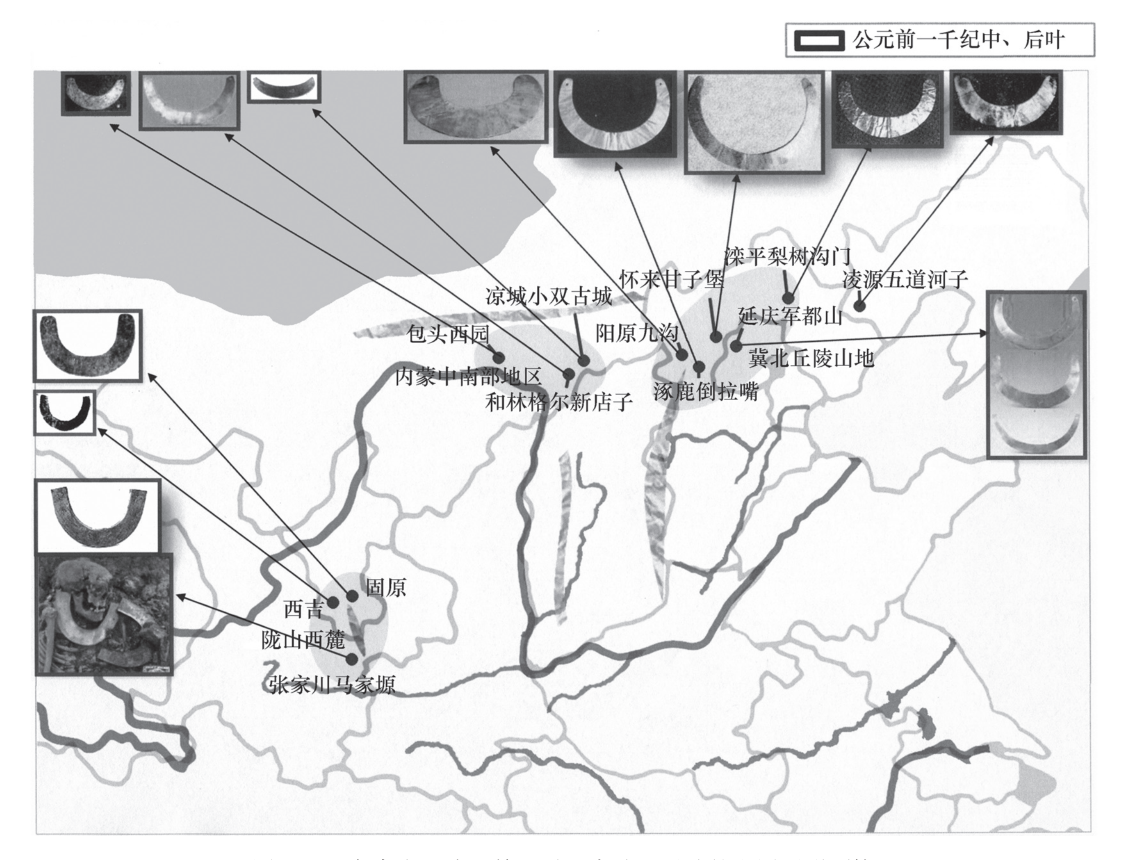


图二三　大河口霸国6022号墓盗洞中发现的金璜
（笔者摄于首都博物馆“呦呦鹿鸣”展）

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到前三世纪的东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的国力衰微，常见于中原地区上层贵族墓葬中的玉璜组佩也全面淡出历史舞台。相对而言，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崛起，金属弧形项饰新一轮的生命周期又再次展开。此时金属弧形项饰除广泛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冀北丘陵山地和陇山西麓外（图二四）[26]，它们在蒙古、贝加尔湖以及图瓦地区也有所发展[27]，在显示欧亚草原民族的装饰品味在中国北方边缘地带的又再次取得了强势的主导地位。

然而即便如此，甘肃马家塬战国时代西戎墓地15号和16号墓出土的金银项饰[28]，其外径约20厘米上下，弧身宽窄一致，两端口缘平直，左右各穿2孔，造型和其他地区普遍见到的月弧形金属项饰颇有差别，却与半环形素面玉璜相当接近。这种融合了北方草原月弧形金属项饰和中原半环形素面玉璜的折中产物，一方面显示草原民族身体装饰无远弗届的传播力量，另一方面则说明即使玉璜组佩已经销声匿迹，中原文化的佩璜传统仍然借由不同的形式展现其无比强韧的生命力。

金属弧形项饰与玉璜项饰之间这种交替兴盛与交互混用的现象，充分反映出西周贵族对外来元素的吸收是以自身记忆的重建为基础，而外来时尚与本地传统对周代贵族佩饰影响的强弱，则取决于寰中和域外政治势力的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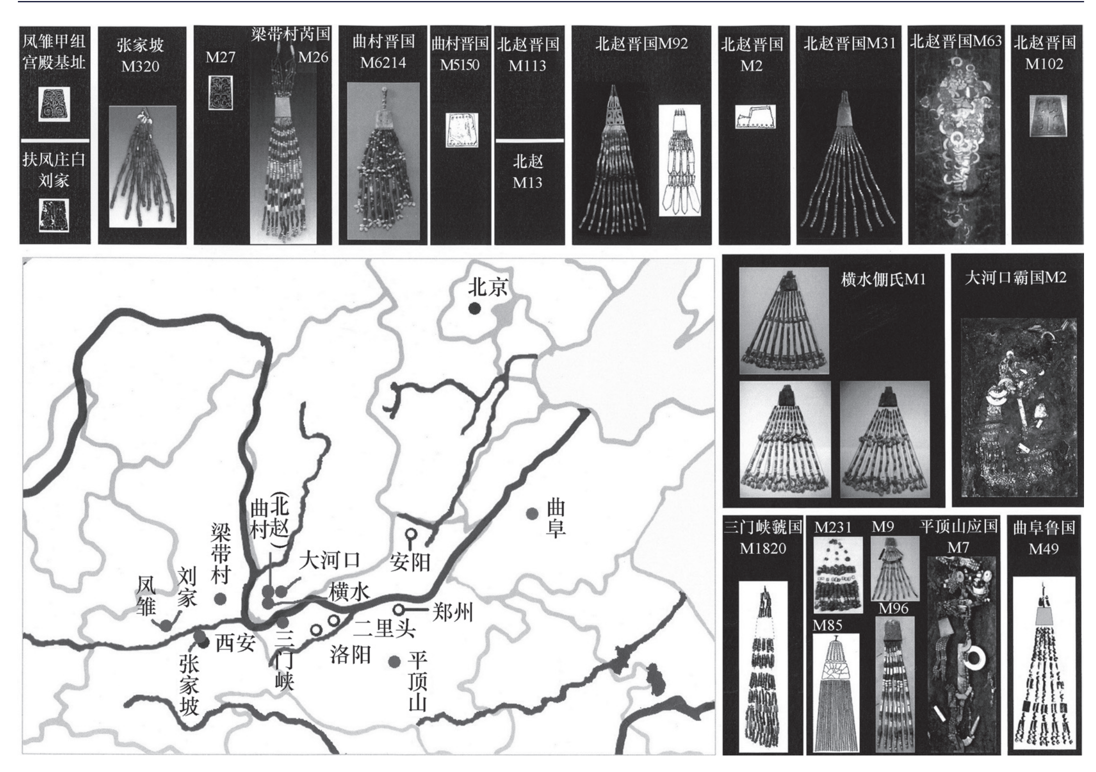
图二四　考古出土公元前一千纪中叶至后叶的金属弧形项饰

（图版来源参见注释［26］）

二、“移动的首饰盒”—西周女性贵族的梯形牌联珠头饰

梯形牌联珠串饰主要盛行于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对于男女贵族均可佩戴且组合规律、使用方式和发展脉络比较清晰的玉璜组佩，梯形牌联珠串饰多数出土于贵族女性墓葬中，其组串设计和佩戴方式与西周以前的串饰传统明显有别，因此有关其使用功能与来龙去脉也格外引人好奇。

据笔者统计，目前已知考古出土的梯形牌联珠串饰共29组（含4组已佚失梯形牌的联珠串饰）、梯形牌4件。其中除3件梯形玉牌分别出自陕西岐山凤雏甲组宫殿基址[29]、扶风庄白刘家遗址（疑似玉作坊遗址）[30]以及韩城梁带村M27芮公墓[31]外，其余皆见于西周早期晚段至春秋早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晋国、霸国、倗国、虢国、芮国、应国和鲁国女性或疑似女性贵族墓葬中（图二五）[32]，其中又以晋南汾河流域的晋国墓地出土年代最早、数量最多、持续使用时间最长，并且在中、高阶女性贵族墓葬中随葬的情况也最为普及。[33]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玉璜项饰发展过程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宝鸡強国领域迄今仍未见到出土案例。



图二五　考古出土西周至春秋早期梯形牌及梯形牌联珠串饰分布图

（《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第561页，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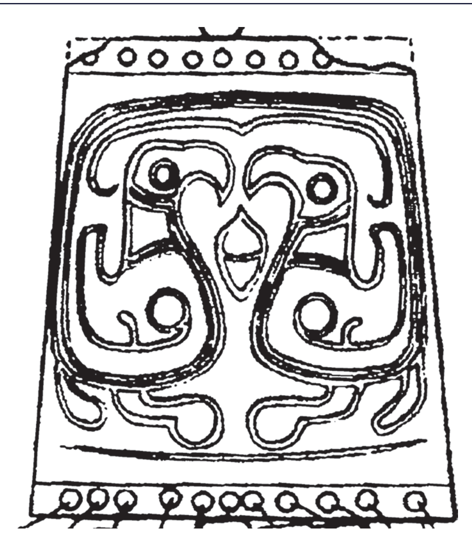
（一）梯形牌联珠串饰的时空分布及设计规律

梯形牌联珠串饰大致萌芽于西周早期晚段的黄河中游一带，此时除了周原岐山凤雏宫殿基址和扶风庄白刘家作坊遗址出土梯形玉牌外，晋南山地的山西天马北赵M113晋侯夫人墓和曲村M6214晋国女性贵族墓以及河南中部的平顶山M231应公少夫人墓中，墓主头侧都各随葬一组以骨质或石质的梯形牌和多股珠穗的梯形牌联珠串饰。[34]其中北赵M113的梯形骨牌联珠串饰图版迄未发表，平顶山M231的梯形牌联珠串饰之梯形牌已朽坏不存，仅余玛瑙珠、绿松石珠和料珠组成的珠串，只有曲村M6214的梯形石牌联珠串饰组合完整并有清晰彩照发表（图二六）。该组串饰是由一件梯形石牌絜领十组多彩珠穗组成，其中梯形牌两面阴刻一对侧身相向立鸟纹饰（图二七），鸟翼上仍嵌有绿松石圆片，梯形牌下方珠穗则包含红玛瑙珠管、绿松石珠管、白石珠以及石贝等，它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且保存完整、出土位置明确的梯形牌联珠串饰。

到了西周中期早段，佩戴梯形牌联珠串饰的风气持续在晋南山地和豫中一带发展，包括北赵M13晋侯夫人墓、平顶山M85应侯夫人墓以及山西绛县横水M1倗伯夫人毕姬墓和翼城大河口M2霸国女贵族墓中，都分别随葬了1至5组梯形牌联珠串饰。[35]在这些梯形牌联珠串饰中，除北赵M13出土的2件梯形牌各为象牙质和玉质外，其余墓



图二六　曲村M6214贵族夫人墓出土的梯形石牌联珠串饰
（《中國の考古學展—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發掘成果》圖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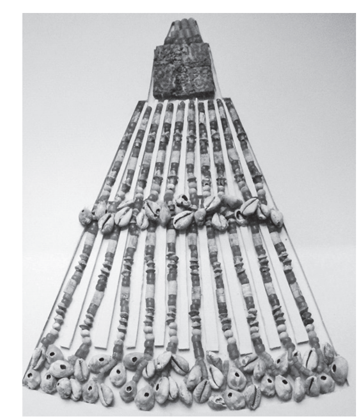
图二七　曲村M6214贵族夫人墓出土的梯形石牌
（《天马—曲村：1980～1989年》第二册，图五六九）

葬所出的梯形牌均为骨质。以横水M1毕姬墓为例，毕姬肩胸两侧共佩戴5组梯形牌联珠串饰，目前仅有3组曾经公开发表或展示，它们都是由梯形骨牌、玛瑙管、料管、料珠、玉管、白石珠、穿孔海贝等串系组成，其中2件梯形骨牌的正反两面嵌有绿松石装饰，一件为双层波曲纹，另一件则似是侧身相背的对鸟纹（图二八）。

进入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以后，梯形牌联珠串饰的分布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包括北赵M2、M31、M63、M92和M102晋侯夫人墓、曲村M5051晋国女贵族墓、平顶山M7、M9和M96应国国君夫人墓、张家坡M320井叔家族墓、河南三门峡M1820虢国女贵族墓、山东曲阜M49鲁国贵族墓、陕西韩城梁带村M27芮公墓和M26芮公夫人墓中，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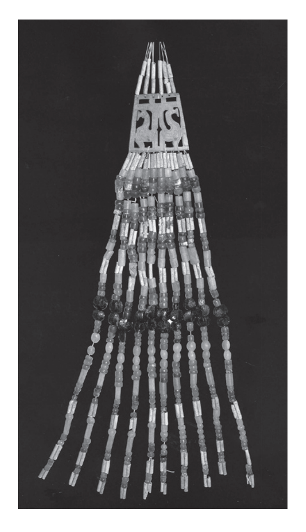






图二八　横水M1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的三组梯形骨牌联珠串饰
（笔者自摄）

可以见到梯形牌或梯形牌联珠串饰的踪迹，其中仍以晋国墓地和应国墓地的出土数量最为密集。[36]此一时期的梯形牌仅少数为石质，其余多为青绿色或青黄色玉料制成，至于器面上的装饰，则除了属于西周晚期较早阶段的北赵M92和平顶山M96出土器上仍出现侧身相背的对鸟纹外，其余西周晚期晚段以后的梯形牌上皆刻划两两相对的对称龙纹或人龙纹样。此外，垂串在梯形牌下的联珠串饰主要由红玛瑙珠管、绿色料质珠管和青玉质珠管组成，而西周早中期阶段相当盛行的穿孔海贝或石贝则趋于消失（图二九～图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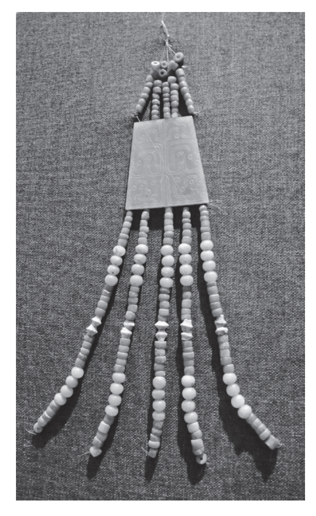
图二九　北赵M92晋侯夫人墓出土的梯形玉牌联珠串饰

（《晋侯古玉——山西晋侯墓地玉器精品展》，图一八）



图三〇　北赵M31晋侯夫人墓出土的梯形玉牌联珠串饰

（笔者自摄）



图三一　平顶山M7应国国君夫人墓出土的梯形玉牌联珠串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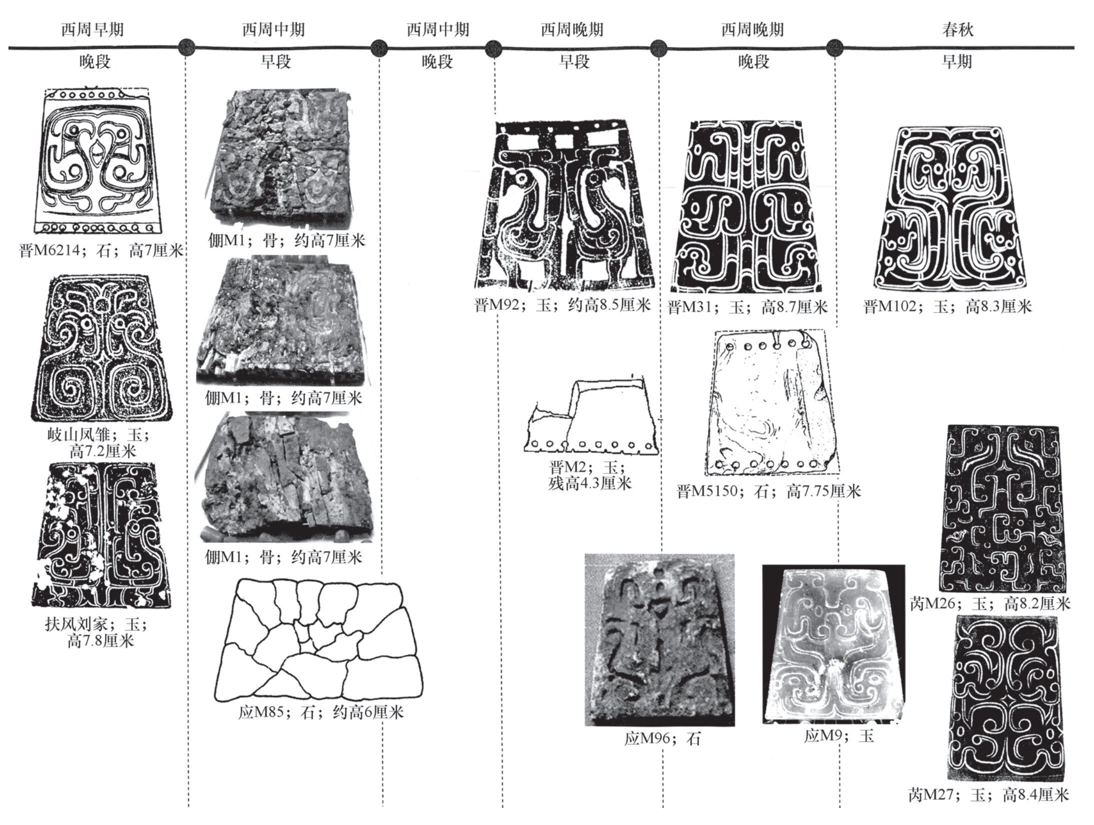
（笔者自摄）



图三二　梁带村M26芮公夫人墓出土的梯形玉牌联珠串饰

（《芮国金玉选粹》，图一〇）

综上可知，在西周早、中期阶段，梯形牌联珠串饰的配置系以的梯形骨牌、玉牌或石牌絜领多股穿缀红玛瑙珠、绿松石珠和穿孔海贝或石贝的珠穗为主，梯形牌上一般阴刻或镶嵌一对侧面相向或相背的立鸟图案。到了西周晚期，除了梯形牌的材质、表现工艺和装饰母题有所不同外，各股珠穗的材料、色彩组合以及珠管类型也发生变化。不仅更能迎合中原品味的梯形玉牌逐渐成为主流，装饰母题也从对鸟纹转变为两两相对的龙纹或人龙纹（图三三），而青玉质的珠管也逐渐取代海贝及料珠成为联珠串饰中搭配红玛瑙和料质珠管的主要构件，整体设计逐渐朝向精雅一致的趋势发展（图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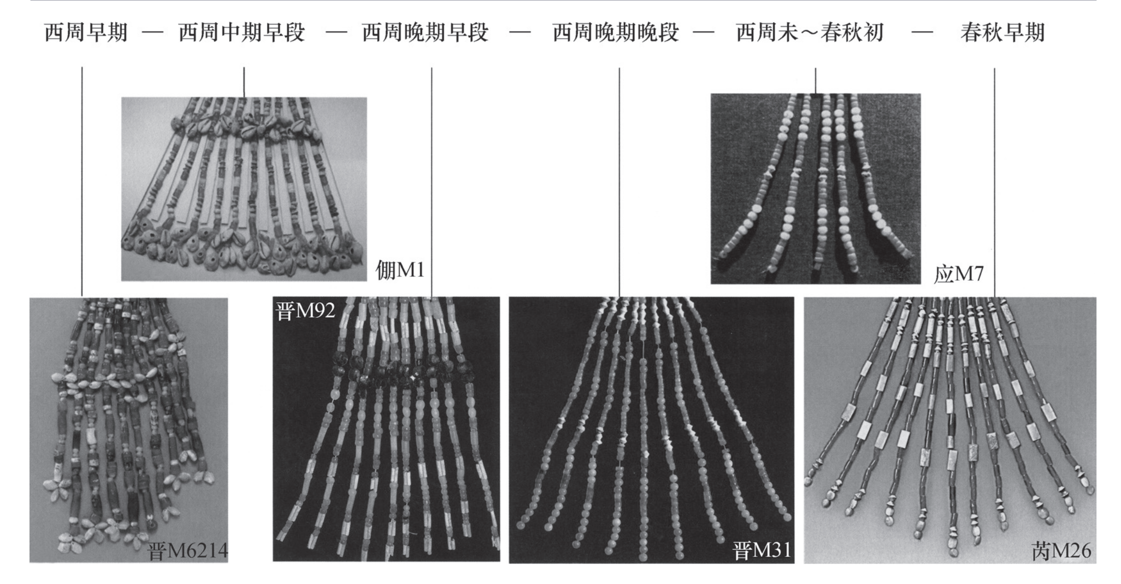


图三三　西周至春秋早期梯形牌饰的形制及装饰发展

（《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第584页）

（二）梯形牌联珠串饰的使用功能及可能源流

迄今为止，梯形牌或梯形牌联珠串饰共出土于22座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贵族墓葬中，其中1座为男性墓、19座为女性墓，另有2座墓主性别不明，推测亦属女性墓葬。在这些出土梯形牌饰联珠串饰的墓葬中，除少数随葬2或5组外，其余皆为每墓一组。由于它们出土时多位于墓主肩部至腰腹部位，因此过去经常被视为“胸佩”[37]或“项饰”[38]，甚至据以进行复原展示。[39]



图三四　西周至春秋早期梯形牌联珠串饰中珠管材料、种类与色彩组合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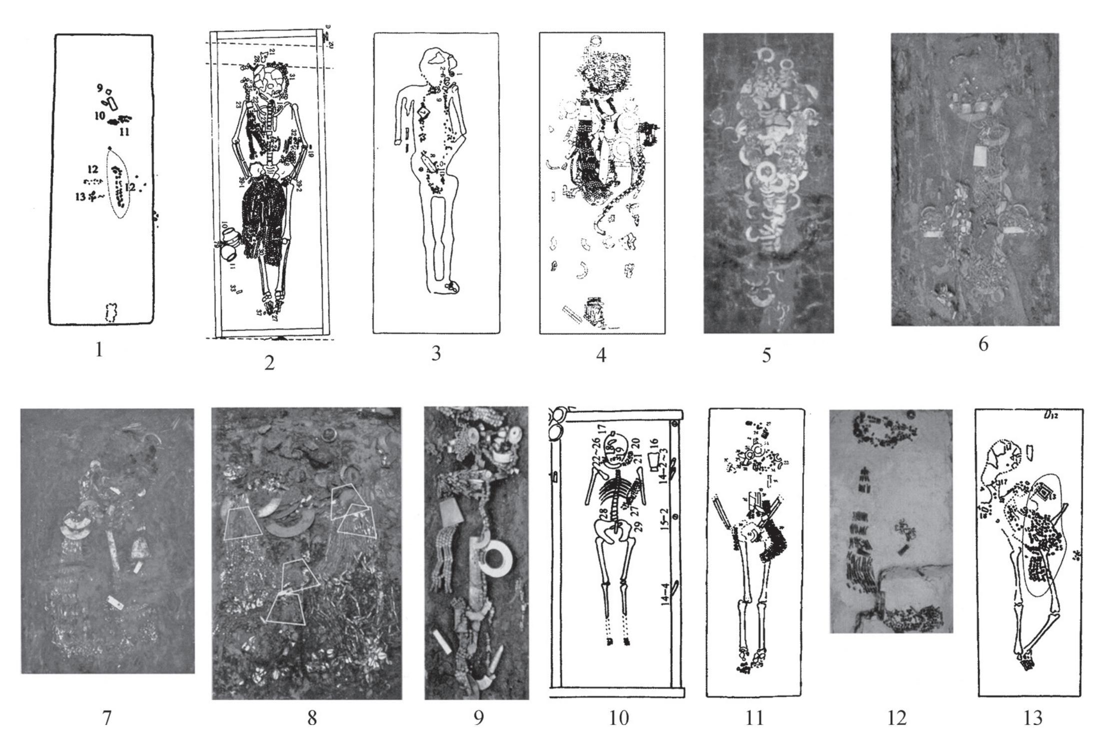
（图版来源同图二六～图三二）

然而若仔细观察目前已发表的14例墓葬平面图或棺内彩照，即可发现除了梁带村M27芮公墓的梯形牌为背面朝上且上下反置出于墓主胸部右侧外，其他13例女性墓葬的梯形牌联珠串饰全部偏置于墓主头肩至腰部的一侧或两侧（图三五）[40]，其中在曲村M6214、北赵M31、北赵M63、横水M1、大河口M2和梁带村M26等墓葬的棺内彩照中，还可以清楚见到梯形牌上方的珠穗皆成束置于墓主头肩一侧，此种佩戴方式明显不同于将上方珠穗左右分梳圈挂于颈项的多璜组佩，却与后世蒙古各族妇女垂挂于传统头饰两侧的颊侧流穗极为类似，由此推测西周女性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梯形牌联珠串饰很可能是墓主所佩戴的头饰。

蒙古妇女传统头饰不仅是族群标志、美的载体，也是显示妇女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因此被称为“游动迁移的首饰盒”。其中分布于漠北的喀尔喀蒙古族以及漠南的克什克腾、喀喇沁、察哈尔、茂明安、苏尼特、乌拉特、鄂尔多斯等蒙古族贵族妇女都盛行在头部佩戴装饰华丽的围箍和颊侧流穗。头饰上的流穗多以方形银饰和大量珊瑚、绿松石和银珠等珠链串接，有时尾端另穿吊银铃；此外左右两边流穗的数量和串珠数目基本相同，佩戴时一般从两颊垂到胸前（图三六、图三七）。[41]

由此可知，蒙古妇女的颊侧流穗与梯形牌联珠串饰除了使用方式相同外，二者的造型设计、色彩配置与组合方式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比性。由于这种以方形或梯形牌提领多股珠炼的颊侧流穗，也可以在黑海北岸乌克兰托沃斯塔（Tovsta Mohyla）墓地发现的公元前4世纪斯基太女性贵族佩戴的金质头饰上见到，推测它们在欧亚草原地区具有相当悠久的发展历史。

综上所述，西周至春秋早期贵族墓葬中以梯形牌联珠串饰置于女性墓主头侧或肩侧



图三五　周代女性贵族墓葬中梯形牌联珠串饰的出土位置

（图版来源参见注释［40］）

1.张家坡M320（左1）　2. 曲村M6214（右1）　3. 曲村M5150（右1）　4. 晋侯夫人M31（右1）　5. 晋侯续夫人M63（右1；左1？）　6. 芮公夫人M26（右1）　7. 大河口霸国女贵族M1（左右各1）　8. 横水倗伯夫人M1（左右共5组）　9. 应国M7（右2）　10. 应国M231（左1）　11. 应国M85（左1）　12. 虢国M1820（右1）　13. 鲁故城M49（左1）



图三六　蒙古族妇女传统头饰

（*The History of Beads, from 30000 B.C. to the Present*, p219）



图三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佩戴华丽头饰的苏尼特蒙古族妇女

（采自*Die Mongolen*, p123）

的现象，不仅不曾见于西周以前黄河或长江流域的佩饰传统，其使用时间和分布范围也不及周代男女贵族皆可佩戴的玉璜组佩，显示此种新兴的人体佩饰既不属于中原本地的佩玉传统，其发展路径也有别于玉璜组佩。因此梯形牌联珠串饰在西周早期阶段的兴起，应与周人和异域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密切相关，而其中最主要的根源即是大漠南北的头饰传统，至于梯形牌联珠串饰的构件组合与装饰设计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各不同阶段的转变，则充分反映它们在一系列“中原化”过程中从粗犷多元到精雅一致的发展趋势。

注　释

[1] a. 黄翠梅. 文化·记忆·传记——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玉璜及串饰［A］. 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东亚考古的新发现［C］.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95～151.

b. 黄翠梅. 彤云皦日·珠玉交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璜组佩［A］. 天地之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与西周玉器精品展［C］.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20～57.

c. 黄翠梅. 流光溢彩·翠绕珠围——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梯形牌联珠串饰［A］. 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三）［C］.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59～600.

d. 黄翠梅. 金属弧形项饰的出现与玉璜串饰的再兴［A］. 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C］. 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5：374～39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J］. 考古，1990（7）：587～594.

[3] 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旅游局. 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J］. 考古学报，2011（4）：525～560.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1980（1）：18～31.

c. 高炜. 龙山时代玉骨组合头饰的复原研究［A］. 海峡两岸古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台北：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321～328.

d. 下靳考古队. 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J］. 文物，1998（12）：4～13.

e. 石金鸣等. 临汾下靳墓地发掘获重要成果［N］. 中国文物报，1998-12-20.

f. 山西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 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99（4）：459～486.

g.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 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 考古，2003（9）：3～6.

[4] a. 陈洪海，格桑本主编. 宗日遗址［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b. 俄军主编.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M］. 甘肃：三秦出版社，2006：61.

［5］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师赵村与西山坪［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70～175，212～214.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干栏式建筑［J］. 考古，2004（6）：6.

c. 刘志华. 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齐家文化玉石器［J］. 故宫文物月刊，2003（8）：97. 另2009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考古工作队队长叶茂林先生陪同下，曾拜访甘青宁各地博物馆，并亲见甘肃定西、会宁、天水和宁夏固原等地征集的素面扇形玉璜.

［6］ 本文有关与西周各期段相应的周王世系主要依据李伯谦. 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18，19.

［7］ a. 卢连成，胡智生. 宝鸡㢠国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b.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简报［J］. 文物，2007（8）：28～47.

［8］ 同［7］b：43～46.

［9］ 卢连成，胡智生. 宝鸡㢠国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45～170.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98～109、166～198.

［11］ 同［1］b：28～52.

［12］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张家坡西周墓地［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60，61，262，263.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张家坡西周玉器［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6～58.

［13］ 同［1］b：32～57.

［14］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虢国墓（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彩版一七.

b. 姜涛，李秀萍. 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的认识与研究［M］. 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8～100.

c. 姜涛，王龙正，乔斌. 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精粹［M］. 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02：2，53.

［15］ 所谓的视觉力场（Field of Force）原理，就是用位置的加强（positional enhancement）和位置的衰减（positional attenuation）强调对象在视觉秩序中的相关位置对于该对象所要传达的讯息种类和讯息量高低之影响. 参见E. H. Gombrich. *The Sense of Order*［M］,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84：155，156.

［16］ a.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07（6）：4，19，20.

b.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J］. 文物，2008（1）：5，16.

c. 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 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原芮国文物珍品［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d. 蔡玫芬，蔡庆良. 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M］. 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

［17］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 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7（9）：29.

［18］ a. 同［1］a：208.

b. 李水城. 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J］. 考古学报，2012（3）：366.

c. 吴振录. 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J］. 文物，1972（4）：62～66.

［19］ a. 乌恩岳斯图.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1～26.

b. 李水城，水涛. 四坝文化铜器研究［J］. 文物，2000（3）：37～38.

c. 林沄. 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2002：1～12.

［20］ a.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J］. 考古，2009（7）：17.

b. 钱耀鹏，周静，毛瑞林，谢焱. 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的收获与意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9.

［21］ 同［1］d：376～378.

［22］ a. 吴振录. 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J］. 文物，1972（4）：62～66.

b. 谢青山，杨绍舜. 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J］. 文物，1960（7）：51、52.

c. 石楼县人民文化馆. 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J］. 考古，1972（4）：29～30.

d. 杨绍舜. 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J］. 文物，1981（8）：50～52.

e. 郭勇. 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J］. 文物，1962（4）、1962（5）：33、34.

f. 王永刚，崔风光，李延丽. 陕西甘泉县出土晚商青铜器［J］. 考古与文物，2007（3）：11～22.

g. 杨伯达主编. 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1）・金银器（一）［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图四，图七.

［23］ a. Jessica Rawson. “*In Search of Ancient Red Beads and Carved Jade in Modern China,*” *Cabiers d'Extrême～Asie 17*［M］, 2008：10，11.

b. 同［1］a：123～144.

c.黄翠梅. 红霞翠影・瑶华缤纷：大甸子墓地的珠管串饰及玉石佩饰［A］.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C］.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73～174.

［24］ a. Emma Bunker.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Tarim Basin Vicinity and its Impact o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II*［M］, 1998：611.

b. 同［19］b：36～44.

c. 同［19］c：1～12.

d. 李水城.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J］. 考古学报，2005（3）：239～278.

［25］ 谢尧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 北京市：文物出版社，2011：73.

［26］ 同［1］d：379～381.

［27］ 同［19］a：211～212.

［28］ a.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 张家川马家原战国墓地2007～2008［J］. 文物，2009（10）：45，图五四.

b.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 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J］. 文物，2010（10）：21，图五二.

［29］ 周原博物馆编著. 周原玉器萃编［M］.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8：93.

［30］ 刘云辉. 周原玉器概论. 周原玉器［M］. 台北："中华"文物学会，1996：15，207，232.

［31］ 同［16］a：19～20.

［32］ 在这21座墓葬中，张家坡M320和鲁国故城M49墓主性别不明，应国西周晚期墓葬资料发表不全，北赵晋国M113和M13的3组和芮国墓地新出的另一组梯形玉牌联珠串饰迄今未见发表.

［33］ 同［1］c：560～585.

［34］ 同［1］c：563～567，576，577.

［35］ 同［1］c：567，572，573，577，578.

［36］ 同［1］c：561～583.

［37］ a. 孙华. 试论周人的玉佩：以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玉佩为中心［A］.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88.

b. 孙庆伟. 周代用玉制度研究・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8.

［38］ a. 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 王朝秘宝：古中原考古文物展［M］. 台北：历史博物馆，2005：89.

b. 同［16］a：16.

［39］ a. 秦潼等. 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在上博展出［J］. 上海文博论丛，2012（2）：13.

b. 蓝玉崎. 害夫簋、害夫钟、宗周钟的赫赫聚首. 典藏古美术，2012（242）：116.

［40］ a. 同［12］a：图四八.

b.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等. 天马—曲村：1980～1989（第二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图五八三，图六一八.

c.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J］. 文物，1994（8）：24.
d. 李文儒主编. 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344.
e. 宿白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96.
f. 同［16］a：6，图四.
g. 谢尧亭. 发现霸国：讲述大河口墓地考古发掘的故事［M］. 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40.
h.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J］. 文物，2006（8）：4，图九.
i. 杨育彬等. 河南出土三代玉器及相关问题［J］. 中原文物，2003（5）：封三～1.
j.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平顶山应国墓地・卷一［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93，659.
k.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上村岭虢国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41.
l.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曲阜鲁国故城［M］. 济南：齐鲁书社，1982：12.
［41］ a. 李春生. 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21.
b. 苏婷玲. 清代乌拉特蒙古族妇女头饰调查［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2）：80～84.
c. 张彤，石红. 倩影婀娜竞风流——清代蒙古族妇女头饰［J］. 文物世界，2003（2）：71～73.
d. 内蒙古腾格里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蒙古族服饰图鉴［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Steppe Culture Elements of North China Embodied in the Aristocratic Body Decoration of Zhou Dynasty

Huang Tsuimei

Abstract: Bead strings with jade *huang* pendants and trapezoidal plaque with multi-colored bead-strings are believed to be significant symbols of social statu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types of decorative jewelry for Zhou nobles.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both shape and function of *huang* pendants of Western Zhou inherited those of Late Neolithic China, however, their components and assemblage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amples of the kind. As for trapezoidal plaque with multi-colored bead-strings worn on sides of the head or shoulders of aristocratic females, their wear-location and assembly patterns have not been found in either the Yellow River or the Yangzi River regions before the Western Zhou. Consequently their

function and source have become interesting topics for discussio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has indicated that the use of carnelian beads, reemergence of *huang* neck pendants and germination of trapezoidal plaque with multi-colored bead-strings have all motivated b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especially stimulus of gleaming and exuberant body adornments rooted from Northern grasslands. Moreover, the transition from a rugged and mixed mien to one that is delicate and uniform as shown in material combination and color assemblage of Zhou body decoration delicate a gradual absorption of the cultural tastes of the Chinese Central Plain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Steppe Culture Elements; Body Decoration; Zhou Dynasty; North China

中亚东北部的乌孙*

谢苗诺夫（Vl.A.Semenov）著[1]　刘汉兴译[2]

（1.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资料研究所，俄罗斯圣彼得堡；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一、前　　言

中国汉代史书中记载，在匈奴—萨尔马泰时期，乌孙这个民族被认为是游牧于罗布泊南部与阿尔泰—萨彦岭高原北部的部落联盟。《汉书》《后汉书》中均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匈奴帝国的缔造者冒顿单于在张掖（甘州）击败了月氏并且征服了与之相邻的楼兰、乌孙，呼揭等西域26个小国（译者注：36小国）。从史料记载可知，月氏的居住地是在敦煌的西部到甘州的东部这一带；楼兰位于罗布泊边缘，是一个绿洲小国；而乌孙则南接楼兰国，北临呼揭（谢苗诺夫，1995：157）。

乌孙还经常被其他经典著作所提及。例如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称他们为亚洲人；托勒密（Ptolemy）称其为伊塞顿人；亨利·安德森（Henry Hudson）则是第一个辨认出乌孙的人（叶列涅茨 Elnitsky，1977：80）。

在匈奴军事大联盟中，月氏和乌孙先后侵入七河地区，后者还建立了一个具有游牧性质的雏形国家。其疆域西及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东到天山支脉，北达巴尔喀什湖岸边，南抵伊塞克湖。赤古城（乌孙首领昆莫所居之处）就位于此。由中国文献可知，乌孙的人口有120000户；其总人口数大概有630000人；士兵总计183000人（俾丘林，1950：190～191）。乌孙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其后它被突厥所征服并成为其附属。大玉兹人和位于伊塞克湖盆地操吉尔吉斯语的人，还有一定数量的乌兹别克人，包括在这个部落联盟中其他部落例如Sary-Uysun，Uyshun等组成了现在哈萨克部落，而这些部落可能与乌孙有密切关系［阿奇舍夫（Akishev），库沙耶夫（Kushavev），1963：139］。

---

* 本文得到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乌孙考古研究”（批准号15BKG013）项目资助，为该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原文名《The Wusun In Northeastern Central Asia》，载《考古学民族学和欧亚人类学》（《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2010（38）: 99～110.

二、遗　　物

七河流域发现的考古遗存，很多与乌孙有关，且已被伯恩施坦，库沙耶夫和扎多纳普热维斯基（Zadneprovsky）等人发掘过。从发现的手工制品、丧葬习俗以及人骨材料来看，都与乌孙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在乌孙时期，还有其他的游牧部落生活在七河地区，如当地的塞人后裔。最早侵入塞人疆土的是月氏人，乌孙紧随其后。根据扎多纳普热维斯基（1992：73～100；1997：73～79）的研究，月氏人的葬俗是把死者埋入经过修整过的地下墓室中。而当地的塞人则是在地面上挖一些简陋的土坑，死者都采取仰卧的方式。因此从地表遗留的痕迹很难区分哪些是塞人墓葬、哪些是乌孙人的墓葬。根据庞培·特罗古斯的记载，乌孙应该称呼为“tochars的国王”更合适一些，即一群生活在中亚东部的游牧部落，他们消灭了由希腊人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因此伯恩施坦和库沙耶夫将这些遗迹称之为“塞人-乌孙文化”或“塞人-乌孙遗迹”。

尤其是那些受到崇拜的大冢，里面埋葬着部落首领，而族属却应为乌孙。扎多纳普热维斯基（1997：82）认为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塔尔加尔大冢就是这样的遗迹。这处遗迹共有444座土冢，其直径4～56米，高0.1～4.5米。1956年发掘了其中的13座规模较小的土冢，这些冢的直径接近10米。1973～1976年，又发掘了其中的6座大冢（直径18～56米，高1.2～4.5米）。这些大冢的墓室形状都是相同的：长3～4.5米，宽2～3米，深0.8～1.2米。墓室的四壁用石头垒砌，顶部用天山云杉原木覆盖。墓室内置木椁，随后墓室用沙土填埋，石块置于其上，接着在土冢上铺满石块，土冢就这样建造完成了。尽管这些土冢都被盗扰过，但还是发现了遗留下来的一些遗物，有陶器、纺轮，带孔的红玛瑙，一块带有双翼山羊的泥质印章，铁刀等。而黄金牌饰在所有的墓葬中均有发现。其中大冢M4共发现了500余件，这些牌饰被缝在染红的皮质衣服上。发掘者马克西莫娃（1980：174～177）认为，这些大冢的时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前4世纪，阿奇舍夫（1983：174～177）则认为时代可能要晚一些，约为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

可以确信，这些葬于塔尔加尔大冢中的人当为乌孙的部落首领，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墓室的规模。这种典型的大冢存在于中亚东部地区，尤其是在斯基泰晚期最为显著，在图瓦地区主要有艾梅尔雷格（曼杰里史塔姆，1992：178～186），苏格鲁格-赫姆1、2和Khayirakan（谢苗诺夫，2003）和奥泽恩-阿拉-别里格（weinstein，1966），蒙古国的昌德曼/乌兰固木等地点。这些木椁均（16～20平方米）由四排原木搭建而成。中型墓室的（面积有6～9平方米）深度2～3米。在木椁旁边或木椁的顶部还有一些石板墓。

据统计，约有90座木椁墓得到发掘，且资料进行了整理，艾梅尔雷格地区墓葬的时代为公元前3～前2世纪。从发掘所得的392具尸骨来看，有306具为成人，86具为儿童，他们都葬于木椁墓中。事实上，所有的木椁墓均被盗扰过，因而不能准确判定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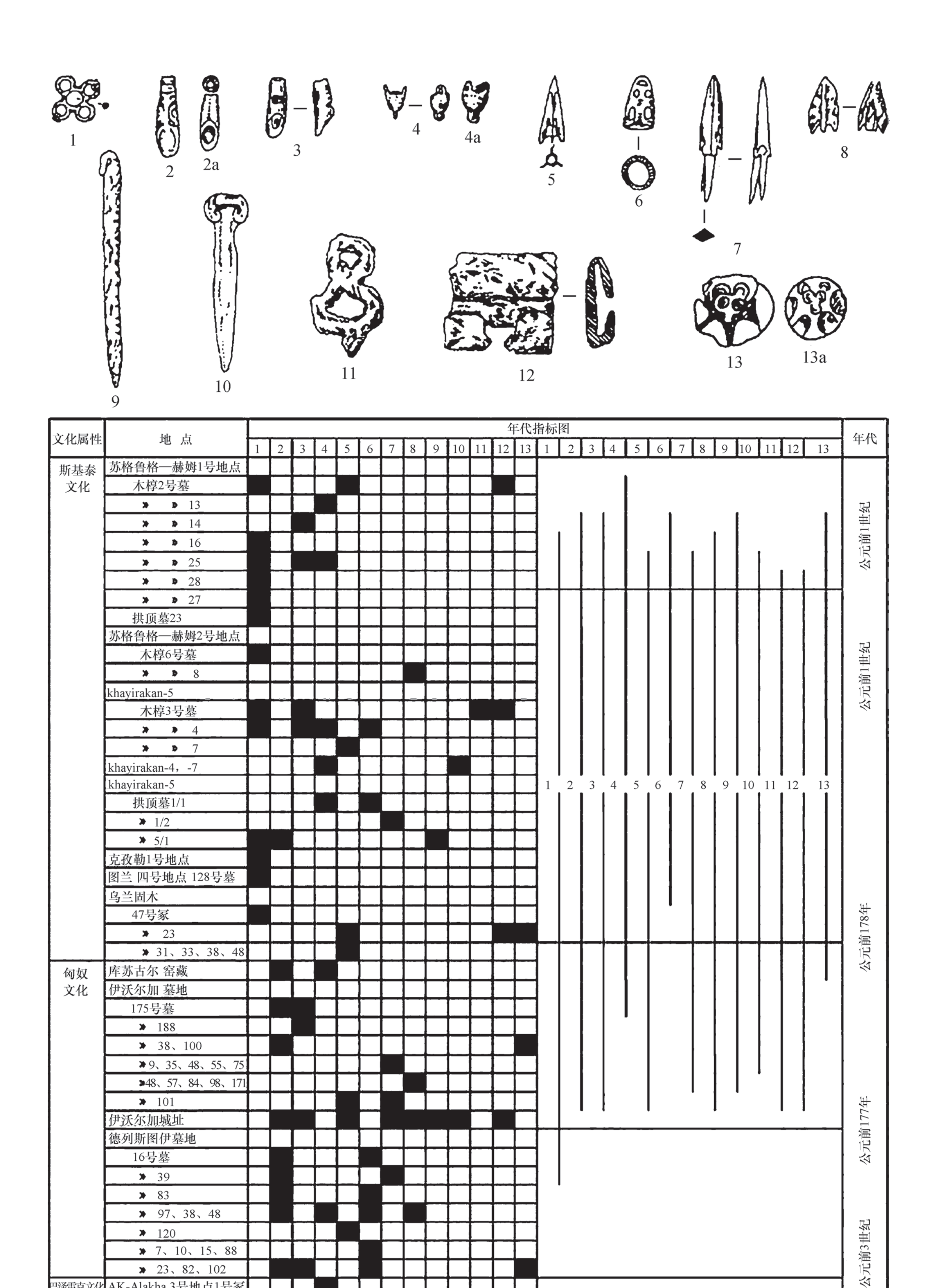
者所处的位置。不过似乎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绝大部分尸骨的左腿是弯曲的（共有153座）。而在82座墓葬中，尸骨置于墓室的右侧。头向西的有117具，向北的有45具，向南的有37具。有6具尸骨的葬式是俯卧，两具采用的是仰卧。通过我们的观察，发现有的骨架是经过人为扰动过的或者尸体长时间暴露在野外（为使骨架变的凌乱，一些尸体放在野外让狗或狼来啃噬）之后的二次葬。在木椁墓和石板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约200余件）、木器、铁器和青铜武器，还有缝在衣服上的黄金制品，片状干红漆及铜镜等。

曼杰里史塔姆（1983：46～48）指出，在艾梅尔雷格地区，斯基泰类型的木椁墓和石板墓同七河地区的乌孙墓及出土的遗物时代基本相当，这些遗物有：顶端为球状的铁簪、带柄铜镜、长方形带扣、“L”形的青铜器和骨坠饰，此外还有表面有凹槽且饰有彩绘的陶器。

从中亚东部到七河地区发现的乌孙手工制品同在苏格鲁格-赫姆、图瓦及蒙古国的西北部发现的手工制品非常相似。这些遗物包括顶端为球状的铁簪、鎏金饰品、耳坠、表面有凹槽并饰有彩绘的陶器、形制各异的带柄（柄部为各种动物形象）铜镜、乌孙的典型器物黄金耳环和铜条，木桌（四条腿），陶纺轮，长方形青铜牌饰，砾石（其也曾被塞人广泛使用），剖面为菱形的镞。后来这种镞在哈萨克斯坦地区也有所发现（KapchigayⅢM20冢），它们有可能是在后来匈奴扩张的时候被带到该地区的。它们偶尔也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和图瓦地区的斯基泰晚期墓葬中出土（谢苗诺夫，1999：177～121）。

传统观点认为，位于阿尔泰—萨彦岭高原的斯基泰文化于公元前3世纪完全消失，并被一种新的文化所代替，而该文化与中亚东部的蒙古利亚人种是有关系的。然而从考古发现来看，公元2世纪甚至公元前1世纪时存在于图瓦、蒙古国的西北部的斯基泰文化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先前在乌尤克-萨格林文化中所认定的墓地以及单个墓葬的年代后来在分期表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其中包括匈奴的手工制品、仿制品以及斯基泰和匈奴所共有的典型遗物。我们在苏格鲁格-赫姆1、2号地点、Khayirakan（M4、M5号土冢）昌德曼/乌兰固木等地的木椁墓、石板墓及拱顶墓中挑选出了13件典型遗物（图一）。

在一些匈奴墓葬中经常发现由五个圆环组成的透雕牌饰，这暗示着乌尤克-萨格林地点出土的大部分器物属匈奴文化时期（图一，1）。这些手工制品有：苏格鲁格-赫姆1、2地点发现的骨质匙形带扣（图一，3），微型青铜鍑形坠饰（图一，4），尾部有孔的三棱青铜镞（图一，5），三棱铁镞（图一，8）和质地坚硬的长方形铁带扣或刑具（图一，12）。在这些遗物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微型青铜鍑形坠饰，其在苏格鲁格-赫姆，Khayirakan和库苏古尔窖藏中都有发现（图一，4a）,按照德夫列特（1980：14）的观点，这类遗物的时代在公元前2～前1世纪。此后的匈奴窖藏中也发现了透雕牌饰和匙形青铜带扣（图一，2），这些遗物的仿制品在Khayirakan 5号拱顶墓和图瓦1号墓均有发现（图一，2a）。相同的器物组合还有五个圆环组成的青铜透雕牌饰和一把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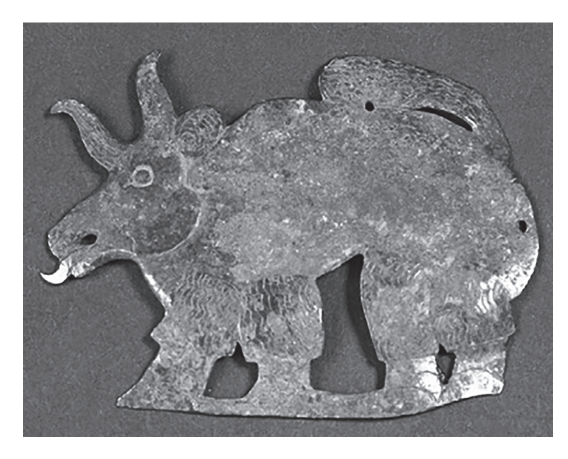
图一 图瓦地区乌尤克-萨格林文化与环贝加尔湖地区匈奴文化的联系

1. 透雕牌饰 2、2a. 匙形青铜带扣 3. 骨质匙形带扣 4、4a. 微型青铜鍑形坠饰 5. 三棱青铜镞 6. 透雕的青铜坠饰 7. 骨镞 8. 三棱铁镞 9、10. 铁刀 11. 铁带扣 12. 长方形铁带扣 13、13a. 扣饰

刀（图一，9），其中铁刀的形制与伊沃尔加遗址（达维多娃，1995：186）、米努辛斯克盆地的特斯（Tes）墓地出土的铁刀十分类似。在Khayirakan其他墓葬中也发现了由五个圆环组成的青铜透雕牌饰、骨质匙形带扣、微型青铜鍑、尾部有孔的三棱镞，透雕的青铜坠饰（图一，6）、底部分叉的骨质镞和铁带扣（图一，12）等遗物。这些遗物表明该墓地在文化属性上最接近匈奴文化，但缺少斯基泰时期的铜镜或带有野兽风格的手工制品。同时还包含了从木椁墓、石拱顶墓中伴出或采集到的乌尤克-萨格林陶器和数量众多的铁器和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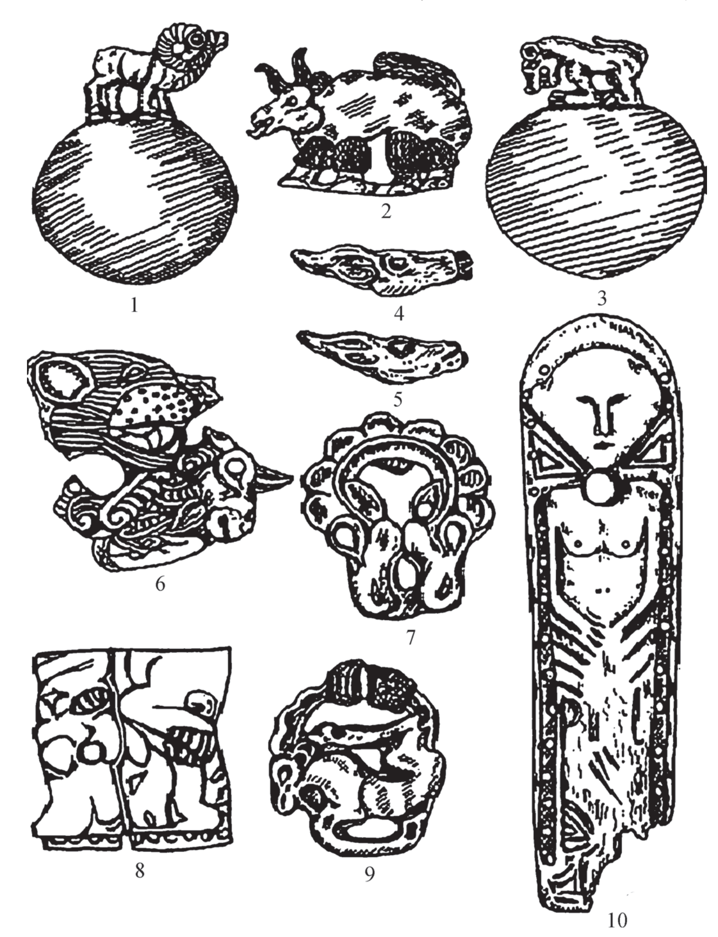
蒙古国西北部的昌德曼/乌兰固木发现的墓地属乌尤克-萨格林文化。这批墓葬有23座木椁墓，另有17座石板墓，且均已被发掘过。最初这些墓葬的时代被定为公元前7～前3世纪（策温道尔吉，1980：95～100）。随后诺夫格洛多娃（1989：278）更精确地定为公元前5～前3世纪。她的观点是：昌德曼/乌兰固木遭到匈奴人入侵后，当地人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因为至少有5座木椁墓中发现了典型的匈奴手工制品，如镞的末端有孔（图一，5）、质地坚硬的铁带扣（图一，12）。而在M23这座木椁墓中，则发现了一枚扣饰，其上饰有一熊头图案（图一，13）。这种扣饰在伊沃尔加墓地M100、M138（图一，13a）和德列斯图伊M102墓葬中都曾发现过。后两处墓葬还出土了三个匙形带扣、青铜透雕带饰、印有双马打斗图案的牌饰和一枚五铢钱。很显然，就整个墓地而言，这样的器物组合其时代下限为公元前118年。也正因为德列斯图伊墓地出土了几枚这样的钱币（米尼亚耶夫，1998：72～75），故而米尼亚耶夫认为整个德列斯图伊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并比同时期的伊沃尔加墓地文化面貌要复杂。然而达维多娃（1996：24、25）则认为伊沃尔加墓地的时代为公元前2～前1世纪，因为根据乌尤克-萨格林的土冢年代与伊沃尔加墓地（包括遗址区和墓葬区）的对应关系，以及包括铁器（图一，8～10、12），三棱镞（图一，5）以及青铜和骨质的匙形带扣，达维多娃认为昌德曼/乌兰固木墓地的时代为公元前2～前1世纪（可能与公元前117年冒顿单于入侵月氏有关）。昌德曼/乌兰固木发现的另一组遗物则更接近德列斯图伊出土的遗物，这其中包括镂空的锥形坠饰（图一，6），微型青铜鍑和复制品（图一，4），横截面为菱形的骨镞和底部分叉的镞（图一，7）以及带有熊面的扣饰（图一，13）。这些遗物最晚可到公元前118年,而年代最早的是由五个圆环组成的牌饰，这种牌饰在匈奴墓葬中还没有发现，这是不确定的（显然这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而其可能最晚是7世纪。事实上，一块来自图瓦地区的牌饰曾作为一个耳环发现于Sainsky M5中，而在彼尔姆地区发现的牌饰与萨珊王朝的库思老二世钱币同出，其时代能追溯到625年（Goldina, Vodolago, 1990：37，29）。五个圆环组成的透雕牌饰，他们后来的衍生物在普热沃文化中发现，普热沃文化和罗马早期时代基本相当（安德烈耶夫，1992：167～189）。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装饰品是在萨尔马泰人扩张时传播到西方的。

在苏格鲁格-赫姆，一般的斯基泰墓葬器物的组合，手工制品的特点是动物风格的装饰，包括出现在陌生的乌尤克-萨格林传统的某些装饰上。其中一件青铜牌饰上有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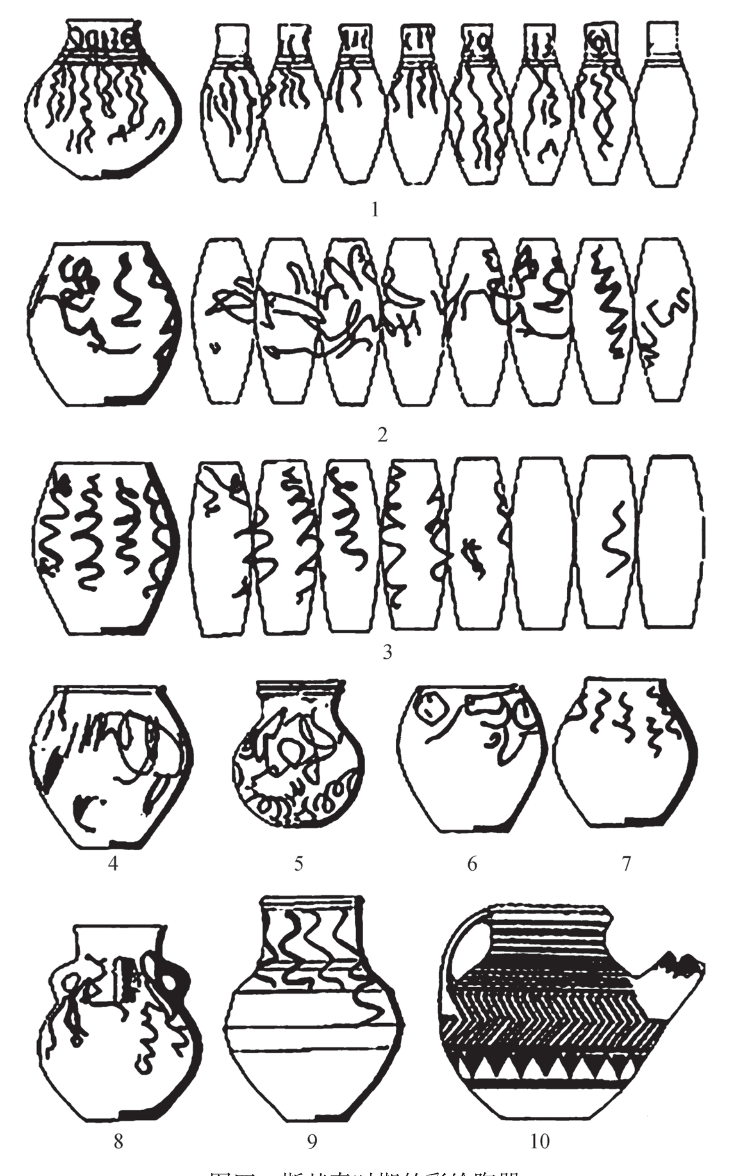
图二　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木椁墓M7，出土的青铜牦牛牌饰

牛的形象（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木椁墓M7；图二）,和牌饰共出的还有铜镜，铜镜顶端有一个猫科类食肉动物的形象（图三，3）。在类似的木椁墓中出土的遗物中，还有三棱的青铜镞、青铜鹤嘴斧、铁（短剑）及心形盾牌及铁带钩等。在附近的木椁墓M5中还发现了彩绘单鋬短流罐，其与中国新疆发现的同类器物有一定的联系（图四，10）。这类组合还包括表面饰有捕食场景片段的骨带扣（图三，6；图五）、缝制在衣服上的黄金牌饰，饰有曲线纹的长颈罐。这种长颈罐在



图三　苏格鲁格-赫姆墓地中木椁墓出土的遗物

1～5、7、9. 青铜　6、8、10. 骨质



图四　斯基泰时期的彩绘陶器

1.Khayirakan地点　2、3、5～7、9、10. 苏格鲁格-赫姆墓2号地点　4、8. 苏格鲁格-赫姆墓1号地点出土

图瓦和戈尔诺-阿尔泰地区最为典型（图六）。在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木椁墓M29中发现了典型的斯基泰金器、青铜饰品和陶器，但是一件刻有人物形象的骨牌饰，其既不是斯基泰文化的遗物，也不属于匈奴文化的遗物（图三，10）。

陶器仍然是随葬品中的大宗，在Khayirakan和苏格鲁格-赫姆1、2号地点，共出土了119件陶器。根据V.F.Gening（1992：15～45）对这些陶器进行测量的数据，可分为八类。

从外形上来看，这些陶器大致可分为两组：细颈圆腹壶和大口罐。前者又可细分为五个类型，后者则依据形状的差异分为两个类型：敛口罐、侈口罐（图六）。它们

作为一个群体，在分类上并没有考虑其纹饰的差异（图七）。Sagly和阿尔泰类型陶器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巴泽雷克类型陶器较明显。阿尔泰类型陶器的轮廓大体上是相似的，其中一些陶器和第一组中的第一类型和第五类型是相似的。然而，阿尔泰类型陶器和这两型陶器比起来其颈部要更长些，同时陶器的高也明显大于其最宽处；像这种比例的陶器还见于尤斯图德，Sailyugem 和乌兰德雷克，当然在这些陶器组合中，还有矮胖短颈壶和大侈口罐（谢苗诺夫，200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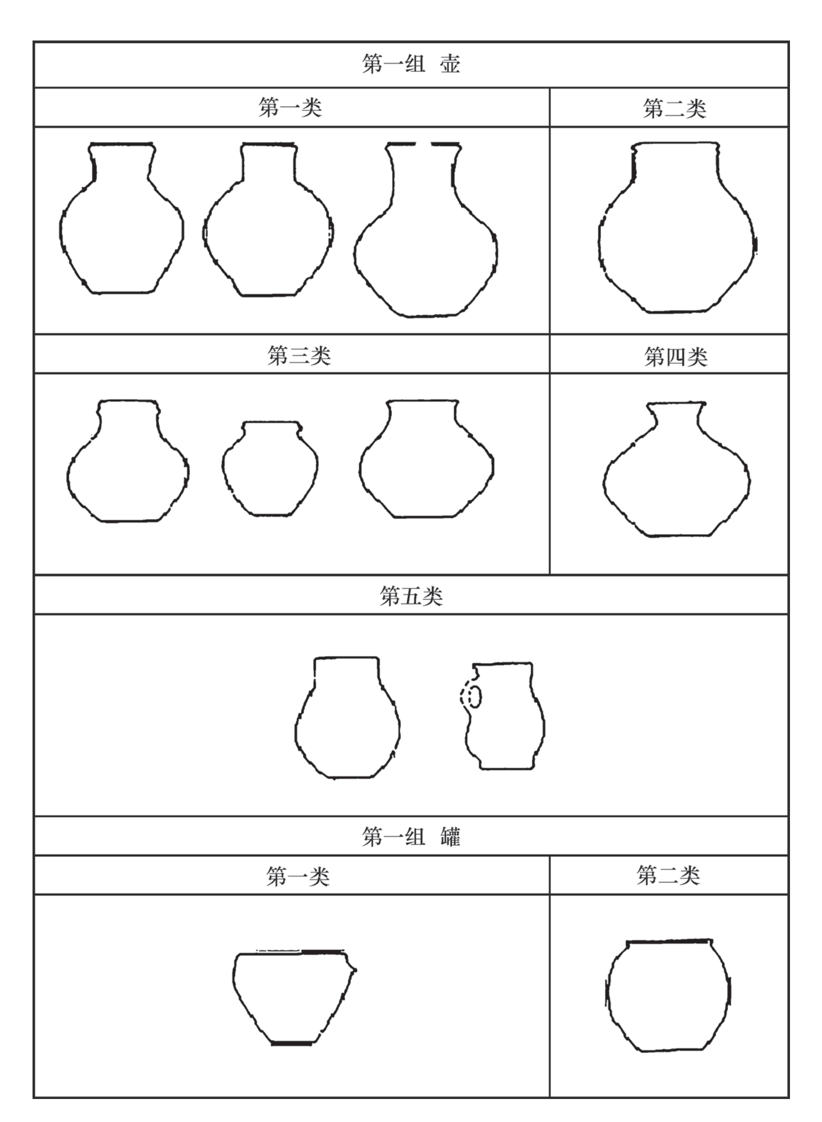
图五　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木椁墓M5出土捕食场景的骨质带扣

许多巴泽雷克类型陶器为大侈口，且颈部较长，整体形状类似漏斗。在图瓦（艾梅尔雷格，苏格鲁格-赫姆，Khayirakan）、蒙古（昌德曼/乌兰固木）、阿尔泰（Bikeh-1, Kara-Koba，尤斯图德，阿拉-格里3号地点，乌兰德雷克，Katon，克孜勒-达尔-1，Tashanta）等发现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彩绘陶器（库巴耶夫，slyusarenko，1990：185～192；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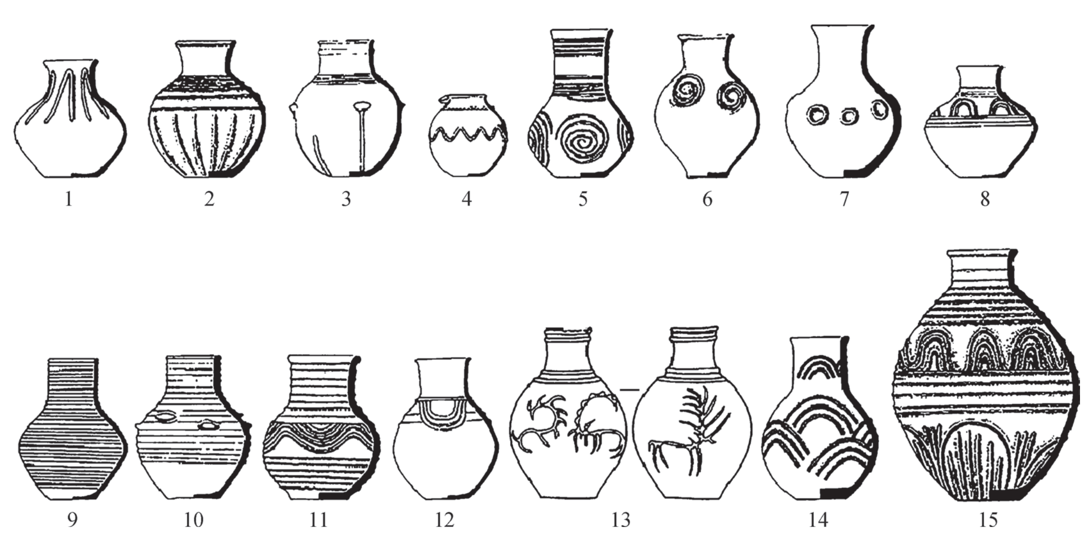
其中出自苏格鲁格-赫姆和Khayirakan的陶器，器表有人工绘制的曲线（图四）。诺夫格洛多娃认为一些更复杂的图案代表了一种未知的字母（昌德曼/乌兰固木木椁墓M23），类似风格的陶器还见于Tashanta2号地点的M4大冢，以及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而尤斯图德22地点的M1墓葬中出土的陶罐，其表面装饰的波浪纹与昌德曼/乌兰固木M47中发现的陶罐上的纹饰很相似。此外，在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出土的绘有几何形图案的单鋬短流罐与中国新疆绿洲出土的陶器很相似（图八）。这种单鋬短流罐的形制还与塔尔加尔M5出土的罐很相似。

在中国新疆发现的斯基泰类型的（the Chow Hugo culture）彩陶上的装饰是完全不同的。器表绘有曲线，同时还有几何形图案，且中间填以三角形纹、折线纹、圆与直线的垂直条纹等（图八）。在新疆西部和西北部的乌孙遗址和墓葬中均发现过彩陶，这些地点是KapchigayⅢ（阿奇舍夫，库沙耶夫，1963：175～182），ShurbaratⅠ（Nurmukhanbetov，特里福诺夫，1989：57～61）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中部城市纳伦的Ketmen-Tyubeg盆地斯基泰类型墓葬等。然而这些地区发现的彩陶，部分原因是受到中亚西部农业文化的影响（扎多纳普热维斯基，1992：73～95）。他们有可能是在公元前2～前1世纪时从伊犁河谷带入到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图瓦的中部和东部，蒙古西北部和俄罗斯阿尔泰的中部和东部地区）。

陶器除了能为死者盛放食物和水以外，还是丧葬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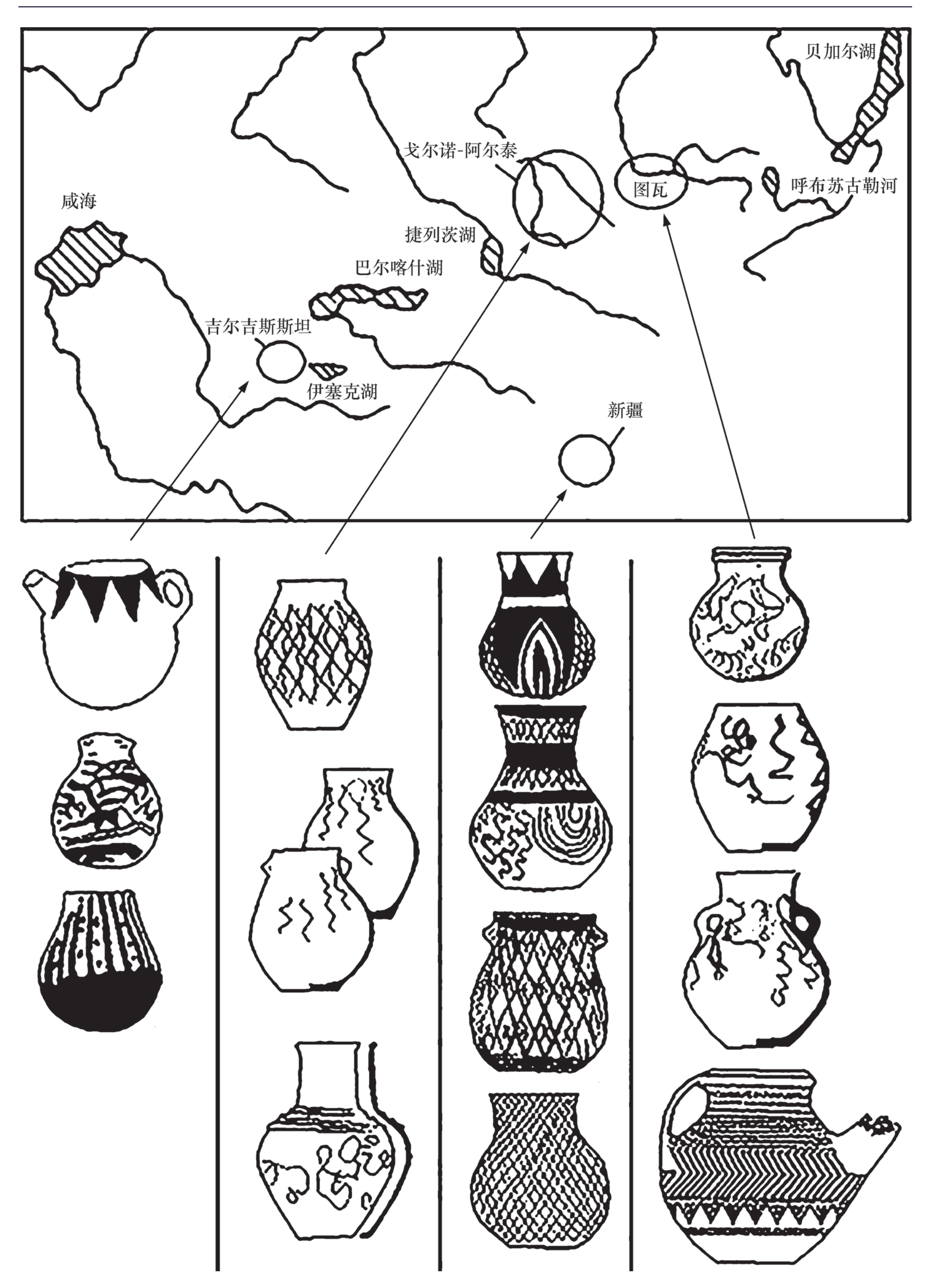


图六　苏格鲁格-赫姆1、2号地点和Khayirakan地点出土的陶器的分类



图七　萨格林文化奥泽恩-阿拉-别里格类型墓中出土的彩绘装饰的陶器

（1、3、5、6、8～10、12. 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　2、7、11、14、15. Khayirakan　4.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　13. 乌兰固木）



图八　彩绘陶在亚洲中部分布示意图

合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区分性别。男性墓葬中一般随葬武器，主要有一把弓和多个镞、一把斧头和一把短剑，其他的器物组合则为女性专用。由于墓葬盗扰严重，大部分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存留下来的随葬品既不是盗墓者的疏漏也不是他们所丢弃的。在某些情况下，有銎的青铜鹤嘴斧是仅剩的随葬品；而股骨上的绿色氧化物斑点则是唯一能证明墓葬里曾随葬匕首的证据，此外还有镞、弓和箭囊。依据丧葬习俗的标准，任何的手工复制品或其他物品都可以通过虔诚的许愿所替代。在萨格林/乌孙木椁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是镞，有时还能发现保存完好的弓箭。

在图瓦中部的Sargy-布伦发掘了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斯基泰人墓葬，墓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弓。在中亚东部地区，早期游牧部落在匈奴（匈奴人的弓与斯基泰人有所差异）入侵之前，弓箭有一个得到改进的机会。Sargy-布伦弓有瓣形截面，弓是用白桦树上最结实的那部分制作的。这把弓的长度为1米，宽为0.4米。弓弦安装在两端扁平状最外围的部分。弓的内部有个凸面，用鱼皮（江鲟？）包裹着。整个弓也都被鱼皮包裹着，由于气候干燥的原因，残存了4～5厘米宽的弓背。在弓的两端刻有凹槽用于固定弓弦，箭囊内有十枚镞，箭囊与皮带相连。皮带由一个青铜带扣和八个青铜牌饰组成。所有的箭杆（7支桦木质，3支由针叶树木制造）都保存完好，它们的平均长度为70厘米。所有的箭杆在靠近羽毛的位置都绘有几何形图案（谢苗诺夫、凯鲁诺沃雅，1990：42、43）。

在斯基泰晚期（乌孙时期）同样的弓仍在使用，在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发现了一座木椁墓，编号为M29。墓主为男性，墓中发现了一件外表包裹着鱼皮的弓，其置于死者胸部。衣服上有金箔牌饰，还发现了一件残损的鹤嘴斧以及皮带周围的短剑。图瓦境内的Kholash，这里毗邻阿尔泰山脉，此处发现的M83，墓中出土了被剥掉的鱼皮和木弓碎片。这座合葬墓中的另一具尸体已被置于另外一座用石板围成的墓葬之中。随葬的两件陶器（表面上的彩绘有所保留）的器型和纹饰与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出土的完全一致。这座墓葬中出土的弓长127～130厘米，鱼皮宽4厘米。弓的两端保留了下来，其余部分均已腐烂（谢苗诺夫，1997：15～20）。斯基泰时期的图瓦地区，这里的游牧部落无论在弓的形状及大小上，都能制造出更符合实际需要的弓。

镞既有青铜的，也有骨质的。为猎取动物的毛皮，当时的人们还用木头制作较钝的镞，即所谓的“托马尔斯”（tomars）。青铜镞共有两类：有翼类和有銎类。前者还可分为三翼形、三棱有翼形、三棱形，值得一提的是，三翼带銎形同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遗址和德列斯图伊墓地出土的匈奴的镞很相似（图九）。

在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发现的一座木椁墓——M6中出土的铁镞（共有六枚），他们都是三翼镞且翼部的尾钩朝下。类似的三翼铁镞在伊沃尔加墓地也有所发现，与这些镞的年代相同的是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和图瓦地区的墓葬。

骨镞可分为四型：三棱形、菱形、有翼形、有銎形（后者还包括子弹形镞），一些标本为菱形镞，尾部分叉或者镞底部有凹槽以便于固定铤。

类型	铜			铁	骨		
	三翼镞	三棱镞	三棱有翼镞		三棱镞	弹形镞	菱形镞
A							
B							
C							

图九　公元前3～前2世纪图瓦地区木椁墓出土的镞演变形式

［A-尾部带有铤，B-尾部有銎，C-底部有分叉（所有的标本纳入各自类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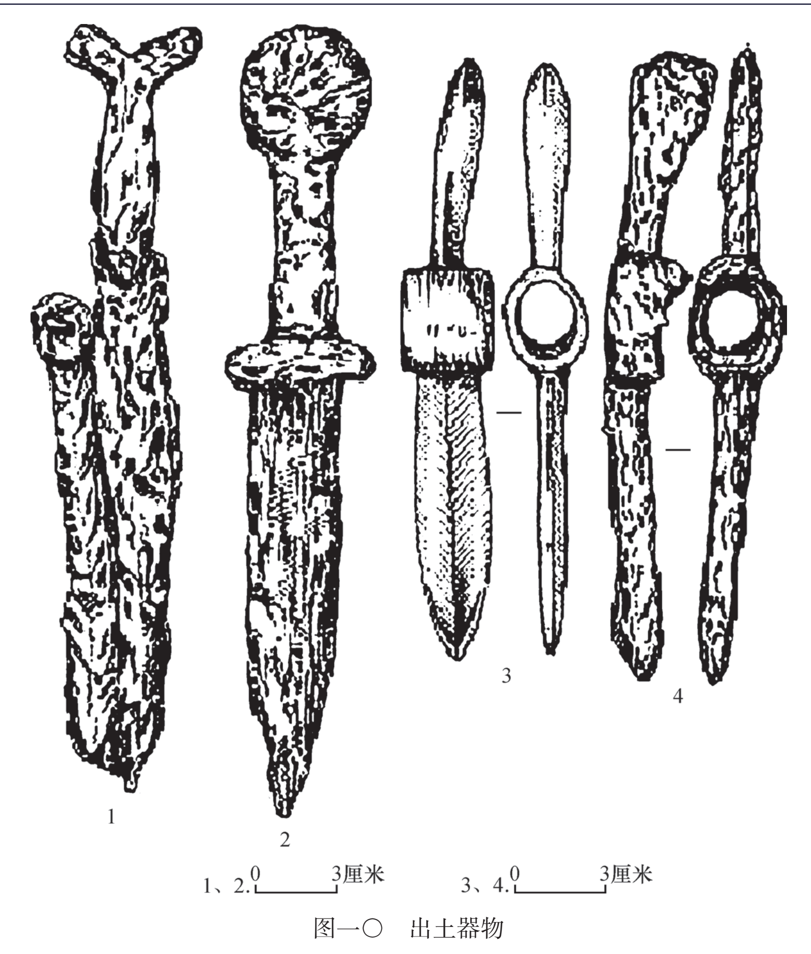
近身战斗武器，如短剑、鹤嘴斧为青铜制造，但更常见的武器是铁质的。其中时代较早的青铜器被保留下来，他们的形状要比其他的青铜器要小。而铁质武器的保存状况虽较差，但尺寸还是较为清楚（图一〇）。

女性墓的随葬品通常有：皮质的小袋子或梳妆盒，梳妆盒里一般有一面铜镜，一把梳子和一把匕首或者他的替代品（锥子或针）。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女性墓葬中的三件组合”。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也可以把相关的武器说成“男性墓葬中的三件组合”。或许因为盗墓者很少拿铜镜的原因，所以铜镜在女性的墓葬中出土的最多。

在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和Khayirakan，共发现了两类铜镜。第一类是奖牌形状，可分为三型：①镜的一侧有不同形状，镜柄中间有孔（图一一，16）；②柄部位于镜的一侧，上面刻有动物纹或素面（柄的反面光滑但是有凸纽）（图一一，17）；③由于人为原因，故意将柄折断。在这个边缘部位有2～3孔或者更少的的孔，以便于将铜镜固定在皮带上（图一一，18）。

第二类为圆盘状，且在镜的背面有一桥形纽。从形制上来看，这些镜的时代均较早（图一一，15）。

短刀有青铜和铁两种质地，其整体形状呈流线型，刃部一直延续到柄部，且柄首的形状也各不相同，目的是为了便于挂在皮带上。通常柄首没有装饰动物风格的纹饰（图一一，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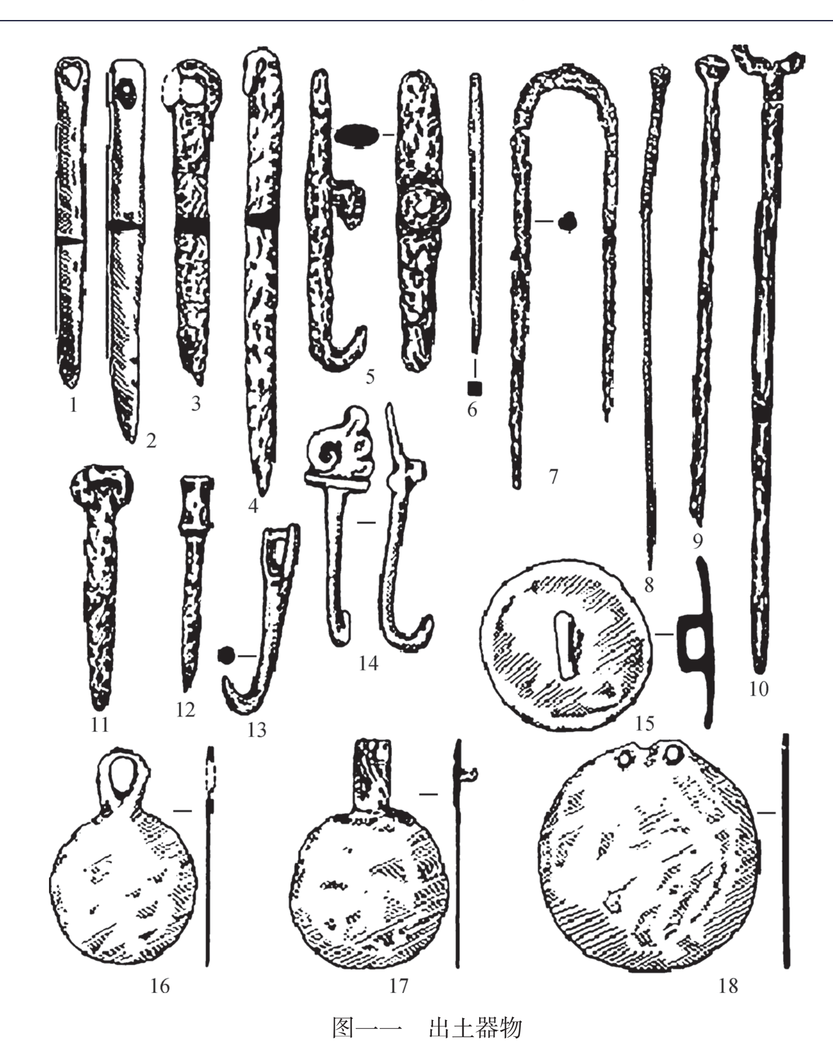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出土器物

1. 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铁短剑　2. Khayirakan 地点铁短剑　3. 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铜鹤嘴斧　4. 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铁鹤嘴斧

锥子茎部绝大多数为铁质，其柄部是用羊趾骨制作的（图一一，12）；青铜锥偶尔也会发现（图一一，16）。

把木齿粘接在一个圆形或者扁平的手柄里以便握在手里，梳子是由这两种形状组成的。一件出自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的一座木椁墓中（M14），另一件则发现于奥泽恩-阿拉-别里格1号土冢。其中前者（M14）还出土了一些铁长簪和顶端为球状的簪。高大的桦皮帽和高发髻是用一些U形的簪来连接的（图一一，7～10）。桦皮帽和其他的遗物在墓葬中时有发现，然而发髻却已荡然无存。螺旋状的青铜耳环在墓葬中也较为常见（一对形状相同的耳环由金丝编成）。无论是男性墓，还是女性墓，均出土有这种不同形状的青铜和铁质带钩，以便于附带武器及不同的流苏件和其他物件（图一一，5、13、14）。

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发现的两座斯基泰贵族木椁墓，其编号为M26、M29，发现的男性服装基本能够复原。其中M26发现的是一件武士的衣服，上面装饰着一百多件的



图一一　出土器物

1～4.匕首　5、13、14. 带钩　6、11、12. 锥子　7～10. 簪子　15～18. 铜镜（1～11、13、16～18为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出土，12、14、15为苏格鲁格-赫姆2号地点出土；1、2、6、8、13～18为铜质，3～5、7、9～12为铁质）

黄金牌饰和鎏金贝壳。而在颅骨附近，还放置了23件金质鹰牌饰，其中22件分上下两行排列在布质的王冠上。在王冠的中央附着一个长9厘米，宽5厘米大小的徽章。在颈椎处摆放着一个鎏金的铁项圈。衣服的两侧装饰有16块蹲踞形花豹牌饰，皮带上附有大型狮头黄金牌饰及20个贝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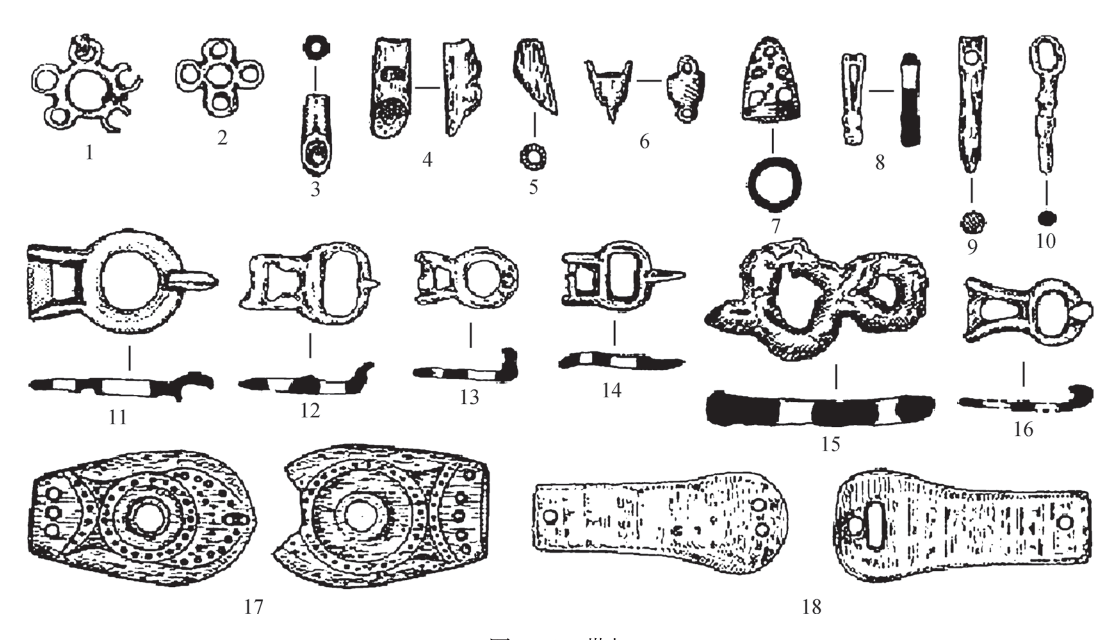
鞋子上饰有几何形的黄金牌饰和黄金带状物，皮带上挂有鹤嘴斧和铁短剑（谢苗诺夫，1998：160～163，图一二）。不同的青铜舌状带扣、五个圆环组成的牌饰都排列在薄薄的皮带上，“8”字形带扣、各种骨饰扣、铃铛、“L”形饰物、匙形青铜器及骨吊坠构成了这件特有的皮带套件。该墓出土的大部分遗物同匈奴墓葬、七河地区的乌孙墓葬中的遗物很相似（图一三）。

有一件手工制品可能代表了乌孙的艺术水平。其为一件骨牌饰，长15厘米，宽5厘



图一二　墓葬平面图及随葬品

1. 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木椁墓M26的平面图　2. 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木椁墓M26武士衣服上的装饰　3. 巴克特利亚Khalchiyan墓葬中出土的服饰　4～11. 木椁墓M26出土的黄金饰品



图一三　带扣

1、2、5、6、8～13. 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　3、4.Khayirakan地点苏格　7、9、14～18. 鲁格-赫姆2号地点（1～14、16为铜质，17、18为铁质）



图一四　苏格鲁格-赫姆1号地点木椁墓M29出土的虚拟人形骨牌饰

米，上面饰有虚拟的人物形象（图一四）。边缘部位还有很多孔，这可能是便于固定在衣服上或者皮带上。这件骨牌饰描绘的是一位女性，脸为三角形，前额较高，乳房突出，武器折叠置于腹部。牌饰的下半部分刻有人字形，只有腿部没有表现出来。这种遗物至今还未在斯基泰和匈奴墓葬中发现。

直到今天人们还关注着乌孙和塞人的迁徙路线，他们从叶尼塞河上游盆地来到七河地区，并通过阿尔泰-萨彦岭地区越过额尔齐斯河来到了斋桑湖附近。这里的移民受到了卡拉苏克文化的强烈影响（Samashev，1987：95～104）。

附记：

Liu Han Xing

I've read your letter and I'm glad to share this knowledge with our respected chinese colleagues. I give my consent to translate on Chinese and publish this article "The Wusun in northeastern Central Asia". I think that would be a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sides.

With best regards

Vladimir Semenov

参考文献

Akishev K.A. *Drevneye zoloto Kazakhstana*［M］. Alma-Ata: ONER, 1983

Akishev K.A., Kushayev G.N. *Drevnyaya kultura sakov i usunei doliny reki Ili*［M］. Alma-Ata: Izd. AN KazSSR, 1963-

Andraloj M. Cmentarzysko ludnoGci kultury przeworskiej w Pruchnowie, stan. 23, gm. Radziejów Kujawski, woj［J］. *Wáocáawek. Sprawozdania Archeologiczne*, 1992(44): 167–180.

Bichurin N.Y.（Iakinf）. Sobraniye svedenii o narodakh［A］. *obitavshikh v Srednei Azii v drevniye vremena, vol. II*［C］. Moscow, Leningrad: Nauka， 1950

Davydova A.V. *Ivolginskiy arkheologicheskiy kompleks. Vol. 1: Ivolginskoye gorodische*［M］. St. Petersburg: Sankt-Peterburg. fond "AziatIKA", 1995

Davydova A.V. Ivolginskiy arkheologicheskiy kompleks. Vol. 2: Ivolginskiy. mogilnik. Ivolginskii arheologicheskii kompleks［A］. St. Petersburg: SanktPeterburg. fond "AziatIKA", 1996

Devlet M.A. *Sibirskiye poyasnye azhurnye plastiny II v. do n.e. - I v. n.e*［M］. Moscow: Nauka（Svod arkheologicheskikh istochnikov; D. 4-7）, 1980

Elnitsky L.A. *Skifiya Evraziiskikh stepei* [M]. Novosibirsk: Nauka， 1977

Gening V.F. *Drevnyaya keramika. Metody i programmy issledovaniya varkheologii* [M]. Kiev: Naukova dumka, 1992

Goldina G.D., Vodolago A.V. *Mogilniki nevolinskoi kultury v Priuralye* [M]. Irkutsk: Irkutsk. Gos. Univ, 1990

Kubarev V.D., Slyusarenko I.Yu. Raspisnye sosudy iz kurganov urochischa Bike [A]. *In Arkheologicheskiye issledovaniya na Katuni* [C]. Novosibirsk: Nauka, 1990: 185-192.

Maksimova A.G. Kurgany bliz Talgara. *Arkheologicheskiye issledovaniya drevnego i srednevekovogo Kazakhstana* [M]. Alma-Ata: Nauka KazSSR, 1980: 114-122.

Mandelstam A.M. Zametki ob arkheologicheskikh pamyatnikakh usunei [A]. *In Kultura i iskusstvo Kirgizii: Tezisy dokladov, iss. 1* [C]. Leningrad:. 1983: 46-48.

Mandelstam A.M. Rannie kochevniki skifskogo perioda na territorii Tuvy [A].*In Stepnaya polosa aziatskoi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oye vremya* [C]. Moscow: Nauka, 1992: 178-196.

Minyaev S.S. *Dyrestuiskii mogilnik* [M]. St. Petersburg: Sankt-Peterburg. fond "AziatIKA", 1998

Novgorodova E.A. *Drevnyaya Mongoliya* [M]. Moscow: Nauka, 1989

Nurmukhanbetov B.N., Trifonov Yu.I. Novye pamyatniki sakskogo vremeni bliz g. Alma-Aty [A]. *In Problemy arkheologii skifo-sibirskogo mira* [C].Kemerovo:Izd.Kemerov. Gos. Univ., 1989: 57-61.

Samashev Z.S. Pamyatniki kulaiurganskogo tipa [A]. *In Arkheologicheskiye pamyatniki v zone zatopleniya Shulbinskoi GES* [C]. Alma-Ata: Nauka KazSSR, 1987: 95-104.

Semenov Vl.A. Tuva v epokhu pereseleniya narodov (nachalnyi etap) [J]. *Uchenye zapiski TNIIYLI, iss*, 1995(18): 157-163.

Semenov Vl.A. *Mongun-Taiga* [M]. St. Petersburg: Izd. IIMK RAN (Arkheol. izyskaniya; iss. 54), 1997

Semenov Vl.A. Vooruzheniye i voinskii kostium skifov Tuvy [A]. *In Voennaya arkheologiya* [C]. St. Petersburg: Izd. Gos. Ermitazha, 1998: 160-163.

Semenov Vl.A. Sinkhronizatsiya pamyatnikov syunnu Zabaikalya i pozdnikh skifov Tuvy i Severo-Zapadnoi Mongolii [A]. *In Izucheniye kulturnogo naslediya Vostoka* [C]. St. Petersburg: Evrop. dom, 1999: 117-121.

Semenov Vl.A. Suglug-Hem i Haiyrakhan. *Mogilniki skifskogo vremeni v Tsentralno-Tuvinskoi kotlovine* [M]. St. Petersburg: Peterburg. vostokovedeniye. 2003

Semenov Vl.A. Kilunovskaya M.E. *Novye pamyatniki rannego zheleznogo veka v Tuve inform bul UNESCO Mezhdunar assotsiatsiya po izuch* [M]. Kultur Tsentralnoi Azii (Moscow), iss，1990(17): 36-47.

Tseveendorj Z.D. Chandmanii soel [J]. *Arheologiin sudlal*, 1980(IX-1): 34-105.

Weinstein S.I. Pamyatniki kazylganskoi kultury [A]. *In Trudy Tuvinskoi kompleksnoi arkheologo-etnogra¿cheskoi ekspeditsii Instituta etnografii AN SSSR, iss. 2* [C]. Moscow, Leningrad: Nauka,1966: 143-184.

Zadneprovsky Yu.A. Ranniye kochevniki Semirechya i Tian-Shanya. Ranniye kochevniki Ketmen Tyube, Fergany i Alaya［A］. *In Stepnaya polosa aziatskoi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uyu epokhu*［C］. Moscow: Nauka, 1992: 73-87.

Zadneprovsky Yu.A. Puti migratsii iuechjei po novym arkheologicheskim dannym［A］. *In Drevniye nomady Tsentralnoi Azii*［C］. St. Petersburg: Nauka, 1997:74-79（Arkheol. izyskaniya; iss. 40）.

The Wusun In Northeastern Central Asia

Vl. A. Semenov

Abstract: Among the peoples mentioned in Chinese dynastic chronicles are the Xiongnu and other steppe nomads such as the Yuezhi and the Wusun. The Xiongnu forced both these peoples to abandon their camping grounds and move to Zhetysu. Numerous sites in Tuva from the Late Scythian period （those of the Uyuk-Sagly culture） reveal ties with the Xiongnu and suggest that they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Wusun. Artifacts from Suglug-Khem-1 and -2 and Khayirakan, Tuva, specifically mirrors with side handles, hairpins, wire earrings, small wooden four-legged tables and painted vessels are paralleled by finds from burials of the low-ranking Wusun in Zhetysu. Before arriving at Zhetysu, the Wusun crossed the Altai-Sayan highland and the Irtysh below Lake Zaisan, where their presence is attested by sites of the Kula-Zhurga type.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latter are flexed burials in stone cists and vessels resembling those from Tuva in shape; other artifacts are extremely rare and similar to those from burials of the low-ranking Wusun in Zhetysu.

Key words: Xiongnu-Sarmatian age; Wusun; Xiongnu; Eastern Central Asia; Tuva; Zhetysu; Uyuk-Sagly culture, chronology; ceramics

1987年后台湾有关欧亚草原文化交流之研究回顾

——以秦汉至辽金元时期为主

胡志佳

（勤益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事业系，台中市，411）

一、前　　言

本文主旨在整理、分析1987年后台湾地区利用文献及考古资料进行欧亚草原文化交流之研究成果。台湾有关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学术著作，从史料汇编、墓志集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断有新的著作，也让这条路上丝路文化交流，在海上丝路兴起的500年后，再次活络于学术舞台上。

台湾地区曾历经政治戒严时期（1949年5月19日至1987年7月15日），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相关的考古信息及数据取得不易，以及海峡两岸之间的往来亦多有限制，造成当时学者的研究面向在文物的考究上与分析上较为不足，进而转向文献史料的考察与研究，但随着时间推移，两岸学术交流展开，考古报告的使用，成为主要数据源。近年来，随着电子数据库的普遍使用，台湾能更迅速掌握大陆之一手资料，使得参与研究者有增加之趋势。

台湾部分学者对于出土考古数据，不只钻研于数据解析，更从大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另外，近年来研究的另一特色是，在台湾使用相关考古数据进行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硕博士论文，涵盖的系所逐渐广披于中文、历史、音乐、戏剧、民族、艺术史等学科。

二、博硕士论文研究成果简析

如前言，台湾地区1987年以前由于大陆出版品使用限制，致使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研究者多集中在文献之爬网，这从相关之博硕士论文的产出，也可得到印证。一般而言，博硕士论文显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对某学术专业范畴的培养情况，台湾有关欧亚草原文化交流之相关博硕士论文，大致可以1997年做一分界[1]，在1997年以前

以历史研究为主，而且多被打散在各断代史中，也就是说，在台湾对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并未形成一完整课题，而是依附于各朝代，被视作断代史中的一环，仅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为了培育蒙、藏边疆及侨务人才，专以边疆史研究为主。[2]

以本文所搜集的范围来看，1997年以前，从1962年王曾才《北朝时期的胡汉问题》，到1997年王儒慧《元朝廷与西番佛教之关系》，之间尚有谢海平、张继昊、宋德喜、黄莹珏、陈钦育、廖启照、陈健文等人，陆续发表。[3][4]对“外族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互动与影响以及有关“夷夏观”之讨论，是本期博硕士论文撰写特色，也是承继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脉络。从发表的院校来看，有其集中性，以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所为多数。

从1997年以后，以历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向，开始有较大的改变，其中维持不变的是博士论文的写作趋向，仍继承传统的文史研究导向，包括有李明仁、张玉芳、丰黛、陈健文等人，相继为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研究而努力。[5] 2010年以后的博士论文，随着考古资料更易获得，文物、文化研究逐渐出现，李建纬的《先秦至汉代黄金制品工艺与身体技术研究—兼论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与身份认同问题》、李心怡的《论塔在隋唐文化中的呈现与意涵》、游琁安的《唐代妇女服饰研究》皆属此类。此外，张继昊之《北魏变乱问题初探》《北系部落民与北魏政权研究》、廖启照《契丹建国前之社会结构》《征服或扩大——辽朝的政治结构与国家形成》、陈健文《月氏民族及其与早期东西交通的关系》《先秦至两汉胡人意象的形成与变迁》等人，硕、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一致。

1997年以后的有关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研究之硕士论文，在几项特色展现，首先，传统的文史学研究大量减少，仅在传统的历史学与中国文学系有少数几篇。[6]大部分以文物、文化的研究取代史实、政治面相之研究。

以墓葬壁画或石窟为主题的研究有萧玉真《中国维摩造像的起源与开展——以隋唐敦煌维摩变壁画为研究重心》、洪蕊《五代敦煌莫高窟归义军供养人图像研究》、林姿君《舞袖飞扬——汉代墓葬中舞人形象研究》、陈瑛《敦煌唐代石窟天王力士图像溯源》、江明臣《唐代长安寺院壁画之研究》、罗照雯《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中胡人图像研究——略论唐代胡风成形的初期样貌》、林浩基《莫高窟壁画所见之政治图像研究——以维摩诘经变画为中心》等。[7]

以文物作为研究基础的硕士论文则有王聪威、钟碧芬、林信志、游宜静、萧宇恒、李孟学、李建纬、李心怡、陈怡安、陈宥臻、林容伊、丁于珊[8]，其中以中古时期墓葬出土之镇墓兽与唐代金银器研究着墨较多。

此外，因文化交流反映在生活上的研究则多样化，如王怡璇、童谨利、曾丽儒、许雅雯、吴孟青等文。[9]杨岳伦与谢佳萤二文，则是少数以粟特族为主的研究成果。[10]

三、期刊论文研究成果分析

台湾曾历经政治戒严时期（1949年5月19日至1987年7月15日），此一时期因当时的政治氛围对于学术交流，相关的考古信息及数据取得不易，在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研究上，对于出土文物的考据篇章少之又少，当时学者的研究在面向文物的考究与分析上较为薄弱，进而转向文献史料的考察与研究，钻研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夷夏观”，[11]包含夷夏之间透过怎样的标准进行区分，区分意识的运作具有何种性质与意义，或是各朝代中西文化上的交流与差异性。

随1987年台湾地区的解严，打破了两岸交流的制度性壁垒，两岸的史学史研究也开始产生交流。两岸三地史学研究由分道扬镳到相互交流，此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亦随之增加，正显示历史学研究是与时代俱进。从1987年至2000年之间，此时期的研究大抵延续戒严时期的方向，大多是集中在各朝代游牧民族的讨论，或单一个案的研究。有多位历史学者长期投入相关研究。

以朝代来区分，有关汉代欧亚草原文化交流，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了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周人的族源与华夏西部族群边界的形成》《近代羌文化探索—有关服饰与语言的书写》《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等系列有关于匈奴、羌与中原文化互动之探讨；[12]王明珂的研究主要在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与北方游牧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其《华夏边缘》相关概念的一系列著作，主要是对中国典范历史与民族知识中的古代华夏、中原帝国与汉人认同多有解构与尖锐批判。透过《华夏边缘》的古今变化，揭示过去的“蛮夷”成为今日中国少数民族的过程，并将此变迁置于人类生态中来理解及反思其意义，以期能构造更好的人类生态体系。王氏之研究，除了探讨民族史与文化史外，主要想建立一种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学知识，以此知识塑造具有反思性认同的个人，并表达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理论。[13]在《羌在汉藏之间》中，基于文本与情境（或表征与本相）的对应关系，利用细腻的文本分析来探索社会历史记忆，以发掘隐于其文本与表征中的社会情境与历史本相。[14]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则是进一步提出文本叙事结构与情境结构亦有其对应关系；借由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情节三层次叙事结构，以及个别文本对它们的依违，分析相对应的华夏与华夏边缘人群之认同情境与社会本相。[15]邢义田《东汉的胡兵》《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1985 ~ 1995）》《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数据中的“胡人”外貌》《汉代画像胡汉战争图的构成、类型与意义》《“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等从图像入手的胡人文化探讨[16]；邢义田研究探讨主题集中在以中国古代与西方文化交流为主，将古代中国置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中，利用文献、考古和图像数据，穷本溯源，由近而远，进行

考据，所撰写文章不仅包括中国北方草原游牧社会、文化的交流，亦涉及整个欧亚大陆两个区域，以具体艺术表现或物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复杂性。此外，近年来的文章也大都依据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利用充分的具体证据，证明文化因素传播的过程和路线勾勒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并说明文化传播的动力，造成了文化流播的力量为何，使之历史轮廓越来越清晰。[17]此外，汉代方面的较重要相关研究为陈健文《月氏的名称、族属以及汉代西陲的黑色人问题》《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从文面图像看内亚高加索种游牧民族与华夏的早期接触》《汉代胡人的文面图样及其与内陆欧亚之关系》等[18]，是近期仍持续投注在汉代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学者之一。

在魏晋南北朝方面，以对拓跋氏的研究较为集中，早期有逯耀东《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北魏与西域的关系》[19]；后继者康乐，仍延续拓跋氏研究《代人与镇人》《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孝道与北魏政治》[20]；此后有张继昊《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勋臣贺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白部和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二》《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匈奴刘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三》《拓跋珪的崛起与北魏王朝的肇建》《大人拓跋——拓跋氏的兴起》《拓跋珪的崛起与北魏王朝的肇建》《北魏“子贵母死”问题的再探讨》《由氏至家——婚姻关系与拓跋郁律一系的崛起（北魏王朝创建历史的考察之三）》等[21]。此外，张文杰《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鲜卑秃发（源）氏及其汉化研究》[22]、雷家骥《关于汉化问题：以五胡史为例》《略论魏周隋之间的复古与依旧—— 一个胡、汉统治文化摆荡改移的检讨》[23]，也有相关的讨论。

在唐代部分，早期有任育才《突厥之文化形态及其对唐代之影响》《唐朝对吐蕃和亲策略之运用》《唐西平大长公主和蕃事迹考》[24]；朱振宏对于唐代与突厥之间的文化交融有《唐代“皇帝·天可汗”释义》《突厥族史善应墓志笺证研究》《阿史那勿施墓志笺证》《阿史那自奴（哲）墓志笺证考释》《西突厥建国考》等文[25]，后集结成三本书出版。[26]宋德熹《独孤氏兴衰史论——“关陇集团”政权中代北家族个案研究之一》《“关陇集团”政权中的河南窦氏：代北外戚家族个案研究之二》；宋德熹、张文杰《北朝政权中河西大姓的角色与地位》[27]；林冠群长期关注唐代与吐蕃之间关系，有《隋文帝“莫缘可汗”汗号考释》《漠北时期回纥形势之探讨：以肃代德时期为中心》《吐蕃部落联盟时期宰相雏形与官员设置研究》《唐代吐蕃的社会结构》《唐代吐蕃政权的属性与政治文化之研究》等文。[28]

在辽金元方面，王明荪有《金代北族之汉学》《契丹与中原本土之历史关系》《略论辽代的汉人集团》《辽代契丹族群之汉学》等文，后陆续集结成书，如《元代的士人与政治》《蒙古民族史略》《中国民族与北疆史论·汉晋篇》《宋辽金元史》《辽金元史论文稿》《辽金元史学与思想论稿》等。[29]袁国藩《成吉思汗大雅萨法典与中原地区关系之蠡测》《元代蒙古人汉化考》《元代西方文物东传中原初考》《十三世纪蒙人之贸易政策》等[30]；张哲诚则有《早期契丹部族考述》以及《十六世纪初东察合

台汗国入侵土伯特的经过》相关论著。[31]此外，刘学铫是少数学者以中国边疆史研究为主，贯穿汉至清代，所发表论文集中在《中国边政》[32][33]。

四、2000年以后的欧亚草原文化、文物研究

2000年后，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开始日渐活跃，特别是大陆有关中国古代出土文物研究的成果资料大量地被介绍到台湾，对台湾的中国古代出土文物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达，交流平台的开放与便利，使得两岸研究成果的交流更加容易取得，因此，2000年后的相关研究大幅上升。而此时期的研究，除了部分延续以往的研究成果外，值得注意的是文物样式的研究不仅多样化，且不再只停留于历史文化层面的考究，艺术面向的赏析也慢慢加入探讨，像是李建纬《一方寸见一世界——试析战国时期北方黄金牌饰的美学意涵》，胡文成、胡文和《从图像学角度探讨成都南朝佛像与犍陀罗、秣菟罗、笈多佛像造型艺术流派的关系》及黄璧珍《从唐宋辽出土金银器实例看錾刻工艺技法》，皆是从器物上窥探当代工艺品的艺术成就。[34]除此，较少涉略的舞蹈艺术，如王广生《析论“飞天”“胡旋”“胡腾”之舞蹈形式及其影响》，以及语言学，王明荪《契丹的语言与文字》《关于汉语中的几个蒙古语》，皆开始有人投入研究，而研究成果的发表刊物，也有集中性。[35]

以艺术史方面的研究，文章稿件投至以《历史博物馆学报》为最多。《历史博物馆学报》以艺术史研究与评论、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等各学域为主。检视《历史博物馆学报》收录有关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研究的文章，可发现其篇章撰写主要着重在出土文物的介绍与当代社会的关联性，或是文化转变的历程，像是吴艳春《“丝路传奇——新疆文物大展”专题（7）：出土文物展现吐鲁番唐代社会各阶层生活》、张玲玲《从吐鲁番出土文物上的狩猎纹样看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杨式昭的《“丝路传奇——新疆文物大展”专题（4）：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绢画探唐代贵族女子风华》；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罗桂英《由丝路上之波斯、大秦谈东西方文化之交流》、王震亚《匈奴在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成耆仁《大唐盛世的文化与形成多元化的因素》和杨秀丽《东土丝路——回顾文化交流的历史路径》，皆是讨论阐述东西文化交流产生各类的影响及冲击，及其绚丽多彩的丰富内涵，增进中、西双方在政治、经贸、宗教、艺术、文学、语言、科技诸领域的互动。[36]

再则是《“故宫”文物月刊》。《“故宫”文物月刊》为台湾著名文史通俗杂志，主要是以台北“故宫”院藏文物为基础做介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探讨《故宫》文物及相关业务，并配合精致图片，关注文物器皿的意义与历史价值，考古科技与文物维护。而《“故宫”文物月刊》所收录关于欧亚草原文化的篇章，大部分为金银器、服饰等出土文物的介绍与考究，像是李建纬《北亚草原民族金银器艺术——以契

丹民族为主》，张文玲的《古代欧亚草原民族动物造型之初探》《古代草原世界的贵族服饰》《唐代金银器上的几个西域纹饰》，陈根远《西安出土“汉匈奴恶适尸逐王”印辨伪》，以及韩伟的《辽代太平年间金银器錾文考释》和戴应新《纳林高兔匈奴文物出土略记》。[37]针对的是单一主题式、单一物品上的考究，将文物放大来看，透过各项的观察与研究，进一步了解各出土文物所代表的文化意涵。上述篇章的搜罗也都符合《“故宫”文物月刊》的主旨，以文物介绍为基础，进而深化探讨其内涵。

《“故宫”学术季刊》为台湾“国科会”103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比艺术学门专业类期刊评等第A级的期刊，相关研究论著，分别为文物艺术风格之探索及其装饰，如陈芳妹《商代青铜艺术"区域风格"之探索——研究课题与方法之省思》和李玉珉《试论唐代降魔成道式装饰佛》《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国和北魏时期》；[38]再者是出土文物史料的源流考证与意义的检视，像李玉珉《敦煌四二八窟新图像源流考》、罗丰《宁夏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述》；[39]其他则是着重在借由文物的研究来了解东西文化的交流，如吴晓筠《马车在早期东西交流中的地位与交流模式：公元前 2000～前1200年》及陈健文《从文面图像看内亚高加索种游牧民族与华夏的早期接触》，上述皆是以中华文物之学研究为核心，重在历史与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40]

五、结　　语

从已发表之著作与期刊论文来分析，可掌握以下几项特点：

（一）台湾曾历经政治戒严时期（1949年5月19日至1987年7月15日），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相关的考古信息及数据取得不易，以及两岸之间的往来亦多有限制，造成当时学者的研究面向在文物的考究上与分析上较为不足，进而转向文献史料的考察与研究，以钻研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夷夏观"。此时期对于欧亚草原中外文化交流之研究，能引用大陆新发现考古史料者，集中在“中央”研究院或台湾大学等重点大学院校，所以研究成果也集中在这些学术单位。

（二）早期台湾研究欧亚草原文化交流之文章，多以传统史料文献为主，但随着时间推移，两岸学术交流展开，考古报告的使用，成为主要数据源。近年来，随者电子数据库的普遍使用，台湾能更迅速掌握大陆之一手资料，使得参与研究者有增加之趋势。199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欧亚草原中外文化交流之研究开始有转变趋向。从前期以历史研究为主，转而开始以文物、文化交流为重。

（三）早期台湾研究欧亚草原文化交流之期刊论文发表，从统计资料来看，有其集中性，以《历史博物馆学报》《“故宫”文物月刊》《汉学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大陆杂志》等刊物为主。

（四）从研究内容分析，台湾对于大陆出土考古资料之解析，有别于后者。如王明珂、王明荪、邢义田等学者，不只钻研于资料解析，更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待中国历史

上中外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五）另一特色是，在台湾使用相关考古数据进行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硕博士论文，涵盖的系所相当广泛，从中文系、历史系、音乐系、戏剧系、民族系、艺术史等学科。

综观战后台湾有关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就量来说，有一定的成果，但就研究议题与研究质量则与台湾地区早期或现今的各国无法相较。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整体研究环境丕变。随着大陆经济环境的改变，使得学术研究受到应有的重视与挹注，加上考古资料不断出现，与因特网加速了全球资料取得的平等，使得研究者大量增加，研究成果丰硕。

其二，反观台湾的问题，台湾在戒严时期，学者为恐因文字而罗织入罪，在当时台湾史研究被视为禁忌。解严以后学术界，尤其是文史学科，大量投入台湾史的研究，而对大陆地区历史的研究相对减少，这个情况，到目前仍是趋势。

除了政治环境改变对研究趋势的影响外，过去十年来，也面临整个研究环境改变的状况。首先，早期撑起台湾有关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研究的学者，已陆续退休，过去所指导的学生，因老师而聚，此时也因老师而散；第二代接棒者面临学术与生活的挑战，被迫无法在本科专业上持续奋斗。而第三、四代，在学术上的训练越来越不完整，能延续者更少。

注　释

[1] 以1997年作为分界，并非本年度有何特殊意义，只是单纯从数据数据的特点来做说明。

[2]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创立于1969年，1990年更名为民族研究所，1996年再更名为民族学系硕士班.

[3] a. 王曾才. 北朝时期的胡汉问题［D］.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62.

b. 吴显庆. 西汉时期中国与匈奴的关系［D］.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73.

c. 赵振绩. 契丹族系考［D］. 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73.

d. 简俊耀. 十一至十三世纪蒙古氏族制度之研究［D］.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

e. 谢海平. 唐代蕃胡生活及其对文化的影响［D］. 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5.

f. 林修澈. 蒙古帝国本部可汗大统承袭之研究［D］.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78.

g. 吴昌廉. 汉代边郡障隧组织——汉简与汉代边郡制度之研究［D］. 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2.

h. 郭光铁. 西汉与匈奴在西域争战之研究［D］.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

i. 裘友任. 突厥汗国政治组织之社会基础研究［D］.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

j. 李今芸. 宋辽贸易之研究［D］.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

k. 张继昊. 北魏变乱问题初探［D］.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

l. 吕春盛. 北齐政治史初探——北齐衰亡原因之考察［D］.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

m. 张中复. 蒙古察合台汗国游牧封建体制之研究［D］.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
n. 郑邦森. 吐蕃与唐室和战关系之历史研究［D］. “中国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
o. 王蔚. 殷商羌族及岳神刍议［D］. 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
p. 何莲莲. 犍陀罗美术之研究［D］. “中国文化大学”印度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
q. 曹英哲. 汉武帝攘匈奴之研究［D］. 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
r. 吕莉玲. 突厥复兴汗国之研究［D］.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s. 宋新民. 敦煌写本识字类蒙书研究［D］.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0.
t. 宋德喜. “关陇集团”中的代北外戚家族研究——以独孤氏及窦氏为例［D］.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
u. 沈冬. 隋唐西域乐部与乐律研究［D］. 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
v. 赵竹城. 金帐汗国在俄国政治社会发展上的角色［D］. 政治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
w. 张继昊. 北系部落民与北魏政权研究［D］.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
x. 黄莹珏. 南北朝夷夏观之研究［D］. 东海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1993.
y. 周宜静. 高昌回鹘与西辽、蒙古的关系［D］.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
z. 陈钦育. 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国家之关系研究:以突厥为例［D］.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4.

［4］ a. 廖启照. 契丹建国前之社会结构［D］.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所硕士论文，1995.
b. 陈健文. 月氏民族及其与早期东西交通的关系［D］.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c. 杨莒妤. 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D］. 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d. 叶佳玫. 敦煌莫高窟隋代四二〇窟研究［D］.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硕士论文，1996.
e. 王儒慧. 元朝廷与西番佛教之关系［D］. 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硕士论文，1997.

［5］ a. 李明仁. 北朝、隋及唐朝前期继承制之研究［D］.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1.
b. 张玉芳. 藩镇与中唐文学［D］.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2.
c. 丰黛. 胡风的流被对唐代妇女常服之影响［D］. 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系博士论文，2004.
d. 陈健文. 先秦至两汉胡人意象的形成与变迁［D］.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6.
e. 陈昭扬. 征服王朝下的士人—金代汉族士人的政治、社会、文化论析［D］.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7.
f. 蔡秉衡. 北朝乐史与乐制之研究［D］.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7.
g. 廖启照. 征服或扩大——辽朝的政治结构与国家形成［D］.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所博士论文，2008.
h. 涂云清. 蒙元统治下的士人及其经学发展［D］.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09.

i. 李建纬. 先秦至汉代黄金制品工艺与身体技术研究——兼论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与身份认同问题［D］. 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论文，2010.

j. 李心怡. 论塔在隋唐文化中的呈现与意涵［D］. 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10.

k. 罗文星. 拓跋政权的政治与社会认同［D］. 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12.

l. 龚诗尧. 从外交活动之发展论北朝汉文化地位的变迁［D］.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12.

m. 游琁安. 唐代妇女服饰研究［D］. 玄奘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博士论文，2015.

［6］ a. 朱振宏. 大唐世界与“皇帝・天可汗”之研究［D］. 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b. 刘丽君. 河西地区与唐代国势兴衰之探究［D］.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

c. 游逸飞. 四方、天下、郡国：周秦汉天下观的变革与发展［D］.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9.

d. 林恩辰. 勋臣八姓与北魏政局研究［D］. 中正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2010.

e. 蔡长廷. 古代北亚游牧民族迁徙与融合之研究——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乌桓［D］. 嘉义大学史地学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10.

f. 潘家宏. 世变下知识分子的生命困境与自我安顿——以仕金汉士与滞金宋使为主的析探［D］. 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硕士论文，2013.

g. 朱振宏. 隋唐与东突厥互动关系之研究［D］.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5.

［7］ a. 萧玉真. 中国维摩造像的起源与开展——以隋唐敦煌维摩变壁画为研究重心［D］. 台南艺术学院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

b. 洪蕊. 五代敦煌莫高窟归义军供养人图像研究［D］. 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c. 林姿君. 舞袖飞扬—汉代墓葬中舞人形象研究［D］. 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中国美术史组硕士论文，2003.

d. 陈瑛. 敦煌唐代石窟天王力士图像溯源［D］.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

e. 江明臣. 唐代长安寺院壁画之研究［D］. 玄奘大学宗教学系在职专班硕士论文，2010.

f. 罗照雯. 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中胡人图像研究——略论唐代胡风成形的初期样貌［D］. 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

g. 林浩基. 莫高窟壁画所见之政治图像研究——以维摩诘经变画为中心［D］.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硕士论文，2015.

［8］ a. 王聪威. 唐宋陶瓷装饰发展的研究——以磁州窑装饰的研究为中心［D］.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

b. 钟碧芬. 北朝石佛三尊像之研究［D］. 艺术学院美术学系硕士论文，1999.

c. 林信志. 北朝隋唐“镇墓兽”之研究［D］.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管理所硕士论文，2005.

d. 游宜静. 中国狮子造型与装饰研究［D］. 台湾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

e. 萧宇恒. 三至七世纪中国金银器的发展研究［D］. 逢甲大学历史及文物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8.

f. 李孟学. 唐代团花纹镜研究［D］. 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

g. 同［5］i.

h. 同［5］j.

i. 陈怡安. 北朝镇墓兽研究（AD386～AD581）［D］.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硕士论文，2011.

j. 陈宥蓁. 唐代陕西地区塔式罐研究［D］.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管理所硕士论文，2012.

k. 林容伊. 唐宋陶瓷与西方玻璃器［D］.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3.

l. 丁于珊. 唐代金银器装饰研究［D］. 台湾艺术大学视觉传达设计学系硕士论文，2014.

［9］ a. 王怡璇. 联珠纹样与唐代纺织纹饰研究［D］. 台南艺术学院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

b. 童谨利. 唐代文学中的舞蹈之美——以霓裳羽衣舞、杨柳枝、柘枝舞为例［D］. 南华大学视觉与媒体艺术学系硕士论文，2010.

c. 曾丽儒. 唐代外来乐舞探微［D］.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所硕士论文，2010.

d. 许雅雯. 唐代妇女的胡服［D］.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所硕士论文，2010.

e. 吴孟青. 唐代外来香药知识的形成初探［D］.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2.

［10］ a. 杨岳伦. 六至八世纪粟特族商业文化活动—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核心［D］.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所硕士论文，2010.

b. 谢佳萤. 入唐粟特人婚姻研究［D］.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4.

［11］ a. 王明荪. 论上古的夷夏观［J］. 边政研究所年刊，1983（14）：1～30.

b. 王明荪. 试析汉晋之夷夏观［J］. 东方杂志，1987（21-3）：24～31.

c. 谷瑞照. 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念［J］. 复兴岗学报，1977（17）：149～178.

［12］ a. 王明珂. 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C］，1993（64-1）：9～50.

b. 王明珂. 周人的族源与华夏西部族群边界的形成［J］. 大陆杂志，1993（87-2）：1～20.

c. 王明珂. 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C］，1994（65-2）：375～434.

d. 王明珂. 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C］，1994（65-4）：989～1027.

e. 王明珂. 近代羌文化探索—有关服饰与语言的书写［J］. 历史月刊，2003（188）：33～39.

［13］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14］ 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

［15］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

［16］ a. 邢义田. 东汉的胡兵［J］. 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3（28）：143～166.

b. 邢义田. 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1985～95）［J］. 汉学研究，1997（15-1）：1～31、441.

c. 邢义田. 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数据中的“胡人”外貌［J］.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集刊，2000（9）：15～99.

d. 邢义田. 汉代画象胡汉战争图的构成、类型与意义［A］.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C］，2005（19）：1～72.

e. 邢义田. “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A］.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C］，2009（26）：193～224、229.

f. 邢义田. 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M］. 台北：三民书局，2014.

［17］ 同［16］f.

［18］ a. 陈健文. 月氏的名称、族属以及汉代西陲的黑色人问题［J］. 国际简牍学会会刊，1993（1）：111～143.

b. 陈健文. 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J］. 史耘，1995（1）：49～68.

c. 陈健文. 从文面图像看内亚高加索种游牧民族与华夏的早期接触［J］. 故宫学术季刊，2011（29-2）：77～113.

d. 陈健文. 汉代胡人的文面图样及其与内陆欧亚之关系［J］.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1（46）：35～75.

［19］ a. 逯耀东. 北魏与西域的关系［J］. 幼狮学报，1960（2-2）：（6）1～（6）50、左4.

b. 逯耀东. 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J］. 思与言，1968（5-5）：31～37、49.

［20］ a. 康乐. 孝道与北魏政治［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C］，1993（64-1）：51～87.

b. 康乐. 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C］，1990（61-3）：575～691.

c. 康乐. 代人与镇人［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C］，1990（61-4）：895～916.

d. 康乐. 唐代前期的边防［M］.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79.

e. 康乐. 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M］. 台北：稻乡出版社，1995.

［21］ a. 张继昊. 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勋臣贺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J］. 空大人文学报，1996（5）：53～74.

b. 张继昊. 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白部和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二［J］. 空大人文学报，1997（5）：69～93.

c. 张继昊. 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匈奴刘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三［J］. 空大人文学报，1998（6）：139～172.

d. 张继昊. 拓跋珪的崛起与北魏王朝的肇建［J］. 空大人文学报，2000（10）：131 ~ 164.
e. 张继昊. 大人拓跋——拓跋氏的兴起［J］. 空大人文学报，2001（12）：80 ~ 108.
f. 张继昊. 北魏“子贵母死”问题的再探讨［J］. 空大人文学报，2003（12）：137 ~ 169.
g. 张继昊. 由氏至家——婚姻关系与拓跋郁律一系的崛起（北魏王朝创建历史考察之三）［A］. 郑钦仁教授荣退纪念论文集［C］. 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123 ~ 140.
h. 张继昊. 从拓跋到北魏——北魏王朝创建历史的考察［M］. 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

［22］ 张文杰. 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鲜卑秃发（源）氏及其汉化研究［J］. 中兴史学，1999（5）：17 ~ 32.

［23］ a. 雷家骥. 略论魏周隋之间的复古与依旧—— 一个胡、汉统治文化摆荡改移的检讨［J］. 中国中古史研究，2009（9）：97 ~ 133.
b. 雷家骥. 关于汉化问题：以五胡史为例［J］. 中国中古史研究，2013（13）：1 ~ 25.

［24］ a. 任育才. 唐朝对吐蕃和亲策略之运用［J］. 师大历史学报，1987（15）：11 ~ 25.
b. 任育才. 突厥之文化形态及其对唐代之影响［J］. 文史学报，1972（2）：133 ~ 160.
c. 任育才. 唐西平大长公主和蕃事迹考［A］. 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台北：中国唐代学会，1997（6）：397 ~ 410.

［25］ a. 朱振宏. 唐代“皇帝・天可汗”释义［J］. 汉学研究，2003（21-1）：413 ~ 433.
b. 朱振宏. 突厥族史善应墓志笺证研究［J］. 中国边政，2014（200）：119 ~ 167.
c. 朱振宏. 阿史那勿施墓志笺证［J］. 中国边政，2013（194）：1 ~ 39.
d. 朱振宏. 阿史那自奴（哲）墓志笺证考释［J］. 成大历史学报，2013（44）：43 ~ 107.
e. 朱振宏. 西突厥建国考［J］. 中国边政，2008（173）：19 ~ 41.

［26］ a. 西突厥与隋朝关系史研究（581 ~ 617）［M］. 新北：稻香出版社，2015.
b. 隋唐政治、制度与对外关系［M］. 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
c. 大唐世界与“皇帝・天可汗”之研究［M］. 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09.

［27］ a. 宋德熹. 独孤氏兴衰史论——“关陇集团”政权中代北家族个案研究之一［J］. 兴大历史学报，1992（2）：13 ~ 40.
b. 宋德熹. “关陇集团”政权中的河南窦氏：代北外戚家族个案研究之二［J］. 文史学报，1992（22）：105 ~ 144.
c. 宋德熹，张文杰. 北朝政权中河西大姓的角色与地位［J］. 兴大人文学报，2004（34下）：607 ~ 630.

［28］ a. 林冠群. 漠北时期回纥形势之探讨：以肃代德时期为中心［J］. 中国边政，1982（78）：23 ~ 32.
b. 林冠群. 唐代吐蕃的社会结构［J］. 政治大学民族学报，1991（20）：1 ~ 56.
c. 林冠群. 隋文帝“莫缘可汗”汗号考释［J］. 史学汇刊，2010（25）：13 ~ 15.
d. 林冠群. 吐蕃部落联盟时期宰相雏形与官员设置研究［J］.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3（50）：33 ~ 58.

e. 林冠群. 唐代吐蕃政权的属性与政治文化之研究［J］. 中国边政，2013（196）：13 ~ 45.

［29］ a. 宋辽金元史［M］. 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

b. 汉晋之北族与边疆史论［M］.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

c. 蒙古民族史略［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0.

d. 含英咀华：辽金元时代北族的汉学［M］.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

［30］ a. 袁国藩. 成吉思汗大雅萨法典与中原地区关系之蠡测［J］. 中国边政，1967（17）：12 ~ 15.

b. 袁冀. 元代蒙古人汉化考［J］. 中原文献，2006（38-4）：17 ~ 33.

c. 袁冀. 元代西方文物东传中原初考［J］. 中国边政，1987（99）：20 ~ 23.

d. 袁冀. 十三世纪蒙人之贸易政策［J］. 中国边政，1988（104）：8 ~ 11.

［31］ a. 张哲诚. 十三世纪蒙古人经略西藏之经过［J］. 中国边政，1988（103）：28 ~ 34.

b. 张哲诚. 早期契丹部族考述［J］. 中国边政，1989（107）：43 ~ 48.

［32］ a. 刘学铫. 漠西及清海额鲁特蒙古简志［J］. 中国边政，1970（31）：34 ~ 36.

b. 刘学铫. 西伯利亚与蒙古昔班汗国［J］. 中国边政，1971（34）：8 ~ 10.

c. 刘学铫. 蒙古莫兀儿王朝的艺术与文学［J］. 中国边政，1971（36）：7 ~ 11.

d. 刘学铫. 匈奴源流［J］. 中国边政，1981（75）：9 ~ 13.

e. 刘学铫. 匈奴早期事略［J］. 中国边政，1981（76）：22 ~ 28.

f. 刘学铫. 匈奴与西汉之和战［J］. 中国边政，1982（79）：24 ~ 33.

g. 刘学铫. 汉武帝后期以后匈奴事略［J］. 中国边政，1982（80）：24 ~ 36.

h. 刘学铫. 匈奴与王莽及东汉之和战［J］. 中国边政，1983（82）：6 ~ 19.

i. 刘学铫. 北匈奴之西徙与阿提拉王朝［J］. 中国边政，1987（97）：14 ~ 25.

j. 刘学铫. 匈奴与两汉之战和及其影响［J］. 中国边政，1987（98）：10 ~ 21.

k. 刘学铫. 鲜卑源流［J］. 中国边政，1990（109）：1 ~ 9.

l. 刘学铫. 鲜卑诸部之兴起［J］. 中国边政，1990（112）：3 ~ 15.

m. 刘学铫. 契丹之兴起与辽之建国及其灭亡［J］. 中国边政，1993（121）：1 ~ 16.

n. 刘学铫. 西辽兴亡史略［J］. 中国边政, 1993（122）：25 ~ 41.

o. 刘学铫. 论匈奴与蒙古之崛起［J］. 中国边政，2004（159）：1 ~ 26.

p. 刘学铫.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文化之冲突与融合［J］. 中国边政，2004（160）：1 ~ 33.

q. 刘学铫. 隋唐盛世胡风炽［J］. 中国边政，2005（161）：55 ~ 72.

r. 刘学铫. 昭武九姓与唐朝之关系［J］. 中国边政，2005（164）：1 ~ 39.

s. 刘学铫. 从"长春真人西游记"看蒙元时期之中亚［J］. 中国边政，2006（165）：17 ~ 28.

t. 刘学铫. 祆教、摩尼教从中亚到中原［J］. 中国边政，2006（166）：17 ~ 65.

u. 刘学铫. 从"大唐西域记"看七世纪之西域［J］. 中国边政，2006（167）：9 ~ 45.

v. 刘学铫. 从"洛阳伽蓝记"看六世纪初之西域［J］. 中国边政，2006（168）：1 ~ 23.

w. 刘学铫. 西域胡风入唐诗［J］. 中国边政，2007（170）：1 ~ 37.

x. 刘学铫. 十二世纪中亚与中国之关系以西辽为例［J］. 中国边政，2008（175）：1 ~ 32.

y. 刘学铫. 消失的罗马帝国，落脚在中国甘肃？［J］. 中国边政，2012（184）：1 ~ 24.

z. 刘学铫. 立国于甘肃的五凉与西秦［J］. 中国边政，2011（186）：1 ~ 52.

［33］ a. 刘学铫. 北匈奴西徙与阿提拉帝国［J］. 中国边政，2011（9）：1 ~ 49.

b. 刘学铫. 西域南道国于阗［J］. 中国边政，2012（3）：19 ~ 65.

c. 刘学铫. 消失的楼兰与精绝［J］. 中国边政，2012（12）：1 ~ 50.

d. 刘学铫. 蒙藏概况［M］.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2.

e. 刘学铫. 匈奴史论［M］. 台北：南天书局，1987.

f. 刘学铫. 蒙古论丛［M］. 台北：南天书局，1987.

g. 刘学铫. 鲜卑史论［M］. 台北：南天书局，1994.

h. 刘学铫. 北亚早原民族双轨政制［M］. 台北：南天书局，1999.

i. 刘学铫. 五胡史论［M］. 台北：南天书局，2001.

j. 刘学铫. 文化外史［M］.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k. 刘学铫. 五胡兴华［M］. 台北：知书房出版社，2004.

l. 刘学铫. 历代胡族王朝及其民族政策［M］. 台北：知书房出版社，2005.

m. 刘学铫. 从古籍看中亚与中国关系史［M］. 台北：知书房出版社，2009.

n. 刘学铫. 中亚与中国关系史［M］. 台北：知书房出版社，2010.

o. 刘学铫. 突厥汗国：狼的子孙［M］. 台北：风格司艺术出版社，2011.

p. 刘学铫. 大辽王朝：青牛、白马、黑契丹［M］. 台北：风格司艺术出版社，2012.

q. 刘学铫. 五胡兴华：形塑中国历史的异族［M］. 台北：风格司艺术出版社，2013.

r. 刘学铫. 新疆史论［M］. 台北：知书房出版社，2013.

s. 刘学铫. 西夏王朝：神秘的黑水域［M］. 台北：风格司艺术出版社，2013.

t. 刘学铫. 匈奴帝国：行国的始祖［M］. 台北：风格司艺术出版社，2014.

u. 刘学铫. 蒙古帝国：苍狼与白鹿［M］. 台北：风格司艺术出版社，2014.

v. 刘学铫. 国史里的旮旯［M］. 台北：唐山出版社，2014.

w. 刘学铫. 唐代以来的边疆策略［M］. 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2014.

［34］ a. 李建纬. 一方寸见一世界—试析战国时期北方黄金牌饰的美学意涵［J］. 艺术学报，2008（82）：15 ~ 32.

b. 胡文成，胡文和. 从图像学角度探讨成都南朝佛像与犍陀罗、秣菟罗、笈多佛像造型艺术流派的关系［J］. 法鼓佛学学报，2011（8）：33 ~ 102.

c. 黄璧珍. 从唐宋辽出土金银器实例看錾刻工艺技法［J］.历史博物馆学报，2010（41）：1 ~ 16.

［35］ a. 王广生. 析论“飞天”“胡旋”“胡腾”之舞蹈形式及其影响［J］. 艺术学报，2011（7-1）：289 ~ 311.

b. 王明荪. 契丹的语言与文字［J］.“故宫”文物月刊，2010（327）：120 ~ 127.

c. 王明荪. 关于汉语中的几个蒙古语［J］.国文天地，2011（312）：52，53.

［36］ a. 吴艳春. 丝路传奇——新疆文物大展・专题（7）——出土文物展现吐鲁番唐代社会各阶层生活［J］.历史博物馆馆刊，2009（19-2）：50～53.

b. 张玲玲. 从吐鲁番出土文物上的狩猎纹样看中西文化交流［J］.历史博物馆馆刊，2009（19-3）：37～41.

c. 杨式昭. 丝路传奇——新疆文物大展・专题（4）——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绢画探唐代贵族女子风华［J］.历史博物馆馆刊，2009（19-2）：18～29.

d. 罗桂英. 由丝路上之波斯、大秦谈东西方文化之交流［J］.历史博物馆学报，1995（1）：101～116.

e. 王震亚. 匈奴在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贡献［J］.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3-2）：44～51.

f. 成耆仁. 大唐盛世的文化与形成多元化的因素［J］.历史博物馆馆刊，2010（20-12）：33～44.

g. 杨秀丽. 东土丝路——回顾文化交流的历史路径［J］.历史博物馆馆刊，2005（19-11）：52～60.

［37］ a. 李建纬. 北亚草原民族金银器艺术——以契丹民族为主［J］. “故宫”文物月刊，2010（324）：54～65.

b. 张文玲.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动物造型之初探［J］. “故宫”文物月刊，1982（10-8）：20～33.

c. 张文玲. 古代草原世界的贵族服饰［J］. “故宫”文物月刊，2000（18-9）：4～11.

d. 张文玲. 唐代金银器上的几个西域纹饰［J］. “故宫”文物月刊，2003（20-10）：22～41.

e. 陈根远. 西安出土“汉匈奴恶适尸逐王”印辨伪［J］. “故宫”文物月刊，1993（11-2）：64～67.

f. 韩伟. 辽代太平年间金银器錾文考释上［J］. “故宫”文物月刊，1993（11-9）：4～23.

g. 韩伟. 辽代太平年间金银器錾文考释下［J］. “故宫”文物月刊，1994（11-10）：100～107.

h. 戴应新. 纳林高兔匈奴文物出土略记［J］. “故宫”文物月刊，1995（12-12）：118～129.

［38］ a. 陈芳妹. 商代青铜艺术“区域风格”之探索——研究课题与方法之省思［J］. “故宫”学术季刊，1998（15-4）：109～150，左6～7.

b. 李玉珉. 试论唐代降魔成道式装饰佛［J］. “故宫”学术季刊，2006（23-3）：39～90，157.

c. 李玉珉. 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国和北魏时期［J］. “故宫”学术季刊，1994（11-4）：1～80.

［39］ a. 李玉珉. 敦煌四二八窟新图像源流考. “故宫”学术季刊［J］，1993（10-4）：1～34.

b. 罗丰. 宁夏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述. “故宫”学术季刊［J］，1995（12-4）：33～66.

[40] a. 吴晓筠. 马车在早期东西交流中的地位与交流模式：公元前 2000 ~ 1200 年[J]. “故宫”学术季刊，2011（28-4）：95 ~ 132.
b. 陈健文. 从文面图像看内亚高加索种游牧民与华夏民族的早期接触[J]. “故宫”学术季刊，2011（29-2）：77 ~ 113.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Eurasian Stepp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from Qin-Han Period to Liao-Jin-Yuan Period）

Hu Zhijia

Abstract：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academic works and journal papers on Eurasian stepp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after the 1950s, some features can be summarized as below.

1. During the political martial law period (1949. 5.19-1987.7.15), the fact that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data is hard to obtain, together with the limitation to the contact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led to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relics and concentration on literature studies digging into the conception of Yidi (how to treat the barbarians) of various periods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rs able to utilize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 the mainland during this time were mainly in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s such a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University.

2. The early papers on Eurasian steppe cultural exchange were mainl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literatur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s have become the major data source. Scholars in Taiwan can get in touch with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in quite short time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electronic databases recently. Since the mid 1990s,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Eurasian stepp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urned to focus on the exchange of relics and cultures, instead of the former historical studies.

3.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data, most of the early journal papers on Eurasian stepp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were published on several periodicals, including the Museum of History Journal, The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Chinese Studies, Collected Papers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nd Mainland Magazine.

4.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the Taiwan scholars 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 the mainland are differentiated with the mainland scholars. Several scholars such as Wang Mingke, Wang Mingsun, Xing Yitian, besides data analysis, paid more atten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Ph.D dissertations and the Master Theses using archaeological data on Eurasi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ver quite wide disciplines, including Chinese, History, Music, Drama, Ethnics and Art History.

Key words：Eurasian Steppe Cultur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view

再论晋陕高原青铜器与商代方国的关系*

韩炳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030001）

研究古代民族的聚集区域和活动区域，是非常困难的。若将考古发现与文献中记载的族称一一对应，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考古学研究又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尤其是历史时期，更应从关注族属方面的研究，以此来解决古代社会的各种相关问题。晋陕高原商代青铜器的时代主要在商后期。这个时候，历史文献记载不太详细，但是，殷墟卜辞是极好的补充资料。多种材料的综合利用，使研究商代地理与社会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文基于晋陕高原青铜器的认识，结合文献与殷墟卜辞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其间的关系，以加深对商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地理的理解。

一

鬼方是殷墟西北重要的方国，自王国维发表《鬼方昆夷玁狁考》后，更加引起注意。关于鬼方的材料，有三个来源，一是传世文献，二是西周青铜器，三是殷墟甲骨。这三种材料所记载的“鬼”是否指一个，学术界历来就有争论。讨论鬼方与晋陕高原青铜器的关系有必要辨明三种记载“鬼”的资料之间的关系。

传世文献中记载的“鬼方”，见于以下。

> 《诗经·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
> 《易·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
>
> 《易·未济》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
> 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
>
> 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

《诗经》《易》和古本《竹书纪年》应当是很可靠的史料，这些史料记载了鬼方不

---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晋西商代青铜器资料整理与研究（13CKG009）”项目资助。

仅是商王朝的敌人，还说明其力量很强大，双方战争持续很长，同时也记载了鬼方活动时间至少从武丁直至商末。但是，除今本《竹书纪年》外，其他史料并没有记载鬼方的位置。假使今本《竹书纪年》可靠的话，鬼方大致与“荆”相距不远，与“氐”和“羌”有关系。

商代金文中没有发现关于鬼方的记载，而两周金文中却有两条关于鬼方的记载。

小盂鼎：“盂以多旂佩鬼方……入南门，告曰：王令盂以……伐鬼方……”

梁伯戈：“抑鬼方蛮……”

小盂鼎为西周康王时器，梁伯戈为春秋早期梁伐鬼方所作器。两则金文揭示了鬼方与周和梁之间的战争，也说明鬼方与周和梁相邻。西周都城在关中，而梁在韩城附近，这里的鬼方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位置。

罗琨先生和孙亚冰先生都比较完整的搜集了殷墟卜辞中的鬼方材料，共八条，见于殷墟一和四期卜辞[1]。这八条卜辞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鬼方为商王朝征伐其他方国。

王勿从鬼。

贞，王从戠伐巴，帝受佑。

贞，王勿从戠伐巴。《合集》[2]6474/1

贞鬼获羌。

贞鬼不其获羌。

乙巳卜，宾贞，鬼获羌。一月。

乙巳卜，宾贞，鬼不其获羌。《合集》203正/1

伐羌的卜辞属于宾组卜辞，说明在武丁时期“鬼”曾和“羌”发生过战争，也就是说武丁时的鬼方并不是殷的敌人[3]。

鬼方与昜应该不远，见于同版卜辞。此同为一事的卜辞有三条：

己酉卜，宾贞，鬼方、昜，亡祸。五月。《合集》8591

己酉卜，内，［贞］鬼方昜，［亡］囚。五月。《合集》8592

己酉卜，𣪊，［贞］鬼方昜，［亡］囚。五月。《合集》8593

于省吾先生将“昜”理解为动词，“鬼方昜”是说鬼方飞扬而去的意思，“言其逃亡之速，故下可以无咎为言”[4]。不能理解为动词[5]，卜辞中“昜”作为动词不见于其他辞例，当做名词比较允当，可以理解为族氏名[6]，罗琨不同意“昜为鬼方君主之名”“鬼与昜是一个人”，认为“鬼”和“昜”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族氏名[7]。孙亚冰先生认为，“鬼方”与“昜”是两个不同的方国，并且从属于商[8]，这是正确的。

还有一类卜辞，是关于刚祭的。

丁卯，贞，王令鬼、𡨄刚于京。《怀特》[9]1650/4

𡧊，应该就是丙族，它在山西灵石附近[10]。京，可能就是王季所伐燕京之戎[11]，这个地方，在汾河上游的管涔山附近。

这些卜辞说明，鬼方的活动区域大致在殷墟以西或西北的汾河流域附近。另外，从卜辞记载的鬼方看，没有与商王朝进行过战争，这与文献和金文记载的商与鬼方大规模冲突相矛盾。殷墟卜辞、传世文献和金文三者不合，对此，学者们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其一，王玉哲先生撰《鬼方考》，后有撰文《鬼方考补证》指出这些卜辞中鬼方之鬼，就是文献中的鬼方[12]。李学勤先生认为关于“亡𡆥”的卜辞中，做主语的都是人名，所以关于“鬼方昜”的那条卜辞就是说商人希望他们有祸，故，鬼方是商的敌人[13]，因此，卜辞中的鬼方与文献相合。

其二，卜辞中的鬼方应该并非指鬼姓之国，而是族氏名，包含很多方国[14]，同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15]中论述一致，王氏以文献与铜器铭文互证，指出文献的鬼方泛指确定我国古代西北古老族群。但这样定义，有些太过于宽泛。从考古学文化上看，这样的族属并不可能是一个族延续这么长的时间。罗琨先生研究，武丁时并没有征伐过一个称之为“鬼方”的鬼姓邦国。文献中的鬼方是由“鬼”这个专名逐渐演化成统称的。并推断“高宗伐鬼方”不是记述武丁对某个鬼姓之国的征伐，而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对周人泛称为“鬼方”的西北游牧之诸族“多方的战争”。鬼方是一个地区所有部族的统称[16]。孙亚冰进而指出金文的鬼方也不是指一个方国，而是一个北方民族的统称；卜辞中的“鬼方”是《史记·殷本纪》记载的“九侯”，原在晋陕高原的李家崖附近，帝辛时迁到河北磁县[17]。

应该确定是说，文献中的“鬼方”是泛指，可能包括叛服无常的方国，也包括商王朝长期敌对的方国；殷墟卜辞中的“鬼方”，称“鬼族”，是商王朝的重要力量或友好方国。而西周金文中的“鬼方”，无从考证，暂且存疑。从考古角度看，过去所定义的“鬼方”及其相关文化遗存的讨论，都是以文献中“鬼方”为落脚点。考古学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存在着很大差异，不能以一个泛指的“鬼方”来考察考古学文化遗存。我们应该从殷墟卜辞的鬼方入手，来探究晋陕高原青铜器和鬼方之间的关系。

上文说到了“昜”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唐”，它是周成王封叔虞之地，位于山西南部，确切说，应该在临汾盆地一带[18]。从时间上看，记载“昜”的宾组卜辞不会晚于祖庚、祖甲时期。所以，这个“昜”应该在殷墟三期以前。王立新和孙亚冰二位先生都认为可能在洪洞坊堆——永凝堡遗址一代[19][20]。在洪洞附近有两处商代的青铜器群，洪洞杨岳[21]和洪洞上村[22]。杨岳青铜器时代为殷墟二期，上村的青铜器整体时代要稍早一些。“昜”应出现在武丁时期卜辞和武丁稍早阶段，相当于我们所说殷墟一期，但至迟不会晚于殷墟三期。这一时间段，恰与临汾盆地的这两个青铜器群时代相当。因此，推断“昜”可能就在洪洞附近，包括坊堆、永凝堡、杨岳和上村等青铜器群。

卜辞记载的“鬼方”和文献的“唐”接近，而这个“鬼方”与“羌”又发生过战争，说明鬼方在武丁时期（殷墟二期）活动在临汾盆地附近或临汾盆地以西的晋陕高原，到殷墟三期依然存在（见于四期卜辞）。它代表的是商文化，是商王朝的一族。但这个“鬼方”是确指，并不能代表所有具有殷商文化的晋陕高原青铜器群，只是这些群的一部分。具有典型商文化和遵循商礼制的，并在地域上与“昜”相邻的青铜器群有大宁太德青铜器群和隰县庞村青铜器群，这两个群，前者时代稍早，与洪洞上村差不多，为殷墟一期稍早阶段；后者为殷墟三期，与洪洞杨岳青铜器时代相当，有可能这两个地方就是殷墟卜辞记载的“鬼方”。一期卜辞以后鬼方消失，四期又出现，很有可能鬼方在武丁时期就迁走，是不是成为后来的“九侯”，也非常有可能。

二

卜辞中记录了大量的和𢀛方有关的史料，都很熟悉，兹不一一举例。这些记录反映了𢀛方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𢀛方的卜辞主要集中在武丁时期；二是𢀛方为商王朝西部的敌对方国；三是𢀛方力量强大，不仅商王亲征，而且战争持续很长；四是𢀛方并没有给商王朝大的伤害，至少卜辞中没有更多的记载，这可能在商王朝与𢀛方战争中，商王朝多胜的原因。

卜辞记载的𢀛方也应该在山西附近或晋陕高原。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敌对方国，竟然在文献中没有记载。恰恰巧合的是，文献记载与殷商王朝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鬼方，在殷墟卜辞中也没有记载。这不由使人将其二者联系起来。𢀛方是否就是文献中的“鬼方”，于省吾认为“以契文𢀛方之方位及为患之剧考之，亦非𢀛方无以当鬼方。[23]”王玉哲先生认为从音韵上，𢀛方与玁狁能够讲的通，地望上在山西中南部[24]。我们认为文献中的“鬼方”和文献中的“玁狁”不宜区分，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泛指，卜辞记载的“𢀛方”应是当时文献记载的“鬼方”一支，是确指。但𢀛方应该属于泛指的文献“鬼方”一部分，以卜辞记载𢀛方的力量来看，应是主要的一支。

𢀛方的相对位置可以依据其与其他族的交往来判断。𢀛方侵扰殷商领地，见于同版卜辞的地名有沚和长。

> 癸巳卜，㱿贞，旬亡祸。王固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䤵告曰：土方围于我东啚，𢦏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啚田。《合集》6057

这一条关于记载𢀛方最为重要的卜辞，不仅记述了𢀛方来自殷墟之西，还明确了土方与其的相对位置以及沚族在𢀛与土之间。沚族有自铭为“沚”的铜器，并为商王征伐过𢀛方、土方、羌方等，应该是商王朝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屏障[25]。卜辞中关于沚的记载主要出现在一、二和四期卜辞中，五期卜辞不见，可以说明在帝乙帝辛时候已

不存在或者不与商王朝发生关系。结合与沚发生过关系的诸方国，多数方国与商王朝敌对，并在商王朝边境，可以推测沚方是商王朝的重要边境力量。考虑晋西青铜器的发现区域和青铜器群特征，忻州连寺沟的青铜器[26]可能与沚有关。在时间上，忻州连寺沟青铜器有稍早的青铜器，如锥足兽面纹鼎，时代可能稍早于武丁时期，而整个青铜器群的时代下限不会晚于殷墟三期；在地理位置上，连寺沟位于太原盆地北进晋北的通道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连寺沟以北的忻定盆地和大同盆地没有发现殷墟时期的商文化特征明显的遗存，亦能说明忻州连寺沟墓地的“卡口”作用。

𢀛方还与长、𠂤、示、昜见于同版卜辞：

……自长友唐，𢀛方征……宎𠂤、示、昜。《合集》6063。

长地就是今天的长子县附近[27]；𠂤与示都在太原盆地[28]附近；昜，上面已经讨论过，就是文献中的“唐”，在洪洞附近。

以上和“𢀛”有关系的各个方国或族都在山西境内，并且大部分在汾河流域或晋陕高原的东部南部边缘。同时在这一片活动的还有土方、羌方、马方、龙方等这些方国，它们都是商王朝的敌人。从时间看，商与敌对方国的战争主要集中在武丁、祖庚、祖甲（殷墟二三期）时期，这和晋陕高原发现的青铜器时代是一致的。于是，很多学者将晋陕高原考古学文化与商代方国拟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

邹衡先生《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29]一文中认为晋陕高原遗存不属于商文化，而与光社文化关系密切。古代文献和甲骨卜辞中所记载的鬼方、𢀛方、土方均与此有关，并论证土方在今山西石楼一带，而 方与土方邻近，或在今吉县一带。刘敦愿先生根据石楼青铜器的特征，归纳出该民族龙蛇崇拜，通过分析以龙蛇纹样为主体装饰的铜器, 判断其为商代山西地区的戎狄族所制作，如果更具体化一点说, 很可能是鬼方的遗存, 也就是商周之际的“怀姓九宗”的遗存[30]。陈公柔先生《说媿氏即怀姓九宗》[31]和林沄先生《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及《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32]都指出鬼方大致在晋西北区域。陈全方、尚志儒《陕西商代方国考》[33]中确切说李家崖就是鬼方所在。戴应新先生《陕北和晋西北黄河两岸出土的殷周铜器及有关问题的探索》[34]一文认为，陕北和晋西北黄河两岸出土的殷铜器，既有商文化铜器，也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铜器，而有铭器物并不完全都是外来的，有的就是当地的文字，并指出这类本地铜器为鬼方、土方、𢀛方等民族所使用的“鬼方文化”，三族分布地域大致轮廓为，鬼方主要在黄河西岸，强盛时雄踞黄河中游两岸，土方在今山西石楼及其周围地区，𢀛方在吉县、永和一带。

以上的这些观点，都是将晋陕高原青铜器指向泛指的“鬼方”或殷墟卜辞的“多方”，从地理位置上看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卜辞记载的方国是确指，如何区分各个方国对应的晋陕高原各个地点的青铜器是一个难点。

李伯谦先生《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35]一文，对灵石旌介商墓及吕梁山一线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和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以灵石旌介商

墓为代表的旌介类型属商文化系统的一个地方类型，是臣属于商王朝、与之关系友好的方国遗存，吕梁山一线青铜器所代表的石楼——绥德类型是以舌方为主体的与商王朝基本处于敌对状态的诸方国文化。曹玮先生比较晋陕黄河两岸铜器，除共同点外，在沿黄河东岸的晋西北还出土了一些特殊器物，不仅不见于殷墟，也不见于陕西境内的黄河西岸，如弓形器、龙形觥、铎形器、高三足盘等，他认为晋西铜器模仿与改造是一大特点。所以依据这些信息，他推测黄河两岸应是两个文化上有着极大相似性的不同方国，西岸是鬼方，东岸是舌方[36]。张万钟《商时期石楼、保德与“沚方”的关系》[37]一文，对石楼、保德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的年代、特征、文化内涵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保德出土青铜器更多保存了游牧民族和本地特点，不属殷墟文化范畴，而以石楼为主的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大体属于殷墟文化的范畴，石楼一带即殷代的“沚方”。陶正刚《石楼类型商代青铜器的研究》[38]一文，将陕北、晋西以石楼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名之为石楼类型，并对其特点、时代以及与殷墟青铜器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认为石楼类型器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殷墟青铜器基本相同，一类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对其族属的讨论中认为鬼方是在山西境内、陕西、内蒙古等地一支古老少数民族的统称，包含有许多方国。并进一步论证石楼类型的石楼、绥德、清涧地区应是商时期的土方所在地。

李伯谦和曹玮等先生更加深入地阐述了晋陕高原青铜器不同类型所对应不同的方国问题，使其确指某方。但是上述的鬼方与舌方的概念不应混淆，卜辞中的鬼方上文已经引述说明，其为商王朝之重要附属方国或部族。

罗琨先生仔细考证了关于晋陕高原青铜器与鬼方、舌方等殷墟西北方国的卜辞后，认为晋陕高原青铜器属于商礼，并对石楼义碟、绥德墕头、永和下辛角、忻州连寺沟等地青铜器徽识进行了研究，提出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为商王朝四境内的文化，是为商人战胜后取得多方土地建成的据点遗存[39]。这种观点更加细致的分析了面对附属于商和敌对于商两种方国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问题，为深入研究青铜器与方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三

晋陕高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单纯的殷墟文化，就晋陕高原青铜器来看，应该分为三群，第一群，仅有殷墟风格青铜器的群，为殷墟文化；第二群，出土殷墟青铜礼器并含仿制殷墟青铜器的群。一部分仿制殷墟样式的青铜器，属于稍加改造，尽管造型奇特，在殷墟不见，但其纹饰并没有超越殷墟青铜器纹饰的界限，设计和铸造完全按照殷墟青铜器的铸造规范进行，依然存在浓郁的殷墟风气。该类青铜器不能判定为其他文化的青铜器，可以认为殷墟青铜器的地方类型。这一类与“李家崖文化”很是接近，但其族群与殷人关系密切，应为殷墟文化地方类型，或称“石楼—绥德类型”，或称

“石楼类型”；第三群，以吉县上东青铜器为代表的“上东类型”，青铜器群中很少看到殷墟文化的印记，如铃首剑和长的管銎斧以及带环的勺形器等。它们随意性强，与李家崖文化的生计模式不同，主要以游牧为主，也不能归属“李家崖文化”，它们有可能来自更远的草原。

商王派去很多与西北敌对方国征战的各族，不应忽视他们代表的文化遗存。因此，从动态的时空角度分析晋陕高原青铜器的族属问题，才是比较客观的。青铜器是权利与管控方式的体现，青铜礼器作为统治的符号和权利标志物，是王权地位的重要表征。晋陕高原青铜器不仅在单器、单组纹饰以及铸造工艺表现出强烈的殷墟色彩，在组合关系上缜密联系商礼。从逻辑上讲，敌对方国绝不会轻易抛弃既有的习惯去践行商礼。因此，绝大多数晋陕高原青铜器群（第一群和第二群）都应该考虑为商人贵族的用品。殷墟卜辞中𢀛方的入侵经常采用掠夺庄稼和人口的形式，是一种游牧民族，因为商王朝与𢀛方征伐的卜辞中所使用的“犪”与其他征伐不同，这是一种游牧民族在产生奴隶制度以后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行动，频繁与联合另一些这样的族群共同行动也是其特色[40]，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𢀛方的军事组织形式分散，且没有相对固定的处所，其生计模式定然以游牧为主。𢀛方对应的青铜文化应该是晋陕高原青铜器的第三群，即“上东类型”青铜器。此类型的青铜器并不多，所体现的并不是商礼，不属于商文化。晋陕高原应该是商王朝与𢀛方交战的前沿，这里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并不是𢀛方的“本营”，而是其侵袭的对象。

晋西陕北这个区域，位于南流黄河两岸，商代的气候要比今天宜人，年平均温度要略高2°[41]，温暖湿润，应该近于今天的河南南部区域。2010年，我们在实地调查了山西西部的晋西高原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后，更加确定了我们的这些想法。从山西吉县到保德，越靠近南部和越靠近谷底森林植被比较茂密，农作物与临汾盆地并没有什么差距。即使在黄土塬上，如灵石县的文殊垣，虽然地势很高，但垣上农民饮水很方便，都有水井，常年不干涸。永和下辛角发现过青铜器，我们在去这个地点考察时，令我们非常惊奇。汽车翻过很多沟壑后，来到了一个较大的垣上，垣上分布有好几个村子，一眼忘不尽垣际。这里地肥水美，树木成林，村民安居乐业，一幅世外桃源景象。在大宁太德村考察同样令我们振奋，这是一个更大的垣，满目尽是小麦，并不是高寒作物。在陕西清涧，从清涧县城到李家塔的路边可以看见季节河在枯水期还没有断流，河流两岸树木成行，岸边还有水草。这么多年伴随经济发展，晋西环境恶化，有目共睹，但即便是恶化，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恶劣。古代晋陕高原与今内蒙古西部草原是连成一片的，由榆林往北到内蒙古阴山之下这一广阔地区，在汉代以前是水草丰盛的沃土，并不像今日这样，有毛乌素沙漠横置其间，遮断南北往还[42]。距今约3000多年以前,今晋陕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大致为农业依然占有很大比例的半农半牧状态，不是“非有定居”的游牧社会[43]。2014年，同样在清涧辛庄遗址发现不同形式的建筑设施和石刀、石斧等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工具，清楚地反映了辛庄遗址为代表的李家崖文化先民应该是

以山地农业经济为主，并经营少量畜牧业的生业形态，可能将明显改变过去普遍认为我国北方早期青铜器文化属于所谓草原牧业文明的观念[44]。这些发现和观点，有助于我们对晋陕高原黄河两岸地理环境的重新审视。因此，我们认为舌方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一种草原文化，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晋陕高原附近或更北位置。

三类青铜器分别属于敌我双方，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晚商晋陕高原复杂的政治地理结构。但是，还有一只长期存在与晋陕高原上的“李家崖”考古学文化，其与晋陕高原青铜器和卜辞记载的各“方”是什么关系，需要加以分析。代表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重要的土著文化——李家崖文化，开始于朱开沟青铜文化结束时，即殷墟二期，结束在西周中期。这是以陶器作为典型标示物而定义的考古学文化，其由殷墟文化与朱开沟文化融合形成的新考古学文化。我们知道，殷墟二期时，商文化沿黄土高原东南两翼的伸展，恰好形成了针对此时商文化西北方的“钳形包围”或“犄角”拱卫之势[45]。在这个过程中商人控制一些小的方国，军事味道很浓，并逐渐建立星罗棋布的据点，这些据点并没有太长时间，所以晋陕高原并没有发现排列整齐的家族墓地，而是零散出现，很有特点。在这个扩张过程中遇到了来自草原民族南下的阻挠，并不断侵袭已形成的势力范围。因此，迁徙、征战及商品交换构成游牧社会经常性的活动，随之各种文化因素得以迅速传播[46]，当地土著文化发生了变异，形成李家崖文化。李家崖文化的居民，不属于草原文化，不是游牧经济模式，而是定居的农业经济模式，这一点在柳林高红遗址[47]和最近发掘的辛庄遗址[48]中更加明晰的看到。从族属看，李家崖居民的归属应该是极为复杂的。考古学文化和族，都是处在不断地变化当中，在此期间，考古学文化的分化，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融合、同化、替代，族的分化、族与族之间的融合、同化、征服，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在考古学文化与人们共同体、与族的对应问题上，有时也会出现十分复杂的情况，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一个考古学文化可以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所使用，一个族也可以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考古学文化[49]。所以，李家崖文化居民应该依附于晋陕高原青铜器所有者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属于不同的族。在殷墟二三期时总体是商王朝的居民。在殷墟四期，由于周文化的发展，晋陕高原青铜器中有了“重食器”的周文化风气，由此，李家崖文化也呈现出周文化的一些迹象，这个时候它的居民依附于具有周文化风气的青铜器群主。

四

综上所述，晋陕高原青铜器的殷商文化群（第一、二群）和北方草原文化群（第三群）分属于殷商王朝戍边贵族和殷墟卜辞记载的“舌方”。殷商王朝戍边贵族的组成非常复杂，有来自殷墟的王族，也有征服的方国，组织结构也是松散的，短暂的，且以据点为中心来完成抵抗外族入侵的任务。晋陕高原最为“热闹”的是殷墟二期，正是殷墟卜辞记载抵抗舌方入侵的时间。殷墟之末，殷商王朝边境失去控制，殷墟青铜器在这

个区域很少被发现。

武乙文丁之时，周人兴起。商王朝从武乙开始，周人在殷墟西境和西北境帮助商人歼灭了很多戎狄，其中在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提及：周王季伐西落鬼戎，浮二十翟王[50]。这里的“西落鬼戎”可能就是卜辞中的“舌方”，武乙时期其势力很大，它们的铜器遗存最南到达山西吉县。经过这次战争，可能向北撤退。以后文献没有再提及“鬼戎”，可能这次战争大大削弱了其实力。在文丁二年、四年、七年、十一年周人都有伐戎的战争，这些戎和“西落鬼戎”一起共同构成了殷墟以西和西北方向重要的戎狄集团，即文献中的鬼方。

在周人伐戎狄的过程中，周文化必然会影响到所征伐区域。从考古发现看，陕北甘泉阎家沟青铜器有显著的重食器倾向，说明周文化因素非常显著；在陕北较晚的铜器群，如清涧解家沟和后任家沟青铜器群，很有可能也与周人征伐戎狄有关。在晋西、晋中周文化因素也有体现，如汾阳杏花村墓地、浮山桥北墓地和灵石旌介墓地，它们的年代都属于殷墟三期以后。有些墓地有周文化的联裆鬲，或叫瘪裆鬲，这种瘪裆鬲与郑家坡文化的鬲非常相似，不可能是本地形成的。过去，邹衡先生提出关于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的关系就是注意到了此类器物。先周文化的器物在汾河流域出现，一定和周人的活动有关。但从史书记载和近来的考古发现，先周文化不会在汾河流域已基本成为共识。先周文化因素在晋中出现，最有可能是周人在武乙文丁时期对其北部的戎狄征伐所形成，在时间上也与该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阶段比较吻合。

入周以后，商代的鬼方并没有消逝。周初分封说“晋处于戎狄之间”，这些“戎狄”很有可能使商代鬼方的孑遗。在天马—曲村遗址M6231中，也发现有上东类型的长管銎斧[51]，这是值得注意的。令人奇怪的是，入周之后的晋陕高原，尽管有大量戎狄存在，却没有发现戎狄遗存。这种情况与上文分析“舌方”问题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是动态的、游牧的，并且来自草原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找到定居和农业生计模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注　释

[1] 孙亚冰，林欢. 商代地理与方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93、294.

[2] 胡厚宣. 甲骨文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余下简称“合集”.

[3] 钟柏生. 殷商卜辞地理论丛［M］. 北京：艺文印书馆，1982：196.

[4]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A］. 释鬼方易［M］. 北京：中华书局，1979：425.

[5] 同［4］.

[6] 罗琨. “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辩［A］. 甲骨文与殷商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9.

[7] 同［6］.

[8] 孙亚冰，林欢. 商代地理与方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95.

[9] 许进雄. 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M］. 加拿大：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9年. 余下简称“怀特”.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灵石旌介商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另见方诗铭，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5.

[12] 王玉哲. 鬼方考补证［J］. 考古，1986（10）.

[13] 李学勤. 商代地理简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75.

[14] 张亚初认为，鬼方可能以姓为国，分成了很多方国（张亚初. 殷墟都城与山西方国考略［A］. 古文字研究第十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83）. 把卜辞中的鬼方和文献中的鬼方都作为统称，不能解释文献中征伐鬼方和卜辞中没有征伐的矛盾问题.

[15] 王国维. 鬼方昆夷玁狁考［A］. 观堂集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 同［6］.

[17] 孙亚冰，林欢. 商代地理与方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8] 文献记载的唐与卜辞记载的唐也有区别. 文献中记载属于封唐的唐应该在殷周时写作“昜”. 详见朱凤瀚.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J］. 考古，2007（3）.

[19] 王立新.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J］. 中原文物，2003（1）.

[20] 同［1］.

[21] 赵志明，梁育军. 山西省博物馆近年征集的部分商代青铜器［J］. 文物季刊，1999（2）.

[22] 朱华. 山西洪洞县发现商代遗物［J］. 文物，1989（12）.

[23] 于省吾. 释方［A］. 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M］. 石印本影印，1994：6.

[24] 王玉哲. 卜辞方即玁狁说［J］. 殷都学刊，1995（1）.

[25] 孙亚冰，林欢. 商代地理与方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65、266.

[26] 沈振中. 忻县连寺沟出土的青铜器［J］. 文物，1972（4）.

[27] 郑杰祥. 商代地理概论［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304.

[28] 同［27］：98～302.

[29] 邹衡. 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领境文化的初步探讨［A］.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30] 刘敦愿. 山西石楼出土龙纹铜觥的装饰艺术与族属问题［J］. 文史哲，1983（5）.

[31] 陈公柔. 说媿氏即怀姓九宗［A］. 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89.

[32]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A］. 林沄学术文集（二）［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9～76.

[33] 陈全方，尚志儒. 陕西商代方国考［J］. 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4] 戴应新. 陕北和晋西北黄河两岸出土的殷周铜器及有关问题的探索［A］. 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C］.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35］ 李伯谦. 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36］ 曹玮. 陕北出土青铜器（第一卷）［M］. 成都：巴蜀书社，2009：34 ~ 39.

［37］ 张万钟. 商时期石楼、保德与“沚方”的关系［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11）.

［38］ 陶正刚. 石楼类型商代青铜器的研究［J］. 殷都学刊，1991（4）.

［39］ 同［6］.

［40］ 同［6］.

［41］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1）.

［42］ 侯仁之. 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三迁是谣传［J］. 文物，1976（2）.

［43］ 唐晓峰. 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2）.

［44］ 种建荣，孙战伟.陕北发现商代大规模重楼环屋式建筑群［N］. 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19日第8版.

［45］ 张忠培，朱延平，乔梁. 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284.

［46］ 乌恩岳斯图.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iii.

［47］ 马昇，王金燕. 对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的几点认识［N］. 中国文物报，2007-1-12（7）.

［48］ 种建荣，孙战伟. 陕北发现商代大规模重楼环屋式建筑群［N］. 中国文物报，2014-12-19（8）.

［49］ 李伯谦. 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A］. 感悟考古［M］. 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38.

［50］ 方诗铭，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 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4.

［51］ 邹衡.天马—曲村（1980 ~ 1989）［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图版一〇七，1.

Another Discussion on Relations of the Jin-Shan plateau bronze and Shang Dynasty’s Peripheral Polities

Han Binghua

Abstract: This paper collated the past literature and the Yin Ruins inscriptions. These previous studies proposed that the Guifang in the literature were “Peripheral Polities” rebelling against the Shang Dynasty or permanent enemies. These included the Tu polity in the Yin Ruins inscriptions, Qiang polity and 舌 po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Shang bronze represents the dominate group in Jin-Shan plateau and the bronze is the frontier of Shang Dynasty aristocratic remains. The Shangdong type represents 舌 polity, mainly nomadic economy,

distributed in the edge of the Jin-Shan plateau and the further northern grassland. Sha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military arist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resistance of 舌 polity's intrusion and made the nobility as the chief. These military aristocracies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Jin-Shan plateau and became a unique type of culture which was in frequent contact with the aboriginal culture "Li Jiaya Culture".

Key words: The Jin-Shan plateau bronze; Gui Peripheral polity; 舌 Peripheral polity; the belonging

嫩江平原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

——兼析“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带”等学术概念

郑君雷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州，510275）

嫩江平原主要是指嫩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行政范围大致包括黑龙江省西部的齐齐哈尔、大庆地区和吉林省西北部的白城地区。嫩江平原地处东北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区的连接地带，与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也有文化关联；其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涉及考古学上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地带”“东北文化区”[1]“欧亚内陆”[2]等学术概念的认识，其中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一、考古学术语中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

据夏明亮等对学术史的梳理[3]，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水野清一[4]1935年最早提出和使用“长城地带”的概念，美国学者拉铁摩尔[5]在则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等的学者”（1939年）。而“大陆学者最早、最全面对‘长城地带’进行论述、划分的”是苏秉琦先生，“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是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六大区系之一。此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题逐渐深入……这使‘长城地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名词”。

“长城地带”确实只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名词，至少其地理范围就是模糊的，而且似乎也未对“长城地带”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6]概念的异同作过认真讨论，多数情况是混为一谈。我以为，考古学上“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指代不同。后者明言“北方”，是将“长城地带”的文化史置放在类似于区系框图的“北方地区”中加以考察，文化内涵和地理范围较之“长城地带”也就出现了差异。另外，后者同时又将“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史置放在欧亚草原的宏观背景和学术视野中加以考察，所以强调了“中国”。

林沄先生认为，“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

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7]。这段话概括出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本质文化属性和历史发展脉络，也界定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地理范围。

柯斯莫使用“北方地带”称谓“包括东起黑龙江、吉林西达新疆连绵的沙漠、草原和森林地区”[8]，地理范围与中国考古学术语中习惯表述的“北方地区”“北方文化带”和“长城地带”均有不同。林沄先生在对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的述评中，指出柯氏将新疆尤其是东北地区纳入“北方地带”未妥。林沄先生理解的“北方地带”实际是他所说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不包括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因此主张将“黑龙江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一样看作东北系青铜器与北方系青铜器同时到达的文化交叉地带”[9]。

考古学研究中通常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分为东、中、西三部分，或者称为东、中、西三段，多数学者以文化史上的辽西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市和辽宁西部的朝阳市）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依林沄先生的认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起西辽河流域”，则其东段或可包括内蒙古东南部的通辽市和辽宁北部的铁岭；再向东北方向，则是属于“文化交叉地带”的黑龙江西部。黑龙江西部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系，或者说黑龙江西部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上的意义，再明确地说“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能否延伸至黑龙江西部，有必要加以讨论。黑龙江西部的核心地域，就是嫩江平原。

二、嫩江平原的考古遗存和历史背景

在本文的研究中，嫩江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套用黑龙江区域考古学的框架体系，分别称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早段（战国西汉）、早期铁器时代晚段（东汉魏晋）[10]和辽金时期。

（1）赵宾福将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编年划分为三段，即：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距今6500年左右）、靶山类型（距今5500～5000年）和昂昂溪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11]。青铜时代以后，嫩江流域“识别了夏至魏晋时期的六支文化遗存。这六支考古文化遗存依年代早晚顺序分别是小拉哈文化（夏至商代早期）、古城类型（ 商代晚期）、白金宝文化（ 西周至春秋时期）、汉书文化（ 战国至西汉时期，按，有些学者称为汉书二期文化）、红马山文化（东汉时期）、大安渔场墓葬遗存（魏晋时期）”[12]，赵宾福并且将嫩江流域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具体划分为七段，而以汉书二期文化晚期为代表的第八段已经进入西汉纪年。[13]

（2）“平洋墓葬”包括泰来县砖厂墓地和战斗墓地[14]。平洋墓葬主体年代属于战国，晚期阶段可至西汉中晚期，“平洋墓葬就是汉书二期文化的墓葬”[15]的认识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公认。嫩江平原汉书二期文化的其他墓葬地点包括讷河大古堆[16]、富裕小登科[17]（晚期墓葬）、杜尔伯特官地[18]、镇赉坦途北岗子[19]等地，时代大致在战国，通榆兴隆山墓地[20]年代在西汉中晚期，齐齐哈尔三家子墓地[21]的年代整体晚于平洋墓葬，可能进入东汉纪年。吉林大安后套木嘎第六期遗存亦属于汉书二期文化，年代范围在战国至西汉。

汉书二期文化在西北方向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完工墓地主要含有汉书二期文化和西汉匈奴文化两种文化成分，“在保持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主要体质特征的同时，完工墓地的人群受到来自西北部匈奴文化的强烈影响”[22]，年代相当于西汉中晚期。在松辽平原中部，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23]（西汉中晚期）、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24]（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夫余遗存）见有汉书二期文化因素的流布。在东面，汉书二期文化与干流松花江上游的“庆华遗存”也有文化联系。

汉书二期文化是战国西汉时期松嫩平原北部最为强势的考古学文化。关于汉书二期文化居民的族属，早年曾经有学者认为平洋墓葬为拓跋鲜卑及其先世遗存[25]，有些学者则将松嫩平原北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夫余先世北夷槖离国挂钩[26]，尚无一致意见。平洋墓葬居民的人种类型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接近（也与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相关）[27]，新近研究表明汉书二期文化居民（后套六期组、平洋组、大古堆组和完工组）属于先秦时期的古东北类型[28]。

（3）嫩江平原东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红马山文化为代表，红马山文化分布于靠近嫩江中游的上游下段，主要包括讷河市境的红马山遗址、二克浅晚期墓葬[29]、库勒浅晚期墓葬[30]、兔子地遗址和嫩江县境的铁古拉遗址等。张伟指出，“红马山文化与汉书二期文化、平洋墓葬在年代上应该是接续的”，陶器群中的“壶、单耳杯、豆、三足兽形器、支座等，是汉书二期文化和平洋墓葬等考古遗存的传统器物……属于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传统”，而“数量众多的罐”则显示了与呼伦贝尔东汉遗存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31]。红马山文化与大兴安岭西侧的拓跋鲜卑遗存关系密切，乔梁认为这“表明了南下的拓跋鲜卑集团中还有向东挺进到嫩江流域的一支”[32]，倪润安则认为红马山文化向西影响到了呼伦贝尔地区的汉代遗存。吉林大安渔场墓地[33]一般认为魏晋时期的鲜卑墓地[34]，潘玲认为时代约在东汉晚期[35]。

（4）北朝隋唐时代的嫩江平原属于南部室韦居地，但是考古遗存基本是空白。近来张伟、田禾将大庆沙家窑辽墓改定为唐代早、中期，认为其中包括室韦、契丹和黑水靺鞨三种文化因素[36]辽代南部室韦被纳入契丹之地。大致以嫩江为界，以西属于上京道，以东属于东京道（金代嫩江以西属于临潢府路，以东属于上京路）。吉林白城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和大安市“塔虎城遗址”与辽代泰州和长春州有关，其中泰州属于节度使级建制。根据乔梁、杨晶的介绍[37]，嫩江流域的辽代墓葬发现主要有龙江朱

家坎墓地、龙江西甸子墓、龙江广厚二村墓、齐齐哈尔三合砖厂墓、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墓、齐齐哈尔长岗子墓、泰来辽墓、泰来塔子城墓、泰来后窝堡墓、泰来平等村墓等。

辽泰州（城四家子古城或塔虎城）金代沿用为新泰州，设置都统司、元帅府、节度使、东北路招讨司等机构；克东县乌裕尔河南岸的蒲裕路城也是金代重要城址[38]。辽金时期嫩江下游称为鸭子河，是辽金皇帝“春捺钵”之地，吉林乾安县花敖泡东南岸和查干湖西南岸发现辽金时期的春捺钵遗址群。此外，自嫩江西岸至大青山的金界壕，东端起自嫩江西岸的莫力达瓦达翰尔旗，向西南的金中都方向延伸。

至此，可以根据历史背景和考古发现将嫩江平原的考古遗存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约公元前4500年至春秋时期）、汉书二期文化（相当于战国西汉）、红马山文化和以大安渔场墓地为代表的遗存（东汉魏晋时期）和辽金遗存（以辽代遗存为主体）。

辽金以后，元代的嫩江平原先后属于铁木哥斡赤斤后王封地和辽阳行省（开元路和泰宁路），明代先是属于努尔干都司辖地，其后海西女真与兀良哈大致以嫩江为界分布。元明时期的嫩江平原主要是兀良哈的游牧区，考古遗存发现不多。元代沿用辽金泰州城故址，先后设置泰宁卫、泰宁府，明代设置为兀良哈三卫之一的泰宁卫指挥司，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清代嫩江平原还有达斡尔族和自新疆东迁的柯尔克孜族居住，配合尼尔基水利枢纽水库建设开展的文物普查中，在嫩江中游左岸发现9座达斡尔族将军墓[39]。

三、嫩江平原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及生业形态的阶段性变化

张忠培先生指出，嫩江流域（包括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附近和呼伦贝尔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40]。嫩江平原不同阶段的考古遗存分别显示出与东北文化区、北方草原文化区以及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联，并且反映出生业形态的阶段性变化。

（1）嫩江平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存属于东北文化区的范畴。新石器时代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的夹砂直口筒形罐是东北文化区的典型陶器形制，靶山类型和昂昂溪文化发达的细石器、骨器（单排倒刺骨鱼镖、侧边凹槽骨刀梗、曲柄骨枪头等）表现出以“渔猎为主的经济形态，代表着东北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41]，这种渔猎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历史时期，甚至可以在这层文化意义上理解辽金皇帝的“四时捺钵”制度。

进入青铜时代，“小拉哈文化应该是由本地区以附加堆纹筒形罐为代表的昂昂溪文化稍晚阶段的遗存发展而来的，并且经过以白金宝F3012组为代表的过渡阶段，最后演化成了白金宝文化”[42]。嫩江平原青铜时代和战国西汉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在陶器

的形制、纹饰、组合等方面显示出东北文化区的特征，以及与东北地区的考古遗存的普遍关联。

（2）至汉书二期文化阶段，嫩江平原与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联较为明显。根据潘玲对平洋墓葬文化因素的分析[43]，早期墓葬（战国早、中期）“随葬的明确可判定年代的铜器都来自于长城地带，如双孔饰、鼓腹管、双联泡、齿状饰，其中鼓腹管和双联泡在长城地带各区都有发现，是较为普遍流行的器物”。中期墓葬（约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管銎的和銎孔式的铜镞、镂空球形铜铃、狗为主要用牲畜类方面”，其中来自冀北玉皇庙文化的因素仍然占主体；但是早期流行的“一次单人葬”已经逐渐转变为以“二次多人合葬”为主要埋葬形式。

平洋墓葬的主体文化因素仍然属于东北文化区。而且至平洋墓葬晚期（西汉中晚期），“来自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已经所剩无几”；早期墓葬的三足陶罐虽然也是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但“很快吸收了嫩江本地的传统使形制发生变化”。潘玲还指出平洋墓葬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因素有“燕尾形”骨镞，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主要是金丝拧绕耳饰。王立新注意到，受贝加尔湖沿岸古代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珍珠纹陶器在嫩江流域“从晚商前后出现，中经白金宝文化而延续到汉书二期文化”[44]。

《平洋墓葬》认为“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渔猎，停留在‘俗随水草，居无常处’、食肉衣皮的游牧状态中”[45]。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平洋墓葬（汉书二期文化）古代居民“当是东北地区以渔猎为主的人群集团，但是受到来自北方长城地带（戎狄）文化因素的强烈冲击和来自蒙古高原（胡人）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外，嫩江下游的肇源望海屯遗址发现过反映吉林农安田家陀子遗址文化因素的遗存[46]。

（3）东汉魏晋时期，嫩江平原以红马山文化和大安渔场墓地为代表的考古遗存显示出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密切联系。倪润安认为新莽至东汉早期以拉布达林组墓葬为代表的遗存来自红马山文化，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晚期以扎赉诺尔组墓葬为代表的遗存“主要文化因素是来自海拉尔河以北地区的红马山文化和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同时也包含了此前平洋文化在当地的遗留因素”，而“嘎仙洞应视作红马山文化从东向西翻越大兴安岭过程中的遗存”[47]。

乔梁则认为：“到了东汉阶段，红马山文化所体现的与大兴安岭西侧早期鲜卑文化的联系，表明了南下的拓跋鲜卑集团中还有向东挺进到嫩江流域的一支，类似的遗存发现的线索尚很少，反映了鲜卑的东进可能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扩张，但从远在三江平原腹地的凤林古城所出土的鲜卑式铜鍑来看，汉晋时期鲜卑集团对东方的影响仍不能小觑。汉书文化的终结很可能与鲜卑的东进南下存在着联系，除去红马山文化在大兴安岭东侧的出现外，以往在吉林大安渔场和后宝石等地的发现也能够透露一些端倪”[48]。

虽然“呼伦贝尔地区的东汉时期考古遗存对红马山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但是红马山文化与汉书二期文化、平洋墓葬“存在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而且“大安渔场

墓地遗存与红马山文化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49]。红马山文化的文化基础仍然在于东北文化区；随着红马山文化的确认，大安渔场墓地的文化性质（是否鲜卑遗存）出现继续讨论的空间，不能轻易排除东北文化区衍生物的可能性。“红马山文化经济类型以渔猎经济形态为主，辅之于原始农业”[50]，大安渔场墓地的经济形态主要应该是渔猎畜牧兼营。

（4）辽金时期，嫩江平原的考古遗存表现出东北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区的复合性状，生业方式也呈现出游牧、渔猎、农耕的混合形态。如果大庆沙家窑唐墓包涵“室韦、契丹和黑水靺鞨三种文化因素”的认识不误，嫩江平原考古学文化的复合性状和生业方式的混合形态在唐代早、中期就已经出现了。

契丹是游牧民族，渔猎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辽朝建立前许多契丹人已经定居农耕。但是辽代族群构成（契丹、奚–汉、渤海）和经济形态的二元结构（游牧–定居农耕）整体上仍然存在。辽帝国政治重心和文化根基所在上京、中京处在北方草原边隅的西辽河流域，实际上是文化地理上的“辽西区”范围，因此辽帝国通常被视为东北地方民族政权，仍然属于东北文化区的范畴。

乔梁、杨晶指出，嫩江流域随着契丹势力的崛起，“这一区域成为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辽朝在此建立了泰州等行政设置以统辖之”[51]。他们认为，嫩江平原辽墓的族属除契丹人以外，“砖圹墓的死者之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承担着耕牧和摇役戍边双重任务的汉族边户”，“由塔子城所出的辽‘大安七年’残刻来看，当地的汉人不仅数量较多，同时还结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汉人也有可能被编入乣军或与之相关的组织”；而“富拉尔基墓和二村墓群正处于辽代突吕不室韦部和涅剌拏古部的分布区域之内”，泥质陶、细颈长体的壶类、用猪头骨或猪下颌骨随葬等现象皆非契丹葬俗，“有可能同辽代的室韦部族有关”。从这些线索看，嫩江平原的辽金遗存反映了契丹、汉人、室韦、女真的共处和融合。

（5）元明时期嫩江平原多为兀良哈的游牧地。以游牧为主，清代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定居在村落里，但是畜牧业非常重要，从事农牧兼营的经济生活[52]。清代迁移到嫩江平原的柯尔克孜族最初被限制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在嫩江、乌裕尔河沿岸边狩猎边游牧，后来出现了定居村落并发展起粗放农业，但是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53]。

元明时期嫩江平原古代居民的生业方式先是向游牧转化，至清代逐渐发展起粗放农业，以农牧兼营为主，但是渔猎经济依然较为重要。在民族志中，农耕生活杂有浓厚畜牧因素的族群，生计方式往往更为复杂，1930年代的达斡尔族尚且“朝为农而暮为猎，今日为匠而明朝为渔，善养牲畜，能驯劣马”[54]。

四、相关学术概念辨析及“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

在北方地区和涉及蒙古高原乃至欧亚内陆的考古学研究中，时常出现“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带”“北方地带”等称谓。讨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需要对这些考古学概念略加辨析。

首先是要明确“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长城地带”“长城地带”这三个概念在文化涵义上的异同。前面已述，考古学上的“长城地带”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指代不同。如果不是突出强调“北方长城地带”文化史在欧亚内陆意义上的宏观背景和学术视野[55]，则“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和“北方长城地带”这两个概念应当等同，而与“长城地带”有差别。

长城具有文化标识和文化符号的意义。“（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是在“北方地区”[56]或者“北方历史–文化区”[57]的区系框图中（即“北方地区中的长城地带”），以中原农耕文化区为参照坐标，以燕山南北和内蒙古中南部为地域重心，以生态环境作为基础，强调“游牧”与“农耕”在族群、环境、生业、文化、社会形态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二元对立和统一。其经济文化类型具有弹性，表现为“时农时牧”或“农牧结合”的经济文化特性和历史特征，其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酝酿长城和长城发挥作用的时间段上。

而“长城地带”超出了“北方地区”（或“北方历史–文化区”）的区系框图背景，地域范围可以延伸至西汉烽燧经行的新疆东部，也可以延伸至燕秦汉长城和明长城经行的辽东，甚至西北朝鲜[58]；若将金界壕视作长城，还可以包括进入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岭北长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大，长城作为北方“游牧”与中原“农耕”二元对立统一的生态基础和文化意义也就淡化甚至不存在了，其作为地理符号的意义超出了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所表述的时间段也就可以包括长城酝酿和形成之前。

因此，乌恩先生所说的“长城地带”[59]实际与柯斯莫的“北方地带”大致相同，这也是苏秉琦先生可以在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体系中使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原因所在，他不过是以长城为地理符号来表述“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虽然地域范围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基本重合[60]。

明乎此，我们就清楚杨建华先生的“北方文化带”[61]和“长城地带”[62]，田广金先生定义的“农牧交错带”[63]，乌恩先生所说的“长城地带中段”，其实都是指“（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杨建华先生的“中国长城地带”[64]主要也是指“（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不过是兼及了“北方地区东北部的松花江、嫩江流域”。这些概念的文化内涵和地理范围、甚至时代意义，均与柯斯莫的“北方地带”有差别。而林沄先生译为英文的“北方地带（Northern Zone）”[65]，在中文语境中其实就是“北方地区”。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带”“北方地带”这些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66]和佟柱臣先生提出的三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67]。作为考古学术语的“考古学文化带”似乎也没有专门性的讨论。我觉得考古学上的“文化地带”也有严格意义和宽泛意义的区别，考古学文化带具有文化廊道性质，内部的族群结构经常是不稳定的，但是仍然具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主要是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带，“长城地带”则显得宽泛，虽然也有“圈点纹”的例子[68]。

关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地理范围，东西方向上（横向），林沄先生认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69]，青海是否属于这一地带仍有不同看法[70]；而杨建华先生认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中心是冀北地区[71]。至于南北方向（纵向），似乎只有田广金、郭素新先生作过界定[72]。

就嫩江平原而言，我们注意到其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文化性质的某些关联性，而且金界壕也被很多学者视为广义上的长城，但是不赞成将嫩江平原纳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范畴。“历史上的黑龙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大约自史前时期一直到金代以前，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东、西两大区系。其中以嫩江流域为重心的西部地区，因西与蒙古草原地带相接壤，故经常处于以游牧为主体经济的文化系统的影响之下”[73]。但是嫩江平原以东、以南地区，是“东北文化区”的范畴，而且嫩江平原作为北方草原文化区与东北文化区的接触地带，战国以后考古遗存所显示的经济形态更多地表现出游牧、渔猎和农耕的“三位一体”，而非游牧与农耕的“二元对立统一”。

嫩江平原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联性，主要发生在汉书二期文化阶段。汉书二期文化居民属于先秦时期的古东北类型。而在北方长城地带东段的辽西丘陵，自青铜时代已经开始出现不同类型人群的共存，表现为自早期青铜时代“以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分布区的古华北类型人群向辽西地区及华北平原地区的扩散”，但是在西辽河以北的东北地区还未有相关新材料的发现[74]。这也在体质人类学上说明了嫩江平原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居民构成的差异。

北方游牧文化对东北文化区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嫩江平原。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讲的，“在北方草原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东北文化区的接触地带（即长城地带及其向西辽河和嫩江流域的延伸方向），不同文化系统的作用是相互的、持续的，文化因素彼此渗透，考古学文化面貌往往呈现出复合性状（虽然主体系统仍然各自有别）”[75]。嫩江平原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自汉书二期文化以来即已经呈现出复合性状；明代嫩江还是北方游牧文化区与东北渔猎、农耕文化区的界线。嫩江西侧的大兴安岭作为天然屏障，似乎也起到了类似长城的作用。但是依照前面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理解，嫩江平原不宜视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至于是否属于“长城地带”或“北方地带”的范畴，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注 释

［1］ 郭大顺. 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余太山认为“欧亚内陆”是地理名称，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 余太山.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

［3］ 夏明亮，童雪莲. “长城地带”考古学术语属性探讨［J］. 东北史地，2012（5）.

［4］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 内蒙古・长城地带［A］. 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C］，1935.

［5］ 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 依夏文统计，首次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为题名的学术会议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首次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为题名的论述是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2002年）. 林沄先生2002年3月在台北召开的“文化差异与通则：纪念张光直先生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此文，2003年5月发表于《燕京学报》新十四期，后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二）.

［7］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A］. 林沄学术文集（二）［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9.

［8］ 柯氏执笔的《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为《剑桥中国先秦史》第十三章. 转引自注释［4］林沄文。

［9］ 林沄.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A］. 林沄学术文集（二）［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78～79.

［10］ 黑龙江考古学界一般认为早期铁器时代早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两汉，早期铁器时代晚段相当于魏晋南北朝. 参见许永杰.黑龙江省铁器时代的聚落考古［A］.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1］ 赵宾福. 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A］.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2］ 张伟，田禾. 嫩江流域唐代文化遗存辨识——以大庆沙家窑辽墓为出发点［J］. 北方文物，2012（1）.

［13］ 赵宾福.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69.

［1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平洋墓葬［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5］ 潘玲，林沄. 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讷河大古堆墓地发掘简报［J］. 文物，2009（6）.

［1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小登科墓葬及相关问题［J］. 北方文物，1986（2）.

［18］ 赵善桐. 黑龙江官地遗址发现的墓葬［J］. 考古，1965（1）.

［19］ 白城地区博物馆等. 吉林省镇赉县坦途北岗子青铜时代墓葬清理报告［J］. 博物馆研究，1993（1）.
［20］ 中澍. 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J］.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3）.
［2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齐齐哈尔市大道三家子墓葬清理［J］. 考古，1988（12）.
［22］ 潘玲.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48～150.
［23］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J］. 文物，1960（8～9）.
［2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榆树老河深［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5］ 同［14］.
［26］ 干志耿提出白金宝文化为"橐离文化"，见干志耿. 古代橐离研究［J］. 民族研究，1984（2）. 王绵厚提出庆华古城为夫余先世"橐离国"故地，见王绵厚.秦汉东北史［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60.
［27］ 潘其风. 平洋墓葬人骨的研究［A］. 平洋墓葬［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8］ 肖晓鸣，朱泓. 汉书二期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基于后套木嘎遗址人骨新材料的探索［A］. 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9］ a. 安路，贾伟明. 黑龙江讷河二克浅墓地及其问题探讨［J］. 北方文物，1986（2）.
b.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 考古，2003（2）.
［3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市库勒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 考古，2006（5）.
［31］ 张伟. 红马山文化辨析［J］. 北方文物，2007（3）.
［32］ 乔梁. 黑龙江汉晋时期考古学遗存的分布与文化格局［A］. 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33］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等. 大安渔场古代墓地［J］. 考古，1975（6）.
［34］ 杨晶. 吉林大安渔场墓地的时代与族属［J］. 考古与文物，1988（4）.
［35］ 潘玲. 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A］. 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36］ 同［12］.
［37］ 乔梁，杨晶. 黑龙江省西部的辽代墓葬［J］. 北方文物，2001（4）.
［38］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裕路古城发掘简报［J］. 考古，1987（2）.
［39］ 许永杰. 黑龙江考古界说［J］. 北方文物，2001（4）.
［40］ 张忠培. 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J］. 北方文物，1997（1）.
［41］ 同［1］.
［42］ 赵宾福. 松嫩平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认识［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3］ 潘玲. 平洋墓葬再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44］ 王立新. 中国东北地区所见的珍珠纹陶器［A］.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5］ 同［14］.
［46］ 同［32］.
［47］ 倪润安. 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A］. 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8］ 同［32］.
［49］ 张伟. 红马山文化辨析［J］. 北方文物，2007（3）.
［50］ 同［49］.
［51］ 同［37］.
［52］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5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 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54］ 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编著. 中国民族学概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55］ “北方长城地带”是开放的文化单元，中国北方考古尤其是北方民族考古更是国际性的学术课题，在某些话语体系中，“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概念较之“北方长城地带”表述得更为清晰.
［56］ 苏秉琦划分的“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之一（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 北京：三联书店，2001：50），深刻地影响着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57］ 田广金，郭素新. 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A］. 北方考古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58］ 西北朝鲜发现有燕汉时期的大宁江长城. 郑君雷. 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J］. 史学集刊，1997（1）.
［59］ 乌恩认为长城地带通常泛指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长城地带中段指东起辽西、西至甘肃东部这一地域. 乌恩岳斯图.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
［60］ 苏秉琦、殷玮璋划定的“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范围，“从东向西主要包括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三个部分”. 苏秉琦.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 文物，1981（5）. 这也说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形成有其历史基础.
［61］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62］ 杨建华认为所谓长城地带，大致指西起陇山向东至鄂尔多斯高原，再向东至桑干河河谷至燕山.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

［63］　田广金，郭素新.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A］. 北方考古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64］　杨建华. 欧亚草原的经济类型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评价［A］. 北方先秦考古研究［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65］　林沄.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A］. 林沄学术文集［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66］　童恩正.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A］. 文物与考古论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67］　佟柱臣1985年提出“阴山”“秦岭——桐柏山——汉水——淮河”“南岭——武夷山”三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

［68］　以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为中心，从新疆至吉林，商末周初之际至魏晋十六国的骨角器上均发现过圈点纹. 潘玲. 圈点纹浅析［A］. 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9］　同［7］.

［70］　同［9］.

［71］　杨建华认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依地理特征及其文化面貌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以陇山为中心的甘肃宁夏地区、以鄂尔多斯高原、岱海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和以桑干河、燕山为中心的冀北地区.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8.

［72］　田广金、郭素新认为，在“北方历史——文化区”所涵盖的狭长地域中，“历史时期修筑了两道长城. 从陇东始，至陕北后分为南北两道，北侧为战国秦汉长城线，南侧为明代长城.两道长城于张家口靠拢，呈横‘X’状分布，其间部分统称为北方长城地带”. 田广金，郭素新. 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A］. 北方考古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74.

［73］　同［37］.

［74］　同［28］.

［75］　马艳，郑君雷. 林西井沟子的早期游牧社会及其他——《林西井沟子》读后［J］. 考古，2013（12）.

Nenjiang Plain and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The Great Wal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 Concurrent Analysis on Academic Concepts as “The Great Wall Area” and “Northern Cultural Area”

Zheng Junlei

Abstract: Nenjiang Plain is the linking belt between the nomadic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grassland area and northeast cultural area. The geographical range of some academic concepts, such as “The Great Wal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Northern Area”, “Northeast Cultural Area” and “Euro-Asian Inland”, are relat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Nenjiang Plain, especially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Wal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and Nenjiang Plai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elements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Nenjiang Plain, making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age change of economic form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Nenjiang Plain. This paper is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concepts, such as “The Great Wal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and “The Great Wall Are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Nenjiang Plain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The Great Wal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Key words: The Great Wal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East Boundary of The Great Wal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Nenjiang Plain; The Great Wall Area; Northern Cultural Area

汉代官营漆器生产的相关问题*

——以蒙古国诺音乌拉墓葬出土漆器为中心

内田宏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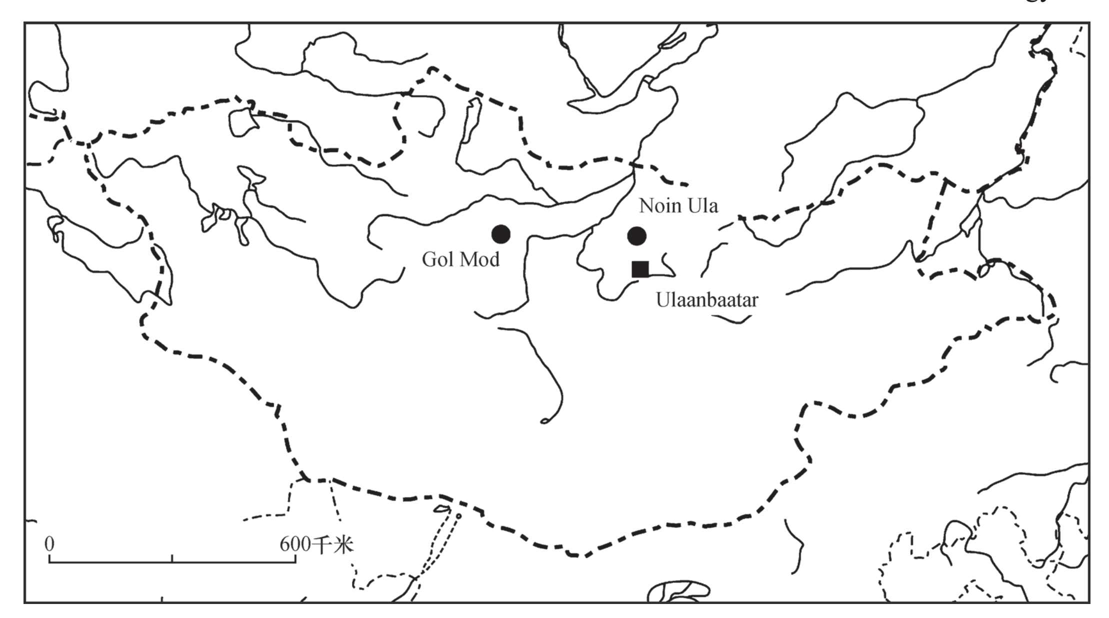
（国学院大学，日本东京）

一、蒙古国匈奴墓葬出土漆器

对于诺音乌拉（Noin Ula）墓葬（图一），1910～1930年间进行了发掘调查，出土了两件“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的耳杯（图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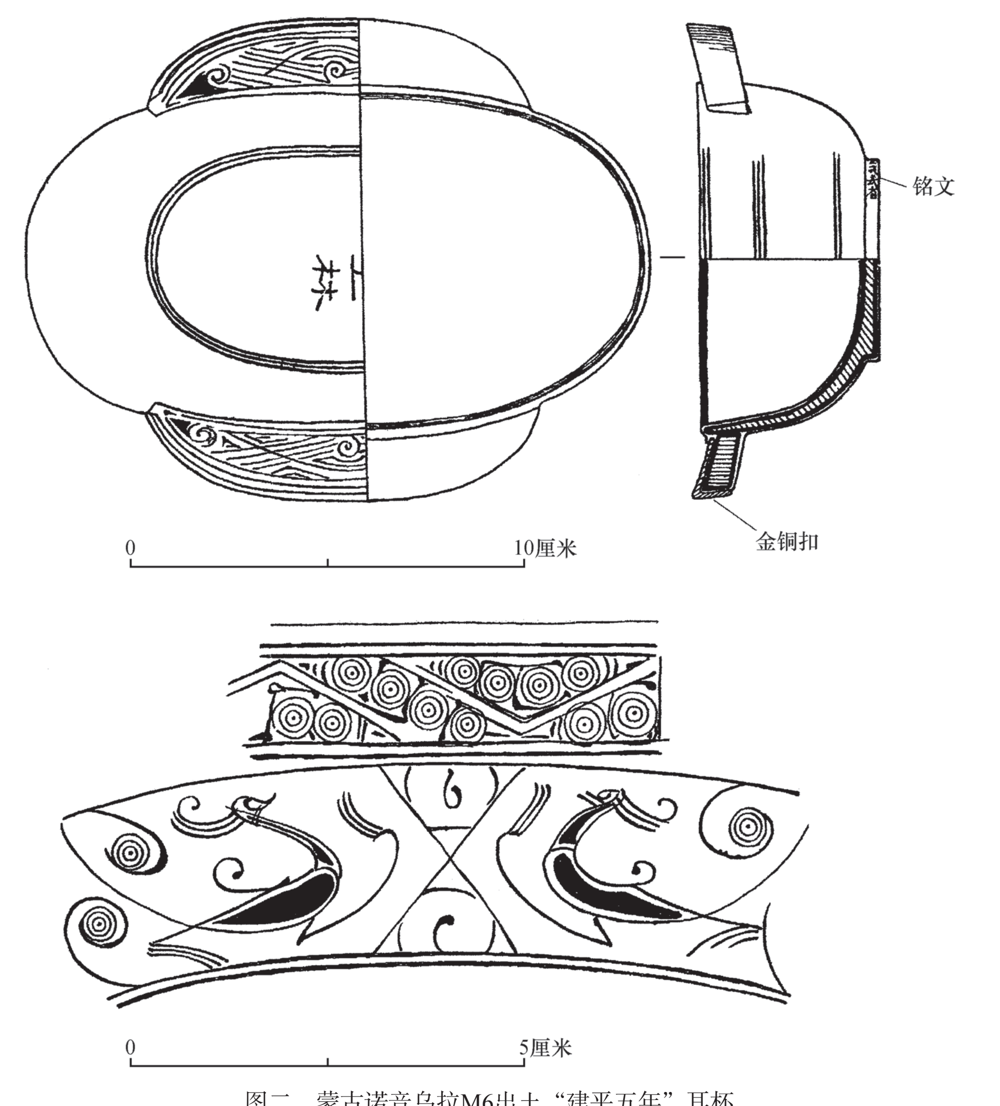
在蒙古国，2000年后也继续对匈奴墓进行调查，在诺音乌拉（Noin Ula）墓葬M20贵族墓发现了两件，在后杭爱县（ArkhangayAimag）的GolMod墓葬M20贵族墓也发现了一件有刻铭文的漆器[2]。在此选取诺音乌拉（Noin Ula）M20的漆器来探讨。

关于该两件漆器，笔者于2013年在蒙古考古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图一　蒙古诺音乌拉（Noin Ula）墓葬与Gol Mod墓葬分布图

* 本研究得到2012～2015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若手研究（B）（课题号码：24720353）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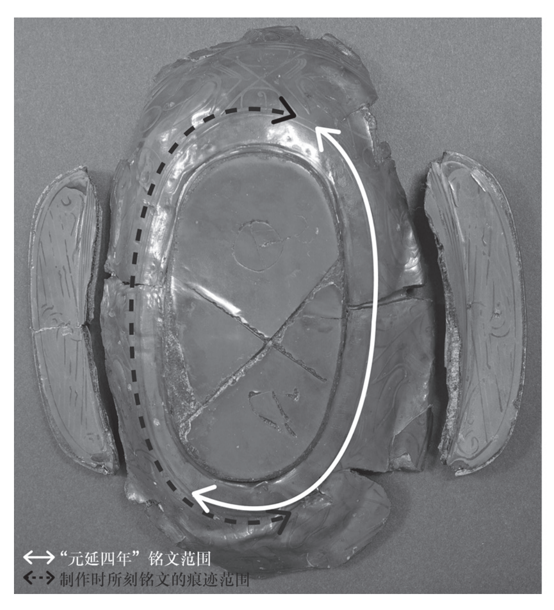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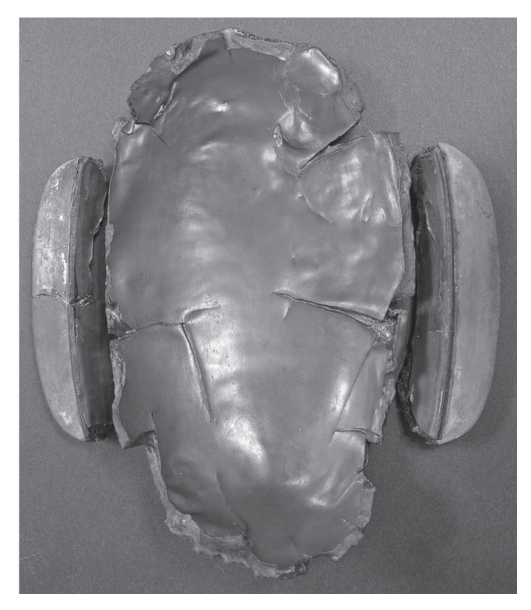
图二　蒙古诺音乌拉M6出土“建平五年”耳杯
（采自《蒙古ノイン・ウラ発見の遺物》）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帮助下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在此说明通过观察了解到的漆器之特征及铭文内容。

1. 诺音乌拉（Noin Ula）M20出土“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耳杯

耳杯高4厘米，厚0.4厘米，底部为纵9.2厘米，横5.1厘米。木胎，椭圆形，配有金铜扣。耳杯器外髹褐色漆，器内髹朱漆。在漆器的侧面以朱漆细线描绘着双凤鸟纹与连卷云纹（图三）。一行铭文针刻在耳杯侧面的底部附近，计46个字，内容依次为器名［乘舆髹（氵月）画木黄耳、棓］→容量（一升十六籥）→制作年代（元延四年）→工官名（考工）→工匠名［工通缮、（氵月）工宪］→官名（守佐臣立、啬夫臣勋、掾臣





图三　蒙古诺音乌拉M20出土“元延四年”耳杯

立主、右丞臣光、令臣谭省）。“工官”指汉代设立在中央或地方（郡国）的官府手工业作坊。汉代漆器铭文中记录的工官名有“考工”“供工”“蜀郡西工”和“广汉郡工官”。

诺音乌拉M20出土“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耳杯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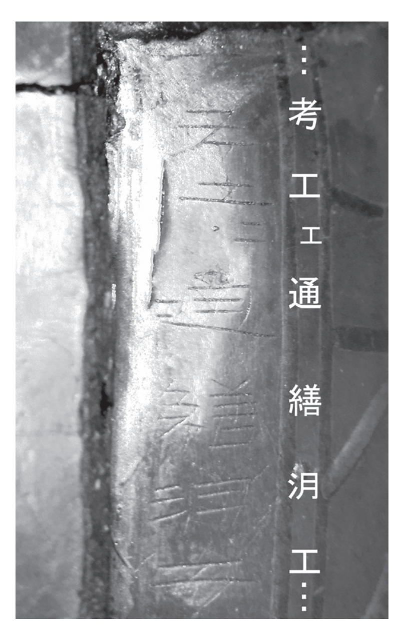
乘與髹（氵月）画木黄耳一升十六籥棓

元延四年考工工通缮　（氵月）工宪

守佐臣立　啬夫臣勋　掾臣立主　右丞臣光

令臣谭省

笔者观察该耳杯，发现有用漆涂去制作时所刻铭文之痕迹。即元延四年的铭文是在上涂的漆之上新针刻的。可以推测，铭文中的“缮”这一字与改写铭文有关，因为“缮”字指“修补”“维修”（图四）。该问题将在下一章中探讨。



图四　蒙古诺音乌拉M20出土“元延四年”耳杯铭文（局部）

2. 诺音乌拉（Noin Ula）M20出土耳杯

残存漆耳杯长14.3厘米。大小、样式、描绘的纹样与“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耳杯中所述杯基本相同。由于底部与侧面有部分损坏，铭文的前半部分无法辨认。

诺音乌拉M20出土耳杯铭文：

……臣孝主　守右丞（忠）　守令臣丰省

可是，从铭文中所记的官名与中国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M62出土的“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耳杯[3]相同来看，该耳杯可能也是公元前8年左右由考工制作的。

磨咀子M62出土的“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耳杯铭文：

乘舆髹（氵月）画木黄耳 一升十六籥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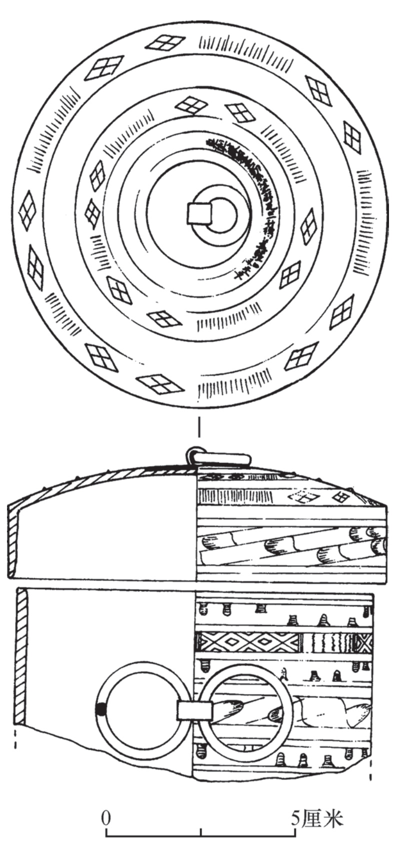
绥和元年 考工工并造（氵月）工丰

护臣彭 佐臣（讠尹）啬夫臣孝（主）守右丞臣忠 守令臣丰省

二、关于漆器铭文中的“缮”字

下面探讨诺音乌拉（Noin Ula）M20“元延四年”耳杯铭文中所见的“缮”字。

笔者本次收集刻有铭文的汉代漆器，发现除蒙古国外，在中国河南省、江苏省、湖南省、贵州省、甘肃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平壤市也有出土，共有83件[4]。概观这些漆器的铭文，在“考工”“供工”“蜀郡西工”“广汉郡工官”等工官名之后通常刻有“造”。“造”字指漆器的“制作”。然而，刻有“缮”字的漆器除了诺音乌拉（Noin Ula）M20外，仅有湖南省永州市的鹞子岭M2出土的一件“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铭樽（图五）[5]。



图五　中国鹞子岭M2出土的一件“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樽
（采自《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

鹞子岭M2出土“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漆樽铭文：

乘舆髹（氵月）画纻黄涂辟耳三升樽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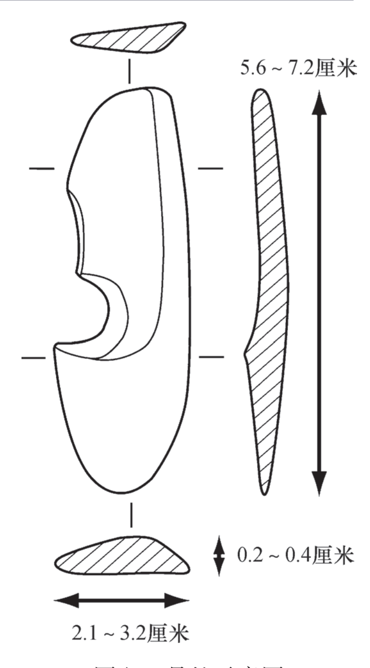
绥和元年 考工工宗缮（氵月）工丰

护臣隆 佐臣（讠尹）守啬夫臣谈 掾臣章主 守右丞臣□令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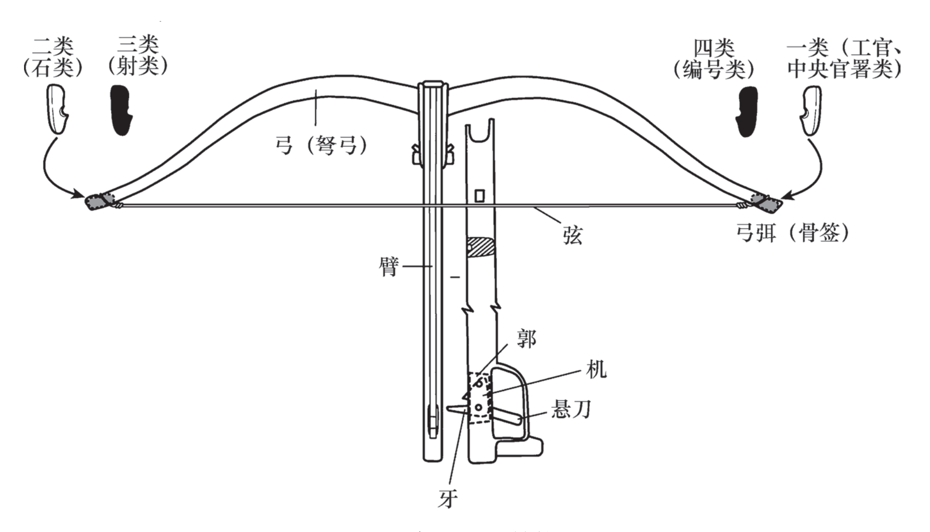
汉代在官营作坊生产的武器与器物中，除了漆器外，刻有铭文者，还有陕西省西安市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建筑遗址（第3号建筑遗址）中出土的6万多件骨签（图六、图七）[6]。骨签以动物骨骼制作而成。正面上部刻字。刻字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骨签铭文内容一般包括纪年（制作年代）、工官名、官吏名、工匠名等。骨签是弩弓的组成部分，是装在弓的顶端使用的“弓弭”（图八）[7]。在未央宫的发掘报告书中提到了8件与年号、中央官署名一起刻有“缮”字的骨签（图九）。



图六　中国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
（采自《汉长安城》）



图七　骨签示意图



图八　弩和骨签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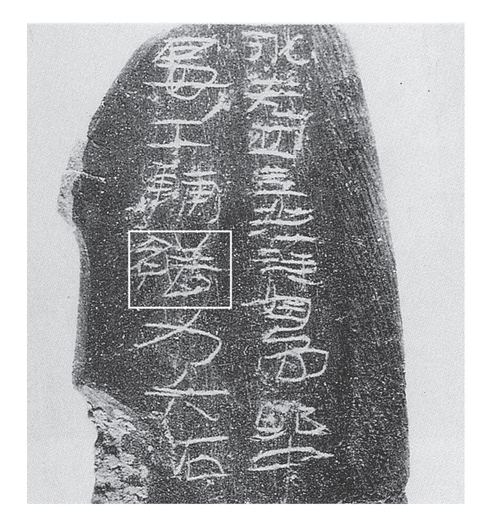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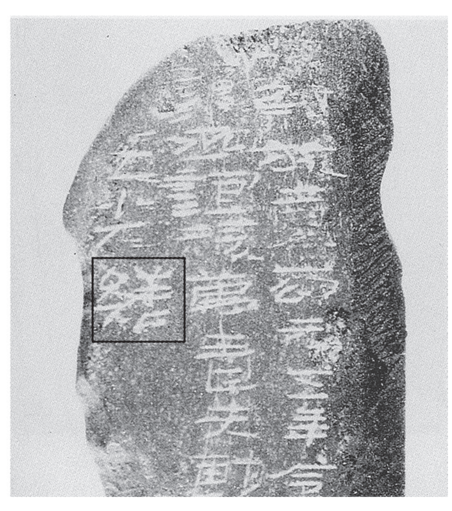
未央宫中央官署建筑遗址出土“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骨签铭文：

永光四年 光俸弩官郎中晏工定缮力六石

未央宫中央官署建筑遗址出土“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骨签铭文：

卫尉旅贲初元五年令（讠肙）丞谊掾万啬夫动工光缮

诺音乌拉（Noin Ula）M20的耳杯以漆涂去了制作时针刻的铭文，改写了“元延四年”的铭文。因此可以认为刻有“缮”字的漆器与装有骨签的弩弓是因某种原因损坏

图九　中国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左："永光四年"骨签，右："初元五年"骨签）
（采自《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

后，拿到作坊修缮、重新使用的。由于"缮"字仅见于写有中央官署名的铭文，可以推测，弩与漆器不是由地方上的工官、工匠，而主要是由中央官署内的工匠修复的。

三、总　　结

本文选取近年来蒙古国匈奴墓葬中出土的两件漆器，整理了通过铭文内容以及观察结果所弄清的内容。

诺音乌拉（Noin Ula）M20出土的两件耳杯，都是在西汉的中央工官制造或修复的，铭文的格式与至今为止收集的漆器之铭文一致。至于本来为宫廷使用而制的漆器是如何又传到匈奴这一问题，有必要与匈奴墓的性质以及其他副葬品一同来探讨。诺音乌拉（Noin Ula）"元延四年"耳杯上所见的重写铭文之痕迹与铭文内容显示，该耳杯是在中央官署修复的。由于铭文上记有参与修复的工匠名，可以设想存在着中央政府对武器与器物进行严格管理的体制。

不仅是漆器的铭文，也通过与骨签、青铜器的铭文进行比较探讨，应该可以更具体地弄清汉代手工业之规模与生产体系。

注　　释

［1］　梅原末治. 蒙古ノイン・ウラ発見の遺物［A］. 東洋文庫論叢第二十七冊［C］. 東洋文庫，1960.

［2］　a. A.N.Chistyakova.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Lacquer Cup From Noin Ula Mound 20（Mongolia）［A］.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37/3*）［C］，2009.

b.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M］，2011.

c. ChimiddorjYeruul-Erdene, OtaniIkue.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lacquerware unearthed from tomb 20, Gol mod Ⅰsite, Mongolia［A］. *The Silk Road*（*vol.3*）［C］. The Silkroad Foundation，2016.

［3］ 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2（12）.

［4］ 内田宏美. 中国漢代紀年銘漆器出土一覧［J］. 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21号）. 新潟大学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科環日本海研究室，2014.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 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J］. 考古，2001（4）.

［6］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b. 刘庆柱，李毓芳. 汉长安城［A］. 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7］ a. 于志勇.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之名物考［J］.考古与文物，2007（2）.

b. 内田宏美. 漢長安城未央宮出土骨簽および弩機の銘文について—前漢における武器生産の実態解明に向けて—［J］. 中国考古学（第11号）. 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11.

Issues related to official-run lacquer production in Han dynasty

Uchida Hiromi

Abstract: Han Dynasty lacquer ware, which has been unearthed in China,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Mongolia. Some lacquer wares are engraved with calendars, the prime ministers, and craftsmen.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lacquer unearthed in Mongolia Xiongnu tomb in recent years, and sort out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observations. From the rewritten marks and the content of inscription on the "Yan Yuan fourth year" ear cup, we know that the ear cup was repaired by the central offic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fact that the names of craftsmen involved in the inscriptions show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a strict management system on weapons and implements.

Key words: Han dynasty; Lacquer ware; Noin Ula; Mongolia; Production

满城汉墓铁匕首所反映的文化联系试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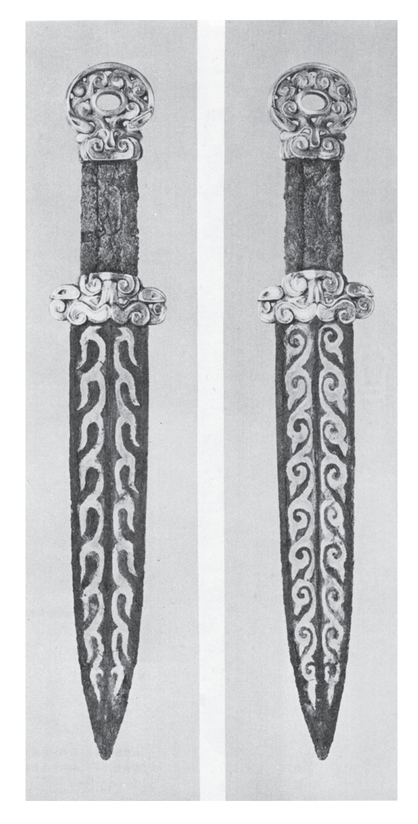
乔　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100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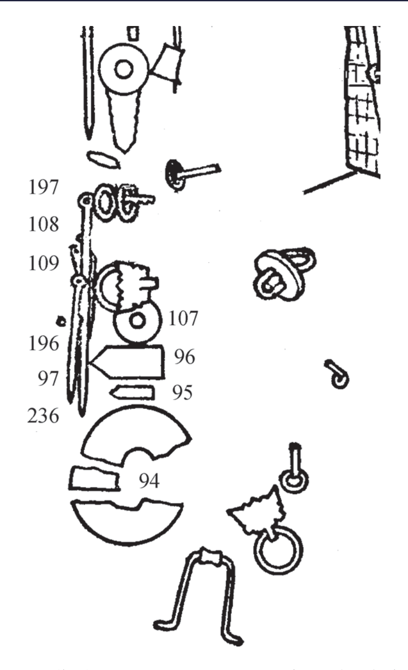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末发现并发掘的河北满城汉墓是有关汉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1]，即使到了相关发现已蔚为壮观的今天，满城汉墓仍可以说是有关汉代诸侯王埋葬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满城汉墓发现以及报告发表以来，相关研究成果已不胜枚举，极大地促进和丰富了汉代诸侯王埋葬制度的研究。同时墓葬有关遗存所反映出与北方草原文化之间联系的线索，也曾引起研究者的关注[2]，但细检发掘报告并参照域外的相关发现，则不难发现仍有个别遗物所承载的相关历史信息没能够得到有效的钩稽或科学的阐释，其中一号墓所出土的饰金铁匕首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例。

以往笔者在所作《中原、南方所见匈奴文化的影响》一文时曾注意到这件铁匕首与中原传统刀剑的差异，并将其视作匈奴文化的影响之一。但近来接触到一些中、西亚或南欧的相关考古资料，发现其所承载的信息并非如此简单，还存在深入发掘和阐释的潜力，故特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这件编号为5196的铁匕首，通长36.7厘米，器身扁平，中脊隆起，脊刃之间有血槽，柄和剑体之间有格，格做兽面形，茎宽扁，边缘圆鼓而中空，柄端为环首。环首与格以及器身两面均钿贴金片（箔）做装饰（图一）。铁匕首出土于安葬墓主人的后室，根据出土时的位置可知系安放在棺椁之间，方位大体在墓主人棺外的右下方，所以虽然并非墓主人安葬时随身佩挂的器具，但应当也属于备受重视的随葬品之一。与该件匕首处于同一群组的器物还有铜匕首和数件铁（铜）刀削等，表明安放位置的选择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图二）。按照发掘报告的相关图文大致可以了解：该群组物品并



图一　满城汉墓一号墓出土饰金铁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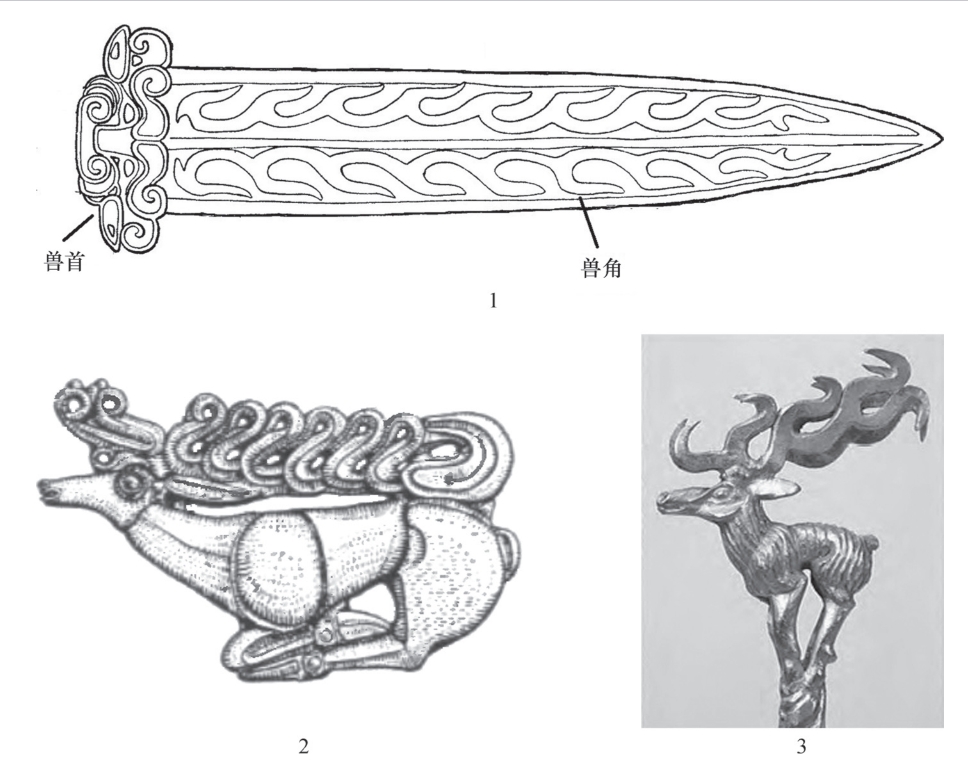


图二　满城汉墓一号墓后室局部器物分布图
94～96、107. 玉璧、圭等一组玉器（右上角即为墓主金缕玉衣的腿部）　97、108、197、236. 铜铁刀削　109. 铜匕首　196. 饰金铁匕首

非均是武器，其中的刀削类器具应当属于用具，更多的可能是当时作为“书刀”应用的文具。而将两件本属于武器类的匕首与刀削器具同置，可能由于其规模相对较小（短），所以并未按照武器来对待。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组器具之中，可以视作武器的两件匕首（短剑）恰恰都体现了十分浓厚的北方文化色彩，似乎也可以为当时对这两件器物应用性质的认识或处理提供一些线索。此外，与该组器具相邻或相叠的玉璧、玉圭等物品很有可能属于放置匕首、刀削的容器或包裹物之上嵌缀的饰品，而只是由于有机质主体已腐朽不存，才呈现为出土时的状况。就这些玉质饰品所安放的位置来看似乎体现着一定的规律，也许在传达着某种特定的涵义，因此铁匕首以及刀削等器具出现于此可能也体现着特殊的意义。

自金属应用以来古代中国一直以剑为短兵器领域应用的主要传统，而匕首由于短小的特点则多见用于诸如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等故事中。就考古发现而言，至少在三代以迄战国时期还较少有严格意义上作为武器应用匕首的出土。就满城汉墓一号墓出土的两件所谓的匕首来看，实际上无论是规模还是形制都比较近似于自东周阶段起曾经广泛流行于北方广大地区的青铜短剑，因此按照北方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知识将其称作短剑似乎更合适一些。按照古人的知识所谓匕首本即指短剑，而只是因剑首形状如同作为食具的匕而得名[3]，所以发掘报告当时对其的命名可能更多地考虑的是与中原系统铜铁剑的显著差别。

满城汉墓出土铁匕首所体现的北方草原文化色彩不仅反映在形制上，由钿贴金箔所构成的装饰图案更直接地传达了文化渊源或联系的信息。匕首的环首和格部均为兽面题材的装饰，两者隔柄茎相望，呈正视相对的效果。环首连接柄茎的基部为兽面的主体，首环部分则分别表现有兽耳和兽角，而斜伸兽角上面的卷曲图像，如果参照欧亚草原流行的鹿（或鹿形格里芬）题材来看[4]，实际上表现的也是兽角的形象（图三）。匕首格部整体表现的为一兽首的形象，基本包括了有角兽类头部的全部要素。格下的匕首器身两面均钿嵌花纹带，发掘报告认为该图案“一面作火焰纹，一面似云纹”，显然这是按照中原文化传统知识体系的认知结果，而如果以前述对环首和格部装饰题材的认知为基础观察，参考以欧亚草原文化装饰的传统风格，则不难发现所谓的火焰或云纹实



图三　满城汉墓饰金铁匕首器身纹饰对比示意

1. 一号墓出土铁匕首器身纹饰　2. 高加索克斯特洛马古冢出土卧鹿纹金饰牌

3. 阿尔赞2号墓出土鹿纹金饰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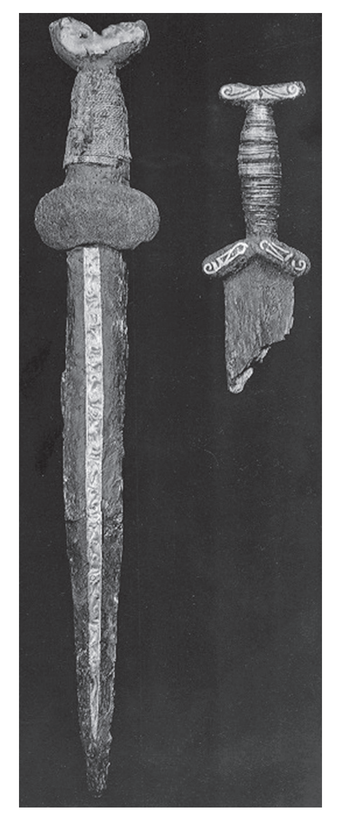
际上都是繁缛鹿角的表现，属于在格部兽首基干上的延伸，与格部兽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鹿首的形象，而被发掘者视作所谓类似于云纹的图案很可能是表现着鹿形格里芬多角叉端带有鸟头的形象。

满城汉墓所出铁匕首的装饰题材和形制都明确地将其来源指向北方的欧亚草原地带，而在中国中原地区北或西北一侧的广大区域存在着长期应用短剑（匕首）的传统，戎狄、斯基泰（塞人）等乃至更早一个阶段的部族集团都拥有比较发达的短剑，甚至女性埋葬也有佩剑的习俗。从围绕着中原地区北方的系列考古发现来看，当时短剑的形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而如果就短剑的基本形态考察，可以说内蒙古长城地带与欧亚草原基本不存在特别明显的差异，至少在短剑的应用方面应当能够视作一个大的系统。然而尽管在相毗邻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多有东周阶段北方系统环首短剑的发现，金柄或饰金的铁质短剑在中原外侧的西北方也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存在[5]，但如就整体形态和装饰风格而言，与满城汉墓铁匕首形态比较接近的应当是俄罗斯图瓦地区发现的阿尔赞2号墓出土的短剑（图四）[6]。阿尔赞墓葬遗存从1916年发现以来，陆续有重要的发现面世，所以墓葬所在的谷地又被称作“国王谷”。其中的2号墓系2001年由俄罗斯与德国合作发掘的大墓。就墓葬规模和出土的精美随葬品分析，可以视作当时的所谓王陵。阿



图四　阿尔赞2号墓出土饰金短剑
1. 男性墓主佩剑　2. 女性墓主佩剑

尔赞2号墓的墓葬封丘直径达80米，墓葬中仅随葬的金质或饰金物品就多达5700余件。封丘以片石累积构筑，封石之下分布着若干墓穴，其中的5号墓穴中的木椁内安葬有男女尸体各一具，虽然5号墓并非居于墓圹的中心位置，但由墓穴和木椁的规模、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等因素来看，应当是墓主人夫妇或墓葬中死者身份最高等级者的合葬。周围分布的可能应当是一些陪葬或殉葬的墓穴以及葬马坑等。墓主安葬在以略作加工的原木所构筑的方形木椁中，在墓主夫妇的身上，安葬时就分别置有金饰华丽的铁质短剑，由出土位置来看短剑应当是佩戴在死者身上而随葬的。这两件佩戴在墓主夫妇身上短剑的形制虽然略有差别，但就整体风格而言应当十分接近，均以相对的动物作为装饰剑首和剑格的题材，并且两者的具体形状也按照动物动作形态设计。剑的柄部基本通体饰金，题材也应当表现的是动物形象，其中主体动物就通体饰条纹来看，应当反映的是虎的形象，而周边的其他动物由下肢带有蹄足以及分别具有分叉或带沟纹的兽角等特征分析很可能是鹿、羊等食草类的动物。两者的剑柄存在粗细的变化，不知是否与使用者的性别有关。剑身的金饰仅饰于剑中的脊部，并且仅有一面饰金，表现的图案虽然比较抽象，但应当与柄部表现的题材类似，都是比较典型的野兽纹题材。



图五　伊赛克墓地出土短剑

阿尔赞2号大墓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前7～前6世纪，所以当早于满城汉墓较多。与阿尔赞2号大墓所出饰金铁短剑（匕首）风格相类似的短剑在欧亚草原地区有着比较广泛的分布[7]，以往在南欧和中、西亚都出土有一些风格接近于阿尔赞2号墓、装饰精美的饰金短剑，而华美的金质剑鞘更反映了文化上的共性。根据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伊塞克墓地以及阿富汗西伯尔罕黄金之丘等发现来看[8]（图五），这类短剑或匕首年代的下限至少可能会达到满城汉墓安葬的公元前2世纪，因此将满城汉墓一号墓所出的饰金铁匕首的来源追溯至西方欧亚草原应当基本不存在时间上的障碍。

满城汉墓与阿尔赞2号大墓所出的匕首（短剑）虽然在

具体形态和装饰题材上尚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如就其整体形制和装饰工艺以及风格而言，显然表现了诸多的共性，无疑应当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满城汉墓的发掘者将出土匕首的装饰技法称作“钿金”，可能是借鉴了后世类似所谓“螺钿”工艺的名称。中国古代在应用贵金属达成装饰效果时一直比较流行“金银错”的工艺，而类似于“螺钿”粘贴的“钿金”技艺的出现则可能要晚一些，并且早期多应用于漆木等材质的器具上，所以与满城汉墓铁匕首在材料和工艺等方面也均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当时发掘报告将满城汉墓铁匕首装饰技艺命名为“钿金”，严格意义上属于一种借用或权宜之计，科学的结论可能还需要对具体材料、工艺或流程做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与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不同，类似满城汉墓铁匕首所应用的饰金工艺在欧亚草原地带却出现的很早，并且曾经广为流行。在阿尔赞2号墓随葬品中采用这种饰金工艺的器具十分普遍，从武器、用具到装饰品都有所发现，表明当时这种装饰工艺已非常发达，应当是以贵金属装饰其他材质器具的最主要的技法之一。

无论是器物形制，还是装饰题材以及装饰技法等都将满城汉墓出土铁匕首的来源指向中原王朝西北方向的欧亚草原。而就满城汉墓发现的遗存而言，反映着西北方欧亚草原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例如，笔者在以往研究中所列举的熊纹节约（铜泡）、扭角兽纹金杏叶以及装饰兽纹的琴弦枘等，因此饰金铁匕首的出现应当不是偶然的事物，反映了当时中原王朝与欧亚北方草原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自从战国后期分布在中原北部的诸国纷纷将势力向更北的区域大规模扩张以来，原本居于中原外围的戎狄诸部逐渐销声匿迹，而以体质人类学上蒙古人种北亚（或古西伯利亚）类型为主体的“胡人”开始与中原王朝北方诸国相接壤，其中文献记述比较明确者则为匈奴与东胡。当时的秦与赵都曾将驱赶或防范匈奴作为开拓北方的重点，势力范围基本达到蒙古高原的南缘，并由此产生了李牧和蒙恬等一代名将。而燕则以曾为质于胡的秦开率军驱东胡为开端，向东北取地可以一直达今之吉林的南部。

尽管在总体趋势上，中原诸雄与胡人集团之间多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但对峙、接触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间的影响和交流，这一点已被众多的考古发现所证明。匈奴与东胡均属于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部族集团，相对灵活的机动性使其可能与欧亚草原西部的诸游牧集团产生比较频繁或密切的联系，因此有意无意间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一种中介的作用，所以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一些反映西方文化的物品或因素在中原的出现很可能与匈奴等胡人的间接传导活动有关。

满城汉墓一号墓的主人中山靖王刘胜卒于公元前113年，而按照文献所述，“是岁，西域始通于汉”，故而饰金铁匕首的传入应当早于正式的汉通西域，其来源也很可能是汉匈之间相关的活动。以往在陕西神木的纳林高兔曾偶然露头一批表现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金银器等[9]，其中就包含着一件与满城汉墓饰金铁匕首风格近似的银质饰金环首剑柄，铁质的剑身已经失去，而剑格装饰的题材也是两羊首相背对，虽然原报道者认为柄上的金饰属于错金工艺，但通过对器物照片的观察，可以确认银柄上的饰金应当

属于贴附上去的，所以该剑柄的形制和装饰都表明其可能来源于西方的欧亚草原。纳林高兔遗存的年代一般认为属于战国晚期，而族属则可能为匈奴。来自北方草原的铁剑在同样属于战国晚期的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也有发现[10]，在该墓中出土有两件金柄铁剑，略呈桃或心形的剑首均装饰着动物图案，由带角和蹄足来看应当是食草类动物，编号105的铁剑剑格部分表现的是两只卷角的羊头相背对，编号104者的表现题材则可能是两只背对的勾喙鸟首，两剑的剑鞘均为一面用金箔贴附有一些包括鸟（鹰）或兽形在内的图案，两支金柄铁剑整体较长，并且均带有木质的剑鞘，而剑鞘尾部则安装有金质的剑珌，其中编号104的剑鞘口端嵌镶的金饰表现的可能是对称的野兽博噬图案，编号105的剑珌则装饰着鹿形格里芬的带喙鸟首的鹿角。虽然辛庄头30号墓金柄铁剑与满城汉墓的饰金铁匕首整体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就装饰题材、风格和装饰技法来看，体现了相同或相近的趋势。辛庄头30号墓出土了较多反映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遗物，这类特殊文化因素的存在，按照其所处的时代分析应当与当时已出现在中原外围的匈奴集团有关。由此可知匈奴集团当时确实拥有可能源自欧亚草原西部的饰金银短剑（匕首）等兵器，所以具备将类似于满城汉墓所出那类原产于欧亚草原西部的饰金铁匕首传入中原的基础。

在西方类似于满城汉墓所出饰金铁匕首的短剑基本都是君主或身份等级较高的贵族随身所佩的武器，并且多配套以豪华的剑鞘，而由其器身短小、装饰华美并且也为女性所佩戴来看，其真实意义可能更多地表现在非实用的体现权威或身份等方面。与中亚、西方的发现不同，满城汉墓的饰金铁匕首尽管器体也装饰华美，但并无配套的剑鞘，出土的位置和相关放置组合关系也表明在随葬时并未将其视作随身佩戴的器具，并且可能也未将其视作武器来对待。这种现象或许表明当时在传入地的中原对于这类器具在原产地的真实意义可能并不是十分清楚，从而也会为间接传导性质的认识有所支持。

当然丝路开通之前中原与欧亚草原的联系并非均需借重于匈奴等集团的中介，历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东西方间文化的交流或影响可能早在史前时期即已存在，只是伴随着中原王朝版图的扩张，原本处于中原以西或北方的诸戎狄或是被吞并或是被驱赶，使新兴的匈奴等胡人集团很快直面中原势力，并在秦所筑长城外围形成隔绝中原与欧亚西部草原直接往来的障碍，导致相关文化联系或往来多需通过匈奴的中介来实现，所以张骞等汉使出使西域时往来多会遭到匈奴的扣留，这种状况可能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击匈奴、通西域、设河西四郡才得以改变。

注　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　乔梁. 中原、南方所见匈奴文化的影响［A］. 东方考古［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　（汉）司马迁. 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载："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索隐："匕音比。刘氏云'短剑也'。"

[4] 参见乌恩岳斯图.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5]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3（10）.

[6] Konstatin v cugunov. *Der skythenzeitliche Furstenkürgan Ar`zan 2 in tuva*［M］. verlag ghillpp von zabern mainz, 2010.

[7] АРХЕОЛОГЙЯ СССР. *Степ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M］. иэ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0.

[8] a. К.А. *Акишев курган иссык*［M］. москва, 1978.
b. V. I. Sarianidi. *The Gold Hoard of Bactria*［M］. Vienna, 1985.

[9] 戴应新，孙嘉祥. 陕西神木县发现的匈奴遗物［J］. 文物，1983（12）.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燕下都［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Analysis of the Iron Dagger's Cultural Meaning in Han Dynasty Tomb in Man City

Qiao Liang

Abstract: The gold iron dagger which was unearthed from Han Dynasty tomb in Man city contained in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It reflecte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Central Asia or Western cultural ties, but previous studies of this are not enough. This paper use contrasting factors analysis, pointed out that this piece of iron dagger, its shape, whether or decorative and craft, embodi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entral Asia, Western Asia or Southern Europe. So it should come from outside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propagation pathways or intermediary is likely related to the Xiongnu.

Key words: Han Dynasty tomb in Man city; Iron dagge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Xiongnus groups

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林梅村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粟特人起源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在今塔吉克斯坦国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南部。粟特人在早期历史上未能形成独立国家，公元前5～前4世纪，粟特人在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统治之下，波斯波利斯王宫28国贡使浮雕上就有粟特贡使像。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雄主亚历山大征服中亚，粟特人又臣服于希腊殖民者。此后，粟特人相继在康居、寄多罗、嚈哒、西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本文拟分三节，讨论汉魏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一、康居统治下的粟特城邦

粟特人繁衍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汉代在锡尔河北岸康居国统治之下，故中国史书起初将“粟特”称作“康居”，而粟特历史则淹没于汉文史籍对康居国的撰述之中。魏晋文献始见“粟特”之名，《后汉书·西域传》写作“粟弋”，与严国、奄蔡国（西方史料称“阿兰”）一道，皆为康居的属国。[1]

康居王族是斯基泰族游牧人，逐水草而居，无宫室城郭。不过，康居国幅员广阔，西起锡尔河中游，东至塔拉斯河，故康居国百姓既有游牧民族，亦有农耕民族。如锡尔河北岸赭时（唐代石国）就是康居国的农耕民族，定居于塔什干绿洲，以卑阗城（今塔什干市西南50千米康卡古城）为中心。[2]《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今哈萨克斯坦讹答剌）。到卑阗城（今康卡古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乐）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西54千米库勒塔佩）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3]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人则不同，皆为农耕民族，定居于沙漠绿洲城邦之内。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国有五小王，指康居国统治下的粟特藩王。粟特五城邦后来发展为九个城邦，唐代文献称“昭武九姓”，而粟特人则称“九姓胡”。[4]

1968年，苏联考古学家马克西莫娃（A.G. Maksimova）在塔什干市西南103千米锡尔河北岸查达拉墓地发掘了一批偏洞室墓。随葬品颇具游牧文化特征，包括长、短铁



图一　锡尔河北岸康居古墓及随葬品

剑、斯基泰式青铜鍑、铁马衔和各类陶器，年代在1～4世纪（图一）。历史上，许多古代游牧部落活动于此地，故发掘者不能断定这个墓地究竟属于康居人，匈奴人，还是大月氏人。[5]

2001年，法国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郊外科柯塔佩（Kok-tepe）发掘了一座偏洞室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锡尔河北岸查达拉墓地相同（彩版三，1）。科柯塔佩古墓出土四乳四虺镜，流行于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约在公元前1世纪。[6]法国考古学家罗宾（C. Rapin）认为，墓主人是中亚草原塞克-萨尔马提亚王子（La princesse saka-sarmate）。[7]其说有误，墓主人当为粟特城邦统治者康居贵族。

2004年，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波杜什金（A. N. Podushkin）在奇姆肯特市西北54千米库勒塔佩（Kultobe）发现游牧人墓地。其中一座偏洞室墓保存完好，墓穴底部呈矩形（长3米，宽2米，深1.3米），墓主人身高达2米。随葬品计有：长短铁剑、斯基泰式弓箭和各类陶器。这个墓地还发现西汉连弧纹镜铜镜（彩版三，2），说明该墓地可以追溯至康居国时期（前2～前1世纪）。[8]正如波杜什金指出的，墓主人当即中国史书所载“康居人”。[9]

在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中，最早到中国经商的是康居国的粟特人。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粟特人就开始扮演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间人角色。由于汉代粟特诸城邦在康居国统治之下，故粟特商胡被视为“康居人”。

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最初是以粟特商人为媒介进行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对策》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10]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马相如《喻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11]故知张骞通西域之前，粟特商胡就到巴蜀（今四川成都），乃至长安（今陕西西安）经商了。[12]敦煌汉长城遗址出土粟特古书信称中国为cyn（秦），并称长安为khumdan（咸阳）。正如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法国学者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指出的，Khumdan之名译自秦朝首都咸阳，汉朝定都长安后才改指长安。[13]那么，至少在秦朝（前221～前206年），斯基泰或粟特商人就来咸阳经商了。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汇报说：

> 臣在大夏时（前129年），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印度-斯基泰王国，今印度河流域）。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14]

身毒国，指印度-斯基泰王国（Indo-Scythian Kingdom，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世纪末，粟特商人频繁地奔走于塔里木盆地南道诸国和甘肃河西走廊。西域都护敦舜致汉成帝（前32～前7年）一封上书说：“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15]大夏商人在身毒国（印度斯基泰王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买到的邛竹杖、蜀布等中国产品，当即康居国（即粟特）商胡从四川成都，经青海（或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道，贩运到印度河流域的（图二）。[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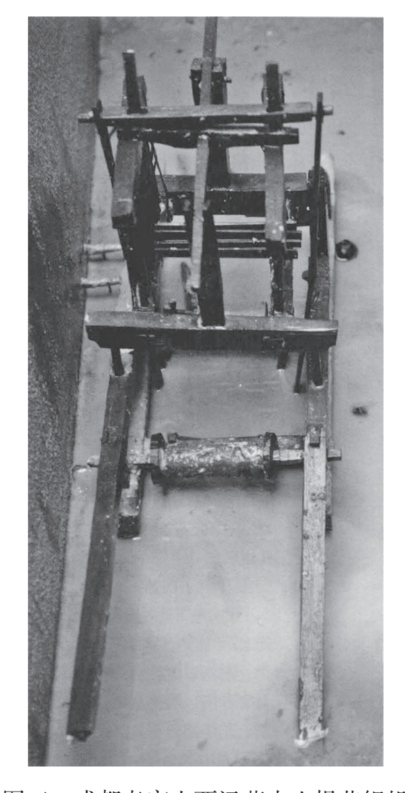
关于公元1世纪中叶印度洋国际贸易，《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第39节记载：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阿拉伯等地“进口到巴巴里贡（Barbaricum，今印度河口卡拉奇附近）市场的商品有：大量质地轻薄的衣服（thin clothing）和少量赝品、提花的亚麻布（figured linens）、黄玉（topaz）、珊瑚（coral）、苏合香（storax）、乳香



图二　印度斯基泰王国地图

（frankincense）、玻璃器皿、金银盘、葡萄酒（wine）。由此出口的物品有：香草（costus，又译“生姜”）、没药树脂（bdellium）、枸杞（lycium）、甘松香（nard）、绿松石（turquoise）、青金石（lapis lazuli）、赛里斯兽皮（Seric skins）、棉布（cotton cloth）、绢纱（silk yarn）、靛青染料（indigo）。”[17]所谓“提花的亚麻布”是中东地区特产，而蜀布可以在身毒国际市场占一席之地，织造技术当不亚于中东生产提花的亚麻布。赛里斯兽皮，可能指汉代虎斑纹织锦。尼雅东汉墓8号墓（M8）出土过虎斑纹织锦残片和一件虎斑纹锦袋（彩版四，1）。[18]

2012～201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的一处西汉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4座西汉木椁墓，出土了大量漆木器、陶器，以及少量铜器和铁器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织机（图三）。[19]目前研究者多以为它们是蜀锦提花机，不一定正确。战国时代，中国丝绸和漆器生产中心在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产品远销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20]秦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国首都——郢都被彻底摧毁。屈原悲愤之极，投汨罗江身亡。



图三　成都老官山西汉墓出土提花织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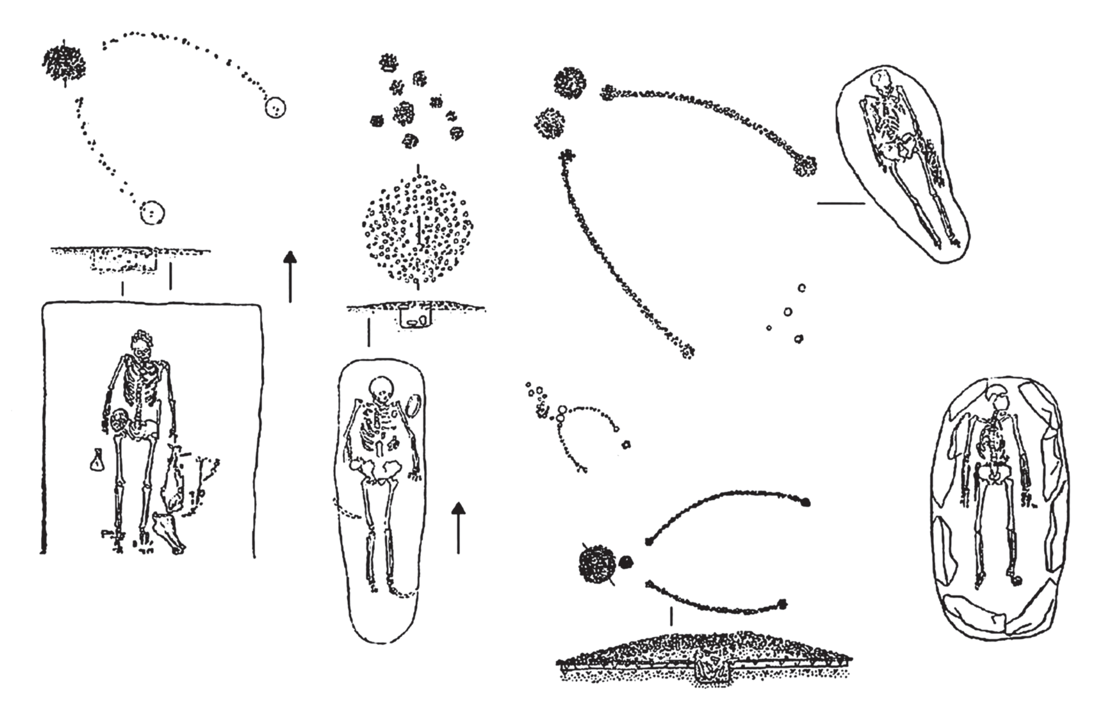
楚汉战争导致关中手工业遭到极大破坏，于是西汉中国漆器生产中心转移到四川成都，而丝绸生产中心则转移到山东临淄。《汉书·贡禹传》记载：“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21]蜀锦创建时代较晚，不早于三国时期。诸葛亮《与陆逊书》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22]因此，老官山汉墓出土西汉织机可能是蜀布提花机。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这种织机制作的蜀布就被粟特商胡贩运到身毒国（印度斯基泰王国，今巴基斯

坦印度河流域），乃至大夏（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

二、塔拉斯河畔的郅支城

塔拉斯河，古称“都赖水”。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汉将甘延寿、陈汤远征中亚，灭郅支单于之战就发生在塔拉斯河。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发生内乱，五单于纷争。五凤二年（前56年），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与其弟呼韩邪单于发生激烈冲突，各奔东西。呼韩邪南迁归汉，郅支则率部众北迁，“因北击乌揭（今阿尔泰山南麓），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今叶尼塞河流域），北降丁令（今外贝加尔湖），并三国”，在坚昆建王庭，史称“北匈奴”。[23]

永光元年（前43年），郅支单于与锡尔河北岸康居国结盟，联合对抗伊犁河上流的乌孙。不料，北匈奴在西迁途中遭遇寒流，随行部属大半冻死，最后仅余三千人到达康居国（今锡尔河北岸）东境。[24]《汉书·陈汤传》记载：甘延寿、陈汤征匈奴郅支单于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踰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今伊塞克湖）西。”[25]可知康居东界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岸。伊塞克湖至塔拉斯河之间原为乌禅幕部故地。据我们考证，乌禅幕考古文化就是哈萨克草原的塔斯莫拉文化（Tasmola Culture，前800年～前92年），采用胡须墓（图四）。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2年），乌禅幕部投奔匈奴，从塔拉斯河迁往天山东部地区，成为匈奴统治塔里木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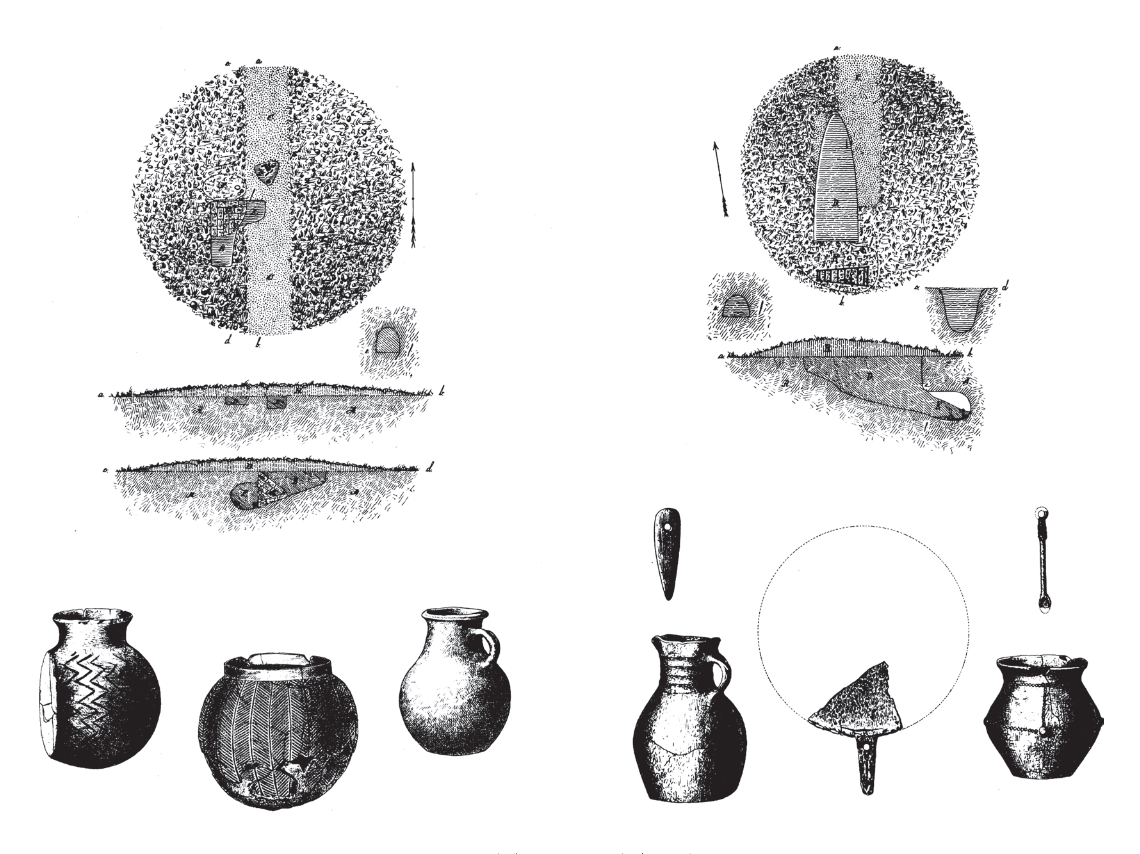


图四　哈萨克草原塔斯穆拉文化的胡须墓

的生力军。[26]此后半个世纪，塔拉斯河流域被锡尔河中游的康居部落占据。

1890 年，芬兰考古学家海开勒（H. J. Heikel）率芬兰-乌戈尔考察队前往蒙古高原考察鄂尔浑碑铭，并塔拉斯河流域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在塔拉斯河畔发现许多古代游牧人墓葬和突厥鲁尼文碑铭，今称“塔拉斯碑”。从考古报告看，海开勒在塔拉斯河畔发掘的古代游牧人墓葬中有许多偏洞室墓。[27]这些墓葬（编号Kujan Tuhaj M12-7 Tsjung Tipa M18）的形制和随葬品（图五），与锡尔河中游的康居古墓（图一）如出一辙。凡此表明，乌禅幕东迁天山东部后，康居人占领了塔拉斯河流域。《汉书·陈汤传》记载：郅支单于“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28]这个“不居者且千里”之地，即乌禅幕的原始故乡。

好景不长。北匈奴西迁中亚不久就和康居发生激烈冲突。郅支单于兴兵讨伐康居王，杀死数百人，并强迫康居人在塔拉斯河畔为他兴建城市，名曰“郅支城”。《汉书·陈汤传》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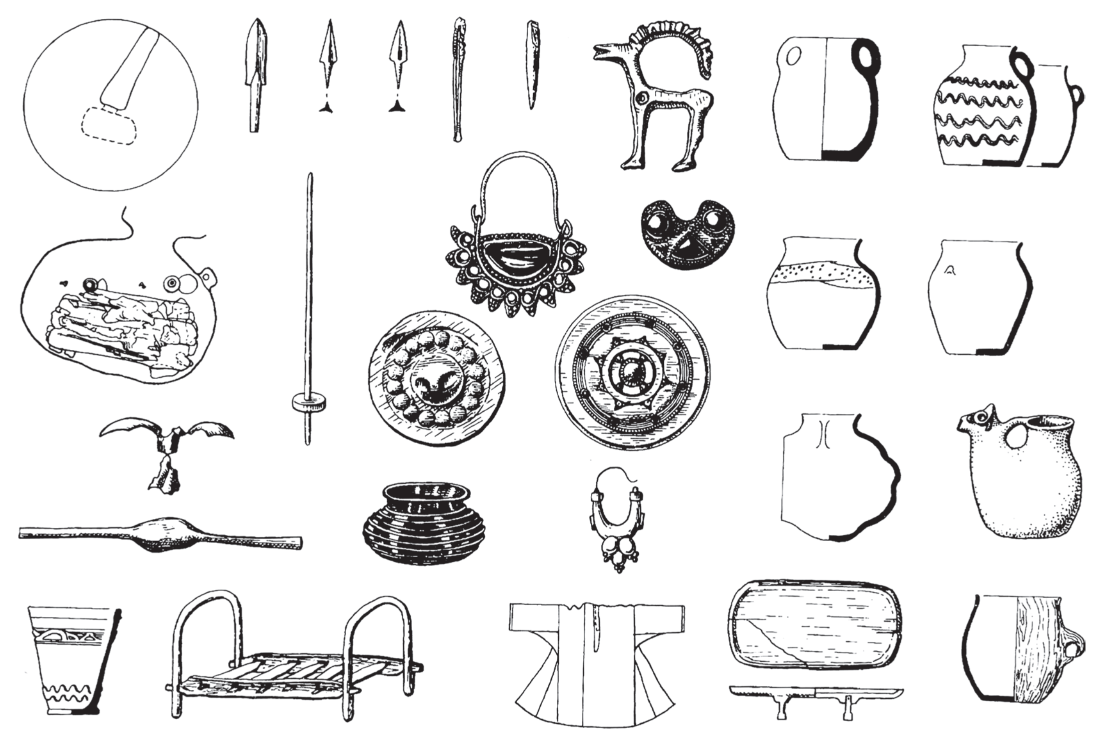


图五　塔拉斯河流域康居古墓

> 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今塔拉斯河）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29]

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远征中亚，攻打塔拉斯河畔郅支城。该古城采用土木结构建筑，有木城、土城、宫城三重城墙，城中有望楼。汉军攻陷郅支城后，杀死郅支单于，并将其首级送长安城，“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30]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专家认定，郅支城和郅支之役古战场就在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为此，2001年塔拉兹市曾经举办建城2000年大型纪念活动。

1940年，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A. N. Bernshtam）在塔拉斯河上游支流肯科尔（Kenkol）河畔发掘了一处汉代墓地，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和偏洞室两种墓葬。前者为典型的匈奴墓，死者置于木棺之中，随葬丝绸残片、云雷连弧纹镜、铁剑、陶器、匈奴艺术风格的骨弓弭（图六）。[31]1956～1963年，苏联考古学家多次在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古墓60余座，年代断在1～4世纪。[32]中亚粟特城邦遗址出土了许多云雷连弧纹镜。据长安汉墓发掘资料，这种云雷连弧纹镜流行于西汉晚期，尤其是新莽时期。[33]肯科尔匈奴墓出土云雷连弧纹镜（图六）属于郅支单于时期，也即西汉晚期。



图六　塔拉斯河上游肯科尔河畔北匈奴古墓

三、粟特钱币之创建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乌孙与匈奴联合西征大月氏，占领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月氏西迁阿姆河北岸，臣大夏而居。翌年（前129年），张骞自匈奴中得脱，西行大宛、康居和大月氏。关于中亚古国钱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34]

安息国，西方史料称"帕提亚帝国"，安息古都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郊尼萨古城。帕提亚发行银币和铜币两种货币。尼萨古城不仅出土有安息银币，还发现希腊-大夏银币、塞琉古的黑海银币以及其他银币，却不见帕提亚自己的铜币。帕提亚发行的两种钱币正面都有国王头像，反面为王家弓箭手（图五下）。[35]早期帕提亚钱币有希腊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走样变形。公元1世纪起，帕提亚钱币铭文开始采用婆罗钵文。[36]

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诸城邦，汉代粟特城邦在康居国统治之下，有五小王。史称"昭武九姓"，分别为安、康、史、曹、米、毕、赭时等。《汉书·西域传》记载：

>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

苏薤城即粟特城，唐代昭武九姓之"康国"，或称飒秣建（sm'rknδc），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市附近阿弗拉西亚卜古城。[37]附墨城则为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bukhara）城之别称，唐代昭武九姓之"安国"。10世纪末阿拉伯作家纳尔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称作bumičkath，[38]在布哈拉市以西40千米处，占地面积约9平方千米，今称"瓦拉赫沙"（varakhsha）古城。[39]窳匿城即贵霜匿（kšy'n'k），唐代昭武九姓之"史国"，或称"碣石"（kesh），在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市附近沙赫里萨布兹（Shahrisabiz）古城。罽城即劫布呾那城（kedud/ kaptutana），唐代昭武九姓之"何国"，在撒马尔干城东12千米。[40]奥鞬城在土库曼斯坦古玉龙杰赤城，唐代昭武九姓之"火寻"，在阿姆河下游乌尔根奇市。[41]

汉魏时期西域贾胡和僧人中有不少粟特人。《诸葛亮集》所载后主刘禅建兴五年三月诏书提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227年），“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42]如果说西汉时粟特人经商范围仅限于塔里木盆地至河西走廊，那么，东汉以后他们已深入到中国内地。《后汉书·马援传》有“伏波将军类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譬喻，有助于说明这一点。[43]

早在张骞时代，有些粟特城邦（如布哈拉和撒马尔干）就开始发行钱币。[44]故《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顸，善市贾，争分铢。”[45]安国粟特城主发行的粟特银币就属于这个时期，模仿希腊-大夏王攸提德莫斯一世（Euthydemus I，前230～前200年）德拉克麦钱。[46]正面为国王头像，背面为弓箭手。早期类型有希腊和粟特双语铭文，成色较足，流行于公元前2世纪；晚期类型成色较低，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希腊钱铭走样或完全消失，钱铭只有粟特文，约流通于公元前1世纪或晚些时候（图七，1～3）。布哈拉绿洲还出土一种粟特银币，模仿塞琉古王安条克银币，正面为国王头像；背面为马头，正反两面周边有希腊铭文（图七，4），流行于公元前2世纪。[47]

公元前2世纪，康国粟特城主开始打造银币，可分两种形式。一种为塞琉古王安条克银币仿制品，正面为国王头像，背面为马头。此类粟特钱币与布哈拉出土第二种粟特银币相似，只是正反两面皆无文字；另一种正面为国王头像（或无头像），周边为粟特铭文，背面为希腊大力神、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周边为希腊铭文（图八）。



图七　公元前2世纪塞琉古、大夏和安息银币

1. 安提阿哥一世　2. 欧西德莫斯一世　3. 阿斯克斯一世　4. 阿尔达班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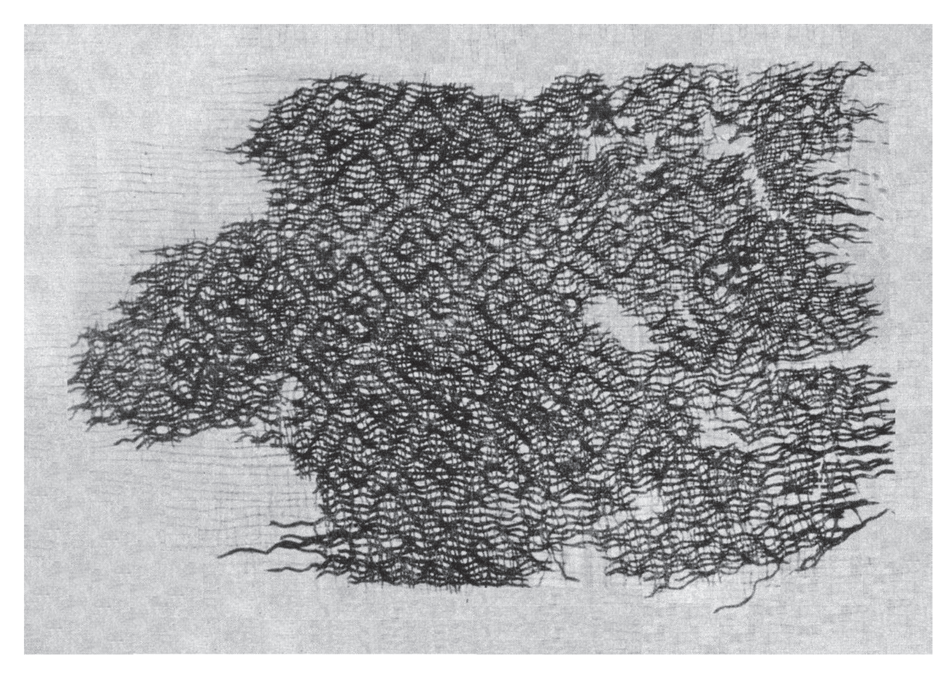


图八　布哈拉土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粟特银币

四、欧亚草原之路上的粟特商人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指罗马帝国），抵条支［波斯湾安条克城（Antiochia）或称Charax Spasinu）］。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甘英畏惧大海，从波斯湾无功而返。不过，不久便有中国商人抵达意大利罗马宫廷。

罗马帝国时代作家福罗鲁斯（Lucius Annaeus Florus，约74～130年）在公元1世纪末成书的《罗马史纲要》中说："克拉苏军团所使 用的军旗就是丝绸织物"，并提到有中国使者出访罗马。他在该书第二章《帕提亚人的和平与奥古斯都的加冕礼》（II.34）写道："Even the rest of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hich were not subject to the imperial sway were sensible of its grandeur, and looked with reverence to the Roman people, the great conqueror of nations. Thus even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sent envoys to seek the friendship of Rome. Nay, the Seres came likewise, and the Indians who dwelt beneath the vertical sun, bringing presents of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and elephants, but thinking all of less moment than the vastness of the journey which they had undertaken, and which they said had occupied four years. In truth it needed but to look at their complexion to see that they were people of another world than ours."[48]意为："现在还不在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也皆知罗马之伟大，对其征服世界的行为表示敬畏。因此，我们见到了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都派遣使者前来与我们媾和。不仅如此，阳光普照下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也来



图九　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墓发现汉代菱格纹锦残片

了。他们带来的礼物中有宝石、珍珠和大象，不过，他们感觉长途漫漫，历时四年才走到。确实，仅从这些人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49]拜占庭作家米南德《希腊史残卷》将康居、粟特、突厥等中亚民族统称“斯基泰人”，福罗鲁斯所谓“斯基泰人”当指粟特人。这些赛里斯人并非中国政府派遣的使者，而是随粟特商团到罗马经商的中国商人。

20世纪初，在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墓发现菱格纹汉绮残片（图九）。类似的汉绮残片在新疆孔雀河畔营盘东汉墓（95M7）亦有发现（彩版四，2）。凡此表明，中国商人是从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随粟特商队到达罗马宫廷的。

近年，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以北50千米发现一处公元1世纪贵妇人墓，随葬品有来自古埃及的圣甲虫形状宝石、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古罗马陶罐以及一堆中国漆盒残片（彩版四，3）。后来在日本住友财团的赞助下历时三年修复了这个西汉漆盒。显然，这个汉代漆盒是通过“欧亚草原之路”来到克里米亚。荷兰阿姆斯特丹阿拉德·皮尔逊博物馆（The Allard Pierson Museum）曾经借展这个漆盒，现为克里米亚博物馆藏品。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河中地区沙漠绿洲的粟特诸城邦，汉代在北方游牧人康居的统治下。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康居商人主要为粟特商胡。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他们就将四川成都生产的蜀布贩运至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近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西汉织机并非丝绸提花机，而是蜀布织机。

第二，中亚塔拉斯河本为乌禅幕的原始故乡，采用胡须墓。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2年），乌禅幕部投奔匈奴，从塔拉斯河迁往天山东部地区，后来东迁蒙古高原。此后半个世纪，塔拉斯河流域被锡尔河中游的康居部落占据。塔拉斯河发现的古代偏洞室墓，应该是康居古墓。永光元年（前43年），北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塔拉斯河流域，时称“都赖水”。公元前36年陈汤、甘延寿攻打塔拉斯河畔郅支城，灭北匈奴就在此地。

第三，公元前2世纪，河中地区沙漠绿洲的布哈拉和撒马尔干城主开始发行银币，主要模仿塞琉古和希腊大夏银币，并在钱币上采用粟特文。锡尔河北岸的赭时国并非粟特城邦，而是康居民族中的农耕民族。4世纪中叶，赭时国才开始发行铜币，但是后来居上，发行量极大，显然用于商业流通领域。

第四，为了打破安息帝国对丝绸之路的垄断，粟特人开辟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向罗马帝国运送丝绸。公元1世纪末，中国商人可能从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随粟特商队抵达罗马宫廷。

2015年7月19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注　释

［1］（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第10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922，2923.

［2］刘迎胜. “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3）：125

［3］a.（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891，3892.
b. 林梅村. 锡尔河中游的康居王庭［J］. 考古与文物，待刊.

［4］蔡鸿生.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5］a. A.G. Maksimova et al. *Drevnosti Chardari*［M］. Alma-Ata，1968.
b.（匈）哈尔马塔主编. 徐文堪等译.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翻译出版公司，2002：379，380.

［6］程林泉，韩国河. 长安汉镜［A］.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C］，2002年：127.

［7］C. Rapin. “La tombe d'une princesse nomade à Koktepe près de Samarkand,” en collaboration avec M. Isamiddinov et M. Khasanov［J］. *communication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2 janvier 2001：33-92.

［8］Nicholas Sims-Williams, Franz Grenet, Alexandr N. Podushkin. Les plus anciens monuments de la langue sogdienne: les inscriptions de Kultobe au Kazakhstan［J］. *Compte-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2007（2009）：1005, 1025-1033.

［9］陈俊锋. 哈考古学家发现古康居国将军墓（网络版），北京文博2004-7-12网页.

［10］汉书·第8册［M］：2511.

［11］（汉）司马迁. 史记·第9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2：3044.

［12］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余太山. 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

［13］ a.〔日〕高田时雄. Khumdan的对音［A］. 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文集［C］.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965～976；

b.〔法〕魏一天著. 王睿译. 粟特商人史［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

［14］ 汉书・第9册［M］：2687，2688.

［15］ 汉书・第12册［M］：3893.

［16］ 印度斯基泰王国地图. 引自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o-Scythians.

［17］ W.H. Schoff (tr.).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Travel and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by a Merchant of the First Century［A］. *Bombay & Calcutta*［C］. London: London, 1912：chap.39.

［18］ 赵丰，于志勇主编. 沙漠王子遗宝［M］. 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2000：87.

［19］ 谢涛，武家璧，索德浩. 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J］. 考古，2014（7）：59～70.

［20］ Sergei I. Rudenko et. al. (ed.).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21］ 汉书・第10册［M］：3070.

［22］ （曹魏）诸葛亮. 诸葛亮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23］ 汉书・第11册［M］：3800.

［24］ 同［23］：3802.

［25］ 同［14］：3011.

［26］ 林梅村，李军. 乌禅幕东迁天山考——兼论公元前2～1世纪匈奴在西域的遗迹［J］. 西域研究，2012（3）：23～34.

［27］ H. J. Heikel. Altertümer aus dem Tale des Talas in Turkestan aux EthnographiquesⅦ［J］. *Helsinki, Soc. F.-Ou.*，1918（Tafei VI-VII）.

［28］ 同［14］：3009.

［29］ 同［28］.

［30］ 同［14］：3013.

［31］ a. A. N. Bernshtam. *Kenkol'skii mogil'nik*［M］. Leningrad，1940.

b.〔匈〕哈尔马塔等主编. 徐文堪等译.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377，378.

［32］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 377，378.

［33］ 程林泉，韩国河. 长安汉镜［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127.

［34］ 史记・第10册［M］：3162.

［35］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 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M］. 上海：上海博物馆，2006：20～32.

［36］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218.

［37］ 季羡林等. 大唐西域记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5：87，88.

［38］ Richard N. Frye (trans.). *The History of Bukhara. Translated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M］. Narshakh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54：21, 120, note.103.

［39］ 1991年，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草原丝绸之路考察队访问过该古城. 与会专家认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公元7～8世纪达到鼎盛. 直讫11世纪（刘迎胜. 前揭文：125）.

［40］ 季羡林等. 大唐西域记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5：91，92.

［41］ a. 冯承钧. 前揭书［M］：52，100.

b. 刘迎胜. “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3）：122.

［42］ （晋）陈寿.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M］. 裴松之注引. 北京：中华书局，1959：895.

［43］ 后汉书・第3册［M］：844.

［44］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218，219.

［45］ 同［34］：3174.

［46］ 希腊-大夏王攸提德莫斯一世钱币. 参见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 前揭书［M］：18.

［47］ 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二世钱. 参见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 前揭书［M］：16.

［48］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M］, London: Hakluyr Society，1913：18.

［49］ 耿昇的译文为，“所以，我们见到了斯基泰人（指粟特人）和萨尔马特人都派遣使者前来与我们媾和，也见到有住在同一天下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他们带来的礼物中有宝石、珍珠和训练过的大象，他们特别吹嘘旅途的阻长，历时四年才走到，仅仅从这些人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一个天地”〔法〕戈岱司编. 耿昇译.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北京： 中华书局，1987：16.

Sogdians along the Silk Roads of the Han Dynasty

Lin Meicun

Abstract: Sogdians originated from the Zerafshan River Valley of Central Asia, their contacts with China began before the envoy of Zhang Qian to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in the former Han dynasty (141–87 BC). Sogdians were called Kangju because they were under the rule of Kangju, a Scythian tribe on the north bank of Sir Darya River in the Han dynasty. Since then, Sogdia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long the Silk Roads as late as the 10th century A.D.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Sogdians along the Silk Roads of Han dynasty and it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Ⅰ. The Sogdian states under the rule of Kangju; Ⅱ. Zhizhi city on the bank of Talas River; Ⅲ. The Issue of Sogdian coins; Ⅳ. The Sogdian merchants on the Eurasian Steppe.

Key words: Kangju; Sogdian; Talas; Eurasian Steppe; Archaeology of Central Asia

粟特人史君漫谈

丁爱博（Albert E. Dien）[1]著　陈昊雯[2]译校

（1. 斯坦福大学东亚学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2003年在西安附近发现的史君墓，提供了大量唐代在华粟特人的重要信息[1]。近年来，许多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在中国和外国陆续发表。现在我想回顾一下日本和欧洲的学者关于史君墓的研究情况，并谈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史君（495～579年），粟特文为Wirkak，是凉州粟特聚落的萨保。他墓葬的大小和墓内精美的装饰均显示出了其在粟特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建造史君墓所需的土方量在305立方米左右，在同处于西安附近这一时期的其他十座墓葬中，仅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524立方米）、骠骑大将军南阳郡公叱罗协墓（524立方米）、谯孝王宇文俭墓（415立方米）可与之匹敌[2]，其余墓葬的土方量均在92至285立方米之间。史君墓中的石椁遍布着精致的浮雕，并保留有彩绘和贴金的痕迹，详细描绘了墓主人由生到死的情景和他的宗教信仰[3]。墓志也由汉文和粟特文两种文字记叙，非常特别[4]。

石椁外壁由多块石板构成，描绘了墓主人生活场景的图像在石椁的西壁和北壁上。根据法国学者葛乐耐（Frantz Grenet）和黎北岚（Penelope Riboud）的解释[5]，这些浮雕表现了一个连续的墓主人自传故事，与其他粟特墓葬中千篇一律的图案单元有所不同。这组浮雕一共有六幅。一些学者认为石椁西壁第二幅浮雕表现的是史君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拜访一对头戴王冠、怀抱婴儿的夫妇，因为王冠的缘故，这对夫妇被认为是嚈哒（Hephthalite）国王和他的王后。史君拜访他们是为了庆祝自己孩子的诞生（图一，2）。在西壁第三幅浮雕上，一位猎人因其头戴王冠，也被认定为是国王（图一，3）。北壁第一幅浮雕中一位首领坐在帐篷内与他的宾客们举杯共饮。这位首领毫无疑问是史君。此外还有其他三个人，其中应当包括他的儿子，以及一支骆驼商队（图二，1）。在相邻的北壁第二幅浮雕中，同样有一对头戴王冠的夫妇，他们坐在更为华丽的建筑内，宾客和乐伎站在前院（图二，2）。北壁第三幅浮雕描绘了坐在马背上的一对夫妇，身后各跟随有三位骑手，这对夫妇明显与其他人物有所区别，应当是史君和他的夫人。图中的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交换着祝福的手势（图二，3）。在北壁第四幅浮雕中，史君和他的妻子分别与宾客们坐在一起饮酒作乐，也许正值波斯新年诺鲁兹节（Nowruz）（图三，1）。在葛乐耐和黎北岚看来，这些对于史君生活场景的描绘，与当时嚈哒人的统治和史君的政治地位相符合，商队和货车显示出其粟特人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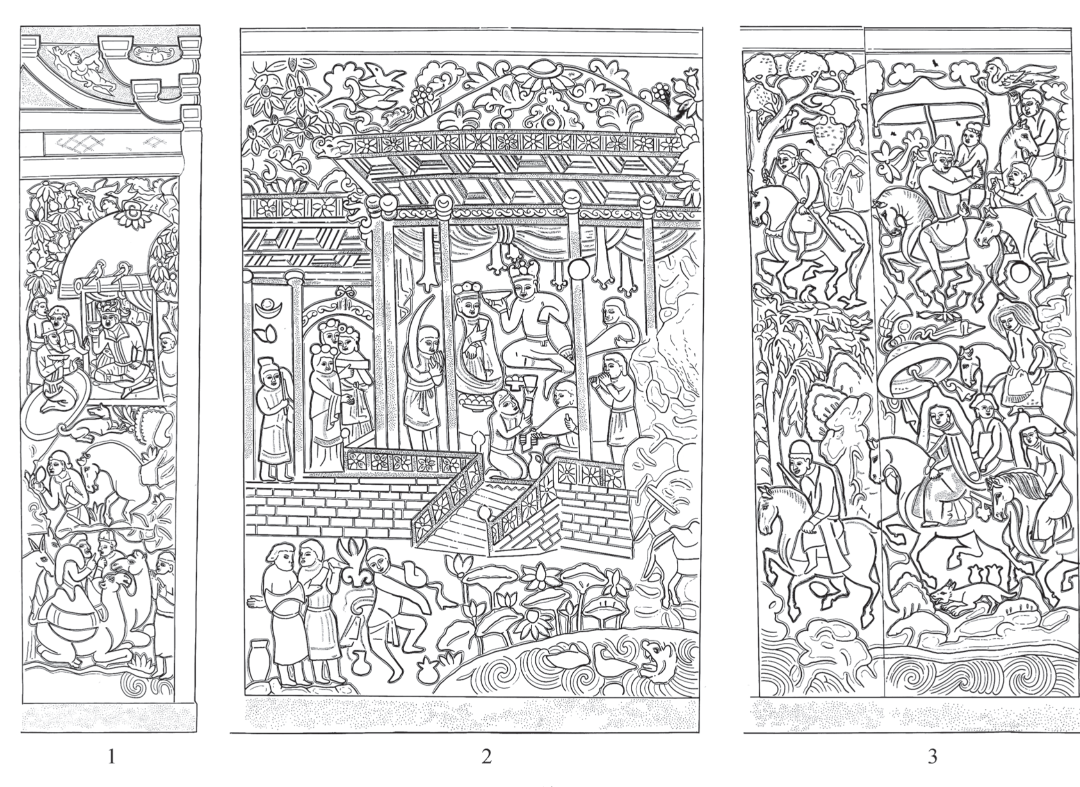
图一　石椁西壁浮雕

1. 西壁第一幅浮雕　2. 西壁第二幅浮雕　3. 西壁第三幅浮雕

（本文所用图片均引自杨凯军：《北周史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

正如我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对于史君墓中的这些场景，我有着不同的理解[6]。葛乐耐和黎北岚重点强调了王冠，认为王冠的佩戴者是史君在他旅途中朝拜的嚈哒国王，但我并不这样认为。从史君的墓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祖父阿史盘陀（Rashtvandak）同样也是一位萨保，是粟特人聚落的宗教领袖，而他的父亲阿奴伽（Wanuk）则并没有获得过这一头衔。因此我认为西壁第二幅浮雕中的这对夫妇是史君的祖父母，婴儿是史君，站在一旁的是史君的父亲。这对夫妇所戴的王冠象征着萨保所受到的崇高的尊敬（图一，2）。王冠的样式与卑路斯钱币上的相同，卑路斯是457～484年萨珊波斯的统治者，卑路斯钱币在当时广泛流通，在中国也十分多见[7]，因此按照钱币来描绘王冠的式样是很有可能的。卑路斯是嚈哒人的属臣，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现嚈哒人头戴这种王冠的图像。

西壁第三幅和北壁第一幅浮雕中的商队代表了史君成为政府官员之前的职业（图一，3；图二，1）。对于北壁第一幅浮雕，日本学者吉田丰（Yoshida Yutaka）认为，跟随着史君的三人可能是在史君墓志中提到的三个儿子。史君在535年被任命为萨保判


1 2 3

图二　石椁北壁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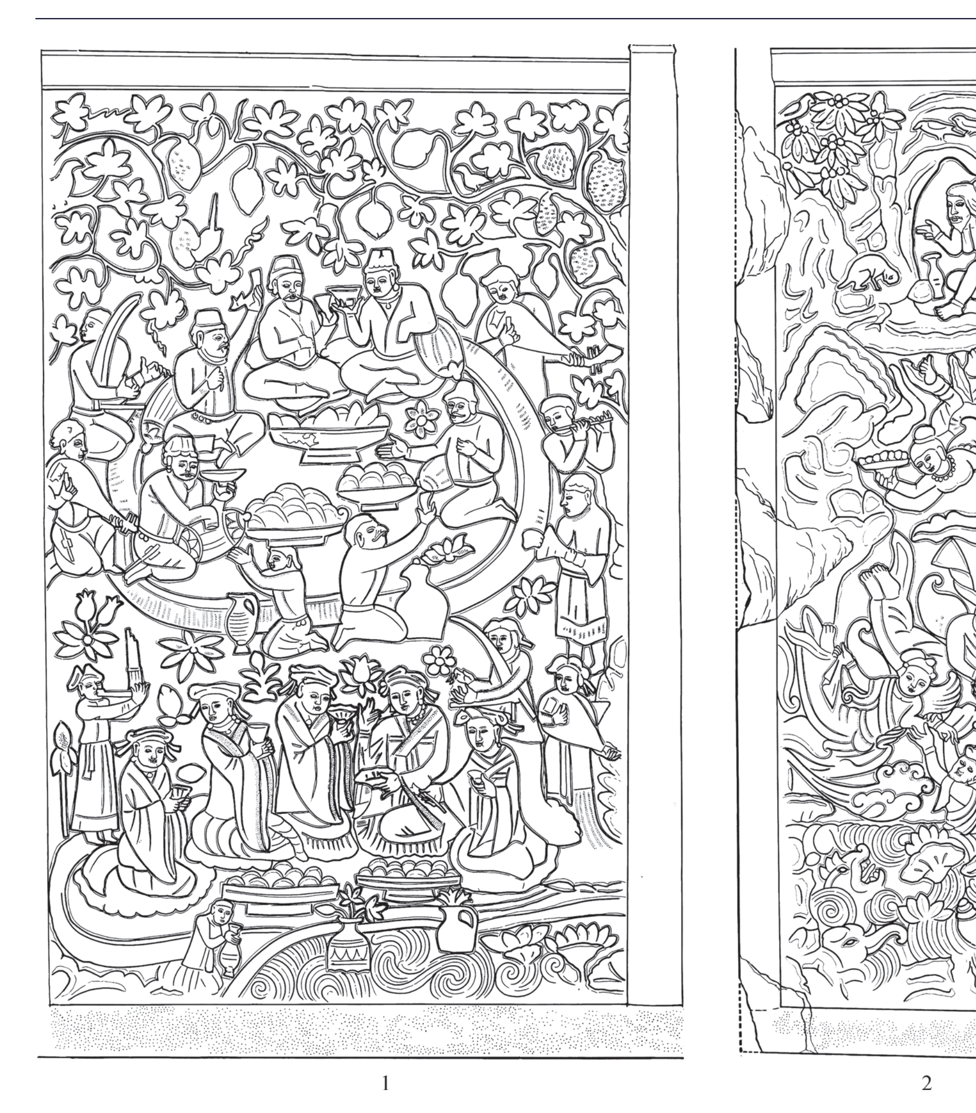
1. 北壁第一幅浮雕　2. 北壁第二幅浮雕　3. 北壁第三幅浮雕

事曹主，这是一个低等级的官职，相对应的，他此时的居所也较为狭小。这时前来拜访他的一位蓄着大胡子的人物，可能史君的父亲，同样的人物在西壁第二幅浮雕中也出现过（图一，2）。

北壁第二幅浮雕中，一对夫妇与宾客和乐伎坐在更为华丽的建筑中。我相信这表现的是史君和他的夫人，两人均头戴王冠。在一旁的三位女性可能是婢女，或是史君的女儿（史君是否有女儿并未在墓志中提及），也可能是他三个儿子的夫人。他的三个儿子并未在这里出现（图二，2）。

北壁第三幅浮雕表现的是一对坐在马背上的夫妇，伴随着他们的应该是他们的三个儿子和各自的夫人，或者是他们的三个女儿。史君转身向人们告别，此时的史君由萨保致仕。这离别的一幕是一种常见的中国古代传统：一位清明而受尊重的官员在致仕离开时会被他的友人送别和祝福。值得注意的是，史君在这时不再是萨保，因此他和他的妻子也不再戴有王冠（图二，3）。

在北壁第四幅浮雕上，史君和他的夫人应当已经到达了长安，享受他们的退休生活。这幅图像表现的可能是诺鲁兹节，也可能只是描绘他们离开凉州之后的舒适生活（图三，1）。正如我们从墓志所得知的那样，史君和他的妻子都在北周末年（579年）



图三　石椁北壁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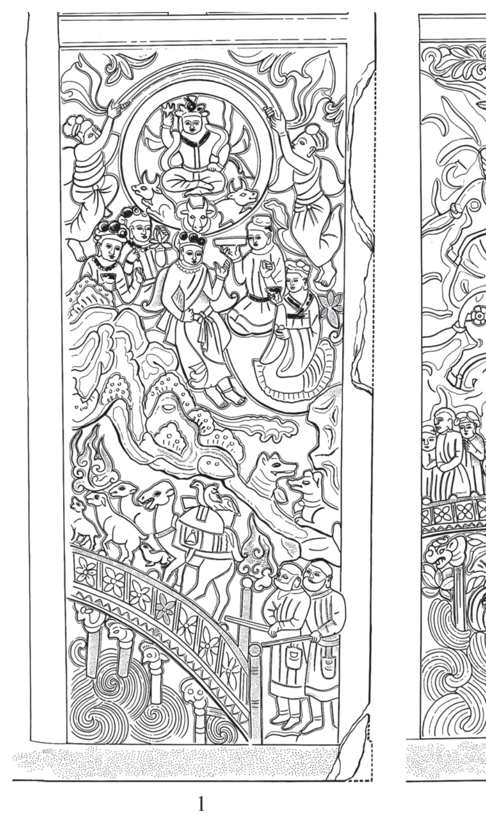
1. 北壁第四幅浮雕　2. 北壁第五幅浮雕

去世，安葬在他们的三个儿子为他们修建的墓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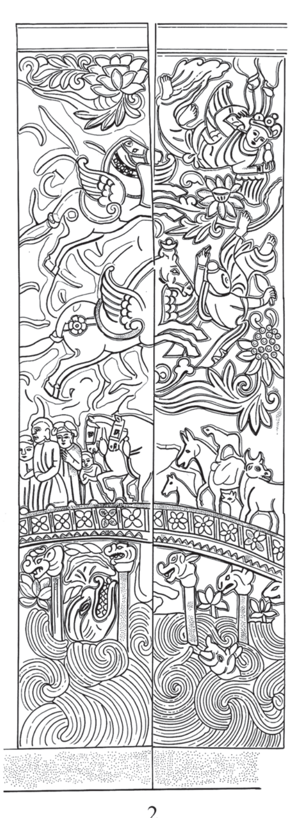
石椁上其余的浮雕描绘的是史君夫妇死后的世界。这些图像更加复杂，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在这里我们将了解两位学者的见解，即杨军凯先生对于图像的详细介绍以及葛乐耐先生对于各类宗教含义的解释[8]。

最大的一幅浮雕占据了石椁的大部分东壁，描绘的是袄教（Zoroastrianism，即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中的灵魂去往天国的场景，拥有着其他同一主题的图像所无法比拟的详细性和完整性（图四，1、2）。按照葛乐耐先生所说，右上角的神应当是湿婆摩醯首罗天（Shiva Maheshvara），他通常手持三叉戟，坐在三头公牛上。俄国学者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指出，粟特图像中的湿婆摩醯首罗天挽着飞舞的飘带，这一形象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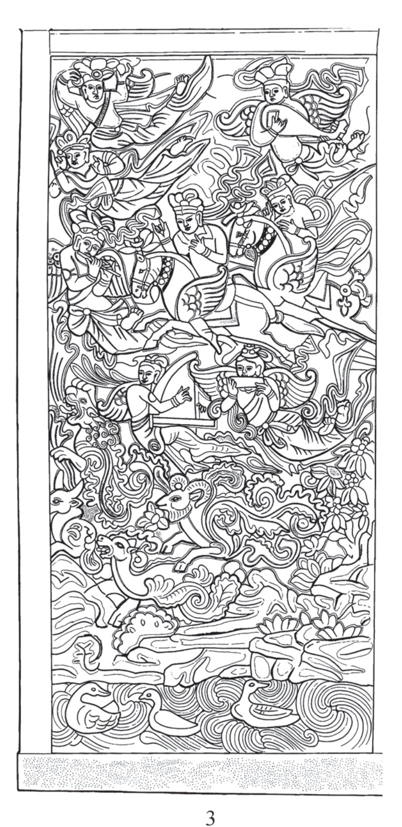
是由伊朗的风神伐由（Vayu，粟特文为Vešparkar或Weshparkar，即韦施帕卡）转变而来[9]。浮雕的其余部分表现的是这对去世的夫妇接受审判、通往天堂的情形。按照祆教的教义，在去世后第三天的拂晓，逝者的灵魂将见到女神妲厄娜（daēnā），她以美丽少女的形象出现，代表着死者的善行。“daēnā”含义复杂而广泛，在中古波斯语中称为“dēn”，现代波斯语中称为“dīn”，“是一个包含有多重神学以及哲学意义的词：‘它是人类所有精神上的属性和特征、想象、自我、道德、宗教信仰的总和’”[10]。这里的妲厄娜头戴宝冠，右手抚着作为祆教信徒象征的长腰带（kustig），腰带上的三个圆环代表着善念、善言、善行。她的左手伸出，似乎将要接过记录着史君高尚品行的卷轴。另有两位少女站在她的身后，头戴宝冠，捧着作为妲厄娜象征的杯子和鲜花。史君的妻子可能已经上交了她的卷轴，正捧着盛有圣水（haoma）的杯子。接着，这对夫妇将要通过钦瓦特桥（Chinwad）。正如葛乐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两只狗守卫着钦瓦特桥，一些火焰浮在空中来帮助灵魂通过隐匿在黑暗中的桥面。桥下是湍急的流水，恶魔将会吞噬那些没有通过测试从桥上坠落的灵魂。桥的一端站着两位祭司，手执用以在寺庙照管神火的双股火棍（barsom），带着口罩（padam）以防止呼吸玷污圣火[11]。钦瓦特桥是拱形的，可能是受到了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12]。



1



2



3

图四　石椁东壁浮雕

1. 东壁第一幅浮雕　2. 东壁第二幅浮雕　3. 东壁第三幅浮雕

按照祆教传统，每个灵魂都将独自过桥，然而在这幅图像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史君和他的妻子，还能看到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群家畜以及背驮货物的骆驼。我们可以推测史君夫妇安全地通过了审判，因为在接下来的图像中，他们头戴王冠，乘坐翼马升入天国，演奏着器乐的飞天环绕着他们。正如史君墓志上所写的那样，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作为夫妇，“进入天国后他们也将生活在一起”[13]（图四，3）。

在这里，我们仍要注意一些神兽：三只在水中游曳的鸭子，两匹没有骑手的翼马。最有趣的是一个正向下坠落的人物，他的上方是一位手持一物的天使。在法国学者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之后，葛乐耐先生也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正在下坠的人表现的是摩尼教信仰中的欲望，所有的欲望在人们去世后升入天国时都需要被丢弃。葛先生还认为，上方的天使应当是位女性，其形态与飞天相吻合，人物风格传承自佛教，这也与之前关于摩尼教欲望的解释相印证[14]。但是，首先从发型来看这是位男性而非女性。其次，把这幅场景简单地解释为当人们没有通过善思善言善行的审判后所发生的情况将会更为合理。天使手中所持的是人们一生的行为记录，通常罪恶的人将会从狭窄的钦瓦特桥上坠落，掉进潜伏在桥下的怪物口中。但在这幅图像中，钦瓦特桥已经占满了画面空间，所以当时的艺术家们只能将表现坠落灵魂的场景放在另一个空间。中国早期传统工匠可能也曾被要求描绘过关于人们被拒绝救赎的主题[15]。

魏义天认为这一系列的浮雕所描绘的从审判到升入天国的画面根据的是摩尼教的教义。例如他认为相对于妲厄娜女神和她的两位同伴，更应将这三人定义为摩尼教的光明圣女。葛乐耐先生则指出这是祆教的内容，我也这样认为[16]。

接下来的两幅浮雕具有宗教指向性，表现了摩尼教和佛教主题。第一幅浮雕在石椁的西侧，上面的图像被杨军凯先生暂时解释为佛祖讲道向众生宣扬佛法的场景。但随后的研究认为这里描绘的是摩尼，佛光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他所结的手印[17]。一对夫妇跪在神祇面前，他们最有可能是史君和他的妻子。图像右侧跪着摩尼教徒，头戴高帽以显示他们作为神的选民的身份。下方有两列相对跪着的人和动物。此外还有两组人物，一组被葛乐耐先生定义为中国的智者，他们留有胡子梳着发髻，可能是道家的代表者。另一组则被认为是汉族以外的西方蛮夷（图一，1）。但葛乐耐先生文章中提供的图片并不清晰，无法证实他对于两组人物的识别。

第二幅浮雕表现了一位身体消瘦的苦修者，坐在类似山洞的地方，他的身旁有一只瓶子，面前有一只动物斜靠在洞外的山石上。在他的下方有多位飞天，他们中的两位从湍急的水流中救出一对男女，可能是史君夫妇（图三，2）。葛乐耐先生将这幅图像与佛教和摩尼教相联系。他引用了一首摩尼教赞美诗，诗中询问“泛滥的洪水流向汹涌的大海……谁将引领我超脱轮回”。此外在一些文献中，摩尼也被为称为“伟大的苦修者”[18]。但我认为，这位类似印度苦行僧的人物可以被解释为569～580年北周武帝灭佛的产物，在这期间佛像也是禁止出现的[19]，苦修者的形象含义模糊，可以避免官府的非难。这对夫妇获救的水流被认为可能代表着“苦海”，或者“苦难之海”，也就是

轮回（saṃsāra），对此我并不赞同。我认为这一场景表现的是从无法感知现实的愚昧中获得救赎，这是苦修者的修行主题。

在史君墓中似乎存在着三种宗教，这就要求我们尝试给出合理的解释。最初我认为这可能与墓主人作为萨保，或者说是凉州粟特人聚落首领的身份有关。他的职责也可能延伸至居住在同一区域内的其他民族。史君的墓志上明确记载了他信仰祆教，但也许他认为应该在墓葬里表现出从前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其他宗教信仰。可是在史君去世时他已经不再担任萨保甚至不居住在凉州，这一解释显然是不合理的。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女士对于史君石椁所表现出的宗教多样性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她认为祆教在当时是一个祖先崇拜的宗教，而不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教场所和宗教信仰的团体，更像是“众多的亲缘、村落、城邦群体”，信徒们有着笼统的信条即“我承认我是马兹达的崇拜者，是琐罗亚斯德的追随者，我痛恨恶魔，并将遵守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的律法”，而并没有严格界定的成系统的教义。宗教仪式是存在的，这些仪式均由祭司执行且没有一般信徒在场。克罗恩女士指出，重点是举行仪式、供奉神祇的寺庙，但信徒们并不在那里聚集。“亚斯纳（Yasna）作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是祭司代表整个聚落的信徒进行礼拜”。个人依靠寺庙来进行与出生、结婚、死亡相关的仪式，但是信徒们并没有共同的礼拜仪式。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参加多种性质的教派和礼拜仪式成为可能，在信奉佛陀或者其他的神明的同时要求祆教祭司举行传统仪式，就像在古代中国，人们生病找道士消灾，去世找和尚超度。正如克罗恩女士所说，“前萨珊王朝时期的宗教形态一定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即便祭司也是如此”[20]。我们可以在史君墓中看到同样的宗教多样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带有摩尼教和佛教色彩的图像似乎都在强调道德，而当表现与死亡相关联的仪式时，史君夫妇又回到了祆教的传统中来。

“多形宗教”包含有两种理解：“eclecticism”即折衷主义，指并不严格地秉持单一模式，而是利用多种理论和观点来获得对于同一问题认识上的互补；“syncretism”即调和主义，指将不同信仰和实践相互融合成为一体[21]。在墓葬中所体现出的史君的宗教信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种区别对于我们研究不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而言十分重要，例如，我们对“汉化”的概念进行分析时就应当注意这两种不同理解的区别。

注　释

[1] a. 杨军凯，孙武. 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5（3）：4～33.
b. 杨军凯. 关于祆教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西安北周萨保史君墓［J］. 文物天地，2003（11）：26～29.

[2] Albert E.Die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Tomb of Master Shi［J］.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003（17）：108.

［3］ a. Yang Junkai. *Carvings on the Stone Outer Coffin of Lord Shi of the Northern Zhou,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M］. Paris:Écolefrançaised' Extrême-Orient, 2005：21-45.

b. Frantz Grenet, PénélopeRiboud, and Yang Junkai.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b in Xi' an, Northern China［J］.*StudiaIranica*, 2004（33）：273-284.

［4］ a. Sun Fuxi. *Investigations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ino-Sogdian bilingual inscription of the tomb of Lord Shi.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M］. Paris:Écolefrançaised' Extrême-Orient, 2005: 47-55.

b. Yutaka Yoshida. *The Sogdian version of the new Xi'an inscription.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M］. Paris: École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 2005: 57-72.

c. 另一块在这个时期由两种语言撰写的碑文是中文-婆罗钵文的，作铭. 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壁墓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J］. 考古，1964（9）：458～461.

d. Janos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āsānian relations. La Persia nelmedioevo*［M］. Rome: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971: 363-376.

［5］ Frantz Grenet,PénélopeRiboud. A reflection of the Hephtalite empire: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in the reliefs of the tomb of the sabaoWirkak (494-579) ［J］.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007（17）: 133-143.

［6］ Albert E.Dien. The Tomb of the Sogdian Master Shi: Insights into the life of a Sabao［J］. *The Silk Road*, 2009（7）: 42-50.

［7］ 关于在中国出土的波斯银币，截止至1972已经有122枚被报道过. 夏鼐. 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 考古学报, 1974（1）：91～110.

［8］ a. Yang Junkai. *Carvings on the Stone Outer Coffin of Lord Shi of the Northern Zhou,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M］. Paris:Écolefrançaised' Extrême-Orient, 2005: 21-45.

b. Frantz Grenet. Religious diversity among Sogdian merchants in sixth-century China: Zoroastriainism, Buddhism, Manichaeism, and Hinduism［J］.*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and the Middle East*，2007(27-2): 463-478.

［9］ a. Boris Marshak. Les fouiles de Pendjikent［J］. *Comptesrendu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990: 307-309;

b. Boris Marshak. *New discoveries in Pendjikent and a problem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Sasanian and Sogdian art. La Persia e l'Asia Centrale de Alessandro al X secolo*［M］, Rome, 1996: 435.

c. Paul Pelliot. Le sa-pao［J］.*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03(3): 669, note 6. 转引自Albert E. Dien. A note on hsien 祆'Zoroastrianism'［J］. *Oriens*, 1957(10): 286.

d. 关于神的名字，可见B. *Gharib. Sogdian Dictionary*［M］. Tehran: Farhangan Publications, 1995: 427.

［10］ a. Ehsan Yarshater, ed. *Encyclopedia Iranica*［M］. Costa Mesa, CA: Mazda Publisher, 1996: (7) 279, subDēn. 也可见M. Molé. Daēnā, le pontČinvat et l'initiationdans le Mazdéisme.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M］. Paris: Presses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0:155-185.

b. Geo Widengren. La recontre avec la daēnā, qui représente les actions de l'homme. Gherardo Gnoli, ed. *Orientalia Romana: Essays and lectures 5. Iranian studies. Serieorientale Roma LII*［M］. Rome: IstitutoItaliano per ilmedioedestremooriente, 1983: 41-79.

c. Werner Sundermann. Die jungfrau der gutentaten. Philippe Gignoux, ed. *Recurrent patterns in Iranian religions: From Mazdaism to Sufism*［M］. Paris: Association pourl' Avancement des ÉtudesIraniennes, 1992: 159-173.

d. GherardoGnoli. A Sassanian iconography of the Dēn［J］.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993（7）: 79-85.

e. "dēn"这一词语也会出现在摩尼教中. Christiane Reck. Die Beschreibung der daēnā in einemsoghdischenmanichäischen Text. Carlo G. Cereti et al., eds. *Religious themes and texts of pre-Islamic Iran and Central Asia*［M］.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3: 323-338. and GuittyAzarpay. The allegory of dēn in Persian art［J］. *Artibus Asiae*, 1976(38-1): 37-48.

［11］ 关于祆教圣火的讨论，可见GuittyAzarpay. The imagery of the Manichaean "Call" on a Sogdian funerary relief from China. *Wolfgang Heimpel and Gabriella Frantz-Szabó, eds. Strings and threads: A celebration of the work of Anne Draffkorn Kilmer*［M］. Eisenbrauns: Winona Lake, 2011: 3-5.

［12］ Miho博物馆所藏石椁上的钦瓦特桥是平的，可见James R. Russell.*Zoroastrianism and the Northern Qi panels*［M］. Bombay: Zoroastrian Studies Newsletter, 1994: 1445-1450, reprinted in idem, *Armenian and Iranian Studi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45-1450.也可见 Annette L. Juliana, Judith A. Lerner. 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J］. *Orientations*, 2001(32-8): 54-61, Fig. 4a.

［13］ Yutaka Yoshida. The Sogdian version of the new Xi'an inscription.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M］. Paris: Écolefrançaised' Extrême-Orient, 2005: 59.

［14］ 同［13］.

［15］ 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陶器上，可以看到一个相似的正在坠落的人物形象. 葛乐耐通过发髻的形状认为这是道教或者佛教徒是没有道理的. Frantz Grenet, PénélopeRiboud, and Yang Junkai.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b in Xi'an, Northern China［J］. *StudiaIranica*, 2004（33）: 283.

［16］ a. de la Vaissière. Mani en Chine. 357-378.

b. 同［8］b: 476, note 24.

［17］ a. 同［8］b: 474-475.

b. Carol A. Bromberg. An Iranian gesture at Miran［J］.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991(5): 45-58.

［18］ 同［8］b: 476.

［19］ a. 周书・卷五・帝纪第五・武帝上［M］. 中华书局，1971.

b. 周书・卷七・帝纪第七・宣帝［M］. 中华书局，1971.

c. Angela Sheng. From stone to silk-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funerary furnishings among Eastern Asian peoples around 475-690 CE［A］.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C］. Paris: Écolefrançaised' Extrême-Orient, 2005: 168.

［20］ Patricia Crone. *The nativist prophets of early Islamic Iran: rural revolt and local Zoroastrian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6-179.

［21］ Helena Motoh. The noble eclecticism: Example of Tao Yuanming's Xing Ying Shen. Jana S. Rošker and NatašaVampeljSuhadolnik, eds. *The yields of transition: Literature, art and philoso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M］.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227.

Remarks on the Tomb of the Sogdian Shijun

Albert E. Dien

Abstract: The tomb of Master Shi discovered near Xi'an has provided much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gdians who resided in China in the pre-Tang perio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ignificant studies carried out by Japanese and European scholars, and put forward some new comments. It is thought that a part of the reliefs on the Sarcophagus represent a continuous biographical narrative of Shijun, including every stage of his life from infant to retirement. Another part of the reliefs depict the passage of Shijun and his wife's souls passed the test and ascended to Paradise, representing the Zoroastrian belief of life and death. But the themes of Manichaean and Buddhist also can be seen in these reliefs. It is because Zoroastrianism was an ancestral religion at that time, not one with a strictly defined system of beliefs.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laymen to practice a kind of polymorphism with sects and cults. The term polymorphism can have two senses: "eclecticism" and "syncretism". This distinction is very important when we study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societies, such as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Sinicization.

Key words: tomb of Master Shi; reliefs on the Sarcophagus; Zoroastrian belief of life and death; polymorphism

东汉时期有翼狮形石兽与中西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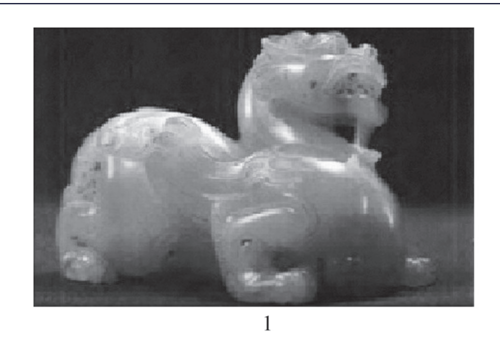
刘汉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东汉时期，在陵园墓前的神道上立石兽的传统已初步形成，《风俗通义》载："《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与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封氏闻见记》卷六引），其中有一类石兽特别引人注目，其形状为身体呈"S"形、体型瘦长、颔首挺胸、曲腰、翘臀、垂尾、口吐长舌或垂须、背树双翼、做行进状，为张口露齿的狮形兽首，翼有单层和双重之别，翼间有三、四、五翎之分，翼尖朝后，四肢粗壮有力，造型劲健古朴。这类石雕不仅存在于帝王陵园前，且在王公贵族、官宦人家墓前也普遍设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其中"石麒麟、石辟邪"包括了一定数量的有翼狮形石兽。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暂且把这类石兽叫做"有翼狮形石兽"，本文拟对此类有翼狮形石兽的分布、艺术造型及渊源进行讨论。若有不当之处，还望博雅者见谅。

一、有翼狮形石兽的分布

狮子并非中国产物，而产于非洲、亚洲西部及欧洲部分地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狮子，猫科大型动物，从前广泛分布在非洲、亚洲、欧洲、现在仅存于撒哈拉以南地区……狮子肌肉发达，身长体壮，腿短，头大。其中雄狮身长3米左右，肩高1米，雌狮体形较小，狮毛较短，为浅黄色至深褐色，鬃毛为雄狮所特有。"[1]现在所知关于狮子传入中原汉地的最早记载，见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饮食、宫室……而又桃拔、师子、犀牛。"从现存实物来看所知的最早发现的有翼狮形石兽是西汉元帝渭陵寝殿出土的有翼狮形玉兽[2]，其长须下垂，背树双翼，翼有三翎，是作为随葬品出土的（图一，1）。据李零先生研究，在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一件有翼狮形玉兽（图一，2），昂首挺胸，头有双角，背上有双翼，推测该作品时代为西汉晚期[3]。在东汉章帝时期，狮子被作为贡品献给朝廷的情况已很多见，《后汉书·章帝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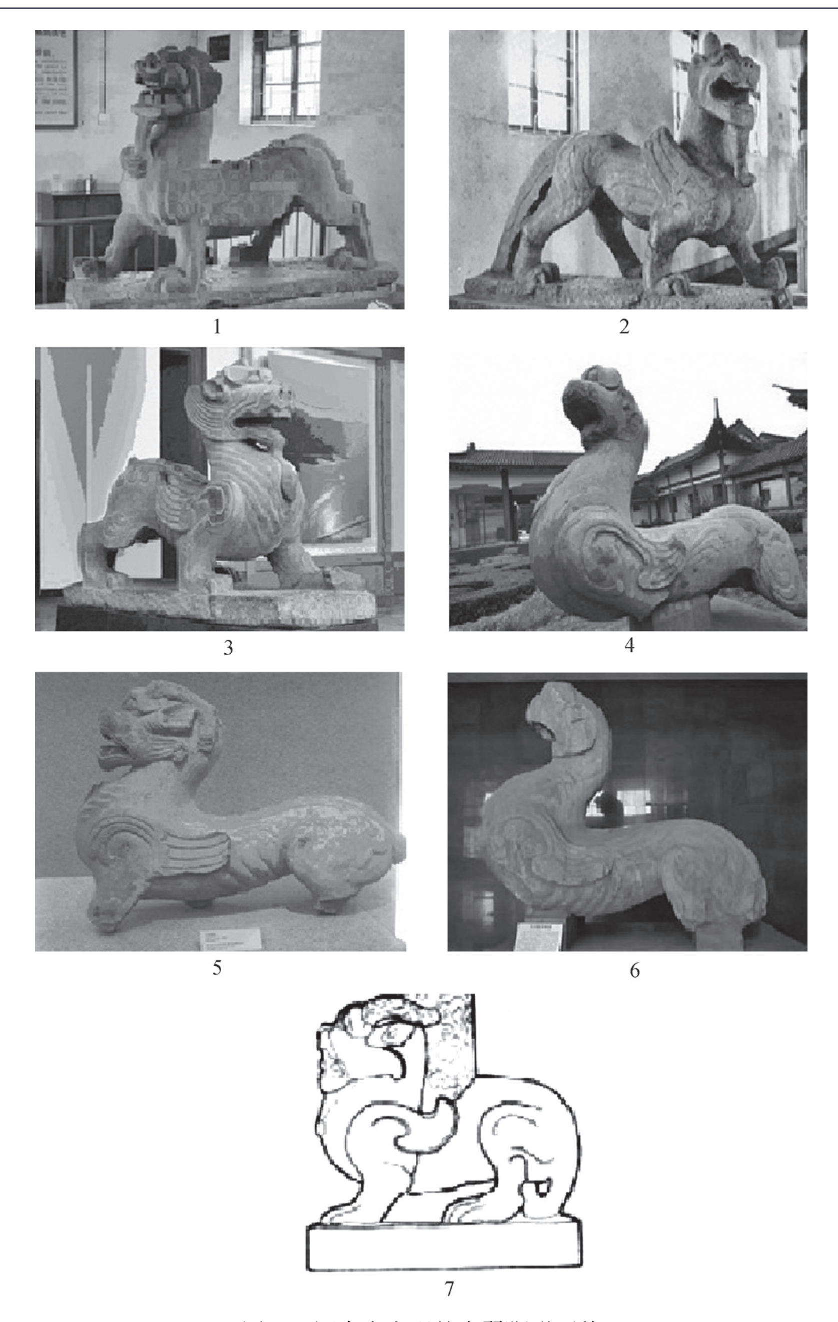
图一　有翼狮形石兽
1. 元帝渭陵出土　2. 美国赛克勒美术馆馆藏

纪》载："章和元年……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狮子。"随之有翼狮形石兽开始出现在陵园神道旁，目前发现的数量较少，仅分布于河南、四川、河北、陕西、山东、江苏六省。

河南省是发现有翼狮形石兽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洛阳、南阳、许昌等地。其中洛阳西郊孙旗屯出土了一对有翼狮形石兽[4]，一件为双角，一件为独角，长须下垂，背树双翼，翼有三翎，翼尖上翘，背部阴刻篆书"缑氏蒿里成奴作"（图二，1）。伊川县彭婆镇东高村出土一件，造型与孙旗屯出土的有翼狮形石兽类似（图二，2）。孟津老村乡油坊村亦出土一件[5]，口吐长舌，背树双翼，翼间有五翎，翼尖上翘（图二，3）。许昌襄城县颍川镇出土一件[6]，局部残，口吐长舌，背树双翼，翼间有五翎，翼尖上翘（图二，4）。许昌禹州文管所收藏一件[7]，造型与颍川镇出土的有翼狮形石兽类似（图二，5）。南阳宗资墓前一对有翼狮形石兽[8]，局部残，翼间五翎，翼尖上翘，在其肋部刻有"天禄、辟邪"（图二，6）。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出土的石兽乘盘[9]，底部为一有翼狮形石兽，整体呈蹲踞形，顶部有独角，背树双翼（图二，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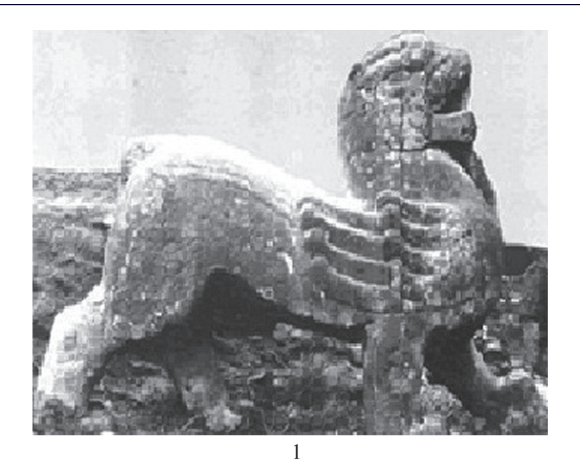
四川省发现的有翼狮形石兽集中于西部的雅安、卢山一带，它们分别是：雅安高颐墓有一件[10]，双重飞翼，翼有四翎，翼尖略翘，从石阙上残存文字可知建造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这也是石兽的雕刻时间（图三，1）。卢山樊敏墓前有三件[11]，双重飞翼，翼有四翎，翼尖略翘（图三，3）；川东地区渠县发现的蹲踞式有翼狮形石兽[12]，头、足部残，背树双翼，翼有四翎，翼尖上翘（图三，2）。

河北省以内丘发现比较集中。其中十方村出土一件[13]，翼间有五翎，原报告误认为是北朝时期的作品，其造型和河南省出土的十分相似（图四，1）。另外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吉米特博物馆分别收藏着三件有翼狮形石兽 (图四，2)，费城大学收藏的为一对，出自内丘吴村，其造型和宗资墓前石雕风格一致[14]。



图二 河南省发现的有翼狮形石兽

1. 洛阳西郊孙旗屯出土 2. 伊川县彭婆镇东高村出土 3. 孟津老村乡油坊村出土 4. 许昌襄城县颍川镇出土
5. 许昌禹州文管所藏 6. 南阳宗资墓前石兽 7. 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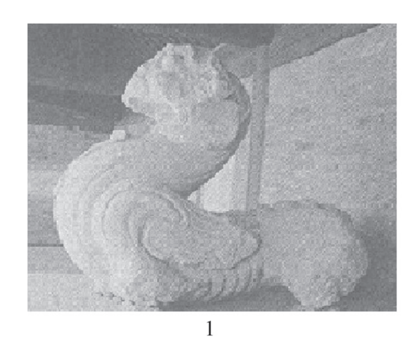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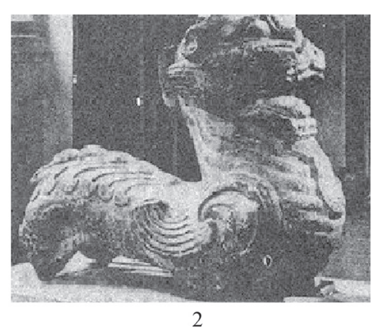

2


3

图三　四川省发现的有翼狮形石兽

1. 雅安高颐墓　2. 渠县出土　3. 樊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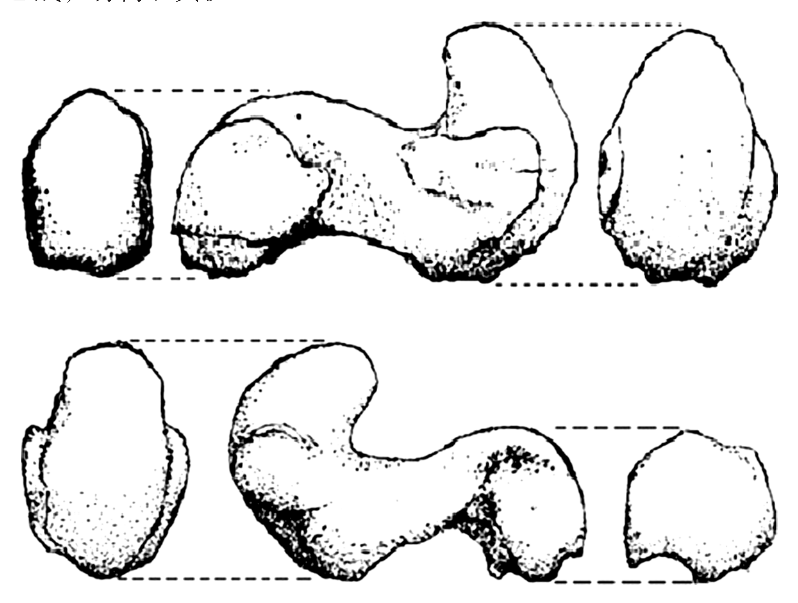

1


2

图四　河北省发现的有翼狮形石兽

1. 内丘十方村出土　2. 法国吉米特博物馆馆藏

陕西省共发现四件，除了元帝渭陵出土一件玉质的有翼狮形玉兽以外（图一，1），其余三件均分布于汉中地区且均为石质，其中张骞墓前一对[15]，头、足缺失，从残石看背树双翼，其风格与南阳宗资墓前石兽相同（图五）。李固墓前的一件石兽位于城固县，已残，背树双翼。



图五　张骞墓前有翼狮形石兽

山东省则主要集中在鲁南一带，其中滕州博物馆馆藏有三件，均残，石兽有双翼，胸前篆刻有“龙爵”二字，另外一件仅存后身[16]。泗水县鲍王村发现四件，仅一件完整，身有双翼，做行进状。石像旁有“鲍王坟”，推测这四件石像与该墓有关[17]。曲阜孔林西北发现两件，其中一件完整，口垂长须，肩背双翼，另一件无双翼。此石兽发现的地点距汉博陵太守孔彪墓（171年）约150米[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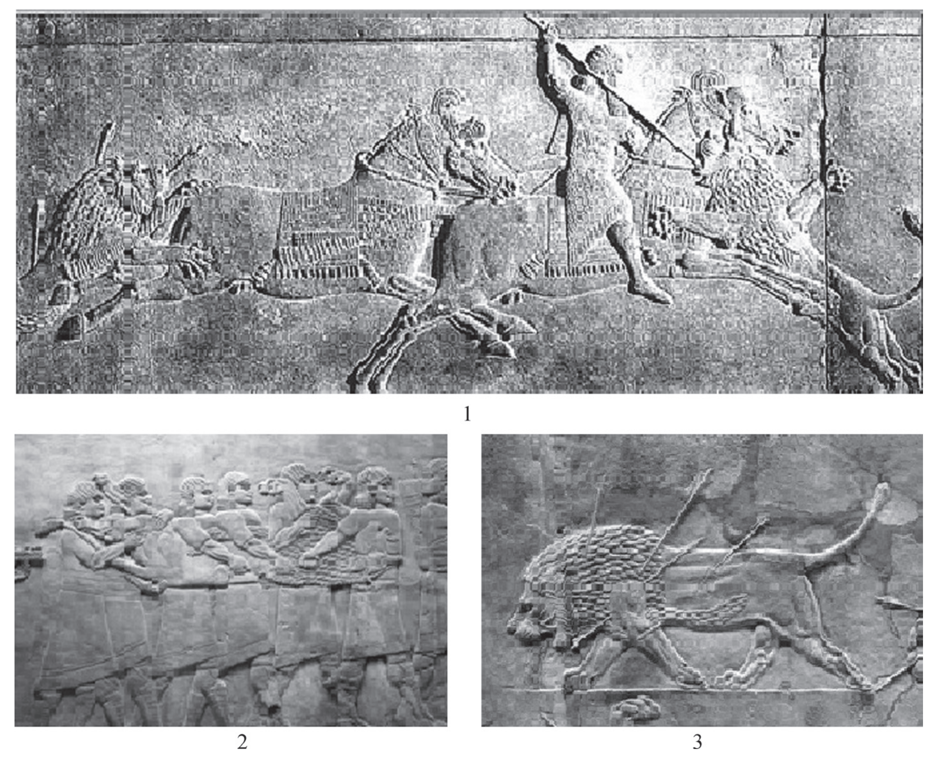
江苏省的有翼狮形石兽主要发现在苏北徐州一带，其中邳州占城发现一件，口吐长舌，背树双翼，呈行进状。占城是东汉下邳国的大型墓地，这件石兽或许与东汉大墓有关。徐州博物馆馆藏两件有翼狮形石兽，属半成品，背树双翼，做行进状，双重飞翼，第一层翼间有四翎，第二层翼间有三翎[19]。

根据有翼狮形石兽在以上六省的分布和形态变化，有学者把有翼狮形石兽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安帝至桓帝时期（107 ~ 167年）；第二期为灵帝至献帝时期（168 ~ 220年）[20]。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东汉时期有翼狮形石兽的传播是以河南为中心，即以当时的洛阳、南阳为中心，西向陕西、四川，东向江苏、山东，北向河北传播。河南、河北两省发现的有翼狮形石兽的双翼为单层翼，翼间多为三、五翎；江苏、四川两省发现的有翼狮形石兽双翼为双重翼，翼间有四翎；陕西省发现的比较少，且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从元帝渭陵出土的有翼狮形玉兽中能得知该区石兽双翼的造型和河南省发现

的石兽双翼很相似。山东省由于有翼狮形石兽破坏严重，故对其双翼的特征不详。

二、狮形兽的西来

前文已经提及，狮子原来分布在亚非欧的广大地区，现仅存于撒哈拉以南地区。史载，在古代中亚两河流域的沼泽地带，狮子为患。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王辛赫那里布，将都城迁到底格里斯河左岸的尼尼微。在犹太人的经典中，尼尼微被称为“血腥的狮穴”[21]。这一方面反映了亚述人的暴虐、残忍和尚武的传统，残忍在亚述人那里可能是一种近似于勇敢的品质，猎狮只是亚述人尚武传统里的一个表现，借此来表现国王的权威和勇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底格里斯河流域狮子之多。在亚述宫廷浮雕中有许多国王狩猎狮子的场面，猎得雄狮要献给诸神以示酬谢（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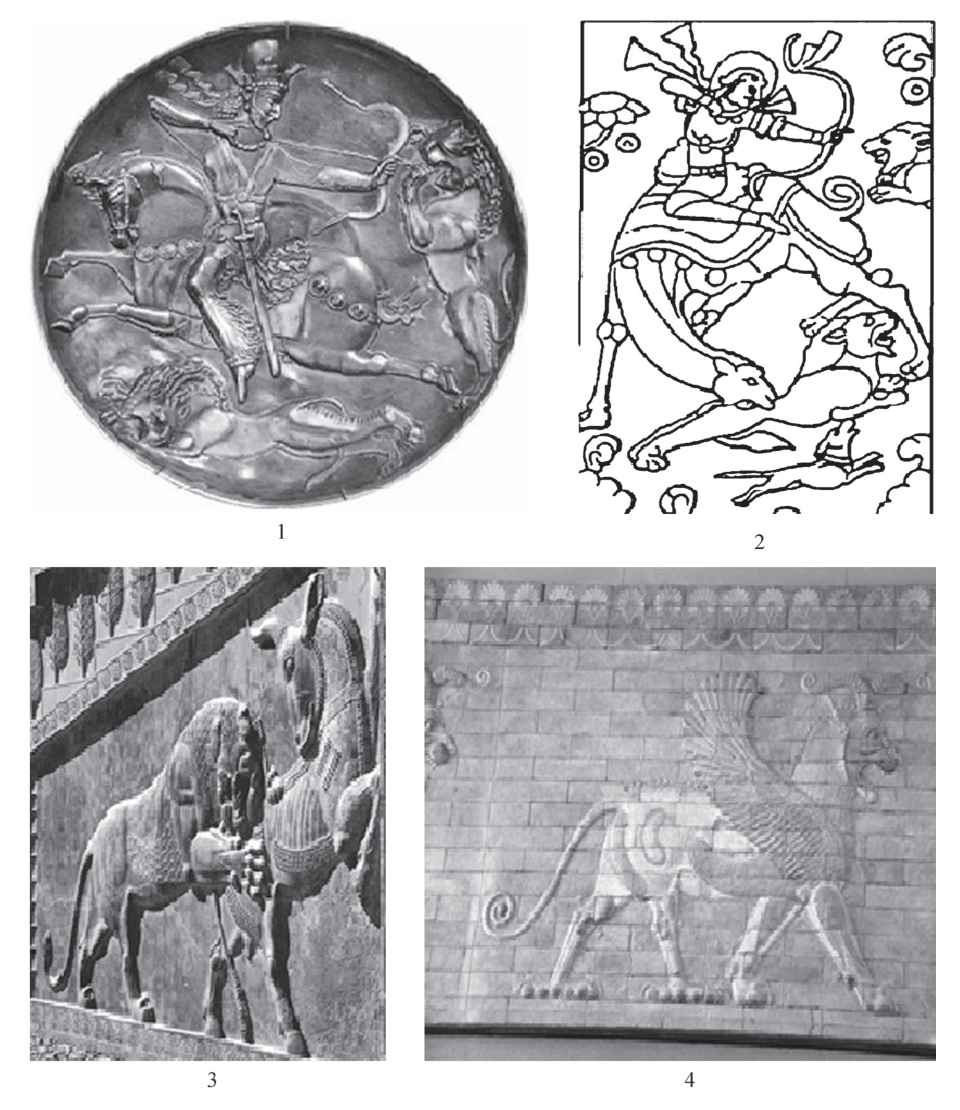


1　2　3

图六　亚述宫廷猎狮图

1. 帝王猎狮图　2. 献狮图　3. 受伤的狮子

公元前6世纪中叶，居鲁士一世创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即第一波斯帝国。在随后的波斯艺术中帝王猎狮这种风格的题材也得到了发扬，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雕刻中就经常见到帝王猎狮图，一直延续到萨珊时期[22]（图七，1）。太原发现的虞弘墓[23]虽然其时代为六世纪末，但所刻画的猎狮图却代表着这一地区的文化传统（图七，2）。波斯艺术中野兽的争斗也是永恒的题材，在阿契美尼德宫殿的墙壁



图七　波斯-萨珊艺术图

1. 帝王猎狮纹萨珊银盘　2. 虞弘墓猎狮图　3. 狮子袭击牛图　4. 有翼狮形石兽

上雕刻有狮子袭击牛的场面[24]（图七，3）及有翼狮形石兽[25]（图七，4）。

在居鲁士一世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同时，扎拉图什特拉（Zarathushitra）在波斯帝国的东部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后传入中国被称为火祆教。火祆教奉《阿维斯塔》为经典，以阿胡拉·马兹达为主神，基本教义是善恶二元论[26]。如果说亚述帝国中的帝王猎狮图表现的是君主的权威和勇猛，那么波斯-萨珊艺术中的猎狮图则君王代表了光明、善良和正义的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狮子、有翼狮形兽等怪兽则代表了黑暗、罪恶和邪恶的之神阿赫里曼，两者之间的搏斗，是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的斗争。

早在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时，粟特人就已信奉火祆教[27]。火祆教传入粟特的同时又向北传入中亚七河地区的塞人部落，七河地区塞人部落的墓葬



图八　方坐承兽铜盘

里所出表现火袄教教坛的青铜器披露了这一史迹[28]。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天山东部阿拉沟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木椁墓[29]，其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方座承兽铜盘，其上立有一对狮（图八），墓主人可能和塞人部落有关。1983年在新疆伊犁河谷的巩乃斯河畔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30]，其中一件青铜器和阿拉沟塞人部落古墓所出的方座承兽铜盘完全相同，用途为火袄教的祭坛。狮形兽的艺术造型是伴随着火袄教的传播而走向东方的，其路线大致为：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七河地区—最后沿着天山向东传播达到了今之天山东部的吐鲁番盆地附近。

在中国的先秦典籍中，就有关于狮子的记载，当时称为“狻猊”[31]，《穆天子传》卷一载：“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穆天子传》于西晋太康二年出土于汲君战国魏襄王墓中，成书于战国后期燕、赵人之手[32]，所以，在战国后期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已经知道了“狮子”这一概念，至于见没见过“狮子”还是值得商榷的。当时古人对狮子的理解更多的是借助老虎，古人把狮子看成是短毛虎（见《尔雅・释兽》），认为狮子比老虎厉害，可以吃老虎，同时把“狻猊食虎”视为祥瑞[33]。据林梅村先生研究，“狻猊”一词大概来自塞语表示狮子的词sarvanai（形容词）或sarauna（抽象名词）[34]。随着张骞通西域，狮子开始进入中原汉地，班固的《汉书・西域传》：“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故最晚在西汉武帝时期，狮子已经开始进入中原汉地。

在东汉章、和帝之际，狮子成为西域各国贡献给中原王朝的贡品，并开始大规模的进入中原汉地。《后汉书・章帝纪》：“章和元年（87年）……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狮子。”《后汉书・和帝纪》：“ 章和二年（88年）……安息国（在今伊朗、伊拉克一带）遣使献狮子、扶拔。”《后汉书・班超传》：“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符拔、狮子。”

三、有翼狮形石兽艺术造型的演变

随着狮子大规模的进入到中原汉地，其体型特征和特点逐渐为中原汉人所熟知，古人认为狮子和老虎一样凶猛，可除凶祟，因而用这种神兽来看阙门、守陵墓，还特意给狮子取了中国名字叫“天禄”或“辟邪”，于是狮子石雕艺术开始在陵墓前流行。

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石阙门前发现了年代最早的石刻狮子，石阙前有《武绥宗使石工造碑》，其铭为："建和元年（147年）……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柿子，直四万……"[35]。其中"柿子"即"狮子"。

1."S"形艺术造型

东汉时期的墓前狮子身体呈"S"形、体型瘦长、颔首挺胸、曲腰、翘臀、垂尾、吐口长舌或垂须、做行走状，与西亚、中亚狮子的造型相比较，其艺术造型较为写意，很明显已是经过"汉化"的造型了，尤其是这种"S"形艺术造型的源头应在中原汉地寻找。

在关中旬邑发现的东汉邠王壁画墓中[36]，后室的北壁和西壁有单骑车马出行图，图中马做行进状，颔首张口、胸略挺、曲腰、翘臀、垂尾（图九，1）。定边郝滩东汉壁画墓中[37]，在墓室东壁绘有单骑车马出行图，作行进状，颔首张口、口露牙齿、翘



图九　东汉车骑出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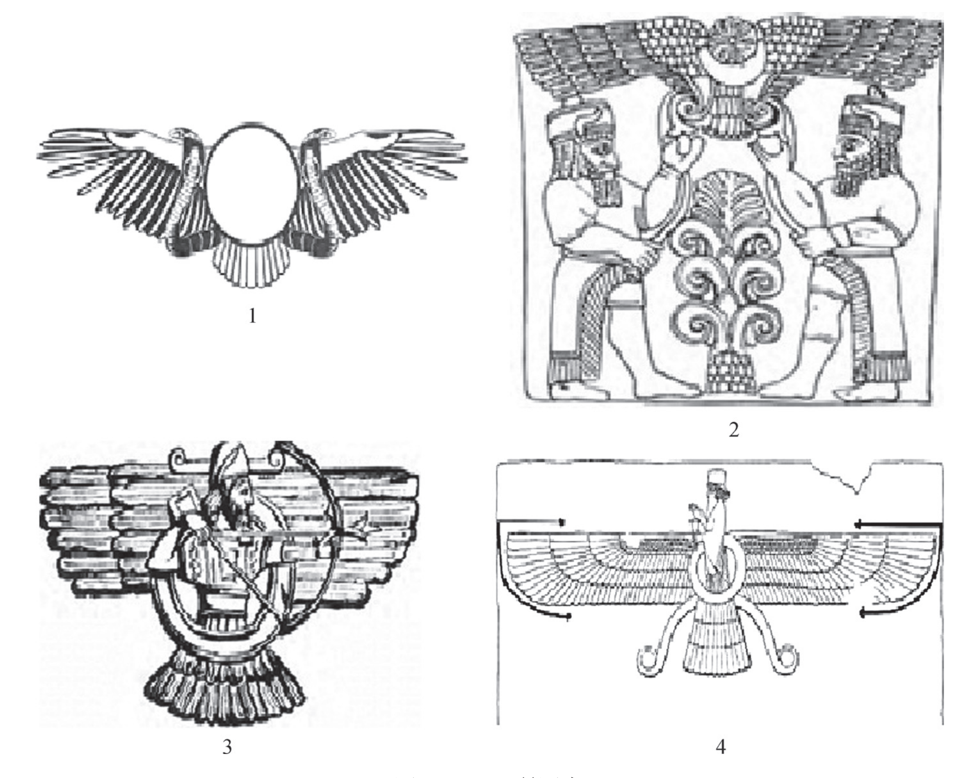
1. 旬邑邠王墓　2. 定边郝滩墓　3. 荥阳苌村壁画墓　4. 和林格尔壁画墓　5. 宿县褚兰画像石墓

臀、尾巴高扬下垂（图九，2）。河南荥阳苌村东汉晚期壁画墓[38]，前室侧壁绘有单骑车马出行图（图九，3）。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壁画墓[39]，单骑车马出行图，骏马奔腾飘逸，身体呈“S”形（图九，4）与当时的有翼狮形石兽造型最为神似。安徽宿县褚兰镇东汉晚期画像石墓[40]，画像石中的双骑车马出行图，身体呈“S”形、颔首张口、挺胸、曲腰、翘臀（图九，5）。

通过对东汉壁画墓、画像石墓葬中的车马出行图的分析，我们能得出此时墓葬中马的艺术造型为，颔首张口、挺胸、曲腰、翘臀、尾巴上扬下垂，头部在整个身体的比例中较小，作行走状或跳跃状，与有翼狮形石兽的造型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均作行走状，身体呈“S”形，颔首张口、挺胸、曲腰、翘臀、尾巴下垂。我们不妨大胆的推测有翼狮形石兽的艺术造型是借鉴或继承了墓葬中车马出行——马的艺术造型，把对马的描绘和刻画应用到有翼狮形石兽石像的雕刻中。

2. 双翼的艺术造型

东汉时期的有翼狮形石兽，背树双翼，且翼有单层和双重之别，翼间有三、四、五翎之分。双翼造型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元素，而是西亚、中亚的文化因子。这种造型是西亚、中亚传统文化里较为常见的，最早的可追溯至埃及的双翼日盘[41]（图一〇，1），经过赫悌、米坦尼、腓尼基、亚述等文明的继承和传播，最终在波斯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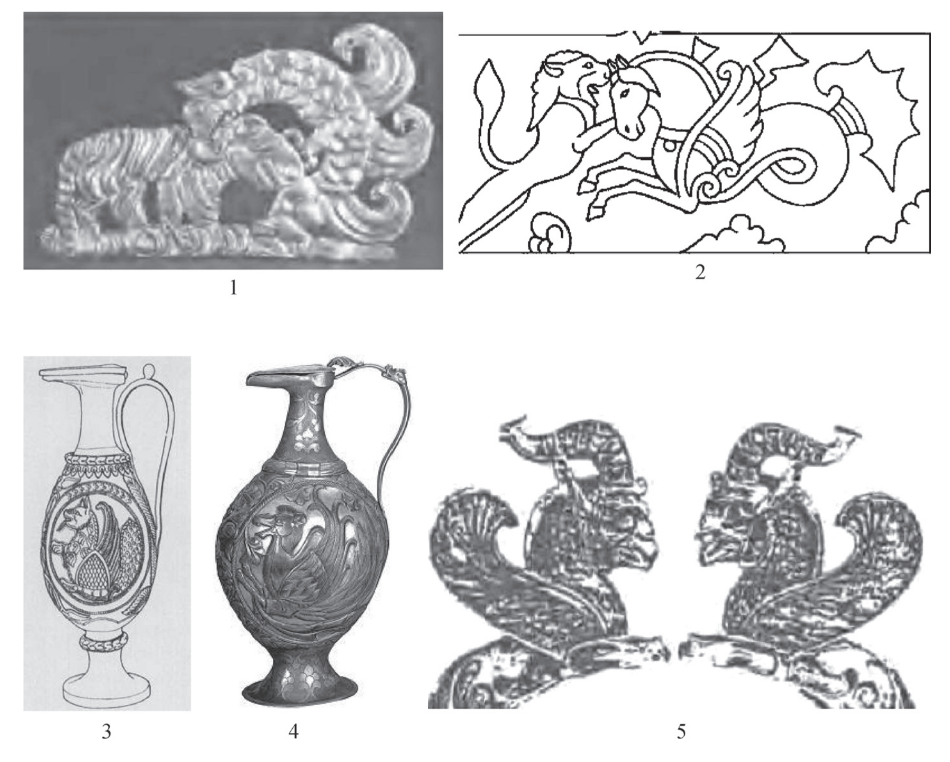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双翼图案

1. 埃及双翼日盘　2. 赫悌双翼日盘　3. 亚述神沙玛什　4. 波斯波利斯宫殿神阿胡拉·马兹达

中大放异彩，并伴随着琐罗亚斯德教（火袄教）而向四方传播开来，传播的载体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

新赫悌王国时期，在萨克吉葛兹发现的公元前9～前8世纪的宫殿图像[42]，两人站在双翼日盘之下（图一〇，2）。亚述帝国时期圆筒印章纹样就有人形双翼[43]，人形为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的象征（图一〇，3）。波斯帝国时期，宫殿墙壁上的阿胡拉·马兹达的形象为人形双翼（图一〇，4）。双翼作为神祇人员的象征功能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些神祇人员均为主神。从埃及到波斯再到后来的粟特、萨珊这些神祇人员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符号崇拜走向偶像崇拜。神祇人员双翼一般为二至四重，在琐罗亚斯德教中阿胡拉·马兹达双翼有三重，代表着善思、善言、善行[44]。

在欧亚草原各地的艺术中也有很多有翼神兽，且艺术主体起源也很早，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起源于埃及、希腊的斯芬克斯，两河流域的格里芬，希腊的飞马，此外亚述、波斯的拉马苏、森穆夫[45]。有人认为在草原地带有翼的动物、头部有菌形肉瘤的动物及独角的动物都是有一定的神性[46]。广布在欧亚各地的有翼神兽是作为一种带有神性的艺术主体所出现的，双翼的造型比较的写实且在翼尖部位有大幅度的卷曲，大部分为单层翼（图一一）。



图一一　欧亚有翼神兽的造型

1. 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格里芬　2. 虞弘墓石椁上的飞马　3. 萨珊银壶上的森穆夫

4.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粟特银壶有翼骆驼　5. 阿姆河宝藏中的格里芬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有翼狮形石兽的双翼艺术造型应是借鉴了西亚、中亚神祇人员的双翼造型非神兽的双翼艺术造型，在并没有完全理解单层或多重双翼所蕴含的意义的情况下，对其双翼的艺术造型只是进行简单的复制模仿。

四、结 语

两汉时期，大批的中原汉人迁居到西域（今新疆一带），特别是随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河西四郡的设置以及李广利两征伐大宛，往来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汉朝使者不绝于道。汉朝使者、流亡的士卒、屯田及戍守各地烽燧亭障的戍卒以及自由流入西域的中原汉民及平民、商人手工业者，构成了两汉时期移居西域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47]，这些人客观上成为了文化传播上的使者。中原汉地东汉时期的有翼狮形石兽艺术造型，是在受到来自西域狮形兽的影响下，按照中原汉人的理解，借鉴或继承了东汉墓葬中对马的描绘和刻画并应用到“S”形狮形石兽的雕刻上，同时还借鉴了欧亚草原上神祇人员的双翼造型，当然一些细节未必十分准确的按照当地的样式来制作，再加上工匠创作时理解上的不同，雕刻时各地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最终形成了气魄深沉雄大的汉代石雕艺术。至此来自西域的狮形兽彻底的完成中原汉化，并成为了符合中原汉地人民审美标准的瑞兽，这与当时的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的蓬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注 释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7）［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2] 咸阳市博物馆. 近年来咸阳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J］. 考古，1973（3）.

[3] 李零. 入山与出塞［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4] 樊文龙.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秦汉雕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苏健. 洛阳新获石辟邪的造型艺术与汉代石辟邪的分期［J］. 中原文物，1995（2）.

[6] 张松利，张金凤. 许昌汉代大型石雕天禄、辟邪及特点——兼论天禄、辟邪的命名与起源［J］. 中原文物，2007（4）.

[7] 同［6］.

[8] 同［4］.

[9] 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 淮阳县博物馆. 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1（4）.

[10] 同［4］.

[11] 同［4］.

[12] 秦臻. 四川渠县新发现汉晋石兽及相关问题［J］. 四川文物，2013（2）.

[13] 巨建强. 河北内丘出土北朝石兽［J］. 文物，2005（7）.

[14] 王鲁豫. 河北内丘石雕神兽考察小记［J］. 美术研究，1987（4）.

［15］ a. 卜琳，白海峰，田旭东，梁文婷. 张骞墓考古记述［J］. 考古与文物，2013（2）.
b. 林梅村先生曾指出张骞墓前的有翼狮形石兽是东汉时期补刻.
［16］ 武利华. 汉代陵墓神道石雕［A］. 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7］ 王思礼. 山东泗水县鲍王村发现汉晋石兽［J］. 考古通讯，1958（8）.
［18］ 孔次青. 山东曲阜孔林发现汉代石兽［J］.考 古，1964（4）.
［19］ 同［16］.
［20］ 贾璞. 东汉狮形石兽初论［J］. 四川文物，2012（5）.
［21］ 李彦. 两河之间：美索不达米亚揭秘［M］.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
［22］ 罗世平，齐东方. 波斯和伊斯兰美术［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 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J］. 文物，2001（1）.
［24］ 齐东方. 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J］. 文物，2006（8）.
［25］ 〔美〕A.T.奥姆斯特德著. 李铁匠，顾国梅译. 波斯帝国史［M］. 上海：三联书店，2010.
［26］ 黄心川.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27］ 林梅村. 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J］. 西域研究，1996（4）.
［28］ A．H.贝尔什塔姆. 谢米列契和天山历史文化的基本阶段［J］. 苏联考古学，1949（11）.（陈世良译. 新疆文物. 1992年译文专刊）
［29］ 王炳华. 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1（1）.
［30］ 穆舜英. 王明哲. 新疆古代民族文物［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1］ 林梅村. 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32］ 余太山. 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3］ 同［3］.
［34］ 同［31］.
［35］ 阎文儒. 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J］. 考古与文物，1986（3）.
［36］ 尹申平. 陕西旬邑发现东汉壁画墓［J］. 考古与文物，2002（3）.
［37］ 国家文物局主编. 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中英文本［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38］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管理研究所. 河南荥阳汉代壁画墓调查［J］. 文物，1996（3）.
［39］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40］ 王步毅. 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J］. 考古学，1993（4）.
［41］ 孙武军. 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源流辨析［J］. 西域研究，2015（2）.
［42］ 〔美〕富兰克弗特著. 郝海迪，袁指挥译.古代东方的艺术与建筑［M］. 上海：三联书店，2011.
［43］ Hannah M.G. Shapero, Faravahar: winged symbol of Zoroastianism, 1995, 1996. http://www.accessnewage. com/articles/mystic/fravah2. htm.
［44］ 同［43］.

［45］ 同［3］.

［46］ 陈凌. 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7］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迁徙［A］. “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Stone animals in the shape of lion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Dong Han dynasty

Liu Hanxing

Abstract: In Dong Han Dynasty, stone animals appeared on the paths of the cemeteries. The stone animals in the shape of a winged lion especially draw our attention. They have S-shaped body, slender shape, head rising and chest lifting, bowing, hot-ass, vertical tail, sticking a long tongue out, beard hanging, winged across his back, marching, strong limbs,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turdy and simple style. The paper tries to prove the eastward process of the stone animals in the shape of a winged lion through their distribution and bodily form features in the provinces of Henan, Sichuan, Hebei, Shanxi, Shandong and Jiangsu. Two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as follow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artistic style of these stone animals in the shape of a winged lion. Firstly, the S-shaped artistic style inherited or borrowed from the mural tomb of Dong Han and the artistic mode of the horses of “The Carriages and Hoarsening on a Journey” of Stone Statue of the Sculptured Stone Tomb. The artist applied this artistic forms to the carvings of these stone animals in the shape of a winged lion. Secondly, the artistic forms of the wings borrowed from the artistic images of West Asia and Central Asia’s gods. The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rtistic figure of the winged animals. Now,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tone animals in the shape of a winged lion which cam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have finished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in the later of Dong Han period, and the become in line with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of Han Dynasty.

Key words: Winged lion gargoyle-shaped; S-Art; Wings; gods staff

试论北魏六镇地望

松下宪一

（爱知学院大学，日本爱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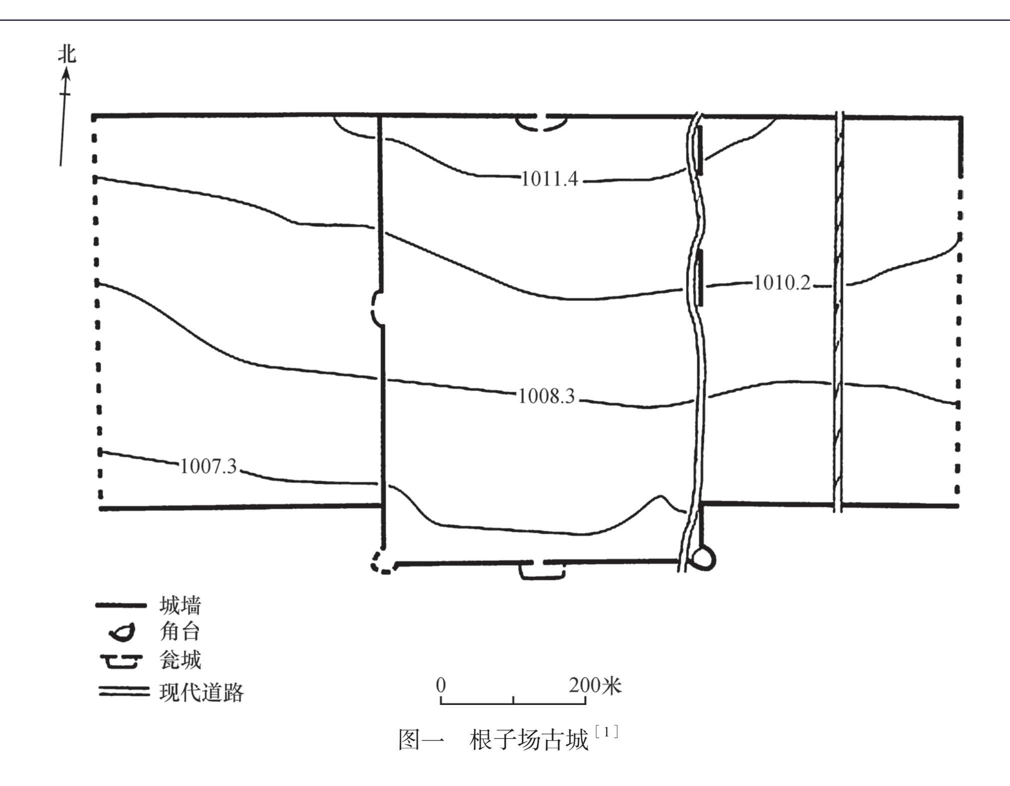
北魏六镇是第三代太武帝征服高车，列置高车降人于阴山一带，为防守柔然侵入和统治高车人，在西起内蒙古五原，东到今张家口边界上设置的六大军镇。六镇的地名和范围，诸说纷纭，近代学者大概认识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近几年来，在内蒙古各地发现了十个的北魏六镇相关遗迹，可是，除怀朔镇以外，其余六镇究竟在哪里？学术界没有一致的观点。例如，关于武川镇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武川县大青山乡土城梁遗迹，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武川县二份子遗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达茂旗希拉穆仁圐圙古城。

因此，本文以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互相参照，特别着重于遗迹规模和遗迹间的距离，就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的地望进行了考察，以求正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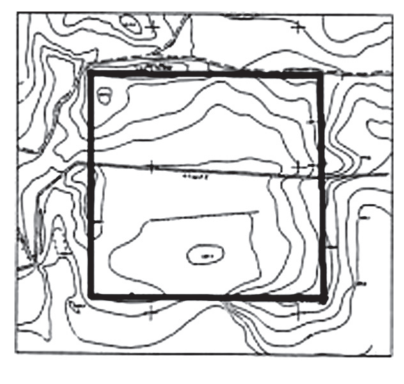
一、北魏六镇相关遗址（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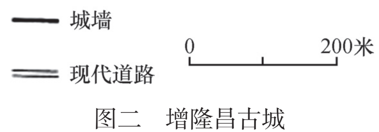
表一　北魏六镇遗址

遗迹名	规模	地名考定
1．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图一）	东西1500米×南北500米	沃野镇
2．乌拉特前旗增隆昌古城（图二）	东西240米×南北315米	光禄城
3．固阳县白灵淖城圐圙古城（图三）	东西1300米×南北1100米	怀朔镇
4．武川县二份子古城（图四）	东西690米×南北744米	武川镇
5．达茂旗希拉穆仁圐圙古城（图五）	东西452米×南北426米	武川镇
6．武川县大青山乡土城梁古城	南城：东西102米×南北110米 北城：东西300米×南北400米	武川镇
7．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图六）	东城：东西900米×南北890米 西城：东西1170米×南北1086米	抚冥镇
8．四子王旗库伦图古城（图七）	东西420米×南北455米	军事城堡
9．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图八）	东西1520米×南北700米	柔玄镇牛川城
10．河北省尚义县三工地镇古城（图九）	东西1100米×南北1003米	柔玄镇



图一　根子场古城[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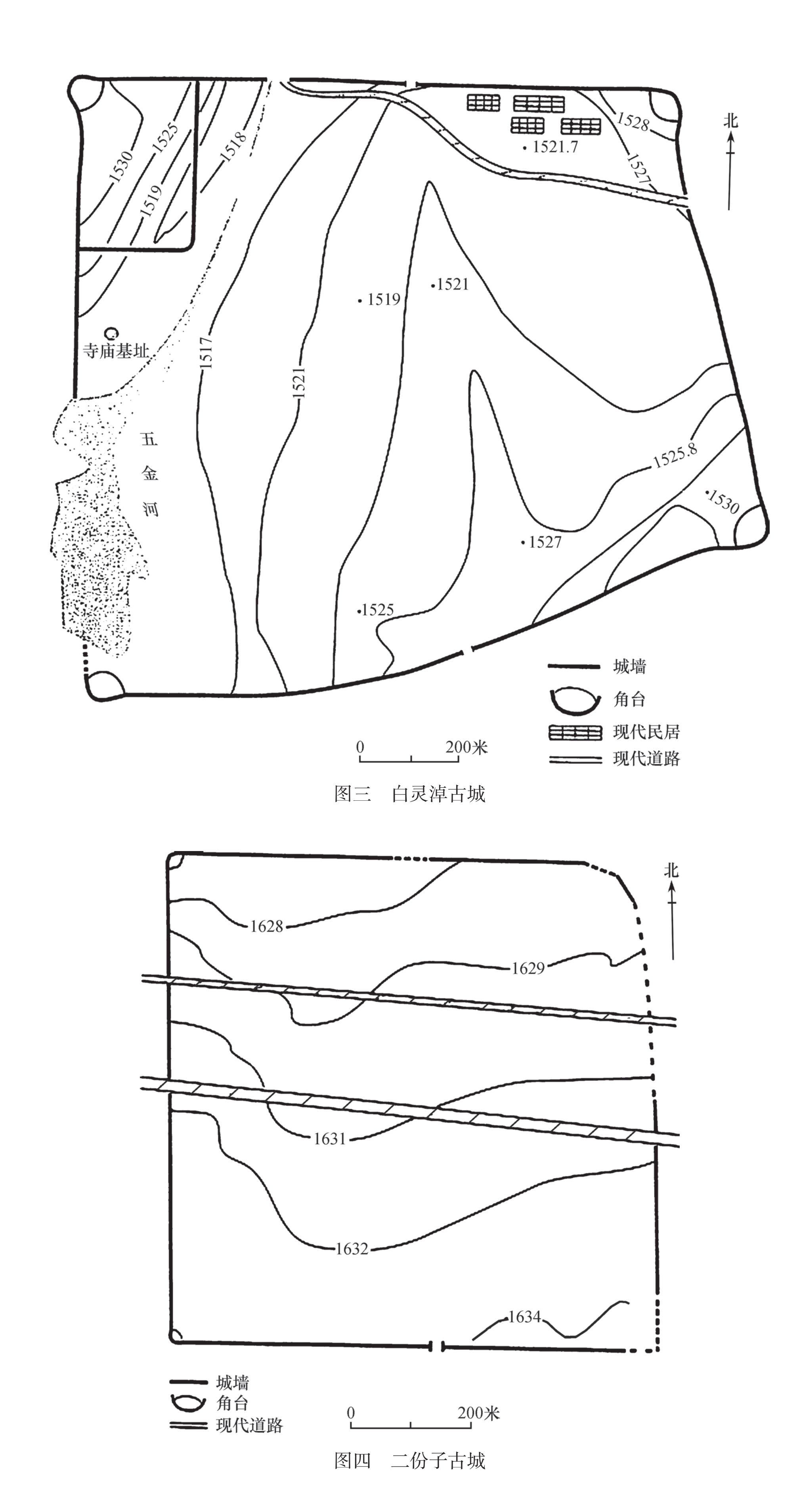


图二　增隆昌古城

武川县二份子古城，坐落于南、西、北三面环山的山谷地带，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角略内折，东西690米，南北744米。夯筑城墙，基宽8米，残高0.5～2米，夯层厚11～15厘米。东墙中部开门。除西墙外、北城有1个马面，南墙和东墙各有2个马面。现存三个城角均有角楼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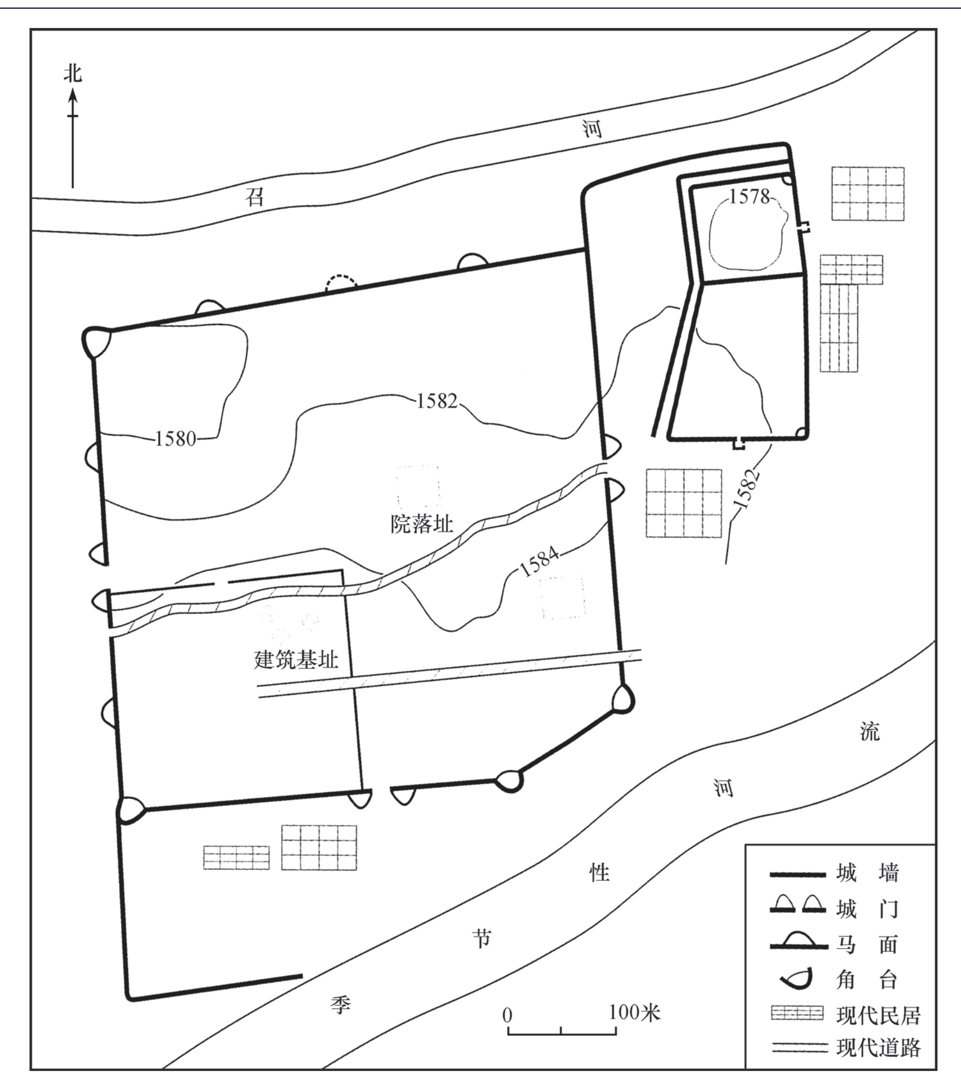
达茂旗希拉穆仁圐圙古城坐落在召河和哈拉乌素干河交汇的河洲地带，地势开阔。大城和小城组成，大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452米，南北426米。夯筑城墙，基宽约10米，残高1～2米，城四角有角楼址，墙上有马面。城内3处建筑基址。小城平面呈“日”字形，东西89米，南北238米，城墙基宽约6米，残高1.5米，四角有角楼址。

武川县大青山乡土城梁古城位于大青山北麓一处较为广阔平坦的山梁上。城址分南、北两城。南城较小，平面呈方形，南北110米，东西102米，城墙残高0.2～0.4米，夯层不清楚。城墙有角楼址、马面等设备。城内偏北处有大型建筑基础，城内发现了“富贵万岁”的瓦当，是典型的五世纪后期北魏遗物。北城规模大于南城，北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300米，南北400米，城墙多半损失了。城内东部有一夯土台基，周围散布



图三　白灵淖古城

图四　二份子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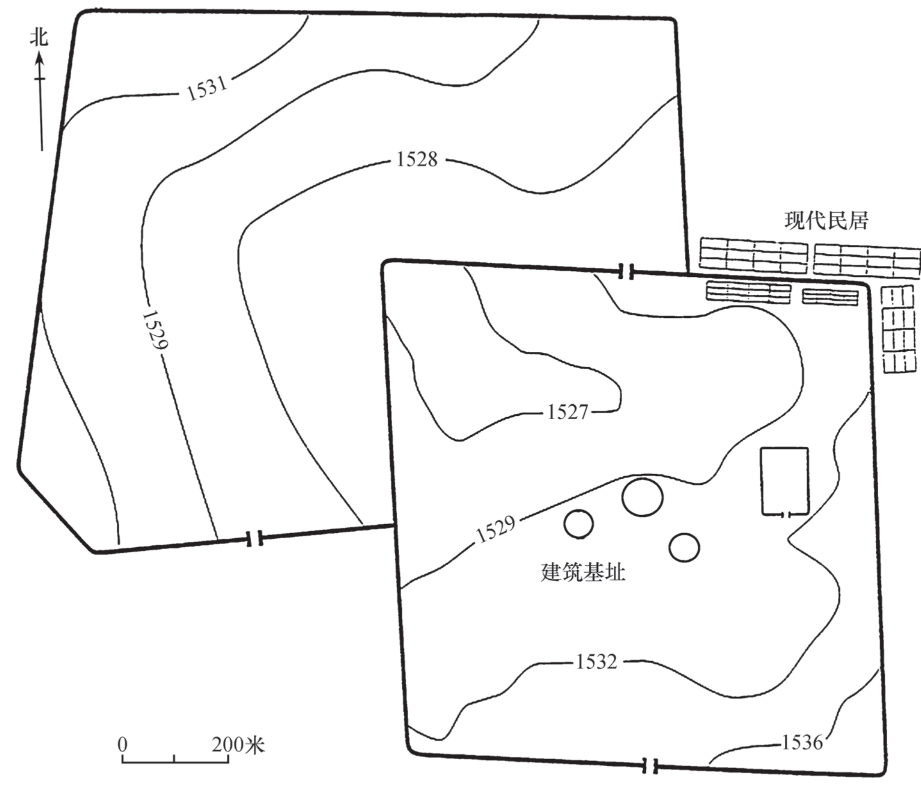


图五　希拉穆仁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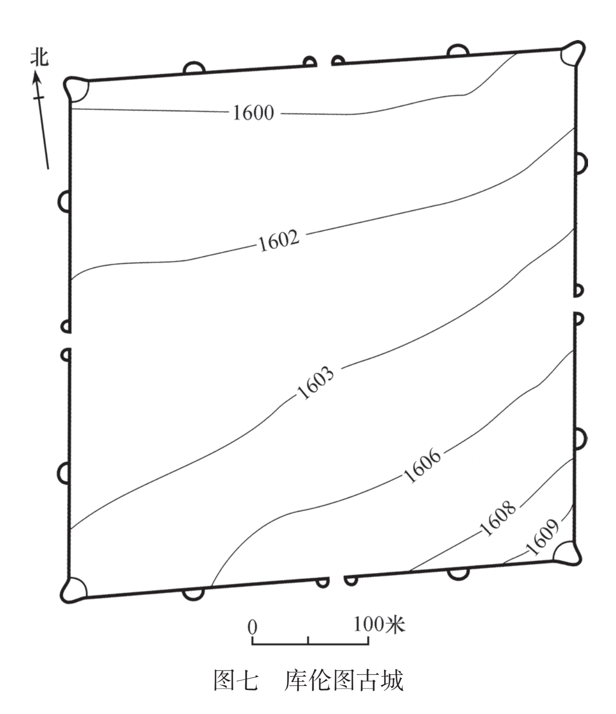
大量残瓦片，亦发现“富贵万岁”瓦当片。

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地处大青山北麓的丘陵地带。古城由并列的东西二城，西城连接在东城的西北端。东城为主城，城址呈平面近正方形，东西900米，南北890米。城墙夯筑，基宽约10米，残高1～3米，夯层厚约10厘米，城墙外附马面，四角有角楼址，城西北有建筑基台，散布砖瓦碎片。西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1170米，南北1086米。城墙呈土垄状，城墙底宽3～5米，残高0.3～0.6米[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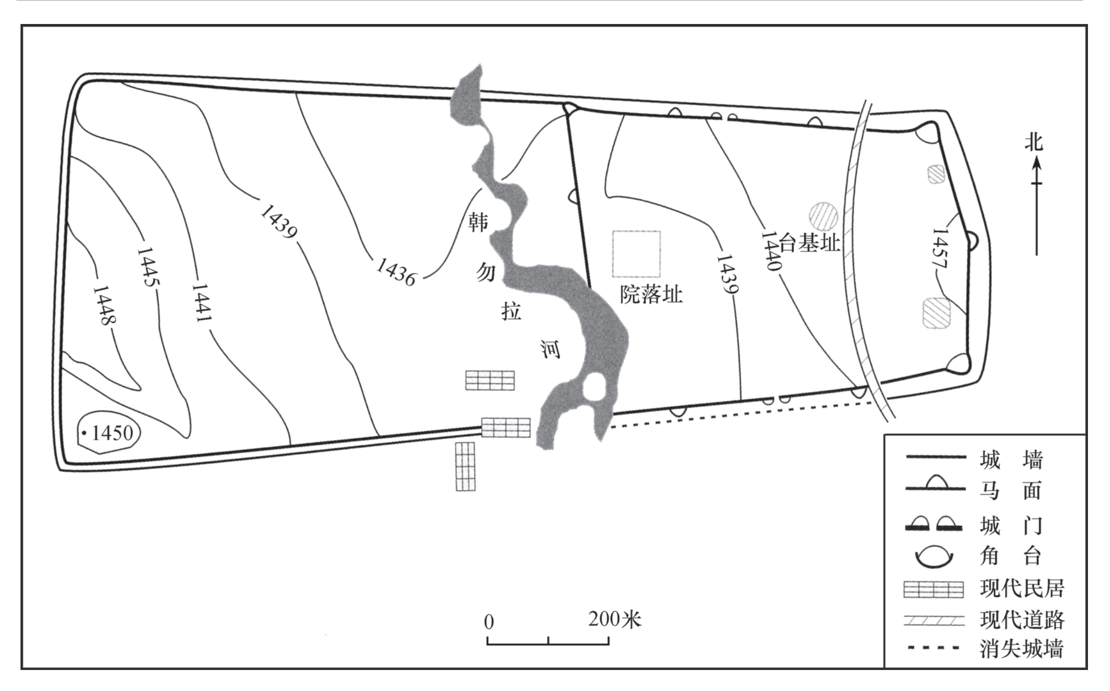
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坐落于韩勿拉山脉西缘中段，哈卜泉川穿城而过。城址平面呈梯形，东西1520米，南北700米，夯筑城墙，基宽8～9米，残高0.5～2米，夯层12～18厘米。城址中部筑有南北向隔墙，将城分东西两城，城址四角有角楼址，正对城内隔墙的北墙有1座马面，东城内遗迹，遗物较多，有圆形土台，围墙，院落建筑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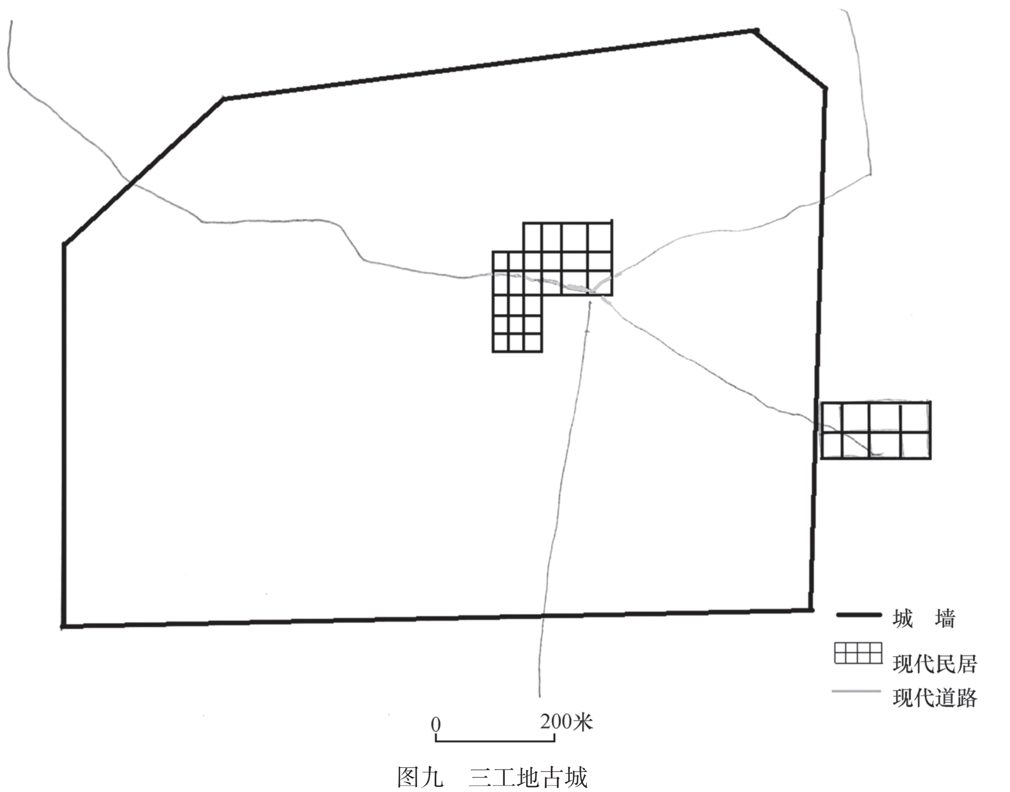
图六　乌兰花古城



图七　库伦图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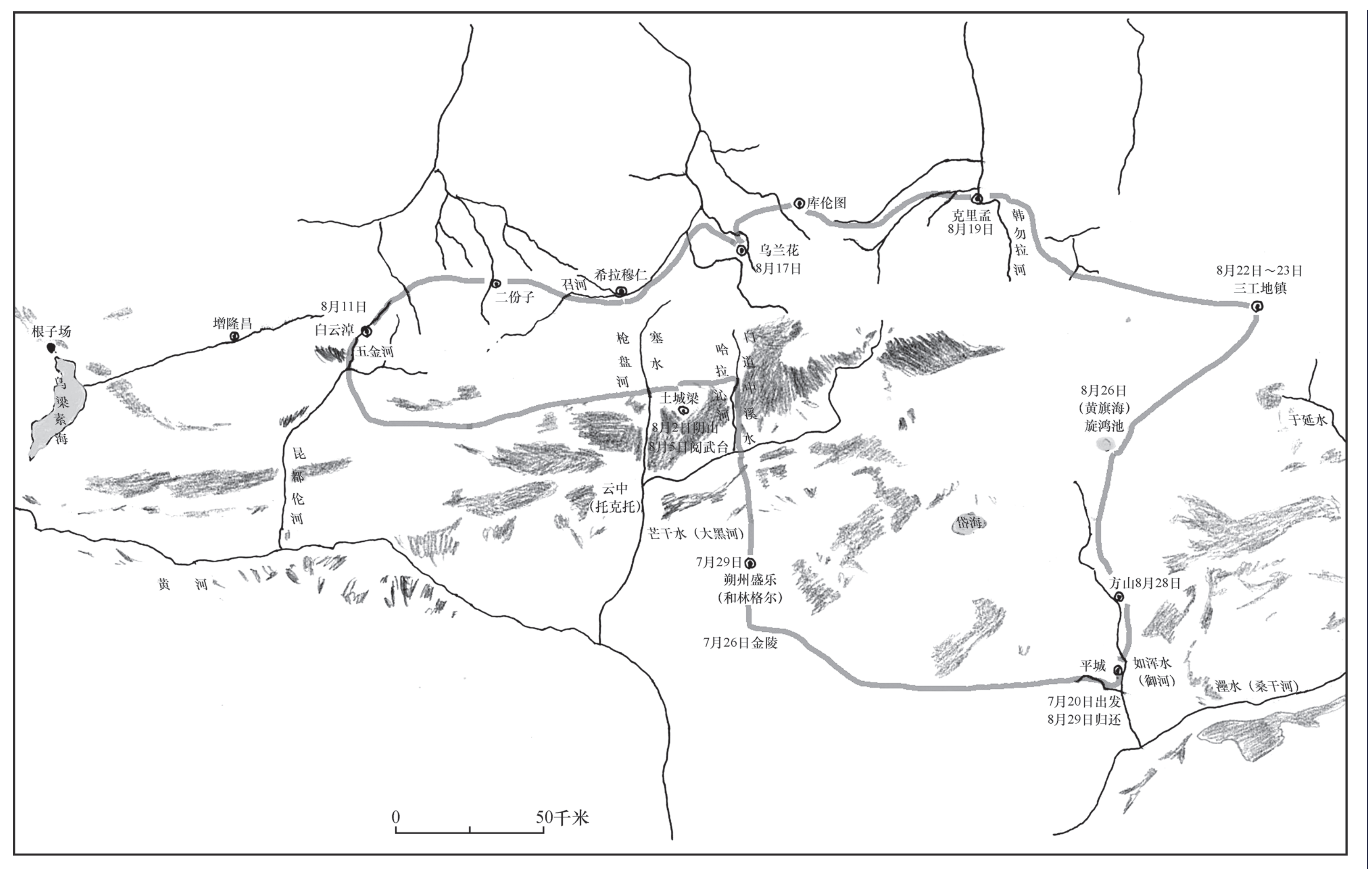


图八　克里孟古城



图九　三工地古城

（Google Earth Image 2015 CNES / Astrium）



根子场
乌梁素海
增隆昌
8月11日
白云淖
五金河
昆都伦河
黄河
二份子
召河
希拉穆仁
枪盘河
塞水
哈拉沁河
白道中溪水
土城梁
8月2日阴山
8月5日阅武台
云中
（托克托）
芒干水（大黑河）
7月29日
朔州盛乐
（和林格尔）
7月26日金陵
乌兰花
8月17日
库伦图
克里孟
8月19日
韩勿拉河
8月22日～23日
三工地镇
8月26日
（黄旗海）
旋鸿池
岱海
于延水
方山8月28日
平城
7月20日出发
8月29日归还
如浑水
（御河）
㶟水（桑干河）
0
50千米

图一〇　北魏六镇遗迹图

等遗迹。

遗址规模来看，考定六镇遗址大概有一边1000米程度的城墙。例如，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有东西1500米的城墙，固阳县白灵淖城圐圙古城有东西1300米和南北1100米的城墙，河北省尚义县三工地镇土城子古城有东西1100米和南北1003米的城墙。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有一边900米的城墙。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也有一边1520米的城墙，值得注意的是，认定武川镇的遗迹中没有保有一边1000米程度的城墙遗迹。

另外，乌拉特前旗增隆昌古城和四子王旗库伦图古城有一边500米以下的城墙，这些遗迹被认为是北魏时期的军事城堡遗迹。达茂旗希拉穆仁圐圙古城的城墙是一边500米以下，所以这个遗址是不是北魏时期的军事城堡遗迹。

或学者说[3]，土城梁古城规模较小，应是与二份子古城、库伦图古城同样为北魏边防军事城堡。李逸友先生说[4]，土城梁古城以其所在纬度偏南，与固阳县、四子王旗等地的北魏镇戍遗址不在同一纬度线上，且城墙规模均较这些北魏镇戍小，还见有“富贵万岁”文字瓦当以及莲瓣纹石柱等，于是认定土城梁古城为北魏的行宫。

二、历史文献

关于六镇位置的历史文献不多，其中《水经注》和《魏书》中有重要的记载。郦道元随从孝文帝的巡幸，所以《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细，而且其记述具有可靠性。

《水经注》卷三，河水条[5]：

> 芒干水又西南，径云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发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径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矣。其水西南流，历谷，径魏帝行宫东，世谓之阿计头殿。宫城在白道岑北阜上，其城圆角而不方，四门列观，城内惟台殿而已。其水又西南历中溪，出山西南流，于云中城北，南注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塞水出怀朔镇东北芒中，南流径广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郎高聪之辞也。自台西出南上山，山无树木，惟童阜耳，即广德殿所在也。

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述武川镇城在白道中溪水旁边，此城为景明年间（500～503年）所建。由此可见，武川镇以景明年间为界，分为早期和晚期两坐城址。晚期武川镇城在白道中溪水旁边。白道中溪水在哪里？据《水经注》的记载，通过阴山注入芒干水的河川有白道中溪水和塞水。现在通过阴山注入芒干水（今大黑水）的河川是哈拉沁河和枪盘河。所以，笔者认为白道中溪水是哈拉沁河，塞水是枪盘河。晚期武川镇城在哈拉沁川上流部。

又据《水经注》的记载，阿计头殿在白道中溪水西侧，其城平面呈圆形。呼和浩特市北郊的坝顶遗址平面呈圆形，这与哈拉沁河的方位一致。所以笔者认为是《水经

注》所记之魏帝行宫阿计头殿。广德殿在塞水东侧，土城梁古城在枪盘河东侧。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六月，太武帝在阴山北建设广德殿。除土城梁古城外，六镇相关遗迹没有发现“富贵万岁”瓦当，这个遗迹不是军事城堡，笔者认为是北魏广德殿。

那么，早期武川镇城在哪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天德军[6]：

> 沃野古城，在军城北六十里，即是后魏时六镇从西第一镇也。武川城，今名里城，后魏六镇从西第三镇，在军北三百里。自北出石门障即光禄城，右入匈奴大路。光禄城东北有怀朔古城，其城即后魏六镇从西第二镇，在今中城界向北化栅侧近也。

据严耕望[7]，天德军在乌梁素海东北岸水滨，沃野镇在天德军城北六十里（33千米），武川镇在天德军北三百里（168千米）。依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除方位外，武川镇在从天德军约170千米的地点，相当了武川县二份子古城。

另一方面，《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八年（494年）条[8]；

> （秋七月）壬辰（20日），车驾北巡。戊戌（26日），谒金陵。辛丑（29日），幸朔州。……（八月）甲辰（2日），行幸阴山，观云川。丁未（5日），幸阅武台，临观讲武。癸丑（11日），幸怀朔镇。己未（17日），幸武川镇。辛酉（19日），幸抚冥镇。甲子（22日），幸柔玄镇。乙丑（23日），南还。……戊辰（26日），车驾次旋鸿池。庚午（28日），谒永固陵。辛未（29日），还平城宫。

这个史料提供了孝文帝巡幸六镇的时间表如下：11日，到怀朔镇，17日，到武川镇，19日，到抚冥镇，22日，到柔玄镇，23日，出发，26日，到旋鸿池，28日，到永固陵，29日，还平城。其中由怀朔镇到武川镇共用了7天时间，当然这不全是行程的时间，在7天中含所用件，但是，除阅武台临观讲武以外，没有工作内容的记载，所以没有特别工作。巡幸六镇行程中的所需日数反映了六镇间的距离。再次分析行程表，由怀朔镇到武川镇共用了7天时间，由武川镇到抚冥镇共用了3天时间，由抚冥镇到柔玄镇共用了4天时间。据行程表，由怀朔镇到武川镇的距离最长，由抚冥镇到柔玄镇的距离较短，由武川镇到抚冥镇的距离最短。如果二份子是武川镇的话，与日程表不符合。七月丁未（5日），孝文帝幸阅武台，癸丑（11日），到怀朔镇。由阅武台到怀朔镇共用了7天时间。阅武台在广德殿北侧，广德殿相当土城梁古城。由土城梁古城到怀朔镇需要7天时间。其中间距离约160千米。依此计算，1天行程约有22千米。如果需要1天准备，全行程减少1天，1天行程约26千米。因此，由怀朔镇到武川镇之距离，推断大约有160千米。由武川镇到抚冥镇之距离，推断约有60千米。由抚冥镇到柔玄镇之距离，推断约有80千米。

三、考定六镇地名

魏隽如和张智海先生[9]以历史文献及实地考察资料考述柔玄镇的地望，认为北魏柔玄镇的地望在河北省尚义县三工地镇土城子村。笔者赞成这个见解。现存历史典籍中关于柔玄镇地望的记载，只有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细。《水经注》卷一三，㶟水条[10]：“㶟水又东，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㶟水即今桑干河，于延水（脩水）为㶟水（今桑干河）的支流，于延水源头的位置在兴和县东北13千米的山上。兴和县北西北15千米在长川城址[11]，一致《水经注》的记载。柔玄镇在长川城的东面，因此，克里盂不是柔玄镇城址。

关于克里盂遗址，李逸友先生[12]认为是牛川城。牛川城是道武帝即位代王之地点，明元帝、太武帝巡幸牛川，但是，在《魏书》中，太武帝以后没有巡幸的记载。太武帝时期牛川城变更六镇之一。克里盂古城遗迹情况来看，这个遗址是不是六镇遗迹之一。柔玄镇是尚义县三工地镇，因此，克里盂不是柔玄镇。据孝文帝巡幸行程，克里盂应当为抚冥镇。

关于武川镇，据《水经注》的记载，武川镇以景明年间为界，分为早期和晚期两座城址。另一方面，据发掘调查，乌兰花古城也成为东西两城。由孝文帝巡幸行程和遗迹规模来看，早晚武川镇城相当乌兰花遗址的东西二城。据《水经注》记载，武川镇城以景明中扩建，乌兰花古城的东城是原来的武川镇城，北魏宣武帝的时期构筑西城。希拉穆仁遗址和二份子遗址规模较小，所以笔者认为希拉穆仁遗址和二份子遗址是北魏城堡遗址。

注　　释

［1］　图一、图三～图八摘自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图二摘自张海斌，杨惦恩. 固阳秦长城.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2］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3］　塔拉主编. 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M］.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198.

［4］　李逸友. 中国北方长城考述［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38.

［5］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2，53.

［6］　（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15.

［7］　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216，卷一，篇六.

［8］　（北魏）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74，175.

［9］ 魏隽如，张智海. 北魏柔玄镇地望考述［J］. 北方文物，2009（1）.
［10］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67.
［11］ 常谦. 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1）.
［12］ 李逸友. 中国北方长城考述［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39.

Discuss On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The Six Towns”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Matsushita Kenichi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tes in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which belong to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Six Towns” through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ombing with the current research about its geographical situation, we deem that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Wuchuan Town is the Wulanhuatuchengzi Ancient City in Siziwang Banner, Fuming Town is the Kelimeng Ancient City and Rouxuan Town is the Tuchengzi Ancient City in Sangongdi Town, Shangyi County, Hebei Province.

Key words: sites of the six towns; historical documents; scale of relics; distance between relics

辽代金银器中的西域胡文化因素

王春燕　冯恩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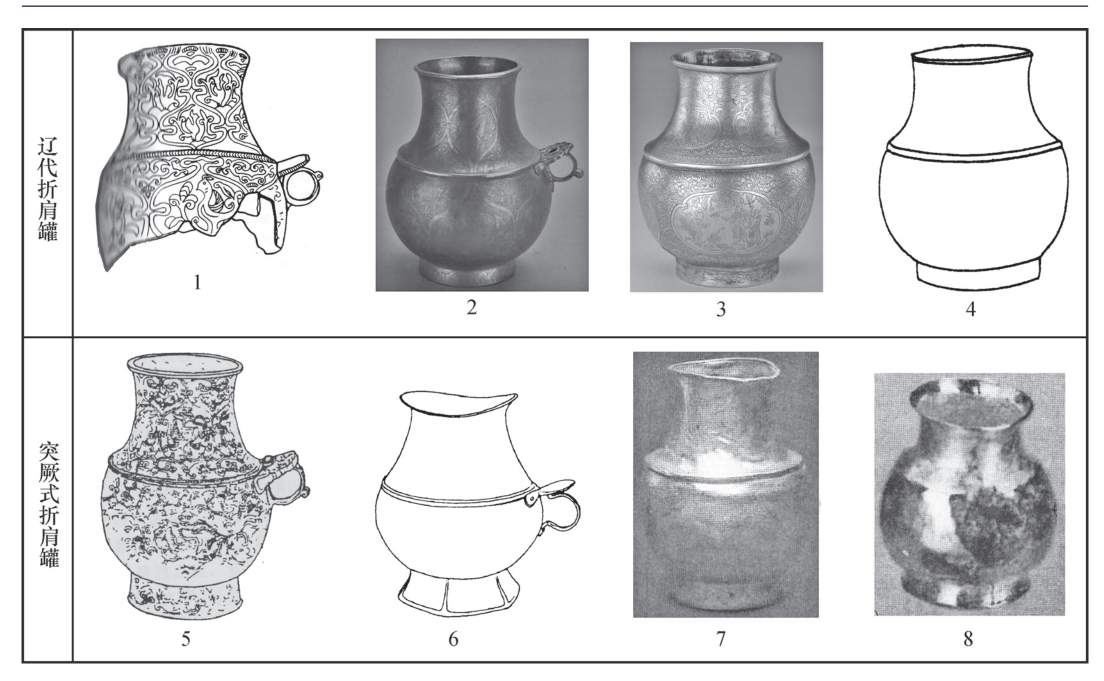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辽代金银器中的西域胡文化因素主要有突厥文化因素、粟特文化因素和无法确定族属的其他西域胡文化因素。

一、突厥文化因素

突厥文化因素对辽代金银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折肩罐、蹀躞带和马具上。

辽墓出土的折肩罐可分为二型，即A型附錾耳和B型无錾耳。A型有吐尔基山金折肩罐（图一，2）和奈林稿木头营子M2鎏金银折肩罐（图一，1），B型有耶律羽之金折肩罐（图一，3）、二八地M1银折肩罐（图一，4）、解放营子银折肩罐和赤峰博物馆藏金花银折肩罐。A型与赤峰李家营子1号墓出土的金折肩罐（图一，6）的形制接近，指垫式的环状把手，肩部有折棱。李家营子金折肩罐，素面无纹饰，圈足外撇，其族属学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突厥银器[1]，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粟特带把杯[2]。笔者认为两种观点是对立统一的，因为"这种器形的陶器、金银器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以东属于昭武九姓国和突厥分布范围的广大区域出上很多，是粟特人和突厥人使用的典型器物，其流行时间自7世纪一直到11世纪"[3]，但是李家营子折肩罐与粟特壁画和典型的粟特饮器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折棱特征明显和素面无纹也是突厥铭文折肩罐的共同特征，更似突厥银器。科比内2号墓出土两件折肩金罐，位于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濒临叶尼塞河上游，其中一件錾耳折肩罐錾满纹饰，另一件无錾耳折肩罐有突厥文铭记。吐尔基山墓出土的金折肩罐与科比内2号墓出土的錾耳金折肩罐（图一，5）在器形、纹饰上几无差异，錾耳、圈足的细节处理都是一致的，二者的纹饰布局分别为莲瓣围成的开光内錾凤衔枝纹和"器身布满缠枝卷草，在颈部和腹部以枝蔓围绕成两排类似开光的莲瓣形，莲瓣内为凤衔绶带"[4]，几无差异。B型与科比内2号墓出土的另一件折肩罐（图一，7）器形相似，均为折棱无耳的形制，科比内2号墓出土者素面无纹，底部有突厥铭文，据研究者考证为突厥器物[5]。新材料是2001年发现的毗伽可汗宝藏中又出土了类似的无耳折肩罐（图一，8），出土的金冠、腰带、碑庙共同证实这批金银珠宝属于734年被毒死的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所有[6]。折肩罐俨然成为突厥的习见器物，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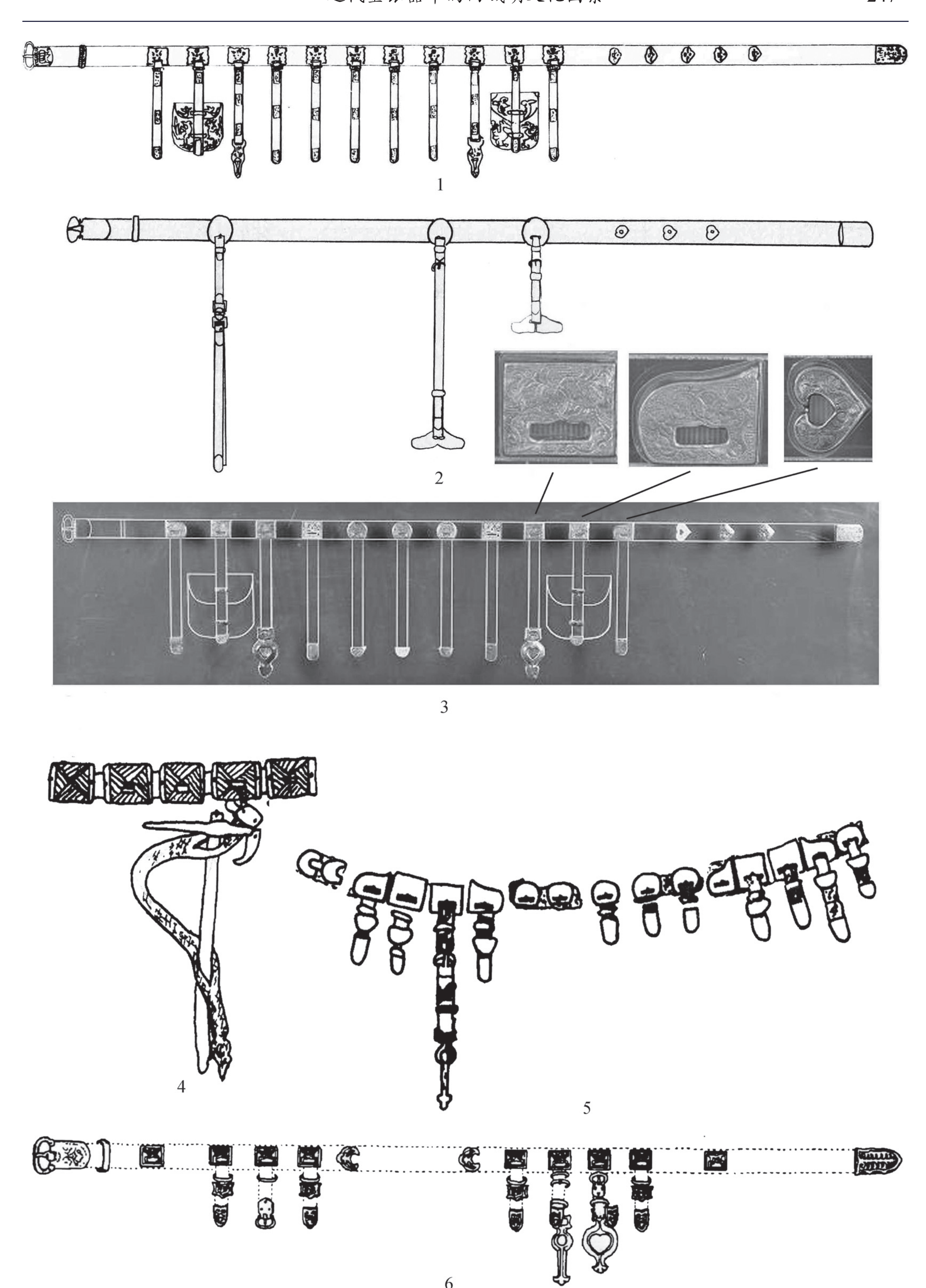


图一　辽代折肩罐与突厥式折肩罐[8]

1、2. 辽代A型折肩罐（奈林稿木头营子M2辽墓、吐尔基山辽墓）　3、4. B型折肩罐（耶律羽之辽墓、二八地M1辽墓）　5～8. 突厥折肩罐（科比内2号墓、赤峰李家营子1号墓、科比内2号墓、毗伽可汗宝藏）

机先生论证了辽代折肩罐来自突厥文化的影响，新材料再次佐证这一观点，解放营子辽代晚期墓葬也出土了银折肩罐的实物，说明B型罐的影响更为深远，已经影响到了辽代晚期。海力板辽墓、阜新辽墓、南皂力营子一号墓等辽墓出土的鋬耳折肩瓷罐[7]，也应该是受到金银器影响的结果。

蹀躞带的带具在辽墓中出土非常之丰富，方形銙、马蹄形銙、桃形銙是契丹墓中常见的带銙形制，比较完整的是陈国公主墓的两条银带（图二，1、2）和奈林稿木头营子M2的金带。阿尔泰吐埃特科塔4号突厥墓（图二，6）和奈林稿M2辽墓出土的蹀躞带（图二，3）比较，除方形带銙、马蹄形带銙等共有的带銙之外，还有两种特殊的带銙：一种是不规则形銙，由两条直线边组成直角，另外一边以曲弧线相连，见于奈林稿木头营子M2出土者，另外一种是四曲桃形，相对桃尖的顶部强烈凹陷，见于大横沟、张家屯辽墓出土者。已有学者从图瓦突厥墓和阿尔泰吐埃特科塔4号突厥墓蹀躞带上为“直角—流线形銙”和“空顶桃形带銙”找到源头[9]。桃形带銙为带上的常见配饰，为契丹蹀躞带和汉式腰带通用的零部件，相比“空顶桃形带銙”，六曲双边桃形更为常见。通过材料对比研究，笔者发现桃形銙的功能与其他带銙不同，虽然也铆于革鞓上，也有“古眼”但并不是用于穿系蹀躞小带，这从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出土的一件鎏金錾花银带扣上能得到启示，带扣的卡针上就穿着一件类似桃形銙的玉饰，而且观察陈国公主墓银鞓上的桃形銙（图二，1、2）确实位于与带扣相对的另一侧，以起到加固和装饰针



图二　契丹蹀躞带与突厥蹀躞带[14]

1～3. 契丹蹀躞带（陈国公主墓、陈国公主墓、奈林稿木头营子M2）　4～6. 突厥蹀躞带（阿尔泰尤斯坦特第Ⅻ地点26号墓、图瓦突厥墓出土、阿尔泰吐埃特科塔4号突厥墓）

孔的双重作用，图瓦突厥蹀躞带上的桃形銙（图二，5）也是同样的位置关系。葫芦形带具和豆荚形横栓为蹀躞小带末端的部件，葫芦形带具在辽墓中出土频率较高，在朝阳沟M2、奈林稿M1、陈国公主墓、长岗辽墓、五道沟辽墓、万金山辽墓、大横沟辽墓、水泉辽墓、大营子驸马墓均有出土。豆荚形横栓见于朝阳沟M2辽墓、陈国公主墓、巴扎拉嘎契丹墓出土者，然而过去不清楚具体的使用位置，直到陈国公主墓银蹀躞带（图二，2）的出土，才确定是古眼带銙下垂飘带上的系挂物。这在突厥墓中都能见到相似物，据研究是契丹带具从突厥带具中借鉴过来的部件[10]。

蹀躞带最早可追溯到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俄国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2号墓出土的银銙腰带，可视为躞蹀带的雏形[11]。尤斯坦特第Ⅻ地点26号墓出土的腰带之所衔小带上还穿挂着鹤嘴锄、弯角锥等工具（图二，4），该墓属于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的巴泽雷克文化[12]，可见，追求实用性是早期蹀躞带诞生的内在动力。突厥时期蹀躞带迅速发展起来，阿尔泰、图瓦等地的突厥墓中发现了数量庞大的蹀躞带（图二，5、6），以致成为各地突厥石人的腰间装饰。突厥腰带的特点是“古眼”带銙明显增多，下垂蹀躞已成常制，小带扣、带具更加完善，这些完全被契丹人所继承，而且蹀躞带确实很适合游牧人佩戴，驰骋马上悬挂弓箭、刀锥极为便利。突厥式蹀躞带虽也曾被借鉴到唐代官制，但终究因毫不适用城市定居生活而在唐开元以后逐渐停止使用，“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13]，至宋代演化为纯粹的装饰物。可见，契丹蹀躞带无论是带銙或带具的形制，还是与生俱来的实用性，都与突厥文化一脉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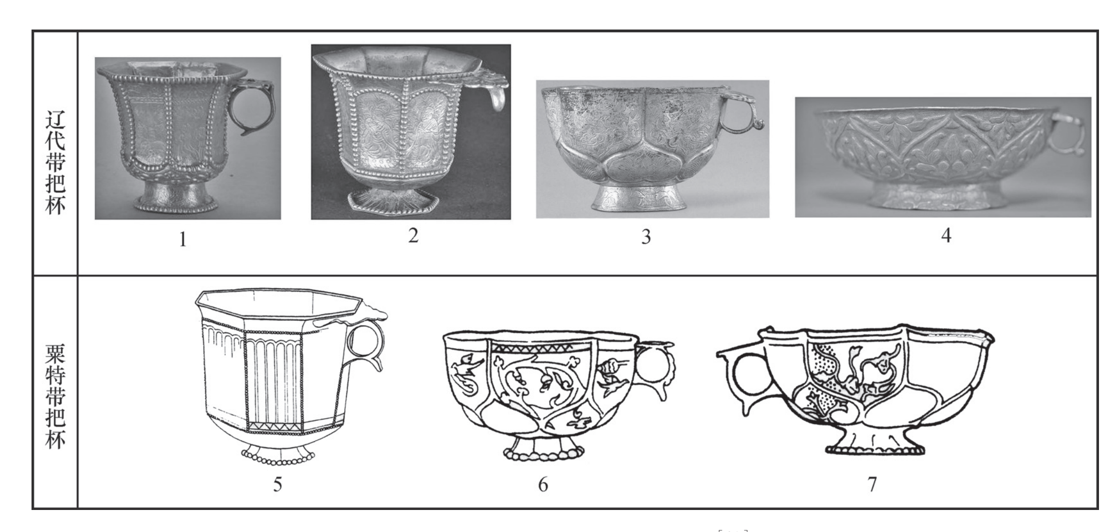
突厥马具中的某些零部件在契丹马具中颇为流行。一种是装饰在秋带交叉处的丁字形节约，见于二八地M1辽墓、巴扎拉嘎辽墓、奈林稿木头营子M2辽墓、耶律羽之墓、大营子驸马墓等诸多出土者；另一种零部件统称为异形杏叶（简报称为“风铃形铜杏叶”），见于二八地M1辽墓、奈林稿木头营子M2辽墓、大营子驸马墓出土者。丁字形节约曾在库赖第4地点3号突厥墓和9至10世纪前期的秋赫加塔窖藏均有出土，据研究束腰尖瓣型和平直方角型两种形制均为契丹节约所广泛继承[15]，但是在纹饰上融合了自己的装饰元素，除变形卷草纹有延续的痕迹外，鹿衔枝纹、飞凤纹、翼马纹、对雁纹等动物题材是辽代节约装饰之特色。辽墓出土的异形杏叶与科比6、7号突厥墓出土者在形制上比较相近，均为顶部环孔、下分三叶的造型，前者更为简约，略去了三叶的细部构造和纹饰特征，但在基本构图和功能上保持有传承关系。

自6世纪至8世纪中叶，突厥帝国曾作为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而契丹兴起于10世纪初，突厥与契丹的建国时间相隔四百余年，不是平行的交往或相隔很近的继承关系，但是辽代金银器受到了突厥文化的深刻影响。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突厥帝国强大，在蒙古草原上极盛一时，“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16]，版图曾东抵兴安岭，西达铁门关[17]。影响力和感召力很大。二是的契丹曾长期臣服于突厥，《旧唐书·契丹传》记载，契丹“本臣突厥”，除葬俗外，“其余风俗与突厥同”，在风俗上受到的影响可能比一般的民族交往更为迅速和深刻。三是有共同的草原生活环

境，有比较相似的生产生活需求，追求实用性的蹀躞带就是例证之一。新材料也证实了突厥文化对契丹人的影响。2011年新发现的内蒙古凉城水泉辽墓[18]，葬式为男女同墓异穴，出土了葫芦形铜带具、“直线–流角形”玛瑙带銙等特别的组件，具有浓郁的突厥文化色彩。这一考古现象的历史背景是突厥颉利可汗败亡后，唐于漠南设置定襄、云中都督府，下属六州，任用归附的突厥贵族为各州都督，大量突厥降户被以“不革其俗”的形式安置在漠南内蒙古，凉城地区自然会深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突厥人崛起于的阿尔泰山南麓，盛产黄金，且突厥人最初为柔然汗国的“锻奴”，擅长金属等锻铁工艺，吐鲁番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提到的“珂寒金师莫畔陁”指的是一位在吐鲁番施展工艺的突厥金匠[19]。这样突厥人坐拥的地利和在金属锻造方面的卓越天赋，势必会对蒙古草原上继突厥而兴的契丹人产生影响。

二、粟特文化因素

辽代的带把杯显然受到了粟特带把杯的影响，辽代典型的折棱带把杯和碗形带把杯都能在粟特杯中找到相似者。吐尔基山金把杯（图三，1），环柄板指形，器形为八棱造型，与粟特银杯的器形非常接近，但所饰纹饰不是粟特杯的常见题材，可能是辽代工匠对粟特器形的模仿制品。耶律羽之辽墓出土的金带把杯（图三，2），特殊之处在于七棱杯体和缺失的把，有异于粟特常见的八棱杯体和完整的环把。通过纹饰分析，杯体七面体内各錾一位高士，如果确为中国传统的竹林七贤题材，那么这种器形的局部改良是为了安排七位高士特意而为，无疑是契丹工匠对粟特器形的创新产品。扎斯台辽墓出土的两件碗形带把杯[20]，深腹（图三，3）和浅腹（图三，4）的杯形均能在粟特器



图三　辽代带把杯与粟特带把杯[21]

1～4. 辽代带把杯（吐尔基山辽墓、耶律羽之辽墓、扎斯台辽墓、扎斯台辽墓）　5～7.粟特带把杯

物（图三，6、7）中找到原型，只是辽代工匠模仿粟特器物只追求形似，在造型的起伏和纹饰的艺术性上差别明显。

粟特人远居中亚，与契丹发生关系的重要前提是粟特人的迁徙、经商与定居。在唐代史书中，粟特人按照其在中亚所居城市而称为“昭武九姓”，包括康、安、石等十余姓。由于西域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和唐代中央政府采取吸引胡商繁荣营州经济的政策[22]，从唐初开始，粟特移民就大批移居营州（辽宁朝阳）。安禄山是杂胡，据《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又“安禄山，牧羊小丑，本实姓康，远自北番，来投中夏”[23]，来自昭武九姓的康国，他就生活在营州。营州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移居营州的粟特人从事对周边游牧民族包括契丹的贸易活动，且营州至契丹牙帐的交通便利，“营州至东北诸族的交通干道见诸文献记载的共有5条。第三条干道为营州至契丹牙帐道”[24]，契丹建国后，粟特人在北方地区分布更加广泛，继续经商贸易，甚至定居辽国，石敬瑭来自昭武九姓的石国[25]，建立后晋，与辽密切。因此，契丹不用任何中介就能得到粟特人的直接影响。

三、其他西域胡文化因素

吐尔基山金带上的一组伎乐人物，每件带銙上錾刻1人，组合成一支14人的乐队，在莲花座上各持乐器，吹、弹、拨、击，姿势不同，飘带飞舞，其中带扣和铊尾上的人物不持乐器，在莲花座上腾跃起舞，舞带飘逸。其中10个乐舞人物的腰前和腰后都拖着一条长宽飘带，上端从腰带内抽出，向下垂落地，带头花形，向上卷起，呈漂浮之态，尽显舞动之姿（图四，1）。辽代壁画中的汉人和契丹人从未发现过这样的装饰，此带容易绊脚，不会是日常服饰的装饰品，亦有学者推测是西域胡人舞蹈服饰的一部分[26]。耶律羽之墓柏木小帐的正壁有彩绘10人的乐队，宽飘带也是乐队人物的特征（图四，2），边奏乐边跳舞，与辽墓中汉人或契丹人单独奏乐的形象有别，而与独乐寺、庆州白塔浮雕的乐舞风格一致。哈鲁辽墓出土的带把杯上也是相同的风格，其中两位舞者袒胸露乳，与宣化张匡正辽墓壁画中的胡人门卫（图四，4）有相似之处，更像西域胡人（图四，3）。总之，吐尔基山金带、哈鲁金把杯上的伎乐人物，更像以西域胡人为原型创造的艺术形象。

双面人头铃铛上有胡人形象。彰武朝阳沟M2出土2件双面人头银鎏金铃，面部丰满，粗眉大眼，阔鼻方唇并錾有胡须，大耳佩戴耳环，下部为六面体覆钵形。大营子驸马墓出土人头形银饰，顶作人头形，头部当中有圆孔，下面为牡丹纹覆钵式七面体，高9厘米，与盔共存，可能为冠饰，白音塔拉辽墓、凉城县水泉M27辽墓也有类似的制品出土，深目高鼻胡须为西域胡人特征，双面人头也不是中国的传统造型，可能是西域胡人在商贸旅行中带到辽地的舶来品。

辽朝时期辽国与西域国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回鹘很可能成为西域胡文化的



图四 辽代伎乐人物图像[27]

1. 吐尔基山辽墓的金带上的舞者 2. 耶律羽之弹箜篌人物 3. 哈鲁辽墓的金杯上的胡人 4. 宣化张匡正墓的胡人门卫

主要传播者。回鹘汗国（744～840年）瓦解后，回鹘分三支自蒙古草原西迁，分别建立河西甘州回鹘、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辽曾一度攻占河西甘州回鹘、沙州回鹘和高昌回鹘使之称臣纳贡。《辽史·太祖淳钦皇后传》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27]，耶律阿保机的回鹘皇后述律氏是参与契丹建国的重要人物。据《辽史》《辽史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统计，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回鹘向契丹朝贡的次数为64次，平均每三年零五个月一次[29]。由于高昌回鹘居辽上京、中京

至大食、波斯、喀喇汗王国的中间地带，起到贸易中转的作用[30]。为了安置回鹘人，辽政府在上京南城之南门东侧置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31]。辽在高昌回鹘设有榷务，以管理西北地区的贸易。宝山辽墓有胡人壁画，陈国公主墓有胡人训练狮子的琥珀，都是西域胡人在辽代活动贸易的考古证据，而回鹘与契丹是同时代的平行的交往关系，使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回鹘很可能成为西域胡文化的主要传播者。

注　释

［1］　孙机. 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和突厥式金银器［J］. 文物，1993（8）.

［2］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张松柏. 敖汉旗李家营子金银器与唐代营州西域移民［J］. 北方文物，1993（1）.

［4］　同［1］.

［5］　a. 韩儒林. 穹庐集・唐代都波新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b. 孙机. 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和突厥式金银器［J］. 文物，1993（8）.

［6］　林梅村. 松漠之间［M］. 上海：三联书店，2007.

［7］　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阜新海力板辽墓［J］. 辽海文物学刊，1991（1）.
b. 李宇峰. 阜新发现的辽瓷鋬耳壶［N］. 中国文物报，1989-8-11.
c.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J］. 辽海文物学刊，1992（1）.

［8］　图中的1摘自简报，2摘自内蒙古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3摘自《探寻逝去的王朝——耶律羽之墓》，4摘自《辽代金银器》，5、6摘自《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和突厥式金银器》，7、8摘自《松漠之间》。

［9］　冯恩学. 蹀躞带——契丹文化中的突厥因素［J］. 文物，1998（1）.

［10］　同［1］.

［11］　鲁坚科. 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山地的居民文化［M］. 俄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53.

［12］　多布赞斯基. 亚洲游牧人的饰牌腰带［M］.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1990.

［13］　（宋）沈括. 梦溪笔谈・卷一［M］，台北：商务印刷馆，1983：711.

［14］　图中的1、2摘自《辽陈国公主墓》，3摘自内蒙古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4～6摘自《蹀躞带——契丹文化中的突厥因素》.

［15］　同［1］.

［16］　（后晋）刘昫. 旧唐书・突厥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　耿世民译本《阙特勤碑》：“他们率军作战，取得了所有四方的人民……并使他们在东方直到兴安岭，西方直到铁门的地方。”

［1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凉城水泉辽代墓葬［J］. 考古，2011（8）.

［19］　姜伯勤.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91，92.

［20］　资料未发表，图片资料见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

［21］　图中的3摘自《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5～7摘自《唐代金银器研究》，余摘自内蒙古

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

［22］ （后晋）刘昫《旧唐书・宋庆礼传》卷一百九十载：“开元五年，奚、契丹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庆礼盛陈其利。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饶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两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拨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胡商，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

［23］ （清）董皓等编. 全唐文・卷四五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4］ 张松柏. 敖汉旗李家营子金银器与唐代营州西域移民［J］. 北方文物，1993（1）.

［25］ a. 徐庭云. 沙陀与昭武九姓［A］. 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C］.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335 ~ 346.

b. 樊文礼. 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A］.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M］，2002：11 ~ 16.

［26］ 冯恩学. 耶律羽之彩绘乐舞人物艺术形象的探讨［A］. 边疆考古研究［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7］ 图中的1摘自《相映成辉——草原丝绸之路文物精华》，3摘自内蒙古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2、4摘自《耶律羽之墓彩绘乐舞人物艺术形象的探讨》。

［28］ （元）脱脱等撰.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9］ 王日蔚. 契丹与回鹘关系考［A］. 禹贡・第4卷・第8期［C］，1935：633，634.

［30］ 许晓东. 辽代琥珀来源的探讨［J］. 北方文物，2007（3）.

［31］ （元）脱脱等撰.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The Western Regions Hu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Liao Dynasty’s Gold and Silver Wares

Wang Chunyan　Feng Enxue

Abstract: Gold and silver wares are remarkable artifacts in Liao Dynasty’s archaeological remains, which had the multivariate cultural sources, in which the Western regions Hu cultural factor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These container displayed Turkic and Sogdian cultural influence, direct or indirect; the Diexie belts, Hutten graphic arts and some components of harnesses derived or inherited from the Turkic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Liao Dynasty is evident.

Key words: Liao Dynasty’s Gold and silver wares; Turkic cultural factors; Sogdiana cultural factors

内亚帝国的考古学研究：中古辽代政体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

关玉琳（Gwen Bennett）[1]著　黄晓嬴[2]译

（1. 麦基尔大学人类学系与东亚学系，加拿大蒙特利尔市；2.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一、引　　言

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都在尝试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去精确分析（而不仅仅是识别）体现跨区域、多族群政治体制特征的差异化网络体系（Alcock，2001；Brosseder and Miller，2011；CICARP，2011，Fang，et al.，2015；Feinman，et al.，2010；Hanks，2010；Hanks and Linduff，2009；Honeychurch，et al. 2009；Honeychurch，2015；Lin，H.，2009，2012；Sinopoli，1994；Underhill，et al.，2008）。对那些研究文字记载有限的早期帝国的学者而言，想要了解其历史进程，他们就需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明确识别出这些帝国的政治体制维度以及经济变化情况。位于中国东北部和蒙古大草原的辽帝国，不仅拥有关于政治制度的历史文献，也有关于其基本经济实践以及人口形态的考古学记录（脱脱，欧阳玄，1974；CICARP，2011）。本文将以一项契丹—辽考古学调查（KLASH）为中心，考察相关的辽代交通路线及周边环境，以及当时的人口迁徙情况。

KLASH是一个多学科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参与单位有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英国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此项研究主要致力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材料之间的辨证对话，力求对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三座有城墙的辽代城址及其周边区域（图一）进行多层面的阐释。

我们计划调查的三座城址基本情况如下：

松山州（北纬42°09′48″，东经118°38′34″），是一座州城，曾有510米×510米的

* 文章中提到的所有工作，得到了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SSHRC）的资金支持（项目编号：435-2012-0093；主持人：麦基尔大学关玉琳）。



图一　文中所提及地点的地理位置

（注：Qingzhou：庆州；Shangjing：上京；Songshanzhou：松山州；Gangwayao：缸瓦窑；Enzhou：恩州；Zhongjing：中京；Fuguguan：富谷馆）

城墙环绕，但赤峰国际联合调查组（CICARP）在2000年和2007年调查时已经缩小，是一个地表散落着陶片的遗址（张松柏，任学军，1986；CICARP，2011）。《辽史》中简略提及过这个州城，仅有7个字的记载，"（松山州）边松漠，商贾会冲"（脱脱，欧阳玄，1974）。这句简短但信息量丰富的描述表明了该城的地理位置及与辽上京的关系。辽上京位于赤峰北的巴林左旗，距赤峰270千米。由于松山州是距中国北方中古时期最大窑口——缸瓦窑（北纬42°07′58″，东经118°30′47.5″）最近的城市（约10千米），因此这段简短描述所提及的商人很可能跟缸瓦窑的产品有关，这些产品曾广泛发现于北亚地区。

恩州（北纬41°51′03″，东经119°04′32″）是一座规模较小的州城，城墙实测285米×285米，始建于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是长城沿线的要塞（脱脱，欧阳玄，1974）。《辽史》记载，926年，辽征服其邻国渤海国之后，在11世纪里，渤海国匠人和农民纷纷迁居恩州。在2013年的调查中发现了此前未见的渤海风格屋顶盖瓦。

最后一座城址是辽中京遗址（北纬41°34′6″，东经119°08′55″），建于1007年，外

郭城城墙为4千米×4.2千米。中京是辽帝国的核心城市，由外城、内城和皇城组成，三重城墙环环相套。大部分城墙保留至今，沿着城墙还保留有几座城门、建筑台基以及三座佛塔，其中两座属辽代，另一座应属辽代末期或晚至金代（1115～1234年）。中京是辽五京之一，五京在整个辽代一直都在使用，有些甚至在1125年辽王朝覆灭后仍在沿用。辽代的第一座都城上京建于918年，在今赤峰巴林左旗（北纬43°57′44.68″，东经119°23′29.17″）；第二座为辽东京，是辽王朝的东部都城，建于928年，是在渤海国的城郭基础上建成的，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北纬41°16′43.38″，东经123°10′34.72″）；第三座都城是南京，是辽王朝的南部都城，建于938年，位于今北京，但现已难觅其踪；第四座都城为中京，为辽王朝的中部都城，建于1007年，位于今赤峰宁城县；第五座都城为西京，为辽王朝的西部都城，建于1044年，位于今山西大同市（北纬40°5′34.88″，东经113°17′43. 74″）。

KLASH 项目将对每一个城址进行考古学和地理学调查，以及钻芯取样，辨析不同时期的城市布局、建筑构件以及手工业产品的分布状况，然后利用这些资料探明不同时期的道路和防御体系，以及沿线的衙署、居民区、集市、宗教祭祀区、手工业区的组织形式。除了每个城市外，还要对城市周边进行调查，将在每个城市周围300 平方千米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调查。这些工作将使我们对辽代主要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轨迹以及它们和周边地区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随着这些中心城市对于辽帝国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渐形成了一个区域以及跨区域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交流的网络体系。KLASH 项目所作的大面积调查工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个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这个进程正是辽帝国得以建立并繁荣两百多年的基础。

在考古项目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之前，我们做了一些背景材料的准备。首先重新分析了1999～2007年赤峰国际联合调查项目（CICARP）中收集的陶片，该项目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Katheryn Linduff 博士、Robert Drennan博士、希伯来大学Gideon Shelach博士与吉林大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对赤峰1234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古学调查，获得了关于北亚地区辽代物质遗存的最集中的一批资料。迄今我们只完成了所收集陶片的子样品分析，它将有助于我们完善辽代陶瓷的年代序列。这种对陶瓷年代序列的完善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目的只是对考古学跨度为一千年（200～1200年）的陶瓷片做必要的、粗略的年代排序。我们计划将此次收集的辽代陶瓷数据整合到KLASH项目数据库中，在结项之前我们将继续进行再分析工作。

我们的另一项准备工作是将一些已知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进行整合，通过宋代使臣的一些历史记述去关注他们去往辽中京的旅程，然后在基础地图上标识已知的驿站位置，并运用GIS分析他们的行程如何与理想的路线相互对应。使臣们的记述能让我们估算出他们途经部分区域的人口密度，以此为标准去验证那些考古学材料反映的情况。此外，通过对使臣所见的一些沿途纪念物进行视域分析，也有助于我们审视辽帝国对过境使臣的一些态度和观念。

二、契丹人与辽帝国

辽帝国的缔造者——契丹人（4世纪～13世纪），生活在中国长城以北，在汉文文献中，他们被认为是游牧民族。这些文献是由他们南边的邻居、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文化精英所作。新近的考古调查表明这种界定过于简单，事实上，在一些契丹人统治区域内，是存在着定居农业的（CICARP，2011； Wittfogel and Feng，1949：121）。历史文献表明这些地方的居民可以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在游牧经济和定居农业经济之间相互转换（脱脱，欧阳玄，1974，59：923；韩茂莉，2006）。907年之前，契丹的统治体系开始从流动的部族组织、以贵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向官僚体制的帝国政权转变。907年，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帝国（907～1125年），随后通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上行动取得了与五代（907～960年）和北宋（960～1276年）相同的地位（Standen，2007）。辽通常被看作是中国中古时期（900～1400年）三个异族帝国中的第一个，建国之后逐步吞并了很多所谓汉族政权下的领土和人口，这些汉族政权最后被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所灭，后者建立了一个更大欧亚帝国。

正如其他早期帝国的文献一样，现存关于契丹—辽时期的文献集中于制度、政治、军事事件、统治精英等方面。尽管契丹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至今仍无法进行完全解读。因此，我们对辽的了解还需借助于南边政权的官方记录。对这些北方民族而言，中原政权拥有复杂的政治意图，有时甚至是文化意图。这些文献记载并不涉及个人，也不描述精英阶层外的社会普通阶层的生活。众所周知，契丹社会发展为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相对匈奴帝国（公元前209 年～公元93年）和蒙古帝国（1206～1368年）而言，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作用。辽与周边社会和政权有着长期密切的互动，其南边是有着定居农业的唐和宋，北边是流动的、半农半牧的突厥帝国和维吾尔帝国，东边为混合经济类型的高丽，这些政权的不同经济模式以及来自各地的谋士都为契丹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此外，汉文文献排除了作者认为没有意义的内容。这些因素表明，为了更好地了解辽代，我们有必要将考古学、文献学、古生态学以及其他学科材料进行整合研究。

契丹起源于今内蒙古赤峰境内（赤峰面积为90275 平方千米，相当于美国的卡罗莱纳州或整个葡萄牙的面积），一至十世纪，这片广袤的土地属于一块边地，北边生活着难以明确区分的蒙古人、通古斯人以及女真人，南边是黄河流域的多个政权，东边有高丽，西边是突厥汗国。辽建立之后，这个地区变得逐渐重要，辽帝将从中原和渤海俘虏的人口（如农民、手工艺人等）重新安置在这里（脱脱，欧阳玄，1974），他们逐渐融入当地原本存在的农耕社会，成为了税收的重要来源，而税收将为帝国运转所需的机构和人员提供了资金保障。

三、内蒙古赤峰

宋代使臣途经的游牧和农耕区域在今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内，一般情况下，环境至今并无太大变化，这些环境影响了一千年前的聚居区。当早期旅行者穿过这些地区来到辽中京时，可以看到这里的农民依靠从渤海湾和黄海吹过来的夏季季风为田地提供水源，许多村子沿河而建，与狭长的冲积河滩上的小块耕地相邻；其他一些小村庄则位于海拔稍高的起伏丘陵地带，或是更高山脉的山麓，这些山坡上也适于农耕。几千年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赤峰农村的居民一直穿梭往来于季节性枯水的台地或河床。近二十年，中国在古代的土路上修建了公路，马帮、驼队、驴车和老式吉普车行走其上。这些新修的道路仍沿用了古代的交通系统，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结构。

河谷两边是一排排的杨树，狭长的河谷之上，连绵起伏的丘陵从河滩处缓缓抬高，其余地区则是玄武岩和安山岩形成的崖壁，矗立在河流之上，未耕作的山坡上则灌木与沙棘丛生，山间河谷之中溪水径自流淌，四周满是常青的灌木丛。2003年开始，为了防止水土流失，抑制北京的沙尘天气，政府立法禁止在山坡上放牧，不过依然可以看到老人或小孩在放牧山羊和绵羊，间或也有几头牛在村庄、田地或路边吃草。诸如粟和荞麦等耐旱作物曾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不过，现在更多沿着麦田种植中草药，高粱和玉米也开始常见。尽管普遍种植经济作物，但也有小块的荞麦地点缀于山坡田地一隅，以便抵御极度干旱的季节。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新的交通系统逐渐深入农村地区，而在此之前，赤峰的地貌景观与一千年前的辽代并无很大的差别。这种相对稳定有助于我们利用辽代文献，追溯帝国时期的交通路线，并在地图上勾勒出来，然后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们要去往哪里，要避开什么，以及他们想要突出什么，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辽代与来自南边邻国的使臣交往时彼此所关心的内容，这些使臣的任务包括了记录和收集旅途中的有用的信息。

四、GIS和考古学视野下宋使辽的线路

路振和王曾是宋代出使过辽中京的使臣，分别于1008年和1012年到过中京（Wright，1998）。在路振和王曾的记述中都提到了驿馆的位置，这些驿馆是辽为使臣、信使、帝国内部官员以及随从提供的进京途中的官方休息场所。历史地理学者在历史地图集（谭其骧等，1982）上标出了辽的城市、驿馆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把辽帝国地图看作是一个行政区划单位，该行政区域包括了使臣驿馆沿线的所有遗址，将它们叠加在带有地理坐标的谷歌地球地形图上，可以标出使臣们在记录中提到的驿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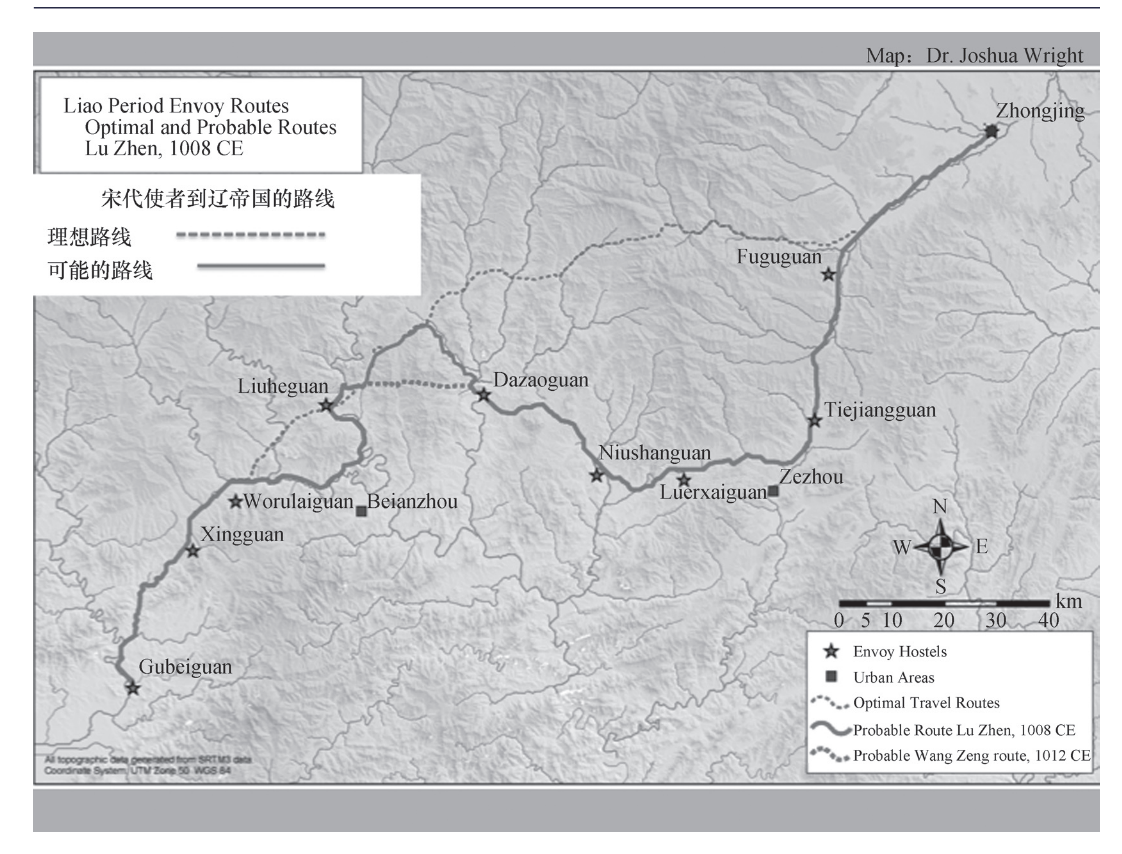
通过考察不同驿站之间可能的交通线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关

系，以及它在更大区域内的重要性。KLASH项目调查的三座城址都位于上京（赤峰北部，辽五京之第一京）和中京（辽五京之第四京，距赤峰270千米的南部）之间。我们可以根据宋代使臣路振的记述来评估这些推断出来的联系，如果他们的实际行程与我们从网络理论中推断的捷径产生偏离，那就意味着辽帝国在路线选择上做了一些战略性考虑，即他们可以决定宋代使臣途经自己领土时所见。如果根据路振途经区域内的资料进行推算，并考察区域内的环境因素，则我们可以了解外来移民选择村庄、乡镇或是城市时的理由，也同样可以对此地人口做一个估算。

路振在其游记中标出了这一区域内的点，我们利用ArcGIS10.2（2014年）中的"最低成本路径"计算出点与点之间的最有效路线。这条路线是在90M像素的成本面上画出来的，这个成本面利用地形坡度随着基于Tobler's hiking function公式的变化而改变，从而可知在颠簸陡峭的路面行进成本更大。这个成本面同样可以用来计算穿过赤峰境内两条主要河流——西拉木伦河（Shara Murun）和老哈河——的成本，除了利用1950年代的地图［U.S. Army Map Service（美国陆军军用地图）， Series L500（1954）］上标识的渡口之外，成本极其高昂，该地图比例尺为1：250000，是从20世纪30～40年代的日军地图和航拍地图中收集而来（来源于http://www.lib.utexas.edu/maps/ams/china/），据此我们将理想路线和路振所记路线进行对比（图二）。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有河流，理想路线和可能的路线均是沿着河谷而前行的；如果没有河流，那么它们就会沿低海拔区域前行，但有时候这两条路线会发生偏离，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我们可以看出路振的契丹向导在带领其通过自己领土时的一些考量。

1005年的澶渊之盟结束了辽与南边邻国宋长达几十年的战争，这些战争并未改变宋辽双方势均力敌的状态。澶渊之盟给两大政权带来百年和平，似乎还约定了遣使，包括宋每年三次定期遣使北上、不定期驻地使团，以及辽对宋的回馈。路振和王曾的出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尽管二人的出使均发生在和平时期，但他们在辽境内的路线仍然为相互之间的防御性质提供了证据。使臣被引导所走的路线不经过任何一个城市中心，可见辽的谨慎态度。这种不经过城市中心区域的情况表明这条路线以及沿线驿馆有可能是专门为每年三次的交聘而设，在出使路线上进行一般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是没有必要的，甚至被刻意回避。经过这样一个几乎空白一片的地区，会让使臣们失去很多观察和评估辽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的机会。

此外，使臣行经路线并不总是沿着理想路线进行，他们到达中京的路线长度是理想路线的两倍多。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河谷地带通常是这一时期中国北方交通运输的通道，然而赤峰夏季降雨却常常造成山间支流以及更大主河道的洪水泛滥。在使臣出使道路沿线的许多地方，这种有规律、季节性的洪水泛滥的破坏作用十分明显。从今天的辽上京和辽中京的遗址状况可见洪水的破坏性，这两座城址均靠近河流，洪水将有些厚达20～30米的外墙整体冲毁。历史表明，使馆是众所周知收集情报以对抗邻国的有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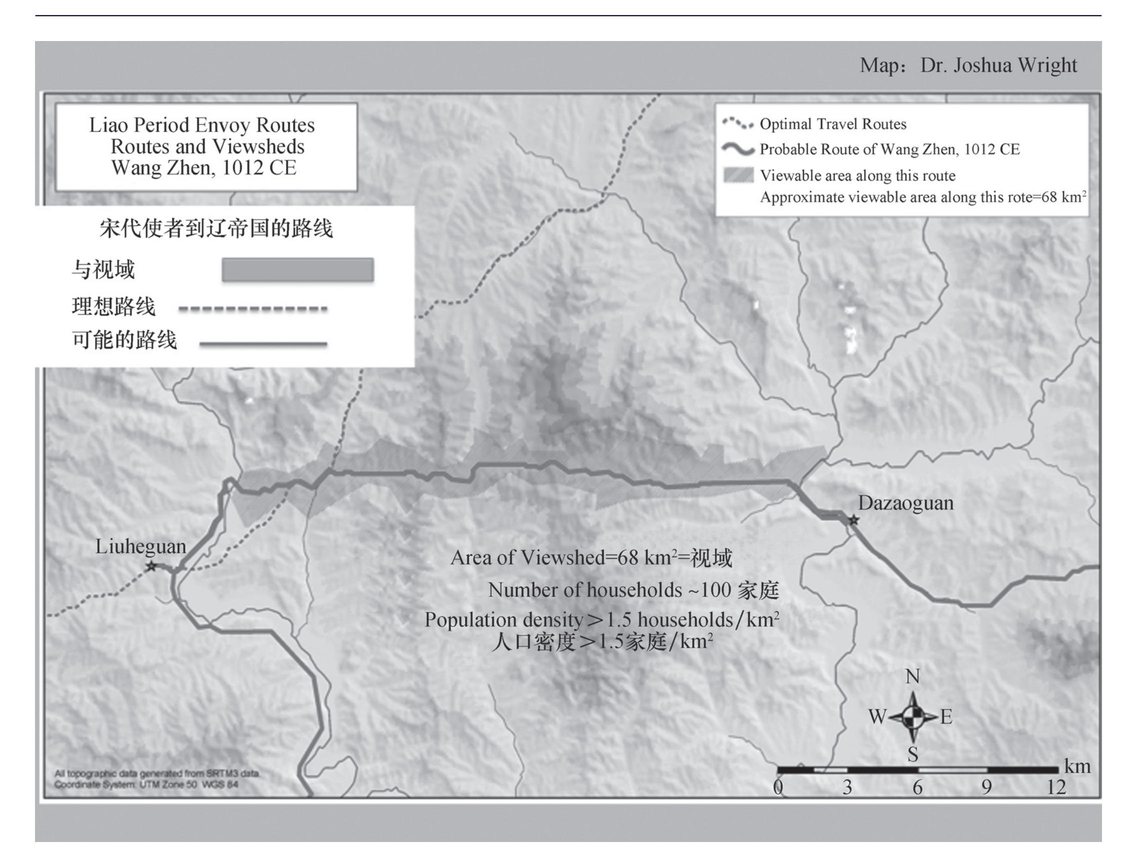


图二　宋代使者到辽帝国的路线：理想路线以及可能的路线

［注：Lu Zhen：路振；Gubeiguan：古北馆；Xinguan：新馆；Worulaiguan：卧如来馆；Liuheguan：柳河馆；Dazaoguan：打造馆；Niushanguan：牛山馆；Luerxiaguan：鹿儿峡馆；Tiejiangguan：铁浆馆；Fuguguan（富谷馆）；Zhongjing：中京；Beianzhou：北安州；Zezhou：泽州；Envoy hostel：驿馆；Urban areas：城市；Optimal travel routes：理想路线；Probable route Luzhen 1008 CE：路振可能的出使路线（1008年）；Probable Wangzeng route 1012 CE：王曾可能的出使路线（1012年）］

点，这些情报可能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或是经济上的。辽似乎也已发现，他们小心谨慎地阻止使臣接近当地的居民，对使臣常去的场所进行限制，这大概就能够解释驿馆为何被隔离开来。沿着这条极其漫长的路线，一路可以见到季节性洪水泛滥的后果，辽对这条通往其都城中京的交通路线的距离和危险性的强调，极具战略眼光。

1012年，王曾是受命前往中京（图二、图三），当他穿过一片柳河馆和打造馆之间一处平缓的山地时，沿途仅见一百来户人家。利用ArcGIS 10.2 (ESRI 2014)中的视域分析法，我们可以计算出这段旅程的视域值。根据分析，他能够看到这一路线周围整整将近68平方千米的景观，这意味着该视域内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5户居民。这种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景象，表明辽的帝国机构有效地掌控了外来使臣在其行程中所能观察到的内容。若果真如此，那么它也同样表明辽在努力避免与宋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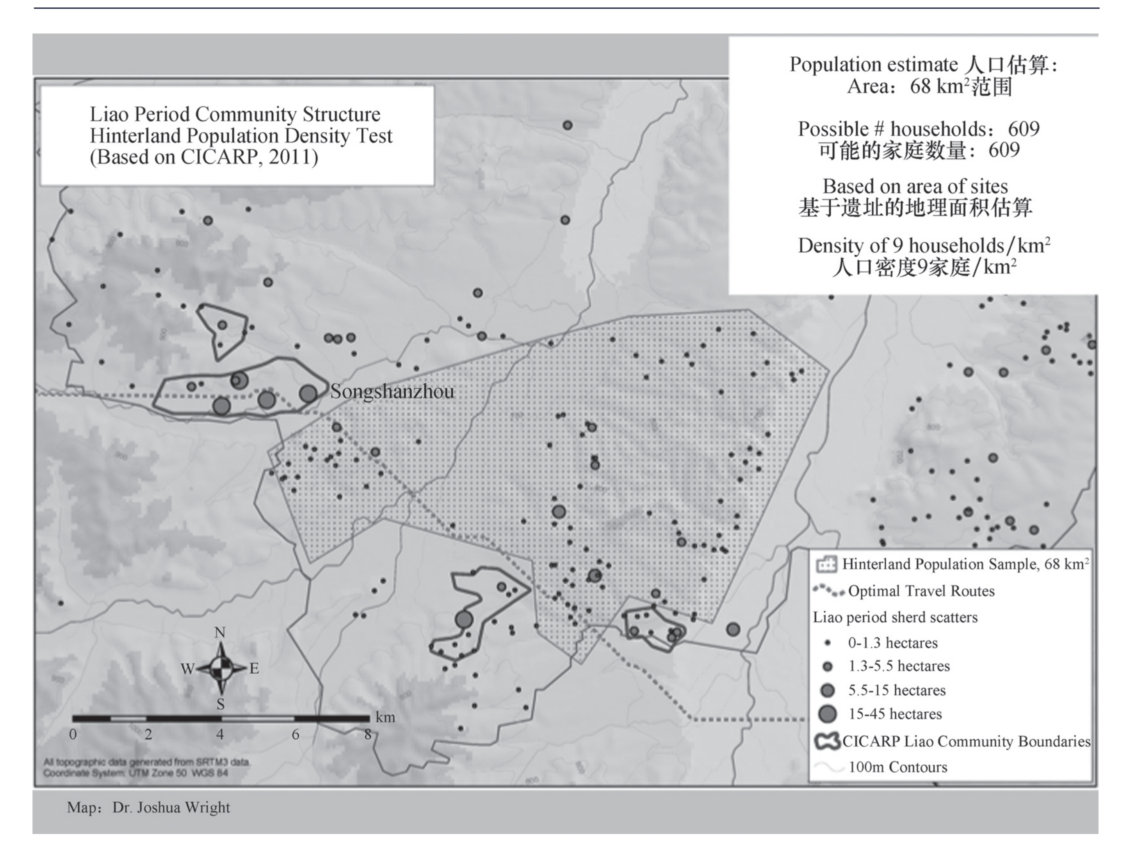


图三　宋代使者到辽帝国的路线：视域，王曾的出使路线，人口估算

［注：Liuheguan：柳河馆；Dazaoguan：打造馆（打造部落馆）；Optimal travel routes：理想路线；Probable Wangzeng route 1012 CE：王曾可能的出使路线（1012年）；Viewable area along this route：沿出使路线的可视范围；Approximate viewable area along this route=68km^2：沿出使路线的可视范围大致为68平方千米］

历史资料和视域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使臣出使路线上的人口密度信息。我们还可将这些数据与仅用考古学材料估算的、不在出使线路上的赤峰其他地区人口密度进行对比，这些地区不见于文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某个区域内发现的陶器密度来推算人口的密度（图四）。在此案例中，我们选取松山遗址附近一个面积为68平方千米的区域（相当于王曾从一个驿馆到另一个驿馆的路上所能看到的面积）。松山州遗址已由CICARP进行过全面的考古学调查，但调查没有涉及该地区任何较大聚居区（CICARP，2011）。这68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已知的辽国遗址面积都进行了计算，通过CICARP的人口统计学方法，得出了每平方千米9户的人口估算值，这个数值比王曾所经过地区的人口密度要明显高出很多（CICARP，2003，2011）。

当然，这种计算方法的一个问题是，考古学所呈现的概貌包括了200～1200年间辽曾经占领过的地区的遗存。王曾的观察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他经过那个地方那一天的大致人口状况。CICARP的人口分析方法也可以按时段来进行测量，根据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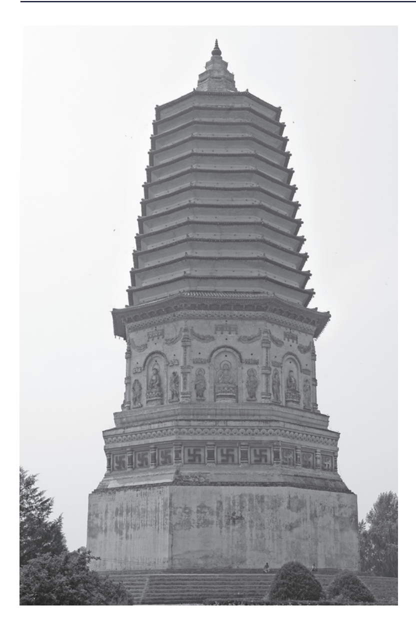


图四　辽代的社区结构：辽腹地的人口密度测试

［注：Songshanzhou：松山州；Hinterland population sample，68km²：腹地68平方千米内的人口样本；Optimal travel routes：理想路线；hectares：平方千米；CICARP Liao Community Boundaries 100m Contours：CICARP项目中100米的辽代社区边界轮廓；100m Contours：100米等高线］

的方法，如果在考古学意义上1000年的周期内，人口密度平均值是每平方千米9户居民的话，那么具体到某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人口密度应该高于这个数（CICARP，2011）。CICARP的人口计算方法证实了在中京到上京之间核心区域内的人口密度的确高于南部山区或者宋代使臣经过地区的人口密度。

视域分析方法还被用于分析辽在操控宋代使臣在其控制区域的旅途中所能看到的景观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其他问题。辽的许多居民都是佛教徒，其中包括一些皇室以及后妃家族的成员，他们出资兴建了许多庙宇和佛塔（Lin，2009）。在辽代，城市发挥着多重作用，城市内有许多建有多层佛塔的庙宇，是举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KLASH正在调查的两座城市遗址——松山州和辽中京，就有很多庙宇和佛塔，尽管其中只有一座佛塔保存了下来。辽代现存的佛塔有26座，大多数用素砖和装饰砖砌成，其表面多用泥浆涂抹。佛塔中有一些与佛祖或高僧有关的圣物、佛教经典以及其他有价值的珍品，这些都是佛教徒们虔诚和敬畏心理的物质体现（Kieschnick，2003），同时也是其



图五　辽中京大明塔
（Daniel C. Waugh摄于2009年）

供养人财富、权力以及掌控能力的体现。与其他朝代相比，辽代现存的佛塔体量巨大，高达50～80米。这样看来，出资修建这些宏伟建筑的供养人多是辽代的皇室成员，也就不足为奇了。位于中京的大明塔是现存最大的辽塔，从底座到塔顶，通高约为80米（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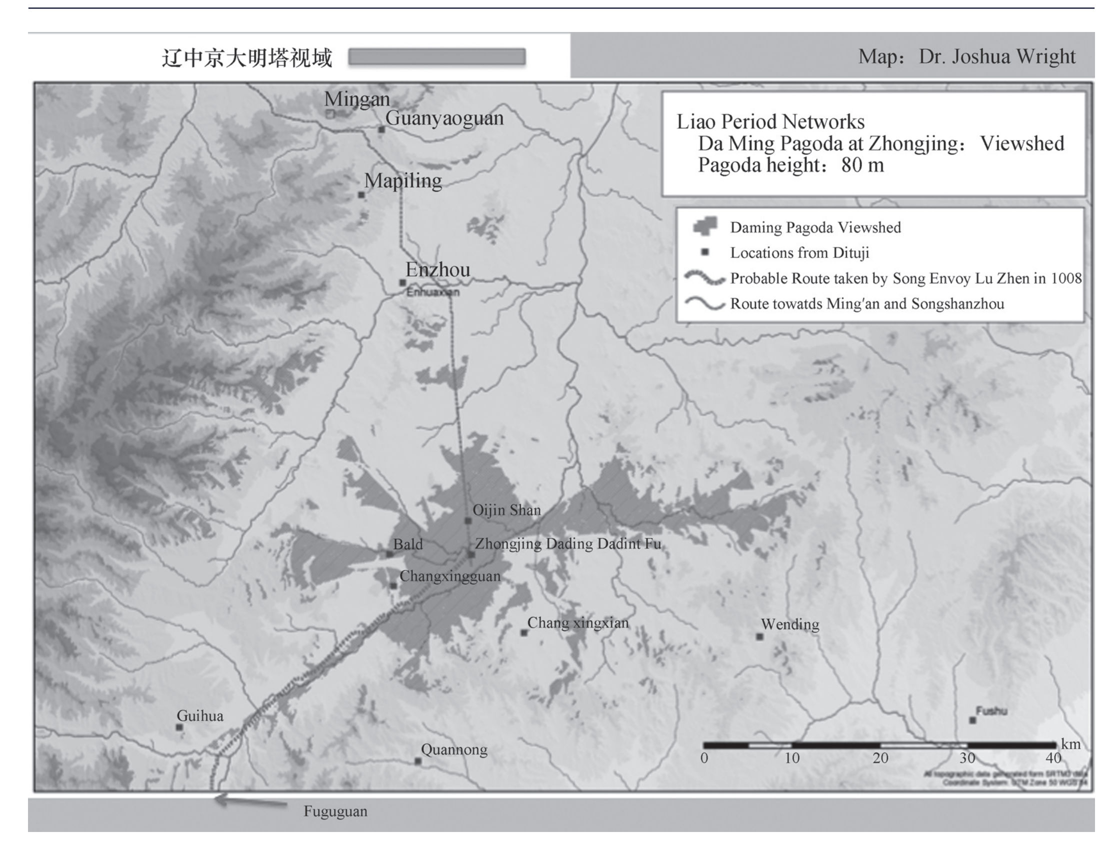
富谷馆是到达中京之前的一个重要驿馆，距离使臣的目的地中京约45千米。离开富谷馆，向北走约5千米，老哈河在这里向东北方向改道，几乎径直地流向中京。对大明塔的视域分析表明，使臣到达老哈河的转折点时，由于方向的改变，一座巨大的佛塔将出现在使臣的视线中，并在其旅程最后30千米内不断地逼近（图六）。

自新石器时代（或许更早）以来，人们就一直用地景和建筑来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Bradley，1984，1993；Clarke，et al.，1985；Hodder，1990；Thomas，1991，1992； Tilley，1994；Tuan，1977）。中京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似乎深谙地景和建筑能够单独或先后对人类创造社会现实的影响力这一道理。为了展示都城的辉煌壮观，他们将30千米长的老哈河河谷当作一个整体的景观，以供宋朝使臣行走其间。体量巨大的大明塔，比现存的任何一座唐宋佛塔都高，在城外30千米就能看到。这样的巨塔曾是展示辽塔建造者的财富、佛教徒的虔诚的符号，也是前现代统治者权位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结　　语

利用GIS以及考古学视角来研究11世纪宋代使臣出使辽中京的路线，反映了辽代有意在让使臣经过自己领土时对其所见所闻进行操控（Bennett，2015）。尽管澶渊之盟表面看来是双方都是平等的，然而和解的条款以及宋向辽赠予的物品（这些物品可从频繁发现于辽代遗址中的宋瓷得到证明），表明了辽是双方关系的强势方。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还表现在辽有意操控宋代使臣去往中京途中的见闻。视域分析表明大明塔在多大范围内影响了周围的景观，而宋代使臣在最后30千米的旅程中，根本无法避开这一景象。正是通过对这些感官印象的强化，使辽从中获益。

理想路线分析揭示了辽的用心，他们阻止了宋代使臣在其旅程中收集有用情报，这段旅程比实际到达辽中京的路线更长，并且沿路是洪水泛滥频繁的河谷。此外，宋代使臣被引领着穿过一片远离城市中心、几乎人迹罕至的乡野区域，这种人烟稀少的景



图六　辽代的网络结构：中京大明塔的视域

［注：pagoda height：80m：塔高80米；Daming pagoda viewshed：大明塔的视域；Location from Dituji：地图集中的位置；Probable route taken by Song envoy Luzhen 1008 ：宋使路振可能的出使路线（1008年）；Route towards Ming’an and Songshanzhou：通往明安和松山州的路线；Fuguguan：富谷馆；Guihua：归化；Quannong：劝农；Changxinguan：长兴馆；Changxingxian：长兴；Wending：文定；Zhongjing：中京；Dading：大定；Dading fu：大定府；Qijin shan：七金山；Enzhou：恩州；Enhua：恩化；Mapling：马疲岭；Guanyaoguan：官窑馆；Ming’an：明安］

象，在王曾的记录中有所提及。用考古学材料对靠近辽核心区域的地方进行可能的人口估算，并将结果与使臣途经地区的人口估算进行对比，这种人烟稀少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以上结论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辽建立这些宋代使臣出使所走的、途中分布着驿馆或是其他小型场所的路线，其目的是为了引导使臣穿过他们的领土。

传统的前现代国家印加或罗马帝国用工程学的成就以及人力劳动修建的道路大多保存到了今天（Woolf，2001；Hitchner，2012；Hyslop，1984；Maas and Ruths，2012；Matos Mendieta and Barreiro，2015；Sistrunk，2010），而辽的道路的遗迹则较为短暂。在辽南京城（今北京）南墙水门以外以及上京城的城墙以里，我们均没有找到经过铺设的路面或是铺路所用的材料，更无法通过它们来了解这些路的结构（http://www.

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museums/139756.htm；与董新林博士的交流）。然而，通过以理想路线为导向的目标调查，来分析连接辽代各中心城市的道路，可以发现，它们所形成的、遍及辽代版图的道路网络仍然十分清晰。引人深思的是，除从宋边境到辽上京的出使路线之外，究竟有多少条这样的路线构成了赤峰21世纪之前的道路系统。随后的北方帝国在不同的地方建都，这条出使道路在辽之后的时代几乎不再使用，它近乎被废的命运成就了它的独特性。

契丹文化遗产（包括保存至今的遗迹以及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广泛分布在今天中国北方以及蒙古图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因此，更好地了解赤峰地区的发展，对研究前现代的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至关重要。之前对辽所作的考古工作，尽管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但除了CICARP的调查之外，都是针对具体的遗址进行的，而CICARP也主要关注较早的时期。KLASH项目计划在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维度上进行调查，对这三座城址及其腹地所做的工作将会让我们了解这里的生活。但是，诸如契丹从部落联盟的政治组织形式向官僚化的帝国结构转变的进程，或是辽将佛教的新形式传入北亚，这些问题只能在更大的、超越城市本身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对道路及交通运输道路的识别，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契丹人在其领土内的活动及其版图之外的扩张，对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进程十分重要。

附记：感谢英国阿伯丁大学的Joshua Wright博士，我KLASH项目的共同负责人，这篇文章中用了他绘制的 GIS基础地图；感谢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Daniel Waugh，经他允许，我在这篇文章中用了他拍摄的大明塔图片；同样，我要感谢英国伯明翰大学的Naomi Standen教授，我KLASH项目的第二位共同负责人，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复阅读，他的意见使这篇文章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参考文献

Alcock S. *Empires: perspectives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ennett G. ‘I spy with my little eye’: GIS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leventh-century Song envoy routes in the Liao Empire［J］. *Medieval Worlds*, 2015(1): 71-85. DOI 10.1553/medievalworlds_no1_2015s72.

Bradley R.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rehistoric Britain*［M］. Lond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Ltd., 1984.

Bradley R. *Altering the earth: the origins of monuments in Britain and continental Europe*［M］.Edinburgh: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1993.

Brosseder U., Miller B. K. *Xiongnu archaeolog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M］. Bonn: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2011.

CICARP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Chifeng region*［M］. Pittsburg: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 2011.

Clark D.V., Cowie T.G, Foxon A. *Symbols of power at the time of Stonehenge*［M］. Edinburgh: National Museum of Antiquities Scotland, 1985.

Fang H., Feinman G. M., Nicholas L. M. Imperial expansion, public investment, and the long path of history: China's initial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its aftermath［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112-30): 9224-9229.

Feinman G. M., Nicholas L. M., Hui F. The imprint of China's first emperor on the distant realm of eastern Shandong［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107-11): 4851-4856.

韩茂莉. 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M］. 北京：三联书店，2006.

Hanks B. Archaeology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and Mongolia［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39*, 2010: 469-486.

Hanks B. K., Linduff K. M. *Social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Eurasia: Monuments, metals and mobilit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Hitchner R. B. Roads, Integration, Connectiv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Roman Empire［A］. *Highways, Byways, and Road Systems in the Pre-Modern World*［C］.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2012(9): 222-234.

Honeychurch W., Wright J., Amartuvshin C. Re-writing monumental landscapes as Inner Asian political process［A］. *Social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Eurasia: Monuments, Metals, and Mobilit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30-357.

Honeychurch W. *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 archaeology, mobility, and culture contact*［M］. New York: Springer, 2015.

Hodder I. *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M］. Oxford: Blackwell, 1990.

Hyslop J. *The Inka road system*［M］.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4.

Kieschnick J.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Lin H. *Urban landscape and politics: the making of Liao cities in southeast Inner Mongolia*［D］.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09.

Lin H. Legitimacy and control: the making of the imperial Liao heartland. In Hartley［A］. *The archaeology of power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gimes and revolution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tos Mendieta R., Barreiro J. *The great Inka road:engineering an empire*［C］.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in association with Smithsonian Books, 2015.

Maas M., Ruths D. Road Connectiv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ncient Empires: A Case Study from Late Antiquity［A］. *Highways, Byways, and Road Systems in the Pre-Modern World*［C］. 2012(5): 255.

Sinopoli C. The archaeology of empires［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4: 159-180.

Sistrunk H. Road to empire: documenting an Inca road in northern Ecuador［J］. *Nawpa Pacha*, 2010(30-2): 189-208.

Standen N. L.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 in Liao Chin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卷：隋、唐、五代十国时期［M］，上海：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卷：宋、辽、金时期［M］，上海：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Thomas J. *Rethinking the Neolithic*［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omas J. Monuments, movement, and the context of Megalithic art［A］, *Vessels for the ancestors: essays on the Neolithic of Britain and Ireland in honour of Audrey Henshall*［C］.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2.

Tilley C.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M］. Oxford: Berg, 1994.

脱脱，欧阳玄.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Underhill A. P., Feinman G. M., Nicholas L. M., Fang H., Luan F., Yu H., Cai F. Changes in region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southeastern Shandong, China［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8 (27-1): 1-29.

Wheatley P.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Wittfogel K., Feng J. S.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M］,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Woolf G. Inventing empire in ancient Rome［A］. *Empires: perspectives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1-322.

Wright D. *The ambassadors' records: eleventh-century reports of Sung embassies to the Liao*［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98.

张松柏，任学军. 辽金松山州遗址调查［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4）：67～73，79.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an Inner Asian Empire: Us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to Study the Medieval Liao Polity

Gwen Bennett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data, combined with GIS analysis gives us new perspectives on 11th c. medieval period envoy missions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o the Liao Empire (907-1125) Middle Capital in Chifeng Inner Mongolia, China. The envoys' routes can be recreated on maps, and optimal route and viewshed analyses give us insight into the Liao's concerns about these foreign missions crossing their territory and how they addressed them. Furthermore, population estimates can be made from envoy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used to extrapolate population density estimates from archaeological data for other areas in Chifeng.

Key words: Liao Empire; Song Dynasty; China; landscape analysis

刍议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与传播

陈建立　张周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生铁冶炼及生铁制钢技术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重大创造，对我国农业和军工发展，乃至国家的强盛影响巨大。根据目前的研究，中国生铁技术的产生可能是源自西亚地区块炼铁技术的东传，在中原地区结合自身文化和技术传统发明的[1]。而生铁在中国中原地区的广泛使用，以及自中原向周边地区，特别是经东北地区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传播，促进了东北亚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东北亚地区钢铁技术的起源、发展及其传播研究既是铁冶金考古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认识中国东北地区在东北亚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的现实需求。

一、中国东北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研究

中国东北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研究存在较多空白，应引起充分重视。迄今，东北地区已有40 余处遗址或墓葬出土汉代以前的铁器制品，吉林和辽宁等地多处三燕、高句丽和渤海时期遗址和墓葬也出土了较多铁器。王巍[2]、白云翔[3]和笔者[4]分别从考古类型学和制作工艺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东北地区古代钢铁技术受到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如经过金相鉴定的东北地区出土铁器已有多批，包括吉林梨树二龙湖遗址（战国至汉，生铁、脱碳铸铁和铸铁脱碳钢）[5]、黑龙江东康遗址（汉代，块炼铁）[6]、内蒙古嘎仙洞拓跋鲜卑遗迹（东汉，块炼渗碳钢）[7]、榆树老河深墓地（东汉，块炼铁、生铁和炒钢等）[8]、辽宁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魏晋时期，生铁、炒钢、贴钢、夹钢和灌钢）[9]、黑龙江萝北团结墓地（6世纪，炒钢）[10]以及吉林和辽宁等地高句丽遗址墓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生铁、炒钢和生铁淋口等）[11]出土铁器百余件，初步揭示了东北地区钢铁技术发展的规律，如远离中原地区主要为块炼铁技术，而靠近中原的地区主要为生铁和生铁制钢制品。这些结果说明东北地区钢铁技术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发展的，并与其生活环境和生产状况相一致。但这些有限的检测结果远不能全面反映东北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面貌，有些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属性还存较大争议[12]，再者以往基于冶铁遗址调查和发掘的冶铁技术研究工作几乎空白，从而无法回答诸如块炼铁技术和生铁技术之间的关系、生铁冶炼和炒钢技术的发展等关

键问题。因此，系统开展东北地区的古代钢铁技术研究，建立更加翔实的技术发展序列是十分必要的。

二、朝鲜半岛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研究

朝鲜半岛冶铁技术起源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目前虽有来自中国东北地区这一基本共识，但近年来有韩国学者试图否认，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1980年以来，中国学者王巍[13]、白云翔[14]，韩国学者申璟焕[15]、李南珪[16]、崔钟泽[17]、伊东锡[18]、卢泰天和赵南哲[19]，日本学者潮见浩[20]等对朝鲜半岛古代钢铁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朝鲜半岛初期铁器文化的起始受到中国战国时代铁器文化的影响，铁器文化的迅速发达是在汉乐浪郡设置以后大规模的移民而造成的，也不排除来自山东半岛的因素，但迄今在韩国尚未发现与早期生铁制品同时期的生铁冶炼遗址。

近年来，韩国弘益大学朴长植教授最先认为韩国古代钢铁技术的起源与中国有关，但后来通过韩国中部地区冶铁遗址采集炉渣以及出土铁器的分析，以及与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合作，指出韩国冶铁技术的起源主要受到块炼铁技术的影响，认为韩国冶铁技术起源主要受到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并非来自中国[21]。最近公州大学赵南哲等检测的高句丽、百济时期的多批铁器以及数处冶铁遗址也均判定为块炼铁技术，其原因也值得深思。出现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冶铁遗物的综合研究较少，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外冶金考古学界关于炒钢和块炼渗碳钢的判定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这正是铁冶金考古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日本列岛古代钢铁技术研究

日本古代钢铁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也存在较多争议。王巍[22]、潮见浩[23]、川越哲志[24]、窪田藏郎[25]、东潮[26]、松井和幸[27]、村上恭通[28]和安间拓巳[29]等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大泽正已、穴泽义功、斋藤努[30]等为代表的冶金考古学者从技术研究角度系统地论述了东亚诸国早期铁器文化，并尝试从社会转变的角度来看铁器在日本的传播。如大泽正己对弥生时代大量铁器进行鉴定，发现弥生时代前、中期已经大量出现可锻铸铁制品，弥生时代中、后期出现铸铁脱碳钢制品，而炒钢制品的出现则是在弥生时代后期以降，同时在福冈西新町遗址出土板状铁斧经鉴定为块炼渗碳钢制品，并发现有贴钢制品[31]。这和中国内地的冶铁技术发展相一致的，只不过时间上滞后而已，说明日本铁器文化是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影响下产生的。大泽正己、佐佐木稔等力图通过对遗址中较为多见，并与冶铁和铁器制造关系密切的铁渣进行分析，以辨别其形成工艺种类，作为推断日本冶铁业开始年代的依据。但问题在于，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

令人信服的判定标准。另外日本学者根据AMS-^{14}C 年代结果将弥生文化起始年代提前了400多年，关于日本早期铁器和冶铁技术从何而来又引起广泛的争议[32]。所以从年代学和冶金学的角度研究古代钢铁技术，在方法上还应有所突破。

四、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根据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代钢铁技术研究结果可知，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发展与传播问题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块炼铁技术的发展历程、生铁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块炼铁和生铁技术在东北亚地区的交互作用尚不清楚。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东北地区冶铁遗址的田野工作较少、铁器的检测分析工作不多；关于中日韩三国关于冶铁技术方面的整合研究严重不足；特别是尚未建立起公认的炒钢、块炼渗碳钢以及对应的冶炼、炒炼或精炼技术的判定标准，严重影响了对东北亚地区古代冶铁技术和铁器材质的正确判定，也严重影响了对钢铁技术传播与交流的认识。如炒钢技术虽有文献记载，但由于缺乏对考古背景明确的冶炼遗物的检测分析，尽管前人多有论述[33]，笔者也曾提出一个基于金相组织和夹杂物分析的炒钢判定标准[34]，但目前看来，这个标准尚不完善，国外不少学者还有疑问。近年来，李延祥等通过炉渣以及铁器中夹杂物的成分，提出古代钢制品中含磷非金属夹杂物可作为炒钢工艺存在的一种判据[35]。法国学者通过大量分析铁器中夹杂物的成分，然后用数学统计方法来试图区分块炼铁和精炼铁（类似炒钢）[36]。这些工作为更加深入探索材质和冶炼工艺的判定标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因此结合冶金实验考古研究，开展更多冶铁遗物的分析，对正确认识古代钢铁技术的特征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韩国和日本铁冶金考古研究非常活跃，从事研究人员较多，经常进行冶铁实验考古操作，经常组团有目的赴国外考察古代钢铁技术，并组织冶铁遗址调查和发掘等工作，定期举办古代铁器文化交流的学术会议，出版较多关于东北亚地区古代铁器文化及钢铁技术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这既是文化自觉的选择，也是文化走出去的举措。而中国在这方面是相对落后的，应引起充分重视。因此基于中国东北地区古代冶铁遗址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系统开展检测分析研究，加强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的比较研究，深入探讨钢铁技术的传播与交流问题，对于从国际视野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规律，正确认识中国东北地区在东北亚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亟须开展的研究课题包括：

（1）块炼渗碳钢和炒钢的判定标准。对各地冶铁遗址中采集的炉渣、积铁块等遗物和出土铁器进行显微组织、成分和制作工艺研究，结合文献记载，开展块炼铁、块炼渗碳钢和炒钢技术的实验考古研究，进一步完善块炼渗碳钢和炒钢的判定标准。

（2）中国东北地区钢铁技术发展历程。系统调研东北地区古代铁器的出土情况，根据冶铁遗址调查情况，采集检测标本，对铁器的制作工艺、冶铁遗址的冶炼技术以及

年代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深入研究东北地区块炼铁和生铁技术的起源、发展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从块炼铁到生铁冶炼的演变过程，完善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发展的时空框架。

（3）朝鲜半岛古代钢铁技术发展历程。与韩国学者合作，开展韩国古代冶铁遗址的田野调查，对采集的冶铁遗物进行年代学和金属学分析，深入研究韩国古代块炼铁和生铁冶炼的发展状况，并在系统整理前人特别是朝鲜学者关于古代钢铁技术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与中国东北地区古代钢铁技术进行比较，进一步明晰朝鲜半岛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历程。

（4）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在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研究的基础上，整理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列岛古代钢铁技术研究资料，同时开展东北亚地区陶瓷、青铜、金银器的考古学和制作技术研究，综合研究古代金属技术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与交流问题，在更大的视野内系统探讨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的传播与交流问题。

五、炒钢判定标准再探讨

柯俊、韩汝玢、李延祥等先生及笔者从钢铁制品的金相组织及其中的非金属夹杂物的成分和物相类型的角度，来区分炒钢与其他制铁技术产品，已判定了不少炒钢制品，但这一方法主要是根据经验的总结而来，对于古代炒钢制品的判定原理、炉渣的判定标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为此，我们又选择若干古代冶铁遗址（如山东章丘东平陵、河南鲁山望城岗、鲁山黄楝树、登封杨村冶铁遗址）和方城县赵河镇牛庄村现代熔铁作坊的炉渣和积铁样品，对不同冶炼过程与不同遗物中金属铁的浮凸组织、磷共晶组织的形成机理及磷的转移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了生铁、块炼铁、炒钢冶炼过程中主要的物理化学变化，初步解释了不同冶炼过程炉渣的形成原理，试图从磷在冶炼和炒钢过程中的流向及其在炉渣和铁器中夹杂物的含量来研究其判据，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形成如下初步认识[37]：

（1）东平陵、望城岗、黄楝树冶铁遗址炉渣与积铁及方城县赵河村现代熔渣的分析结果验证了遗址存在生铁冶炼技术，且不同遗址内使用助熔剂有异，东平陵遗址主要使用了含钙助熔剂，导致其炉渣中铁颗粒磷含量普遍高于其他遗址，甚至出现较多磷共晶组织。此外，东平陵冶铁遗址内还存在炒钢或精炼技术，且炒钢过程中加入含钙助熔剂，助熔剂中含有一定量的磷。登封杨村冶铁遗址积铁样品的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内可能存在精炼技术。

（2）古代生铁冶炼过程中，若渣中钙含量高，则磷主要进入炉渣中。伴随炉渣排出炉外，温度降低到1000℃左右，高温下形成的$3CaO \cdot P_2O_5$分解并还原为单质磷，进

入到炉渣铁液滴中，形成固溶体或磷共晶。若渣中钙含量低，磷主要进入铁水中，并伴随铁制品的后期加工，可能形成磷共晶、浮凸组织。

（3）在判断炉渣氧化还原程度时需考量炉渣玻璃相基质的成分；判断冶炼生产过程时需综合考虑生产的初始炉料、物料转化过程及引起的相关结果。炉渣或钢铁制品夹杂物中析出浮氏体或铁橄榄石，不仅取决于炉渣、夹杂物中FeO含量，还取决于其中硅钙的含量。

（4）炉渣中出现$3CaO·P_2O_5$时，可确定该炉渣为精炼或炒钢的产物。炉渣中金属铁内部或铁制品中发现磷钙复杂化合物时，基本确定为炒钢的产物。

六、结　语

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对东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30多年来，中日韩三国学者关于东北亚地区铁器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较多，但在冶铁技术方面的综合研究较少，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的研究存在较多空白，炒钢和块炼渗碳钢的判定标准尚不明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对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发展历程的正确认识。因此通过文献调研、田野调查及实验考古等方法，以及年代学、冶金学和金属学等分析手段，开展铁器材质和工艺的判定标准研究，并重点对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国采集的冶铁遗物进行综合分析，系统研究钢铁技术在东北亚地区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状况，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注　释

［1］ 陈建立. 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 王巍. 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白云翔. 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4］ 陈建立，韩汝玢. 汉晋中原与北方地区钢铁技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刘文兵，隽成军，张周瑜，刘海峰，陈建立. 吉林梨树二龙湖遗址出土的战国铸铁制品及其意义［A］. 亚细亚铸造技术史学会研究发表资料集7号〔韩〕［C］. 韩国：岭南大学，2013（8）：251～269.

［6］ 黑龙江省博物馆考古部，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 宁安县东康遗址第二次发掘记［J］.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3）.

［7］ 曹熙. 从噶仙洞出土铜铁器研究中初探黑龙江地区古代冶金史［A］. 东北古代科技史论文汇编（内部资料）［C］. 东北民族历史考古资料信息研究会，1987：200～202.

［8］ 韩汝玢. 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葬出土金属文物的研究. 榆树老河深［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9］ 陈建立，韩汝玢，李延祥. 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墓地出土铁器的鉴定［J］. 文物，2001（12）.

［1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萝北县团结墓葬发掘［J］. 考古，1989（8）.

［11］ a. 贾莹，李新全，梁志龙. 五女山城高句丽铁器金相学初步探讨［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7（3）.

b. 贾莹，金旭东，张玉春等. 丸都山城高句丽铁器的金相与工艺［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2）.

［12］ a.刘国祥，倪润安. 嘎仙洞遗址的发现及相关问题探讨［J］. 文物，2014（11）.

b.蒋琳. 东北地区早期铁器的发现与研究［D］. 吉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硕士论文，2014.

［13］ 同［2］.

［14］ 同［3］.

［15］ a. 申璟焕，李南珪. 古代韩国的铁器文化，1995 .

b. 申璟焕. 韩国地域における初期铁器の冶金学的特性［A］. 东アゾアの古代铁文化・その起源与传播［C］. たたら研究会，1993.

［16］ 李南珪. 韩国初期铁器文化の形成と发展过程・地域性を中心とてし［A］. 东アゾアの古代铁文化・その起源与传播［C］. たたら研究会，1993 .

［17］ 崔钟泽，张恩晶，朴长植. 三国时代铁器研究［M］. 韩国：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1.

［18］ Dong-Suk Yoon, Joon-Shik Koh. Metallurgical study of the early Iron Age artifacts found in Korea［A］. *Phhang Iron and steel*［C］. Co. LTD, 1984.

［19］ 根据笔者与卢泰天、赵南哲诸教授多年联系与合作的了解.

［20］ 潮见浩. 東アジアの初期鉄器文化［M］. 日本：吉川弘文馆，1982.

［21］ a. Jang-Sik Park, Mark E. Hall. The use of white cast iron in ancient Korea［J］. *IAMS*, 2005 (25): 9 ~ 13.

b. Jang-sik Park, Thilo Rehren. arge-scale 2nd and 3rd Century AD Bloomery Iron Smelting in Korea［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1 (8): 180 ~ 1190.

c. Jang-Sik Park, Susanne Reichert. Techn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as inferred from bloomery and cast iron objects excavated in Karakorum［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5(53): 49 ~ 60.

［22］ 同［2］.

［23］ 同［18］.

［24］ 川越哲志. 弥生時代の铁器文化［M］. 日本：雄山阁，1993.

［25］ 窪田藏郎. 铁の考古学［M］. 日本：雄山阁，1979.

［26］ 东潮. 古代东アジアの铁と倭［M］. 日本：溪水社，1999.

［27］ 松井和幸. 日本古代の铁文化［M］. 日本：雄山阁，2001.

［28］ 村上恭通. 古代国家成立过程と铁器生产［M］. 日本：青木书店，2007.

［29］ 安间拓巳. 本古代铁器生产の考古学的研究［M］. 日本：溪水社，2007.

［30］ 笔者与大泽正已、穴泽义功、斋藤努有多年联系与合作。

［31］ 大泽正己. 弥生时代の中国产铁制品・可锻铸铁、铸铁脱碳钢、炒钢、块炼铁［J］.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in Shimane*, 1998(5): 25 ~ 27.

［32］ a.春成秀而. 弥生时代早・前期の铁器问题［J］. 考古学研究（50），2003（3）.
b.春成秀而. 碳十四年代と铁器［A］. 弥生时代の实年代［M］. 日本：学生社，2004.
c.春成秀而. 弥生时代の年代问题［A］. 弥生时代の新年代［M］. 日本：雄山阁，2006.

［33］ a.华觉明. 铜和铁造就的文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b.韩汝玢，柯俊. 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c.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

［34］ 陈建立. 汉晋中原及北方地区钢铁技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5］ 杨菊，李延祥，赵福生等. 北京昌平马刨泉长城戍所遗址出土铁器的实验研究——兼论炒钢工艺的一种判据［J］.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4（2）.

［36］ A. Disser, P. Dillmann, C. Bourgain, et al. Iron reinforcements in Beauvais and Metz Cathedrals: from bloomer or finery?［J］. *The use of logistic regression for differentiating smelting process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42): 315 ~ 333.

［37］ 张周瑜. 山东章丘东平陵故城冶铁遗址冶炼技术研究［D］.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论文，2014.

A Preliminary Opin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Ancient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

Chen Jianli　Zhang Zhouyu

Abstract: The use of iron and spread of iron smelting technology activated the great soci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ancient Northeast Asia. In the past 30 years,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carried out many research works for this topic, while there are many gaps in th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iron-making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dispersal and influence of iron technology from China to Korea and Japan, and the criteria to distinguish the ironware's mak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puddling and bloomery carburized steel. This paper mainly address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ron technology during 4th c.BC-7th c.AD using evidence of iron smelting, casting and refining materials unearthed

within Northeast Asia area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chronological, 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 science methods. We want to try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formative ancient iron technology framework of Northeast Asia, to give a clear roadmap of the spreading and the exchange of iron technology,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xplore the role of ancient Chinese iron technology in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Ancient Northeast Asia; Iron technology; Spread of iron

辽西青铜时代早期矿冶遗址考察报告

李延祥[1]　席光兰[1，2]　李辰元[1]　韩立新[3]　李　波[4]　陈　利[5]
陈建立[6]　王立新[7]

［1. 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重点科研基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100083；2.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100192；3. 克什克腾旗博物馆，经棚，025350；4. 建平县博物馆，建平，122400；5. 凌源市博物馆，凌源，122500；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7.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长春，130012］

本文所言的辽西地区指的是以辽河上游两条主要支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区，行政上以今内蒙古赤峰市为中心，并涵盖了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吉林省西南部等广大地域。

辽西地区作为中国先秦时期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区，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在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演进到了青铜时代，先后现成了以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为代表的典型青铜文化。本文以距今3000年为大致界限，将此前的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主的距今4000～3000年的时段划为辽西青铜时代早期。根据目前考古学研究的进展情况，辽西青铜时代早期除了分布广泛、年限持久因而影响巨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外，还包括有大致与之并行但分布偏东北的高台山文化、年代较晚的魏营子文化或晚商文化以及某些尚待定性的考古学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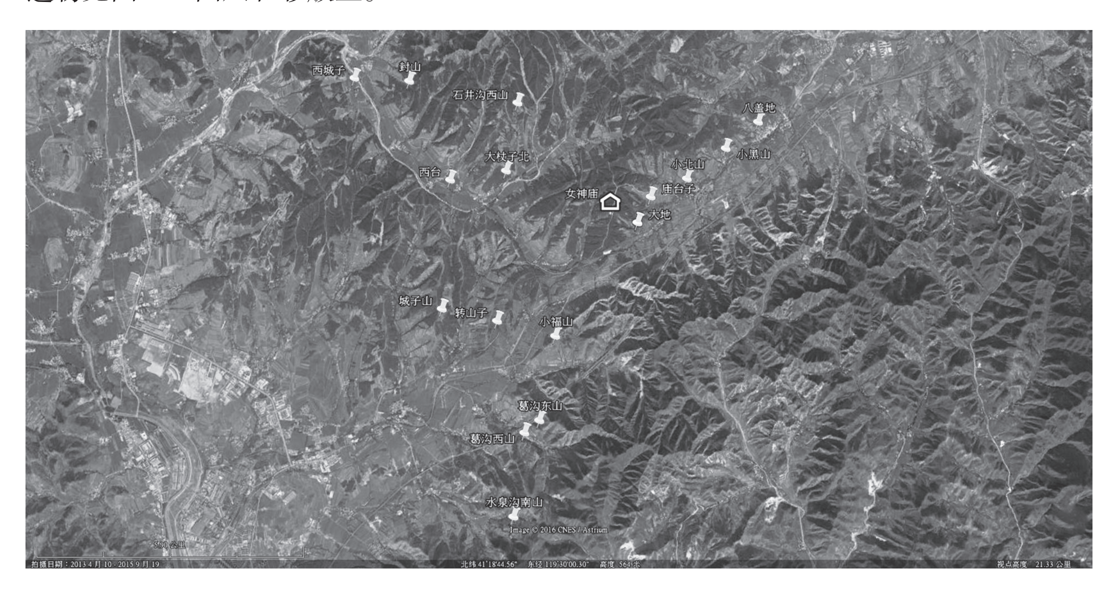
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冶金技术研究已发表的成果有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铜器［1］、凌源县牛河梁两处炼铜遗址［2］、翁牛特旗尖山子炼铜遗址冶炼技术［3］、克什克腾喜鹊沟采矿遗址［4］～［6］、赤峰二道井子遗址出土铜器的研究［7］等。本文仅报告上述遗址的新发现与近年新见的古矿冶遗址。

一、牛河梁炼铜遗址群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牛河梁调查发掘红山文化遗址过程中，发现了转山子（13地点）、小福山（14地点）两处遗址含有炼铜炉壁残片，并发掘了前者。李延祥等发掘期间曾到遗址考察，取得了这两处遗址的炉壁等样品，后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了其冶炼红铜的属性并复原了炼炉的上部结构，并通过热释光年代测定指出

炼铜炉壁的年代要晚于红山文化，落入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范围之内[8]。上述结果发表后，有学者曾当面提出异议，认为热释光年代测定结果误差较大，不能排除牛河梁上的炼铜遗物属于红山文化的可能。安志敏先生则以上述结果为部分论据对把红山文化作为“文明曙光”的看法提出批评[9]。牛河梁炼铜遗物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冶铜实物资料涉及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及对红山文化的属性判断等重大学术问题，牛河梁上还有多少遗址含有同类遗物、其年代和文化属性如何，都需要开展深入的探究。

出于上述考虑，在建平县、凌源市博物馆的指导下，在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的基础上，作者等2010年开始5次对牛河梁管理区进行炼铜遗址的寻找考察，至2015年底共计对40余处遗址进行了考察及复查，按特征明显的炼铜炉壁和炉渣的出现为依据，确认了建平县庙台子、小黑山、小北山、八盖地和凌源市封山、西城子、西台、大杖子北、石井沟西山、城子山（16地点）、葛沟东山、葛沟西山、水泉沟南山共13处遗址也含有炼铜遗物，另有大地遗址高度可疑，诸炼铜遗址分布见图一。典型遗址的面貌、遗迹、遗物见图二～图六和彩版五。



图一　牛河梁15处炼铜遗址分布图（2015年）（上为北）

牛河梁保护区内目前所确知15处炼铜遗址由南向北呈丫字形分布，这一分布格局明显与水系分布有关。各遗址出现的冶炼遗物明显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共生，无论是地表考察获得的，还是从地层和灰坑中暴露出来的，都是如此。各炼铜遗址获得的冶炼遗物多寡不一，封山、大杖子北、葛沟东山、庙台地、小北山、小黑山、八盖地发现冶金遗址较多，每个遗址数量可达数十块，葛沟西山、城子山（16地点）、石井沟西山发现的较少，个别遗址如水泉沟南山仅见炉壁而未见炉渣。

所有黏附在炉壁上的炉渣、单块炉渣经X射线荧光元素分析仪无损检测和部分取样



图二　葛沟东山遗址远望



图三　葛沟西山遗址远望



图四　庙台子遗址远望及谷歌地图中的面貌



图五　从庙台子遗址远望小北山遗址



图六　小黑山遗址含陶片和炼铜炉壁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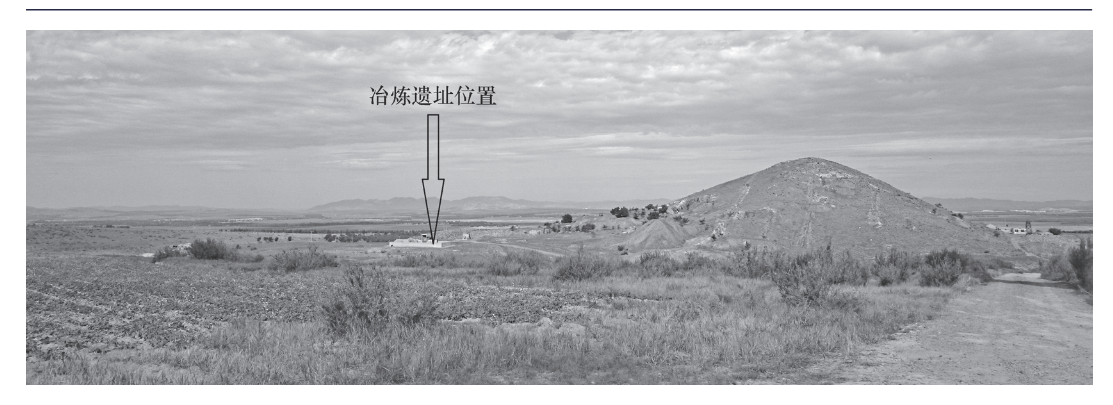
检测，所炼金属与转山子、小福山炉渣冶炼金属相同，皆为红铜。

从地表、地层与灰坑伴生陶片看，牛河梁所见所有冶炼遗物应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无疑。为进一步确认这些冶炼遗物的年代，对小黑山遗址、八盖地遗址灰坑与冶炼遗物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陶片共出的三个木炭样品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使用AMS^{14}C年代测定结果为：小黑山JPXHS-H1（北大编号BA131413），实测年代为3385 ± 25BP；八盖地JPBGD-01（北大编号BA131415），实测年代为3265 ± 30BP；八盖地JPBGD-02（北大编号BA131416），实测年代为3495 ± 25BP；经牛津最新校正程序OxCalv4.2.4校正年代分别为1744BC ~ 1624BC（95.4%）、1619BC ~ 1458BC（95.4%）、1891BC ~ 1746BC（95.4%），完全落入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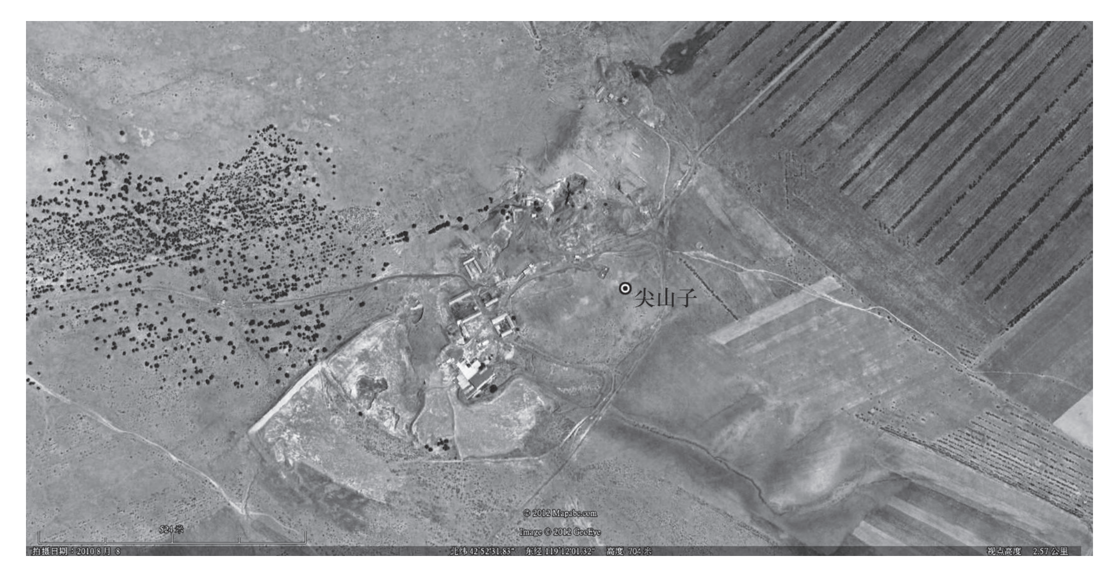
二、翁牛特旗尖山子、克什克腾旗哈巴其拉炼铜遗址

1. 翁牛特旗尖山子炼铜遗址年代科学测定

尖山子炼铜遗址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镇崔家营子村东约4千米处的尖山子（又称“敖包山”）东南侧圆形土丘上，面积初步估算约1000平方米（图七、图八）。



图七　尖山子炼铜遗址远望



图八　谷歌地图所见之尖山子遗址（2009年）（上为北）

该遗址使用尖山子矿区含铜锌为主的共生氧化矿石还原冶炼生产红铜，因矿石含有较高的锌矿物，因而形成含锌较高的炉渣。

李延祥等曾综合伴生陶片类型等信息，初步判断尖山子炼铜遗址年代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10]。

2014年在复查尖山子炼铜遗址的样品时，在炉渣样品中发现夹杂有木炭颗粒，经提取获得直径约2毫米的^{14}C样品一块，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使用AMS^{14}C年代测定结果为：北大编号BA140222，实测年代为2960 ± 30BP，经牛津最新校正程序OxCalv4.2.4校正年代为1263BC ~ 1056 BC（95.4%）。

在古代炼铜炉渣中的木炭颗粒是冶炼燃料木炭的残留物，古代冶炼使用的木炭皆为直径越小因而树龄较短的树木烧制，因而残留在炼铜炉渣中的木炭颗粒能够很好地代表冶炼活动的年代。尖山子炼铜遗址的这一^{14}C年代测定结果指向了辽西青铜时代早期

的偏晚时段，已经晚于通常所界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下限。该遗址地表采集的陶片破碎严重（彩版六），目前尚难以认定其明确的文化属性，以前的报道[11]仅据其陶质和表面纹饰初步认定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现在看来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确定其文化属性。

2. 克什克腾旗哈巴其拉炼铜遗址

位于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哈巴其拉村西南呈东西向分布的山梁上。整个遗址呈扇面状，西高东低，西端顶部宽约200米，东端最窄处约为70米，长约500米。遗址北侧现为一季节性小河，南侧为一大冲沟，西端坡度急剧下降并大部被冲沟截断，仅余西南角约40米宽通道与另一较高山丘相同（图九、图一〇）。遗址曾开垦为农田，现已退耕但尚留有田垄痕迹。



图九　哈巴其拉炼铜遗址远望（上为西）



图一〇　谷歌地图所见哈巴其拉炼铜遗址（2011年）（上为南）

该遗址系由李延祥等于2014年4月25日考察途中见其西端有大量盗掘迹象而发现，并于2014年10月3日连同克什克腾旗博物馆韩立新等复查。2014年4月25考察发现遗址东端入口处有小面积辽代遗迹（部分被冲沟所毁），辽代遗迹南侧道路两侧发现数处盗掘坑，在掘出土壤中发现有典型的红山文化陶片，道路上也可见破碎的红山文化陶片。遗址中部向上开始见有细碎陶片并逐渐增多，从陶质上大致可分辨分别出大部分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少量属于晚期者（夏家店上层文化），近西端顶部出现数十座盗掘坑，其中有部分盗掘坑，掘出土中出现人骨、兽骨，并有大量陶片。所见陶片分为两种，数量较多的是为陶质偏灰、偏红的并带有绳纹、花边口沿等纹饰，类似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图一一），明显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仅见夹砂红陶质的实心三组器足。2014年10月3日复查于一新盗掘坑掘出土中发现与早期陶片相混合的数十块大小不一的铜矿石（图一二）。两次考察都在遗址中部至顶部地表采集到细小的炉渣残块，部分盗掘坑掘出土中也发现有炉渣和炉壁的残块，其中一块较大的炉壁残片内部有灰白色烧结渣层，并带有一鼓风孔（彩版七，1），与牛河梁炼铜遗址群所见炉壁残片结构相同。

经X射线荧光元素分析仪无损检测，初步判断遗址所出矿石为铜锡砷共生氧化矿石，块度较小的炉渣为冶炼产物为铜锡砷合金，但图一二等数块较大带孔炉壁内黏附炉渣内含锡量甚高，含铜量较低，应是冶炼锡的遗物。



图一一　盗掘坑掘出土中拣选的早期陶片



图一二　盗掘土中发现的铜矿石

综上，哈巴其拉是一处涵盖有红山文化、疑似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在遗址中部以上存在有矿石、炉渣等炼铜遗址，矿石与炉渣与青铜时代早期陶片共生。该遗址其冶炼遗存属于何种年代、其具体冶炼内涵，有待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揭示。该遗址所出的与牛河梁炼铜炉壁结构相同的炉壁遗物及其初步判断为冶炼金属锡的无损检测结果更值得特别关注。

三、克什克腾旗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

依和沃门特（汉语意为“园林子”）采矿遗址是在2011年6月30日喜鹊沟采矿遗址发掘期间由李延祥、陈建立、韩立新等根据安乐锡矿矿工提供的线索发现的，并于2014年10月3日复查。遗址位于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音查干苏木境内热阿线公路57千米处西北侧山坡上，属于著名的黄岗梁铁锡矿区的一部分（图一三）。



图一三　谷歌地图所见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2012年）（上为西）

遗址已知范围南北长约500米，宽约150米，地表显露有明显的古代露天开采矿坑30余处，所有矿坑都沿着矿脉方向从山底向上顶延伸，其中最大者长达300余米（图一四、图一五）。遗址地表可采集到大量的采矿石器（图一六），考察共采集到石锤50余个，石碾盘10余个（图一七）。在现代地质队开掘的探槽中，发现有兽骨、木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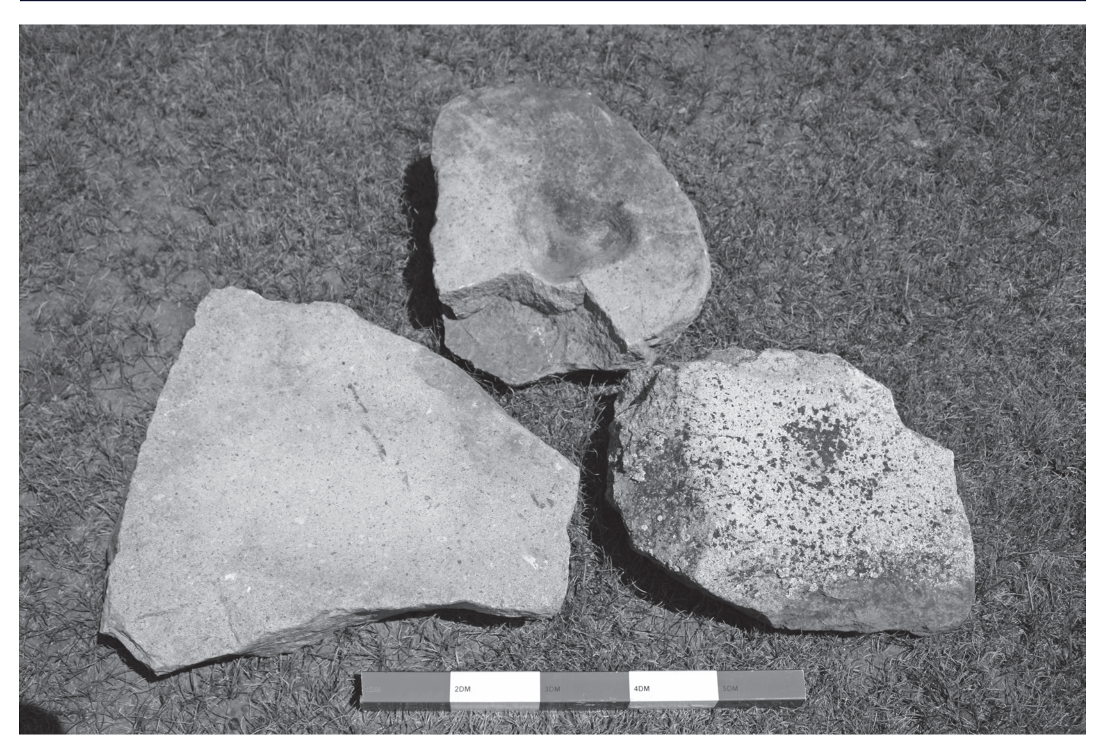
图一四　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古矿坑之一



图一五　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古矿坑之二



图一六　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采集部分石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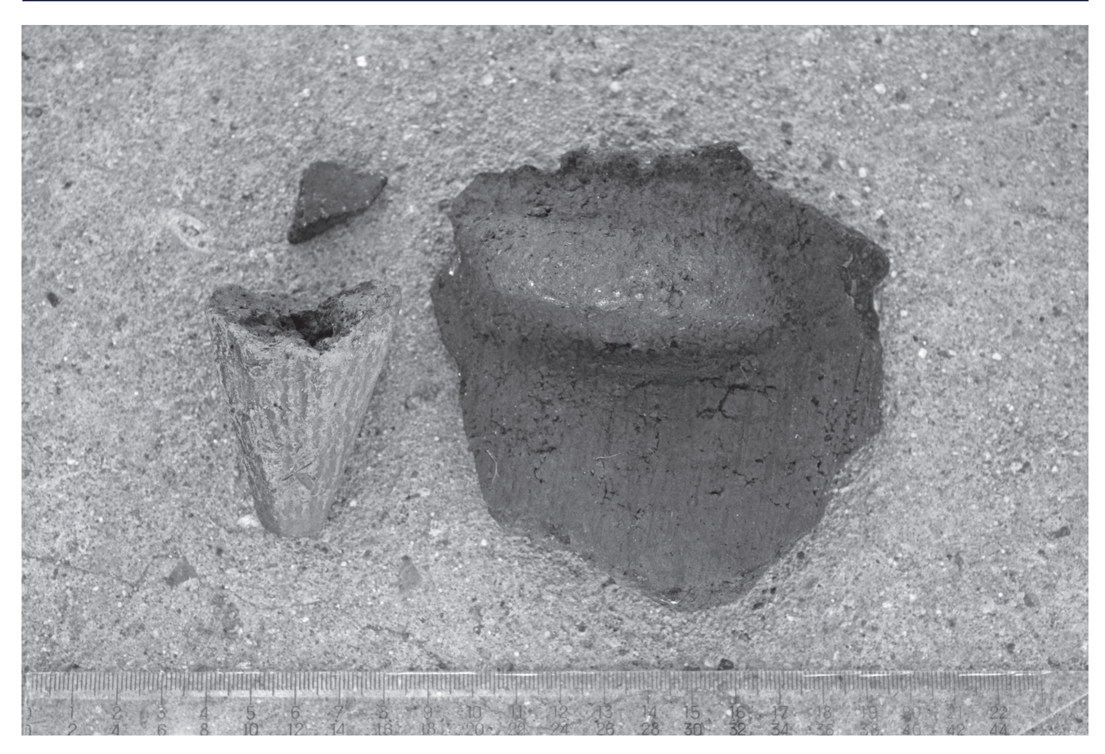
图一七　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采集部分石碾盘

陶片、矿石等出露，采集到的陶片为灰黑色带有细绳纹（图一八）。从古矿坑底部出土的三个样品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使用AMS^{14}C年代测定结果为：木炭YHW-1（北大编号BA130778），实测年代为2920 ± 25 BP，兽骨YHW-2（北大编号BA130780）实测年代为2770 ± 20BP，兽骨YHW-3（北大编号BA130779）实测年代为2665 ± 25 BP，上述测定结果经牛津最新校正程序OxCal v4.2.4校正年代分别为1210BC ~ 1026 BC（95.4%）、978BC ~ 842BC（95.4%）、845BC ~ 793BC（92.4%）。

目前遗址所在地西侧正由某矿业公司进行基本建设，为地下开采做准备。据该公司矿工反映，遗址附近的公路南侧，还有同类遗迹存在。

依和沃门特遗址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一处锡多金属共生矿，大量存在的石碾盘表明古人能够从开采的矿石中重选出锡矿物，故古人开采的目的应主要是获得锡矿物。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属性通过陶片的类型可初步判定为属于青铜时代早期，与喜鹊沟采矿遗址属于同时期，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王立新将根据喜鹊沟采矿遗址的发掘资料提出“喜鹊沟类遗存”[12]同样适合于该遗址。

目前该遗址保存基本完好，虽曾因现代探矿槽的开掘有所破坏，但古矿坑主体部分未遭破坏。遗址有被进一步破坏的可能，现代采矿工作已经开始毁损遗址的西部。亟须开展保护。遗址所在地具有极好的交通条件，地近著名的阿斯哈图石林，有良好的展示条件。



图一八　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矿坑底部出土陶片

综上，依和沃门特采矿遗址是目前赤峰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较大、保存最好的采掘早期锡多金属矿的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展示意义，故须加以法律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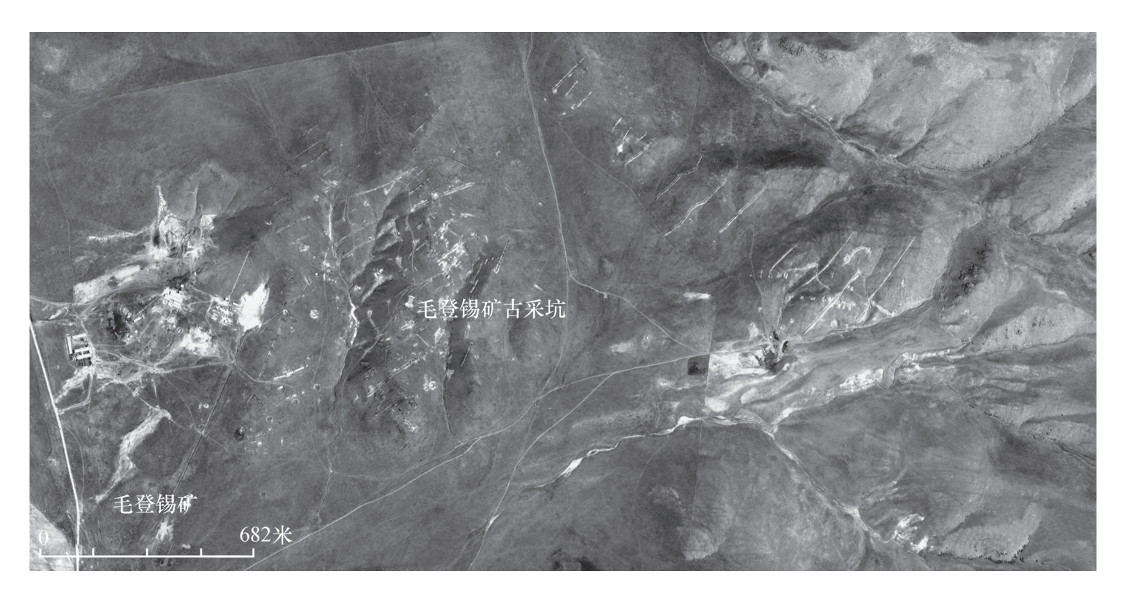
四、锡林郭勒盟采矿遗址

1. 锡林浩特市毛登采矿遗址

位于锡林浩特市东北50千米处毛登牧场内（图一九、图二〇）。毛登矿区1959年内蒙古地质局126队发现，至1989年主要由109队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为开采期）。毛登锡矿为产于燕山早期阿鲁色格山似斑状花岗岩、花岗斑岩体南西边缘及接触带（下二叠统达里诺尔组中火山岩段杂砾岩）中，受断裂控制的岩浆期后高、中温热液矿床。共圈出北西走向锡矿体262个（有工业意义的109个）。分三个矿脉带（Ⅰ、Ⅱ、Ⅲ号）。截止2004年12月31日毛登矿区锡矿（及伴生元素）资源储量为：锡5817.61吨（品位0.79%～1.735%），铜2209.85吨（平均品位1.85%），银2.78吨（品位32.09克/吨），三氧化二钨39.68吨（品位0.086%），锌1237.99吨（品位6.994%），保有锡3162.89吨[13]。据上可知，毛登矿区产出的矿石应是锡铜多金属共生矿。



图一九　毛登采矿遗址远望



图二〇　谷歌地图所见毛登采矿遗址（2013年）（上为北）

2013年7月，李延祥、席光兰等到毛登矿区考察。由于矿区已有近30年开发现代开发历史，并正在进行地质勘探，仅确认了一处古矿坑（图二一），并在该矿坑附近采集到典型采矿石器2枚（图二二），但由于该古矿坑表土及植被覆盖较好，未能见到陶片及文化层出露。

2. 锡林浩特市石灰窑采矿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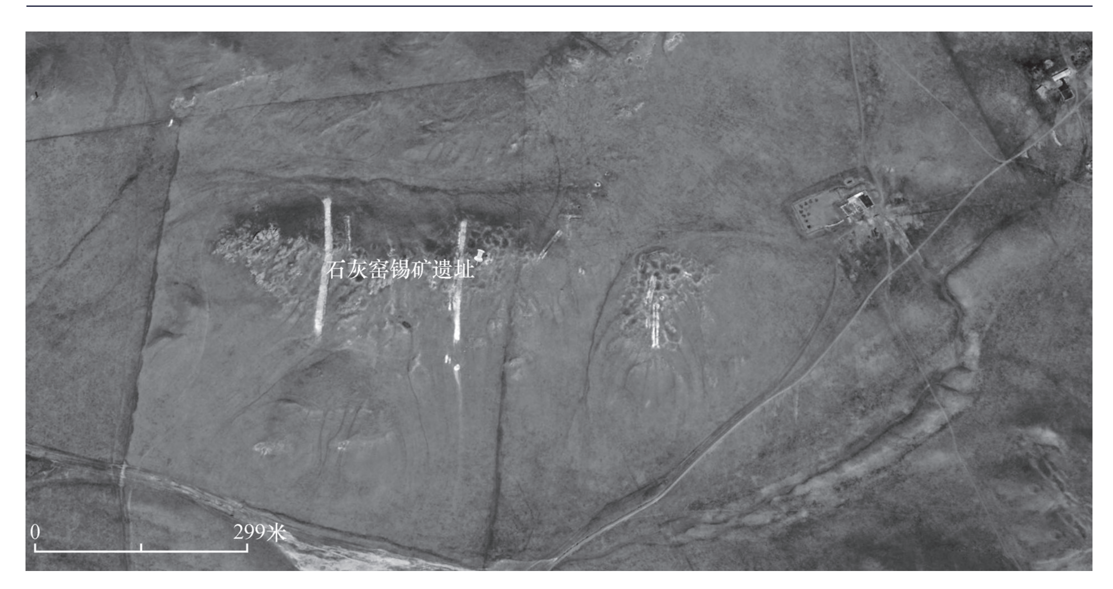
位于锡林浩特市东偏南54千米处白音锡勒牧场内（图二三）。2013年7月李延祥、陈建立、席光兰等考察确认，2013年10月与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所共同复查，2014年4月再次复查。



图二一　毛登采矿遗址古矿坑（中间草高处）



图二二　毛登采矿遗址发现的石锤



图二三　谷歌地图所见石灰窑采矿遗址（2011年）（上为北）

矿区位于锡林浩特市东南63千米白音锡勒牧场，交通较方便。地矿部门曾对该矿进行以钨、锡、稀有金属矿产为主的综合普查工作。地质资料显示该矿为锡稀有金属共盛况，为燕山期花岗岩在封闭环境中由岩浆热液蚀变和交代成矿，蚀变矿化发生于岩体顶部。20世纪80年代勘探经做工作初步查明Ⅱ、Ⅳ号矿体局部地段铷、钽、铍等稀有金属含量，并圈定了矿体，个别地段有锡矿化。查明铷赋存于天河石中，铍赋存于绿柱石中，铌钽呈铌钽铁矿方式存在。计算了D级储量：五氧化二（铌+钽）2991吨，氧化铍1261.3吨[14]。该矿区目前正按稀有金属大型矿床进行勘探。

考察在石灰窑矿区长约700米，宽约300米范围内存在大小矿坑近百个（图二四），采集到大量采矿石器（图二五），未能采集到陶片等伴生物。

石灰窑矿虽然按现代矿产资源划分归类为稀有金属矿，但该矿所产稀有金属在古代无利用价值，古人较大规模地开采此矿的目的应是针对锡矿化地段的锡矿资源。

3. 太仆寺旗千斤沟采矿遗址

遗址位于太仆寺旗旗府宝昌镇正东直线距离27千米之千斤沟乡二联村西（图二六）。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09地质队20世纪80年代地质普查报告称该矿区共69个矿体，长25～126米，厚0.5～4.05米，平均品位0.245%，储量D级表内锡816吨，表外422吨，并记录有古采坑，年代不详[15]。

李延祥等于2012年10月18日至矿区考察发现采矿石锤及古矿坑，并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博物馆、锡林郭勒盟及太仆寺旗文博工作者于2013年5月17日进行了复查。考察确认了10余条古矿坑，其中最长的沿山梁伸展，长约100米（彩版七，2）。考察采集到采矿石器20余件（彩版八，1），地表采集的矿石（彩版八，2）经X射线荧光元素



图二四　石灰窑采矿遗址古矿坑



图二五　石灰窑采矿遗址石锤



图二六　奥维地图所见千斤沟采矿遗址（上为北）（2015）

分析仪无损检测确认为锡矿石无疑。经该矿老矿工回忆，古矿坑中曾出土有陶器，但已丢失。作者等两次考察皆曾努力寻找陶器等文化年代标志物，但未有收获。

五、结　语

辽西青铜时代早期矿冶遗址就数量而言已达20多处，其中文化属性和年代已有基本判断的包括牛河梁保护区15处冶炼遗址、翁牛特旗尖山子和克什克腾旗哈巴其拉2处冶炼遗址、克什克腾旗喜鹊沟和依和沃门特2处锡多金属采矿遗址，另有锡林郭勒盟毛登、石灰窑、千斤沟3处文化和年代不明的锡多金属采矿遗址。

从上述遗址的初步研判结果，结合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等遗址出土的早期铜器的研究结果，可初步判断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早期能够单独冶炼金属铜、能够通过重选从锡多金属矿石中分离出锡矿物、能够单独冶炼金属锡，因而在铜器制造时实现了铜锡二元配

料。辽西地区多次出土有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大型礼容器，表明其必然存在有陶范铸造技术。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单独的铸铜遗址，但牛河梁、尖山子、哈巴其拉诸冶炼遗址皆未发现有陶范出现，表明这些遗址的功能主要是冶炼合金原料而不是铸造铜器，由这些遗址提供的合金原料生产铜器的铸造遗址必然存在。上述事实都显示辽西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产业格局具有类似中原地区的先进结构。

辽西地区是中国长江以北最大的锡矿产地，也是目前确知有早期锡矿开采遗址的地区。这为寻找同期中原的锡料来源提供重要的指向。千斤沟锡矿遗址与张家口的直线距离约140千米，与大同的直线距离约280千米，与北京市直线距离仅约230千米。辽西地区的锡矿通过汾河河谷、太行山东麓的完全可能输入中原地区。商人起源的幽燕说、商先王与有易氏的传说、先商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辽西早期铜器与中原铜器在类型学方面的联系等诸多学术探讨都表明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早期与中原地区的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物质基础之一可能就是辽西地区的丰富的锡矿资源，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早期（至少是其晚段）的青铜产业甚至可能是中原大的青铜产业的一部分。此外，辽西青铜时代早期锡矿冶遗址的发现也为探讨朱开沟文化的青铜原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实现对辽西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冶金技术以及上述学术判断与否的全面揭示，本文的发现仅属初步，尚需开展更深入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开展已知遗址的复查和实验室研究，获得充分的田野考察实物资料，实现对毛登、石灰窑、千斤沟等遗址的文化属性和年代判定，开展针对哈巴其拉遗址冶炼技术属性和科学年代测定。二是通过同位素、微量元素等示踪手段建立诸采矿遗址与冶炼遗址的物料供应关系的揭示。三是进一步寻找新的矿冶遗址，大兴安岭南端已知的大小锡多金属矿床多达百余处，一定还有相当数量的矿冶遗址有待发现。牛河梁炼铜遗址群的矿石来源也需进一步寻找。四是在高等级遗址上寻找铸铜遗迹遗物，尤其是寻找陶范铸造的线索。五是加强锡林郭勒盟与张家口地区的冶金考古工作，填补这一重要区域的空白。

注　释

［1］ 李延祥，贾海新，朱延平. 大甸子墓地出土铜器初步研究［J］. 文物，2003（7）.

［2］ 李延祥，韩汝玢，宝文博等. 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研究［J］. 文物，1999（12）.

［3］ 李延祥，董利军，杨菊等. 内蒙赤峰翁牛特旗尖山子炼铜遗址考察［J］. 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11（7）.

［4］ 李延祥，陈建立，朱延平. 克什克腾旗喜鹊沟古矿遗址考察［A］，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5］ 王立新，李延祥，曹建恩等.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14（9）.

［6］ 王立新，付琳. 论克什克腾旗喜魏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J］. 考古，2015（4）.

［7］ 王永乐，梅建军，陈坤龙等. 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A］，边

疆考古研究（第13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8］ 同［2］.

［9］ 安志敏. 论“文明曙光”与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实证［J］. 北方文物，2002（1）.

［10］ 同［3］.

［11］ 同［3］.

［12］ 同［5］.

［13］ 内蒙古第八地勘院. 毛登矿区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M］. 北京：全国地质资料馆，2005年，档案号100495.

［14］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石灰窑稀有金属矿区初步普查地质报告［M］. 北京：全国地质资料馆，1986年，档案号75131.

［15］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09地质队.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千斤沟矿区锡矿初步普查地质报告［M］. 北京：全国地质资料馆，1987年，档案号75104（1）.

Metallurgical Sites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the Liaoxi Region

Li Yanxiang　Xi Guanglan　Li Chenyuan　Han Lixin　Li Bo　Chen Li
Chen Jianli　Wang Lixin

Abstract: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the Liaoxi Region takes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as the mai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ends about 3000BP. The smelting sites belonging to this period are the group of smelting sites in Niuheliang（牛河梁）, the smelting site of Jianshanzi（尖山子）in Ongniod Banner（翁牛特旗）, the smelting site of Habaqila（哈巴其拉）in Hexigten Banner（克什克腾旗）. The mining sites of this period include the Xiquegou（喜鹊沟）mining site, Yihewomente（依和沃门特）mining site in Hexigten Banner, there are also three mining sites in XilinGol League（锡林郭勒盟）which need chronological clarification. All the mining sites above are of tin polymetallic ore. The report will try to reconstruct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bronze metallurgy industry in the Liaoxi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field searches and the study results in laboratory,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tin source in Liaoxi Region supplies to the Central Dynasties in the Bronze Age.

Key words: Smelting Sites; Liaoxi Region; Early Bronze Age

从彩陶、冶铜术的出现看早期中外文化交流

宋亦箫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430079）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学者们将研究的触角不断向前延伸，希望能找到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景况。但越往前，考古学便越受倚重。一些物质资料成为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蛛丝马迹。例如彩陶和冶铜术，尽管前人曾或隐或显拿出这两类物质文化作为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证迹。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在少数，甚至成为更主流的观点。因此仍然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前史

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国外学者在接触中国文化后，因有中外两方面的资料之便，其研究要早于中国学者。17、18世纪，在考古学尚未诞生之际，一些学者（教士）在泛埃及论的基础上主张中国文化埃及传入说[1]。19世纪，法国学者拉克伯里力倡中华民族迁自巴比伦[2]，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则进一步发挥拉氏之说[3]，1913年，英国教士鲍尔也提出与拉克伯里相同的观点[4]。这些“中国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发现石器时代遗址后，自然都偃旗息鼓。且他们表达的是中国文化的整体外来，也不属于本文要讨论的中外文化接触问题。

真正属于探讨中外早期接触的命题，要到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且认为这是中国固有的土著文化后才算开始。中国发现石器时代遗址后，安特生[5]、阿尔纳[6]、高本汉[7]等人认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是外来文化因子，也即是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一支以彩陶为代表的先进农业群体，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汇入原有的文化中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中国史前文化[8]。但他们在判定彩陶西来的路径时想当然地认为是新疆、甘肃，结果未得到后来的考古发现的支持，这使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将信将疑。阿尔纳则认为除了彩陶，仰韶遗址所出鼎、鬲、小口尖底瓶、石环、贝环等也是从西方起源的[9]。这种认识在现在看来显然不符合事实，正是这些错误认识夹杂在一起，使得他们的基本观点“彩陶西来说”不仅未能得到巩固反而受到了强烈批评。

1923年，两位法国神甫兼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发现了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

代遗址，揭开了该遗址中的勒瓦娄哇技术与西方关联讨论的序幕[10]，将中外文化接触问题一下子提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场讨论也一直延续到当下。

苏联考古学家列・谢・瓦西里耶夫出版于1976年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11]，是探讨中外早期接触问题的里程碑式著作。他提出的“梯级–传播”理论，有别于传统的文明起源一元论或多元论。如果说此前中国文明起源是在西源说和本土说之间的争论，瓦氏提出的则是“融合说”[12]，即从上古开始，中外之间、东西方之间便发生了文化接触，外来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13]。大多数中国学者不认同瓦氏的结论，仅将瓦氏著作作为了解域外传播论派的一个窗口和批判中国文化外来说的一个靶子。只是，那些用以批判的依据，比起瓦氏的论据更成问题。

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向为中国知识界所津津乐道。但我们的乐道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乐道于李约瑟在书中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推重，却有意无意忽视李约瑟反复提到和肯定的诸如中国远古天学知识的巴比伦来源[14]、冶铜术的单一起源[15]等观点。如果客观评价李约瑟思想，他重视文化传播论派，认为中国远古文化有受到西方影响的观点一样是真知灼见。

当下，夏含夷[16]、梅维恒[17]、马洛瑞[18]、蒲立本[19]、胡博[20]等汉学家从更精细、具体的研究中继续追索中外文化的早期接触问题，是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要特别借重的力量。

中国学者呼应国外汉学中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和文明起源问题，始于20世纪初年。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纷纷接受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巴比伦来源说，但这种接受有它的目的：作为排满革命的学术依据。因此政治考量大于学术理性。时过境迁，也就很容易放弃这一主张。只有郭沫若、苏雪林、凌纯声、杨希枚等在专深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坚持和发展。郭沫若透过《释支干》等名篇，一直未曾放弃他关于巴比伦天文学在极早期传入中国的诊断[21]。苏雪林集几十年之功精研屈赋，发现屈赋中存在大量域外文化因子，撰成《屈赋新探》四卷本，在台湾辗转出版，现武汉大学作为百年名典丛书在大陆予以再版，形成完璧[22]。凌纯声曾写出大量篇什探讨中外文化交流问题，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一本论文集和五本专刊中[23]。杨希枚研究过殷墟人骨，认为其异种系的可能性大于同种系[24]，他还长期搜集过可资比较的中外纹饰资料，后来交给芮传明和余太山，由他们写成《中西纹饰比较》著作，成为透过古代纹饰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佳作[25]。

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外文化早期接触问题上，做着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以精细的论证在清算过去汉学家的一些失误。例如严文明先生的名文《甘肃彩陶的源流》，论证出甘肃彩陶东早西晚，而不是安特生等人预想的西早东晚，因此否定了新疆、甘肃乃彩陶东来通道的看法。中国学者以此文所奠定的结论，否定了安特生等人的中国彩陶西来说。但其实，严文的结论只能否定掉甘、新是彩陶东来的通道这一设想，如果世界彩陶确系一源，除了甘、新，还是可以有其他通道连接中外的。比如中国北部边缘的欧亚草

原。另一方面，是拓展并细化对中外文化早期接触问题的研究，例如李水城[26]、刘学堂[27]、杨建华[28]对中国早期铜器与域外关系的讨论，袁靖[29]、赵志军[30]对家培动植物中可能属外来动植物的讨论，都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和支持，我们将在本文中秉承他们的研究思路，但也会提出不一样的外来文化传播路径和首入地问题。

吴耀利先生曾连续著文讨论中国彩陶的起源问题[31]。他通过世界彩陶的大范围比较，在肯定世界早期彩陶有共同特征的前提下，得出中国彩陶是独立起源、其起源地在关中的结论。笔者感谢他梳理世界彩陶时所提供的广泛资料线索，但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后文将辟专节探讨。

总之，关于中外文化早期接触问题，虽经历了三四百年断断续续的研究，经过了几次主流观念的反复，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和成果，但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现今，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外来文化的传播路径和传入地上。笔者将为此提出既能坚持外来文化影响过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能部分弥合反对意见的新看法，其不当之处，请方家多多指正。

进入正题之前，我还想说说在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过程中，中外学者最容易犯的两个思维误区：一是认为早期中外文化交流，新疆是必经之地。20世纪初期，中外学者在这种错误思路和逻辑上建立起来的中外早期联系，经后来者论证出的新疆彩陶、铜器等文化因素的出现明显晚于其东西两侧的东、中亚这一观点的驳难，而被“合理”推翻。正反双方之所以都认可这种驳难，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新疆乃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必经之地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发现新疆承担不了这个重任，就只好推倒中外文化早期接触这座大厦。这似乎是一种将孩子连同洗脚水一起倒掉的做法。如果我们能转移视线，将中外文化早期接触地带移出新疆，推至其北边的欧亚大草原，在看似山重水复之际，或许柳暗花明，别有洞天。

第二个思维误区只在中国学者中出现，那便是：以本民族自创自发文化为荣，以采借吸纳他族文化为耻。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思维定式作用下，部分中国学者感情上、主观上就反感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受到过外来文化影响的观点，他们在批驳、反证中外文化有早期接触并大受影响的观点时就难以做到客观公正。而这正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今日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只有克服掉上述两种思维误区，才能放下包袱，重新前进。

二、世界彩陶的流布及首入东亚大陆的地点和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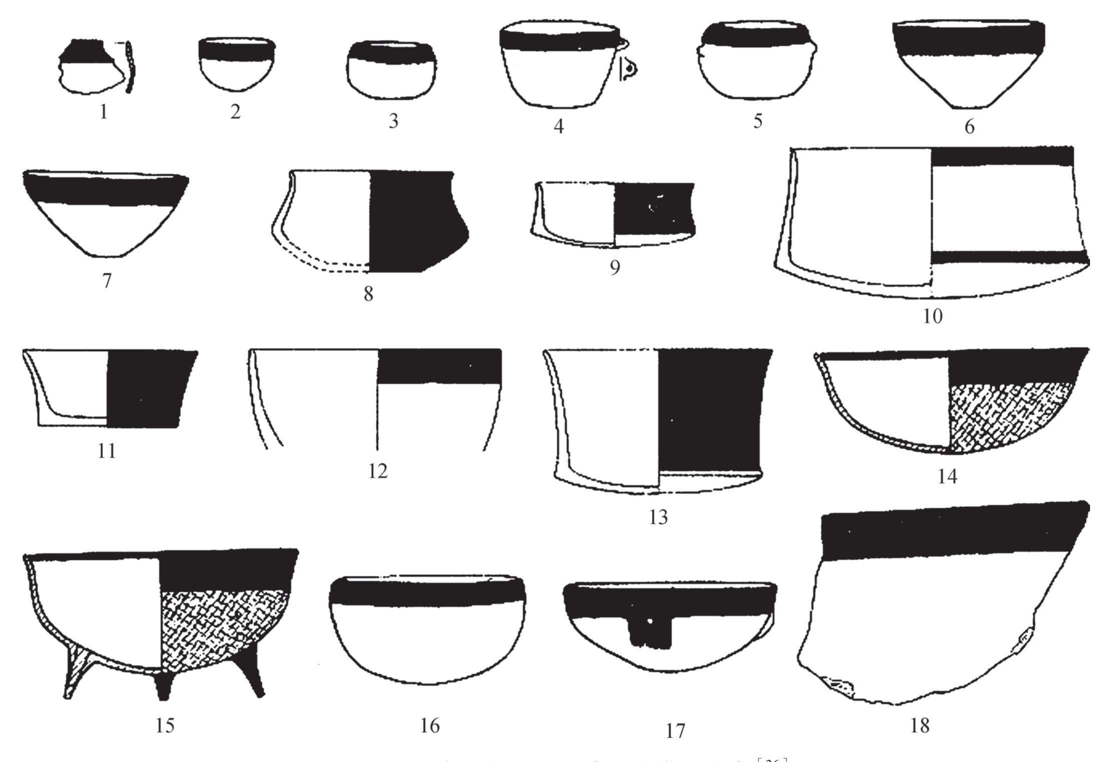
有学者认为，中国彩陶的出现和消失，明显地是一种运动、一阵文化风。中国的东部、东北部、东南部，甚至西南部，受彩陶的影响都没有中原或西北部那么深厚，彩陶花纹的呈现亦不过是中原式样的延续、分支或整理，更重要的是出没期恰好较中原滞后[32]。这是说中国彩陶本身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是一场有头有尾的流行风。其“头”

在关中地区[33]。

既然中国彩陶有相同的源流关系，而彩陶并不仅见于中国，在亚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从东亚的黄河流域，一直向西延伸，经中国的甘肃和新疆、中亚、伊朗、乌克兰，直到巴尔干半岛，分布着一条长达一万多千米的“彩陶文化带”[34]。那么世界各地区彩陶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它也会像中国内部各地区的彩陶一样，有着共同的源流关系吗？下面试作分析。

尽管亚欧大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形成带状分布，地域上的毗邻关系有助于说明它们之间或许存在源流关系，但还得具备两方面关联，才能坐实这一看法。一方面是彩陶施彩纹饰和观念上的类同；另一方面是各地彩陶出现时间能从空间上排比出时间差，即从起源地到各传播地有一个彩陶渐趋晚出的滞后期。

先看第一个“关联”。在世界各地最早的彩陶中，有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个是彩绘颜料都是以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另一个是纹饰上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图一）[35]。在远古人类的思维意识中，红色代表鲜血和生命，其在陶圆器口沿施一周红宽带纹，体现了早期人类的生殖和再生巫术思想。这种巫术心理和表达方式的同一，将其看作是观念的传播比看作是纯属巧合或心理的一致要更可信得多。



图一　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红宽带纹彩陶[36]

1～5. 土耳其麦辛　6、7. 伊朗西亚克　8～13. 伊朗古兰　14、15. 中国白家村　16、17. 希腊奥特扎克　18. 巴拿马莫拉里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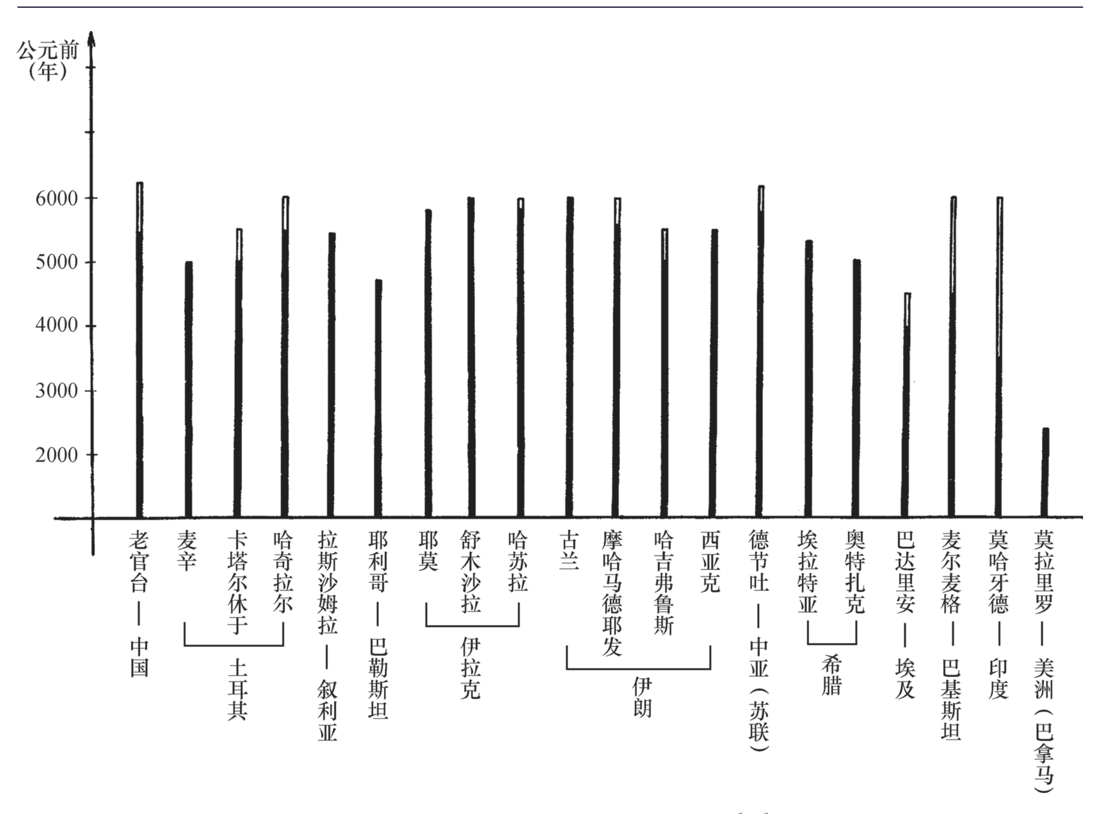
除了最早期彩陶红宽带纹的类同，在彩陶继续发展的中后期，东西方彩陶彩绘纹样的雷同不绝如缕。最有名的是安特生将河南仰韶村、土库曼斯坦的安诺、乌克兰的特里波里三个遗址的彩陶所作的对比（图二）。我们可看到，仰韶与安诺在三角纹、网格纹、睫毛纹、联珠纹，仰韶与特里波里在叶脉纹等纹饰上的相似之处。



图二　仰韶、安诺、特里波里三处彩陶比较[37]

其他纹饰上的共性还有：东西方都有三角纹排成一排形成的锯齿纹；用两个对顶三角形图案表示动物和人物躯体，有的还在这些动物躯体图案内绘上斜格纹和点纹；还有东西方彩陶中互见的“十”字纹、“卐”字纹、横“S”纹、公牛花纹等纹饰。这些大量的相似纹饰，用巧合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只能考虑它们之间存在源流关系才符合实际。那么，它们之间若存在源流关系，谁是源，谁又是流呢？

再看第二个“关联”。吴耀利先生为研究中国最早的彩陶在世界早期彩陶中的位置，曾综合排比过世界各地最早彩陶出现的时间，制成一表（图三）[38]，可资借鉴。由此表可知，西亚的伊拉克、伊朗等地彩陶出现最早，可早到公元前6000年，随后是中



图三　世界各地最早期彩陶出现时间表[39]

亚、叙利亚、土耳其、中国、希腊、巴基斯坦、埃及、美洲等地，各地在彩陶出现的时间上，显然存在一个西亚的伊拉克、伊朗等地最早，其他各地则呈现出与两伊之地越远越晚的趋势。这只能将其解释为世界彩陶以两伊之地为起源，再向其东、西两侧扩散而形成的现象。当然，在扩散传播的过程中，彩陶自身会有丰富和发展，由于不断吸收传播线路上的土著文化因子，彩陶纹饰也会得以丰富和变化。

依据上表，中国最早彩陶出现于公元前5300年左右，属于老官台文化。这似可解释为，西亚彩陶经过一站站接力传递，大约经过了700年便传到了东亚大陆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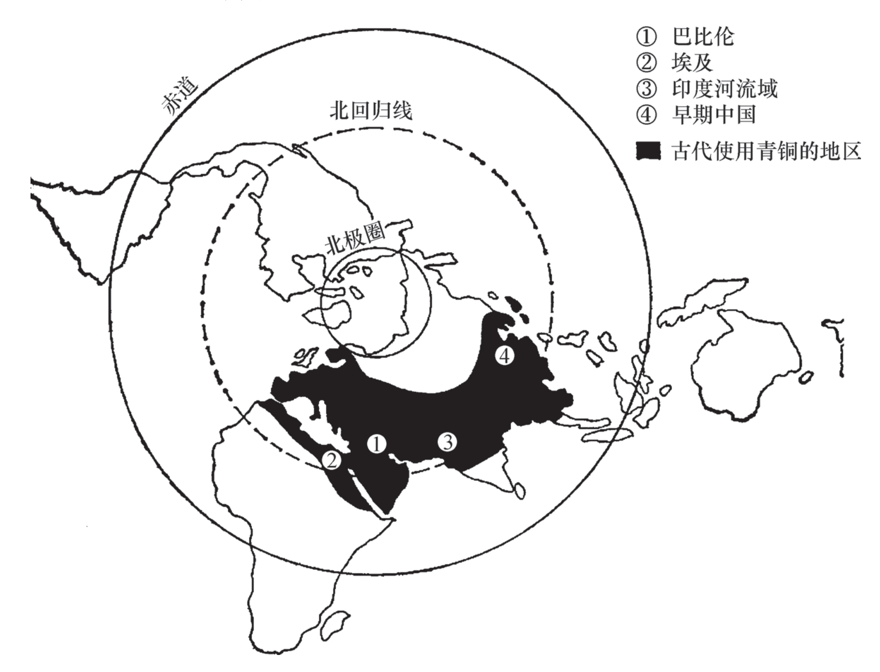
至于传播路径，依据各地彩陶的相似度及存在时间，推定为西亚—中亚—欧亚大草原—中国关中，而不是中外学者一直以来认为或作为反驳彩陶西来靶子的新疆、甘肃“沙漠丝绸之路”一线。严文明先生曾著宏文《甘肃彩陶的源流》，证明甘肃彩陶源于关中，其越往西彩陶出现越晚，从而“否定”了“彩陶文化西来说”，后来新疆彩陶被证实部分来自甘肃，属时代更晚的青铜时代，再次“坚定”了中国彩陶独立起源的信念。殊不知，西来彩陶根本就不是走的丝绸之路，而是其北边的草原之路，率先到达关中后，再分别向东西两侧传播，向东进入河南、山东，向西进入甘青和新疆。所以我们看到的陕甘新（新疆东部）彩陶越往西越晚，正是因为它们传自关中的缘故。

依据老官台文化及其后来的仰韶文化彩陶特点，并与西方彩陶比较，可知西来彩

陶并不是只东传过一次，而是续有东来，至少在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各传来一次。也即是说，以彩陶为标志的中外文化早期接触，有一个持续影响和交流的过程。

三、冶铜技术进入东亚大陆及其本地化

人类发现并利用铜金属始于距今约9000年的安那托利亚地区。约7000年前，人工冶炼的铜制品开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出现，标志着冶铜术的诞生。在进入真正的锡青铜时代以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红铜和砷铜[40]。冶铜术在西亚诞生后，像彩陶一样，逐步向四周扩散。李约瑟对冶铜术的发明曾简洁地发表过看法："确实很难令人相信，青铜的冶炼曾经过多次的发明"[41]。毕安祺（Bishop）曾绘有一幅极圈投影图（图四），标示古代世界使用青铜的地区，将其大略分成四区，其出现青铜的顺序是①巴比伦②埃及③印度河流域④早期中国。这是符合离冶铜术和青铜起源地距离越远青铜出现也越晚的文化传播规律的。



图四　古代青铜使用地区极圈投影[42]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早期铜器和冶铜遗址集中分布于中国西北、中原、北方和海岱（今山东一带）这四个地区。西北地区发现的铜器达千件以上，为数最多，分布最广；中原地区其次，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早期铜器达数百件之多，并出现了礼器；北方地区排第三，已发现早期铜器将近百件，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地区；海岱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最少，总数为20余件[43]。综观这些铜器和冶铜遗存发现地点，都位于中国北方，在铜器数量上甘青和新疆所在的西北地区最多，海岱地区最少。中国早期铜器所在的地

理位置和数量上的分布特征，符合源自近东经欧亚大草原传播而来这一空间背景。

关于中国早期铜器成分，据研究[44]，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和新疆东部的林雅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经历了如同西方多数古代文明一样的红铜—砷铜—锡青铜发展阶段，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甘青河湟地区齐家文化是从红铜发展到锡青铜。但在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也发现了零星几例砷铜。由此我们发现，中国早期铜器成分特征与西方比较，其发展阶段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其一致之处是甘青西部和新疆地区与西方一样，都经历了完整的红铜—砷铜—锡青铜三个发展阶段。它们距西方冶铜术起源中心略近，反映了两者间更紧密的影响关系。其不一致之处是甘青东部和中原地区砷铜器的缺失或微弱。它们距冶铜术起源中心最为遥远，铜器出现时间也最晚。出现这种铜器成分分布特征的合理解释只能是：自西而来的冶铜术，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完整影响到中国北方的西部，但越往东，因距离越远，其影响力渐弱，自主性渐强，形成砷铜缺失或微弱影响，代之以红铜—锡青铜的变易发展模式。这正是中国北方中东部铜器发展特点并率先出现新式器类包括青铜礼器的深层原因。

中国早期铜器的种类，基本是各种小件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小件兵器有刀、短剑、带銎戈、镞等，工具有匕、锥、透銎斧、铲、矛等，装饰品有耳环、扣、泡、镜、牌等，除带銎戈外，这些铜器都可以在欧亚草原铜器中找到原型。而戈是中国的特产，“銎”则是欧亚草原特质，有銎戈便是中外两种文化因素的结合器。二里头文化晚期出现铜容器爵、斝、盉、鼎，显然是利用冶铜技术对传统陶器的仿制创新。因此由早期铜器的种类特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铜器是由域外传来的品类，但也有少数是冶铜术进入东亚大陆后模仿本地陶容器和石器（戈）的创新。

关于冶铜术传入东亚大陆的途径，首先可以排除从新疆到甘肃的这条丝绸之路。因为，最先发现铜器的地方是甘肃东部东乡县的林家遗址，而河西走廊的铜器反倒是从陇东西传而去，甚至传播到新疆东部地区。这种情况类似于彩陶的出现和西传。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冶铜术进入中国的首播地是甘肃东部的马家窑文化区，其传播路径是其北边的欧亚草原和蒙古高原。美国学者胡博认为，驰骋于欧亚草原上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塞伊马-图尔比诺文化等族群，都曾经充当过冶铜术东传的媒介者角色[45]。

我们还要看到，冶铜术进入东亚大陆，并非一锤定音，而是多次断点续传。这跟彩陶传入也非一蹴而就相似。最起码，东亚大陆在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二里头文化等阶段，分别接受过域外冶铜术的洗礼，这也是上述几种考古文化中铜器成分、种类差异的原因之一。

但是，中国北方当时的各文化族群，对于进入本文化的冶铜术，不是照单全收被动接受，而是在自身丰厚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有选择、有创新。二里头文化时出现的泥范模具，更是该文化也是对冶铜术的重大技术创新。它一改过去的石范不精细、不好浇铸容器的缺点，开启了以后近2000年的中国青铜时代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不惟中国冶铜术自北边的欧亚草原南下而来，即便是东南亚冶铜术，据最新研究[46]，也不是从中国中原经逐步过滤，最后剔除掉中原色彩而形成自身特色的过程，而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以南西伯利亚的塞伊马–图尔比诺文化为源头，而进行的长距离、直接与完全的技术传播。尽管这之间可能是传播路径的中国西部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支持这一观点，但不妨碍这一观点的提出。这样，我们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会更有方向性和目标。

四、结　　论

早期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可以追溯到极早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水洞沟文化及其石器制作技术——勒瓦娄哇技术，可看成是最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风向标[47]。其后，历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中国与域外的接触持久而活跃。彩陶、冶铜术等文化因素，成为中外早期接触的最醒目标志，这些文化因子进入中国后，深刻影响了中华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形成。

中外早期接触的通道，在欧亚草原。正是通过它，遥远的中西亚与中国北方的陕甘宁地区、内蒙古以及海岱地区出现了持久的联系和交流。而历史时期形成的“丝绸之路”，只是到了青铜时代才渐有沟通，张骞通西域后才完善巩固，逐渐取代草原之路沟通东西的地位。这正是彩陶、冶铜术最先进入的是陕甘宁地区，而不是新疆和河西走廊的根本原因。

注　　释

［1］江晓源. 中国天学的起源：西来还是自生［A］. 天文西学东渐集［C］.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

［2］Albert Étienne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M］. London: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5.

［3］〔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 支那文明史［M］. 上海：上海竞化书局，1903. 转引自李帆. 拉克伯里学说进入中国的若干问题［A］. 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3 ~ 102.

［4］C. J. Ball, M. A., D. Litt. *Chinese and Sumeria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5］〔瑞典〕安特生著，袁复礼译. 中华远古之文化［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6］阿尔纳著. 乐森璕译. 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M］. 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

［7］B. Karlgren. Andersson’sarkeologiska studier i Kina［J］. *New Society of Letters of Land*, 1924（Vol I）: 142-153.

［8］陈星灿.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1997:125.

［9］同［6］：25.

［10］　高星.悠古神奇水洞沟［J］. 中国文化遗产，2008（4）：72.
［11］　〔苏联〕列・谢・瓦西里耶夫著. 郝镇华等译.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2］　江晓源. 中国天学的起源：西来还是自生［A］. 天文西学东渐集［C］.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2.
［13］　同［11］：362～367.
［14］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第四卷）：7，8.
［15］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第一卷）：85，241.
［16］　a.〔美〕夏含夷. 古史异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b.〔美〕夏含夷. 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7］　梅维恒. 古汉语巫、古波斯语Maguš和英语Magician［A］. 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8］　J. P. Mallory,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M］. Thames&Hudson, 2000.
［19］　Edwin G. Pulleyblank. *Central Asia and Non-Chinese Peoples of Ancient China*［M］. Alder 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20］　〔美〕胡博. 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A］. 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1］　郭沫若. 释支干［A］. 郭沫若全集（第1卷考古编）［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2］　苏雪林. 屈原与《九歌》［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3］　a. 凌纯声. 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b. 凌纯声. 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二十［C］；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十六［C］；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C］；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十［C］；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十五［C］.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24］　杨希枚.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5］　芮传明，余太山. 中西纹饰比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6］　李水城.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J］. 考古学报，2005（3）.
［27］　刘学堂，李文瑛.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A］. 藏学研究（第3辑）［C］.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28］　杨建华，邵会秋. 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J］. 西域研究，2012（3）.
［29］　a.袁靖. 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J］. 文物，2001（5）.
b.袁靖. 绵羊和黄牛何时进入中国［J］. 科学画报，2012（12）.

［30］ 赵志军. 公元前2500～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A］. 科技考古（第二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1］ a.吴耀利. 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起源［J］. 史前研究，1987（2）.
b.吴耀利. 我国最早的彩陶在世界早期彩陶中的位置［J］. 史前研究辑刊，1988.

［32］ 程一凡. 中国考古学中的动静异同［J］. 中原文物，2004（2）.

［33］ 同［31］a.

［34］ 王钺等. 亚欧大陆交流史［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19.

［35］ 同［31］b：95，96.

［36］ 图一引自吴耀利《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文.

［37］ 图二引自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图十三.

［38］ 同［31］b.

［39］ 图三引自吴耀利《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文.

［40］ a.梅建军. 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使用铜器［J］. 科学画报，2012（12）.
b.李水城.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J］. 考古学报，2005（3）：239.
c.华觉明等. 世界冶金发展史［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16.

［41］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241.

［42］ 图四引自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85.

［43］ 梅建军. 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使用铜器［J］. 科学画报，2012（12）.

［44］ a.同［40］b：262.
b.潜伟等. 古代砷铜研究综述［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2）：48，49.

［45］ 同［20］：11～37.

［46］ 乔伊斯・怀特等著. 陈玮译. 东南亚青铜技术起源新论［A］. 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59～89.

［47］ a.侯亚梅. 水洞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兼论华北小石器文化和“石器之路”的假说［J］. 第四纪研究，2005（6）.
b.邓聪. 追寻东方的勒瓦娄哇技术——宁夏水洞沟遗址的世界性意义［N］. 中国文物报，2012-01-06（7）.

Evidence of Earlier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unication: the Emergence of Painted Pottery and Copper Technology

Song Yixiao

Abstract: The evidenc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unication can be found by comparing material object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chaeology.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painted pottery of Neolithic Age, copper smelting technology of Chalcolithic Age and Bronze Age, proving that they each has same origin which is in West Asia. The approach to early China is not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Xinjiang and Hexi Corridor in Gansu, but the Eurasian Grassland.

Key words: Painted Pottery; Copper Technology; Earlier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Grassland Silk Road

巴泽雷克文化早期马面具复原研究

布洛瓦·芭芭拉（Busova Barbara）[1]著　孙　丹[2]译

（1. 格拉巴艺术品保护中心，俄罗斯；2.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得名于巴泽雷克冢，因其良好的保存状况而闻名于世，墓地中发现的动物形马头饰反映了特定的葬马习俗。斯基泰时期有数座贵族大墓非常著名，如Bashadarky和 Tuektinsky冻土墓，虽然这些墓葬被盗掘严重，而且遭到极大扰动，但种种迹象表明墓葬里随葬的马戴着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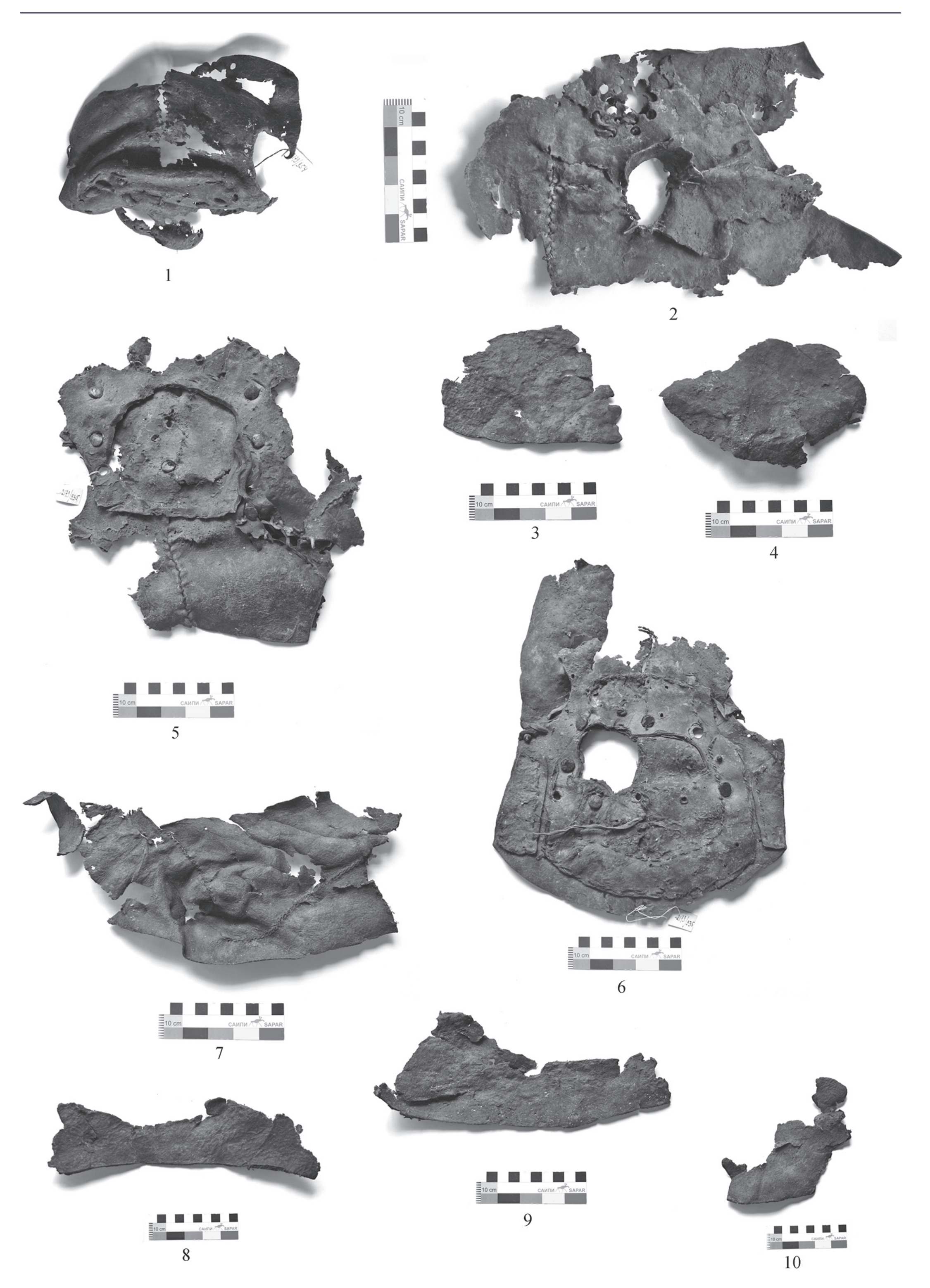
然而，关于这些面具的结构以及如何与马头连接等尚无明确的信息，相关的研究和历史重建仍比较少。Tuektinsky一号墓中出土了零星的马面具材料（图一；冬宫博物馆），但迄今尚未发表，我们的工作即是以这些马面具材料为原型，复原出一个模仿山羊角的木质马面具。我们运用X光荧光分析对它的金属成分进行检测，在显微镜下研究皮质，并对兽首进行利多卡因分析，最后在已构建的复原图表基础上复制了一个与实际大小相同的马头盔。

现在巴泽雷克冢中的马头盔形象已经非常明晰，这要感谢研究者们（Gryaznov, 1950; Rudenko, 1953, Barkova, 1999; Polosmak, Barkova, 2005）和复原者们（Chekhova, 2010）的努力，目前这些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形象的作品在冬宫博物馆陈列。

一、马面具遗物介绍

1. 藏品2179/954（图一，1）

该面具大部分都已严重变形，已经看不到最初固定的绳子，不过还能清晰地识别出在耳朵处打开的部位。枕骨部位的宽度大约为14.4厘米，有一条非常紧实的绳子穿过枕骨，继而在颚骨下方打结。面具用揉搓而成的筋线在耳朵处缝合（Jerusalemskaya，2005，86页）。藏品总长度约为14厘米，耳朵处的直径约为4.6厘米。将这个残片放在马的额部（根据解剖学的知识），那么相连的角则会稍微高于头顶，由于头盔严重变形和之前失败的复原（遗物迅速被风干），我们很难判断出头部被马头饰覆盖了多少。不过通过这件藏品我们能看到Tuektinsky面具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非常厚，而且在头后方固定皮革物两端的缝合非常灵活。



图一　Tuektinsky一号墓马面具残片（Busova V.S.摄）

1. 马面具（编号2179/954）　2. 马面具（编号2179/955～956a）　3、4. 马头盔残片（编号 2179/955～956 b、v）
5. 马面具（编号2179/935a）　6. 马面具（编号2179/935b）　7～10. 马面具残片（编号2179/957a、957b、957v、957g）

2. 藏品2179/935（a、b）

根据S.I. Rudenko（Rudenko, 1960：137）提供的图我们知道Tuektinsky古墓出土了两件面具，但被编在了同一个编号下，保存状况较差，被标记为作用不明的物品，尺寸为：26厘米×31厘米，25厘米×31厘米。二者都是用比较坚韧的筋线缝合了两层厚皮革。内层装饰着青铜铆钉，这可能会刺到动物。藏品a （图一，5）在头部后面、耳朵下方边缘有缝合处，但是缝合点没有保存下来。面具的额部上面被割掉了很厚的一层，下面还保留着，但是已经被损坏了。根据割破的痕迹推测盗墓者并不想把角带走，只是从缝合处割开。另外，盗墓者也没有将铜钉带走。在这附近发现了5～6个铆钉，皮革下面还发现了一个严重氧化的铆钉。整体来看，整个面具破坏严重，许多地方都被割坏，不过里面还有固定毛毡的痕迹，这为复原留下蛛丝马迹。

第二个面具的保存状况较好一些（图一，6）。它也是由两层皮革做成的，已经没有枕骨的部分，但是在内层能清晰地看到两块皮革的缝合。外层是用粗的筋线缝合，在耳朵处留一个孔。还有一块圆形皮革钉在额部，从痕迹推测当时用了10枚铆钉，但是仅保留下5枚。而且还能看到角部曾被人粗暴地切割过。另外，在皮革上还有一条绳子，由颜色鲜亮的皮革制成，作用还不明晰。虽然这个头盔保存并不好，但是仍留下不少有价值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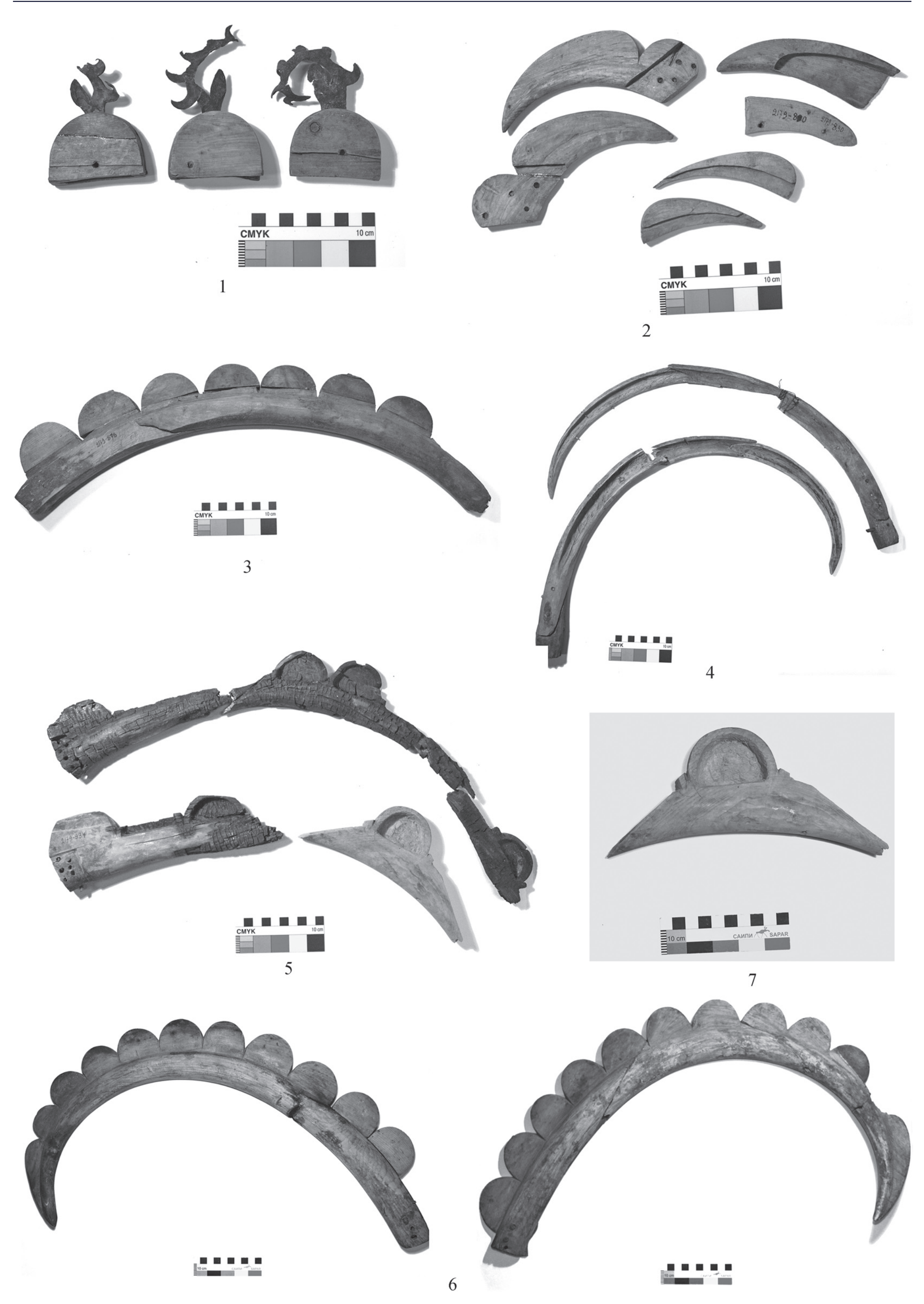
Tuetinsky 和 Barshadarsky 古墓中的马面具上还有雕刻的木山羊角，其中Tuetinsky一号墓里发现了16只这样的角，部分已经被烧坏了，仅残存了一些碎片。墓葬里还发现许多这样用角做成的装饰物（图二；顶端饰和花边饰）。

3. 藏品2179/891～893（图二，1）

花边饰，即木质角上的圆形残片，由两部分组成，并在顶部开一个口以连接皮革顶端饰和动物塑像。平均长6～7厘米，高5厘米，宽2～3厘米。

4. 藏品2179/879（图二，6）

马头盔上面的角，木质，有11块花边饰，其中9个是连着角的基部直接做成的，另外2个是插在插口里（可能还有第12个）。V.P. Melnikov（历史学博士，IAE SB RAS博物馆系主任）初步观察之后认为，这个角是将一片长的雪松木锯开做成的。第二个角可能不是连续制作的，由于工匠的失误，花边饰分成了两部分。花边饰的平均厚度为1.5～1.8厘米，底部的平均宽度为5.2～7厘米，高度为2.5～4.9厘米。整个角的长度为58.5厘米，最底下边缘的厚度为4.8厘米，到顶部逐渐变薄到1.9厘米。连结角和面具的孔的直径为0.7～0.8厘米，总计有4个穿透的孔，其中两个里面还保留着皮带子的残片，因此推测连结的部位在角的下方。



图二　Tuektinsky一号墓出土的马面具上的木质顶端饰（Mylnikov V.P. 和 Busova V. S.摄）

1. 木质顶端饰（编号2179/891～893）　2. 木角尖（编号 2179/887～890）　3. 木角（编号 2179/878）　4. 木角（编号2179/885、886）　5. 木角残片（编号2179/884）　6. 木角（编号2179/879、880）　7. 木角残片（编号2179/883）

5. 藏品2179/880（图二，6）

该马头盔上的角和上述的角很像（根据藏品簿得知是半圆形的），二者不同之处在于该角是从雪松树上直接锯下来的，有12个花边饰（丢失了1个）。整个遗物长约60厘米，花边饰的厚度平均为1.6 ~ 1.9厘米，底部的宽度为6.3 ~ 7.8厘米，高度为3.4 ~ 4.9厘米。只有一个特别长的花边饰（编号2179/879）底部长度为13.8厘米，高度为2.4厘米，宽度为1.5厘米。这两只角都有一个凸面和平的背面。另外有3个穿透的孔来稳固连结部位，孔里面还有粗糙的皮绳残留物，确切来说，只是切割呈长方形、非常粗糙的皮。以上两只角都有切割的痕迹，根据肉眼观察无法复原。

二、复原研究

1. 连结和固定的问题

马头盔中的木质角长达60厘米，每个重500克，一对角则重1千克（作者测量了复制品2179/879、880的重量）。Tuetinsky一号墓中有两个骨笼，上面有开口，并且在最有代表性的残片上有穿孔的痕迹。另外还出土了8对木质角的下半部分，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它们连结面具的方式也各异，以藏品2179/954、2179/955 ~ 956a为例来介绍。

一个被炭烤过的花边饰木质角，它的底部和已经严重变形的皮革面具（藏品2179/954）连结在一起，开口方式是皮革套筒式，由一条皮革绳子连结，很可能还用胶水进行黏合。在两只角的底部花边饰里有一个木质钉子，推测是为了加固，皮革绳子在钉子附近打结，再穿向面具的前额部位。

第二个皮革面具在2179/955 ~ 956a号藏品目录下，还保留着木质残片，与中空的角结合而成。角的底部被单独切割（这里尤为复杂），在套筒下面有缝线的痕迹，并不是用胶水黏合。连接方式即角插到皮革套筒里，再用皮革线在下面缝合，最后加上皮革衬垫，与面具的连接就非常紧实。在角的底部还可以看到铁质别针的痕迹，推测也是为了加固。

复原（藏品2179/879、880）用的木质角是结构最复杂并且争议最多的。我们推测有一条粗的皮革线穿过4个孔，继而固定花边饰，如此还有一定的张力能保持角的稳定。

除了将角放在面具上，保持其稳定性，另外一个问题是避免高处的顶端饰掉落。Berel11号大墓里发现了一个山羊角的雕刻，是从两边用皮革线固定。“先用皮革绳绑住两个角，再将绳子从交叉方向穿过来，绑在处理过的木头上。”（Samashev, 2011：131）

2. 铜钉的成分

我们对Tuektinsky古墓的马面具做了复杂的研究，得以知道各种材料的成分、用途和制作方法。Tuektinsky一号墓中的两个马头盔装饰有铜钉，它们的作用推测一是用来连接角底部的两层皮革，但这样会可能会刺到马；二是很可能只起装饰的作用。我们选了4个钉子，从中采集了5个样本送到冬宫博物馆科技部，用分光仪来研究它们的金属合金成分。其中和铆钉类似的钉子由砷铜制成，这在巴泽雷克文化的金属品中很典型（Dashkovsky, 2007; Kharvin, 2007）。除了少量合金锡（掺杂剂），还有一些其他矿石——锑、砷、铋，但是没有铅，巴泽雷克文化中这样的铜合金非常多见。

3. 通过皮革表面的纹路来确定皮革的来源

在古代，马皮可以制作衣服、容器和腰带等，用途广泛。在农业社会中，其次就是羊用得最多，用羊毛可以做毛毡。在巴泽雷克冢中发现了野猫、松鼠、紫貂、水獭的毛皮，Katadinsky古墓中发现了貂，Shibinsky中发现了紫貂和松鼠皮。观察发现，皮革表皮层的厚度并不一致，表面上有凹槽、脊和突出，里层的结缔组织也是如此，有乳突、背脊和不少的毛发等，而且每种动物表皮的背脊和凹槽的形状各有不同。例如，牛皮的毛囊就大小一样，而且成排分布。牛的年龄越大，毛囊就越大，毛囊间的距离也更宽。山羊皮的毛囊是从大到小成系列的，而绵羊的毛囊则相比而言小一些，而且是成组分布。

编号2179/957 b、c、d面具残片的兽皮保存较好，从毛皮表层的形状可知所用的动物皮种类，而其他面具则难以确定。

4. 藏品2179/957b-4（图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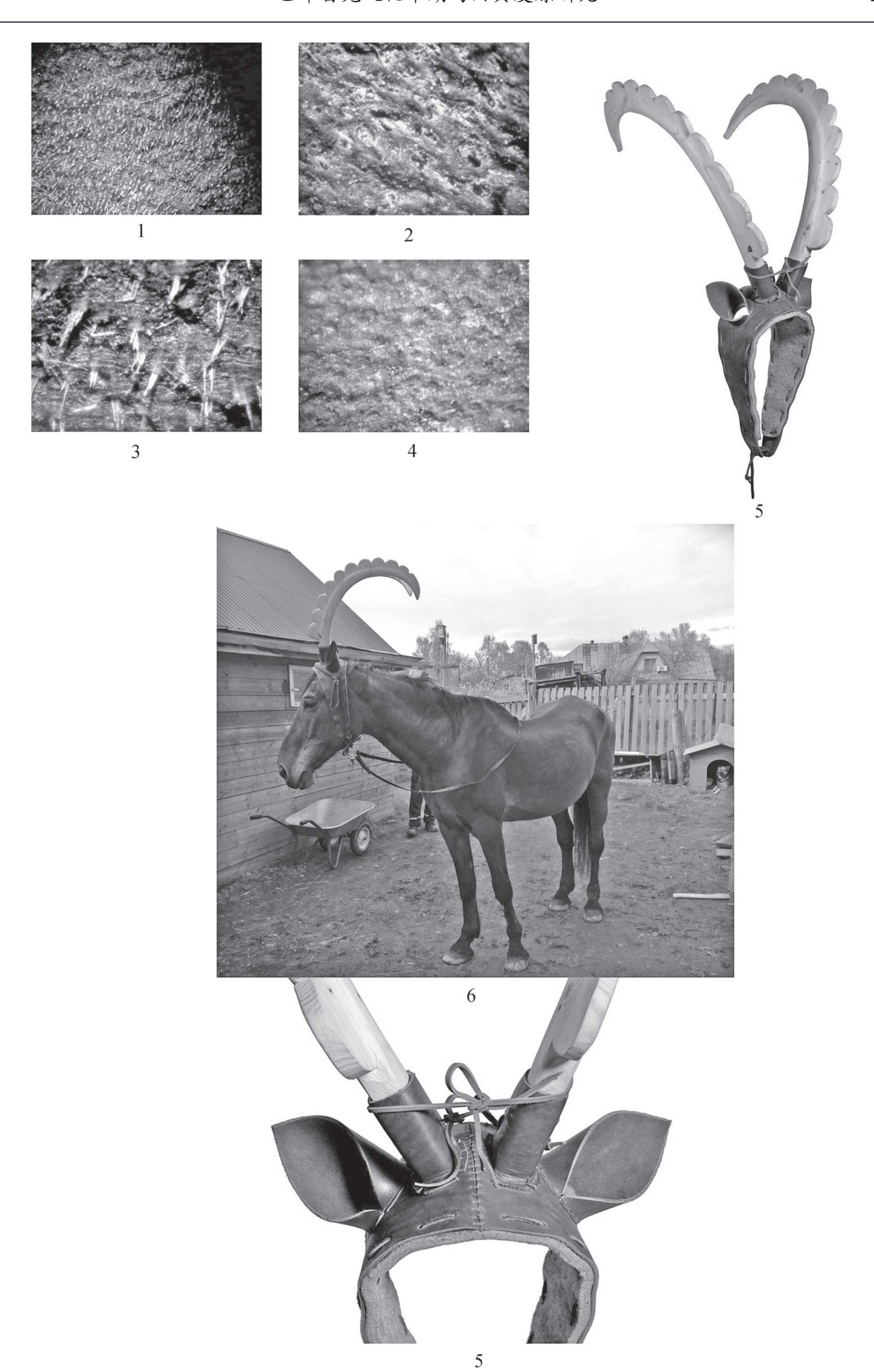
在10倍放大镜下观察，毛皮上的毛发看得很清楚，毛茬分布非常均匀，但不是线性的。推测面具用的可能是小牛（1岁左右）的皮，未进行鞣革。

5. 藏品2179/957b-5（图三，2）

在60倍放大镜下观察，样本上全部的毛发都看得非常清楚，很可能是小牛皮。

6. 藏品2179/957v-4（图三，3）

面具残片里面还有衬毡，在60倍放大镜下观察，毛囊看得非常清楚，样本与牛（奶牛或水牛）的毛皮相似。



图三　Tuektinsky一号墓马面具上皮革的高倍显微镜照片

1. 957b-4的10倍放大照片（马皮）　2. 957b-5的60倍放大照片　3. 957v-4面具内里60倍放大的毛毡（牛皮）

4. 954-1的60倍放大的马面具（牛皮）　5. 巴泽雷克文化早期的马面具（Busova V.S复原拍摄）

6. 在马头上试戴头盔（俄罗斯，圣・彼得斯堡，2014年5月）

7. 藏品2179/954-1（图三，4）

在60倍放大镜下观察马头盔，虽然毛发基本看不到，但可以推测是用大型的牛的毛皮制作的。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推测墓葬中发现的面具是用生牛皮制成的，所有的线是筋腱揉搓而成，脖子处用的可能是小牛的皮。

8. 木质角的分析结果

冬宫博物馆生物科学博士M.I. Kolosova用显微镜分析了Tiktinsky中木质角的8个样本，结果显示，2179/883, 2179/887、890, 2179/879、880, 2179/878是用西伯利亚红松（Pínus sibírica）做成的，2179/885、886, 2179/884是用云杉（Pícea obováta）做成的，这确认了红松在巴泽雷克文化工艺中的主要地位。

三、复原成果

复原主要是为了重建某物的原始面貌，或者是表达与它相关的雕刻、设计、模型的关系。为达到这个目标，在详细研究保存的遗物或残片的基础上，还必须要科学地、尽可能综合地运用相关的考古、图像、文本材料等（Tishkin, Gorbunova, 2004：91）。M.P. Gryaznov曾大量引用过巴泽雷克一号墓中马面具的材料 （Gryaznov, 1950：Fig. 10, 16, 38; Table. ⅩⅢ，ⅩⅩⅢ）， S.I. Rudenko运用田野照片进行了图像的复原（Rudenko, 1953：Fig. 134, 137）。这些成果都得益于永久冻土，墓葬中的遗物才能够在“原位”保存完好，而Tuektinsky墓葬则不然。

Krym Altynbekov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认为在复原和重建的过程中能够促进我们理解考古材料。确实，在复原过程中从实验室的马坑里选择复原模型的方法都值得探讨。另外，在哈萨克斯坦 Berel墓葬里发现的5个面具都有木质“羊”角，虽然并不是同时的，但推测它们都与巴泽雷克文化有关。在11号墓葬里发现了3对角，在10号、4号墓葬里分别都发现了一对，面具只残留纺织品和部分皮革（11号墓葬里）。本人认为Berel面具的基础部分可能是由皮革、毛毡或骨头做成的，因为它上面有用来插角的插孔和皮革质的装饰品。装饰品的复原件已经在国际展览上展出、公布了（Altynbekov, 2014：168～176）。据K. Altynbekov说，这个面具展出时并不是戴在活马头上的，还需另行准备马匹。Berel墓葬里马面具上的木质角和顶端饰是靠角之间的木桥固定的，再插在马头上方15～20厘米处孔里（Myl'nikov 2011：161）。

复原第一阶段在研究Tuektinsky一号墓葬的面具残片过程中，我们重建了两个图像（Busova, 2014：73）。考虑到需要连接木质角和基部的皮革，我们先用纸做模型。此外，我们尝试用刨平的松木做成角和基部连接，这也是最有争议的地方，另外在底部做

了3个中空的孔（名匠M.I.Ivanov）。原始遗物中是从树上切割下一整块木头做角，而在我们的模型中，角是由几部分组成的。

第二阶段我们请了一位精通鞣制皮革的工匠用现在的牛皮制作面具。皮革的厚度为0.3厘米（用成年的牛），里面的毛毡厚度为1厘米，面具用亚麻绳绑定，而出土的面具是用筋腱绑定的。2179/935（b）有两块皮革，在耳朵和“角”之间十字交叉。复原面具由两块叶状的皮革组成，在冠部缝合以戴在耳朵上。用羊毛做的毛毡可能是用胶水黏合的，而我们用一条粗的皮革绳子固定，绕整个面具的边缘一周（编号为2179/954、2179 / 955 ~ 956 a）。为了固定角，我们采用了前文提到的方法，即用皮革绳穿过圆柱形皮革套筒的三个孔，在角外面打结，加之角之间产生的张力，结构就非常稳定。这个实验中，工匠成功地将面具缝合在一起，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推测（图三，5；制革工人A.P. Glyzin-Bogoslavskih）。

最后阶段是在马身上试戴这个复原出来的头盔。我们请一位经验丰富的驯马师从马厩中挑选出一匹最年长的马（37岁），在给它带重达1千克头盔的过程中，它可能没有能力反抗。头饰从侧面戴上，耳朵穿过开口部分，用一根现代的缰绳固定它。整体来看，头盔放上去非常稳定，角也很合适，马戴着头盔还能走路、轻微地斜头，但是不能低头吃草或者做剧烈、快速的运动（图三，6）。

四、结　　语

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么重并且不舒服的东西并不是每个马都能戴的。巴泽雷克冢中两匹最年长的马（2号马和10号马，都是20岁）带着有角的头饰，不仅是仪式需要而且还是非常实际的选择。

根据现有资料运用复原研究的方法，我们科学地复原出了巴泽雷克文化早期的马头盔，但是因为遗物保存状况很差，几乎也没有图像资料，所以复原的过程非常复杂。这项工作是作者个人尝试的，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通过这项复原研究我们知道：在巴泽雷克文化早期阶段，Tuektinsky和Bashadarsky墓葬中发现的马头盔以用山羊角为典型特征，与后期用鹿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变化可能与巴泽雷克社会中关于认知的观念急剧变化有关。通过对修复痕迹和破损地方的观察，我们认为这些马头盔在不同的仪式中被反复使用，最后用在墓葬葬仪中。这种马面具是用当地的青铜制造技术、当时典型的钉子做成的，面具是用牛或马的生皮，角是用雪松或冷杉做成。通过复原和实验，我们了解了巴泽雷克文化中马面具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方式。

参 考 文 献

Altynbekov, 2014 - Алтынбеков К. Возрожденные сокровищ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опыт научной реставрации. - Алматы: Остров Крым, 2014. 360 с.: ил.

Barkova, 1999 - Баркова Л.Л. Конская маска из Первого Пазырыкского кургана. // АСГЭ. Вып. 34. СПб: 1999. С. 97-101

Busova, 2014 - Бусова В.С. О конских масках раннего этапа пазыры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Ладог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и и археологии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XVII Чтений памяти Анны Мачинской (Старая Ладога, 22-23 декабря 2012 г.) и XVIII Чтений памяти Анны и Дмитрия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Мачинских (Старая Ладога, 21-22 декабря 2013 г.). Спб: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14. С. 71-74

Chekhova, 2010 - Чехова Е.А. Конская маска с головой оленя из пятого кургана могильника Пазырык.//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2010 год. СПб: 2011. С. 77-78.

Gryaznov, 1950 - Грязнов М.П. Первый Пазырыкский курган. Л.: Гос. Эрмитаж, 1950. 92 с.

Jerusalemskaya, 2005 - Иерусалимская А.А. Словарь текстильных терминов. СПб: Гос. Эрмитаж, 2005. 96 с.

Haines, 2006 - Haines B.M. The fibre structure of leather.// in: M. Kite, R. Thomson (Eds.), Conservation of Leather and Related Materials, Butterworth Heinemann-Elsevier, Oxford, 2006, P. 11–21.

Myl'nikov 2011 - Мыльников, В.П. Резьба по дереву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Северная Азия) : монография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11. 188 с.

Osipov, 2006 - Осипов Д.О. Обувь московской земли XII-XVIII вв.: Материалы охранных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Т. 7. М.: ИА РАН, 2006. 202 с.: ил.

Polosmak, Barkova, 2005 - Полосьмак Н.В., Баркова Л.Л. Костюм и текстиль пазырыкцев Алтая (IV-III вв. до н.э.).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5. 232 с.

Rudenko, 1953 - Руденко С.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Л.: 1953. 402 с. + 120 табл.

Rudenko, 1960 - Руденко С.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Л.: 1960. 360 с. + 128 табл.

Samashev, 2011 - Самашев З.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Таймас, 2011. 236 с.

Tishkin, Gorbunova, 2004 - Тишкин А.А., Горбунова Т.Г. Методика изучения снаряжения верхового коня эпох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еза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Учеб.-метод. пособие.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04. 126 с.: ил.

Experience of Restoring Horse Masks from The Early Period of Pazyryk Culture

Busova Barbara

Abstract: Pazyryk culture in the Altai is widely known for its unique preservation of material from Pazyryk barrows. From these burial mounds, scholars have found horse headgear with zoomorphic tops. These are thought to transform horses on their way to the afterworld. The elite Pazyryk Scythian burial mounds Bashadarskie and Tuektinskie in the central Altai have permafrost beneath barrows. Almost all of them are looted, and finds in them are mixed, but o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t is clear that there were also burial places of horses in horse-masks. However,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ature of their attachment to the horse's head and a structure does not exist, special studie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historiography are extremely rare. This paper describes unpublished fragments of horse-masks from the First Tuektinskij barrow (collection number 2179, the State Hermitage). The aim of this work was to create a horse mask with wooden tops, imitating horns of a mountain goat, the prototype of which served as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from the First Tuektinskij barrow. We used x-ray fluorescence analysis of metal components, studied leather under the microscope, made analysis of wooden tops.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ed graphic reconstruction, crosslinked horse headgears in full size.

Key words: Central Altai; early Iron Age; the Pazyryk culture; horse masks; horse headgears; X-ray fluorescence analysis; reconstruction

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刘　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2015年10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办的“2015·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会议厅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是一次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国际会议，汇集了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韩国的21位国际学者，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逢甲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等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57位，共计78位学者参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吕学明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先后致辞。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在广义上是对连接中国文明与欧、亚、非三大洲古代文明的交往路线的总称，而“草原丝绸之路”则被认为是这个交流体系中最早的一条，即早在北方草原的青铜时代，这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动脉已经存在，并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为中西文明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这条庞大的文化路线引起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关注。此次研讨会意在推动学术界对于早期中西文明交流重视程度的提高，努力加强丝绸之路、特别是北方草原地带早期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运用最新的成果，逐步构建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清晰框架。

研讨会总计收到来自国内外学者的论文和摘要48篇，有国外15位、中国大陆21位、台湾地区3位，总计39位学者做了精辟而又精彩的发言。研讨内容涉及“发现与研究”“文化与技术”“互动与交流”和“宗教与艺术”四个方面。

一、发现与研究

“发现与研究”这一主题主要由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展示了从中国新疆小河、阿敦乔鲁、东天山地区，到河北元中都、内蒙古辽上京、吉林塔虎城以及蒙古国的突厥墓

和俄罗斯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中世纪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增添了新资料，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丛德新研究员首先做了《天山为桥：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的考古新收获》的报告，阿敦乔鲁遗址及墓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城西约43千米处的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遗址居北，墓葬偏南，两者相距约1.8千米。该遗址考古工作的意义在于：第一，首次在新疆确认了相互关联的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地，为探讨该区域古代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第二，为揭示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具体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将极大地推进新疆青铜时代聚落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第三，阿敦乔鲁居址F1的面积近400平方米，是此类遗存中最大的房址，显示了该遗存在亚欧草原的青铜文化中的重要位置。第四，年代在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之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疆天山北麓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

深处罗布泊西南荒漠的小河墓地（前4000 ~ 前3500）是被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一处考古遗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研究员做了《小河文化及其多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的报告。汇报了2006年至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考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对小河墓地出土小麦及牛、羊等样本进行了DNA分析和动物形态学分析，并选择墓地附近自然地层剖面采集样品进行古环境分析。初步成果主要有：小河的小麦均为普通小麦；小河牛均为黄牛；小河人的生存环境一直有较为强烈的风沙活动，小河文化繁盛的阶段也是这一地区淡水资源比较充分的时段；以及小河人群的遗传构成非常复杂，包括欧洲成分、北亚成分、中西亚成分、东亚成分和南亚成分。

日本德岛大学名誉教授东潮先生报告的题目是《蒙古国境内的两座突厥墓——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将蒙古国境内发现的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古乙突墓定位在东亚和东部欧亚大陆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对乌兰克热姆墓壁画进行图像学分析，同时对墓室结构、墓葬等级、随葬品、陶俑和卤簿制进行探讨。然后，根据蒙古国阿尔罕盖县哈尔·哈尔巴鲁卡斯城（Харбалгас）附近发现的“大唐安西夫人壁记”碑和两座突厥墓，推定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及金微州都督府的所在位置。另外，从唐朝的羁縻统治、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形象来探讨唐朝的天下观和夷狄观。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孙危教授的《贝加尔湖沿岸及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中世纪考古材料与相关研究》一文则主要将《布里亚特史》这一重要史料的第一卷第十章，即中世纪的相关内容向国内学界做一个概要性的介绍。涉及被俄罗斯学界认为其民族属性为拓跋鲜卑的卓尔科里文化遗迹（额尔古纳河流域，公元1世纪），布尔霍图伊文化、萨扬图伊文化与早期蒙古的联系以及库鲁姆钦文化的特点与族属三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就与汪盈助理研究员合作的《辽上京宫城考古新发现和研究》做了汇报。主要是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

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于2014~2015年，对辽上京宫城墙及城门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取得重要收获。通过对辽上京宫城墙的试掘，结合出土遗物推定，宫城墙建于辽代，局部夯土经过增补修筑；毁弃于金代，并有金代房址建于墙体的废弃堆积之上。另外，此次发掘更正了以往资料对辽上京宫城范围的模糊认识和推测，首次确认了北墙、西墙、南墙、东墙的走向、长度、位置以及形制特点。进而第一次探明了宫城四面墙体的完整范围。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彭善国教授《吉林前郭塔虎城为金代肇州新证》一文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论证吉林前郭塔虎城为金代肇州（辽代出河店）故址，而并不是历史地理学界主流意见所认为的辽长春州、金代新泰州故址。其主要依据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塔虎城内的遗存主要为金、元两朝，辽代文物阙如，这与史料所载辽长春州存续近百年的史实不符，且塔虎城辽长春州说还存在文献上的矛盾。将塔虎城推定为金代肇州（辽代出河店）故址，既与文献记载吻合，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强力支持。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主任张春长研究员以《元中都研究新收获》一文结束了该组的汇报，该文是对元中都遗址的深入研究，对元中都与大都之间的驿路提出了新的认识，探讨了“驿路归途因何舍近求远”，“‘辇路’中段走向”，“‘野狐岭’纳钵和孛落驿站的位置”等元中都研究中极为重要且长期存疑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文化与技术

“文化与技术”是一个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的主题，中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其一，是从北方草原地带青铜器的谱系与族属、墓葬青铜器的规制、墓葬出土马具的复原、辽东半岛与蒙古高原大墓的特征比较，探讨了东北亚青铜器作为欧亚草原文化一部分的可能性。其二，是通过对辽西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矿冶遗址的调查，探讨了采矿和青铜冶炼的产业格局的形成，以及东北亚地区钢铁技术的体系框架及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其三，是从汉魏至辽金元时期北方草原地带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遗物，探讨了不同文化因素的共存关系。另外，还有对于居延绿洲西夏至元代居住址和水利灌溉系统关系的探讨。

盖底兹堡学院艺术与艺术史系孙岩副教授做了《地方青铜文化墓葬中商、周风格的青铜礼器——以公元前二千纪晚期~前一千纪上半叶北方青铜文化带的东北区为例》的报告。以北方文化带的东北区为例，在地方族群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和地方文化能动性（agency）的框架中讨论商周风格铜礼器在地方青铜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商周铜礼器的风格、可能的来源、组合、共出器物，以及墓葬中的摆放位置和整体墓葬礼制的特点等几个方面入手，认为在北方青铜文化带东北区不同时间和地域内活跃的人群对商周风格的青铜礼器的使用具有鲜明的多样性和选择性。这些不同体现了地方文化

在与商周文化接触过程中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与当地文化特点和政权结构直接相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韩炳华副研究员的《再论晋西商代青铜器的谱系与族属》一文通过重新整理晋西商代青铜器，提出晋西商代青铜器应该分为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中的青铜器各具特色，分别属于不同的谱系和族属。同时指出，石楼—绥德类型不足以涵盖晋西高原青铜器全部内涵，应该以石楼—绥德类型和上东类型两种类型概括。在族属研究中，提出殷墟卜辞与文献记载的商代西北各族应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研究，从而更加客观地认识晋西商代青铜器及其背后所揭示的复杂的商王朝边境景况。

俄罗斯格拉巴艺术保管中心布洛瓦・瓦拉瓦拉女士在《Tuektinskie遗址出土马面具复原研究》的报告中指出，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得名于巴泽雷克古墓，因其良好的保存状况而闻名于世，墓中随葬大量动物形马面具。然而，我们尚未掌握关于这些面具如何与马头连接、它们的结构如何的准确信息。布洛瓦・瓦拉瓦拉女士的团队以Tuektinsky一号墓葬出土物为原型复原出一个模仿山羊角的木质面具。运用X光荧光分析法对它的物质组成进行了分析，利用显微镜研究了它的皮质并对兽首进行了分析。在已构建的重建图表的基础上交联复制了一个与实际大小相同的马头盔。

韩国庆熙大学校姜仁旭教授汇报了与其研究生赵素恩合作的《阿尔然与岗上：公元前9～前7世纪图瓦与辽东半岛大幕比较分析》一文。通过对阿尔赞-1古墓的发掘及年代、阿尔赞-1号大墓和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圈的南西伯利亚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提出在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产生阶段的所出现的大型古墓并不是因武力与权利集于一人而产生的，而是以礼仪和意识形态为根据，各部落共同发展并且结为联盟的方式而产生的。公元前1000年前，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急剧变化是从阿尔赞大型坟冢开始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初期阶段，在中国东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被发现，由此可以判断与东北亚青铜时代的前期也毫无关系。阿尔赞-1号古墓还揭示了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和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以及他们和亚洲东北部青铜时代的关联性的新视点。

北京科技大学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重点科研基地李延祥研究员以《辽西青铜时代早期矿冶遗址》一文汇报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早期冶炼遗址的研究进展，主要有牛河梁炼铜遗址群、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炼遗址、克什克腾旗哈巴其拉冶炼遗址，采矿遗址有克什克腾旗喜鹊沟、依和沃门特锡多金属矿采矿遗址，以及锡林郭勒盟毛登、石灰窑、千斤沟三处年代有待探明的锡多金属矿采矿遗址。与此同时，还对辽西地区青铜冶金的产业格局进行了讨论，对未来工作方向进行了展望，并提出辽西地区可能是同期中原地区锡料的来源地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在《刍议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对东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东北地区古代钢铁技术的研究存在较多空白，炒钢和块炼渗碳钢的判定标准尚不明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对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发展历程的正确认识。该文拟在梳理中日韩古代铁器制作与年代问题的研究文献的基础

上，重点讨论炒钢的判定标准问题，以为建立更为完备和翔实的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体系框架，提高对钢铁技术传播与交流的认识，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做了《满城汉墓铁匕首所反映的文化联系试析》的报告，结合阿尔赞2号大墓等同类材料，针对满城汉墓出土的錋金柄铁匕首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改变了原有在中原文化体系下对于这件器物的认识。满城汉墓铁匕首无论是器物形制，还是装饰题材以及装饰技法等都将满城汉墓出土铁匕首的来源指向中原王朝西北方向的欧亚草原，其出土的器物组合也反映了一定的特殊意义，并且并非偶然的事物，反映了当时中原王朝与欧亚北方草原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很可能与匈奴等胡人的间接传导活动有关。

日本国学院大学内田宏美女士的报告题为《汉代官营漆器生产的相关问题——以蒙古国诺音乌拉墓葬出土漆器为中心》，以近年来在蒙古国中央省（Tov Aimag）诺音乌拉（NoinUla,Noyonuul）匈奴墓葬出土"纪年铭漆器"为核心，结合中国、日本及蒙古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材料，通过对其铭文进行分析研究来探讨西汉时期漆器生产与手工业。例如对于铭文"缮"字的研究，认为刻有"缮"字的漆器与装有骨签的弩弓是被中央官署内的工匠修复后铭刻，可见汉代存在着中央政府对武器与器物进行严格管理的体制。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新西伯利亚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奇斯佳科娃·阿格尼娅研究员汇报了《诺音乌拉墓地发现的西汉漆耳杯新收获》，诺音乌拉墓地是一座匈奴贵族的墓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此墓地位于北蒙古诺音乌拉山岭，距乌兰巴托130 千米。研究以墓葬中出土的漆耳杯为对象，提出耳杯铭文协助确认陵墓的年代；铭文包括制造年、工名，汉代的管理人员和制造者姓名与岗位；匈奴陵墓随葬包括中国制造品表明匈奴与汉代中国建立了密切文化和亲切关系。耳杯为考工故可确认诺因乌拉墓地是一座匈奴贵族即单于及其陪葬者的墓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讲师森谷一树博士汇报了与博士研究生郝园林合作的《居延绿洲居住遗址和水渠遗址的分布及其关系》。此项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用GIS软件和高分辨率卫星图片探明内蒙古额济纳旗古居延绿洲的水渠遗址和居住遗址之间的具体关系，并进一步辨别汉代同西夏、元代农业开发的地域差异。其一，在汉代，大规模的水渠建设仅限于居延城遗址周边，其他围郭遗址均沿旧黑河支流河边建设，耕地遗址亦沿围郭遗址附近分布。其二，从西夏到元代，耕地遗址、水渠遗址的分布扩大至绿洲西部，并从黑河主流直接引水。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西夏时期居延泽水位十分低下，被当时的居民认为旧黑河支流已经干涸，因而只能从黑河主流处引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王晓琨的《内蒙古伊和淖尔M1出土的人物银碗研究》一文则对包括内蒙古伊和淖尔北魏墓M1出土高浮雕人物银碗在内的，国内外6件同类器物进行仔细的比较鉴别，初步判定：伊和淖尔M1出土的这件人物银碗不是萨珊波斯的典型制品，而很可能是萨珊波斯属国贵霜–萨珊王国的产品，产地可能来

自巴克特里亚地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冯恩学教授汇报了与博士研究生王春燕合作的《辽代金银器中的西域胡文化因素》研究。辽代金银器是辽代考古遗存中引人瞩目的器物，其文化来源是多元的，其中的西域胡文化因素占据了重要地位。辽代金银器中的容器中有明显的突厥文化、粟特文化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带具中有来自突厥文化的蹀躞带，有胡腾乐舞风格的图案艺术，马具中的某些零部件继承突厥马具而来。西域国家与辽朝的关系可见一斑。

三、互动与交流

“互动与交流”是本次研讨会的一组重要议题，由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加拿大、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以新的视角，共同探讨了欧亚草原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以及欧亚大陆早期中西文明的相互交融与碰撞；同时，作为欧亚草原地带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及对其社会内部结构的研究，特别是对前吐蕃时期西藏西部发现的遗存与中亚的关系的探讨，都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

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部林俊雄教授作了《欧亚草原上的迁移与文化交流》的报告。在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上的迁徙路线已经变成向西和向南这样两个方向，骑马的游牧民族的军事活动成为了这个时期最主要的角色。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在游牧民族和中国之间的地壳运动激起了一场大海啸，并且涌向了欧洲。然而骑马的游牧民族被中国打败后就西迁到达欧洲的简单猜想几乎在历史上从未见过。在17～18世纪，在欧亚大陆中部的力量对比是彻底地改变了。俄罗斯帝国向西扩展，而清王朝向北扩展。现在的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版图就是在最后一次扩张的过程中被确立的：从西到东，从南到北。

台湾勤益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事业系胡志佳教授的汇报主题是《1987年后台湾有关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研究之回顾（秦汉至辽金元时代）》。战后台湾有关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从史料汇编、墓志集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断有新的著作产生，也让这条路上丝路文化交流，在海上丝路兴起的500年后，再次活络于学术舞台上。胡志佳教授将台湾自1950以后相关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之学术论著作一一整理分析，以便台湾以外学者参考之用。

美国欧柏林学院的约书亚·怀特教授汇报了《东部草原文化景观研究最新进展》，结合最近在外蒙古戈壁沙漠集中进行考古调查的资料，阐释在欧亚草原进行集中调查的可能性。以东南部戈壁青铜时代早期居民的聚落，即其多种类型的定居系统和纪念物中的居所为实例，讨论大的历史进程中，本地文化景观如何发展，以及地形学在遗址环境中的中心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的《早期东西交互：新的视角》一文，提出了

“权杖头”这一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一个全新切入点。“权杖头”是一种从古到今、贯穿西方文化始终的文化特质，至今仍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故可将其视为衡量东西文化交互的一个重要指示物。研究利用了大量出土于中国境内和近东地区的考古资料，提出权杖最早出现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最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进入中国，代表了东西方接触的最初阶段。文化的交互、技术的引进对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的成长有重要的推动。但是，任何一个文明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都有取舍、也有选择，甚至加以改造、利用。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讲师马健先生的《从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考古新发现看东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融》一文。通过对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资料的梳理与分析，对该遗址群所代表的东天山地区在公元前13世纪～前2世纪的古代游牧民族聚落形态、生业模式、文化面貌及其发展演化规律等方面问题都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大致勾勒出了公元前一千纪以绿洲农业为主要生业方式的哈密盆地和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方式的巴里坤草原在物质文化遗存、埋葬习俗、生产技术等方面互动与交流的线索。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郑君雷教授的汇报主题是《嫩江平原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兼析“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带”等学术概念》。嫩江平原地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与东北文化区的连接地带，考古学上“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地带”“东北文化区”“欧亚内陆”等学术概念的地理范围，均与嫩江平原考古遗存文化属性的认识相关，其中北方长城地带与嫩江平原的文化关系尤其值得关注。郑君雷教授概括了嫩江平原考古遗存和历史背景的基本线索，对嫩江平原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及生业形态的阶段性变化作简要讨论，结合“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长城地带”等考古学概念的辨析，指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不应当包括嫩江平原。

加拿大西肯塔基大学让·吕克·胡乐教授在与希瑟·拜尔利合作的《气候与动因：匈奴时期蒙古高原的社会动力》一文中，评估气候在匈奴帝国兴起和衰亡过程（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中的作用。基于近年来在蒙古不同地区获得的考古资料和气候重建，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组织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古气候数据显示，匈奴时期的蒙古中部气温和降水变化显著，带来蒙古帝国腹地的生产力提升。气候的好转可能因此为加强一元化领导提供了富足的资源。当然，毫不奇怪的是，实际过程要比简单的“气候好转/文化提升”“气候恶化/文化崩塌”复杂得多。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历史学科副教授松下宪一先生汇报了《北魏六镇地望试论》一文。结合北魏六镇地望研究的现状，从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分析了内蒙古高原的北魏遗址与北魏六镇之间的关系，认为北魏武川镇的地望在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抚冥镇的地望在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柔玄镇地望在河北省尚义县三工地镇土城子古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仝涛先生做了《前吐蕃时期的西藏西部与中

亚》的报告。从种类丰富的考古发现和出土遗物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与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中亚地区的相关资料进行联系和比较，以展示和重建两个地区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互通和交流状况。这些代表性的资料包括特征性岩画、丝织品、黄金面具、其他金属器、漆木器、各类珠饰及动物殉葬习俗等。分析表明，西藏西部在前吐蕃时期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中居有一定的位置，丝绸之路从新疆地区延伸到了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对于西藏西部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与东亚研究系关玉琳教授的《中古时期辽帝国研究中新观点与新方法的应用》，结合考古学资料、历史学资料及GIS分析，为研究11世纪宋朝赴辽中都的贡使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团的路线可以在地图上重建，最佳线路和可视域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辽国对外国贡使穿过本国领土的关注及其安置方式。此外，利用贡使信息可以用于人口估算，基于此，进一步利用赤峰其他地区考古资料做出人口密度估算。

四、宗教与艺术

“宗教与艺术”主题历来都是欧亚草原地带古代文明研究的热点，有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及美国学者就早期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尖顶冠形饰、周代贵族配饰的草原文化因素，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大量遗存即来华粟特人的宗教信仰，柔然人在丝绸之路的活动和相关文书的记载，以及当前如何从全球化及全球视野下，重新省思欧亚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应有的地位等，都做了十分精到的探讨。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韩建业教授做的《公元前3至前1千纪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尖顶冠形符号》的报告。公元前3千纪中叶～前1千纪初期，在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陶器上有一种尖顶冠形符号。这种符号在中亚出现较早且渊源有自，而在中国则是稍晚突然出现，故推测很可能存在从西而东的传播发展过程。

台湾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黄翠梅教授的《周代贵族佩饰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一文过对考古发现的大量玉璜组佩、梯形牌联珠串饰资料进行梳理和研究，发现，在公元前5～前3世纪的东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逐渐崛起，不仅周王室的国力渐衰，常见于中原地区上层贵族墓葬中的玉璜组佩也不复流行。相对而言，金属弧形项饰则再次兴起于中国北方广大边缘地带。无论是周代红玛瑙珠的流行、玉璜组佩的再兴或梯形牌联珠串饰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发轫，都与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刺激密切相关。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谭玉华讲师的汇报题目是《古代草原宗教艺术中的拟态母题》。在古代欧亚草原众多的艺术形象当中，拟态母题占有相当的比重，按照拟态模仿者的不同，可以分为人的拟态和动物的拟态两种类型。人的拟态，即在人形之上装饰上鹿角、狮身、翅膀、鹰嘴等不同动物的身体部位，以使人获得以上动物才有的优越性能。动物的拟态，是指在动物形体之上装饰其他动物的身体部位，使前者获得后者的优

越性能。以往研究对此类复合母题的关注不够，通常以动物母题或神化母题来看待，拟态母题概念的提出为探讨古代草原游牧人群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的《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一文对国内外出土的大量粟特研究相关依存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分析，提出四点重要认识：第一，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康居商人皆为粟特商胡。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他们就将四川成都生产的蜀布贩运至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第二，中亚塔拉斯河本为乌禅幕的原始故乡，采用胡须墓。第三，公元前2 世纪，河中地区沙漠绿洲的布哈拉和撒马尔干城主开始发行银币，主要模仿塞琉古和希腊大夏银币，并在钱币上采用粟特文。第四，为了打破安息帝国对丝绸之路的垄断，粟特人开辟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向罗马帝国运送丝绸。公元1世纪末，中国商人可能从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随粟特商队抵达罗马宫廷。

美国斯坦福大学丁爱博教授做了《粟特人史君的宗教信仰》的报告。对史君墓中的图像进行解释。认为带有皇冠的形象代表着袄教中的萨保，皇冠是萨保地位的象征。石椁镶板上描绘了史君及其夫人的灵魂从审判到上天的过程，展现了袄教的生死观念。同时出现了戴有摩尼教式帽子的人物以及佛教的苦行僧形象，这可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俗人往往拥有多形宗教信仰，史君作为袄教教士，同时也负责其所在聚落其他信仰宗教仪式的执行。史君墓所表现的多形宗教应当是折衷主义的一个例子，在其他问题如“汉化”概念的探讨中可能也同样适用。

台湾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周梁楷教授汇报的《欧亚草原文化与世界文明：全球史的视野》一文，从全球化及全球史的视野，省思欧亚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应有的地位。即尝试以欧亚草原文化为核心对象，重新检讨21世纪人们应该有怎样的世界史及史学理论。在考古学、人类学、生化科学等新知识为理论基础，对“文化”和“文明”重新下定义。举莲花和郁金香为实例，说明这两种植物如何从原生地，逐步经过欧亚大陆及其草原，各地的“文化”不只负起传递交流的功能，同时也奉献了独特的创造力。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研究员汇报了《草原丝绸之路与世界视野》，草原丝绸之路不是孤立的一条带，而是一个网络状的连接带，中国古代正是通过一个大的网路推动了古代人类文明交流，促进了欧亚文化发展与经济繁荣的。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在“新经济带”这一理念上，而应是总结2000多年来欧亚大陆多条贸易商业和人文宗教等交流的通道，有着多条不同的引力之道。19世纪初提出的丝绸之路更应注重文明的理念，它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特别“欧亚理念”与“世界视野”是把人们从旧的丝绸之路历史故纸堆中拯救出来的最好契机。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做了《柔然与丝绸之路》的报告。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又一个称雄漠北的游牧汗国。1997年吐鲁番出土的永康九年（474）、十年（475年）阚氏高昌出人出马护送使文书，为探讨柔然与丝绸之路的关

系，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材料。荣新江教授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献和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柔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经历了两天紧张的研讨，会议于18日下午5时圆满闭幕，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林俊雄先生、斯坦福大学教授丁爱博先生、吉林大学资深教授林沄先生出席闭幕式并致辞，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进行了学术总结，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吕学明教授主持闭幕式。

林沄先生在闭幕致辞中表达了深深地喜悦之情，并对本次会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会议的论文质量很好，视野很宽广，涉及地域广泛，总论性强，有哲理性，对与会者的研究将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同时，林先生还对全国各高校考古系及考古单位、中国考古学的中坚力量和青年精英提出了热切希望，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召开这样的国际会议，让世界各地考古学家所想的问题能够互相交流，研究成果能够互相启发，这样我们中国考古学就能更快地发展！希望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步子跨得更快！跨得更大！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进行了学术总结。魏坚教授指出，本次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有四个特点值得总结：第一，来源广泛。即参加本次会议的78位学者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第二，规格甚高。本次会议的与会专家中，来自国外的丁爱博教授、东潮教授、林俊雄教授、贝曼教授、卢克教授等，来自国内及台湾地区的林沄教授、林梅村教授、荣新江教授、李水城教授、水涛教授、伊弟利斯研究员、乔梁研究员、葛承雍总编，来自台湾的周梁楷教授、黄翠梅教授、胡志佳教授等均是欧亚草原文化考古研究方面的佼佼者；第三，安排紧凑。本次会议发言人数较多、且时间都很短短，但我们实现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示更多的成果，聆听更多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看法；第四，兴趣浓厚。本次会议的会场现场人数始终整齐饱满，听众专注，可以说是一场学术上的盛宴。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本次会议是对近几年相关课题研究的一次梳理和总结，同时也是对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验和分享。当然，就我们的研究工作而言，应当说才刚刚起步，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各国学者交流互动的机会，加强彼此的联系。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研讨会再见！

征稿启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创建十周年之际创办的学术刊物。本刊本着加强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普及考古文博知识的宗旨，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要特色，同时兼及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研究。

为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本刊拟每年出版一辑，目前拟设置的栏目包括：①考古新发现；②研究与探索；③考古新视野；④考古与科技；⑤书评等。稿件内容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同时欢迎其他方面的优秀成果投稿。

稿件具体要求：①论文不超过15000字，考古发掘报告字数可适度增加；②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300字左右）、关键词（3～6个）及作者简介；③注释统一采用文后注，注释格式请参考《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的样式；④译文需取得原作者的授权，以免发生版权纠纷。

《北方民族考古》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刊用意见将在收稿后3个月内通知作者。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一经刊用，即奉样刊五本。

联系人：李梅田

电子邮件投稿地址：limeitian@hotmail.com（如邮件超过20M，请发至578134457@qq.com）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邮编：100872

(K-2457.31)

www.sciencep.com



定　价: 158.00 元